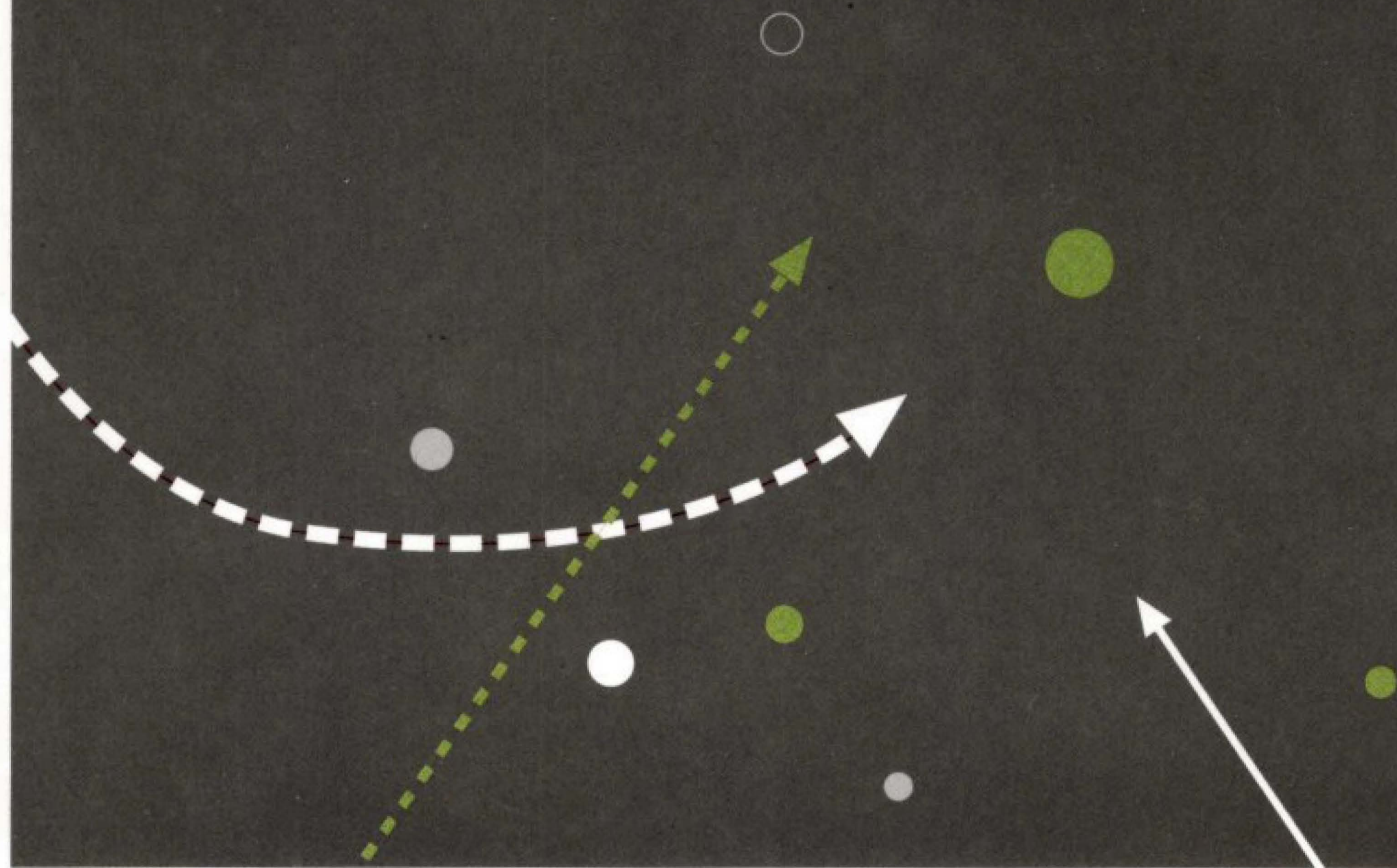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政治与社会译丛

[美] 胡安·J. 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孙龙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总之，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政体可以被认为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五个场域，每一个场域要运行良好，都有其自身基本的组织原理。完全可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没有其他任何场域，或者所有场域的支持，这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民主政体之中，公民社会需要法治对结社权加以保护，也需要国家机器的支持，以对那些试图以非法的方式妨碍人们行使民主权利以组织起来的人，施行有效而合法的制裁。此外，民主制度的每一个场域都对其他场域产生影响。例如，政治社会创制宪法和主要法律，管理国家机器，为经济社会制定规章制度。因此，在巩固的民主之中，这些场域之间持续地相互协调，每个场域都恰好处于其他场域的影响力“范围”之内。

》》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两位有造诣的学者撰写的这部杰出著作，以一种卓越的方式处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对民主政体的创制和培育。

Gianfranco Pasquino, *West European Politics*

本书无疑是当前分析该主题最为全面的著作，也是衡量未来该主题研究的标尺。两位作者理论的精深、分析的技能、深厚的历史知识以及驾驭复杂数据的娴熟能力，使得本书成为近数十年来政治社会学领域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同时，作者简练的文风和表达方式也很值得称道。

Shlomo Avineri,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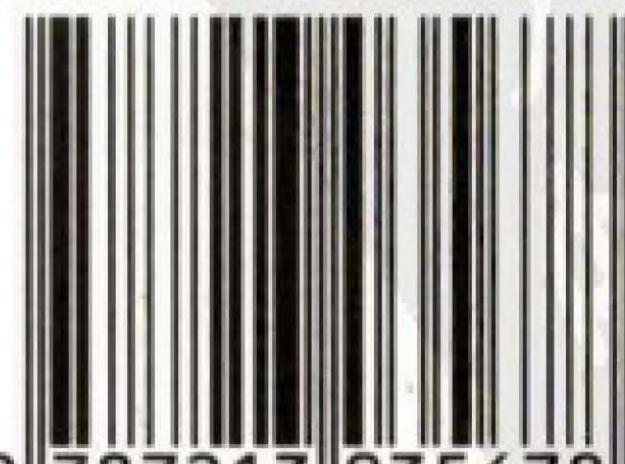
本书力图同时分析三个地区超过15个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问题，我很难想象会有人怀疑它的学术分量和影响力。所有关注全球近期50多个民主化案例并对它们的命运怀有兴趣的读者，必将凝神阅读此书……两位作者承担此项繁重研究的勇气确实值得赞赏。

Philippe Schmitter, *Journal of Democracy*

胡安·J.林茨 (Juan J. Linz) 耶鲁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教授，曾任国际社会学委员会主席、国际政治学会主席。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Alfred Stepan) 曾任中欧大学校长、牛津大学政府学教授和全灵学院研究员，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教授和民主、宽容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ISBN 978-7-213-03567-8



9 787213 035678 >

定价：54.00元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 胡安·J. 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Juan J. Linz & Alfred Stepan

孙龙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

© 199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 (美)林茨, (美)斯泰潘著;孙龙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1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1辑)

ISBN 978-7-213-03567-8

I. 民… II. ①林… ②斯… ③孙… III. 民主—研究—西方国家 IV. 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07643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7-52号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胡安·J.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孙 龙等 译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177号)
-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 印 张 33.25
- 字 数 55.8 万
- 插 页 2
-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213-03567-8
- 定 价 5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一辑主编 景跃进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丛书第一辑总序

作为一项计划工程，本丛书第一辑的书目选择乃是众多考量平衡的结果，其中三个因素值得说明。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理性算计是任何事业得以展开的必要环节。这一变量对于本丛书目录选择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选译之书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潜在读者群，而不应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读物。于是，跨学科性便成为选书的一个操作性标准。

令人宽慰的是，尽管这一标准具有实用的品格，但它并不影响所选之书的学术品位。这固然是由于跨学科性本身并不与学术质量有什么矛盾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书目选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范围。在横向维度上，丛书第一辑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两者杂交的产品——政治社会学，以及经由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脉络而扩展到旁临学科。在纵向维度上，它涵盖了历史研究与当代学术的前沿性探索。

在这一广泛领域中，对书目选择发挥指导或定向作用的坐标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这自然成为选书的第二个操作性标准。丛书第一辑所选作品虽然涉及不同的学科，且具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但它们之间有着一个相似或共同的主题。借用扬(Iris Marion Young)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政治化”(扬使用该术语来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理论的研究概况)。

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改革前后数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高度政治化，到解/去政治(全能国家的消退，非意识形态化，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生活的兴起等)，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所谓“重新政治化”并非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治的回归，而是指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纳入公共领域的视野，或

2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或成为需要政府加以解决的政策议题。从理论上讲,重新政治化过程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发,以及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建设的进步,基于公民行动基础上的广义的利益政治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在众多社会问题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生态环境、性别平等、社会公正等方面——将承担起与公众期望相适应的政治责任。质言之,市场经济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同构效应,使得以前被认为只有在西方国家才发生的事情或现象,我们今天也开始程度不同地面临了。

选书的第三个操作性标准来自学科建设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过选择性的译介以窥见西方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新发展趋势,为本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上述诸种考量虽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总体目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对中国特色的追求(从制度层面到学术品格)是在世界文明这个大舞台上展开的,了解“他者”(尽管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西方”,但其实不止是西方)的过去、当下及发展趋势,乃是追求中国特色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基本背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西方与认识中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翻译与本土研究之关系,亦当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景跃进

2006年冬

中国人民大学

前言与致谢

在我们所编的多卷本著作《民主政体的崩溃》前言的倒数第二段,我们写道:“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分析威权政体崩溃的条件,分析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特别是要分析后威权时代民主政体得以巩固的机制。”^①这本书即代表了我們致力于上述研究议程的努力。

首先对本书的书名作一点说明。作为比较研究者,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大多数政治转型都脱离了过去稳定的非民主政体,但是并没有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s)。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巩固的民主政体。^②而且,如我们在1978年的著作中曾经指出的,甚至曾经巩固的民主政体也有可能崩溃。^③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认识到在所有主要的政治转型之中,完整的民主转型

^①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第 IX—X 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② 事实上,我们相当多的研究工作都用于分析并没有导致完整的民主转型的政治转变。这些国家的突出代表包括王权崩溃之后的伊朗,帕帕·多克(Papa Doc)倒台之后的海地,以及索摩查(Somoza)倒台之后的尼加拉瓜。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一种苏丹制,韦伯将这种形式称为极端的家产制(patrimonialism)。这些案例将在由 H. E. Chehabi 和 Juan J. Linz 所编的关于苏丹式政体及其合法性的著作之中进行分析。一个相互关联,但是在分析上互相独立的问题是,当非民主政权倒台或者被推翻之时,会出现一种不完整的民主转型,同时会产生一种“紧急状态下的过渡政权”,民主选举被无限期(sine die)地推迟,以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参见 Yossi Shain 和 Juan J. Linz, *Between States: Interim Government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身为人权组织美国观察的成员,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经常敦促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不要将民主化一词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等国家的纯粹的选举至上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贬低民主化,这些国家即使在选举之后,军队仍然享有巨大的非民主的特权。

^③ 在第一章之中,我们将对完全民主转型和巩固性民主给出一个宽泛的定义。

在实际上非常少,也由于我们坚持认为,完整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是值得追求的,因此本书将明确探讨民主巩固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实践过程。完整的民主转型,以及稳固性的民主政体,就是本书的关键因变量。在本书中,我们将尽力关注可能的策略(possibilist strategies),也将关注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危机,或者国家的缺席是如何为成功的民主转型创造条件的。

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如下解释路径和观点。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关注点,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与本书其他部分直接相关。在第一章开头我们即对本书的两个因变量,完整的民主转型和巩固性的民主政体,进行了讨论。接着我们论证了这么一个观点,即为什么民主需要五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才能得以巩固,是如何巩固的。这些条件包括: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的政治社会、法治、可资利用的官僚组织(usable state)以及经济社会(注意,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①,任何一个场域都与其他场域相互作用、互相强化。在第一章的剩余部分,我们讨论了七个我们认为对于分析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独立变量,我们以这些变量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命题^②。其中的两个变量非常重要,我们将其称为宏观变量,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加以讨论。

第二章我们讨论了第一个宏观性的自变量,这个变量在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文献之中必须被认真地提到,即国家、民族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这个变量称为国家性(stateness)。我们将阐释为什么主权国家(sov­ereign)的存在是民主以及切实的公民权(citizenship)的先决条件。接着我们将探讨当国家和民族不一致,或者民族国家和民主的逻辑发生冲突之时,不同的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策略对于民主的含义,事实上这种不一致和冲突经常发生。

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宏观变量,即初始政体的类型。我们认为,关于通向民主的路径,可以用修正后的“路径依赖”概念加以概括,这对于我们重新分析现代的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非常重要,不同的转型过程就

① 当我们提出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至少需要包括这些支持条件时,我们心中并没有一种终极性的目的论,因为在每一个稳固的民主政体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五个非常明显相互影响的场域。不过,巩固的民主政体在平等的范围以及参与的热烈程度方面,存在性质和程度方面的显著差异。

② 无论好坏,我们也不会将我们自身严格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历史的特殊性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将讨论一些变量(如领导个性和时机选择)的影响,虽在这里没有形成独立的命题,但是这些因素对于任何特殊个案的历史分析都非常关键。

是以这些非民主政体为起点的。为了进行以上分析,在第三章中,我们首先修正了现代非民主政体的类型学:全能主义政体(totalitarian)、后全能主义政体(post-totalitarian)、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和苏丹式政体(sultanistic)。在第四章我们将尽可能清楚地阐述,对以上四种政体类型来说,哪些是民主转型的有效途径,哪些不是有效途径。我们还要讨论,一个国家从四种政体理想类型之中的某一种开始,到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的过程之中,在五个场域的每个场域之中,必须完成哪些可预期的任务。

xv

第五章我们讨论自变量中的另外五个变量。两个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另外三个是以情境为中心的变量。两个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一个涉及的问题是先前的非民主政体的领导是什么类型,一个涉及的问题是由谁启动和控制着转型进程。三个以情境为中心的变量分别涉及国际影响、合法性和强制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制宪环境。

在本书第二、三和四部分,我们应用第一部分提出的这个框架,对14个国家进行了分析,既进行了跨区域的比较,也进行了区域之内的比较。在研究以及写作的过程之中,作者中的一位或者两位,对13个国家(不包括这些国家的继承者)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进行了多次访问。作者中的一位或者两位还对一些相关的国家,如韩国、秘鲁、玻利维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什么研究这么多国家?为什么排除一些潜在相关的案例?为什么发表形式体现为作者的专著,而不是编论文集?因为从事国别研究的专家对特定国家的理解,必然超过我们。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在这个创造关于民主(和非民主)政治知识的阶段,一个核心的任务是使用非常严格的跨区域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探讨世界不同区域民主化的主要的差异性和类似性。我们相信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从单一作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此外,我们也相信情境化的、区域内的比较分析可以使我们关注并且解释一些主要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在对某个国家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中可能会被忽视。

为了将跨区域分析和区域内比较的优势结合起来,我们决定选择并直接观察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分属三个不同的区域。只有当一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在近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种比较才有意义。这限制了可能

的区域选择范围。^① 我们所选择的南欧,在 1970 年代即处于欧洲共同体民主核心的外围;而我们所选择的南美,属于资本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但并非是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意义上的高级阶段的民主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最后,我们所选择的后共产主义的欧洲,直到最近还处于一种非西方意识形态的体制之下,我们认为,这些地方“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这与新近出现的民主和市场导向产生了一种紧张。

在这三个不同的区域,我们决定考察所有相关国家,而不是选择一些可能具有特殊性或者会在事先导出某些结论的国家。最容易选择的是南欧。在过去的 30 年中,只有三个南欧国家开始了民主转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所以我们的研究包括了所有这些国家。

根据现代史和现代学术研究,我们在南美选择了一组国家。四个相对发达的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早期,民主政体被颠覆了,而按照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的著名分析,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官僚威权政体”。这些政权取缔大众组织,压制公民社会,由等级制的军人团体进行领导(不同于南欧国家),在其制度和层面则留下了“总统制”的遗产,而非“议会制”遗产^②。直到 1987 年,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都还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直接观察可能的转型和可能的失败。^③

① 在 1990 年代早期,这些区域排除了非洲和伊斯兰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思的小型区域。但是这一区域必须包括朝鲜等尚未自由化、民主化的地区。我们相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转型,可以利用我们的分析框架加以研究,尽管它们具有儒教背景。对韩国,特别是对台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我们分析框架中的一个宏观变量,国家性。

② 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Series, 1973), 以及 David Collier 编: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30 多个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比较缺乏分析性,而对任一个案而言,则难以处理。我们认为,这个地区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组国家,每组之间在社会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以及地缘政治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三组包括:安第斯地区,在社会经济方面属于欠发达地区,在文化方面则具有浓厚的本土特性;中美洲地区,在内战和美国的卷入方面更为突出;加勒比的各个小国,在以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多数国家都具有比较长的议会民主的历史。

③ 在 1987 年,智利经济繁荣,等级制的军人团体在皮诺切特(Pinochet)领导下团结紧密,而民主反对派处于分裂之中。在阿根廷,1989 年的民主处于极端危险之中,首位民选总统,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ín),在其就职典礼之后,就一直受困于五次下级军官政变和十二次总罢工,而经济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之中。由于骚乱,阿方辛被迫离职出走。1989 年,在巴西这个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等级制军人团体的影响仍然具有影响力,总统直接选举仍然没有进行,而获得广泛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已经脱颖而出,而在其身后事实上没有组织化政党的支持。在本书写作之时,巴西的民主仍然没有充分巩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我们决定选择所有那些明确归属于苏维埃体系的国家,它们在防务上受制于《华沙条约》,在经济上属于经互会。因此,我们的分析包括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① 对比较研究者来说,目标是认识并且评估共同性和差异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
 所有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它们都接受前苏联强加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制度的统治。但是,除了这些共同的遗产,这一区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在对这些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将后共产主义政治的研究整合进比较政治研究之中,于是我们在本书结束之时试图将这个重要问题,以及后共产主义的多样性纳入一种完全比较性的和理论性的视野之中。^②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迫重新修正并反思我们从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的许多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研究成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本书关于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篇幅最长(我们对这个区域最缺乏专长,而且语言能力也最为缺乏),这有些冒险,而且似乎不符合常理。这种学术探索可能不适合于所有的读者,但至少对作者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xvii

在准备本书之时,我们使用了多种方法:类型学分析,调查分析,内容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和路径依赖分析,博弈分析,对众多关键人物和最有影响人物的访问。我们相信,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民主化的理论导向的、经验性的、同时进行跨区域比较和区域内比较的研究著作,它体现了作者的观点。正是由于这点,在将书稿交给出版社之时,我们即已敏锐地意识到了其固有的局限性。毫无疑问,考虑到基本的历史研究才刚刚有所进展,如果我们用五年时

① 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唯一排除的是民主德国,由于其“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形,就其自身是否合并到已经成型的民主国家联邦德国进行了投票。这样,除了1990年3月18日到1990年10月3日期间,民主德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民主国家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缺少民主德国,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林茨出生在德国,1990—1991年曾在柏林高等研究所(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工作。在以政权“崩溃”为个案对国家性问题进行探讨之时,我们将提到当时民主德国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去秘密化(informer-lustration)综合征。按照我们的标准,南斯拉夫必须排除在外。但是从分析上说,南斯拉夫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和苏联相似。如,在时序上没有民主化而进行自由化,在中央进行多党竞争性选举之前,即在地方共和国实行多党竞选,联邦政体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结果是国家的分裂(其中的例外是斯洛文尼亚)和民族主义政权(ethnocracies)的出现。作为苏联研究的一个延伸,我们将对这种形式的国家分裂结果的探讨扩展到俄罗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这些国家,公民资格问题以及政权民族化问题都成为一个主要问题。阿尔巴尼亚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不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和经互会成员,而在我们的多数研究将要结束之时,它还没有开始民主转型。

② 我们在第一部分描述的理论框架,特别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当代非民主政体的类型学,为分析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差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策略。

间来研究和思考后共产主义欧洲,那将是一部更好的著作。但是,作为力图与我们广大国际学术共同体进行互动的学者,我们相信这本书现在就出版可能更为有用,这样众多正在撰写他们第一部著作的新生代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及实践者,就可以了解我们提出的假设性的观点。我们希望我们的后继者在对现代历史这段最为激动人心、最为艰难的进程进行更好理解的基础上,能够完善,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反驳我们的观点。

xviii 我们还将指出本书的其他局限性。我们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类型,也鼓舞了我们。未来的一个世纪中,这些研究成果将成为历史学家的材料,但是也许和民主理论或者民主化理论不是很相关。一些研究者试图模仿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建立社会物理学或者社会变迁模型,本书可能令这些人失望。但是,我们猜想,这些社会变迁模型也将作为历史资料使用。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宿命。我们所研究的事件发生在历史的时间点上,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之中,发生在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国家和民族之中。我们坦然面对我们研究中所固有的局限性。然而,我们相信,理解这些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之间的事件,是一项非常有价值并且激动人心的任务。无论我们是否成功,分析发生在3个大洲、30多个国家的、至少涉及5亿人口的生活(一位作者是这5亿人口中的一位公民)的这些事件,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①。

本书有很多缺憾,但我们还是要向众多人士衷心致谢。在耶鲁大学(1978年我们在这里撰写《民主政体的崩溃》一书前言之后不久,我们合作开设了第一门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胡安·马奇研究所(Juan March Institute)以及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我们过去或者现在的学生,给我们的写作提供的建议不仅涉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也不止一个,他们就我们先前的分析所做的评论非常有益。我们感谢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同事,他们和我们一起阅读经典的民主理论著作,和我们分享他们关于南欧和南美的批评性洞见,也和我们探讨他们所认为的潜在

^① 我们认为,本书一个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又非常必然的局限性是,由于要将分析纳入一本书的篇幅之中,我们大大压缩了关于南欧和南美“民主转型阶段”的讨论,一如我们在各章的注释之中所做的澄清,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在其他地方已经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我们也省略和简化了一些观点的论证,这些观点在我们过去20年的学术作品之中非常重要,如时机选择、领导风格、宗教和法团主义。当然,在本书之中,我们将我们的分析路径和这些主题统一了起来。

的主要转型式变迁(transformative changes),如韩国、菲律宾、伊朗和波兰,这些国家最终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在这里感谢的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 Nancy Bermeo, H. E. Chehabi, Paloma Aguilar, Ed Gibson, Robert Fishman, Daniel V. Friedheim, Charles Gillespie, Jan T. Gross, Luis Eduardo González, Jonathan Hartlyn, Mimi Keck, Robert Martínez, Guillermo O'Donnell, Vello Pettie, Oleg Protsyk, Cindy Skach, Brian Smith, Hector Shamis, Evelyn Huber Stevens, John Stevens, 以及 Mark Thompson。他们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我们要感谢柏林高等研究所,林茨于 1990—1991 年度在此担任研究人员,并就本书的部分初稿主办了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海德堡大学邀请林茨担任马克斯·韦伯访问教授,对本书的早期工作也是一个鼓舞。两位作者也非常高兴地感谢马德里的胡安·马奇高等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撰写这么一本涉猎广泛的著作的鲁莽行动,也得益于我们作为参与者合编多卷本《南欧民主巩固的政治学》(*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两书之时一些同事的建议和鼓励,前书由我们和 Richard Gunther、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 Jürgen Puhle 合编,而后者由 Linz、Larry Diamond 和 Seymour Martin Lipset 合编。斯泰潘还要感谢两个多年、多卷本的计划,第一个项目由 Adam Przeworski 主持,对东方—西方转型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可持续的民主》(*Sustainable Democracy*);另外一个项目则由 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Laurence Whitehead 主持,最终出版了《威权统治的转型》(*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还要感谢牛津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1993 年的盛情邀请,让他在这里担任资深研究员,而 Timothy Garton Ash、Archie Brown 以及 Alex Pravda 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他们是 Yitzhak M. Brudny, László Bruszt, Richard Gunther, János Kis, Wiktor Osiatynski, Paulo Sergio Pinheiro, Anna Seleny 以及 Samuel Valenzuela。

Richard Rose 应当获得我们特殊的感谢,因为他和维也纳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学社(Paul Lazarsfeld Society of Vienna)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数据库,用于研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变迁以及公众对那些变迁的反应。他慷慨地允许我们广泛使用那些调查数据——当然,对这些数据库如何解释是我

们的责任。同样的感谢应该给予 Hans-Dieter Klingemann, 他允许我们使用关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调查资料, 在各章之中我们都感谢了相关作者。我们特别感谢 Marta Lagos, 因为他使我们接触了“拉美舆情调查”(Latino Barometer) 尚未发表的资料。在我们看来, 民意调查为民主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在我们这样的研究领域里非常重要, 我们也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关于民主的全球舆情调查”。

我们还要感谢很多位总统、总理、部长和反对党领袖, 以及民主转型数以百计的重要的反对者和支持者, 他们接受了时间较长的访问。这些人包括工人领袖, 如波兰的 Lech Walesa, 巴西的 Luís Ignácio da Silva (“Lula”), 他们从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 也包括占统治地位的干部或者军官集团之中的成员, 他们倡导并设计了最初的自由化, 这些人包括前苏联的 Aleksandr Yakovlev, 以及巴西的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 将军; 以及一些签署了历史性文件的政治领导人, 如西班牙前首相 Adolfo Suárez, 乌拉圭总统 Julio María Sanguinetti; 还包括一些专业学者, 他们曾经是公民社会理论家, 而在新的民主制度下他们成了政治领袖, 如波兰的 Bronislaw Geremek, 巴西的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还包括一些领导人, 如阿根廷前总统 Raúl Alfonsín 试图组织法庭审判来民主地对待过去的遗留问题, 比如军人政权如何为“失踪者”承担责任。在本书的相关内容中, 我们在引述这些访问以及其他访谈资料的细节时, 都有针对性地致以了感谢。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衷心感谢福特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机构(Carnegie Corporation), 它们慷慨资助斯泰潘在所有三个区域进行广泛的实地研究, 特别是在 1991—1993 年对后共产主义欧洲进行研究; 他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和中欧大学, 鼓励他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工作, 而免除其学校行政事务。我们再次愉快地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 Henry Tom 合作。我们感谢 Ken Eaton 耐心地制作了索引。

本书的写作和修改, 夜以继日, 费时甚长, 辗转于柏林、巴西利亚、布达佩斯、纽黑文、纽约、马德里、台北和华沙等多个地方。

我们谨以此书献给 Rocío de Terán 和 Nancy Leys Stepan, 他们是在智识及诸多方面的同事和合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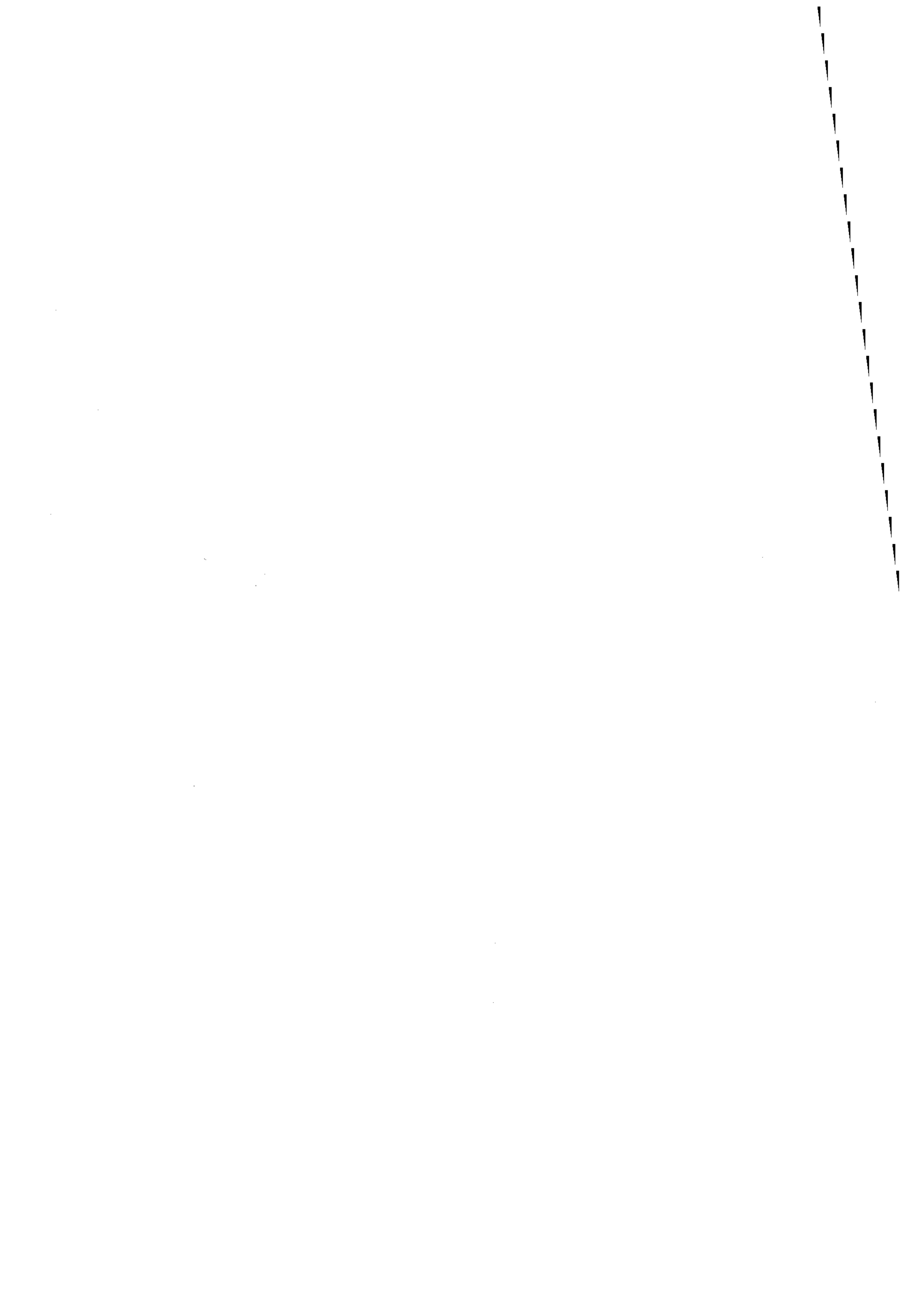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1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第一章 民主及其场域	3
第二章 “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16
第三章 现代非民主政体	40
第四章 初始政体类型对转型路径及巩固目标的影响	59
第五章 行动者与情境	71
第二部分 南欧：民主巩固的完成	
第六章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的范例：西班牙	91
第七章 从临时政府到转型与巩固同步进行：葡萄牙	121
第八章 中下级军人政权的危机：希腊	135
第九章 南欧：总结性反思	144
第三部分 南美：受限制的转型	
第十章 具有风险的巩固民主：乌拉圭	157
第十一章 效力、合法性危机和民主国家的出场：巴西	172
第十二章 从不可能到可能的民主博弈：阿根廷	197
第十三章 不完整的转型/接近巩固：智利	212

第十四章	南美:总结性评论	226
第四部分	后共产主义欧洲:最为复杂的转型路径和任务	
第十五章	后共产主义的史前史	241
第十六章	威权共产主义、伦理性公民社会和矛盾的政治社会:波兰	261
第十七章	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多种形式: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301
第十八章	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影响下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	356
第十九章	“国家性”问题与转型:苏联与俄罗斯	381
第二十章	当民主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冲突之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418
第二十一章	后共产主义欧洲:对比较研究的总结	454
索引		481
译后记		516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第一章 民主及其场域

3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非民主政体的不同特点是如何对民主转型得以完成的路径产生影响,或者不产生影响的。我们还将探讨,在这种处于雏形阶段的民主政体尚未巩固之前,先前的非民主政体的形式对于这一可能的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对问题进行表述之后,我们就要对**完整的民主转型**(*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和**巩固的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y*)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在本书中,对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的状况进行判断之时,我们都将使用如下明确的标准:

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制定新的政策的权力,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不必与其他法律(*de jure*)主体分享权力。

依据这一操作性定义,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民主实践者和理论家坚持要对**自由化和民主化**进行区分。在非民主的环境之中,自由化可能同时伴随着政治变迁与社会变迁,比如,放松对媒介的控制,扩大工人阶级自组织的空间,开始强调对个人合法权利,如**人身权利**(*habeas corpus*)的保护,大赦政治犯,允许逃亡

者回国,也许还采取政策改善收入分配,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反对派的容忍。^①

民主化会导致自由化,但民主化是一个更为广泛而且更具有针对性的政治范畴。民主化要求开放关于政府控制权的辩论,接着便是要求进行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由选举结果决定谁来进行统治。从这些界定来看,很明显,即使没有民主化也可以有自由化。

4 我们关于完整的民主转型的构成要素的讨论,有助于澄清两个问题。首先,转型也许可能启动,但无法完成民主转型,即使一个新的威权政体没有执掌权力。我们的界定可以防止“选举至上谬误(electoralist fallacy)”,即自由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能被视为民主的充分条件。^② 最为常见的进行了选举但没有完成转型的案例是,先前的军人政权(如,1980年代的危地马拉)虽然宣布放弃对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但他们仍然享受广泛的特权,而民主选举的政府甚至在法律上都没有实施统治。第二,我们的定义提出,人们必须就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产生民主政府这个问题形成共识,由此,我们也关注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决策问题。民主拥护者如果在单一制与联邦制、君主制与共和制,或者选举制度类型等问题上缺乏共识,可能就会使正在孕育的民主政府及其决策程序,甚至未来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都出现问题。如果在建立民主所必须的程序上存在制度上的不确定性,那么不仅会导致转型的不完整,而且

① 戈尔巴乔夫在哪些方面有所开放和改革,在哪些方面没有开放和改革,人们关于这些问题在概念上所进行的大部分争论,可以随着对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两个概念的逐步澄清而得到平息。上述关于自由化和民主化差异的辨析,来源于 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1。也可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和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 - 11;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2; Gui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特别是 pp. 81 - 89; 以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9。

② “选举至上主义”(electoralism),或者我们所说的“选举至上谬误”,在近来关于中美的讨论之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参见 Terry Karl, “Imposing Consent? Electoralism vs. Democratization in El Salvador”, 载于 Paul W. Drake 和 Eduardo Silva 编: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1980 - 1985* (San Diego: Center for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6), pp. 9 - 36。也可参见 Abraham F. Lowenthal 编: *Exporting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以及 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 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会影响民主的巩固。我们并不是说,在转型早期的立宪过程之中,在关于什么是最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存在争议。存在这种争议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精英以及大多数人在民主制度问题上存在尖锐而长期的对立和矛盾,就即将出台的制度达不成一致意见,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因此,民主的巩固举步维艰,不仅是由于人们关于民主的价值缺乏共识,也在于人们对于特定的民主制度缺乏共识。

要判断一个转型是否完整,还要完成很多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工作。非民主政体的掌权者往往宣称,他们已经完成的某些自由化变革,对于他们自身的民主来说已经足够充分了。就什么是完整的民主转型所确实必须设定一个清楚的标准,对民主反对派来说,就可以比较容易(向他们国内和国际上的盟友,同时也可以向非民主政体)指出,另外还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工作需要去做,如果有的话。在旧的非民主政权已经倒台或者被推翻,而过渡性政府开始掌权之时,这样的标准也非常有用。这样的时刻充斥着兴奋、全面改革和审判。但是,除非立即承诺完成民主转型所要求的所有步骤,否则这样的临时性过渡政府就可能长期执政。^①

完成民主转型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得到巩固之前,仍然需要完成很多任务,需要创造许多条件,必须培养许多态度和习惯。那么,巩固的民主政体具有哪些特征呢?许多学者在对巩固的民主政体进行界定之时,可能列举这种政体的所有特点,而这些方面可以改进民主的**总体品质**。相反,我们则采纳关于民主巩固的狭义界定,但是这个定义综合了行为、态度和制度等维度。从本质上说,我们认为巩固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情境,在这种情境中,简而言之,民主已经成为“最佳的政体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②。

主要的政治团体不寻求推翻民主政体,或者脱离国家而独立,这样,在行为层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体选择。达到这样一种共识之后,在民主转型过

^① 在第5章之中,我们将对过渡政府进行更为具体的讨论。而关于这种政府的广泛讨论,参见 Yossi Shain 和 Juan J. Linz, *Between States: Interim Government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8—40。

^② 其他关于民主巩固概念的探讨,参见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以及 J. Samuel Valenzuela 编: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而对这个概念特别严格的探讨,参见 J. Samuel Valenzuela,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Post-Transitional Settings: Notion, Process,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pp. 57—104。也可以参见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ies*, pp. 137—155。我们所使用的“最佳的政体选择”一词,即来自于 Giuseppe di Palma。

程之中新生的民选政府,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不再是如何防止民主崩溃。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时,民众之中的绝大多数也都相信,任何进一步的调整都必须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进行,这样,在态度层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体选择。当国家之中的所有行动者都习惯于这么一种事实,即政治冲突必须依据既定规则加以解决,如果违反这些规则,很可能既没有效率又代价高昂,此时在制度层面,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体选择。简单说,随着巩固,民主变成为一种常规,深深地内化于(internalized)社会、制度甚至心理生活之中,同时也内化于以成功为目标的算计过程之中。

我们对巩固的民主政体给出了如下操作性定义:

6 ——就行为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没有重要的民族(national)、社会、经济、政治或者制度性的行动者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的政体,或者用于暴力,或者用于寻求外国的干涉从而获取独立。

——就态度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绝大多数民众都具有这么一种信念,即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反体制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少,或者是或多或少地被孤立于民主的支持者。

——就制度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力量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习惯于在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而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产生于新生的民主程序。

必须注意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当我们说一个政体是巩固的民主政体之时,我们并没有排除其将来可能崩溃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确信,这样一种崩溃与民主巩固历史过程本身的缺点或者问题没有关系,而与一种新的情势有关,在这种情势之下民主政体面临一系列不能解决的问题,而非民主政体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者,而在此之前忠实于民主政体的支持者,开始本能地变成非忠诚的或者半忠诚的支持者。^①

我们要提请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显然并不是认为,仅仅只有一种巩固性的民主政体。最近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研究成果,探讨的正是巩固的民主

^① 从本质上说,这属于研究民主崩溃的文献探讨的范围,这样的文献参见 Joh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编: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与本书或者其他关于民主转型巩固的书相比,该书对这样一种现象的分析更为直接也更为相关。显然,我们并不对与转型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评论。更准确地说,我们的观点是,关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崩溃的文献应该整合成为统一的现代民主理论。从这样一种政体的理论视角出发,“巩固的民主的崩溃”就并非一种矛盾的说法。

政体的多样性。我们也并不否认,巩固的民主政体仍然会继续提高其质量,而提高民主质量的方式既包括所有公民都必须依靠的最低水平的经济稳定性,也包括深化对于国家生活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巩固的民主政体的谱系,是一个从低质量的民主到高质量的民主的连续谱。在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一个急迫任务是,研究如何提升大多数巩固的民主政体的质量。我们本书的目标与此有关,但是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么多的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并且在努力巩固民主政体,因此对巩固的民主政体进行精细的理解,同时具有政治和理论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大多数关于当前的民主化“浪潮”的流行的意识形态性的讨论,都被选举至上论者所主导,以及/或者被市场机制引导民主化的观点所主导。但是,民主的巩固,除了选举和市场以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7

巩固民主的五个场域(arena)

我们认为,巩固的民主政体需要五个相互作用的场域,这些场域彼此之间相互促进,使民主得以巩固。此外,还涉及一个附加因素。

民主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这样,没有现代政治实体(modern polity)可以民主地得到巩固,除非它首先是一个国家。因此,国家不存在,或者国家高度缺乏认同,某一地域上的大量群体和个人试图加入另外的国家,或者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时会产生根本性的并且常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这种“国家性”问题非常基本,却又缺乏分析,因此我们在下章将主要探讨这个主题。不过,就我们此时的讨论而言,只要知道没有国家的存在就没有巩固的现代民主政体存在这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存在有效运转的国家,只有其他五个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条件也同时存在,或者被创造出来,一个民主政体才能得到巩固。首先,必须存在一个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发展的条件。第二,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第三,必须有法律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第四,必须存在一个国家官僚系统(state bureaucracy),可供新的民主政府利用。第五,必须存在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让我们阐述一下,在创造这些相互联系的先决条件的过程之中,牵涉哪些因素。

关于公民社会,我们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自治性的群体、运动和个人,可以相对独立于国家,可以表达其价值观,创造社团及社会凝

聚力,并推动其利益。公民社会可能包括来自于各个阶层(如工会、企业主协会、新闻记者或者律师)的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妇女团体、地域社团、宗教团体以及学术组织)和公民结社。公民社会的理念,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愿景,以及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在拉美可以有效地动员人们反抗军人领导的官僚—威权统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巴西;而在东欧,公民社会起到了关键性的工具性作用,它确保了那些试图行使“似乎具有的自由”者的自主性,最为突出的是在波兰。

8 整个组织性的团体,如合法或者非法的工会、宗教团体、律师协会、教授和学生协会,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复杂网络,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另外一部分社会:那些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普通公民。这些普通公民在执政者/反对者的转换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加入街头抗议、质问警察和官员,首先是表达他们对特定政策的反对,对更为广泛的要求的支持,最终他们会挑战政权。一般情况下,开始时,他们的规模很小,尔后人数越来越多,在某些情况下,其规模有可能超过政权的代表性,迫使当政者认识到正在成长的自由化,最终实现政体变革。不过,这些组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人群尽管很重要,人数众多而且非常勇敢,如果没有加入我们在本书所考察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他们也不可能推翻原来的政权,并且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政权,没有一个动用了武装力量,下命令向人群开枪从而导致大屠杀,这个事实使我们相对比较少地关注非民主政体通过武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可能性。有证据表明,有些领导人确实考虑了这么一种可能性。有时候他们也要求他们的安全力量做好战斗准备(如,在柏林墙倒塌之日)。但是,这种镇压还是没有发生。施行大规模镇压,付出的成本很高,并且很难为这种镇压提供充分的合法性。非民主政权,至少是在南欧、南美南锥区以及大多数东欧国家,并不具有这种合法性,而公民社会中大多数普通的、非组织的民众常常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在时间上还往往早于统治者本身。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部分东欧国家,如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关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社会,我们是指这么一个先决条件,通过政治社会,政治组织围绕如何对公共权力和国家机器实施合法的控制进行竞争。公民社会最多能破坏一个非民主政权。但是,充分的民主转型,特别是民主的巩固,必然涉及政治社会。一个民主政权的形成和巩固,需要人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采取行动,以在价值层面形成一种对民主的政治社会的核心制度的肯定性评价——这些制度包括政党、选举、选举规则、政治领导、政党之间的联盟以及立法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制度,社会形成了其自身的政治构造,选择民主

政府并对其实施监督。^①

就现代民主理论,特别是就如何巩固民主这个问题而言,重要的不仅是要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差异性进行区分,而且要探讨其互补性。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这种互补性。我们在本书中进行论证时,也往往顾此失彼。更糟糕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对公民社会或者政治社会任何一方的支持,时常会诱发一种话语或者一系列行为,而这些话语和行为会潜在地影响另外一方的发展。由于这种对抗很少会公开发生,因此我们将探讨这种潜在的对抗形式,并探讨这些话语和行为为什么以及如何阻碍民主的巩固的。

近期东欧和拉美反抗非民主政体的斗争中,一种话语被建构起来,即强调“公民社会和对立”。这种两分法,在哲学上当然具有悠久的历史。^② 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哲学传统在政治上有利于最近的民主运动,这些民主运动出现的背景是公开的政治组织被禁止或者非常弱小。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在政治上有利于反对派通过创造一种“我们”(us)相对“他们”(them)的伦理政治(ethical politics),将非民主政体及其国家孤立起来。在许多国家公民社会被正确地视为是民主抵抗和转型的众望(celebrity)。

民主转型之时刻,问题出现了。政治社会的民主派领导者常常宣称,公民社会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任务,应该被取消,从而允许常规民主政治的发展。^③ 这种论调体现了不良的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实践。活跃的公民社会不仅推动

① 更早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进行的区分,参见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chap. 1. 将这个概念熟练地应用于具体的历史分析,参见 Paolo Farneti, “Social Conflict, Parliamentary Fragmentation, Institutional Shift, and the Rise of Facism: Italy”, 载于 Linz 和 Stepan 编: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pp. 3–33。

② 关于公民社会在当代的复兴(特别是在东欧和南美),参见 Jean Cohen 和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p. 29–82 有关章节。这部杰出的著作比较好地将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也可以参见 John Keane 编: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Verso, 1988) 的“导论”, pp. 1–31。Cohen 和 Arato 合作的著作也非常有价值,因为它没有将政治社会纳入公民社会。亚诺什·基什(János Kis)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匈牙利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s)前主席,是最早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差异进行讨论的一位思想者兼行动者。参见 Kis, *Politics in Hungary: For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Boulder, Colo: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1989)。

③ 在一些转型社会,公民社会的外在危机只不过反映了这么一种事实,即某些所谓的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先即已经存在的合法的政党建立并且直接引导。当这些政党能够合法地参与政治时,他们就不再将精力用于动员公民社会,在一些案例之中,则是有意识地制约公民社会。这一现象在西班牙的案例中特别引人注意,其公民社会组织由共产党所控制。与此相似,智利的许多公民社会运动由基督教民主党或者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掌控。

了政治变迁,产生了政府和国家,从而启动了民主转型,还可以防止逆转,从而推动转型的完成,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并有助于民主的深化。因此,在民主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一个活跃和独立的公民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去考虑,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并帮助解决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建立起来的虚假的矛盾。危险的是,最初植根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团体,有时候可能会忽略政治社会的发展,这种非常适合公民社会的组织偏好和风格,可能被认为是,甚至确实被当作政治社会唯一合法的组织方式。例如,公民社会的很多领导人以道德好恶的眼光来审视民主力量的“内部冲突”和“分化”。制度性的惯例、政治协调和妥协常常被说成是蜕变(pejoratively)。^①但是,上述每个词汇所指代的都是一个巩固民主政体之中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实践。民主的巩固需要政党,而这些政党的最基本目标即是聚合并且代表不同的民主力量。民主的巩固需要培养一种按照民主规范和程序来解决冲突的习惯。高水准的制度性常规化(institutional routinization)是这些程序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和结构性妥协,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合理而且必须的目标。简而言之,经由公民社会交流信息、施加压力并周期性地更新的政治社会,必须在各种可能的方法上达成一个可实施的合约,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民主权力将被形塑和运作。

为了巩固民主,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必要的自治和独立性必须嵌入法治(rule of law)之中,并得到法治的支持,这是民主的第三个场域。所有重要的行动者——特别是民主政府和国家——必须尊重并且支持法治。就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形式来说,具体体现立宪精神的法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立宪精神需要的不仅仅是多数主义。这就需要在宪政制度方面有相对比较强的共识,尤其需要一种对治理程序进行“自我约束”的承诺,而这些程序的修改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它还需要在法律之间确立明确的等级关系,法律的解释由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来完成,并且得到公民社会中强烈的守法文化的支持。^②

^① 在研究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章节之中,我们将对反政治(antipolitics)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举例来说,如何解释“民族性的公民社会”(ethical civil society)和“标准的政治社会”(normal political society)同时以标准的反对派的形式出现,参见我们研究波兰的章节,特别是表 15.1。在后转型时期的巴西,反政治也造成了问题。

^② 探讨立宪主义、民主、法律文化和“自我约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优秀著作,参见 Jon Elster 和 Rune Slagstad 编: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尤其是 pp. 1-18。

上述三个条件——活跃和独立的公民社会、充分自治的政治社会以及在治理程序、立宪主义和法治方面的基本共识——事实上已经确定了巩固民主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存在一个可以供民主领导人利用的官僚体制,以及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这些条件可望更好地得到满足。

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生活的形式,将对公民权利加以捍卫和保护。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并且为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基本服务,民主政府必须有能力有效地行使其所宣称的在其领土上垄断而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即使国家没有其他更多的职能,它也必须强制征税,以供警察、法官和基本服务之费用。因此,现代民主需要施行有效的命令、管制和提取资源。为了做到这点,必须有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和国家官僚体制,并且能够为新的民主政府所使用。正如我们将要在第二章进行讨论的,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由于多方面原因,这样一种国家并不存在。在本书之中,国家分裂问题在前苏联的一些地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国家没有足够的征税能力,或者在很多地方不够正规化和科层化,这样,公民就不能行之有效地要求其权利受到尊重,或者获得基本的权利,在很多拉美国家,如巴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官僚体制对新的民主政权的可用性(usability),在一些国家也存在问题,这些国家即将离任的非民主政权将任期留给国家官僚体制的许多关键成员(如智利),以在司法和教育方面执行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职能。新民主政体所掌握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可用性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么一些案例之中(如后共产主义欧洲的众多国家),在这些国家,党和国家实际上不存在差异,而党失去了政权,出现了分裂或者被取缔了。

巩固的民主政体的最后一个支持条件涉及经济,我们认为可将这个场域称为经济社会(economic society)。我们使用“经济社会”这个词汇来提请大家注意我们所相信的两个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有可靠依据的论断。第一,在指令经济的条件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非战时(non-wartime)的巩固的民主政权。第二,从来没有,也几乎能确定不可能有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政权会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如果说这两个论断被认为是有充分的依据,那么现代巩固的民主都需要一系列在社会—政治层面经过精心设计并得到社会—政治性的认可的规范(norms)、制度(institutions)和规章(regulations),这些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以在国家 and 市场之间进行协调。

从经验方面来说,还没有证据说明存在于指令经济之中的某个政治实体符合我们对巩固的民主的界定。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是否可以在理论逻辑

上解释这么一种普遍性的经验性结论？我们认为是可以解释的。在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的高度自主性和经济之中所有权的多样性，是保证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活跃性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公民社会有助于民主的发展。同样，如果国家掌握所有的财富，而且价格、劳动力、供给和分配决策都完全由国家通过指令经济加以控制，政治社会的相对自治性就不再存在，而这正是巩固民主所需要的。^①

但是，为什么完全自由市场没有和现代巩固的民主相伴而生呢？在经验方面，关于现代政体的研究一再证明，在所有巩固的民主之中，都存在高度的市场干预和国家所有制。^② 在理论上，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尽管关于市场的自足性受到充斥着极端意识形态、流传甚广而且富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论调的推崇，但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国家管制，纯粹的市场经济既无法形成，也无法维持。市场需要公司法，需要对股票市场进行管制，需要制定关于重量、长度和成分的标准，也需要对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进行保护，这些都需要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第二，即使最好的市场也存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必须进行校正从而使市场运转良好。^③ 即使是亚当·斯密这位极为倡导市场所起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学者，也承认国家是市场发挥这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国富论》一个被人忽视却又非常重要的页码之中，亚当·斯密给现代国家分配了三个不可或缺的任务。

首要的职责是保护本社会免遭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侵略；第二个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之任何成员，免遭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而第三种职责，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

①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在类似的讨论之中提到了产生这个结果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关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例如，在列宁主义掌权的国家)，党一国意识形态明确反对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自治性。而在国家指令经济的案例之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存在巩固民主所需要的特定的物质性需求，如出版自由，因为纸张和印刷物资都被控制了。参见 Dahl, "Why All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Mixed Economies", 载于 John Chapman 和 Ian Shapiro 编: *Democratic Commu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35: pp. 259—282。

② 比如，可以参见 John R. Freeman, *Democracies and Market: The Politics of Mixed Econom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著作之中所列举的关于 14 个发达民主国家的众多文献。

③ 关于市场必然失灵的杰出分析，参见 Peter Murrell, "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no. 4 (1991): pp. 59—76。

公共事务和某些公共设施。这类事务和设施,对于一个大的社会常常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但是,若由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建立和维持,其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付成本。^①

巩固的民主需要市场干预的第三个原因是,民主会就政府应该优先考虑的事务和政策举行自由的公共辩论。如果民主政体从来没有出台政策以生产政府应当负担的公共物品,如教育、健康和交通,以及为公民提供安全网免受市场波动的损害,并采取措施缓解全社会的不平等,民主将无法持续下去。^②当然,从理论上而言,将这些公共政策摒弃在公共辩论议程之外是反民主的。因此,即使在那些假想的发端于纯粹市场经济的民主政体的极端个案之中,现代民主(以及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也将促使纯粹市场经济向混合经济转变,或导向我们称为经济社会的一套规范、规章、政策和制度。^③

13

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分析问题,民主的巩固需要将对社会和政治性的市场管制制度化。这需要经济社会,而这反过来又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即使是试图通过有序和合法的方式限制公有制活动范围(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也都毫无疑问地通过强国家(能力)而不是弱国家来推行其政策。由于国家能力丧失而无法推行任何管制措施,从而导致既有经济水准的大幅度下降,很可能使经济改革问题和民主化问题混淆起来。^④

^①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 1910), 2: pp. 180—181.

^② 现代民主的运行,也常常以合法的方式从市场之中排除一些活动,如出售人体器官,出售儿童所提供的性服务。

^③ 达尔的论证路径也与此相似。“民主几乎确定无疑地摧毁某一种经济秩序,无论是资本主义指令经济还是严格的自由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的受害者获得了自由、权力和机会去从事这件工作,他们将竭力管制市场,以消除或者至少限制他们所认为的破坏性……政治竞争使民选的领导人有动力去回应任何组织化的或者非组织化的人群的观点和建议……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市场的受害者就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政府——或者某些政府(some government),不管是地方政府、州政府、省政府,还是区域政府——以采取干预政策减少伤害性……其结果是,每个民主国家都拒绝了对竞争市场放任自流的实践,尽管他们不是总是拒绝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存在于所有民主国家,这确实是事实;每个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都受到政府干预的调节,这也是一个事实。”参见“Why All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Mixed Economies”, pp. 259—282.

^④ 在后共产主义欧洲,捷克和匈牙利成功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制度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家能力不够强,我们无法谈及经济社会。缺乏经济社会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俄罗斯,人口比匈牙利大15倍,原材料更为丰富,在1992—1993年,仅仅接受了36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匈牙利同期则接受了9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关于这种差异性的多数解释是,匈(接下页)

表 1.1 现代巩固的民主的五个主要场域:相关原则及协调范围

场 域	基本组织原则	来自其他场域的必要支持	与其他领域协调的主要机制
公民社会	结社和通讯 自由	法治保护合法权利; 国家机器捍卫公民社会得以组织的权利,使之 免遭践踏; 经济社会充分多元化,支持公民社会保持必要 的独立性和活跃性	公民社会的利益和价值是政治社会的主要催生 者; 公民社会创造理念,帮助管理国家机器和经济 社会
政治社会	自由和开放的选举竞争	需要取得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可; 需要得到法治对合法权利进行保护,需要国家 机器公正地加以维护	制定宪法和主要法律; 管理国家机器; 给经济社会制定主要的规章制度
法治	立宪主义	深深根植于公民社会的守法文化,受到政治社 会和国家机器的尊重	建立一个法律等级体系,使行为以及其他领域 有法可依,具有可预测性
国家机器	理性—法律的科层制规 范	公民社会对理性—法律权威提供规范性支持 (normative support)并服务于对合法暴力的垄 断;由政治社会征收货币资源,它由一个良好运 作的经济社会所产生,并转付给国家;而经济社 会创造了充分的税收剩余	强制执行公民、政治和经济社会,民主地颁行由 政治社会建立的法律和程序
经济社会	制度化的市场	由政治社会制定合法的规章制度,受到公民社 会的尊重,并得到国家机器的执行	提供必要的剩余产品,使国家可以履行其公共 产品职能,为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多元主义 和自主性提供物质基础

总之,一个现代巩固的民主可以被认为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五个场域,每一个场域要运行良好,都有其自身基本的组织原理。完全可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没有其他任何场域,或者所有场域的支持,这个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例如,民主政体之中,公民社会需要法治对结社权加以保护,也需要国家机器的支持,以对那些试图以非法的方式妨碍人们行使的民主权利以组织起来的人,施行有效而合法的制裁。此外,民主制度的每一个场域都会对其他场域产生影响。例如,政治社会创制宪法和主要法律,管理国家机器,为经济社会制定规章制度。因此,在巩固的民主之中,这些场域之间持续地相互协调,每个场域都恰好处于其他场域的影响力“范围”之内(参见表 1.1)。

15

(接上页)牙利在法律、合同和管制措施(regulatory regime)方面具有一个强大的经济社会,而俄罗斯实际上没有经济社会,但是其指令经济又停止运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 *Wall Street Journal* 出版物, *Centra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Summer, 1994), p. 6。广受传颂的市场成功案例,捷克共和国,事实上也是以政治的方式来对新的经济社会进行设计的最为成功的典型。事实上,斯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指出:“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总理,远远不是他所声称的反国家主义者(antistatist),而是后共产主义欧洲最为明智的国家建设者。”参见 Holme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 in the Czech Republic”,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no. 2(1995): pp. 52—55, 引自 p. 52。

第二章 “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

本章我们将转向国家性问题,该问题理论化不够,但是对民主化非常关键,要求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之前进行充分的探讨。我们的焦点是国家、民族和民主之间的关系。^① 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在普通民众(demos)参与的基础之上,而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的界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哪些应该或者不应该被包含在普通民众的范围之内。我们将从这里引出许多有待分析的问题。

在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之时,很多人倾向于假定,被挑战的是非民主政体,而用民主的方式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合法性系统。但是,在许多国家非民主政体的转型同时伴随着深刻的分歧:哪些在事实上构成了政治体(或者政治共同体),哪些民众或者民众们(大众或者大众们)应该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地理边界的分歧的出现,以及关于谁在这个国家拥有公民权利的分歧的出现,我们称之为“国家性”问题。对一些政治体而言,不存在国家性的问题;而对另外一些政治体而言,国家性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两种类型的政治体向现代民主的过渡,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当前关于民主转型的经典著作没有特别关注“国家性”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南欧和拉丁美洲,在一个地理国家范围之内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构成的挑战,或者关于谁是新的民主政治体的成员这个问题,在整体上

^① 我们所称的理论化不够,主要是指关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主义和现代民主之间的三边相互关系的探讨。当然,最近有些优秀的著作对国家形成史进行了研究。请特别参见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Two: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1993)。

而言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① 即使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Catalan)和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也几乎没有进入理论文献,因为西班牙的国家性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是将关于国家性的系统研究纳入到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理论之中。我们将通过探讨三个不同的问题,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为什么主权国家的存在是现代民主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和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是一个不同的过程?此外,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当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民主是相互补充或者相互冲突之时,特别是两者处于相互冲突的逻辑之时,人们可以为建设民主做些什么?

17

作为民主先决条件的主权国家

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形式。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② 这些论断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成立的。让我们对国家的定义进行考察,以说明为什么上述论断是对的。马克斯·韦伯就现代社会中国家的核心属性,进行了经典而且明确的讨论。

现代国家在形式上存在如下基本特点:它提供一种行政秩序和法律秩序,这种秩序的改变必须有法律依据,行政官员有组织性的职位行为,也受法律规制。这种秩序体系所形成的权威的有效性(binding authority),不仅针对该国的成员,即公民,其中绝大部分的成员资格由其出生地加以界定;也在很大程度上针对其管辖范围之内所发生的所有行为。这样一种强制关系是以领土为基础的。此外,如今只有获得国家的允许或者指示以后,运用暴力才被认为是合法的……现代国家所宣称的

^① 例如,关于民主转型最有影响的是 Guillermo O'Donnell, Phillippe C. Schmitter 以及 Laurence Whitehead 所编四卷本著作,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该书主要研究南欧和拉丁美洲,并且没有讨论国家性问题,以及民族主义问题。

^② 确实,除了现代国家,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前国家(prestate, 甚至是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可能——正如人类学家已经正确地指出的——使用民主程序进行决策。但是,这种形式的决策在根本上不同于我们所用的政治民主(political democracy)一词,政治民主是指现代国家之中权威的产生形式。

对暴力的垄断,被认为是其强制管辖权和组织持续性的一个根本特征。^①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供了一个更新的表述,也注意到了国家控制其领土范围之内人口的能力。按照蒂利的说法,“国家是一个对有确定边界的领土范围内的人口有控制能力的组织,(1)它不同于同一领土范围之内运作的其他组织;(2)它是自治的;[而且](3)它与其他任何国家有正式的边界线”^②。

18 在一定领土范围之内除非存在一个具有这些类国家(statelike)特征的组织,否则政府(即使是民选政府)无法有效地行使其所宣称的在其领土范围之内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无法征收税收(并提供公共服务),也不能运行司法制度。正如我们在讨论巩固民主的五个场域之时所澄清的,不具备这些能力,就没有民主的治理。因此,从逻辑层面和经验层面,这些争辩可以得出同样一个结论,即如果缺乏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组织(如1992—1994年的索马里),就无法实现对该国所有的领土进行民主的治理,尽管不能排除在一些区域形成局部性的政治权威。

如果人们(和我们一样)接受韦伯的论断,即一个组织在成为国家之前,需要在其领土范围之内成功地获得有效的权威,以及蒂利的观点,即国家应该是“自治的”,那么他们也应该清楚,这些对于民主来说也具有极大的(而且我们认为无法超越的)局限性,除非这个领土实体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将以香港为例对这个观点进行说明。1984年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基本协定将基本的立宪权(constitutional prerogatives)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后者最终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政体,无论那里的民主运动范围和力量有多大。

1984年“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的最初表述及协定承

① Max Web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ociology”, 载于 Talcott Parsons 编: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 156.

②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载于 Charles Tilly 编: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0。在同一定义之中,蒂利还认为,国家应该“施行中央集权”(centralized)。我们撇开了这点,这样可以避免给联邦制国家的概念带来混乱,联邦制国家组成主体之间“有正式的边界线”,在蒂利看来,当然是国家。关于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精辟分析,参见 Gianfranco Poggi 所撰写的在历史和理论上都非常扎实的著作,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诺,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现存的法律、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保持50年不变,这很好地说明了不具有国家地位的民主化的局限性。如果我们以一个国家政权(one state)来替代一个国度(one country),它就变成了这么一种证据,即决定什么类型的政治制度的最终权力操控在国家的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其自身的考虑,特别是为了和澳门,尤其是台湾实现统一的计划,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自主性和自治地位,但是这个决定权最终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只有那些受英国和中国的联合声明所捍卫的制度,作为国际条约的一个部分有可能得到维护。

我们由此来讨论一个在民主化的文献中没有被探讨的问题。在非民主化的国家之中是否可能产生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亚体制?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存在于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框架之中,或者是后全能主义的国家之中?从政治上看,可能不能——因为这样做将为全国的公民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看到,有些区域享受了他们所没有的自由。这种不协调将使主权国家持续地形成一种摧毁原来那些民主制度的意愿。但是,还存在更为严峻、更具有根本性的结构性难题。国家仍然拥有权利改变组成单位的政治地位。当然,这样做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冲突,而以达尔式的方式计算出来的镇压成本,与容忍所形成的代价相比,可能导致主权国家逐渐容忍部分地区的民主制度。即使这样,划定一块决策区域,让其保留为我们所说的联邦组成单位,而让其他区域由非民主的中央政府进行决策,仍然会将重要决策权置于民主控制之外。在许多民主的联邦国家,组成单位的公民显然有权以民主的方式参与联邦代表机关,从而参与中央的决策过程。但是,在一种非民主的中央体制之下,他们将没有参与机会,而非民主的体制将制定最重要的决策。这样,后一种情景中的组成单位将不会达到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民主式联邦政体的两个必要标准,一个要求是“在联邦体制之中,全国性的多数人不能优先于少数人,这个少数人在一个宪法上享有特殊地位的地方一级恰好构成多数”,另外一个要求是联邦国家的所有组成单位必须是民主的,这样个体公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必须获得尊重。^①

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之中,例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可能存在非常重要

^① 关于达尔就民主联邦制及其固有(但是可被接受的)局限性,即联邦体制意味着一种由国家的部分公民进行的民主决策形式,所进行的简短但是经典的讨论,参见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Liberty, and Equality*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4—126, 引自 p. 115。

的民主发展,也可能存在某些形式的权力共享,以及与民选代表的重要的商议,但是任何这样的非民主体制,按照我们对政治民主所作的界定,从威斯敏斯特掌握的保留权力来看,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政体,直到联合王国承认印度的独立。民主需要国家的地位。没有主权国家,不可能有可靠的民主制度。^①

20 国家与国家构建,民族与民族构建

现代国家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对此进行论证之后,我们随即将考察为什么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是两个有所交叠,然而在理论和历史上都迥然不同的过程。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并不是一个紧密交叠和牢不可分的过程——我们将说明这两者为什么不是同一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可能对国家性和民主化都带来问题。

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国家构建得以加速。^② 这是基督教帝国(Christian empire)崩溃和君主国(monarchy)之间相互混战的结果,君主国先出现在西欧,随后出现在北欧。国家,如同伟大的历史学家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指出的,是一件“艺术作品”,从其一开始就具有人造的性质。^③ 毫不意外,在描述这个过程之时,人们要调动建筑艺术方面的想象力。国家建构过程并不是一个有机体成长的过程,这点将在稍后讨论民

① 相互分离但是相对独立的单位,如朝鲜与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國大陸,可能在其中的一个组成单位产生民主。但是,精英所意识到的安全威胁,会使军队或者情报组织具有特权地位,从而为民主化进程增添特殊的复杂性。例如,台湾地区的民主化由于法律虚置(legal fiction)而格外复杂。“中华民国”(在事实上只控制台湾和附近岛屿)宣称代表所有的中国人民,因此给来自于大陆地区的“代表”保留了席位,并没有进行连续选举。他们都是“自动延长任期”万年国大代表(prolonged mandates),在他们去世之后才能进行增补。此外,关于台湾争取独立地位的讨论是非法的。重返中国大陆的神话是延续威权统治的一个基本理由。显然,近期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导致保留席位(reserved seats)和万年国大代表的废弃,并开放了关于台湾独立问题的讨论。关于台湾近期变化的讨论,参见 Chia-lung Lin, “Political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aiwan: Institutional Connection in a Divided Society”(北美第一届台湾研究讨论会,耶鲁大学,1995年6月2—4日)。

② 更为详尽和充分的讨论(我们将大量加以引证),参见 Juan J. Linz,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European Review* 1 (1993), pp. 355—369。我们感谢《欧洲评论》(*European Review*)的出版者允许我们将那篇论文的内容转用到本章之中。同时参见 Juan J. Linz, “Plurinazionalismo e democrazia”, *Re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25, no. 1(1995): pp. 21—50。

③ J. Burckhardt,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Bern: Hallwag, 1943)。该书开始一部分的标题即是“Der Staat als Kunstwerk”, pp. 11—144。这本书首版于1860年,流传下来一个对译本(key text)。

族主义时特别强调。国家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有机体的概念,而是一个创造和工艺的概念。

在民族概念——特别是民族—国家概念——激发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之前,国家构建过程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事实上,1500年左右,欧洲的历史地图上有数以百计的政治实体,而到1900年时仅仅存在25个左右的政治实体,在这个政治实体缓慢减少的过程之中,国家构建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①直到法国大革命,受到法兰西共和国支持的处于其外围的共和国,以及稍后受拿破仑支持的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和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其国家构建过程的继续并不建立在民族情操、认同和意识的基础之上。^②出现于15世纪以后的国家,并没有要求其国民在领土边界、历史、文化或者语言方面有强烈的认同。事实上,国家认同和忠诚,常常被认为可以随着王朝之间的联姻(dynastic marriages)而变换。那就是说,效忠的对象是王朝,而不是民族(在许多案例中,民族意识还没有“创造出来”)。

21

然而,很少需要质疑的一点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者生活在现代君主国各组成部分之中的人们对他们共同的国王的效忠,是与原民族感(protonational sentiment)相伴而生的。^③或迟或早,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国家民族—构建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与民主化相随的民族构建过程。这为我们理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增添了困难。^④

对韦伯来说,民族的概念属于价值领域;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合适的期待,

① 例如,可以参见 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Times Concise Atlas of World History* (London: Times Books, 1982), 第79页地图,该图显示,在今天德国这个国家的版图上,1648年曾存在300多个小邦和自由市。

② 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明确或者不明确地在法国大革命和民族主义之间架构起一种强因果联系。在历史上和理论上,这种关系更为复杂。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输出民族主义,因为在巴达维亚和赫尔维希亚建立的共和国是入侵军队和法国占领者的工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和民族主义有关系,那就是在王朝统治者、政治家和外交家保卫其民众的行动失败后,有些时候激起了大众的反革命行动,人们随后将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西班牙对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法国的目标并不是以现代的民族概念为基础划定其“自然边界”,而是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一世在重划欧洲的版图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创建民族—国家供其兄弟们和将军们统治,而是将原来的国家——王国——如西班牙和那不勒斯,或者新创建的国家,如威斯特伐里亚分配给这些人。

③ 参见 Liah Greenfeld 的重要著作,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④ 虽然我们所谓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是民族(nation)的联合,实际上我们处理的事务是各个国家(states)共同的事务。联合国(UN),如果US这个名称没有被美利坚合众国先行使用的话,应该被称为US。

这种期待来源于一个群体在面对其他群体之时的一种特殊的团结感”^①。韦伯也注意到,人们并没有就如下两个问题达成共识:这些群体应该如何划界,这种团结感会产生什么样的一致行动。用日常语言来说,一个民族并不一定由同一国家的人员所组成,即一个民族的人们并不一定获得同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这并不是说民族和国家不能等同,而是说两者并不必须等同。最近德国统一之前的情况就很清楚地说明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尽管很多人共享着一个宣言、要求——这最终表现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倒台和“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宣称中,但是这确实是两个国家,是从一个德意志民族划分出来的两个国家。^②

22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国家与民族两者之间更为重要的差异。民族没有官员,也没有确定的领导职位,虽然其中有些成员成为韦伯意义上的领导者(Träger),承担了民族运动的情感代言人,或者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言人的角色。民族成员的资格并没有清楚的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合法地强制执行(虽然民族主义者常常试图对他们所认同的民族,或者他们宣称应该认同的民族,强行采取行动)。但是,如果没有国家的控制,他们想采取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legally),甚至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legitimately)。民族和民族主义领导人无法以民族的名义拥有强制力或者征税,不能要求人们服从;只有国家才能提供这些资源,才能以有效的方式达到民族的目标。

因此,与国家相比,民族不具备任何组织性特征。它没有自主性,没有领导者(agent),没有规则,仅仅拥有来自于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一个国家可以将其规则的外在一致性作为其存在基础,民族则要求内在的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非常正确。如果没有“想象的共同体”,就没有民族。^③

^① 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参见 Max Weber,“Political Communities”,载于 Guenther Roth 和 Klaus Wittich 编: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11: pp. 921—926。

^② M. Rainer Lepsius,“Ethnos and Demos”,载于 *Interessen, Ideen und Institution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0), pp. 250—251, pp. 232—246。1919年奥地利制宪会议,就其宪法草案的第1条投票时,仅仅只有一票不同意与德国合并,但是合并进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于地缘政治原因而阻止了。这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和德国都出现了国家性问题,削弱了民主。参见 Walter B. Simon,“Democracy in the Shadow of Imposed Sovereignty: The First Republic of Austria”,载于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编: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80—121;关于投票,参见 p. 83。

^③ 参见其代表作,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修订与扩充版, p. 141。

当然,人们会争辩道,一个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脱颖而出的民族,即使它还没有控制一个国家,也可以运用权力,施行暴力,在没有获得国家地位之时即要求人们贡献资源。但是,在一个由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之中,这意味着这种运动正在承担另外一个国家的职能,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秩序,这样,这个国家就会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渐崩溃。民族主义可以创造私人军队实现其野心,并对国家的权威进行挑战,而在一些案例中,国家也失去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在这种案例中,我们称其为出现了内战,或者民族解放斗争,其结果可能是新国家的建立。

虽然我们将现代国家的出现追溯至 15 世纪,但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直到 18 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而到 19 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才成为主要的力量。^① 尽管从历史来看,“民族”开始出现于 19 世纪,大部分出现于 19 世纪的下半叶,但仅有很少一部分民族成为国家构建过程的基础。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德国、希腊,而匈牙利则在“二元君主国”(Dual Monarchy)的框架下进行了民族国家的构建。比利时是一个特殊而有趣的案例:作为一个在 1830 年就已经从尼德兰的统治之下获得独立(虽然从 16 世纪开始就享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的国家,似乎已致力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但在 20 世纪,这个过程又受到佛兰芒(Flemish)民族主义的挑战,于是创设了一种政治制度和实践,成为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国家。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是 19 世纪最强

23

^① 由于某些原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都是在 1983 年首次出版了他们研究民族主义的主要著作,在这里,民族主义正如我们所做界定,出现在 18 世纪晚期。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性(nationality)……如同民族主义一样,是特定类型的文化创造……我试图指出,在 18 世纪晚期的这些创造物,是多种历史力量交汇自然而然的结果。”(参见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第 4 页。)他特别关注印刷语言(print-language)的传播过程:“印刷语言创造了民族主义,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语言。”(同上书, p. 134)他认为,在工业化之前出现在北美和南美的民族主义,语言的差异并不重要,这点具有原创性而且令人信服(同上书, pp. 47—66)。对格尔纳来说,工业化的出现要求发达的书面语文化、劳动分工,特别是需要复杂的教育体制对人们进行教化,使其超越他们在空间方面的直观感知。对格尔纳来说,“外部社会化的强制性可以说明,国家和文化为什么必须联系起来,在过去,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thin),具有偶然性和多样性,并且往往是最低限度的联系。现在,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之中”。参见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8。

有一项重要研究认为,绝大多数现代学者都将民族主义作为 18 世纪晚期的一种运动和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形象地指出“前现代的种族和种族中心主义和晚近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存在越来越广泛的联系”,参见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pp. 43—70, 引自 p. 52。也参见早先引用的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关于欧洲民族主义的早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参见 Guy Hermet, *Les nationalisms en Europ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6)。

的民族主义之一,但是圣史蒂芬(St. Stephen)的加冕将其扩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在以下问题上意见不一,即在多大程度上统一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是加富尔(Cavour)领导的国家—构建过程,而不是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第(Caribaldi)领导的民族—构建过程。^① 虽然德国在统一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德意志帝国(German Reich)更主要是俾斯麦(Bismark)领导的国家构建的产物,而不是民族主义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协定,随着威尔逊(Wilson)自决原则的宣布,使民族构建达到高峰。但是1918年以后出现的新国家,在事实上并非都是民族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新的共和国占64.8%的人口,德意志人占23.6%,罗塞尼亚人(Ruthenian)占3.5%,犹太人占1.4%,而“其他”占6.7%。在波兰,波兰族(Pole)人占69.2%,乌克兰人占14.3%,犹太人占7.8%,德意志人占3.9%,俄罗斯人占3.9%。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占73.4%,立陶宛人在立陶宛占80.1%,爱沙尼亚人在爱沙尼亚占87.6%。三个帝国的分裂,产生了很多新的国家,但是国家之间边界的重新划分并不是民族—构建运动的直接结果。对那些从巴黎和约之中新生的国家,或者那些边界得到扩张的国家来说,很难说绝大部分是民族国家,因为其人口之中的相当部分并非主体民族。列举其中的一些国家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边界扩张之后的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24 那些新国家的主体“民族”(dominant “nations”,或者人口),塞尔维亚、捷克、波兰、立陶宛或者拉脱维亚,可能感到“被解放了”,但是那些非主体民族则可能会认为受到了压迫,如果这些民族形成了独立的民族意识的话,如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的德意志人和乌克兰人,甚至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之中的少数民族。在不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或者压迫程度也各不相同。由于“民族—构建”观念的影响,人们有时候倡导多民族国家的理念,虽然这个理念从来没有实现过。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如何成功地进行国家—构建。人们应该历史地分析,在很多案例之中,如果优先进行民族构建,会导致民主的不稳定和危机,有时甚至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危害到国家自身。一战之后欧洲形成的8

^① H. Ullrich, “Bürgertum und Nationale Bewegung im Italien des Risorgimentos”, 载于 O. Dann 编: *Nationalismus und Sozialer Wandel* (Hamburg: Hoffman und Cape, 1978)。

个新的国家,只有3个——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爱尔兰——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相反,在15个原有国家之中,有9个保持了民主的稳定。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和罗曼洛夫(Romanov)帝国的继承者中,除了芬兰,没有一个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①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巩固的关系的讨论之中,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记录,而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是我们本章的中心议题。研究现代民族主义最有影响的学者格尔纳和安德森所撰写的两本才华横溢的著作,没有一本将民族主义、国家和民主的关系作为核心论题。^② 本章的余下部分将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

民族国家与民主化:不利条件

在什么样的经验条件之下,“民族—国家”和“民主化”形成了互补的逻辑?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它们构成了相互冲突的逻辑?如果它们形成了相互冲突的逻辑,什么类型的行为和制度将最大可能地促进民主的巩固,或者影响民主的巩固?

许多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都假定,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以及民主构成了现代政治体的基本规则,并且在世界上,法国、德国、葡萄牙、希腊、日本和瑞典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这么一种假定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民主还没有巩固的国家,与民主政策相比,民族—国家的政策往往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民族—国家政策,我们是指这么一种政策,

25

^① 参见 J. Linz, “La crisis de las democracias”, 载于 Mercedes Cabrera 等编: *Europa en crisis, 1919—1939* (Madrid: Editorial Pablo Iglesias, 1991), pp. 231—280。在我们看来,芬兰特别有意思。芬兰接近于一个同质性的民族—国家。但是芬兰具有一个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为了成功地塑造国家忠诚,芬兰将瑞典语定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并且确认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在这种背景下,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很容易形成对芬兰民主国家的忠诚;尽管他们保留了瑞典文化制度的重要方面,这些文化制度却得到了芬兰国家的合法性认可。

^② 事实上,两本书在旁征博引之时甚至都没有提到民主。格尔纳在他的其他著作之中,特别是在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之中,集中讨论了民主实践。但是,他在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的中心论题是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在他的作品全集之中,他将民族主义(和民主)视为工业化的一个复杂后果。我们相信,格尔纳的解释,特别是关于世界民主的实际起源及其多样性的经验基础的分析,具有过分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忽视了民主效应的国际性扩散等其他事情,例如印度和许多英属加勒比海国家在广泛的工业化之前,就相继建立了长期存在的民主政体。

国家领导人追求一种罗格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所说的“民族化的国家政策”,以提供文化的同质性。这些领导人有意或者无意地发出这么一种信息,国家应该成为民族的与为了民族的国家(“of and for”the nation)。^① 由此,在他们撰写的宪章以及出台的政策之中,主体民族的语言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有时候甚至成为国家事务和公立学校教育(可能也包括私立学校)唯一通用的语言,主体民族的宗教享有特别的待遇(即使没有必要被确定为官方宗教),而主体民族的文化象征也往往在所有国家象征(如国旗、国歌,甚至包括某些类型的军用符号),以及所有国家控制的社会化方式,如电台、电视和课本之中,都享有特殊地位。相反,在国家构建过程之中,民主政策是指那些强调更为广泛、更不具有排他性的公民资格的政策,这种政策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个体权利。

在什么样的经验条件之下,国家政策逻辑以民族构建为目标,而在什么样的经验条件下,国家政策逻辑以发展合适的民主为目标? 在经验层面,当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都认同一个民族的主观理念时,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将大为减少,民族事实上就接近于国家。只有在以下环境中,这些经验条件才能得到满足:如果在这个国家的边界之外,不存在重大领土争议问题,如果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存在(或者觉醒),并且这个国家之内文化差异很小。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些环境之中,政府领导人才能逐渐推行民主化政策和民族—国家政策。政治实体和民众的这种契合性将有助于民主的民族—国家的创建。从经验上说,这种契合性将大大减少国家性问题,而这应该被认为是民主巩固的一个支持性条件。然而,在现代环境下,很少有非民主国家在开始可能的民主转型之时,就具备高水平的民族—国家的同质性。^② 对于民族—国家的提议者来说不利的事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并/或进行认真的考虑,从而加剧了国家性问题。

26 政治领导人的民族主义雄心,往往与该国的绝大多数民众(population)的实

^① 参见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Note toward a Relational Analysis” (May 1994, 未出版的手稿)。我们在完成本章的前一稿之前收到了该文。

^② 例如,就我们在本书所关心的国家建设而言,只有葡萄牙、波兰、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启动转型之时,差不多具备了典型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同质性。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变成了 22 个国家。在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居住着不止一个民族。在匈牙利,许多匈牙利“民族”居住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巴西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在种族和社会经济方面差异性非常大。

际认识不协调。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认知不协调有很多种类型,所有这些类型都会使民主巩固产生问题,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认真的解决。事实上有很多国家(不仅仅是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质疑国家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很多民族群体寻求民族自决权,主体民族或者(按照苏联术语来说)冠以国名的民族(titular nationality)否认国家事实上的多民族特征,拒绝与其他民族进行任何妥协,使其不具有充分的公民权。质疑国家合法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个国家公民之中的大多数希望加入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因为——如1919年的奥地利或者1989年的民主德国——他们认识到他们自身是那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国家则被想象为民族—国家的具体代表。

影响民主的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是,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被其邻国认为,或者可能被其邻国认为应当由其实施统治,有时候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和平。如果主体民族的领导人试图推行一种有挑衅性的民族构建政策,疏远少数民族,而后者转而向邻国寻求支持,此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这样一种民族构建政策反过来又可能引发邻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此时,如果政府不出面保护他们“同一民族的兄弟们”的利益,或者不施行强硬的领土收复主义政策(irredentist policy),就将失去合法性。不管怎样开始,如果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t)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将对少数民族所认同的外部“祖国”(homeland)的民主,以及邻国的民族—国家构建,都产生重要影响。^①

在关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研究中,忽视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这个变量,不仅对非民主政治实体非常重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民主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事实上,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优先于(prior to)民主制度的创建。达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经典表述:“我们不能在民主理论之内解决民主单位合适的范围和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多数原则的民主程序预示着事先存在一个单位。民主程序的标准是以单位自身的正当性为前提的。如果单位自身(被认为)不正确或者缺乏正当性——如果其范

^①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民族化国家(nationalizing states)、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和境外祖国(external homelands)”三股力量相互竞争的场域,先前所引的罗格斯·布鲁贝克的论文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探讨。例如,纳尔戈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上的亚美尼亚人使亚美尼亚的民主化变得非常复杂。如果阿拉法特(Yasir Arafat)说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使加沙(Gaza)和杰里科(Jericho)民主化,使其成为巴勒斯坦国的核心,那么他将面对一些人的挑战,这些人认为约旦河西岸(West Bank)应当由他们实施统治。

围或领域不合理——那么，民主程序就不能简单地使其具有正当性。”^①

27 我们不认为达尔的重要观察意味着国家性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相反，在多数规则被接受为合法的规则之前，常常有必要开展复杂的谈判、签订协议，并且有可能重新划分边界以及签订同盟条约。但是，正如达尔所宣称，简单地主张多数规则本质上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单位的合适范围已经建立起来。

在这里，民主政体与任何非民主政体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不论非民主政体是“威权主义”、“苏丹式政体”、“全能主义”还是“后全能主义”政体。^② 对于非民主政体来说，关于国家领土范围的共识并不是一个先决条件。非民主政体能够在很长时间内强迫众多民众默许其统治，而不至于威胁国家的团结。非民主政体的中央权威的起源及其维系并不是自由的选举竞争，这一事实意味着如果存在着分离主义或者民族统一主义的渴求，也不会正常的政治过程之中通过常规方式表达诉求，而可能受到简单的压制。

与之截然相反，民主的内涵刚好要求一定领土范围之内的公民就政府得以产生的程序形成共识，从而使政府可以合法地要求公民服从。因此，如果有相当多的民众并不将政府的要求视为合法要求，因为这些民众不想作为这个政治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政治单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那这样的情况对于民主转型，甚至民主巩固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③

对于民主理论来说，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某个领土范围作为一个合适的实体，就其可能的未来进行决策，这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从这里可以得出一种假设：在给定领土范围之内，人们不想成为这个领土实体的成员的百分比越高——虽然它可能被重新组建——在这个单位之内巩固民主的难度就越大。

关于国家之内公民权的共识，在非民主政体之内也不是一个必要而根本性的条件。一个国家之中的多数民族——语言的、宗教的、族群的或者文化的——常常将其规则或者理念施加给少数民族。政府，“宣称代表人民”，不会

^① 参见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07。着重号系原文所加。在访问苏联之后，达尔在其“Democracy, Majority Rule and Gorbachev's Referendum”一文之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参见 *Dissent* (Fall 1991): pp. 491-496。

^② 在第3章中将对这些非民主政体的每种类型进行界定和分析。

^③ 事实上，甚至在民主政体之中，当大部分人或者重要的少数人质疑国家的合法性时，民主的中央政府的回应也往往是停止该区域的民主程序，建立非民主的直接统治，严重时候会限制公民权利甚至触犯人权。我们必须提到北爱尔兰或者克什米尔以支持这个观点。

受到潜在的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制度管道(如法院、开放和自由的选举)的挑战,因为在非民主政体之中,这种诉求管道并不存在。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将少数民族“排除”出选举权或者充分公民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往往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每个人(everyone)都不具有这种权利。

28

但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之中,存在两个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并且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国家之中谁是公民?公民权的规则是如何确定的?民主要求对民众进行界定。而将民众这个概念等同于“人民”(the people)已经引起了问题:谁是人民?人民一词的德语单词,Volk,即已明显地说明民众的定义就存在问题。如果我们说民众即公民——具有个体主义的内涵——而不是具有集体涵义的人民(people)、Volk 或者民族(nation),我们可能会感到容易一些。但是问题仅仅得到部分的解决,因为我们接着将被质问:谁界定的公民权,是如何界定的?在传统上,有两个主要原则得到应用:血统原则(ius sanguinis,依据世袭来取得公民权)或者出生地原则(ius soli,依据出生地作为取得公民权的唯一依据)。也有第三个原则,即依据志愿申请者和批准者两个方面确定公民权。这三种取得公民权的方式都与国家有关:世袭原则一般是指从某个国家的公民那里继承,有时候追溯到非常久远的世代,而不考虑语言、宗教、种族或者主观认同。在出生地原则的情况中,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即出生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以志愿申请为基础的公民权当然与国家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那些试图获得公民权的人必须由国家依据法律批准,或者特批(concession)。

这些将我们带回到我们的基本主张:现代民主治理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性发生联系。没有国家,就无所谓公民权;而没有公民权,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个论断与霍布斯式的没有国家就没有组织化形式的社会的观点没有关系。虽然人类学家已经多次重申,许多社区的亲密关系、成员资格并没有导致正式的公民权的产生,然而,我们的反驳是,如果没有投票,没有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投票,在社区之中没有正式的公民权,没有国家对公民的成员资格进行认证,那么就没有复杂的现代民主。在拉丁美洲和南欧的转型过程之中,关于公民权的界定问题并没有浮现出来。在非民主政体统治之前,公民权由公民权法(或者国籍法)界定,在威权统治之下得以持续(例外的是,在巴西独裁统治时期,卡萨多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并且在民主化的过程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在西班牙,巴斯克乡村和加泰罗尼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否认国家的合法性,但关于人民的界定问题,即谁是西班牙国家的公民的问题,从来

没有成为西班牙的一个问题。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武装分子或者分离分子，从来没有否认作为一个西班牙公民的法律地位。西班牙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苏联一样将国籍(nationality)展示在身份证上。任何西班牙公民，不论其语言、民族自我认同如何，出生地在哪里，在西班牙国境之内都具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但是，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的初始环境非常不同。在 20 世纪的历史上，奥匈帝国和苏维埃帝国的崩溃、纳粹扩张主义和苏联扩张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野蛮的征服与驱逐，以及大规模的边界重新划分活动，使国家性和民族问题特别突出。这片土地上的个体，很多在其一生之中曾经先后成为三个国家或者更多国家的公民或者主人，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出生地。因此，后共产主义欧洲，由于近代史原因而不仅仅是“原始情感”方面的原因，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区域，这些争议包括，谁是公民？国家是什么？以及在罗伯特·达尔的意义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合适的决策单位和国家主权？让我们再次引用罗伯特·达尔另外一段冷静的反思：

特别重要的是，范围(domain)——哪些人构成了这个单位——应该得到明确界定。这毫无疑问是为什么领土边界，虽然从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根本的，但是常常被用来确定单位的范围的原因，特别是如果这些边界可以反映明显的历史或者地理因素之时。相反，领土或者范围的不确定性越高，国家，如果被建立起来，就越有可能卷入管辖权(jurisdictional)争论，甚至爆发内战。^①

民主的一个特征是，不是强调国民，而是强调公民，因此，民主转型往往将国家/民众问题作为政治的核心问题。从以上所有的论述，可以得出三个论断：

1. 在由多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社会组成的国家之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复杂，这是因为就民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将越困难。
2.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多民族或者多元文化的国家，民主不可能得到巩固，但它确实意味着，必须就民主规范、行为和制度进行认真的政治设计。

^①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sis*。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 一些处理国家性问题的方式,与民主内在地不兼容。^①

也许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首先要求我们认真地质疑一些根深蒂固的假定。最为危险的一个观点可以格言的形式概括为:“任何国家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任何民族都应该成为国家。”事实上,依据我们的判断以及我们对这些词汇的界定,世界上现在还不是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中,要有一半逐渐成为民族—国家,并且同时实现巩固的民主,也许是不可能的。

30

这种不利因素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现有国家的大多数是多民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② 要以民主的方式将其变成民族—国家非常困难。从嵌入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结构性因素来说,创造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的几乎唯一可能的民主方式是志愿性的文化同化、志愿性的向外迁移,或者以和平的方式划定新的领土边界,最终由一个国际性的共同体进行支持和领导,并且得到所有政治领导人的接受。这些确实是豪迈(而且具有经验和民主方面的难度)的设想。^③

创建一个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的其他可能性包括,对那些与主体民族(titular nation)语言不同、服饰不同或者宗教信仰不同的人进行隐蔽或者不那么隐蔽的制裁。尤金·韦伯(Eugene Weber)在其经典的研究,《从农民到法兰西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一书之中,对学校、公共服务和军队之中精心设计出来,用以抑制和削弱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构建技

① 很显然,就本书的目标而言,东欧特别是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国家性问题之严重,大大超过了我们所讨论的任何南欧、南美,甚至是中欧国家。

② 在1970年代早期,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估计世界132个国家之中,只有12个“从族群观点来说具有根本的同质性”。参见Connor,“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World Politics* 24(1972):p. 320。其后,依据有些不同的标准进行估计,世界上真正的民族—国家的数量也非常少,参见Hakan Wiberg,“Self-determin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Issue”,载于Iaonn M. Lewis编:*Nation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Ithaca Press, 1983), George Thomas Kurian,*The New Book of World Ranking*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1),以及沃克·康纳对各篇论文的汇编,*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康纳的作品所特有的启发性在于,他证明现代政治科学之中重要学者在同一篇文章之中往往将“民族—国家”与“国家”互换使用。参见Connor,“Terminological Chaos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载于*Ethnonationalism*,尤其是p. 8。

③ 除非,一个民族共同体民主地控制了国家——或者其中的一个子单位——并且致力于使用大量资源、激励手段和有限的歧视性手段进行民族—国家构建,才可能取得局部成功。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为接近的例子是加泰罗尼亚政府推行的语言“规范化”政策,在小学之中有别于西班牙语。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宪政和政治方面对这种规范化政策的质疑正在出现。

术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分析。^① 法国受雅各宾派(Jacobin)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思想的鼓舞,最终成功地克服了文化和语言的异质性。法国有意识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与19世纪西班牙的自由派中央集权主义者(liberal centralist)用同样努力却取得的有限成果,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整个一个世纪之中,特别是在19世纪前75年之中,西班牙和西班牙国家用以创造西班牙认同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现代国家所付出的那些努力远非值得赞扬,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愿意付出的。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如何评估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民族构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在当代背景下如何使这些努力变得切实可行的问题。我们建立在社会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答案是,在今天的绝大多数社会之中,特别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了价值判断)和这样一种努力,注定会失败。我们将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概括成几点。在现代世界,即使在欠发达的边陲,或者族群、文化和语言都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之中,每个社会都产生了一个知识精英群,他们基于感情原因和(我们不能忘记)自利的考虑,将捍卫这种“原始的”价值观和特性。这些精英,正如格尔纳曾经正确地强调的,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之中并不存在。今天他们则存在于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之中。在现代情境之中,所有重要的群体都有作家和知识分子传播其民族文化,而传播体系已经大大增加了移民和他们的家文化保持持续联系的可能性,并且现代民主规范已经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此时,同化政策,即使不是正式的反民主的,也可能不会被导入民主运作设计过程。如果主体民族确实要建立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各种类型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ing)方案往往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方法。

我们关于某些类型的政治体不可能构建民族—国家和民主的论断,也是建立在对世界上人文类型(humanity)的空间分布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的。民族构建的一个障碍可能是语言。但是正如欧内斯特·格尔纳所观察的,世界上的语言也许有8000种之多(没有将重要的方言计算在内)。^② 也许“民族共同体”也是一个障碍;但是,如果出于论证目的,我们假定每十种语言可以构成一种“合适而有效的”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就有800个民族共同体。^③ 但是

^① 参见 Eugene Weber 的杰出专著,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参见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 44。

^③ 这种推测由格尔纳提出,参见同上书, pp. 44—45。

最为重要而且复杂的事实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这么一个既成事实,即文化、语言或者宗教群体相互混合,互相重叠,无法整齐地分割为 8000 或者 800 个民族,并使每个民族都占有合适并且边界清楚的领土。不能用整齐划一的棋盘来进行比喻,合适的比喻应该是无法分离的调色板和杂乱扭结在一起的布料。

让我们对一些有抱负的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族群分布的空间模式进行考察。我们并不反对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柔性分离”(velvet divorce),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相对清晰的文化边界有利于这种领土分离。拉脱维亚试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但是拉脱维亚人口最多的七个城市之中,没有一个城市讲拉脱维亚语的占一半以上。在爱沙尼亚的首府塔林,离俄罗斯的边界有相当距离,有雄心建立爱沙尼亚民族—国家的人们之中,讲爱沙尼亚语的人口刚超过一半。对这些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来说,无法进行简单的领土划分或者“柔性分离”。^①

32

当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变成 15 个国家,所有国家都是以“主体民族”作为基础,一些分析家高兴地认为可能会出现民主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在这些国家第一次选举之时,许多任职者提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的)的纲领。减少主体民族和“移民”之间的冲突的一种可能方案是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所称的“竞争性的同化博弈”(competitive assimilation game)。许多工人阶级移民为了使其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增加生活机会而开始竞争性的同化。这可能发生在文化和经济都充满活力的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工人阶级移民之中。但是,它有可能在中亚的俄罗斯人中发生么? 1989 年,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占 59%,而哈萨克人,该国的主体民族,占 22.5%。只有不到 1%的俄罗斯人会说哈萨克语。比什凯克(Bishkek),吉尔吉斯斯坦首府,这一比例在事实上也差不多。在这种住地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背景之下,没有一个志愿组成的民族—国家能真正推行竞争性的同化过程。在这种情景之下,如果要成为民族—国家,就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

^① 参见阿纳托尔·列文(Anatol Lieven)优秀而且进行冷静分析的著作,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34。即使在文化区分相对清晰的地区(如讲俄罗斯语的克里木,1954 年被赫鲁晓夫划给了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俄罗斯人占多数地区,来自国家主体民族(state-bearing nationalities)的政治家通常也极难允许“分离”。克劳斯总理说服他的政党和大多数捷克人,没有斯洛伐克,他们在经济上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能力非常不具有典型性。

式。事实上,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只会鼓励“殖民性的居住者”(colonial settlers)向俄罗斯日里诺夫斯基(Zhirinovsky)类型的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求助。^①

33 在多民族背景下鼓吹民族—国家还有另外一个不利因素。许多民众,如果他们居住在多民族国家,也许会出于认同原因(或者是为了维护其经济中的多渠道组合方式),偏好多样化的认同,抵制民族—国家的同质化运动。这些民众往往是民族—国家事业的第一个目标。从经验上和情感上来说,当今世界的许多族裔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止认同一种文化和历史,他们具有异族联姻经历,拥有其他民族的朋友,经常在一个国家进进出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可能具有双重认同。民族主义者,无论是来自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和被压迫的民族,都要求人们放弃这样一种双重认同,在二者中选一。事实上,他们常常制造或者强化了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两分法。这就是为什么公民投票能够分裂并且破坏实际的社会联结的一个原因。

多民族国家与民主化:超越相互冲突的逻辑

在多民族国家,民主化如何可能?我们确实就多民族背景之下民主不能巩固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强的假设。在一个给定的国家之内,有这么一些人口,他们出生于该国,或者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外国公民,但是却无法获得该国的公民权,而没有这种公民权的话,生活机会就会受到影响。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口的比例越高,该国巩固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小。

以更加肯定性的语言来表述,我们的假设是,在多民族的背景之下,国家政策具有开放性,能认可平等的公民权,使所有公民都接受国家授权或者强制实施的个人权利的共同“庇护”,那么,巩固民主的机会将会增加。

与其他政治实体相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比如,如果在国家之内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比较明

^① 关于戴维·莱廷对加泰罗尼亚“移民竞争性同化博弈”的分析,以及对前苏联地区中亚共和国可能的“殖民性居住者博弈”的分析,参见 Laitin, “The Four Nationality Games and Soviet Politics”, *Journal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Spring 1991): pp. 1–37。事实上,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主体民族、俄罗斯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本土的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复杂的冲突关系。参见 Martha Brill Olcott, “Kazakhstan: A Republic of Minorities”, 载于 Ian Bremmer 和 Ray Taras 编: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3–330。

显的空间差异,可以实行联邦制。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允许各种多样化的公共机构的存在,如媒介和学校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尊重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允许多种合法的婚姻模式,在法律和政治上允许代表不同社群的政党,在政治程序和设置的安排方面,则实施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所说的“协合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① 一般来说,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单一席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s],取得简单多数票即可以当选[first-past-the-post])可以更好地代表在空间上分散的少数民族。政治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些忠实追随者,强调个人权利和普遍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权利。但是我们认为,将多民族、多文化社会和国家之中民族或者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与**得到国家充分保护的**个人权利结合起来,可能是将民主和非民族—国家政策结合起来时冲突最少的一种方式。^②

34

如果转型的起点是非民主的多民族联邦制度,建立民主的联邦制的一种策略,在选举的次序上可能应该首先在国家层次进行选举,这样可以产生一个合法的框架,然后再仔细考虑如何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分权。如果首先进行区域性的竞争性选举,那么选举可能会助长区域性的民族主义,出现的可能是一族统治(ethnocracy)而不是民主。^③ 但是,多民族国家组织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应该放置在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下进行考虑。按照这些路径,我们认为,现在是重新评估“非地域自治”(nonterritorial autonomy)的众多实验的时候了,这些实验包括民族或者宗教共同体自治,如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犹太人卡巴(Jewish Kaba),奥斯曼帝

① 参见其开创性论文,“Consociational Democracy”,*World Politics* 21 (January 1969) : pp. 207—225,以及其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某些形式的集体权利对特定类型的个体权利和普遍的权利规范演进来说是必要的,这一有趣观点参见牛津哲学家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尤其是 pp. 165—216, 以及 Kim Lane Scheppele, “Rethinking Group Rights”, *The Meaning of Rights in the Former Soviet Bloc Countries* 会议论文, 1994年7月4—5日, 中欧大学宪政与立法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onstitutional and Legislative Polic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布达佩斯。也参见哲学家威尔·金里卡 (Will Kymlicka) 的严谨论证的著作,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特别是 chap. 3,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chap. 4, “Rethinking the Liberal Tradition”; 以及 chap. 6, “Justice and Minority Rights”。

③ 在“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 (Spring 1992) : pp. 123—139, 以及本书关于西班牙和关于苏联国家性的章节之中, 我们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更加详尽的探讨。

国的宗教社区自治 (*millet*), 哈布斯堡帝国晚期的“民族法院” (*national curias*)。^① 这些机制没有消除多民族国家的冲突, 但是它们可以调解冲突, 从而能同时促进国家构建和民主巩固。

我们认为, 应当从理论上、政治上和规范上对国家—民族的可能性进行关注。我们所称的民族—国家是多元文化的, 甚至是多个民族的国家, 但仍然试图努力获得其公民的高度认同和忠诚, 在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支持者看来, 这样的认同和忠诚只有民族—国家才具有。美国是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多种语言的国度, 和瑞士一样。两个国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两者都可以称为“国家—民族”。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领导下, 印度通过灵活和志愿的方式开展了大量的合作活动, 在处理多民族紧张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这一过程, 印度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早期就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民族”。但是, 如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 1990 年代赢得了政权, 而且企图把这个拥有 1.1 亿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变成印度民族—国家, 那么毫无疑问, 公共的暴力将会增加, 印度的民主将受到严重的威胁。^②

在结论部分, 我们讨论一下政治认同。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作品集中探讨“原生性的”认同, 也探讨人们在相互排斥的认同之间进行选择的必要性。但是, 我们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说明了两件事情。首先, 政治认同并不是固定的, 并不是《牛津英语辞典》上的最初的涵义, 该辞典的解释是“在初始状态即固有的, 存在于(或者来源于)初始状态的; 在时间上领先的, 最早的, 本源的, 原初的 (*primitive*), 原始的 (*primeval*)”。相反, 它们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第二, 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政治家(或者秉持粗暴的两分法的社会科学家和人口调查工作者)所创造的强迫人们进行两难选择的氛围, 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可能选择多样化和完整的认同。^③ 事实上, 如果拥有受国家保护的

① 关于这些重要但是被忽视了的试验的初步介绍和解析, 参见 John Coakley, “Approaches to the Resolution of Ethnic Conflict: The Strategy of Non-territorial Aut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 no. 3(1994): pp. 297—314。

② 关于这个主题的两部先驱性著作是 Arend Lijphart, “The Puzzle of Indian Democracy: A Reinterpretation”, 未出版手稿, 1994; 以及 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o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 *Daedalus* 122(Summer 1993): pp. 227—261。

③ 例如, 1982 年在加泰罗尼亚进行调查之时, 问卷设计了五个可能答案供被调查者就他们自身的认同进行选择: “西班牙人”, “首先是西班牙人, 其次是加泰罗尼亚人”, “西班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 一半对一半”, “主要是加泰罗尼亚人, 其次是西班牙人”, 或者“加泰罗尼亚人”。40% 的被调(接下页)

权利的政治“庇护”，享有包容和平等的公民资格，人们追求多样化和完整的认同的能力，可以为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为政治认同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久的，民主领导人的品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政治领导人可以培养多样化和完整的政治认同。政治领导人也可以培养两极化和冲突性的政治认同。^①在波黑种族清洗意识被作为一种建构民族—国家的策略之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其居民具有多元化的认同，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不同信仰之间通婚率最高的一个城市。

本章的核心论题是，如果将成功的民主巩固作为目标，那么掌握国家机器的民主设计者必须认真考虑该版图之内民族、文化和觉醒的政治认同之间的特殊混合情况。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等的条件下，某些类型的民主可能适合于某些类型的国家，即使掌控了国家的精英们竭力建构另外一种类型的国家，也难以取得实质性成功。如果某地域在文化上是多民族的，控制国家的政治精英是可以推行“民族化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不会违反人权，也不会违反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所认定的民主标准，但是那种政策将可能具有混合效应(combined effect)，从而在政治体的五个方面，大大减少民主巩固的机会。多数“民族化政策”(nationalizing policies)在五个方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在公民社会方面，学校和大众媒介将被要求使用官方语言。在政治社会方面，民族化的公民资格法律可能导致在政治官员选举之时，主体民族具有过分代表性(over-representation)。在国家机器方面，向单一官方语言的快速转变将在事实上减少其他民族对于国家提供的服务的参与。在法治方面，法律体系将加速取代即将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各种风俗、习惯和制度。最后，在经济社会方面，主体民族，假定的民族—国家的主人，如果施行私有化的话，将被赋予特殊的(甚至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进行土地分配或者资金分配。相反，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民主巩固，民主化的策略将要求减少多数主义，在如上每个方面设计更多的具有共识性的政策。

37

(接上页)查者认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一半对一半”(选该项的人最多)。参见 Juan J. Linz, “De la crisis de un Estado Unitario al Estado de las Autonomías”, 载于 Fernando Fernández Rodríguez 编: *La España de las Autonomías*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dministración Local, 1985), pp. 527—672(上述数据在 p. 560)。

^① 参见 Linz 和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pp. 123—139。

表 2.1 国家、民族和民主化的关系(假定不存在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议)

“主体民族”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和行为					
主体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特点	以民族—国家为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文化差异具有正当性	精心设计某种联邦或者准联邦制度,和/或进行准联合民主实践 (quasi-consociational practices)	在原则上认为,可以通过和平、民主的谈判方式进行分离	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或者非常弱势的国家领导人
不存在其他民族,而且文化和族群差异很小	民主的民族—国家可以容易得到巩固并变得强大		单一民族的民主国家容易建立起来		
不存在其他民族,但具有广泛的文化多样性		民主的民族—国家可以容易建立起来	单一民族的民主国家容易建立起来		
其他民族存在,但是没有觉醒	可能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	民主的民族—国家可以容易建立起来			
其他民族存在而且觉醒了	冲突产生,民主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民主的民族—国家可以存在,但是存在向右边的类型转变的压力	多民族的国家才具有民主的可能性。如果精心设计,民主可以得到巩固	如果存在明确的领土界线,可能实现和平分离,两个新的国家都可能建立民主。	
其他民族存在,而且具有进攻性	产生了众多冲突和镇压,民主非常难以巩固	民主的民族—国家可以存在,但是如果巩固应该向右边的类型转变	多民族的国家才具有民主的可能性,但是民主巩固的难度很大具有向右边类型转变的压力	如果没有明确的领土界线,不可能出现“柔性分裂”,如果战争持续,民主不能得到巩固。	
没有一个集团具有充分的凝聚力和认同,从而成为民族的构建者。					国家不可能存在,故民主也不可能。

注:这里所使用的映射空间 (property space) 的概念最初由 Paul Lazarsfeld 提出。参见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ader i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1), pp.40-62。

最后的政策指向与时机有关。政治领导人只有预先就某些类型的政策和决定进行讨论、谈判,并且贯彻这些政策和决定,才能处理民主的这些潜在难题。如果丧失了这种政策改良的机会,可资利用的机动空间的范围将受到限制,社会冲突机制可能会强化,这样民主巩固将会变得更加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

我们以表 2.1 来总结本章,以讨论民族—国家和民主化兼容的可能性及其限制,并进一步阐明在何处、何时推行某些预定的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并具有民主导向。^①

^① 表 2.1 没有讨论那些在两个邻国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施行民主的后果。对这些进行描述需要更复杂的表格。

第三章 现代非民主政体

民主的转型和巩固包含了从一个非民主政体向一个民主政体转变的运动。然而,在转型的可行路径,以及新建立的民主政体在得到巩固之前所需面对的未完成的任务方面,特定的政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的主要努力就是要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许多(尽管并非全部的)这类变体可以通过先前的政体类型得到解释。

在过去 25 年多的时间里,有兴趣对世界上不同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的分析家所运用的主流概念框架一直存在着三种区分,即民主政体、威权主义政体和全能主义政体。新的范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们帮助分析家看到了他们过去所忽略的共同属性和隐含意义。当胡安·林茨写作他 1964 年的论文《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西班牙》时,他是想让大家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时被看作是两种主要的稳定的政治极 (political poles)——民主极和全能极 (totalitarian pole)——之间,存在着一种政体形式,它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并且也是一个稳定的政体类型。尽管这种类型是非民主的,但林茨认为,在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动员这四个关键方面,它与全能主义政体有着根本的区别。这自然就是他所称的**威权主义政体**。他将它们定义为:“政治系统具有有限的、不承担责任的政治多元化,没有精致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具备独特的精神,且除了在发展中的某些时刻外,不存在广泛或深入的动员,由一个领导人或者有时是一个小团体行使权力,这些权力受到正式的但不甚明了的限制,而它们事实上又是可以预测的。”^①

^① Juan J.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载于 Erik Allardt 和 Yrjö Littunen 编: *Cleavages, 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 (Helsinki: Transactions of the Westermarck Society, 1964), pp. 291—342。重载于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s 编: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pp. 251—283, pp. 374—381。页码引用参见 1970 年版。该定义在 p. 255。

20世纪60年代,分析家试图建构类型用以比较、对比世界上所有的制度类别时,威权主义这一类别被证明是有效的。当新的范例为比较学者所掌握时,两个有些让人惊讶的结论出现了。首先,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有更多的政体是“威权主义的”,而不是“全能主义的”或“民主的”,或是两者的结合。^①因此,威权主义政体是现代世界的常见政体类型。其次,威权政体并不必然向另一个政体类型转变。林茨关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西班牙的研究显示,威权主义政体的四个独特方面:有限的多元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受限的领导权以及弱动员,能够长期地凝结成一个不断加固、一体化的、相对稳定的制度。^②

39

类型学的兴起或衰落随它们对研究者的分析用途而定。我们判断,现有的三种政体分类对民主理论家和行动者不仅逐渐地丧失了以往的用途,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障碍。类型变化的部分情形始于我们需要分析的经验领域的影响。如果我们很粗略地环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世界,有多少个国家能持续十年被令人信服地称为“民主政体”?有多少个国家在那整个时期都非常接近全能极?当然,答案具有内在的主观性,它涉及类型学中关于国家分类尺度的不同看法。但幸运的是,两个独立地组织起来的研究都努力依据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来考量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③ 这些研究中所运用的标准很明

① 例如,参见本页脚注③和下页①包含的数据。

② 参见 Juan J. Linz, "From Falange to Movimiento-Organización: The Spanish Single Party and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68", 载于 Samuel P. Huntington 和 Clement H. Moore 编: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128-203。另外参见 Linz, "Opposition in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载于 Robert A. Dahl 编: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71-259。

③ 其中一项努力的贡献者是米歇尔·柯培基(Michael Coppedge)和沃尔夫冈·赖尼克(Wolfgang Reinicke),他们试图将罗伯特·达尔主张的一个多头政治所必须具备的八项“宪法保证”付诸实施。基于在1985年中期所作的政治环境评估,他们为137个多头政治标准的国家赋予了价值。结果可以参见“A Measure of Polyarchy”,这是为1988年5月27-28日在胡佛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举行的测量民主讨论会所准备的论文;也参见他们的“A Scale of Polyarchy”,载于 Raymond D. Gastil 编: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87-1988*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0), pp. 101-128。达尔开创性的关于多头政治所需的“宪法保证”的论证可参见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6。

其他将民主标准付诸操作的主要努力是 Freedom House 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年度评估。顾问小组在近年来吸收了诸如 Seymour Martin Lipset、Giovanni Sartori 和 Lucian W. Pye 这些学者。他们在1978-1987年间每年赋予它们的标准的价值可参见 Gastil, *Freedom in the World*, pp. 54-65。

确,因而其结果得到了高度认同。如果我们运用这些研究和传统的三种政体类型区分,结果将发现,超过90%的现代非民主政体分享着共同的类型学空间,即“威权主义”。^①很明显,既然有如此多不同类型的国家分享着同一类型学的“起始点”(starting place),那么这种政体类型的类型学便不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在可能的转型路径和巩固任务中极为重要的变化的范围,而这些变化我们相信事实上是存在的。在这章的其余部分,我们的目标是重新阐明构筑政体类型的三种范式,以便使之对转型路径和巩固任务的分析更有帮助。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的类型学,它包含“民主的”、“威权主义的”、“全能主义的”、“后全能主义的”以及“苏丹式的”政体。

民 主

谈及政体的民主类型,首先,要注意民主内部自然有重要的变体。然而,我们认为诸如“协合民主”和“多数民主”这样重要的类别是民主的亚类型,而不属于其他政体类型。^②民主作为一种政体类型具有充分的价值而应被保留。关于这一点,本书不做详细阐述。

① 我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得到这个结论。由雷蒙德·D.加斯蒂尔(Raymond D. Gastil)整理的年度调查运用了民主政体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的七点标准。加斯蒂尔在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小组的帮助下,于1978—1987年间,将167个国家按这种标准进行分类。出于我们研究的目的,如果我们称那些于1978—1987年间,按照加斯蒂尔的标准在政治权利方面得分从不低于2分,并且公民自由不低于3分的国家为民主国家领域范畴,我们将得到42个这样的国家。这很接近于米歇尔·柯培基(Michael Coppedge)和沃尔福冈·赖尼克(Wolfgang Reinicke)在他们1985年的独立研究中归类为“完全的多头政治”(full polyarchies)国家的数目。由于我们的兴趣在于国家如何成为民主国家,我们将这42个国家排除在我们的分析领域之外。这样,这一领域我们要研究的就剩下125个国家了。

接着,如果我们决定将那些在1978—1987年间的每一年中,按照加斯蒂尔的标准在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方面都可能获得最低的可能分数的政体称为长期存在的“全能主义”政体的话,那么我们便可得到9个全能主义国家。因此,如果运用传统的类型学,加斯蒂尔标准将暗示,125个国家中的116个,或者分析领域中的92.8%,将被置于同一个类型学空间中。参见Gastil的*Freedom in the World*一书,pp. 54—65。

② 关于民主内部的变体的讨论,参见Arendt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尤其是pp. 1—36; Philippe C. Schmitter和Terry Lynn Karl的“*What Democracy Is... and Is Not*”, *Journal of Democracy* 2, no. 2 (Summer 1991): pp. 75—88; 以及Juan J. Linz,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载于Gary Marks和Larry Diamond编: *Reexamining Democracy* (Newbury Park, N. J.: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182—207。

全能主义

我们同样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全能主义政体的概念,在历史上有一些接近的近似体,具有持久的价值。如果一个政体消除了几乎所有以往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而拥有一个统一的、明晰的、指导性的、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有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并且统治的领导权通常是克里斯马型的,没有明确的限制,并且对精英和非精英都一样具有高度的无法预测性和脆弱性,那么在我们看来,称其为具有强烈全能主义倾向的政体,依然具有历史的和概念的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民主和全能主义政体类型在概念上的持续有用性,那么需要进一步修正类型学的空间,以便涵盖那些明显的既非民主又(或)非全能主义的政体。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明显属于全能主义政体的或正在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国家的数目,事实上已经持续下降了一段时间。当许多苏联类型的政体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开始变革时,正如调查所显示的,它们不再坚持全能主义的模式。这种变化带来概念上的混淆。许多学者争辩说全能主义政体这种类别本身就是错误的。其他人则想把后斯大林政体称为威权主义政体。然而,这两种取向在我们看来都不完全令人满意。当然,从经验上看,大多数80年代的苏联类型的制度并非全能主义的。然而,“苏联类型”政体,波兰除外(见第十二章),如果被放进威权主义政体类别中,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特殊性。

41

关于苏联类型政体的文献及时地引起了人们对那些已不再属于全能主义的政体特征的关注,并开启了具有潜力的关于政策制定的新研究。其中一个角度是“制度多元主义”(institutional pluralism)。^①然而,根据我们的判断,把这些后斯大林政体称作多元的,会忽略一些尤为重要而又难以被称为多元的特征。多元民主理论,特别是由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和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等学者探究的“集团理论”(group theory),是从公民社会的个人着手的,这些个人加入到大量自由形成的相对自主且通常交叉往来

^① 最强烈倡导采用制度多元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苏联政治的是杰里·霍夫(Jerry F. Hough),尤其在他的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中。

的利益团体中。公民社会中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团体试图在政治社会中聚合他们的利益,并相互竞争,以影响国家政策。然而,一些作者所洞悉的苏联的“制度多元主义”,则从根本上不同于此,因为几乎所有的多元冲突都出现在**政党—国家内部政体创设的组织**(regime-created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party-state)之中。所以,在概念上,这种形式的竞争和冲突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理论家所称的**官僚政治**而不是**多元政治**。^①

我们认为,与其将这些苏联类型政体强行纳入现有的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政体的类型学中,不如详细说明一种我们将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独特的政体类型,从而扩大这种类型学。^②方法论上,我们认为这种类别是合理的,因为政体类型的四个维度——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动员——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存在一个后全能主义政体的理想类型,它区别于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的理想类型。在这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也将清晰地阐明将苏丹制作为一个独立的理想类型政体的论点。^③

我们将以醒目的方式阐述我们的论点,首先以示意图展示我们提出的五种理想政体类型——民主的、全能主义的、后全能主义的、威权主义的和苏丹式政体——如何在政体类型的四个组成特征的每一个特征上彼此区别(表3.1)。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明确说明各个政体类型对民主转型路径和民主巩固任务所具有的隐含意义。

① 对采用制度多元取向研究苏联政治的先锋批评来自 Archie Brown 的“Pluralism, Power and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于 Susan Gross Solomon 编: *Plur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 61—107。对文献的有用的评论,且关注 Gordon Skilling, Archie Brown 和 Jerry Hough 等作者,可见 Gabriel Almond (与 Lara Roselle 合著)的“Model-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一文,载于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p. 157—172。

② 林茨在他的“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一文中分析了他所称的“后全能主义威权政体”。此文收录在 Fred I. Greenstein 和 Nelson W. Polsby 主编的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5), 3: pp. 175—411, 参见 pp. 336—350。在这里,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民主转型的可行路径和民主巩固任务,因此对于我们两人而言,把后全能主义政体本身看作一种理想类型,而不是威权主义的补充类型,似乎会更实用。

③ 关于林茨第一次对苏丹式政体的讨论,同前书, pp. 259—263。更多的完整的关于苏丹式政体的讨论,参见 H. E. Chehabi 和 Juan J. Linz 的“Sultanistic Regimes”,这是为 1990 年 11 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苏丹式政体讨论会所准备的论文。讨论会的结果,包括论及伊朗、菲律宾、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论文,将被收录在 H. E. Chehabi 和 Juan J. Linz 主编的一卷书中出版。

后全能主义

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探索在政体类型四个维度的每个维度上,后全能主义如何区别于全能主义,又如何相异于威权主义。^① 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还会让大家注意全能主义政体和后全能主义政体中一些低度理论化的特征,它们产生了跳出类型的变革(out-of-type change)的动态压力。我们不赞成那些认为两种类型是静态的观点。

后全能主义政体,如表 3.1 所暗示,可以包括从“早期后全能主义”到“僵滞的后全能主义”,再向“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变化的连续统。早期后全能主义政体非常接近于全能主义的理想类型,但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同的,即它通常对领导人有所限制。还可能有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尽管它以持续的宽容态度对待来自公民社会的对政体的一些批评,但几乎所有其他的党—国控制机制都持续存在很长时间,而且没有任何发展(例如 1977 年至 1989 年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还包括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其中,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唯有在政治上,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依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如 1982 年至 1988 年间的匈牙利,最终它还是在 1988 年末得到了接近于跳出类型的变革的发展)。

关于**多元主义**,全能主义的定义特征是,政体中不存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多元主义,并且原有的多元主义源泉都已被根除或者受到系统性压迫。在威权主义政体中,存在一些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和通常相当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多元主义。在威权主义政体中,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和较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多元主义的许多表现,在时间上要先于威权主义政体的出现。如何对比后全能主义政体中的多元主义、全能主义政体中几乎不存在的多元主义,以及威权主义政体中有限的多元主义?

43

^① 我们相信读者自己能很清楚地理解后全能主义政体为何不是民主政体,所以我们将不再另加讨论。我们希望讲清楚的是,为了我们的分析目的,在本书中后全能主义一词指的是处于民主转型之前的一种非民主政体类型。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理想类型。然而第十五章“后共产主义的史前史(Post-Communism's Prehistories)”中,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证明对于我们在本书表 1.1 中所分析的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所必须具有的五个场域,全能主义或后全能主义(对比威权主义)的遗产都意味着什么。

续表

特征	民主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动员	<p>通过公民社会自发产生的组织以及法律体系保证下政治社会中的竞争性政党来进行参与。重视低度的体制动员和高度的公民参与。政府广泛宣传塑造良好公民和爱国情感。宽容对待和平有序反对派。</p>	<p>除了政治制度发展的某些时刻外,其他时候不存在广泛深入的动员。</p>	<p>广泛动员加入政体建立的强制性组织的巨大阵容。强调骨干和军人的积极精神。努力动员积极性。私人生活受侵蚀。</p>	<p>领导人和非领导人参与组织动员的兴趣日益下降。对国家赞助的组织内的人员的常规动员,目的是获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从。许多“干部”和“军人”只是职业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主导价值的厌倦、淡出以及最终的私人化成为公认的事实。</p>	<p>低度但不定期的仪式型的操纵动员,运用高压和庇护主义的方式,不需常设的组织。半国家团体的阶段性动员,它们使用暴力对付苏丹所攻击的团体。</p>
领导权	<p>由自由选举产生的高层领导权,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领导权必须定期地经历选举并产生于选举。</p>	<p>政治制度中由领袖或偶尔是小团体行使权力,这种权力受到正式的、不甚明确的、但事实上却可预测的规范的限制。尽力从老精英团体中指派职位。国家公务和军队中有一定的自主性。</p>	<p>全能主义领导权的统治,对成员和非成员而言,都受到不明确的限制和巨大的不可预测性。通常是克里斯马型的。对高层领导的选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党组织中的成就和贡献。</p>	<p>后全能主义政治精英越来越强调个人安全。通过政党结构、程序和“内部民主”实现对高层领导权的制约。高层领导人很少是克里斯马型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仅限于执政党内,但很少取决于党组织内的事业发展。高层领导人可能来自国家机构中政党技术专家。</p>	<p>高度的个人化和专制。没有理性—法律制约。强烈的朝代化倾向。国家事业中没有自主性。领袖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对领导人的服从是建立在强烈的恐惧和个人回报之上的。官员是从领袖的家族成员、朋友、商业伙伴,或那些直接参与使用暴力维持政体的人中间选拔。官员的地位源于他们对统治者的纯粹的个人屈从。</p>

表 3.1 现代政体的主要理想类型及其判定依据

特征	民主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多元主义	<p>责任的多元化,因多元自主性在经济、社会和组织内部生活等广泛领域的存在而得到增强。法律保护与“社会法团主义”而不是“国家法团主义”保持一致。</p>	<p>政治制度具有有限的、非责任的政治多元化。通常是非常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多元化。威权主义政体中,大多数的多元化在政体建立之前已根植于社会之中。通常给予半反对派一些空间。</p>	<p>没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多元化。执政党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垄断权力。政党几乎消除了所有前全能主义的多元化。没有第二经济或平行社会的存在空间。</p>	<p>有限的但非责任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多元化。几乎没有政治多元化,因为政党仍正式地掌握着垄断权力。可能存在“第二经济”,但国家仍具压倒性的势力。“扁平的政体”(flattened polity)中大多数的多元化运动形成于宽容的国家结构中,或形成于那些自觉组成的反全能主义政体的反对派团体中。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中,反对派通常建立“第二文化”或“平行社会”。</p>	<p>经济和社会多元化没有消失,但受到无法预测的专制干涉的管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或国家中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法摆脱苏丹的专制权力的控制。没有法治。制度化程度低。私域和公域高度融合。</p>
意识形态	<p>对公民身份和竞争的程序规则具有广泛的知识承诺。非目的论。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法律,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p>	<p>政治制度没有详尽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但具有独特的精神。</p>	<p>详尽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清晰阐明了一个可以实现的乌托邦。领导人、个人和团体的使命感、合法性,以及常常很具体的政策,大部分源自他们对于人类和社会的整体性认知的信奉。</p>	<p>指导性意识形态仍是法定的,且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对乌托邦的忠诚和信仰已经减弱。从强调意识形态转向强调计划性一致,这种转变大概是建立在没有过多引证意识形态的理性决策和有限的争论之上的。</p>	<p>对象征的高度的专制操控。对统治者的极度赞颂。除专断的个人至上论外,没有精细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甚至没有独特的精神。不试图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来证明主要行动的合理性。国家雇员、臣民和外部世界都不信奉这种冒牌的意识形态。</p>

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国家内部的制度多元主义的作用要比全能主义体制更为重要和复杂。此外,与全能主义对比,后全能主义政体通常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多元化程度,并且在成熟后全能主义政体中,还存在着关于“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或“并行文化”(parallel culture)的经常性的讨论。其证据可见诸活跃的地下出版物文献和大量发行的这类杂志,而这在全能主义政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①这种发展中的多元主义既是攻击后全能主义政体脆弱性的充满活力的源泉,同时也是正在形成的民主反对派力量的活力来源。例如,这种“第二文化”可能非常强势,以至虽然第二文化的领袖人物经常被关押,但在一个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反对派领导人能形成大批的支持者,并在公民社会中建立长期存在的反对组织。因此在危急时刻,一个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能拥有一个由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民主反对派形成的中流砥柱的基础结构,它比全能主义政体更容易形成民主政治反对派。一个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还具有的特征是国家计划经济和广泛的部分市场试验的并存,这能形成由国家部门管理人员组成的“红色资产阶级”(red bourgeoisie),以及一个正在发展的但居于次要地位的私有部门,尤其是在农业、商业和服务产业。

然而,在后全能主义的政体中,这种社会和经济多元主义与威权主义政体里的多元主义在程度和类型上有所不同。它们程度上有区别,是因为威权主义政体通常具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多元化(特别是,通常它有一个更具自主性的私有部门,具有稍微多一些的宗教自由以及大量公开的文化产品)。同样,这一区别在类型学上更为重要。在一个后全能主义社会中,对于政体的掌权者和反对派而言,他们所持的历史依据都是先前的全能主义政体。根据定义,前全能主义政体的存在意味着,大部分先前存在的有责任的、组织化的多元主义资源已被铲除或受到压制,并且已经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的秩序。因此,在公民社会的反潮流一方,存在着“去全能主义”的积极努力。为此,公民社会中反对派的许多情绪上和组织上的驱动,是被有意识地精心制作出来的,目的是形成其他可供选择的结构来取代由全能主义政体建立的,并且在后全能主义社会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结构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故而许多第二文

^① 例如,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匈牙利,最具影响力的地下出版物是 *Beszélő*,自 1982 年至 1989 年间,作为一种季刊,它的发行量达 20000 册。信息由出版人和编辑委员会成员米克洛什·豪劳斯蒂(Miklós Haraszti)于 1994 年 8 月在布达佩斯提供给斯泰潘。

化在形式上并不传统,而是出自全能主义经验引发的新运动中。还可能存在着由国家领导的去全能主义,其中政体自身开始消除一些一元论经验中最为极端的特征。因此,如果存在着一个发展中的“制度多元主义”,或人们对程序、法律的尊重逐渐加深,或存在新的可容忍的私人部门,那么这种情况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诞生于先前全能主义政体的多元主义。

然而,强调在后全能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对多元主义的重要限制,无论在类型学上还是政治学上都是很重要的。与威权主义政体形成对比的是,后全能主义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中存在相对自主且不受限制的多元主义。在所有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执政党(official party)仍然具有法律认可的在政体中的领导地位。后全能主义政体在制度上的多元化不能与政治多元化相混淆,制度多元化是在政党—国家内部,或在新的可容忍的第二经济或并行文化中运作的。并行文化或第二文化的多元化应该被看作一种可能具有政治含义的社会多元化。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后全能主义政体的政体和政体领导人,除非他们经历跳出类型的变革,否则他们不会对非官方政治多元化赋予合法性或责任。^①甚至卫星党(satellite parties)的正式多元化也只有在政体转型进程开始后,在政体的最后阶段才具有。

当我们转向**领导权**这个方面时,我们也可看到全能主义与威权主义领导权相区别的一些主要倾向。全能主义领导权不受法律和程序的约束,并经常是克里斯马型的。领导权可能产生于革命政党或运动,但这个核心的成员和其他民众一样,对于领袖阐明的激进政策和意识形态变革,都同样易受伤害(在失去生命的可能性方面更是如此)。^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林茨的分类表中,威权主义领导权的特点是,政治制度中有一个领袖或者有时是一个小团体行使权力,他们的权力受到正式而不明晰、但事实上又可以预测的规则约束。经常有广泛的努力将老精英团体吸纳到领导队伍中去,且在国家公务和军事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性。

和全能主义政体一样,后全能主义的领导权依旧特别地受制于革命政党或运动。然而,较之于全能主义政体,后全能主义政体的领导人更倾向于官僚政治的、国家技术专家型的,而不是克里斯马型的。后全能主义政体的重要核

47

^① 1988—1989年的匈牙利代表了一种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通过广泛的去全能主义和日益承认其他政党的合法性,甚至在共产党丧失权力以前它就经历了重要的跳出类型的变革。见第十七章。

^② 例如,在斯大林统治下,1930年政治局中的9个成员,至1937年有5个失踪或被枪杀。参见George K. Schueller, *The Politbur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5—6。

心,通常是通过缩小最高领导人专断的自行决定的范围,以力求成功地增强安全和减少恐惧。

对比那些宣称全能主义政体概念是静态的人,我们认为,当一个机会出现时(例如,最高领导人的死亡),高层精英希望减少未来领袖的专制自行决定权的愿望,可以预期地会成为推动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转变的跳出类型的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因此,在这个方面,后全能主义政体的领导权在类型学上更接近于威权主义政体的领导权,其领导人的统治受到不明确的、但在现实中可合理预测的限制的制约。然而,这两种类型政体的领导权仍然有着根本不同。后全能主义的领导人仅从党员中招募,他们在党组织内部、官僚机构或国家技术部门发展他们的事业。因此他们全部都是从政体所建立的结构中招募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威权主义政体的规则是,政权所吸纳的众多领导人物来自于具有一定力量、势力和合法性的团体,而不是直接来自于政权自身。的确,威权主义政体经常被先前存在的社会的强大碎片所俘获。在一些威权主义政体中,甚至获取高职位也较少依靠政治忠诚,而更大程度上是依靠职业化和技术专长,以及通过面向全社会开放的考试的竞争。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里,技术能力越来越被看重,但我们不要忘记职业训练最原初的入门是由政治标准所控制的。另外,后全能主义制度所接纳和认可的能力是技术上和管理上的,并不包括更广阔领域范围中发展的技能,如法律、宗教组织、独立经营或劳动等。

后全能主义中有限的政党—官僚—技术专家的多元化,并不给体制带来内部变化的灵活性,而在许多威权主义政体中,非体制精英的吸纳能带来这样的后果。抵制第一书记—理论家(the first secretary-ideologue)个人化的领导权的愿望可以化为使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转型的资源,但它也可能最终导致受特权阶级支持的高龄领导的寡头政治。而试图包括或吸纳外部的新的男女领袖以使高层领导年轻化的尝试,则通常非常有限。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如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1968年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显示了衰老的趋势。在危机情况下,恢复领导层生机的无力——这并不十分荒谬——成为这样一个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潜在的变革动力源泉,该政体领导基础陈旧、狭窄,谈判能力也非常有限。这样一个领导结构如果在危机中不能压倒反对派,就会特别脆弱从而崩溃。为什么曾经是全能的、高压的政治组织权力中的中层骨干,在危急时刻没有向民主反对派发动攻击,而是放任体制倒塌,其中一个原因与后全能主义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有关。

意识形态在全能主义制度和后全能主义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别更多的是在行为和信念上,而不是官方规定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骨干和社会双方而言,使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转变的充满活力的潜能,在于官方意识形态主张和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经验性裂痕。这种裂痕使得干部这方对意识形态的信奉减少了,而在公民社会团体中则引起了越来越多对体制的批评。事实上,公民社会的许多新的批评来自于过去真正的信奉者之列,他们争辩说该政体没有——或者更糟的是不能——向它的自身目标前进。教条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所产生的压力常常形成一种类型外转变,即从全能主义政体动员积极性的努力,转向后全能主义的维持默许的努力。在后全能主义阶段,全能主义体制下创制的精细的和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仍作为一种官方规定而存在,但在众多领导人中,对于乌托邦的执著和信仰已经减弱。在多数民众中,官方的规定被看做是一种义务般的仪式,而对于“平行社会”或“第二文化”中的团体而言,他们一直都将第一文化看做是“活谎言”(living lie)。^① 这是另一个弱点的源泉,它“掏空”(hollowing out)了后全能主义政体表面上的力量。

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意识形态的功能较全能主义中的相比有所减弱,但它仍然与威权主义政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着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威权主义政体具有弥漫的非民主的精神,但它们不具有高度清晰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涉及政党的领导作用、利益集团、宗教、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其他许多方面,以及仍属于我们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政体的国家。因此,后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政体的根本性对比在于,后全能主义政体中存在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遗产,它不能被忽视且不能被正式地质问。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在后全能主义政体的组织生活中具有一种社会势力(social presence)。无论它是通过国家赞助的组织的大规模阵容来体现,或是处于自创建初期以来一直受官方控制的组织的管辖范围,较之大部分的威权主义政体,后全能主义政体的意识形态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与后全能主义政体相关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对以乌托邦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信仰的逐渐弱化,意味着和许多威权主义政体一样,后全能主义国家也在日益努力将政绩标准作为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在意识形态的原初乌托邦因素和不

49

^① 关于“平行社会”、“第二文化”和“活谎言”的广泛讨论和参考,可参见我们关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全能主义的一章(第十七章)。

断增长的将效力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努力之间存在着鸿沟,特别是当后者失败时,这个鸿沟就成为后全能主义政体弱点的一个源泉。由于民主政体要求服从的权力是建立在由民主政治所派生的程序基础以及政绩之上的,所以面临较差政绩时它们有一个绝缘层,而这是大多数后全能主义或威权主义政体所不具备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弱化成为后全能主义的一个特征,这样便开启了政体脆弱性的新动力——或者,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讲是新的机会——这可能被民主反对派所利用。例如,不断强调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与意识形态跟政策制定越来越不相关之间的矛盾,或者,更糟糕的是,它与社会现实之间显然的矛盾,会破坏体制内中层和低层骨干的承诺和信仰。如果这个高压机构中的中层官员开始深刻地怀疑他们是否有权枪杀那些反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公民,正如我们将在讨论 1989 年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时会看到的,这种情况就能导致政权的迅速崩溃。^①

最后一个我们要探讨的类型学上的区别是**动员**。大多数威权主义政体从未建立以全民动员为目的的复杂的、囊括一切的组织网络。它们可能有短暂的深入动员,但通常在深度上低于全能主义政体,在广度上也小于后全能主义政体。然而,在全能主义政体中,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使之加入体制建立的组织和活动的巨大阵容中。由于乌托邦目标是体制本身固有的,因而存在通过动员积极性以激励骨干的巨大努力,而大多数领导人正是从这些骨干中产生的。在全能主义制度中,人们贬低“私有化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与家人和朋友待在家中,并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小圈子里享受生活。

在后全能主义政体中,体制建立的动员媒介机构的大规模阵容仍主导着社团的生活。然而,它们已经失去了深度。成员资格仍然是普遍化和强制性的,但倾向于产生更多的厌倦而非积极性。只要存在官方组织“正确的”参与,那么国家—技术专家的录用作为一种成功的职业道路,是激励干部的另一选择。后全能主义政体中仪式化的动员网络不像全能主义政体中积极性动员的功能那么显著,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它导致了偏离技术性任务的“时间”的浪费。浪费时间并远离专业人员的技术统治任务,同时也使得许多其他人产生厌倦并逃往私人生活。如果不存在结构危机,尤其不知道有另一个可行的选

^① 丹尼尔·V. 弗里德海姆(Daniel V. Friedheim)正在进行关于这种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崩溃问题的主要研究。参见 Friedheim, “Regime Collapse in the Peaceful East German Revolution: The Role of Middle-Level Officials”, *German Politics* (April 1993): pp. 97—112, 以及他即将出版的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其中讨论的是民主德国。

择时,这种私有化对于后全能主义政体来说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因而,卡达尔(Kádár)“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支持我们的人”,这个说法只有在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是令人信服的,而在全能主义政体中则不然。然而,如果与全能主义政体相对立的后全能主义的政绩很差,以至于私人生活的个人回报被侵蚀,那么私有化和冷漠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动力——尤其在其他选择认为是可行的时候——促成“脱离”、“扬音”和“忠诚”等危机。^①

让我们用一个关于后全能主义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弱点的概要来总结我们的讨论。我们这样做,有助于丰富关于为什么一旦进入持久的停滞期,以及当苏联撤回大规模的高压支持时,这些政权就迅速崩塌的讨论。的确,在第十七章“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多种形式”中,我们形成了一个理论上和经验上的论点:为什么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比威权主义政体或全能主义政体更易受攻击而崩溃。

全能主义、民主,甚至许多威权主义政体,考虑到导致这些政体建立的历史环境,首先形成的是在他们的核心支持者中的“与生俱来的”(genetic)合法性。与之对比,后全能主义政体没有这种坚实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性,因为它们形成于全能主义政体的常规化、衰退,或者精英的恐惧。后全能主义政体,由于其继承的强制性的力量以及组织化的反对派的相关弱点,表面上看起来与威权主义政体差不多或者更具有稳定性,然而,如果外部支持被撤回,它们就会因失去内部支持和信奉而受攻击导致崩溃。

后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部分源于脱离斯大林主义,但也是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社会改革的结果。后全能主义政体废除了镇压的最残暴的方面,但同时又保持了大部分的控制机构。尽管比斯大林主义下的血腥程度有所降低,但安全部门的势力——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Stasi——有时更加具有渗透性。后全能主义本可能走向缓和的经济改革,如那些在布拉格之春时期讨论过的,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复职终止了在苏联和其他大部分实行苏联式制度的国家中充满活力的改革,除了匈牙利和波兰。

后全能主义可能比一个更为全能主义的制度有更少的、可提供给统治 51

^① 参考书自然是 Albert Hirschman 的 *Exit, Voice and Loyal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9。关于这一动力与前民主德国关系的精辟分析,参见 Hirschman 的“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on Conceptual History”, *World Politics* 41 (January 1993): pp. 173—202。我们会在关于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多种形式的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卡达尔的引语(第十七章)。

精英和最重要的中层骨干的合法性。意识形态乌托邦成分的缺失,以及对政绩更大程度的依赖(这在取得一些最初的成功后没能得以延续),使得政权易受攻击,并最终使大量镇压的使用更为不合理。被动的顺从和功利主义为退回到私人生活敞开了大门,并削弱着政权,因而当它不能再依赖强力时,反对派就能最终迫使它进行谈判或者崩溃。

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弱点至此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释,但它能大概被理解,条件是牢记最初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联的大量希望和能量,这些在过去解释了全能主义的出现和它的诉求。^①许多杰出的、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学者欣赏列宁主义或为其辩解,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对斯大林主义也如此,但是几乎没有左翼西方学者能积聚起对苏联的后全能主义,甚至改革和公开化的积极性。

正如我们将在第四部分中看到的,后全能主义的出现和演化是三个相互区别但又常常相互连接的过程的结果:(1)统治者对全能主义制度进行软化和改革的审慎的政策(自选的去全能主义),(2)全能主义体制结构的内部“掏空”、骨干对制度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内部侵蚀(通过侵蚀来去除全能主义),以及(3)对抵制或逃离全能主义控制的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空间的创建(社会征服导致的去全能主义)。

“苏丹制”

有大量的政权,比如杜瓦利埃(Duvaliers)统治下的海地、特鲁希略(Trujillo)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博卡萨(Bokassa)统治下的中非共和国、马科斯(Marcos)统治下的菲律宾、君王统治的伊朗、齐奥塞斯库(Ceaușescu)统治的罗马尼亚等,它们有强烈的倾向于成为世袭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即韦伯所谓的苏丹制。韦伯说:

世袭主义以及极端个案中的**苏丹制**有兴起的倾向,只要传统统治发展出纯粹作为统治者个人工具的行政部门和军队……当统治……的执行

^① 关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意识形态上和道德上的吸引力,以及它在苏联崩溃之后遗留的“真空”,参见 Ernest Gellner, “Homeland of the Unrevolution”, *Daedalus* (Summer 1993): pp. 141—154。

主要建立在自行决断的基础上时,它就被称为**苏丹制**……然而非传统元素从非个人角度而言没有被加以理性化,而仅仅存在于统治者自行决断的极端发展之中。正是这一点使它区别于所有形式的理性权威。^①

韦伯并没想用**苏丹制**一词来暗示在宗教上要求服从的诉求。事实上,在奥斯曼的统治之下,统治者兼有两个不同的职位和头衔,即作为苏丹和哈里发。最初,奥斯曼的统治者是一位苏丹,在征服大马士革后,他才获得了哈里发这个头衔,继承了宗教上的权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后,宣布成为共和国,前任统治者丧失了苏丹的头衔,但仍保留宗教头衔哈里发,直到阿塔图尔克(Atatürk)最终迫使他连这个头衔也放弃了。问题的要点是,他的权威的世俗和宗教方面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彼此区别的。进一步说,苏丹这个词不应仅限于分析中东。正如新德里和巴黎、北京一样都有官员,五角大楼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存在男人气质的政治,非洲和加勒比海与中东一样有苏丹制统治者。我们运用苏丹制这个词是要指称一种支配和政体统治的普遍类型,如韦伯所说的,世袭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在苏丹制里,私域和公域融合在一起,并非常倾向于产生家族式权力和朝代延续,国家事业和统治者的个人服务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缺乏理性化的非个人的意识形态,经济上的成功取决于与统治者的私人关系,并且最主要的是,统治者完全随意行事,不受限制且没有更大的、非个人的目标。

表 3.1 显示了关于苏丹制类型与多元化、意识形态、动员和领导权有关的大量细节。在这个部分,我们试图突显苏丹制、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相信它们是不同的理想类型,而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个案中,一个特定的政体可能是部分苏丹制和部分威权主义倾向的混合体(一种可能展开多种多样转型选择的结合),或者是苏丹制和全能主义倾向的混合体(这是一种倾向于消除大量转型选择的结合)。

在其长篇论文“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政体”中,林茨讨论了使苏丹制成为非民主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些特别的特征。^② 由于苏丹制政体类型在文献中没有被广为接受,因此我们相信,对它的独特性质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强

^①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和 Claus Wittich 编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 p. 231, p. 232.

^② 参见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p. 259—263.

调,将有助于明晰这种政体类型对民主进行抵制的模型和对民主巩固问题的暗含之意。

在苏丹制中,统治者使得私域和公域之间高度融合。苏丹制政体成为苏丹的个人统治。这种统治中不存在法治,制度化程度也很低。在苏丹制中,可能存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多元化,但几乎从来没有政治上的多元化,因为政治权力直接与统治者个人相联系。在苏丹制中,基本的现实是,苏丹制中所有的个人、组织以及机构,都长久地服从于苏丹无法预测的专制干涉,因而所有的多元化都是不稳定的。

威权主义中可能存在或不存在法治、给予半反对派(semi-opposition)的空间,或给予可能与温和反对派建立联系的体制温和主义者的空间,政体中也通常存在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它们在一个安全的、相对自主的框架中运作。但是,苏丹制下没有法治,没有半反对派的空间,没有可能与民主温和主义者进行谈判的体制温和主义者的空间,也不存在不服从苏丹专制的经济和公民社会领域。正如我们在下一章所要证明的,威权主义和苏丹制政体中多元化的这种关键性区别具有巨大的暗含意义,暗示了适用于威权主义政体但不适用于苏丹制政体的转型的类型。

全能主义和苏丹制政体在意识形态的功能和影响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全能主义政体不仅有精细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而且它的意识形态还具有使政体获得合法性的功能,且统治者通常受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某种限制。统治者或其追随者,或者两方,都将意识形态作为行动的指南和正当性理由来信奉。与之相比,苏丹制统治者没有精细的指导性意识形态这种特征。他们可能具有高度个人化的主张,并希望以此作为意识形态,这些主张常常以苏丹的姓名命名,但这种意识形态是在统治者获得权力后才得以详尽阐述的,它服从于极端的操控,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于限制统治者,只有在统治者执行它的时候,它才相关。因此,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斯大林的实践和陈述是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一致,但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争论特雷希略(Trujillo)是否坚持特雷希略主义。威权主义政体和苏丹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比没有那么鲜明,然而,作为大多数威权主义联盟的一部分的独特精神,通常对统治者的限制要多于苏丹个人特质的意识形态。

广泛而深入的动员是全能主义体制的一个特征,但在苏丹制中却很少找到,这是由于苏丹制制度化水平低,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信奉程度也低。组织化程度低意味着,任何真正出现的动员都是不均衡和零星的。可能苏丹制动员

和威权主义动员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苏丹制具有一种倾向(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就是海地的杜瓦利埃的被称为马库特大叔[Tonton Macoutes]的国家安全自卫军),即通过与苏丹相联系的准国家团体(para-state groups)来使用暴力和恐怖对付任何反对统治者意志的人。这些半国家团体不是现代官僚机构,它们没有普遍化的标准和程序,而是苏丹意志的直接延伸。它们不具有重要的制度自主性。如韦伯所强调的,它们纯粹是“统治者的个人工具”。

最后,苏丹制、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三者的领导权有何区别?苏丹制的本质在于不受限制的个人领导权。这种个人化的领导权,如我们所见,是不受意识形态、理性—法律规范或任何权力制衡所限制的。“支持的基础不是先前存在的特权社会集团和统治者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而是统治者所创造的利益、他对忠诚报以的奖赏,以及人们对他的报复所产生的恐惧。”^①

54

苏丹制和全能主义的领导权在一个重要方面是相似的。在这两种政体中,领导人统治的权力不受到明确的限制,且对精英和非精英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无法预测性。在这一方面,一个斯大林和一个索摩查(Somoza)是一样的。然而,也存在重要的差别。在全能主义政体中,具有非个人化的公共使命的精细的意识形态担负着重要的合法化功能。全能主义领袖的意识形态声明,不仅他的追随者和骨干相当重视,连社会和知识分子也如此,其中包括在国家之外受领导者控制的知识分子。这给予全能主义领导权一定程度的组织、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而这是苏丹制领导权中所没有的。最为重要的是,苏丹制领导权个人化的强烈程度使得王朝(dynastic)领导权在规范上得以接受,在经验上也得以普遍化;而大众要求其全能主义政体建立王朝的雄心,如果不是史无前例的话,至少也是异常的。

在领导权这一方面显示了威权主义和苏丹制之间更为强烈的对比。如林茨在讨论威权主义时所说的,威权主义政体中领导权的行使遵循一些“正式的、不甚明了但实际上可以预测的”规范。^②在大多数威权主义体制中,一些官僚实体具有重要的功能。这些官僚实体常常保留或制订它们自己的规范,这暗示存在着一些程序上和标准上的限制,使得领导人不能随意指示例如军官、法官、税务官或警官等去做他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而,苏丹制的领袖则“要求无条件的行政服从,因为官员对其职位的忠诚,不是一种对规定了其职

① 参见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 260。

② 同上书, p. 255。

责范围和内容的非个人任务所作出的非个人承诺,而是一种建立在与统治者完全是个人化关系上的仆人的忠诚,以及一种原则上没有限制的义务”^①。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详细解释了现代世界五种理想类型政体的中心趋势,其中四种政体是非民主的。我们准备下一步去探索先前的非民主政体为什么以及如何对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以及在民主政体得以巩固之前要完成哪些任务。

^① 参见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p. 260。

第四章 初始政体类型对转型路径及巩固目标的影响

55

在分析建立巩固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后,我们将详细阐述四种非民主政体理想类型之间的重要差异。应该清楚的是,初始非民主政体所具有的特征对可行的转型道路、对不同国家开始努力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时所面临的任務具有深刻的意义。可以想象,在这些理想类型中,威权主义政体在其晚期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有了支持宪政和法治的法律文化,有了在职业规范内运作的、可资利用的官僚机构和合理的制度化的经济社会。对这样一个政治体来说,在其最初的民主议程中,首要的也是唯一必要的一项与政治社会有关,那就是,创建民主制度所具有的自主性、权威、权力和合法性。在第六章中我们指出,西班牙在1970年代早期就接近于这种状况。但是,如果起点是共产主义的亚类型——全能主义政体,那么,民主的巩固就不仅同时承担着缔造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任务,而且还要精心建构民主所需要的各项条件。在表4.2和4.3中,我们将更加系统而详细地阐述这些观点的全部意义,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们通过表4.1,先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来阐述这一观点。

现在,把全能主义与后全能主义区分开来的分析性效用应该是清楚的。正如表4.1所示,可以想象得到,后全能主义政体可能向民主政体转型,同时,在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上,除了政治社会的自主性这一条件外,它的得分处于低—中位或中位水平。在1989年早期和中期,匈牙利最接近于这种状态。始于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民主派面临的任務是具有挑战性的,而比起始于全能主义政体的民主派面临的任務,其挑战性要小得多。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恰恰因为后全能主义政体已经有一个前在的全能主义时期,所以有必须克服的遗产,这种遗产并不存在于没有经历过全能主义的威权主义政

56

体中。

表 4.1 以前的非民主政体类型对民主巩固任务的意义

场域属性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公民社会的自主性	从中到高	低	从低到中	从低到中
政治社会的自主性	从低到中	低	低	低
宪政与法治	从低到高	低	中	低
国家官僚机构的职业规范与自主性	从低到高	低	从低到中	低
具有某种程度的市场自主性和产权多样性	从中到高	低或中等	从低到中低	从低到中

注：在转型即将开始启动之时，前非民主政体中的特征对于民主派领导人将要面临的任務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政权成为巩固的民主政权前，这些领域越是欠发达，民主领导人必须完成的任務就越多。

在我们的类型学中，威权主义与苏丹式政体之间的显著差别有助于将注意力引向这一事实，即苏丹式政体对民主缔造者（如海地）的直接意义是，他们将不得不从一个低水平的基础上建构市民社会、宪政、法治、官僚职业规范、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

对不同政体类型的描述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阐述“协议”（pacts）的可能性与限制，它是任何一个独特的非民主政体类型可利用或不可利用的转型选择。在讨论什么条件下可能签订协议之前，必须强调关于协议的三个普遍性的分析观点。第一，民主转型在理论上和历史上都不必然涉及协议。实际上，斯泰潘在其他地方分析的八种独特的再民主化道路中，其中只有三种道路涉及协议。^① 第二，协议可能具有非常民主的动机和结果，也可能有非常不民主的动机和结果。为了迅速摧毁一个非民主政体，或者为了确定一个较早的、明确的自由选举日期，可能会特地精心构建出一个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协议得到实施的话，它在动机上就会具有明显的民主性，如果得以达成的话，结果也具有民主性。或者，在第一次大选前后的短暂时间内，协议可能会明显承受一些非民主性的制约。相比之下，一个最初不民主的协合式（consociational）

^① 参见 Alfred Stepan, “Paths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载于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Laurence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年), pp. 64—84, pp. 170—174。

表 4.2 非民主政体类型对民主转型路径的影响

路径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1.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	考虑到公民社会已经相当发达,一些温和的政治反对派已经存在,他们拥有全国选民的支持,在温和的当权者与温和的民主反对派之间,可能发生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执政的领导人或反对派都可能赢得公平的选举并完成转型。	没有为组织化的民主反对派或温和的当权者留下空间。因此,改良式转型道路是不可能的。	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下,存在集体领导和温和派。同样,民主反对派也有发达的“第二文化”和初始性的政治群落。如果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领袖相信,选举是必要的并有赢得选举的机会,那么由第二文化的领袖,或者引发自由选举的初始反对派领导的改良式转型是可能的。	考虑到一方面没有法治和公民自由,另一方面苏丹对整个政体的人格化渗透,四个博弈方协商改革的两个前提条件,即组织化的非暴力的民主反对派和拥有充分的谈判缔约权威的当政温和派的不存在,使得改良式转型事实上不可能。
2. 在战争中失败	如果在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中存在民主力量的代表,并且要求实行选举,那么战败或者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崩溃,会导致民主转型,此时,先前的非民主政权的谈判能力很弱。	事实上,全能主义战败后快速民主转型的唯一路径是被民主政权占领,在外部力量的监督下植入民主政体。	在后全能主义的早期,民主政治的前景与全能主义几乎相同。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下,民主反对派可能执政,也可能在早期控制选举。	考虑到法治的缺乏,以及准国家(parastate)暴力的蔓延,如果没有外部监控及保证,民主道路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续表

路径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3. 如果不是当权者发起转型(通过中下级军官发起政变、武装起义或者群众反抗而导致政权崩溃),政权垮台后将建立临时政府。	在威权主义政体下,组织化的民主反对派在公民社会甚至在政治社会中存在。如果他们要求早期选举,这一转型道路是非常可能的。但是,由于没有提出有效的选举要求,临时政府对实施革命性权力感兴趣,并推迟或取消选举,这样就延缓了转型或导致新的非民主政体。	不太可能出现临时政府。但是,更深刻的危机会导致一个继承(successor)政府。考虑到扁平化的公民社会及组织化的民主政治社会的缺乏,控制自由选举的有效压力是不可能存在的。继承者可能会寻求选举的合法性,但是这不能保证民主化。	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早期选举仅仅只是最可能的道路,其中激进的反对派可能组成政府并进行民主化。在早期或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最可能的政体转型是群众起义,如果起义没有被镇压,会导致政体崩溃,并形成一个过渡政府。过渡政府很可能由与旧政体相关的精英组成。在这个依然“被摧毁的社会”中,这些精英能够巩固他们在选举上的权力。	为了实施改革,“临时政府”以人民的名义要求采取行动并推迟选举的机会很大。考虑到以前缺乏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的自治,与苏丹有联系同时因曾经支持起义而宣称自己有合法性的集团会取得非民主的权力。民主转型的最好机会是,如果革命起义是由得到国际支持的、有民主倾向的领袖领导的,他确定了选举日期并允许权力的自由竞争。

续表

路径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4. 摆脱高级军官统治	如果政权由高级军官领导,“作为机构的军队”如果感到受到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威胁,就可能迫使“军政府”放弃直接统治,并进行“解脱性选举”(extrication elections)。转型时间,以及作为军队放弃政权的代价的“权力保留领域”的范围,则受到作为机构的军队所承受到的内在和外在压力的大小,以及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中民主力量的大小的影响。	对这一政体而言,这一路径是不可能的。革命党的首要地位和领导人不受限制的统治使得不可能由高级军官来统治。	考虑到政党的领导地位,这种路径对这一类型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种路径对这一政体不可能。苏丹式政体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混合,苏丹对官僚机构规范的干预与高级军官统治不相容。
5. 特定政体可能的转型路径和可能的结果	如果非民主的威权主义政体是由中下级军官领导的,并且这一政体崩溃或者被推翻,比起政体是由高级军官领导的,那么建立文人控制的民主政体较为容易。	全能主义政体的领导权会使开辟群众动员和自由化的道路发生分裂,甚至可能分裂、操纵选举的过渡政府。考虑到抗议运动之前的控制水平,一个更为可能的结果是运动的影响力导致再次强迫接受全能主义的控制势力或转向后全能主义。见后全能主义的转型道路。	如果镇压的选择是不可能的,面临着更加严重危机的后全能主义政体可能崩溃。政体崩溃会导致其他精英的非民主接管、民主化或混乱。	考虑到苏丹式政体的代际传承,如果苏丹死于自然原因,家庭成员会努力继续苏丹政体;因此,一般来说不会发生政体领导的自由化。

续表

路径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6. 其他特定政体的路径	如果文官领导的威权主义政体发起了民主转型,无论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将只会趋向于拥有选民和被选举的官员给予他们的授权。因此,比起以前由高级军官领导的非民主政体来,正在出现的民主一般受到的限制要少。	如果全能主义政权得到了外部霸权的支持,霸权支持的撤离会改变全部的权力关系。镇压的成本上升。反对和动员高涨,政权瓦解成为一种可能的结果。如果政权垮台,混乱或临时政府是最可能出现的。考虑到缺乏组织化的民主反对派,即使临时政府开始转型,来自于旧政权的人控制政府也是非常可能的。	如果后全能主义政权受到外部霸权的支持,如果霸权撤走了强制性的保证,这一政权就会瓦解。如果是早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接续的政体可能是威权主义或受到来自于以前政权的领导人的控制。如果是晚期的后全能主义,临时政府的公民社会领导人会要求早期的、完全自由的选举。	如果苏丹依赖于外国赞助者,来自于赞助者的持续危机和压力会导致统治者操纵突然选举,他认为他可以控制这一选举。选举中的失败是可能的,特别是当外在的赞助者支持反对派时。但是,由于赞助者不断地参与民主化过程,民主统治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外国赞助者有时会强迫苏丹下台。
7. 其他特定政体的道路		全能主义政权会转变为后全能主义政权。见后全能主义政权的转型选择。		导致苏丹失败的最可能的国内原因是武装群体或公民社会的刺杀或革命性剧变。剧变甚至得到商业群体的支持,因为他们不喜欢苏丹对独裁权力的极端使用。临时政府是最可能出现的。见上面的第三项。

协议,如果它被维持了太长时间,就会阻碍新的社会群体进入政治,并最终变成一种“排他的协合式威权主义”形式。^①最后,签订协议将一些群体永久地排除在外,使某些群体广泛地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其他群体,这样的协议在其存续期间,其动机和结果显然是非民主的。第三,正如斯泰潘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缔约并不必然意味着协议的维持——协议可能瓦解……无论具有或者不具有联盟因素,协议不可能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能得到创立。政党协议具有两个要求:第一,领袖具有通过谈判达成重大内部联盟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第二,由遵守协议条款的政治信徒们组成联盟。”^②

大多数关于协议的转型文献都会提及“强硬派”和“温和派”。转型经常被认为涉及当政的温和派与反对派的温和派之间的协议,他们都能够“利用”且“控制”他们各自的“强硬派”。本质上,这是一个四方参与的理论模型。^③但是,一个真正的四方博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当政的温和派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性,这样,他们可以与温和的反对派进行战略性和策略性的谈判;相反,为了在协议谈判中扮演他们的角色,温和的反对派也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组织、权力和跟随者存在,这样才能胜任协议谈判。对于研究转型的许多作者来说,这样一个具有经典性的协议出现在西班牙。^④在西班牙,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当政者和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最初设计了一个协议式改革。最后,谈判导致了协议的破裂,这使得佛朗哥政府的非民主要素解体,并产生了新的民主结构。这整个过程被称为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reforma pactada-rupture-pactada)。

虽然人们认为,协议可能是大多数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四方均参与的协议可能仅仅在两种非民主的政体型式中存在。苏丹式政体不会把改良

^① Jonathan Hartlyn 在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 Rule in Colombia* 一书中讨论了联盟性排斥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Stepan, “Paths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p. 80。强调起源。关于维持协议的困难的杰出分析,参见 Eric Nordlinger, *Conflict Regulation and Divided Societies* (Cambrid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例如见 Adam Przeworski, “The Games of Transition”, 载于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和 Samuel Valenzuela 编: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p. 105—153。

^④ 严格而合适地应用博弈理论的案例是西班牙,见 Josep M. Colomer, *Game Theory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Spanish Model* (Aldershot,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5) 和 “Transitions by Agreement: Modeling the Spanish W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1年12月): pp. 1283—1302。

式转型—革命式转变作为转型道路,因为缺乏两个温和博弈方。苏丹式政体的本质在于苏丹混淆了私人权力和公共权力。这一政体中的重要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是因为他们把持了任何官僚机构职位或职业地位,而是因为他们 65 他们是苏丹的私人雇员。而作为苏丹的家庭雇员,绝对没有空间成为温和的谈判方,从而可以公开讨论其雇主的废立问题。在苏丹式政体中,从来没有来自于组织化的民主反对派的温和派。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没有充分的自主性,以便能够组织民主反对派并发展充分的谈判能力,从而成为协议式转型的完整的博弈方。^①

甚至,同样的逻辑会使全能主义政体难以形成完全的两方博弈。有一个强大的博弈方(全能主义强硬的最高领袖及其党国随从)和一个弱小的地下反对派(半个博弈方?),这个反对派努力生存下来并可能进行反抗,但绝对没有谈判协议式转型的力量。

甚至在后全能主义政体的早期,在支配性的党—国领导层内,也不具有充分的多元性和自主性,在民主反对派内部,也没有充分的力量和自主性,来促成各博弈方,成功催生民主转型的四方博弈。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的,如果一个博弈的或“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面临着反抗危机,如果不能镇压这一反抗,考虑到它有限的谈判能力,它将非常易于崩溃。但是,一个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国家(例如 1980 年代中期的匈牙利)和各种威权主义政体(如 1970 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巴西)会产生四方参与的博弈。因此,虽然文献中“协议式转型”的资料很丰富,但是,只有在一些威权主义和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典型的四个博弈者的协议式转型才成为事实上的转型路径。

看起来对于大多数非民主政体可行的转型道路,在更加仔细研究之后,事实上只是对与军人有关的威权主义政体才是可行的。如果认为“军人政府”(military as government)统治对于“作为机构的军队”(military as institution)的成本太大,那么自由选举就会成为控制威权主义政权下的等级

^① 例如,1988 年在国家范围内唯一没有一个反对派地下出版刊物的华沙条约国家,是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之下,这个国家结合了强烈的苏丹制和全能主义倾向。从苏丹政体成功进行民主转型具有特定的困难,这一点见 H. E. Chehabi 和 Juan J. Linz 主编的 *Sultanistic Regimes* 一书中介绍性的一章,以及 Richard Snyder, “Explaining Transitions from Neopatrimonial Dictatorships”, *Comparative Politics* 24(1992 年 7 月): pp. 379—399。也见于 Michael Bratton 和 Nicholas Van de Walle, “Neopatrimonial Regime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1994 年 7 月): pp. 453—489。

表 4.3 非民主政体类型对完成民主转型与巩固的最低目标所具有的意义

必要条件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1. 法治和公民社会的自由	<p>在一些威权主义政体中,存在非常活跃的法治和公民社会传统,但是,公民自由需要得到扩张和保护。法律赋予工会、传媒等的自治也需要被制定和实施。</p>	<p>不存在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许多法规被高度政治化、工具化,这是为党国服务而不是为公民服务,因此,这些法规与民主并不相容。公民自由是最低限度的,并且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发展与保护。公民社会“被压制”的本质(flattened nature)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但在短期内难以实现。</p>	<p>需要广泛改革法制以保证公民权,并实施“法”治。</p>	<p>考虑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混淆、权力极端私人化这样的遗产,建立法治并保护公民须置于优先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p>
2. 政治社会的自主性及其法律条件	<p>需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确保政党之间的自由选举竞争。在基本条件下,政党竞争只是被暂时中止,很容易重新恢复。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建立政党需要法制化,对某些政党的限制需要加强。在某些情形下,关键政治行动者的政治权利需要重建。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威权政党必须被取缔。</p>	<p>党在社会各领域的领导地位必须被废除,在各类机构中的组织必须被取消,几乎所有党产必须转到国家手中。但是,如果公民想重建该党,应该得到允许,其所获得的支持和权力应当依赖于人们的投票意愿。考虑到社会基础被压制,利益的表达将特别困难。</p>	<p>依据法律或其他方式废除执政党的特权地位。通过法制改革保证政党的成立及竞争自由。虽然社会可能不像在全能主义一样被“压制”,经济和政治差异性的相对缺乏使政治利益“表达”很困难,也增加了民主政党依照常规谱系发展的复杂性。</p>	<p>取缔半秘密性暴力并建立信任是政党发展、自由竞争权力并使民主程序和制度充分自主运行的前提。</p>

续表

必要条件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3. 权力民主分配的宪政规则	有时,直接宣布恢复以前的民主宪法;有时,可能对非民主宪法进行修改;有时,需要一个完全民主的立宪会议和立宪程序。	存在形式上的宪法,但以民主的内容对其进行填充之时,可能产生非正当的结果,因为它不是为民主社会而设计的。必须创建新的民主宪法,但是困难重重,因为政治社会没有形成,缺乏宪政文化,以前宪法的承诺没有落实也带来后续影响。	考虑到宪法虚置的特点,沿用这些制度代价非常高,因而,制订民主宪法十分迫切。	必须发展普遍性的法律文化。即使宪法是可以采用的,考虑到近来对宪政规则的滥用,在苏丹制的晚期,也不存在尊重和信任宪政的精神。
4. 接受并服务于民主政府的国家官僚机器	在一定程度上,官僚机构没有被政治化,并保持了专业标准,也没有改革官僚机构的紧急需要。有时,或多或少有限的“纯化”官僚机构,包括司法和军事的,是需要进行的。但是,如果等级制军队力量在以前的非民主政体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这样的清洗就变得相当困难。	国家把主要任务授权给政党,政党对所有官僚机构和部门的渗透使得创立非政治性的官僚机构成为一个紧迫而艰难的任务。取缔政府内的党组织会大大降低政府机构的效率与和谐,并且为新的民主党人或机会主义者实行庇护主义的接管打开了大门。党国的经历留下了大众对政府不信任的遗产。	政府的许多功能,包括司法功能,是由党的机构执行的,这一事实使得净化、改革官僚机构成为广泛的要求,但解决起来,也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议题。前任官僚机构精英的技术熟练而反对派经验的缺乏可能会给前任精英带来特权地位。	庇护主义者的渗透和官僚机构的腐败限制了它们的效率和合法性,并使广泛的改革提上议程。即使民主选举的领袖也会维持庇护主义的做法而不是实施理性的管理。

续表

必要条件	威权主义	全能主义	后全能主义	苏丹制
5. 经济和经济行动者有充分的自主性来保证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的多元主义	如果经济是功能混合经济,那么不需要紧急的变革来推动民主转型和巩固。无论是喜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这是正常政治过程的一部分,这一政治过程包括财产更加社会化与私有化、包括对市场或多或少的社会和/或经济管制。	在共产主义的全能主义中,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制,党和经济的联系使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自主性的成长特别困难。必须对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框架的缺位,以及法律文化的缺乏,使“经济社会”的创建困难重重,并助长了非法和违法行为。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最终控制看起来无助于最低程度的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强大,但这是民主政体所必需的。需要一些改革来创建制度化的经济社会。充分成熟的市场经济不是民主的要求。	废除统治者及其联盟世代相传的庇护主义结构是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正常成长所必须的。

制军队摆脱困境的一种方式。^① 但是,等级制的军事官僚机构控制的政府与苏丹式政体、全能主义政体或在后全能主义政体中的执政党的角色完全不一致。

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以下将讨论非民主政体类型对民主转型路径的影响(表 4.2),以及非民主政体类型对于完整的民主转型目标的实现与民主政体巩固的影响(表 4.3)。

^① 在第五章中,就作为军人政府和作为机构的军队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分析和政治分析。

第五章 行动者与情境

66

除了初始政体类型及其国家性这些“宏观变量”之外,我们将关注其他影响民主转型与巩固的一些重要变量,以这些变量为基础可以构建一些中层命题。两个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关注先前非民主政体的领导基础,关注谁启动、谁控制转型这一问题。三个情境变量涉及国际影响、高压政治的政治经济合法性以及立宪环境。

先前非民主政体的制度结构和领导

此处我们的核心问题关涉对国家机器进行日常控制的核心群体。这些国家精英(state elite)的制度特征是什么?这些特点对民主转型及其巩固是发挥有利还是不利的影晌?在分析意义上,组织基础这一变量必然不同于政体类型这一变量,因为在某些政体类型(特别是威权政体)之中,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国家精英类型,每一种类型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涵义都非常不同。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精英(这并没有包含所有的精英类型):(1)高级军官(hierarchical military);(2)中下级军官,(3)文官精英,(4)独特的苏丹式精英。

高级军官

正如第四章所示,关于以前非民主政体的影响后果,只有威权主义政体有被高级军官控制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控制不同于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苏丹

67 制政体的逻辑。^① 所有的高级军官领导的政权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一特征潜在地有利于民主转型。军官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把自己视为国家机器的永恒部分,具有长久的利益和永恒的作用,可以超越当前政府的利益。这意味着经常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作为机构的军队的领袖做出判断和决定,直接介入非民主政体统治的成本比摆脱非民主政体的成本大。这样,以作为机构的军队(military-as-institution)的名义重申等级权威是军政府(military-as-government)永远面临的危险。而且,作为情境性(situational)的精英成员——其权力和地位来自于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作为机构的军队对国家稳定充满兴趣,而这需要一个政府。^② 这常常意味着,如果民主政体是这一政府中可行的统治方式,军人也许会决定把政府移交给文官,解决他们的内部组织问题及其对政府的需要。自相矛盾而又可以预料到的是,民主选举常常是军队摆脱非民主政体的策略,当他们感受到他们在非民主政体中的突出作用受到威胁。

关于高级军官领导的政权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我们只能做出一些非常吝啬(parsimonious)而且相当不乐观的论断。正是因为军人(他们很少被外国势力或革命消灭)是国家机器的永恒部分,并因此享有获取强制性资源的特权,所以军人是新的民主政府必须管理的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在转型前,军队对国家及其自身组织的管理越是直接,如何对军队进行成功的民主管理这一任务就越有可能成为民主巩固的任务。而且,军人越是受到高级军官的领导,他们就越不会因内部矛盾强迫自己从非民主政体中解脱出来;迫使他们远离职位的联盟越薄弱,军人就越会处于这样的位置,即以保留他们的非民主特权为条件来就他们的撤离进行谈判,或把非常具有限制性的条件强加给通向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与在非民主政体中发现的其他任何三种组织基础相比,高级军官拥有更大的能力把“保留的领域”强加给新选举产生的政府,而这根据我们的定义,会明显阻碍民主巩固。

^① 在一些案例中,例如智利和乌拉圭,特别是阿根廷的肮脏战争(dirtywar)中,军队在其国家安全理论中对敌人进行了界定,这抑制了全能主义者的维度。例如参见,Alexanda Barahona de Brito,“Truth or Amnesty——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Uruguay and Chile”(Ph. 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3), pp. 28—61。

^② 关于区分军政府和作为机构的军队所具有的分析性和历史性作用的讨论,见 Stepan,“Paths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pp. 75—78, pp. 172—173。有关作为“情境精英”的军人与国家之间的特定关系,见 Alfred Stepan,“Inclusionary and Exclusionary Military Responses to Radicalism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eru”,载于 Seweryn Bialer 编: *Radicalism in Contemporary A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7), 3, pp. 221—239, 344—350。

如果高级军官广泛卷入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把他们的忠诚建立在不受新的民主政府惩罚的条件上,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侵犯人权的遗产对阿根廷和智利的民主巩固提出了严重的难题。

68

这并不意味着局势的稳定。权力在何时何地都是理性的。我们只是想说,如果相对统一团结的、等级制领导的军人已经离开了直接统治的活动,那么,创建民主权力和减少军人的非民主特权领域这样一个复杂的双重任务,必须成为新的民主领袖最重要的任务。

中下级军官

另一方面,中下级军官领导的非民主政体具有一些特征,可以使民主转型特别是民主巩固少一些潜在的阻碍。关于民主转型,如果中下级军官领导的军政府(例如陆军上校和少校)遇到困难,那么,作为机构的军队可以通过支持摆脱非民主政体的政变,重建权威的动力会高于军政府被高级军官领导的情况下它的动力。但是,政治的和理论的根本性分野影响到民主的巩固。如果对于已下台的非民主政府的成员的审判和惩罚不被视为对军队组织的惩罚,而被看作是军人中的这些人触犯了军队自身的规范,那么军队将从很大程度上包容这种审判和制裁。同样,如果这些军官们建立了准国家性的情报系统,并被视为对军队组织自身也形成了威胁,那么更有可能默许(甚至坚持)对这些人所保留的权力加以剥夺。

文官领导权

比较而言,从特征上来看,文官领导的政体(甚至成熟的后全能主义的文官领导的政体)比军队或苏丹式领导人,具有更强的制度性的、象征性的吸纳能力,发起、指导以及管理民主的转型。比起军人来,文官领袖往往更有动力发起,也更有能力就复杂的改革协议展开谈判。与军人领袖或准军事化的苏丹式领袖相比,他们通常与社会有更多的联系。文官也会把自己视为未来的民主政体中潜在的赢家和统治者。而对于军人和苏丹式领袖来说,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小得多。

当然,文官领导的政治变革对完全的民主转型和巩固也有潜在的问题。文官领导的自由化会使缺乏民主转型的体制重新达到平衡,或通过技巧性的非民主途径赢得选举,因为他们有接近权力杠杆的特权。但是,当我们考察民主转型时,看起来前非民主政体中的文官领袖设置民主转型障碍的能力,例如

69

在宪法上规定的权力保留领域,比起军队组织要小得多。

也许,上述论断的一个例外是文官领导的、以一党专政为基础的非民主政体情形。这种组织基础对民主转型造成的障碍是否应该与刚刚离开政权的高级军官组织造成的障碍相提并论?在东欧,一些政治积极分子担心,就阻挠民主巩固的能力而言,被打败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与被打败的、占有统治地位的高级军官在功能上是等同的。但是,我们相信,在共产党败于民主自由选举的情形下(如1990年的匈牙利),这一类比在两方面存在根本性的误导:(1)与国家机器的组织关系,(2)动机。高级军官除非已经在军事上被打垮并且被新的民主政体任职者解散,否则,作为一个组织,它会作为一个单位退回国家机器,在国家机器中,它仍然有广泛的政府使命和政府分配的资源(如1989年的智利)。相形之下,被挫败的共产党即使好好地保留了对许多资源和忠诚的控制,可以帮助它参与以后的选举竞争,但它在国家机器中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制度基础;对新的政府资源没有连续性的要求权,也没有连续性的国家使命。在组织上,它是一个被打败的在野党,虽然在未来它可能赢得开放的选举(如1994年的匈牙利),但比起在野的军人来,它缺乏施加“保留领域”的集体资源。此处我们的观点仅仅局限于这样的情形,即民主反对派赢得了公开的竞争性选举并且承担起对国家的控制。但是,在一些社会中,一般是在靠近全能主义一极,由于没有自由或民主政治的遗产,那些地位最高的党国权贵(nomenklatura)就会穿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不是致力于民主构建,而是种族构建。在这样的情境下,公民社会过于脆弱而不能产生有竞争力的政治社会,而党国权贵能够占有权力并通过选举使他们自己“合法化”。

关于行为动机,在大多数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中,那些来自于前党国权贵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在自由竞争性的选举中被打败后,仍然会在国家机器内占据大量的重要职位,特别是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前党国权贵的成员通过扩展他们在管理、行政甚至安全服务领域中的网络,能够保证他们在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享有特权地位,并随之享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们一般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利益而行动。在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前党国权贵并不试图推翻或直接挑战新政体,而是通过它来牟利。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前苏联,这导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混淆,因此给予腐败相当大的空间。前党国权贵成员越是作为个人或民主国家管理者的身份行动,他们作为政府官员生存下来的机会就越多。对于国有生产、贸易、银行业的管

理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可以成功地利用其组织资源来重构公私产权形式。^①因此,前特权阶级的动机系统包含着强大的利己主义者和网络组成成员,他们通过操纵新的政治情境而不是反对它来牟利。而军人的动机系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几乎无一例外,军人的动机是集体性的,并且衍生于维护群体特权的斗争,这些斗争是为了避开集体性的消极行动,例如审讯。因此,不像在野的党国权贵,在野的军人有强烈的动机在反对新的民主政府的公开竞争中采取共同行动。

苏丹式领导

最后,我们应该详细地考察苏丹式统治的制度结构对民主转型和巩固所具有的影响。在苏丹制政体中,统治者将政府和政权私有化,并以一种非制度化但异常普遍深入的方式,渗透进政府、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不仅个人与公众是混淆不分的,而且文官和军人也是这样。在理论上,很难将苏丹制归类为军人领导或文官领导的政体。苏丹式政体为民主转型提供了机会,因为如果统治者(他或她的家庭)被推翻或者遭到刺杀,政权就会崩溃。但是,正是苏丹式政体的特征意味着留给民主反对派组织的空间非常小,因此,除了少量的自然死亡,苏丹独裁者一般是被公民社会迅猛的群众运动、暗杀或武装反抗所推翻(见表 4.2)。这种政体的终结方式经常导致临时政府的动态变化(dynamics),除非决定迅速举行选举,否则这种情况一般会给民主转型带来危险。^②而且,对独裁者的权力的人格化,可能会使政体的亲密伙伴窃取权力。或者,即使领导起义的群体或武装运动消灭了与苏丹式政体最密切的那些人,他们也会把自己任命为人民“至高无上”的代表,并在民主的名义之下进行统治,而不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选举这些为完全的民主转型和巩固所必需的阶段。

71

转型的启动:谁发起?谁控制?

由公民社会的起义、非民主政体的突然崩溃、武装革命、中下级军官领导

^① 达维德·施塔克(David Stark)正在进行关于新的网络形成及其“产权重组”的先驱性研究,他认为产权重组既不是真正私有,也不再是公有的。见“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工作报告,布达佩斯学院,1994。

^② 在对另一变量的分析中,我们将讨论过渡政府。

的军事政变发起的转型都趋于这样的情形,即统治的工具将面临被过渡政府或临时政府所攫取的危险。^① 而由高级军官政府领导的或政权当局领导的势力发起的转型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过渡政府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的状态,并且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哪些群体是最强大的,尤其取决于是选举还是彻底性的法令政令改革被认为是首要的。如果过渡政府迅速确定了选举的日期,并且作为这些选举的相当中立的监控者来进行统治,那么这会是走向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快捷而有效的道路。但是,如果过渡政府声称,它在推翻政府中的行动赋予其合法的使命,来实施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被它解释为民主选举的前提条件,那么过渡政府就会启动一个危险的进程,把民主转型置于危险的动态变化中,甚至包括无限期地推迟选举。

选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选举,就没有一条简单的途径来判断过渡政府是否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人。如果没有选举,在消灭旧政体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的行动者就难以突显出来并宣告他们的民主授权(mandate)。如果没有选举,构成新的民主政治社会的、完整的一系列制度——例如司法、立宪会议和竞争性的政党,就不能形成充分的自主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政体瓦解的情况下,民主政党领导人几乎直接成为过渡政府的核心(如1974年的希腊),或者公民社会领导人成为过渡政府的核心,他们保证把建立政治民主作为第一要务(如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样的情形中,选举最有可能马上举行。但是,通常过渡政府会形成一种使它们远离完全自由竞争的72 动力机制(dynamics),尤其是在武装势力让他们掌权的情形下。为了宣称革命的正当性,临时政府可能以临时性的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取代多党选举。从非等级性的政变起家的临时政府可能会开启一个爆炸性的情势,因为它会使一部分的国家机器攻击另一部分的国家机器,冲突的结果可能是大规模的镇压,可能是革命。在这样一个冲突中,最不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程序民主。

关于国家领导或当局发动、控制的转型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其中之一是,如果当局控制了政权的转移,直到选举决定谁应该治理政府,那么事实上出现过渡政府的潜在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需要明白,这一基本观点意味着当局控制的政权更替可能是一个连续谱,可能是忠于民主的政权,也有可能

^① 对于过渡政府详细的讨论,见 Yossi Shain 和 Juan J. Linz 编: *Between States: Interim Government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是不忠于民主的政权。不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权转换指的是,出于一些原因,即将下台的当政者通过在重要的政府职位上安排非民主政体的支持者,并成功坚持要求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保留许多非民主特征,试图对即将上台的民主选举政府施加强大的限制。如果即将下台的非民主政体领导人不愿意将权力移交给民主制度,且非民主政体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关系是,非民主领导人保留了相当强大的强制性和政治性资源,这时候非常可能发生不忠诚的政权转移。基于我们已讨论过的某些原因,如果以前的非民主政府是等级控制的军人政体,并且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中存在强大联盟,那么,正如我们将在智利这一案例中所看到的,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

国际影响

关于民主转型最有影响并被广泛阅读的出版物是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洛朗斯·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编辑的四卷本著作——《威权主义统治的转型》。这一研究中的案例全部是关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南欧和拉美的,除了意大利。奥唐奈和施米特概括了这些时空范围内的经历,在总结性的一卷中,他们提出,“国内因素在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准确地说,我们认为,没有一种转型,它们的开始不是威权主义政体自身内部重要决定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①在颇具价值的一章中,洛朗斯·怀特黑德讨论了国际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个更高水平的概括:“在这里所考察的所有和平时 73
期,国内力量在决定转型尝试的过程和结果上具有首要性,而国际因素只发挥了次要作用。”^②

但是,如果考虑到整个世界和当代所有主要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民主化

^①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86), p. 19.

^② Laurence Whitehea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Whitehead 的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一书, p. 4。在文章的主体部分,怀特黑德详细描述了欧共体如何在南欧的民主巩固中发挥了强大的支持性作用。在后来的著作中,奥唐奈、施米特、怀特黑德正确地认识到国际影响力在东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见 Abraham F. Lowenthal 主编的两卷本著作 *Exporting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91 年) 和 Geoffrey Pridham 主编的 *Securing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Regime Transi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0)。

案例,就可以大大推进对国际影响因素的分析,并且提出一系列有细微差别的假设。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区分了外国政策、时代精神和扩散效用。

外国政策

从概念上分析,外国政策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国内情境施加影响力。事实上在三种类型的情境下,外国政策力量的运用实际地决定了与民主有关的结果。第一,非民主国家可以运用暴力推翻一个在军事上不够强大的民主政体,并且吞并或占领这个国家或安插一个非民主的傀儡政体(例如,德国在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非民主的地区霸权(它可以是单独一个国家,也可以是采取共同行动的国家共同体)可以在它的“外部帝国”使用军事暴力,逆转民主革命,防止非民主政体被推翻(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或使自由化的过程倒退(例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在反抗非民主政体的斗争中获胜的民主国家可以占领被打败的国家,并通过安插势力来发起民主转型(例如,1945年的德国和日本)。但是,即使外国政策在民主转型阶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一个独立国家的民主巩固最终是由国内力量决定的。

外国政策对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另一影响,我们称之为“打开民主行动之门”。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它们自己内部的需要和地缘政治的需要作出反应,可能在次属的政体中,向民主化行动打开以前关闭的大门。而是否将导致民主转型,是否将导致民主的巩固,这主要由国内因素决定(例如,“二战”后大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1989年东欧的苏维埃集团)。

74 颠覆是政策影响的又一类型。在帮助颠覆非民主政体上(例如,1987年美国对菲律宾的外国政策),或帮助颠覆与霸权者的政策偏好相反的民主政体上(例如,1973年美国对智利的外国政策),地区霸权(民主或非民主的)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虽然很少是决定性的。民主霸权也会运用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权力反对那些竭力阻碍民主转型进程的非民主力量(例如,1978年卡特总统在颠覆多米尼加共和国选举欺诈行为上的作用)。

最后,地区霸权可通过一以贯之的一系列包含着意味深长的促进或促退活动的政策,在帮助区域羽翼未丰的民主政体完成民主转型和巩固上,发挥主要的支持性作用(例如,欧共体共同的对外政策,特别是1974年联邦德国对葡萄牙的战争)。

时代精神

Zeitgeist 这一概念取自于德国的思想传统(intellectual history),它指的是“时代精神”(spirit of times)。我们不相信“历史终结”这一论题的任何变体——这个论题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例如民主意识形态,能或将阻止人类通过创建其他可选择的政治图景和意识形态,对问题做出反应。^① 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当一个国家是国际意识形态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这个共同体中民主只是许多激烈竞争的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比起民主意识形态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这样的时代精神,民主转型及其巩固的机会会少得多。当我们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与 1970 年代中期和 1980 年代的欧洲进行对比时,可以迅速看到民主敌对性或支持性的时代精神具有的效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欧洲,在奥匈帝国解体后的余波中,在凡尔赛公约产生的边界变化和许多政治实验中,11 个国家努力建立了民主政体,而这些国家以前只有很少或者没有独立民主政体的经验。^② 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在欧洲,民主理念与其他四种意识形态竞争,其中没有一种是民主的。苏联共产主义是一个崭新的实验,许多人感到它提供了伟大的承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被许多人视为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强大竞争对手。在罗马教皇的通谕——*Rerum Novarum* 之后,天主教义成为法团主义和整合主义运动(integralist movements)新形式的基础。最后,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许多保守主义者仍然对前民主的、威权立宪君主制这一政治形式记忆犹新,在这些政体中德意志帝国被尊为典范。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非民主观点的影响。拉美也受到这些欧洲知识和意识形态思潮的强烈影响,正如巴西在瓦尔加斯(Vargas)统治之中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的经历和阿根廷庇隆主义的经历所表现的。

75

虽然,即使在时代精神最具支持性的情境中,民主也从没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到了 1970 年代晚期,在南欧——实际上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除了伊

^① 例如,见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National Interest* 16(1989 年夏):pp. 3—18。在立陶宛、波兰、匈牙利,改革的共产主义者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重新掌权只是历史如何可以以新的出人意料的方式演进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在前苏联的部分地区和南斯拉夫,在民主的多数主义的名义下民族国家主义专政的复兴。

^② 这些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对这些国家终结(demise)的讨论见 Juan J. Linz,“La crisis de las democracias”,载于 Mercedes Cabrera, Santos Juliá 和 Pablo Martín Aceña 编:*Europa en crisis, 1919—1939*(Madrid: Editorial Pablo Iglesias, 1992), pp. 231—280。

斯兰文化共同体内原教旨主义的复活这一重要例外)——时代精神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没有主要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确实没错,共产主义在苏联生根并在东欧次属的政体中扩散,但一位杰出的波兰哲学家宣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在中东欧的“临床死亡”,这一声明证明是具有预言性的。^①到1977年,人权问题取得了泛欧洲广泛的支持,以至于东欧政权也成为赫尔辛基协定的签字人。^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彻底丧失了信誉,不再代表吸引力的一极。梵蒂冈二世(1961—1963)之后,天主教教义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形成了对民主(如果不是对资本主义)空前未有的服从性的地位。^③在当代社会,大多数安全而成功的君主是议会民主政体国家的宪法首脑。在1960年代,埃及和秘鲁对军人政体的选择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这种政体在世界上已很少有拥护者。另一方面,拉美左派经历了军人领导的威权官僚主义的现代政体这样一种新类型,它有助于深入地重新评价民主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策略性的工具,而是作为其本身内含的一种价值观。^④一些民主主义者希望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成为一种训练民主的方式,这种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在非洲,到1990年代早期,“一党”政府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最初享有的作为“动员性政权”的可信性(credibility),并逐渐被蔑视为“寻租者”,这一称呼是非民主精英开始采用的。

扩 散

在政治社会中,时代精神指的是历史时期。但在国际政治共同体中,特别是在与文化、高压政治体制和/或信息传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中,扩散效应可以指几星期甚至几天。对诸如民主之类的人类创造物的类定律(law-

^①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p. 465.

^② 关于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对东欧国家和苏联国内政治的影响,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尤其是 pp. 85—100。

^③ 关于梵蒂冈二世及其他如何提高民主在罗马天主教义理论中的地位,见 George Weigel, *The Final Revolution: The Resistance Church and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尤其是 pp. 67—74。

^④ 左派的民主复兴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一个这样的例子见 Francisco Weffort, “Why Democracy?”载于 Alfred Stepan 编: *Democratizing Brazil: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27—350。

like)陈述内在地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类定律陈述,因为历史上没有两个时刻是精确相似的。人类反思以前的事件——这些事件似乎与他们直接相关——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调整他们的行为以取得或避免一个具有可比性的结果。政治上的学习是可能的。例如,在葡萄牙革命爆发后,西班牙的保守主义领导人曼努埃尔·弗拉加(Manuel Fraga)对在领导民主变革中发挥作用表现出一些兴趣,因为他“并不想成为西班牙的卡特罗(Caetano)”^①。同样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也毫无疑问受到了希腊事件的影响,在希腊,他的表兄弟康斯坦丁(Constantine)国王因为对民主的含糊态度,失去了他的王位。

更为普遍的是,我们认为,一组国家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在这组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转型将越会改变其他国家可认识到的政治抉择范围。实际上,正如我们对1989年的中东欧所观察到的,国家扩散效应几乎在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精英的政治期望、群众行为、政体内的权力关系。同样,对实践者和理论家来说,在现代世界,由于信息革命,扩散效应已经明显取得了显著性。今天,通过广播、电视,邻近国家的所有人口事实上都立刻经历了非民主政体的急剧崩溃。这种经历反过来又立即成为国内政治强大的新的组成部分。^②

合法性与强制的政治经济学

公民对一个政权社会经济有效性的认识,与对这个政权本身合法性的认识,关系如何?经济如何影响非民主政体民主转型的前景?如果转型已经开始了,经济如何影响民主巩固的机会?持续的增长对于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的助益是否同等?经济衰退对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的负面影响是否同等?

77

几乎没有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且社会经济发展高水平的政体大多数是民主政体,我们接受这种有充分根据的判断。^③大

^① 弗拉加指的是葡萄牙后萨拉查领导人——马塞洛·卡特罗被推翻之事。卡特罗启动转型失败了。这里的扩散效应是,西班牙保守主义者马上开始重新评价发起民主转型的成本和收益。

^② 本卷中讨论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一些扩散效应,但都没有中东欧国家经历的剧烈。

^③ Seymour Martin Lipset 对这一观点做了经典性的、也是开创性的论述,“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59): pp. 69—105。Larry Diamond 回顾了三十年来的发展/民主争论相关的文献,总结认为,证据广泛支持 Lipset 的理论。见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载于 Garry Marks 和 Larry Diamond 主编的 *Reexamining Democracy* (Newbury Park: Sage, 1992), pp. 93—139。

多数主要的现代转型都发生在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但是,发展水平和民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告诉我们民主转型会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如果民主转型发生,是否会成功完成转型。实际上,在中等发展水平这个关键的情境中,我们认为,关于经济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常常难以或不可能提出系统性的论断。^① 但是,如果采用一个结合了政治学、经济学并关注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就可以做出一些有意义得多的判断。当然对于转型理论来说,有重要影响的人士对于替代方案及体制弊端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合法性信念比经济趋势本身更为重要。为什么呢?

对于那些在经济和政权稳定性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来说,强大的经济条件看起来对任何政体都起支持作用。但我们认为,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无法自圆其说。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侵蚀非民主政体,我们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侵蚀民主政体,我们没有理由来证明。政权类型不同,结果差异很大。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绝对不能提出以下形式的有效命题,即“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不存在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动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许多非民主政权,特别是统计模型中的威权主义政权,考虑到它所面临的例外异常困难(往往是经济方面),而被国家精英及其核心社会经济同盟作为一种必要的政权加以辩护、捍卫。这样,长期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在威权政权下,可能会动摇建基于例外情况的政权的正当性。长期的经济成功可能使人们意识到,非民主政权所采取的特殊强制手段不再必要,因为这些手段可能影响新的经济繁荣。

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导致社会变迁,从而提高镇压的代价,这样间接有利于民主转型。长期稳定的经济扩张一般会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使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更为旺盛,他们的重要性也得到提升;会带来教育的扩张,通过电视、广播、旅游与其他社会建立更强的联系;也可能带来更为多样化的抗议活动。更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一国之内,地区财富的增长提高了公民希

^① 经济增长或经济危机与脱离非民主政体的转型发动之间的特定关系已经成为大量争论的目标。在一篇非常优秀的著作中,何塞·玛丽亚·马拉瓦利非常详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同时特别提到了南欧和东欧。我们发现,他的研究包括了我们独立完成的一些细节分析。我们非常高兴让读者参阅他的书以获取相关证据。见 José María Maravall, *Los resultados de la democracia: Un estudio del sur y el este de Europ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5)。

望受到警察善待的期待。^①

从经验上看,在许多案例中,持续稳定的经济繁荣改变了支持民主势力的权力之间关系。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就有三个案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巴西在1970年代早期,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在最后的20年中(和韩国),都拥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西班牙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人们对威权主义政体一些核心要素的信仰,也导致工业精英相信,他们在未来更加民主的环境中可以管理得一样好。时代在变,政体也应该改变。^②在巴西,在持续五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之后,在石油危机、利率高涨及其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之前,1973年9月,温和派的军人宣布了它的自由化计划。1973年9月,军人觉得经济状况非常好,也没有重大的政治威胁存在。在他们自己的眼里,当使他们的军事政变合法化的“例外情况”不存在时,他们逐渐相信,连续的威权主义统治不仅不是必需的,而且会带来安全部门的自主性和“巴西的阿根廷化”。^③在智利,许多重要的实业家相信,在1980年皮诺切特是必不可少的,到了1988年,他们逐渐相信公平的选举对经济模式的风险比起在不公平的选举中支持皮诺切特的风险小。^④在所有这三个案例中,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对未来其他可能选择的新认识,降低了对民主抉择的反对。

79

与此形式鲜明对比,当我们考察正在民主化的政体或巩固的民主政体之时,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经验证据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导致了政权瓦解这一观点。当然,“不断增长的期望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会对民主政府提出新的要求,但是它不可能攻击民主政府存在的目的或理由。实际上,如果一个政权建立在民主程序的合法性和社会经济的效力这一双重合法性之上,那么,某一重要社会群体(a significant group)提出对政权进行根本性

^① 例如,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七个职业群体进行了调查,这些群体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有自由职业者,他们要回答是否期望警察像对待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对待自己,还是受到“更好”或“更坏”的对待。根据被访谈者住宅位置的经济水平来分析数据。在具有可比性的21个地区中,其中19个地区经济越发达,被警察平等对待的期望越高。见 Juan J. Linz, “Ecological Analysis and Survey Research”, 载于 Mattei Dogan 和 Stein Rokkan 编: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pp. 91—131, 特别是表 1, p. 113。

^② 正如阿道弗·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在他成为西班牙总理前所言,“在(佛朗哥)政府开始时期,我们的人民只是要求面包,今天他们以相同的方式,要求高质量的消费品,在开始时期他们想要秩序,今天他们要求自由——政治结社的自由。”1976年6月9日在西班牙议会上的讲演。

^③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32—33.

^④ 见与智利主要商业利益集团的一位领导人的访谈,载于 Alfred Stepan, “The Last Days of Pinoch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88年6月2日): p. 33.

改变的可能性(考虑到不存在国家性这一问题),在经验上可以忽略不计。

严重的经济问题对民主和非民主政体,尤其是威权政体的影响非常不同。为什么经济的剧烈衰退(比方说持续五年的负增长)会对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产生反面的影响,但是对后者的影响大得多,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现代非民主政体(特别是威权政权)常常十分依赖其绩效宣称(performance claims),而没有得到由民主政治所派生的程序宣称的支持。因此,理论引导我们提出,民主政体有两种宝贵的资源,可以使其与持续的经济低迷摆脱干系,这些对于非民主政体是不可得到的:一是以其起源为基础的合法性宣称;二是选举一直在望,可以产生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计划和政府,而政体可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大多数新的民主政体有八年的喘息时间——最初的政府大约四年时间,取而代之的政府又大约四年。

这个以理论为基础的假说得到了经验数据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数据是费尔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和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收集整理的。在对南美1945—1988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非民主政体在连续三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是73%。更具戏剧性的是,他们的数据表明,没有非民主政体能够在连续三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而民主政体在四年或五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分别是57%和50%。^①

80 让我们回到我们关于非民主政体和民主政体替代方案和对体制弊端的责备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析。如果人们没有强烈认识到有可能进行其他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民主政体通常可以依靠高压继续统治。但是,当人们相信其他选择是可能的(也是更可取的)时,合法性和强制的政治经济条件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非民主政体的强制力下降(比方说由于内部不满和外部重要保证的撤销),长期持续衰退的政治经济状况就会导致政权瓦解。不是经济的变化而是政治的变化引发了政权的瓦解——也就是说,经济恶化的影响经常不得不由政治变革来加以缓解。

体制谴责(system blame)的问题对民主的命运也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的,两次战争期间欧洲的经济危机在荷兰、挪威(它们没有崩溃)与德国、奥地利(它们崩溃了)同样强烈。实际上,在1936年,有3万

^① Fernando Limongi 和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America, 1945—1988"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3年10月27日,未发表的手稿)。

荷兰人到德国工作,因为荷兰的经济状况比德国更差。促使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危机成为政治体制危机的,正是左右两派的强势群体在心目中有其他的政体抉择,并因而攻击这一政体。政治触发的体制谴责,而不是经济危机本身,导致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瓦解。^①

对于民主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其公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政府正埋头于令人信服的工作,力图克服经济难题。当民主政体自身被认为不能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时,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将会对民主巩固带来严重的、或许是无法解决的挑战,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总结一下,关于转型理论与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我们能说些什么、不能说些什么呢?理论分析和利蒙吉-普热沃尔斯基(Limongi-Przeworski)的数据表明,连续几年的负经济增长会降低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生存的机会。因此,比起经历经济负增长的国家来,经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有更好的机会来巩固民主。这就是说,理论和数据也表明,民主政体相比非民主政体,更多地与经济困难绝缘。雄心勃勃的民主政体是否也能够经受住经济困难,正如在对德国与荷兰的比较中表明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非经济体制谴责的程度和大众—精英进行其他政治抉择的意愿。因此,这一问题是一个关系问题。这样的情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的确也出现了,即一个新兴的民主政体受困于公民对民主的社会经济效力认知的下降;与此同时,他们的“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民主是最好的可能政治体制”这一信念却在增强。^②

81

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下,当公民逐渐相信民主政体自身使得经济问题复杂

^① 这一观点更加详细的进展与支持性数据,见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s”, 载于 Robert A. Pastor 编: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New York: Holmes and Mayer, 1989), pp. 41—61。我们要感谢艾卡特·齐默曼(Ekkart Zimmerman)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所做的先导性研究。见 Zimmerman, “Government Stability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 during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30s: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5, no. (1987): pp. 23—52; 和 Zimmerman 在中西政治学协会大会上提交的论文,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actions to the World Economic Crises of the 1930s: Six European Countries”, Chicago, April 10—12, 1986。

^② 在 Linz 和 Stepan, “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p. 44, 我们提到,在这一时期(1978—1981),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恐怖主义不断上升,在全国民意测验中,西班牙公民对民主效力的相信下降了 25%,同期,相信民主对于西班牙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最好的政治体制的比率上升了 5%。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公民不相信任何其他政治体制是更可取的,即使遭遇经济困难。

化,或者没有能力确定并实施一个值得信赖的经济改革策略,对体制的责怪将会大大加剧经济困难的政治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当政府外部或——更加致命的——政府内部的实力集团不断坚持认为,非民主的治理抉择是经济危机的唯一解决之道时,经济危机将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瓦解。

在发生持久性危机的情境中,在经过了至少一个民主政府轮替,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论断,即民主的政治行动者不能或者不愿意寻找解决办法,甚至在通过诸如暗斗和腐败之类的行动把问题复杂化,此时,关键的行动者将寻求其他抉择。但是,其他抉择可能行不通。这些重要行动者关于其他抉择的以往经验也许会同样甚至更加不具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行动者会从一个表现不良的民主政权辞职。这种辞职也不能阻止危机、巨变和有企图的地方政变,也不利于政体改革。但是,这当然会使得民主难以巩固甚至可能使民主解体。

立宪环境

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宪政框架可以被采纳或保留,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是民主转型与巩固分析中受到忽视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评论各种可能的情况,仅仅提及六个可能非常不同的情境和/或框架,并将指出这些对民主转型和巩固构成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讨论既包括对民主巩固最具限制性的情境和方案,也包括了那些对民主巩固限制最少的情境和方案。^①

1. 保留了非民主政权创立的宪法,设置了保留领域和困难的修宪程序。这些限制性条件也许是即将下台的非民主政体为其交出对国家机器的正式控制所提出的要价。但是,如果这部宪法规定非民主政体的“保留领域”继续由下台了的非民主政权执政者控制,那么直到铲除他们的权力,我们定义的民主转型才能完成。如果修改宪法的程序很难,那么会使民主转型与巩固的过程

^① 关于宪法和民主,一些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是 Jon Elster 和 Rune Slagstad 编: *I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Douglas Greenberg, Stanley N. Katz, Melanie Beth Oliveira 和 Steven C. Wheatly 编: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Bruce Ackerman,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 E. Dick Howard 编: *Constitution taking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由位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东欧宪政主义研究中心自 1992 年每季度出版,同时中欧大学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合作伙伴。

更加复杂化。在本书中,智利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例子。

2. 保留了一个“纸面上”的宪法,当在选举竞争更加激烈的条件下发挥用途时,它会产生意料不到的非稳定性和瘫痪性后果。一些非民主宪法可能会规定一系列详细的决策规则、程序和权利,但对非民主政体的运行不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宪法是虚置的(fiction)。但是,在选举更加激烈的情形下,这一宪法可能会被激活,要达成有民主约束力的决议几乎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一宪法可能助长对国家的破坏。应该在它的负面后果发挥瘫痪性作用前极其迅速地修改它。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形式的联邦宪法,即是最重要的例子。

3. 由临时政府创立了包含一些合法的非民主权力的宪法。即使当旧的非民主政体已经瓦解,并且许多新政策通过了,除非去除由临时政府设计的宪法中的非民主成分,否则民主转型本身也不能完成,正如我们在葡萄牙例子中看到的。即使非民主的条款被去除,这一起源于临时政府的宪法,也会因为它的非合适性或脆弱的社会接受度而影响民主的巩固。

4. 在高度限制性条件下创立了宪法,这些条件反映了非民主制度和势力的实际权力。这样的宪法会具有形式上的民主性,因此与正在完成的转

83

型是一致的。但是,民主巩固可能会受到阻碍。这是因为,虽然相信其他的制度安排更适合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巩固,但是,受到限制的制宪会议实际上会被阻止去选择这些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巴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5. 保留了以前的民主宪法。这一方案排除了关于宪政抉择的具有潜在分裂性的争论。因为速度和避免冲突的原因,或者希望唤起一些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法律遗产的原因,再民主化的政权常常会选择这一方案。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简单的保留为民主巩固提出了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如果在威权主义的间歇时期,国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可能新的宪法安排事实上更适合于民主巩固。第二,保留的做法也假定,旧宪法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对民主政体的瓦解根本没发挥任何作用。当事实上旧的民主安排已经影响了民主政体的垮台过程,保留以前的民主宪法就阻碍了一个构建崭新的、先进的具有不同程序和象征的制度安排的历史机会。乌拉圭和阿根廷是值得从这种视角分析的例子。

6. 自由的、一致同意的制宪。当民主选举代表们走到一起来自由协商、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最适合他们政体中民主的巩固的宪政安排时,就形成了自由的共识性制宪。制宪会议在理念上应该避免只为“暂时的大多数人”同意的

党派性宪法,因为这会使一个数量巨大的少数派将宪法修改提上议程,因而使得民主制度的巩固更加困难。最好的方案是,对可能存在的重大分歧和集中关注的问题,以共识的方式而不是多数主义的方式来形成决议,通过全体公民投票同意,使制宪会议取得更进一步的合法性。公民投票设置了民主情境,在这一情境中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例如分权(如果这些是要考虑的)。^① 在本书中,只有西班牙适合这种模式。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考察,在世界上三个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地理)区域,南欧、拉美的南锥共同体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诸如政治社会、法治、经济社会之类的场域,以及一些变量,如政体类型、国家性以及在本章中讨论的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的。

^① 关于赞同由全国范围讨论提出并认可的共识性宪法的观点,参见 Ackerman,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 pp. 46—68。

第二部分

南欧：民主巩固的完成

我们认为,民主的转型与巩固是紧密相连的过程,无法截然分开。但是社会科学家仍然应该尽量清晰地说明某一民主转型是否完成、某一政治体制是否是巩固的民主制度。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讨论下面的主题: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不仅完成了民主转型,而且已经成为稳固的民主国家。由于人们对于南欧国家的民主转型研究较多,而对其民主巩固研究较少,因此,我们就特别关注南欧诸国由民主转型向民主巩固过渡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甚至是艰难性。

第六章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 转变的范例：西班牙

87

人们日益认为：正如魏玛共和国是民主崩溃研究的范例一样，从许多方面看，西班牙是协议式民主转型与迅速民主巩固的典型个案。^① 一系列因素促成了西班牙在转型研究文献中的特殊地位（如果在事实上并不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话）。首先，西班牙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民主转型“第三波”中的先行者之一，因而影响到许多将要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的思考。与许多国家的转型相比，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也没有面临战争中失败或近于失败

^① 在本书使用的案例中，有关西班牙转型的相关文献是最丰富的。一份必不可少的文献是 José Félix Tezanos, Ramón Cotarelo 和 Andrés de Blas 所编的 *La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española* (Madrid: Sistema, 1989), 本书包括西班牙社会科学家撰写的优秀论文、一份相当完整的参考书目、一篇回顾民主转型分析的短文以及一份转型过程年表。也可参阅 *Sistema* 第 68—69 期特刊(1985 年 11 月), 其中包括一篇书目提要短文、数篇优秀论文和一些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表明他们对转型过程看法的调查问卷答复。Ramón Cotarelo 主编的 *Transición política y consolidación, democrática; España (1975—1986)*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1992) 选编了一些重要论文。其余一些重要综述包括: José María Maravall 和 Julian Santamaría,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载于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Laurence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0—108; José María Maravall, *La política de la transición 1975—1980* (Madrid: Taurus, 1981), 其英文版本是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London: Croom Helm, 1982); Carlos Huneeus, *La Unión de Centro Democrático y la transición a la democracia en España*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Siglo XXI de España, 1985); Donald Share, *The Making of Spanish Democracy*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86). Charles T. Powell 的 “Reform versus ‘Ruptura’ in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h. D. diss., Faculty of Moder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1989) 是关于西班牙民主转型前后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 论证充分, 特别关注在佛朗哥政权后期, 那些重要的激进主义者为什么会转而接受民主转型。关于政党与选举, 参见 Richard Gunther, Giacomo Sani 和 Goldie Shabad 编: *Spain after Franco: The Making of a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关于工人阶级的作用, 参见 Robert Fishman, *Working Cl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Return to Democracy in Spa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份关于西班牙民主转型与第一次选举时期人们政治态度的文献是 Juan J. Linz, Francisco Andrés Orizo, Manuel Gómez-Reino 和 Darío Vila, *Informe sociológico sobre el cambio político en España 1975—1981* (Madrid: Fundación FOESSA, Euramérica, 1982)。

88 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曾在葡萄牙和希腊出现。同样,西班牙的统治者也并未像拉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苏联那样遭遇深刻的经济危机。统治者也并未受到外部因素(诸如国外强权撤回对政权的支持等)的影响。西班牙的情况是:当权者认为,尽管反对政权者尚未积聚起(至少是尚未马上积聚起)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政权(特别是由于军队对政权的忠诚),但是鉴于西欧的环境背景,如果不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他们将无法继续掌握权力。^① 在这一意义上,西班牙是“政权启动的转型(regime-initiated transition)”,尽管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

观察家们看重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内战的遗留影响,在外人看来,西班牙曾是一个高度对立和潜在的暴力的社会。但是,外人的看法与20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事实上,通过转型前民间社会的“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转型过程中持续的民间社会文化工作及几乎所有的政治社会要素,西班牙将内战的教训转变为有助于转型的积极因素。这与20世纪40年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内战的历史影响相比,相当引人注目。^②

^① 佛朗哥去世十年以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了一种认识僵局。一方面,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佛朗哥去世后的政权不需变革也能持续;另一方面,只有18%的被调查者认为“反对派力量强大,能够推翻政权”。参见“Actitudes y opiniones de los españoles ante la constitución y las instituciones democráticas”(Madrid: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1985), p. 105。关于1969—1975年政权军事力量的变化,参见Powell, “Reform versus ‘Ruptura’”, pp. 15—54。关于对同一时期军队角色的精彩分析,参见Fernando Rodrigo Rodríguez, “El camino hacia la democracia: Militares y política en la transición española”(Ph. D. diss., Facultad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ológica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1989), pp. 21—72。

^② 正如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Victor Pérez-Díaz)所言,西班牙新的民主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审慎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这一制度成就得益于文化上的集体行动(部分是有意的,部分是无意的)。在我们对于那一经历的集体记忆中,非常突出的是一场已经失败的试验:我们的第二共和国和1936—1939年的内战……那一悲惨记忆的道德意义就是:罪行与责任在竞争者之间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平均分配,因为他们都应受到谴责”。参见Pérez-Díaz,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and the ‘Invention’ of a Democratic Tradition”(Madrid: Instituto Juan March, June 1990, Working Paper #1), 引自 p. 19、20、21、23。也可参见他的权威著作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aloma Aguilar Fernández 对西班牙的教科书、新闻影片、戏剧和普通演讲进行了精彩研究,用事实论证了在佛朗哥逝世前的20年中,关于内战的历史记忆如何在文化上得以重建并成为促成民主巩固的努力的一部分。参见他的 *La memori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1936—1939): Un proceso de aprendizaje político*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en Ciencias Sociales, 1995)。尽管40多年过去了,克罗地亚人一般仍然以内战时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塞尔维亚敌人——塞尔维亚游击队员(Serbian Chetniks);同样,塞尔维亚人也称呼他们的克罗地亚敌人为克罗地亚乌斯塔莎分子(Croatian Ustašas)。参见 Ivo Banac, “Post-Communism as Post-Yugoslavism: The Yugoslav Non-revolutions of 1989—1990”, 载于 Ivo Banac 编,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68—187。

对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伴随着民主转型的启动,多语言、多民族国家的各种问题在西班牙加剧起来,这也是我们选取的这种案例中的第一个。

西班牙转型个案令人瞩目的又一个原因是威权政体已经持续了 36 年,并且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制度结构。西班牙不可能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通过填充民主内容而使既存制度延续下去,或者回到前独裁时代的民主制度中去。特别是佛朗哥设置了君主政体,这使西班牙的民主转型看上去复杂化了,因为君主政体的历史合法性低,且易为民主派所批驳。今天,国王常被称作变革的领航者(*el piloto del cambio*),但是谨记:在西班牙,是国王的行动赋予了君主政体以合法性,而不是君主政体赋予了国王以合法性。^①

89

事后看来,西班牙的民主转型相对平稳,这使许多人将西班牙模式的政治工程视为一种“过于决定了的(*over-determined*)”成功。确实,如果我们将这一凌乱的历史过程简化为一个理论模型,而不考虑其中的复杂、挫折、延滞与疑惑,那么它看上去就像一个优雅的过程,而且易于进行博弈论分析。^②事实上,当代的理论建模与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之间的对比应当成为一种警示,提醒正在研究相似变革的人们注意其间的差异。应当记住,即使是最容易和最成功的转型,在现实中也表现为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不断需要创新性的政治行动。^③值得怀疑的是,1975—1977 年的西班牙人对转型如何进行会像 10 年以后那样表现出巨大的自豪感。当然,对转型过程和它的领导者(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的所谓不满、失望

① Charles T. Powell, *El piloto del cambio; El rey, la monarquía y la transición a la democracia* (Barcelona: Editorial Planeta, 1991) 对民主转型中国王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长达一本书的论述,该书获得了西班牙埃斯帕乔奖(Premio Espejo de España)。关于国王角色的讨论,也参见 Juan J. Linz, “Innovative Leadership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a New Democracy: The Case of Spain”, 载于 Gabriel Sheffer 编: *Innovative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141—186。

② 例如, Josep M. Colomer, *El arte de la manipulación política; Votaciones y teoría de juegos en la política española* (Barcelona: Editorial Anagrama, 1990), 这篇文章最早且富于智慧地将博弈论运用于转型过程的分析。还有一篇以此书为基础的论文,即 “Transitions by Agreement: Modeling the Spanish W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 1991): pp. 1283—1302。

③ 例如, Juan J. Linz, “Spain and Portugal: Critical Choices”, 载于 David S. Landes 编: *Critical Choices for Americans; Western Europ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7), pp. 237—296。这篇文章写于 1974 年,并在 1976 年作了微小修改,它反映了胡安·卡洛斯统治之初的不确定与人们的担心。事后发展出来的理论模型可能会使人们有一种印象,即转型是一个平稳且预先确定的过程,而重读此文有助于更正这一印象。关于领导者在可能性向现实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参见 Linz, “Innovative Leadership in the Transition”。

或者去神秘化,如今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忘却,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转型中,却依然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在追溯历史的时候,1981年2月23日军事政变未遂引发的对转型的潜在威胁,也有被低估的倾向。^①

90 最后,在讨论协议对稳定转型过程的作用时,蒙科洛协议(Moncloa Pact)成为权威性的参考引证。但是,人们经常忘记,在首相官邸蒙科洛签订的这份协议不是社会协议(工会与雇主组织之间),而是一项政治协议。阿道弗·苏亚雷斯召集参加蒙科洛会议的各方相互协商,因为他想让政治社会参与进来,特别是第一次自由选举后在西班牙立法机构拥有代表的各个政党。与会各方中,政党与他们处于民间社会中的重要选民进行协商(苏亚雷斯认为,对于共产党和工会而言,这一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联系尤其重要)。经过这些广泛协商之后,蒙科洛政治协议才在国会的一次庄严会议上正式表决。^② 批准蒙科洛协议的决议在上下两院得以通过,其中下院一票反对,上院三票反对、一票弃权。

在对我们设定的变量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已经强调了这些事实,因为这些变量固然极其重要,我们却不想让我们自己和读者陷入一种认识的陷阱,即认为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是过于决定了的,或政治工程师们总是在遵循一种理性的模式。既然有这样重要的告诫,西班牙又如何与在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变量联系在一起呢?

从一国完成转型与巩固民主之前需要着手许多任务的角度讲,西班牙是从一个相对优越的起点开始转型的。事实上,从表4.3来看,1975年11月佛朗哥逝世时西班牙唯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独立的和获得支持的政治机构。鉴

^① 关于转型中的军方和1981年2月23日失败的军事政变,有文献大量存在。The Revista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36 (Oct. Dec. 1986)专门讨论文武关系,收录了苏亚雷斯之下第一位文官国防大臣阿古斯丁·罗德里格斯和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国防大臣纳西斯·塞拉分别撰写的文章,以及社会科学家的论文、民意数据、书评等。Albert O. Hirschman在“On Disappointment”中极好地探究了不满(desencanto)之下潜藏的复杂性与心理状态,见他的著作 *Shifting Involvement: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9-24。

^② 这一关于蒙科洛协议政治进程的叙述主要基于1990年5月24日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对苏亚雷斯的一次采访。苏亚雷斯说,他最初只是想将稳定化方案作为一项行政决定,但很快认识到如果能够与各政党达成一致,这一方案将会更具合法性和有效性。政治社会内部复杂的协商一致过程是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特点,而这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主要稳定化方案中却是完全缺乏的。这些方案由总统与亲近的顾问秘密制定,未经立法机构讨论便通过电视向震惊的人民宣布。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工会与蒙科洛协议的关系,参见 Fishman, *Working Class Organization and Democracy*, p. 17, p. 180, pp. 215-226。

于此种情况,有人认为,在支持性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政治环境之下,西班牙的民主巩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看法目前正变得流行起来。我们认为,这一未经权衡的观点不仅会造成对西班牙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实际情况的严重误读,而且会导致对如下情况的忽视,即转型实际上是如何准备的,转型计划的成功实施如何使西班牙国家性问题的解决和在事实上巩固民主变得容易。因此,让我们开始讨论转型实际上是如何被构设的。

91

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构设

西班牙民主转型必须解决一个在其他转型国家将同样出现的问题:如何拆除非民主政权及其制度并获取基于选举的民主合法性,以应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希腊和拉丁美洲的军人政权(智利与巴西在一定程度上例外)相比,佛朗哥的文官和威权政权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制度和宪法结构。向佛朗哥政权的制度(如单一执政党与法团主义式国会)内部填充民主选举的人员并不能使之服务于民主政治,一如许多人认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形式上的极端民主主义宪法不能服务于民主政治一样。佛朗哥政权的制度必须去除,但是鉴于民意的整体倾向和军方对既存政权的支持,暴力革命的方式(反对派所主张的与既存政权的决裂)在现实中不可行(正如西班牙共产党领导者后来承认的那样)。① 尽管一些军人激进团体(受葡萄牙政变革命激励的少数人)支持废除佛朗哥宪法,但是由国王发布一项达致这一目标的违宪宣言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从一开始,在现有政权之内,就有利用佛朗哥基本法和法团主义式国会的合法地位、通过合法途径变革现有政体的想法,这些想法与那些法律的精神

① 1978年2月西班牙共产党(PCE)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份文件专门解释了为什么源自政权内部的改革压力和反对派的结合(当然也有国际压力)会“迫使西班牙共产党调整其决裂论题”。完整文本可参见 *Mundo Obrero*, Madrid (Feb. 2, 1978), p. 1。

但是,根据费施曼(Fishman)的研究,晚至1981年,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仍有大量工厂级别的工人阶级领导者并不相信“由于反对派许多领导者的优柔寡断与失误,在大众运动和政治决裂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先进的民主制度的历史机遇已经逝去了”。在巴塞罗那,与共产主义者同盟(Comisiones Obreras)有所关联的领导者中有68%(在马德里有40%)这样认为。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工联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内分别有31%和23%的人认为政治决裂本来是可能的。在接受采访的324名工人代表中,39%相信政治决裂的可能性,57%认为“政治转型时政治力量的平衡使得通过政治决裂实现民主并不可行,左派领导者在转变战略以促进民主改革方面做得很好”。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分别有66%和72%的劳工联盟代表、55%和30%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持此观点。以上数据出自 Fishman, *Working Class Organization and Democracy*, p. 144。

和意图是相违的。大量的思考与争论、一些并不成功的尝试,所有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政治改革法的诞生。合乎法律的“形退实进”(backward legitimation),按照朱塞佩·迪·帕尔马的说法,其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国王曾经宣誓维护这些法律,国王的权威来自于这些法律,政府是根据这些法律任命的,只有通过这一途径进行变革才能保证军方的服从。^① 权威的真空、权力向当时激进的反对派(主要是外围的民族主义者、西班牙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工会运动)的突然转移,极易引发衰退与政治镇压的风险,这正是人们所担心的。因此,改革者必须小心翼翼,他们采取合法的改革,这使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能够解决即将出现的问题(包括国家性问题以及初发的经济危机)的政府团体成为可能。同时,也必须避免对于君主政体的分裂性的公开讨论,因为君主政体并不具有特别强的合法性。

西班牙选择的道路是,说服国会(佛朗哥建立和部分任命的立法机关)同意通过自由公开的选举产生一个根本不同类型的立法团体,并让各政党参与选举。政治改革法的制定和经公民投票批准实现了这一目标。^② 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将会说服共产党和复杂政治结构中的立法机构同意自由竞争的多党选举,以产生一个有责任 and 权力组织政府的联盟议会。即使并不如此,至少也应在联盟范围内通过直接的多党竞争选举产生苏联总统。但正如我们所见,在苏联历史上,与此近似的选举从未出现。但西班牙是如何实现的呢? 无人能够忽视西班牙的结构性有利条件,但是毫无疑问,执政当局在这一相当成功的转型中也贡献颇多。

我们将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领导层作更加详细的分析,并将特别关注国

^① backward legitimation 这一概念最先由朱塞佩·迪·帕尔马提出,见 Giuseppe di Palma, "Founding Coalitions in Southern Europe: Legitimacy and Hegemon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5 (1980): pp. 162-189.

^② 关于“政治改革法”,参见 Pablo Lucas Verdú, *La octava ley fundamental* (Madrid: Tecnos, 1976), 其中有 Enrique Tierno 撰写的序言。也参见 Antonio Hernández Gil, *El cambio político español y la constitución* (Barcelona: Planeta, 1981)。一些读者或许认为,我们在分析中过于关注当政者与反对派中的主要人物。在此,我们意图强调普通公民在造成政权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经常冒险去反对政权,与之作斗争。他们也对政权行动者形成压力,并使之开启了转型过程(有时因此而避免了政权崩溃)。然而,在西班牙的案例中,一项政治改革法被批准后不久进行的调查支持了我们的研究路径,这项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就以下问题作出选择,即谁在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26%选择了政府,23%选择了国王,20%选择了首相苏亚雷斯,8%选择了反对派政党,3%选择了国会,21%选择了一般大众与公民,6%认为毫无意义,9%未作选择。见 Linz 等编: *Informe sociológico sobre el cambio político*, p. 119。

王的缓和作用、圣地亚哥·卡利略(Santiago Carrillo, 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建设性领导、红衣主教塔兰孔(Cardinal Tarancón, 西班牙天主教会领袖)的审慎、古铁雷斯·梅拉多(Gutiérrez Mellado)将军(西班牙军队参谋长)的支持与勇气、约瑟·达拉帖拉斯(Josep Tarradellas, 流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领袖)的政治机敏、多尔夸多·费尔南德斯·米兰达(Torcuato Fernández Miranda)的议会协商能力以及保守派领袖曼努埃尔·弗拉加的合作, 这仅是与转型密切相关的人物的一部分。限于篇幅, 我们无法对这些人物和组织作同等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会唤起对阿道弗·苏亚雷斯的革新型领导的注意。我们将特别关注他在他的两篇最具政治影响的演说(遗憾的是, 它们尚未被翻译成英文)中是如何阐明民主政治的关键问题的。我们将会看到, 对苏亚雷斯而言, 支持选举是他的基本任务。他是正确的。选举对于拆除旧政权的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 对于新的民主政权的设置、合法化和权力获取甚至更为重要。尽管在不同国家这一过程的特征并不一样, 但我们认为, 在我们随后将要讨论的一些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中, 领导人错过了推进这一权力侵蚀/权力创建过程的机会, 从而对民主政治与国家能力造成了损害。

在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演讲中, 时任第一届王室内阁大臣、国民运动(Movimiento, 几乎僵死的西班牙单一执政党, 原长枪党)秘书长的阿道弗·苏亚雷斯向佛朗哥控制的法团主义式国会发出呼吁: 自由化与最终的民主化是必需的。^① 它引发了长达五个月的争论。苏亚雷斯首先提及“民主主义的君主”对于改革的支持, 然后指出: 鉴于佛朗哥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政府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进行政治改革, 允许自由的政治结社。“我想我们的历史任务……非常简单: 完成(佛朗哥开启的)工程。……在这一历史性时刻, 政府作为法定管理者, 有责任将现代民主制度巩固所必需的机制付诸实施。”他强调, 西班牙的社会变化已经促成了新的多元化状态, 事实上, 这一多元化状态已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

(提议进行政治改革、使政治结社合法化的)出发点是承认我们社会

^① 许多分析家认为, 这一演讲影响到国王选择年轻的阿道弗·苏亚雷斯接替阿里亚斯·纳瓦罗的首相之职。马拉瓦利和斯塔玛里亚(Santamaría)认为阿里亚斯“从未接受将继承下来的政权转变为多元民主制度的观念”。参见 Marvall and Santamaría,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81.

的多元状态。如果社会是多元的,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一状况……如果我们用最低限度的坦诚来思考国家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除了理论上的多元论,现实中已经存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如果我们拒绝看到这一现实,我们将会使自身陷于荒唐的盲目之中。这些政治力量,无论是否称之为政党,已经作为一种公开的事实而存在……这些政党的目标是明确的,相当重要的是他们要夺取权力。所以,如果国家不自主地制定法律以向他们开放政治道路,我们拥有的将仅是表面的和平,在此之下萌生着政权颠覆的种子。

苏亚雷斯继续说,政治协议正在讨论之中。但他随后机敏地提出一个问题:大众的政治代表如何产生以参与这样的政治协议:“他们(政府)同谁订立协议?”苏亚雷斯接着给出了他的答案:“只有经过选举才能产生有效的对话者与合法的代理人。”^①1976年7月1日,首相阿里亚斯·纳瓦罗(Arias Navarro)被迫辞职,阿道弗·苏亚雷斯被任命为首相。

苏亚雷斯上任之初,民主进程的制度化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在许多民主转型中,旧政权的政治体制仍然有效,抑制或延缓了民主革新。在西班牙,国会本来也会是这样一个机构。苏亚雷斯试图说服国会批准政治改革法,这项法律实际上将导致国会自身的消亡,因此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如果他没有能够说服国会,他当初就不得不冒体制性对抗而对民主的合法性造成不确定性后果的风险(正如1993年叶利钦与俄罗斯议会之间的冲突),或者顺从国会而停止民主转型所需要的变革。

为了处理好这一问题,苏亚雷斯谨慎地起草和商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法文本。在提交国会以进入法定批准过程之前,他通过电视发表了第二次历史性演讲。在面向全国的演讲中,苏亚雷斯含蓄地警告国会,如果没有新的政治体制准则,社会冲突将会发生:“规则的缺失导致‘个殊性程序(ad-hockery)’,这可能导致政治混乱。”他同时督促国会允许人民表达意志,以避免冲突。他向人民表示,他相信国会会执行这一历史性任务。然后他迈出了从自由化向民主化过渡的重要一步。他倡导自由公开选举,并为此设定了日期。“我已经

^① 所有这些引用均译自阿道弗·苏亚雷斯于1976年6月9日向国会所作的演讲,他在其中为政治社团法辩护。演讲与法律的全文见于“El Derecho de Asociación Política”(Madrid: Ediciones del Movimiento, 1976), pp. 9-28。

说过选举这个词,本质而言,这是此提案的关键。(被提议的)宪法修订将准许(新)国会尽快由直接的、无记名的和广泛的投票选举产生,而选举无论如何也要在1977年6月前进行。通过这一方式,人民将参与他们自己未来的建设,因为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将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将就关涉国民全体问题做出决策。”对苏亚雷斯而言,根本任务是设法使街头和民间社会的政治力量参与到政治体系中来,并且保证自己在选举之前不会丢失权力。尽管承认反对派团体及其领袖,苏亚雷斯仍然重申他的论点,即只能由选举决定协商的对象。苏亚雷斯认为,通过选举,“今天这些作为积极参与者而自愿公开出席的政治团体(他们影响重大、值得重视,但是缺乏大众授权)将会成为人民的代表。”

95

苏亚雷斯间接向国会呼吁,如果国会允许自由选举,由投票决定自己的去留,这从伦理和历史角度而言都将是正确的。他同时向国民保证,权力真空不会出现,法治终将实现。“政府确信,(佛朗哥政权的)制度机构将会理解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并将支持向自身所服务的人们发出直接呼吁。不可能、也不会出现政治体制的真空,更不会出现合法性真空。之所以不会出现真空状态,是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建立在法律优先基础上的法治国家。”

苏亚雷斯继续指出,只有实现政府重组,以新的民主性权力填充它,它才能足够有力地执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议程,解决隐约出现的国家性问题。因此,一系列改革的开端必须是政治改革。“当人们的呼声得以表达时,其余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才能在选举代表制赋予的权威之下得以解决。像地方行政区域制度化这样的问题才能在西班牙的永久统一前提下得以处理。”苏亚雷斯将政治改革视为经济改革的前提。“只要国家仍然存在政治未知数,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复苏与稳定。”演讲结束时,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之情,并暗示国会必须允许人民去决定。“未来并未绘成,因为只有人民能够描绘它。”^①

在投票的前一天,许多密切关注此事的观察家并不确定政治改革法是否能够得以通过。然而,国会以425票对59票通过了这部法律,这赋予了苏亚雷斯和民主化运动以动力。^② 随后,1978年12月15日,政治改革法被提交全

^① 参见 Pablo Lucas Verdú, *La octava ley fundamental*, 其中含有这部法律的全文(pp. 103—108)和苏亚雷斯向国民的演讲(pp. 109—119),我们据此作了摘选翻译。

^② 林茨现场经历了整个国会辩论与第一轮投票。在1976年11月18日的投票中,赞成票与反对票的差额是366票,其中赞成票比1976年6月9日举行的表决增加了121票,这一表决针对的是自由化的政治社团法,而对它的争议本来就小得多。

民公决,并以77%的投票率、94%的赞成票获得批准。

96 政治改革法在全民公决中以压倒性多数获得批准后,拆除威权结构、认可民主权力的进程加快了。公民表决增加了苏亚雷斯进行政治协商、建立包容性政治社会的权力和能力。1976年12月23日,即公民表决之后仅仅8天,苏亚雷斯首次正式会见反对派,在此之前的1976年夏天,他已经同工人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领袖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及其他反对派领袖进行了两次非正式会晤。1977年1月,苏亚雷斯非正式会晤了刚刚获释的共产党领袖圣地亚哥·卡利略。1977年4月9日,苏亚雷斯采取了使共产党合法化的举措,考虑到强硬派的抵制,这一步是十分危险的。1977年6月15日,第一次国会选举举行。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起草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于1978年12月6日由全民公决批准。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一进程阐明了转型过程中合法、合法性与权力和时间设定重要性的复杂相互作用。^①

共产党的合法化:对包容性抉择的解释

一旦立法机关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总体原则被接受,苏亚雷斯面临的最困难、最危险的决断就是是否使西班牙共产党(PCE)合法化。数十年的反共宣传、对共产党抱负的猜忌以及对其弥散于整个社会的力量的担忧,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得右翼(特别是军方)本应动员起来以反对这一转变。即使是在改革者中间,也有人呼吁将共产党的合法化推延至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

然而,合法化问题事关对政治论争的包容,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因此关系到西班牙民主化努力的可信性。此外,按照激进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的说法,一个强大共产党的明显存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两难境地,需要在镇压的代价与容忍的代价之间作出困难抉择。苏亚雷斯在电视讲话中试图证明合法化的合理性,他把这一问题清晰地展现于人民面前:

共产党有组织地存在着,(对合法化要求的)拒绝与现实不符。与共产党的斗争只能通过镇压才能进行。

我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像我的其他阁员一样强烈反对它的意识

^① 关于时间设定在转型中的作用,参见 Juan J. Linz, "Il fattore tempo nei mutamenti di regime", *Teoria politica* 11, no. 1 (1986): pp. 3-47.

形态。但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真诚地信奉民主。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人民足够成熟……以融合他们自己的多元状态。

我不认为我们的人民希望看到自己的监狱中充满了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入狱的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我们必须警醒自身,必须见证和判断我们的公共行为。我们必须存有对合法少数的尊重,共同生活的权利与责任中蕴含着对反对派的认可。一个人如果反对另一个人,必须通过文明的竞争来实现。坦率地说,投票箱难道不比街头的动荡局面更可取吗?^①

97

这一关键决定使人们不再怀疑苏亚雷斯本人的民主许诺的真实性,苏亚雷斯也借此时机宣布他将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使共产党合法化的决定相当危险,这引发了一系列强烈反对,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军方领袖,甚至包括一些支持转型的重要政治家。例如,苏亚雷斯的公告使得海军部长愤而辞职,这一职位不得不由一位退役将军接替,因为没有现役将军愿意承袭这一位置。苏亚雷斯的公告同时也刺激军队最高委员会(the Army Supreme Council)发布了一致性宣言,声称“共产党合法化已经造成了军队各部门的普遍反感”。但是,除了早先一份言辞激烈的文件,他们在最后仍然认为:“考虑到更高的国家利益,(委员会)会保持克制,并接受这一既成事实。”^②事后证明,苏亚雷斯的这一艰难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保证了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西班牙共产党及其领袖圣地亚哥·卡利略的温和态度,从而为转型的最后成功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我们不进行冗长的论述,但是很明显,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做出包容性的选择决定抑或排斥性的选择决定将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将允许所有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进程,后者则需要一些规则以抵制在政权的某些重要部门或社会看来可能会对它们或民主政治造成威胁的政党。我们也不会讨论民主政治是否有权将“民主游戏”的参与权仅限于许诺遵守民主规则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规范性问题。然而,我们希望将包容性选择的两项经验意义表述清楚,它们曾

^① 苏亚雷斯的这一篇以及在1976—1978年关键时期的其他演讲,见于 Adolfo Suárez González, *Un Nuevo horizonte para España: Discursos del Presidente del Gobierno 1976—1978* (Madrid: Imprenta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78)。

^② 对共产党合法化后军方紧张状态的精彩分析,参见 Rodrigo, “El camino hacia la democracia”, pp. 185—194, 引自 p. 191。

在苏亚雷斯的上述演讲中被委婉提及。首先,允许政治参与的决定要求客观地计算支持可能的极端主义运动的票数,这将削弱他们遭到禁止时为寻求广泛社会支持而表现出的过激诉求。其次,如果极端主义政党被宣布为非法,民主政权将依据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而非实际的行为来监禁属于国家宣布的非法组织的公民。

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主义者必须消极地抵制反民主力量。民主主义者可以反对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可以尝试从政治上孤立他们,可以在他们以暴力实践其观念时将其投入监狱。但是首先,民主主义者不能逃避与反民主力量的协作,即使双方的协作并非完全诚恳。

西班牙共产党忠诚地致力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与巩固,但是1977年出现的规范性与经验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突出。赫里巴塔苏纳党(the Herri Batasuna, HB),一个鼓吹巴斯克地区独立与革命的政党,不加掩饰地同情甚至间接支持埃塔(ETA)恐怖主义者。然而,恰恰在我们看来,鉴于我们已经提出的理论与经验论据,赫里巴塔苏纳党并未被宣布为非法。实际上,赫里巴塔苏纳党已经成功地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但是它在政治上是根本性孤立的。

我们在分析一些重要案例时发现,西班牙甚至允许一些明确的反民主极端主义者参与选举的做法对于民主巩固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例如,在1979年第二次大选中,新力量党(Fuerza Nueva,一个新法西斯主义团体)在全国积极活动,宣称要伸张过去的价值,并试图聚合反政权力量。但是,新力量党仅赢得了全部选票的2.1%,仅选出一名代表。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在1979年大选后旋即解散。更具戏剧性的是,1982年大选期间,法院竟然允许1981年2月政变组织者之一的安东尼奥·莫利纳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Molina)在狱中掌运西班牙团结党(Solidaridad Española),理由再次是他代表了反对转型方向的思潮。特赫罗(Tejero)的政党仅获得全部选票中的不足3000张(占0.13%),借用苏亚雷斯的话,这客观地“计算”出选民对于反叛者的彻底拒绝。

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支持民主政治,也不意味着反民主人士不可以享有进行合法的与非暴力活动的自由。暴力活动当然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惩戒(尽管一些民主主义者或许会由于对恐怖主义的憎恶而宽恕非法报复)。保卫民主政治是民主党派及其领导者的责任,并最终是选民的责任,尽量使民主主义者来组织政府。

国家性问题及其民主重构

如果西班牙像我们将要讨论的葡萄牙、希腊和拉美国家那样是一个相对同质的民族国家,它的民主转型或许早就随着宪法的批准而告结束。然而,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促生了国家性问题。西班牙转型进程的著述者们并未意识到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的重要性。然而,其余多民族国家的危机突显了西班牙解决国家性问题的措施的重要意义,这需要单独加以关注。我们认为,西班牙之所以能够通过成功的授权来解决国家性问题,完全是由于它首先建立了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权力(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一进程),它有权威和能力来重构政体。

99

我们判断,当西班牙开始转型时,对民主转型与巩固而言,有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并发症的变量就是国家性。由于国家性是如此重要,同时由于它在西班牙得到了很好的处理(这与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同),因此我们将详细地分析这一问题,其中包括它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影响,也包括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国家民主转型的理论意义,这些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在地区、文化、民族等方面有着重要差异。

当西班牙开始民主化进程时,危险的国家性问题出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 1960—1975 年巴斯克民族主义组织埃塔(*Euskadi ta Askatasuna*—*Euskadi and Freedom*)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共导致 43 人死亡。在宪法被批准的 1978 年,死亡人数上升至 65 人。1979 年和 1980 年(这一年举行了第一次新的地区大选,导致中央权力的较大范围的下放),这一数字分别是 78 人和 96 人。^① 这些武装暴力活动造成了军方反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 1968—1975 年或者转型时期的 1975—1977 年,巴斯克叛乱没有造成一位军官被杀害,而在按照民主规则运行的后大选时期的 1978—1983 年,巴斯克民族主义暴力活动造成了 37 名军官死亡。^②

^① 参见 Fernando Reinares, “Sociogénesis y evolución del terrorismo en España”, 载于 Salvador Giner 编: *España sociedad y política* (Madrid: Espasa Calpe, 1990), pp. 353—396。特别注意第 390 页的表格与参考文献。

^② 同上书。也可参见 Francisco J. Llera, *Los vascos y la política. El proceso político vasco: Elecciones, partidos y opinión pública y legitimación en el País Vasco, 1977—1992* (Bilbao: Universidad del País Vasco, 1994)。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军官被害,同时西班牙准联邦制的建立面临不可避免的困难,那些全国范围的重要利益集团或政党却并没有抨击体制。他们并没有故意利用困境来攻击羽翼未丰的民主政权的权威,也没有利用这一困境来削弱与传统单一制国家组织形式相背离的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我们判断,之所以没有出现体制抨击,主要是由于西班牙成功地通过全国范围的大选处理了潜在的严重国家性问题。

选举,尤其是奠基性选举,有助于确立行动议程、行动者以及团体组织,最重要的是有助于确立合法性与权力。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一国存在国家性问题,那么第一届选举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将具有重要影响。西班牙的第一届选举是全国性的,我们认为这有助于超越国家性问题。正如我们所见,后佛朗哥时代的第一次投票是一次批准“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决。这一法律并未促使政府承诺政治改革的具体细节,而是承诺明确的民主化(不仅是自由化)进程。

1977年6月15日进行的第二次关键性投票也不仅仅是关于自由化的,而且有关民主化;这是一次全国大选,以选出创建政府和起草新宪法的代表。由于涉及全国所有选区,四个全国性政党在整个西班牙范围内围绕着全国性话题展开了激烈竞争,并赢得了350个席位中的319个。在分裂倾向最严重、反体制情绪最深远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这四个全国性政党的竞争相当艰苦。尽管强大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出现,但是这四个全国性政党及其地区机构仍然赢得了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选票的67.7%和51.4%。^①

由这一系列全国性选举产生的代表与政府,围绕着宪法与如何处置国家性问题进行了漫长的公开或私下的协商。最终,一部共识性宪法取得了上述四个主要政党和加泰罗尼亚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国会中的支持,274名成员中的258名投票批准该部宪法。紧接着,西班牙向选民发出第三次全面呼吁,也就是对宪法的全民公决。1978年12月1日,新宪法以87.8%的支持率获得通过。在巴斯克地区,投票者中有68.8%支持新宪法,但投票率仅为45.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加泰罗尼亚67%的投票率。^②

^① 关于全国性政党的组织情况和大选在转变这些政党的行动议程中的重要作用,参见 Gunther, Sani, and Shabad, *Spain after Franco*, pp. 37-177。1977年选举的结果见 p. 38 和 p. 311。

^② 关于全民公决投票的具体情况,参见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7)。

经过这三次选民集会,西班牙政府与国会得到加强并获得了合法性,他们开始认真讨论协商向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省级代表授权的问题,这些代表已经在大选后被任命。经过激烈的争论,协商者最终草拟了一个制度,据此西班牙将改变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而建立一个新的分权体制,其特征就是前所未有地向外围的地区民族主义选民授权。1979年10月,关于地区自治协商的结果(自治条例, the Statutes of Autonomy)被提交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选民表决。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参与投票者中分别有87.9%和90.3%赞同各自的自治条例。^① 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PNV)在全民公决宪法时曾极力主张弃权,但是这一次却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做出调整,对自治条例表示赞同。^②

101

假如西班牙第一届选举是地区性的而非全国性的,创建全国性政党与全国性行动议程的动力将大大降低,从而使全国性政党及其各地机构的得票数减少。^③ 我们也认为,如果第一届选举处于地区性水平,民族所引发的问题将在选举竞争中发挥更显著、更具分裂性的作用,民族主义政党和它们的地区机构将更具极端性。实际上,外围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本来可以利用竞选进行宣讲,从而使得分裂和独立的呼声与动员变得有力。^④ 这样,被强化的民族主义政党本来有可能使西班牙的国家性问题严重复杂化。军方与中央政府中的民主力量之间的关系本应相当紧张。在国家性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政变联盟(在1981年2月23日,由于国王的个人干预而失败)本来

^① 参见 Juan J. Linz, "De la crisis de un Estado unitario al Estado de las autonomías", 载于 Fernando Fernández Rodríguez 编: *La España de las autonomías*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dministración Local, 1985), pp. 527—672; Juan J. Linz, *Conflicto en Euskadi* (Madrid: Espasa Calpe, 1986)。关于巴斯克自治条例的协商,参见两位记者的报道, Keba Bordegarai and Robert Pastor, *Estatuto vasco* (San Sebastian: Edicione Vascas, 1979)。

^② 一些极端分离主义团体继续抵制自治公决,这次投票率比全民公决宪法时的全国平均投票率低13%。然而,54%的投票率仍然具有政治意义。

^③ 甚至当国家性问题并不突出时,西班牙的地区性政党在地区性选举中的得票率也一般要比全国大选高15%—25%。

^④ 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例子就是:1976年3月,加泰罗尼亚政治力量委员会公开要求“自‘民主决裂(ruptura democrática)’的时刻开始,建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临时政府,由该政府承担加泰罗尼亚的权力,并承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宣布和举行选举,以产生加泰罗尼亚议会;该政府将立基于1932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宪章体现的基本原则,并将自身的成立作为自决权具体运用的第一步”。曾经流亡在外的前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主席约瑟夫·塔拉德利亚斯(José Tarradellas)在他的文集中评论道:“政治性的套话处于鼎盛时期。” José Tarradellas, *Ja Sóc Aquí: Recuerdo de un retorno* (Barcelona: Planeta, 1990), diary entry of March 15, 1976, p. 4。

有可能早些时候出现,用更大的力量来反对分裂的、并且缺少合法性的政府。

102 西班牙民主转型当然是在有利的环境中开始的,明确的民主化承诺与全国范围的选举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资格,有助于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西班牙外围民族主义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新的、宪法所认可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全国范围的选举通过对多重认同和民主政治的支持重构了国家性认同。在一个新的民主政治的西班牙,相辅相成的多重认同是存在的。加泰罗尼亚的双重认同就是一个典范,且从未受到质疑(见表 6.1)。

表 6.1 加泰罗尼亚的多重认同:1982 年

认 同	人 口			整体性样本
	双亲均生于 加泰罗尼亚	双亲均不生于 加泰罗尼亚	移 民	
加泰罗尼亚	13.7	10.7	2.3	9.0
加泰罗尼亚 > 西班牙	26.5	12.0	4.2	16.9
加泰罗尼亚 = 西班牙	48.2	37.5	25.9	40.1
西班牙 > 加泰罗尼亚	5.7	10.5	12.6	8.2
西班牙	5.1	23.7	51.3	23.5
未作回答	0.8 (414)	5.7 (69)	3.8 (317)	2.4 (885)

资料来源:Juan J. Linz,“De la crisis de un Estado unitario al Estado de las autonomías”,载于 Fernando Fernández Rodríguez 编: *La España de las wutonomías*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dministración Local, 1985), p. 560。

加泰罗尼亚人目前从政治、文化上控制着教育、电视和广播,实际上几乎涵盖了以前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受到压制的所有领域。加泰罗尼亚人作为一个地区团体,同样参与欧洲共同体(现在的欧盟)事务,欧共同体是一个国家间共同体,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地区间共同体。最终,在这样一个新背景之下,加泰罗尼亚人远比以前广泛地接受了作为西班牙国家一员的身份。西班牙的一系列选举有助于从法律和情感上建立一种相互助益的、对民族的(加泰罗尼亚)、国家的(西班牙)和超国家的(欧盟)政治体的成员资格认同。加泰罗尼亚人中的压倒性多数以身为加泰罗尼亚人为荣,以身为西班牙人为荣,并且支持加入一体化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表 6.2 清晰地展现了这些相辅相成的多重认同。

表 6.2 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认同

调查答案	百分比	
	加泰罗尼亚	整个西班牙
身为西班牙人而自豪	73%	85%
身为加泰罗尼亚人而自豪	82%	N/A ^a
支持通过欧盟实现欧洲统一	83%	76%

资料来源：关于自豪感的问题来自 Francisco Andrés Orizo and Alejandro Sánchez Fernández, *El sistema de valores dels Catalans* (Barcelona: Institut Català d'Estudis Mediterranis, 1991), p. 207。关于欧洲统一的问题来自“Los Españoles ante el Segundo aniversario de la firma del Tratado de Adhesión de España la Comunidad Europa”(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Abril 1988), 53。经过允许,这一表格复制自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 (Spring 1992): p. 128。

^a N/A 表示数据无法获得。

巴斯克地区的政治状况较为复杂。尽管对加入欧洲统一体的支持率很高,但是巴斯克地区公民对身为西班牙人感到自豪的百分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0 个百分点,比加泰罗尼亚人低大约 30 个百分点(见表 6.3)。巴斯克地区仍然存在日常的分离主义暴力活动,但我们相信,经过我们所描述的一系列选举,整体的政治状况已经改善。实际上,巴斯克地区是一个相当显著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选举如何建构认同、如何削弱某些类型的反国家暴力活动的合法性。

表 6.3 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认同

调查答案	百分比	
	巴斯克地区	整个西班牙
身为西班牙人而自豪	44%	85%
身为巴斯克人而自豪	69%	N/A ^a
支持通过欧盟实现欧洲统一	74%	76%

资料来源：经过允许,复制自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 (spring 1992): p. 129。

^a N/A 表示数据无法获得。

现在,我们详细关注政治进程如何建构认同的问题。1977—1979 年,西班牙政治中最热门的问题涉及外围民族主义与单一制国家的关系。这两年期间,巴斯克地区希望独立者的百分率增加了一倍,几乎相当于总人口的 1/3。同一时期,加泰罗尼亚持赞同独立态度者在一个较小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倍。

显然,如果这些趋势再持续几年,西班牙将出现严重的国家性危机。然而,一旦出现了自治条例的全民公决,一旦建立起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参加的政府,独立的情绪就减弱了,并在较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见图 6.1)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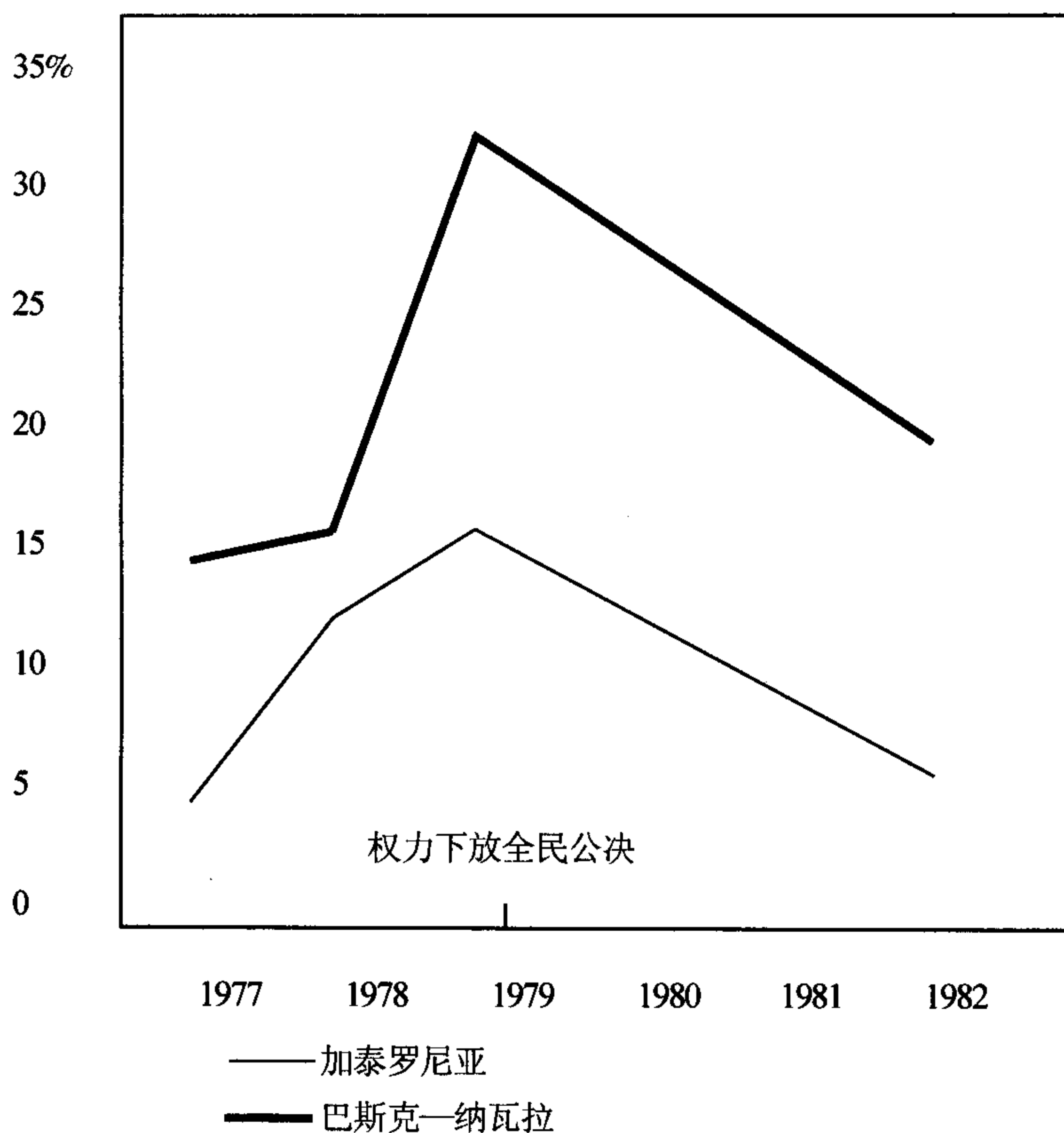


图 6.1 1979 年向自治区下放权力全民公决前后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纳瓦拉地区希望独立者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 (spring 1992): p. 130。经过允许, 来源于 *Daedalus*。这一表格基于下面文献提供的原始数据: Juan J. Linz, "De la crisis de un Estado unitario al Estado de las autonomías", 载于 Fernando Fernández Rodríguez 编: *La España de las wtonomías*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de Administración Local, 1985)。

全民公决之后,由倾向独立的群体主使的暗杀、绑架和恐怖主义依然存在,但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显著改变。在民主转型、宪法制定、自治条例的协商与批准、巴斯克议会选举、巴斯克政府组成、向政府转移职能的过程中,埃塔恐怖主义是一个重要动力因素。在每一个这样的时间点上,人们总是认为,这样一些步骤会导致恐怖主义的终结;然而,更多的情况是,这些步骤往往伴随

着恐怖主义伤亡数字的高涨。恐怖主义并未随着西班牙民主政治和巴斯克制度结构与自我治理的巩固而消失。

这是否意味着解决国家性问题(外围民族主义的存在)的这些步骤已经失败了呢?有证据(在此我们无法详细讨论)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恐怖主义在以前具有核心重要性,现在已经变成了生活中悲惨的一面,在巴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均是如此,但是它却无法动摇西班牙的民主政治。1995年对反对派人民党(Partido Popular)领袖何塞·玛丽亚·阿兹纳尔(José María Aznar)的人身袭击激起了社会的一致谴责。现在,恐怖主义的支持力量仅占巴斯克人口的少数。

105

民意测验数据显示了巴斯克地区的人们对于埃塔的态度根本转变,但在这些民意测验中,问题表述存在一些变化,回答“无意见”与“不知道”的比例也有不同(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民意测验机构测验的缘故),这使得跨时间的不同态度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化。在记住这些的同时,我们想指出,1979年仅有5%的人将埃塔视为“犯罪分子”,到1989年,有16%的人这样认为。1979年17.1%的人将埃塔视为爱国者,到1989年,这一比例仅为5%。在10年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说埃塔是“理想主义者”的人口比率由33%降至18%;含糊地说埃塔是“被操纵的”的比率由29%降至11%;而将其视为“疯子”的比率由8%增至16%。许多这样的变化应归于回答“不知道”者和不予回答者的增加,由8%增至34%——或许反映出对于整个议题的厌倦——但是这确实折射出以下事实:将埃塔视为爱国者而加以支持和将埃塔视为犯罪分子而加以谴责的数量已经发生了改变。

另一组数据涵盖了1981至1989年的时间跨度,它表明:1981年8%的人们“完全支持”埃塔,到1989年,这一数字是3%。支持埃塔的目标但不支持其实现方式的人由1981年的3%增至1989年的9%。最重要的是,持完全反对态度者由1981年的23%增至1989年的45%，“不知道,未作回答”者的比率由1981年的48%降至1989年的16%。^①

比较1979至1986年间人们对政党态度的数据,可以发现,在支持工人社会党(PSOE)的人中,回答“爱国者”或“理想主义者”的比率由46%降至10%,

^① 关于巴斯克地区民意测验数据的分析和对政治暴力背景下民主政治的更广泛讨论,参见 Goldie Shabad 和 Francisco J. Llera, “Political Violence in a Democratic State: Basque Terrorism in Spain”, 载于 Martha Crenshaw 编: *Terrorism in Context*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0—469; Llera, *Los vascos y la política*; 以及 Linz, *Conflicto en Euskadi*, p. 698。

而给出消极答案(“疯子”或“犯罪分子”)者的比率由 47% 升至 74%。最显著的是,这一“认同去合法性(identity delegitimization)”同样也发生在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artido Nacionalista Vasco, PNV)的投票人中间,其中给出积极答案者的比率从 40% 降至 16%。甚至在赫里巴塔苏纳党的投票者中,积极回应也有弱化,说“爱国者”的比率由 60% 降至 31%,但是说“理想主义者”的比率有所升高,从 1979 年的 25% 升至 1986 年的 40%。^①

106 对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而言(或许类似于全世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将永远不会消失。但是这种期待的强度和用以推进这一期待的政治手段能够而且已经改变。融合于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国家是可能的,正如过去 20 年西班牙—巴斯克政治模式所显示的。

这些发展已经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多层次的身份认同(持有巴斯克和西班牙双重认同的重要群体),并且限制了这两个群体的两极分化。它们同样稳定了初始强烈并且日益增长的独立愿望。虽然政治、政府和选举在一个重新界定的西班牙国家内发生和运作着,但是这样一种愿望并未消失,尽管它日益被表述为一种象征性的长期目标。这些发展同样使得巴斯克地区内的埃塔恐怖主义政治分离活动的去合法性成为可能。尽管巴斯克的政治暗杀仍然持续着,但它们不再能够威胁到足以颠覆民主政府。

西班牙的国家性危机已经被抑制,最初是由于对选举顺序(electoral sequence)的选择。在讨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国家性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国家的选举顺序与西班牙是极为不同的,它加剧了这两个国家由于苏维埃式联邦体制和历史记忆而存在的国家性问题。我们不想夸大在关键时刻首先举行全国性大选——全国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同时也会给予民族主义政党以民主合法性——对于成功解决西班牙国家性问题的意义。如果没有后续步骤(1977 年秋天为地方自治做准备的各项法令、1978 年宪法和 1979 年自治条例的批准),这一问题将继续是西班牙民主巩固的障碍。我们也不是说在多语言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外围的民族建构努力并不成为问题(就我

^① Shabad 和 Llera, “Political Violence”。遗憾的是,对于 1979—1989 年关于独立的态度的比较并不完全可能,因为“不感兴趣(indifferent)”的选项在 1989 年才被引入。然而,对独立持“巨大期待”和“相当大期待”的比率在 1979 和 1989 年分别为 36% 和 31%,而期待“相当小”的比率分别为 15% 和 18%，“很小”分别为 12% 和 7%，“没有”分别为 29% 和 19%。提供“不感兴趣”选项使得 19% 的人未作选择。此外,“未作回答”的比率由 7% 升至 18%(或许是由于不同的调查机构的缘故)。

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的意义而言)。我们要说的是,中央对地方权力全面下放的推延(至1978年西班牙宪法获得批准之后)、自治条例的协商及它们在全民表决之后所具有的广泛合法性,所有这些对于民族主义的抱负以及创造一个新的、与以往不同的国家,提供了不那么冲突的、较具制度化的认可。

运用前面提出的民主转型定义,我们认为西班牙民主转型始自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最迟结束于1979年10月25日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全民公决举行。当然,也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观点:民主转型结束于1977年11月政府向国会负责的原则正式确立之时,或者1978年12月6日新的民主宪法在全民公决中获得批准之时。然而,我们认为,只有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方案得以协商并表决之后,西班牙才符合我们设定的民主转型完成的三个条件:由自由的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执掌政权;政府拥有制定政策的最高权威;政府按照法理不必与其他团体分享权力。在此之前,人们曾经臆测:军方是否会成功地挑战政府,协商和制定涉及富于争议的地方政治(regional politics)政策的统治权利。而且,如果民主选举的政府无法解决这些地方化问题,它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政府有可能被视为是佛朗哥追随者政权的额外持续。

107

对暴力与民主化的解释

估量政治暴力在实现民主化的努力中的重要性是困难的。在本书所含的案例中,各个政权并未被大众武装运动、游击队或恐怖分子所颠覆,如果我们忽略罗马尼亚杂乱的种种事件。葡萄牙上尉们的“以政变实现解放”却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西班牙案例中涉及的埃塔暴力活动当然不会导致西班牙的转型,而只会加剧佛朗哥政权的危机。1973年12月,佛朗哥的总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Luis Carrero Blanco)遭到暗杀,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对当时的政权和佛朗哥去世后的变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将继续处于争论之中。有人认为,如果佛朗哥去世时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是首相的话,强硬派的抵制将更加强烈,民主转型将会是另一番更加困难的景象。一些事实是清楚的。埃塔的暴力活动是严重的问题,对它的镇压削弱了佛朗哥政权在国际上的合法性。1978—1980年,在批准新宪法、第二次自由选举、同巴斯克温和派政治家协商巴斯克自治以及巴斯克地区领导人的首次选举期间,暴力活动的规模达到高潮。

然而,许多反对派在整个这一时期对埃塔的同情与容忍态度,以及法国政府对在法国活动的埃塔分子的暧昧态度,使埃塔能够扰乱和阻挠新的民主政治。尽管埃塔在政治上日益孤立,但其暴力活动仍然使得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政府宽恕(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了反对埃塔的非法活动。这是一个民主政府污损其公民权利纪录的案例。^① 在1995年之后的几年中,这造成了对政府的严重信任危机。

在此,我们只想指出,反对非民主政府的恐怖主义斗争可能是对新的民主政治造成负面影响的历史遗产,因为恐怖主义者可能会追求民主化之外的目标,因此在民主政治实现之后不会停止行动。智利在民主政府执政之后,右翼的一位有智慧的领袖,参议员杰米·盖兹曼(Jaime Guzmán),遭到暗杀,这是这种历史遗产使政治进程复杂化的又一个例证。

民主的巩固

学者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西班牙民主政治的巩固不迟于1982年10月大选之后权力向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和平转移。我们承认这一日期,但是,也必须指明,民主政治的巩固甚至要更早一些,可以追溯至对参与1981年2月23日政变的军官的审判与监禁完成之时。这次政变的两个主要领导者特赫罗上校与米兰斯·德·博施将军(General Miláns del Bosch)遭到监禁,军方和民间社会从未有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来宽恕他们,这的确意味深长(与阿根廷相比,这让人惊讶)。

在关于民主巩固的理论探讨中,我们区分了公民整体的态度与全国性重要团体的行动,以及在政策领域民主政府是否享有法律上的最高地位这种结构性现实。在西班牙的案例中,与民主巩固完全相适的第一个要素是民意。到1978年为止,西班牙的民意已相当具有民主倾向,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如此。(见表6.4)

西班牙的民意不仅在抽象意义上强烈趋向于民主,而且激烈地抵制与民主政治相对的另一种选择——军人政府。(见表6.5)

^① 正如林茨所指出的,在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语言的和宗教的要求相混合的案例中,民主政府极易违反法律,犯下滥施人权的错误。参见他的“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s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Historical and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载于Asbjørn Eide和Bernt Hagtvet编: *Human Rights in Perspective: A Global Assess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 177–222, pp. 299–310, 尤其是 pp. 190–193。

表 6.4 “对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西班牙,1978—1993 年

调查答案	1978	1980	1981	1982—1983	1983	1988	1993
“是的”	77	69	81	74	85	87	79
“不是”	15	20	13	6	10		
“视情形而定”				12			
“其他”	8	11	6	7	5		
样本数目	5898	无法获得	1703	5463	3952	4548	1448

资料来源:经过允许,本表格复制自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载于 Robert A. Pastor 编: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9), 44。由马德里的 Data S. A. 作的全国性调查。关于 1978(7 月)和 1980 年的数据,参见 J. J. Linz, M. Gómez-Reino, D. Vila, and F. A. Orizo, *Informe sociológico sobre el cambio político en España, 1975—1981* (IV Inform FOESSA, Vol. 1, Fundación FOESSA), (Madrid: Euramérica, 1981), pp. 627—629。关于 1981 年 3 月 4 日至 21 日(2 月 23 日政变之后)的数据,参见 *Cambio* 16, no. 488 (April 6, 1981): pp. 42—45。关于 1982 年 12 月—1983 年 1 月的数据,参见由 Volkswagen-Stiftung 支持的大选后调查,未发表。关于对此的研究,参见 Juan J. Linz 和 J. R. Montero, *Crisis y cambio: Electores y partidos en la España de los años ochenta* (Madrid: Centro ed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1986)。关于 1983 年(秋季)的数据,参见 J. J. Linz, “La sociedad española: presente, pasado y futuro”,载于 J. J. Linz 编: *España, un presente para el futuro, I: La sociedad*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Económicos, 1984), pp. 57—95, 以及 J. J. Linz,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载于 Mattei Dogan 编: *Comparing Plutalist Democracies: Strains on Legitim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pp. 65—113。1988 和 1993 年的数据来自马德里的 the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de Data S. A.。关于一个重要的概念与经验分析,参见 José Ramon Montero 和 Richard Gunther,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Spai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 IVI World Congress, Berlin, August 21—25, 1994。

表 6.5 “当前,你认为以下哪一个是最佳选择:仅由中间民主联盟组成的政府、政党联合政府、文官—军人政府、军人政府?”西班牙,1981 年

109

调查答案	百分率
中间民主联盟政府	27%
联合政府	52%
文官—军人政府	5%
军人政府	2%
其他(未作回答、不知道、很难分类)	14%
(样本数目=1703)	100%

注释:这一问题用西班牙语表述是:“En estos momentos, qué cree usted que es el mejor: un gobierno solo de UCD, un gobierno de coalición entre partidos políticos, un gobierno civico-militar, o un gobierno military?”

资料来源:经过允许,这一表格源自 Linz 和 Stepan, “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c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p. 45。数据来源于西班牙马德里的 Data S. A。在 1981 年 3 月 4 日—21 日(2 月 23 日政变之后)所作的一次特别民意调查。

佛朗哥死后十年,76%的人对民主转型感到自豪,仅有 9%不以为然。这种自豪感在左翼中尤其强烈,其中包括支持共产党的人口中的 82%,支持工社党的人口中的 88%。^①

就全国性重要团体的行动而言,军方中的一部分人极力试图以强制手段(必要时则以武力手段)向民选政府施加条件,这至少延续到 1981 年 2 月的未遂政变。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等学者认为,一些政党的激进主义者与政变谋划者保持着充分的联系,由此他们事实上被称为半忠诚的反对派(a semiloyal opposition)。然而,国王、民意与政党领袖们所表现出的对政变的压倒性的反对态度非常清楚地表明:1981 年 2 月以后,最佳选择只能是民主博弈。^②

110 民主巩固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民主政府成功行使了它的权利,从而使它的政策权力未受到非民主机构的限制。到 1982 年,对政变军人的审判与关押已经结束。这一审判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巩固,因为它表明了政变军人的“选择”受到抵制和不被纳入议事日程的实际程度。最重要的强硬路线者失败了,他们受到斥责,被投入监狱。审判之后,“大量军官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认识:民主政治已经稳固下来,军队应该将自身融于其中”^③。最后,在 1982 年 10 月面对工社党成员控制的稳固的议会多数时,“军方的主张从政治方面转向更加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事务,从抵制转向融合”^④。从 1982 年 12 月到 1991 年 3 月,工社党政府的国防大臣、前巴塞罗那市市长纳西斯·塞拉(Narcis Serra)设计和执行了一场宏大而彻底的军队重组,这一重组开始于中间民主联盟政府及它们的文官国防部长。在他任期结束时,“原先令人恐惧的军方权力在许多方面是国家管理机构的又一个分支了。”^⑤就文官—军人关系而言,文官—军人

① “Actitudes y opiniones de los españoles ante la constitución y las instituciones democráticas”, p. 32.

② 政变之前,一些政党(包括工人社会党)的重要人物忙着与军方就建立一个文官—军人联合看守政府的可能性进行半忠诚的商讨。政党激进主义者的这些矛盾行动在政变之后停止。关于一些政治人物的半忠诚行为的讨论,参见 Paul Preston,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 (London: Methuen, 1986), pp. 160—168, 尤其是 pp. 191—184。

③ Felipe Agüero, “The Assertion of Civilian Supremacy in Post-authoritarian Contexts: Sp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 D. diss., Duke University, 1991), p. 300.

④ 同上, p. 309.

⑤ 关于工社党改革的精彩讨论,参见上书, pp. 309—356。本引文出自 p. 356。

关系的民主制模式使得军方在民选政府的政策论争中声音微弱,军方认可了自身少有“特权”或者限于自身领域的现实。^①在十年以上的时间里,西班牙一直处于此种情形之中。

对推进或阻碍民主巩固的基本背景变量的回顾表明,西班牙(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国家性问题变量除外)是在所有其他变量相当便利的条件下开始转型的。威权政体的组织基础是文官或文官化的职业政权官员。一些人或许会认为佛朗哥政权是一个军人政权,但是佛朗哥行使权力时的身份不仅是军队的将军,而且是政党的首领,特别是国家的领袖。大量对佛朗哥政权最后25年决策的研究支持费利佩·阿圭罗(Felipe Agüero)的判断,即“尽管军队在佛朗哥政权结构中地位很高,但是它并未规划或监控政府决策或控制政府领导人”,“西班牙的军队并未进入制定主要转型决策的精英核心。”^②我们认为,将转型之前的政权称为“文官化的威权政体”是合适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相对于苏丹式基础 and 军方掌权而言,这样一个基础为民主转型与巩固减少了许多障碍。

111

当然,佛朗哥逝世时,西班牙存在着要求变革的社会与政治压力,这很重要。我们强调西班牙民间社会中较为组织化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日益显现的政治社会的基础、保护与支持性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民众以较少组织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异议,这种异议体现于示威、集会与罢工声援之中。一些这样的行动相当具有自发性,当然许多参加者也并不属于这些行动的任何发起组织。

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与共产主义欧洲诸政权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这些政权具有强烈的全能主义或者僵化的后全能主义特征,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诸国。在转型开始之前和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民间社会与政治社会比较弱小,这使得在广场、教堂和大街集会的市民们(如莱比锡、德累斯顿、柏林、布拉格、索非亚、提米索亚和布加勒斯特的情形)对这些政权的危机和崩溃,或者说对这些国家转型的启动发挥

^① 关于“军方特权(military prerogatives)”和“军方主张(military contestation)”的深入概念性探讨以及对西班牙、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比较分析,参见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93—127, 特别是 p. 122 的图表 7.3。

^② 这两个引文出自 Felipe Agüero, “The Military in the Processe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merica and South Europe: Outcomes and Initial Conditions”, 递交拉丁美洲研究会第十五次国际会议的论文, San Juan, Puerto Rico, September 21—23, 1989, p. 22 and p. 27. 一个类似的观点,参见 Rodrigo, “El camino hacia la democracia”, pp. 21—32, 以及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118—121。

了更大的作用。这些案例中的一些极有可能导致暴力结局,但在西班牙,由于民间组织和刚刚出现的政治社会的领导者们的调解作用,这种结果并不容易产生(或许巴斯克地区除外)。1977年2月西班牙的大规模示威就是一个例子,这次示威发生在共产主义劳工律师遇害——阿托卡谋杀(the Atocha murders)——之后;在最高法院大楼内的律师协会办公点举行的遗体瞻仰(lying-in-state)、这次大规模示威的获准以及西班牙共产党对武器的控制,使它成为一次相当重大但却是有序的事件。在这种强化的改革压力与期待背景之下,政权的政治领袖们(特别是阿道夫·苏亚雷斯)启动了政治改革法,并且在第一次大选举行和宪法起草时掌控着局势。大众压力促使转型不断向前,并且形成了著名的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的辩证逻辑。尽管如此,既然政府在转型诸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将西班牙视为协商转型的案例是合适的,我们认为这一模式可以避免“临时政府”诸问题中的大部分。

至于先前的非民主政府的角色的意义,我们在表4.3中认为,一国在威权政体的最后阶段,可能会形成关于民间社会、立宪与法治、政府官僚机构和经济社会的一系列条件,如果出现民主转型的话,这些条件将非常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西班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用维克多·佩雷斯-迪亚斯的话说,“到7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欧,与这些制度的运行相应的文化信仰、规范性倾向与态度也与欧洲相近。这是政治民主改革如此迅速的一个原因”^①。他继续指出,到70年代中期(转型前夕),“西班牙的经济已是现代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位列第十,它的工业庞大,服务业繁荣,农业正经历迅速的转变”^②。事实上,西班牙经济得益于西欧经济的整体发展,在1961和1970年之间,西班牙达到了7.3%的增长率,是世界上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③ 西班牙的转型特别关联到关于新民主转型与巩固中

① Pérez-Díaz, “Emergence of a Democratic Spain”, p. 14。政治偏好方面同样如此。例如,尽管在1977年选举之前公众对领导者以及日益显现的大量政党认识不足,但是他们仍能清楚地把自己界定为左翼或右翼,并且表达他们对欧洲政治光谱中某一意识形态倾向的偏好,这种情形甚至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出现,而在转型开始后尤为明显。大多数西班牙人通过日常新闻而对欧洲政治与政党相当熟悉。就此而言,西班牙与后全能主义社会显著不同,特别是与前苏联相比。

② 同上。

③ 参见 J. M. Maravall, “Economics Reform in New Democracies: The Southern European Experience”, *East South System Transformations*, Working Paper # 3 (Oct. 1990),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 3。关于1960到1975年西班牙经济实力与佛朗哥政权的缺陷的详细评述,参见 José María Maravall, *Los resultados de la democracia: Un estudio del sur y el este de Eutop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5), pp. 61—104。

的经济要素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强劲的经济增长促成了一个更加复杂与独立的社会,大量的工人阶级抗议与罢工首先关注经济事务,随后关注于一致性要求(solidarity demands),由此间接促进了民主转型。在转型时,西班牙紧密的组织网络抑制了混乱与暴力活动,这或许是由于每个人在无序之中都有所失。然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民主转型的肇始和促成民主制度的具体政治进程之间并无直接联系。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前的许多年,西班牙已经达到了本应导向民主化的一定发展水平,但是商业阶层并未施加改革压力,并未清楚地宣示既存政权已经完成其使命,未来的发展需要民主化。商业阶层并不反对民主化,甚至悄悄加以支持,但是他们并未对民主化发挥任何积极的公开作用。

正如第一章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对民主的巩固至关重要的五个场域中,西班牙在开始民主转型时已经具备了除了政治社会之外的所有理性的支持条件。民主转型的策划者与支持者继承了一个合理分化的、强大的民间社会,一个需要重组但是已经制度化的经济社会,一个被威权主义腐蚀但是有用的国家机器(民选政府之前当然如此,第一届民选政府就是沿用它的框架)以及一个新近产生的、理性的、浓厚的法治传统。 113

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并不认为国际影响对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与巩固非常关键(我们将要指出,国际影响对于葡萄牙相当重要),但是它起到了系统性的支持作用。事实上,在西班牙1986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前,它的民主制度已经巩固。不过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是民主国家,并且为即将加入者“设立了一个稳定的奖惩模式”,这一事实有助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与巩固。^①正如前工社党大臣何塞·玛丽亚·马拉瓦利(José M. Maravall)所指出的,“阿道弗·苏亚雷斯于1977年表达了西班牙希望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意愿,议会中的所有政党都支持他。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近来历史上的国际孤立与独裁政治密切相关。欧洲共同体被视为民主与发展的一个象征,这一象征在反对佛朗哥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十分重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被认为是民主巩固的决定性步骤”^②。因此,西欧国家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与流行的时代思潮非常支持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与巩固。扩散效应同样有助于西班牙的转型。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激励一些支持政权的领导者推动了民主转型,而不是坐

① Whirehea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p. 22.

② Maravall,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p. 16.

等下层社会的反应。希腊国王地位的丧失或许也促使胡安·卡洛斯支持政府主导的民主转型。

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相当有趣,因为毫无疑问,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西班牙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直到民主巩固(1982年)3年之后才有所改善。20世纪70年代早期,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是欧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徘徊于3%左右。伴随着民主转型,失业率迅速上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失业率达20%,事实上是欧洲最高的。1960年到1974年,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平均高于7%,属于世界最高之列;而1975年到1985年,则平均仅为1.7%。^① 经济效力与政治合法性紧密相关的假设将使我们预见到民主制度合法性的降低。尽管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政权之社会经济效能的信任大大降低,但在回答“对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民主是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时,持肯定态度的市民显著增加。^② 正如荷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情形,20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尽管经济滑坡,但仍然竭尽全力维持民主政权的运行,因为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合适的选择。借助于良好的经济状况这一事实,西班牙的改革顺序实际上是先政治、再社会、后经济。^③

我们的最后一个条件变量是宪法批准模式。西班牙并不存在苏丹式背景或者军事武装冲突,因此由临时政府强加宪法便不再可能。昔日威权政权日常管理过程中军队的相对淡出,以及转型是由政权中的文官领导者启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队并不试图向制宪会议强加威权或限制条件。^④ 内战的遗留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以及佛朗哥政府执政达40年之久的事实,实际上使得复辟已不再可能。这些因素连同民主主义反对派的持续压力,使得政权的领导者采取了自由的制宪模式。在这一模式内,西班

^① 西班牙的失业数据来自 Banco de Bilbao,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Situación: Review of the Spanish Economy*,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 10-11, 1986。西班牙的增长率来自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6, 1982 和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Quarterly Reports: Spain* (2nd quarter 1986)。

^② 这一观点的详细展开,参见 Stepan and Linz, “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 载于 Robert A. Pastor 编: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9), pp. 42-48, 引文出自 p. 43。

^③ 关于南欧改革议程先后顺序的开创性作品是 Maravall 的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一文。鉴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面临的“共时性(simultaneity)”问题,该地区的改革顺序(很不幸)未被人们严肃地加以考虑。甚至在南美国家,除智利以外的所有地区,改革顺序的选择都引发了深刻的债务问题与政治问题之并存。

^④ 关于这一重要论点,参见 Rodrigo, “El camino hacia la democracia”, pp. 273-277。

牙选择了协商一致形式,而非多数裁定形式。1978年4月5日,苏亚雷斯向议会下院作了一篇演讲,强调了政治转型与制宪进程中的协商一致问题:

在制宪过程中,政府必须约束自己的各种选择意向,将意见歧异限制在并不严重的水平,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造成国家完全缺乏和谐一致性的方法,这种和谐一致性是国内各种力量实现共存的基本环境,它的缺乏将是对国家最严重的威胁。这种暂时的情形是所有制宪时期的特征,影响着政治行动的各个方面……宪法作为国家一致性的表达,必须经由协商一致来达成,因为将现存的各种政治力量考虑在内是必要的。^①

通过协商起草宪法的结果就是宪法在下院以 325 票获得通过,仅有 6 票反对、8 票弃权。为使新宪法的合法性最大化,西班牙的领导者选择了将其集体成果提交公民复决,新宪法获得了 88% 的支持率。^② 本卷中我们考察的其他 12 个国家均未实行所有这些步骤。协商进程的最大影响或许是:佛朗哥去世 10 年之后,65% 的被调查者认为宪法是“绝大多数正当协调一致的结果”,仅有 10% 认为宪法是“一党强加于其他政党的结果”。在回答“宪法体现了谁的意愿——‘右翼’、‘左翼’、‘中间派’、‘所有人’或者‘并不显著’?”时,57% 认为是“所有人”,其次,7% 认为是“中间派”。^③ 因此,宪法曾经是、现在也是新的民主政治中公众意见一致的构成要素。

我们并不想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西班牙民主的巩固是由我们所设定的变量过于决定了的。我们已经承认了国家性问题之微妙、1981 年 2 月西班牙民主制度所受军方威胁之严重,以及对转型成功而言政党领袖与国王的政治技巧与智慧之不可缺少。但是,从比较的视角看,西班牙是在有利的环境中开始转型的。如果西班牙在一个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或者苏丹式政体的背景中开始转型,情况将大不一样。但是,我们考察葡萄牙的情况时将会看到,尽管与西班牙拥有同样类型的威权(政体作为起点,一个起始于由中下级

^① 关于对民主决策过程中一致同意形式与多数裁定形式的区别的阐述,参见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ism and Consensus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36。

^② 关于表决情况,参见 Linz, “Innovative Leadership in the Transitions”, p. 185。关于制宪进程,参见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③ “Actitudes y opiniones de los españoles ante la constitución”, pp. 50—51。

军官发动的政变的民主转型却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

在本书作最后修订时,西班牙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不过这与民主转型无关。这场危机起因于西班牙银行行长和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第一位文官队长的贪污、对秘密行动组织自由反恐大队(Grupos Antiterroristas de Liberación,GAL)恐怖主义式的反埃塔行动的容忍与支持、对一名埃塔成员死于警察之手的隐瞒以及广泛的电话监听。

建设性不信任投票(the 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与加泰罗尼亚政党——民族党(Convergència i Unió)的利益的结合延迟了议会解散与新选举。但是,没有人质疑民主制度,人们得到的回应是1996年3月进行的提前选举。在这一案例中,民主的质量并未损害民主的巩固;事实上,在这一及其他案例中,人们可以认为:民主制度对蹩脚政府的保全是民主巩固的证据。

第七章 从临时政府到转型与巩固 同步进行：葡萄牙

116

葡萄牙民主转型展现出的特征与我们的理论框架直接相关，它极其生动地展示了由中下级军官发动的民主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在葡萄牙，这造成了临时政府的统治，并且使得制宪历程深受非民主压力的影响，结果造成了权力“保留领域”的出现，阻碍了民主转型的完成与巩固。葡萄牙的案例鲜明突出了选举在民主转型与巩固中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因素，因为选举可以从社会和法律上改变权力关系。如果没有武装力量运动（Armed Forces Movement, MFA, 亦称尉官运动）关于在一年内举行选举的书面允诺（一些革命军官及其支持者后来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将变得更具不确定性与艰难性。

为什么葡萄牙的民主转型与西班牙有根本性不同？政权类型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因为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政权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并无显著不同。的确，葡萄牙政权常被描述为全能主义政权，但是，多数学者现在认为它从来就不是全能主义的，即使是在最糟糕的萨拉查统治时期。^① 葡萄牙政权确实有法西斯式的群众组织结构，但是与西班牙相比，这些结构的实际重要性更小，而且执政党也并非组织有力。葡萄牙政权拥有一个非民主的宪法体制，这一体制带有强烈的法团主义色彩，但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这一政权拥有某些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制度，如议会定期选举，甚至曾经在选举之前短暂

^① 关于对萨拉查政权法团主义性质的分析，参见 Manuel de Lucena, “Interpretações do Salazarismo: Notas de leitura crítica”, *Análise social* 20 (1984), pp. 423—451。关于文献回顾，参见 António Costa Pinto, *Salazar's Dictatorship and European Fascism: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Boulder,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1995)。关于佛朗哥与萨拉查政权的比较，认为两者均非全能主义，参见 Javier Tusell, *La dictadura de Franco*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88), pp. 272—305。

117 地容许政治争论。^①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出现过直接选举总统——事实上,在1958年,当政者提出的候选人几乎失败。单一执政党的软弱与法西斯意识形态影响的弱小,使得葡萄牙政权比西班牙更加异于全能主义模式。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的军方更加难以驾驭、更富政治化。军方反叛并非奇事,而且政府和反对派都试图争取军方的支持,让军官来决定总统的标准。事实上,1926—1986年的葡萄牙总统均为军方出身。^② 但是这个政权绝不是一个军人政权。基本上,葡萄牙的非民主政权可以被视为拥有一个弱小政党的、文官化的威权政体,这与西班牙相似。萨拉查是一个被学院派所包围的大学教授,他的继任者也是一位著名大学教授。萨拉查长期担任政府首脑,像佛朗哥一样,他最终致力于维持他所创建的非民主政权。

既然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政权如此相像,为什么葡萄牙的转型是与过去的革命式决裂,而西班牙却是一种“交易转型(transition by transaction)”呢?今天,在撰写葡萄牙的巨变时,我们往往以一种由后来的转型进程所设定的框架来审视它,而忘记了1974年的葡萄牙是现代南欧民主转型的先行者。匈牙利、巴西、乌拉圭和韩国的政府与反对派精英可以效法与参考“西班牙模式”,而葡萄牙的转型发生在西班牙之前,并没有这种有利条件。作为转型的首发者,葡萄牙当然也不会受到扩散效应的推动。协议式改革—协议式决裂模式尚未被创造出来。然而,当我们怀着对扩散效应与政治学习(political learning)的重要性进行评估的兴趣而讨论西班牙时,我们已经展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之所以与葡萄牙具有根本性差异,部分原因可能是:佛朗哥去世时,葡萄牙的激变正在发生,这种动荡对于西班牙政权中的一些重要激进主义者而言是一个如何不进行转型的参考点。姑且不论此重要一点,人们仍然可以从历史假设的角度推测“交易转型”在葡萄牙原本是否具有可能性。

梅因沃林(Mainwaring)和赛俄(Share)等“交易转型”的理论家们,根据对西班牙与巴西的概括而推定交易转型是很可能发生的,只要满足下列条件:

① 参见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Régime d’Exception’ That Became the Rule: Forty-eight Years of Authoritarian Domination in Portugal”, 载于 Graham and Makler, *Contemporary Portugal*, pp. 3—46。

② 关于萨拉查统治下的军队及对21个不同起义个案的分析,参见 Douglas L. Wheeler, “The Military and the Portuguese Dictatorship, 1926—1974: ‘The Honor of the Army’”, 载于 Graham and Makler, *Contemporary Portugal*, pp. 221—256。尽管有这些歧义,惠勒(Wheeler)仍然很清楚萨拉查政府不是军人政府。“1933年特别是‘二战’之后,军队的领导权逐渐被国家所控制”(p. 199)。

(1)适度稳定的政权；(2)低度的颠覆威胁；(3)合作型反对派；(4)低度动员；(5)革新型领袖。^①除了一个小型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之外，1970年萨拉查去世时，葡萄牙在前四个条件上与西班牙和巴西具有很大相似性。葡萄牙所缺少的是一个在民主转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革新型领袖。^②中层职业军官的地位和士气正在被削弱，许多下层军官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特别是后两者）殖民战争中变得激进化，最终两处相合，推翻了不能或不愿结束战争的政府。1974年4月25日，西欧最古老的独裁统治被下层军官所推翻。^③

大量的人群几乎立即涌上街头，支持下层军官们的行动。这些枪筒中插着康乃馨（也称石竹花）的人们赋予了“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the carnations）”以合法性，并使其不可逆转。经由政变而实现的解放迅速使得政治犯获得自由。^④这一解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段：狂热的活动，社会抗议，或多或少自发地接收工厂和大型农场，清除看上去与先前政权有关的各种制度，持续集会以表决任何事情。被视为代表着旧政权延续性的政党被取缔。在各种集会中，葡萄牙共产党浮现出来，掌握了关键性的权力。银行国有化将这个国家置于社会主义道路之上，因为银行对许多工业拥有传统的控制权。这一革命进程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热情与恐惧。

^① 参见 Scott Mainwaring 和 Donald Share,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 and Spain”, 载于 Wayne Selcher 编: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Brazil*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pp. 175–215.

^② 与西班牙苏亚雷斯的“革新型领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塞罗·卡埃塔诺 (Marcello Caetano) 并未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来协商转型。关于这一方面的系统分析，参见 Daniel V. Friedheim, “Innovative Leadership: The Failure to Democratize Pre-revolutionary Portugal” (Yale University, July 1990, mimeo)。关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转型的早期比较，参见 Juan J. Linz, “Some Comparative Thoughts o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Portugal and Spain”, 载于 Jorge Braga de Macedo 和 Simon Serfaty 编: *Portugal since the Revoluti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25–45.

^③ 军队中的危机显现于下述事实中：军事学院 1971 级有 550 个空缺名额，但仅有 169 名应试者申请参加考试，其中有 103 名被录取。参见 Maria Carrilho, *Forças armadas e mudança política em Portugal no séc. XX: Para uma explicação sociológica do papel dos militares* (Lisbon: Estudos Gerais Série Universitária, 1985), p. 385。这是一本文献翔实的著作。大学生被征召服役激怒了职业军官，他们很多人希望结束殖民战争。他们担心，一旦输掉战争，他们将受到来自政府的羞辱对待，这早已被在果阿（印度一地区）投降的西班牙驻军指挥官们的经历所表明。

^④ 经典性的研究是 Philippe C. Schmitter, “Liberation by Golpe: Ret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Portuga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 (Nov. 1975), pp. 5–33.

革命的中下级军官启动的转型

119 分析一下,这样一个革命进程是如何开始的,特别是这样一个进程如何与为何导向了代表议会民主制?显然,如果我们考虑在第一部分已经讨论过的变量,那么这一革命进程与“谁启动和控制转型”最有联系。那些启动转型的人们同样向“制宪环境”变量中引入了强烈的非民主因素。^①

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由尉官开启的,因此与我们即将讨论的希腊不同,葡萄牙的革命不是由国家发动的。这导致了正规军事结构的危机和国家的全面危机。与我们的分析框架相一致,革命开启了一个“过渡政府(interim governments)”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中实现充分的民主转型非常令人怀疑,姑且不论民主的巩固。被里斯本和南方的大规模群众动员所牵引的下层军人,暂时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和其他试图变革国家的革命团体结成同盟。^② 1974—1976年间,西班牙处于动荡的临时政府时期,国家近乎分裂。实际上,肯尼思·麦克斯韦尔(Kenneth Maxwell)提到这个事实,即有大量理由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葡萄牙更接近于尼加拉瓜,而不是任何一个南欧或南美转型国家。^③

革命性激变时期,军队深深卷入政治行动的每一阶段。1974年4月之后,由7位军官领导的拯救国家军人集团获取了最高权力,从自身成员中选举出新总统,并任命了政府。另一个革命性的新政权机构国家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tate)在制宪会议选举之前行使立法权,它由21名成员组成,皆由军方任命,其中仅有5人为文官。最后五届过渡政府均由军人主持,90个内阁职位中的40个被军官占据。^④ 此外,1974—1975年间,军方的权力不仅不

^① 参见第五章我们对这些变量的讨论。

^② 高度的自主的大众动员和土地籍没非常重要,需要加以强调,这一方面的翔实论述可参见 Nancy Gina Bermeo, *The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 Workers' Control in Rural Portug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Kenneth Maxwell, “Regime Overthrow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rtugal”,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和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p. 113。

^④ 所有这些数字均出自一篇资料丰富的文章, José Sánchez Cervelló, “El proceso democrático portugués (1974—1975)”, in Hipólito de la Torre, ed., *Portugal y España en el cambio político (1958—1978)* (Mérid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Educación a Distancia, Centro Regional de Extremadura, 1989), pp. 155—163。

能被废止或者受到限制,而且延伸到对“反革命”罪行的监视,大众媒体的行为也被列在内。军方授权自身执行逮捕、进行警务调查,并且使他们认为的冒犯军方者屈从于军方的控制。^① 军方单方面控制了重要的外交政策事项。按照临时政府最激进的军方领导人之一巴斯克·冈萨尔维斯(Vasco Gonçalves)的说法,“武装力量运动是负责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唯一的和排他性的团体”^②。军方同样替代了大众传媒的重要角色。他们的《武装力量运动公告》发行量达到10万册。通过文化传媒部门 *Dinamização Cultural*,武装力量运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以支持革命进程。甚至竞争参加欧洲电视网音乐节的胜出者也是一名军官。^③

120

鉴于低阶军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Moscow-line Communist Party)和大众革命行动所承担的特殊政治角色,按照我们设定的标准,葡萄牙在1982年8月12日是如何同时完成民主的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呢?

过渡政府与选举

在理论与经验层面,我们相信对过渡政府非民主动力的最大民主性抵销力量是有确定时间的自由选举,只有这样的选举才可以建构政治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选举可以:(1)产生新的民主政治行动者;(2)用与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填补新近开放的政治空间;(3)向在非民主政权崩溃过程中未起到必要作用的势力赋予民主合法性;(4)第一次向这个国家的公民提供评价临时政府的机会。

葡萄牙的案例支持上述的一般性论点。武装力量运动的初始计划就是明确宣布将在一年之内举行制宪会议选举。^④ 他们进一步允诺将在另一年内、

^① 所有这些数字均出自一篇资料丰富的文章, José Sánchez Cervelló, “El proceso democrático portugués (1974—1975)”, in Hipólito de la Torre, ed., *Portugal y España en el cambio político (1958—1978)* (Mérid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Educación a Distancia, Centro Regional de Extremadura, 1989), pp. 155—163.

^② 同上书, p. 162.

^③ 同上书, pp. 162—163。关于1974—1975年革命期间的多数重要法令、宣言和演讲的年表,参见 Henrique Barrilaro Ruas 编: *A revolução das flores; Do 25 de Abril ao Governo Provisório* (Lisbon: Editorial Aster, n. d.)。

^④ 参见“Disposições Constitucionais Transitórias”(May 14, 1974)中的第4篇文章。完全文本见于 Barrilaro Ruas, *A revolução das flores*, pp. 308—314。

在制宪会议决定的框架之下进行议会和总统选举。^① 我们必须谨记,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有两个选项。其一是选举产生制宪会议,它不具备其他功能,政府不对其负责;其二是选举产生政府对其负责的正常议会,它起草和批准宪法,也负责普通法律的制定。正如葡萄牙曾经出现的情形,第一个选项可能延
121 迟建立在议会基础之上的政府的形成,直到宪法获得批准和举行新的选举。它使得一个或许是威权主义的过渡政府延续存在。另一个结果或许是:真正的政治领导者们或许并不喜欢参与制宪会议,在制宪会议召开的同时,他们更对置身于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感兴趣,这使得制宪会议的产品相当抽象化和理论化;如果这些产品是由最有权力的领导者们妥协产生的话,情况或许有很大不同。相比之下,在尼加拉瓜,支持桑定解放阵线(Sandinistas)的广泛联合并未要求和得到这样一个关于由民选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的明确声明,也没有明确临时政府的结束日期。

葡萄牙制宪会议选举于1975年4月25日按时举行。在这些全国性选举中,一个中左政党、一个中右政党和一个保守政党赢得了选票的72%,它们都支持程序民主。1976年,葡萄牙举行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上述三个政党赢得了选票的75%、263个议席中的222个。^②

关于过渡政府的关键论点是:经过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废除非民主政府、建立过渡政府的政治团体可以不断声称他们合法地代表了人民的愿望与需要。如果不进行选举,事实上就无法检验他们的声称。选举产生了新的民主的提出法律要求者,过渡政府领导者的垄断性声称因此而遭到异议。新产生的政治空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由这些民主程序产生的行动者来占领。

选举的举行并非意味着转型中民主与非民主方向的斗争已经结束。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环境中,比如1974—1975年的葡萄牙,自由选举仅仅意味着民主话语与民主权力资源已经产生,可以同与过渡政府相关的势力所掌握的话语和资源相竞争。这两种话语和权力基础可能具有根本性差异,甚至在选举之后不久也是如此,这在1975年葡萄牙共产党领袖阿尔瓦罗·冈哈尔

^① 参见“Disposições Constitucionais Transitórias”(May 14, 1974)中的第4篇文章。完全文本见Barrilaro Ruas, *A revolução das flores*, p. 118。

^② 关于选举,参见David B. Goldey, “Election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Portuguese Democracy: 1974—1983”, *Electoral Studies* 2, no. 3 (Dec. 1983): 229—240, 和 Thomas C. Bruneau and Alex Macleo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ortugal: Partie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6), 尤其是 chap. 2。

(Alvaro Cunhal)接受意大利记者奥丽埃娜·法拉希(Oriana Fallacci)采访时的讲话中表现得相当明确：“社会党获得了40%的选票，人民民主党获得了27%的选票，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构成了多数……那你就发生了认识错误……我将告诉你，选举与革命动力无关或关系微弱……我向你保证，葡萄牙将没有议会。”^①

军队权威的重申

122

为什么民主议会事实上建立于1976年？我们必须回顾下层军官发动革命的原因。我们在第五章已经指出，由低阶军人建立的军人政权永远承受着一种风险，即很容易被与军方高层关系密切的军官的要求控制的声明所约束。在此，我们与费利佩·阿圭罗(Felipe Agüero)的观点略有不同。他断言，如果先前的威权政府实现了文官化，并且民主转型是由军事政变开始的，相关的军人权力职位将会是“强固的”。^②我们认为这仅是就高阶军官发动的政变而言。如果政变是由低阶军官发动的，他们就很容易屈服于高阶的反政变集团。

在葡萄牙，临时政府时期的政治日益威胁到军方的指挥链。在一些案例中，平行的军事指挥机关建立起来，它们拒绝服从自己名义上的上级。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各种团体有时候相互争论。最后，自称的“革命发动机”团体发生分裂，这导致了军队内部在未来政策方向和联盟政策上的严重冲突。正如劳伦斯·S.格雷厄姆(Laurence S. Graham)所指出的，到1975年晚期，葡萄牙军队的政治卷涉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左翼、右翼和中间路线者各自的联盟代表了不同的文官和军队领导者群体。从组织的视角看，此时，作为与文官群体有明显区别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军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存在了。革命前军队之间的区隔以及内部军官与士兵之间已经分裂为敌对的派系。”^③有资

^① Maxwell, “Regime Overthrow and Transition in Portugal”, p. 127.

^② Felipe Agüero, “The Military and Democracy in South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Outcomes and Initial Conditions” (递交拉丁美洲研究会第十五次国际会议的论文, 迈阿密, 1989年12月4—6日。也可参见 Felipe Agüero, *Soldiers, Civilians, and Democracy: Post-Franco Sp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Laurence S. Graham,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Kenneth Maxwell, ed., *Portuguese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ões Center,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Special Report No. 3, 1991), p. 16.

料证明,到1975年8月止,军方至少有三种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①

123 在这种环境下,以拉马尔霍·埃亚内斯上校(Colonel Ramalho Eanes)为中心,一些关注团结与纪律等制度性问题的高级军官组成了一个团体。1975年11月25日,一个由伞兵组成的、无军官参与的团体卷入了一场看上去是左翼色彩的政变,它被埃亚内斯上校镇压,但却得到了强大的民族和国际力量的支持。军队组织内部重建高层控制的长期进程开始了。尊重选举结果成为军队高层自身去政治化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麦克斯韦尔所言,“军队在1975年自称是‘革命的领导者’和‘民族解放运动’,在1976年则推崇‘权威’与‘纪律’”^②。

制宪环境:1976年的非民主宪法

然而,过渡政府之间的间歇和军队高度卷入政治产生了遗留影响,特别是涉及我们所称的制宪环境变量。就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而言,代价就是:不像西班牙,葡萄牙的制宪会议事实上不是“最高的(sov^{er}ei^gn)”³,不能草拟出会议成员所满意的宪法。为了使1975年的制宪会议选举能够举行,各政党服从于革命的军方权力,并且与MFA(武装力量运动)签署了一份正式书面协议,同意MFA甚至在选举之后担当监督者的角色。武装力量运动与各政党之间的第二份协议签署于1976年2月26日,当时制宪会议正在举行,这份协议进一步约束了由选举产生的官员。^③

作为这些协议的结果,1976年宪法明显具有一些非民主的特征。军方的革命委员会具有支配地位,它被赋予自我制定法律的权力,并且可以判断议会通过的法律的合宪性。1976年葡萄牙宪法的第149条第3节明白直接地写

^① 1975年7月和8月,互相竞争的军方诸派系产生了三份完全矛盾的政治文件。参见由名为COPCON的团体发行的、较早支持革命的文件和由明确谴责COPCON反民主政治的军官签署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文件,见于Hipólito de la Torre和Josep Sánchez Cervelló, *Portugal en el siglo XX* (Madrid: Ediciones Istmo, 1992), pp. 325—334。Paul Christopher Manuel, *Uncertain Outcome: The Politics of the Portugues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Lanham, N. 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这部著作就1974—1976年武装力量运动中的政治和派系作了资料翔实的说明。

^② Maxwell, “Regime Overthrow and Transition in Portugal”, p. 133.

^③ 关于第一份协议的完整文本,参见“Plataforma Constitucional Partidos—M. F. A.”, 载于Fernando Ribeiro de Mello编: *Dossier 2ª República* (Lisbon: Edições Afrodite, 1976), 1: pp. 235—241。第二份协议的完整文本参见“Segundo Pacto dos Partidos com o M. E. A.”, 载于Reinaldo Caldeira和Maria da Céu Silva, *Constituição política da República Portuguesa 1976: Projectos, votações e posições dos partidos* (Lisbon: Livraria Bertrand, 1976), pp. 343—352。

道：“革命委员会的法令具有与共和国议会的法律同等的有效性。”^①第 148 条指出，革命委员会可以“制定有关机构职能的法律和武装力量的纪律”。它还指出，“上面一节提及的权力将单独授予革命委员会”^②。

只要宪法赋予一个不是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机构以法律特权，葡萄牙就不符合我们关于完整民主转型的标准。此外，革命委员会也在事实上运用着这种特权。布鲁诺(Bruneau)和麦克劳德(Macleod)说：“革命委员会采取了打倒许多文官政治家的激进姿态，在 74 个提交议案中，否决多达 35 个。”^③最终，在 1982 年修订宪法并且废止革命委员会、建立对军队进行民主控制的法律框架之前，革命委员会通过民主政党和埃亚内斯总统的默许，有时甚至是积极的支持而发挥了 6 年作用。^④

124

转型完成与民主巩固的共时性

一般而言，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在时间顺序上是相互分离的过程，然而在一些条件下，它们可以同时发生。我们认为这种共时性就发生于 1982 年 8 月 12 日的葡萄牙。为什么呢？

非常遗憾的是，关于民主巩固的态度维度，我们并没有太多相关的和/或方法上合理的、1983 年之前葡萄牙人关于民主制度的民意数据，但是我们认为，1975—1985 年葡萄牙诸政党偏好的高度稳定表明，投票者中的绝大多数对赞成民主、支持政权的政党怀有持续的偏爱。基于对民意的研究和对投票模式的分析，布鲁诺与麦克劳德指出，“投票者对政党的忠诚早在 1975 年就已经确立，在 1976—1986 年间很少变动。”^⑤就此而论，1975 年的“奠基性选举(founding election)”颇具说明性。1975 年的选举成为革命军人与民主政党之间的竞争，前者公开活动以使选举者弃权或制造无效票，而后者则力求实现

① 这一权力仅是再次肯定了“Plataforma Constitucional Partidos—M. F. A.”第 3 条第 2 部分的承诺。

② 这一军队自我管理的特殊“权利”也在“Segundo Pacto dos Partidos com o M. F. A.”第 3 条第 14 部分中有所“协定”。

③ Bruneau 和 Macleo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ortugal*, p. 40.

④ 关于废止革命委员会的投票情况细节，参见 *Facts on File*, 41 (1982): p. 638, p. 867。到 1982 年 11 月，重要的国防法(Law on National Defense)得以通过，这部法律详细说明了文官控制的制度细节。关于文官授权与民主控制的渐进过程，参见 Bruneau 和 Macleo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ortugal*, pp. 12—25, and Graham, “The Military”, pp. 14—28。

⑤ Bruneau 和 Macleo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ortugal*, p. 40.

高参与率。军方的运动事实上没有效果。参与者超过 90%，这是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奠基性选举中最高的参与率之一；无效票仅比 1976 年的选举多 2%，那时没有什么运动刻意促成无效票。^①

125 尽管缺乏 1982 年以前的真实调查，这一投票模式仍然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态度而言，1982 年的葡萄牙已经越过了我们设定的民主巩固临界点。1985 年在葡萄牙进行的一项民意研究揭示了与其他巩固的民主国家并无不同的民意概貌。^② 在 1988 年的调查中，90.2% 的民众大体上支持民主制度，其中积极支持者是 38.9%，消极接受者是 51.3%。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过去 10 年中的民主制度运行表示不满意的 24.6% 民众中，表示支持民主制度者占 19.1%，表示反对者仅有 5.1%。^③ 到 1990 年为止，葡萄牙内支持民主制度的情绪已经超过西欧标准。当欧洲民意调查中心 (Eurobarometer) 向欧共体内部的被调查者问及“你对民主制度运行方式的满意度如何”时，平均有 62% 的人回答“非常满意”或者“满意”；而在葡萄牙，这一数字是 71%。^④

^① 关于 1975 年奠基性选举细节的最好文献是 Jorge Gaspar 和 Nuno Vitorino, *As eleições de 25 de Abril: Geografia e imagem dos partidos* (Lisbon: Livros Horizonte, 1976)。

^② 关于 1985 年调查和对西欧、南欧的比较与分析，参见 Leonardo Morlino 和 José R. Montero,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载于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Jürgen Puhle 编: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0—260。

^③ 这些结果被报道于 Franz-Wilhelm Heimer, Jorge Vala-Salvador, 和 José Manuel Leite Varga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Portugal” (递交给欧洲联合体进行政治研究的论文, Paris, April 10—15, 1989)。关于 1978 年和 1984 年调查的比较分析，也可参见 Bruneau and Macleo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Portugal*。关于葡萄牙民意数据的回顾，也参见 Mário Bacalhau, “Transi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Portug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 no. 2 (1990): pp. 141—154。

^④ Eurobarometer (1991): pp. 18—31。事实上，在 1987 年的欧洲民意调查报告中，所有欧共体成员国中只有卢森堡比葡萄牙对民主运行方式更满意。参见 Philippe C. Schmitter, “Public Opinion and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Portugal”，载于 H. E. Chehabi 和 Alfred Stepan 编: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Comparative Essay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345—359。施米特在文章中呼吁人们关注认为能够影响政府的被调查者所占的低比率，关注被调查者对卡埃塔诺非民主政府所作的明显高于 1984 年以前民主政府的评价。然而，施米特得出结论：“从规范理论的角度讲，甚至更多是从蕴含于‘4 月 25 日运动’中的及其以后的雄心壮志的角度讲，现代葡萄牙民主制度的质量将不得不被认为是‘令人失望的’。但是从西欧和北美民主制度实际运行的角度讲，葡萄牙的民主制度是‘正常的’。这似乎无法让人产生兴奋之情，但如果回顾一下威权统治结束之前的情形，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pp. 358—359) 关于西班牙民主转型前 20 年调查数据的全面收集与分析，参见 Mário Balcalhau, *Atitudes, opiniões e comportamentos políticos dos Portugueses: 1973—1993* (Lisbon: Edição Mário Balcalhau-Thomas Bruneau, 1994)。

就行为维度而言,我们认为1982年以后、甚至或许是之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组织或者运动不再试图通过非民主手段使用重要资源以实现它们的目标。几位作者在他们关于南欧新民主国家比较的重要论文中,将葡萄牙置于“支持政权(regime support)”之列,这与他们对法国、意大利和芬兰等巩固的民主国家在此方面的评估相同。^①

最后,就政治结构维度而言,1982年早期,革命委员会的“保留领域”所拥有的权力仍然如此巨大,以至于葡萄牙并未完成民主转型。但是,当军方接受1982年8月12日的宪法修订时,葡萄牙不仅完成了民主转型,而且从态度、行为和政治结构上全面实现了民主的巩固。^②

126

我们认为,我们设定的、用来分析葡萄牙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的7个变量中,最突出的变量涉及转型启动者的特征。民主转型以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实现的解放为开端,开启了过渡政府的动态过程,其中革命成为与议会民主同等的选择。第二个有影响力的变量,制宪环境,与第一个变量紧密相连。由低阶军人(得到葡萄牙共产党与首都及其南部市郊的社会动员所支持)所扮演的强有力角色导致了高度受限制的制宪进程。民主转型与巩固进程中的其余变量并没有如此显著。然而,如果在它们与其他力量的辩证关系中来理解,所有这些变量都可被视为是最终支持民主巩固的。

与西班牙,甚至大部分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葡萄牙并不存在“国家性”问题,这是因为葡萄牙像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接近于理想类型的民族国家。葡萄牙是一个单一语言国家,它的边界早已确定了数百年。唯一一个按照历史或民族状况应属葡萄牙而实际上属于他国的地区是与西班牙接壤的一个有2.5万人口的小镇。当时唯一可能的国家性问题或许是亚速尔群岛的分离主义,这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他们在当地有空军基地,而当时葡萄牙正趋向于共产主义,但这在事实上并未成为突出的问题。

^① Arend Lijphart, Thomas C. Bruneau,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Richard Gunther, “A Mediterranean Model of Democracy? The South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1 (Jan. 1988), p. 19.

^② 对从1974年4月25日到民主巩固这一历史进程诸阶段的概念化,可参见 António Vitorino (他是社会党在欧洲议会的代表、一位法学教授、前宪法法院成员), “A democracia representativa”, 载于 Adriano Moreira 等编: *Portugal hoje* (Lisbon: Instituto Nacional de Administração, 1995), pp. 328—350。维托里诺(Vitorino)写道:“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全巩固源于1982年对宪法的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取消了革命委员会,由此导致了对政治体系的重新界定,大众投票成为公共权力的唯一来源。”(p. 329)这篇文章提供了与宪法修订相关的文献索引,相当出色。

127 与我们设定的国际影响这一变量相关,葡萄牙的外交政策最终促进了民主的转型与巩固。与西班牙相比,外交政策在葡萄牙的案例中更加重要,需要更多的研究。尽管认识的扩展需要等待档案以及更完整的研究报告的公开,但是当前仍然有一些线索提示我们:美国非常关注葡萄牙的革命推动力量,以至于他们曾经考虑过一系列秘密的甚至是准军事的行动。^① 考虑到1975年葡萄牙社会动员的程度,如果美国的秘密军事行动(正如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情况),而不是选举,击败了革命力量,那么很难相信后来的氛围会有助于民主的巩固。欧洲共同体督促美国放弃军事行动而采取政治战略。此外,欧洲的社会党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社会党,通过资金、组织和道义支持着葡萄牙最重要的民主政党——由马里奥·苏亚雷斯领导的社会党。一旦经过1975年的奠基性选举、特别是产生政府的1976年选举,欧共体就对西班牙的民主政府产生了珍贵而稳定的吸引力。^② 民主转型期间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外交关系同样需要更多的关注,它们现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主要政治家一直都努力避免两国在1974—1975年的革命过程中发生冲突。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作为葡萄牙的比邻国家,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竟然在葡萄牙革命力量取得政权4天以后就承认了革命政府。佛朗哥政府与葡萄牙的革命过渡政府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两国间恰当的关系。1975年9月,巴斯克·冈萨尔维斯上校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府倒台,皮涅伊洛·德·阿泽维多(Pinheiro de Azevedo)领导的温和政府掌权,模糊而危险的情形出现了。葡萄牙政府对5名被判处政治谋杀罪的革命者执行死刑后不久,里斯本的西班牙大使馆和波尔图(Porto)的西班牙领事馆被纵火焚烧。西班牙坦克正向葡萄牙边境压来的不实报道在葡萄牙广泛传播。由于疏忽或者被授权,激进的葡萄牙军事派别如COPCON似乎已经卷入了这些事件。只是由于两国政府迅速而适

① 肯尼斯·麦克斯韦尔写道:“当里斯本的形势向左转向时,由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主导的美国政策一度放弃了对葡萄牙转型的民主结局的期望,开始轻率地计划一些反革命的行动——一些是准军事行动,一些推动了亚速尔分离主义。”参见Maxwell, “Portuguese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An Overview”, 载于Maxwell, *Portuguese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p. 6。

② 德国学者Rainer Eisfeld引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葡萄牙社会党进行援助的相关文献,参见“Portugal and Western Europe”, 载于Kenneth Maxwell编: *Portugal in the 1980s: Dilemma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29—62, 尤其是p. 55。也可参见Thomas C. Bruneau, *Politics and Nationhood*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52—54。

度的外交活动，这一危机才被平静下来。^①

尽管社会动员不是我们设定的普适变量，但是如果不对其加以讨论，我们就会负有疏忽之责。在“政变解放”之前没有显著的社会动员。^② 但是，迅速出现于街头之上的、欢呼解放的大众支持肯定减少了萨拉查—卡埃塔诺政权反击的机会。在几天的时间里，可怕的安全部队处于无组织的溃散状态，政府正在死亡，所有我们的案例中规模最大的清剿正在进行。^③ 然而，社会动员也还有另一个侧面。如果我们将大量民众通过自己的行动支配事件发展的现象称为一种形式的动员，那么 1975 年选举中成千上万的葡萄牙公民拒绝回应无效票企图的事实就是一种重要形式的动员。通过他们展示的大规模偏好，葡萄牙的公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8

最后一个需要评价的变量是合法性与强制性的政治经济学。1968 年萨拉查下台至 1974 年政变革命这一段时间，葡萄牙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6.5%。^④ 因此，我们不能说经济危机本身导致了民主转型的开始。真正导致民主转型开始的，是作为强制机构重要部分的军队认为现政权无法解决殖民战争问题，而这将形成对他们颇具威胁的巨大危机。于是他们成为反对政权

① 参见 Josep Sánchez Cervelló, *A revolução Portuguesa e a sua influencia na transição espanhola* (1961—1976) (Lisbon: Assirio e Alvin, 1993), pp. 353—357。尚未明确的是，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官邸被焚是否是 COPCON 或其他组织的预谋，以促使西班牙加以干涉，进而点燃葡萄牙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葡萄牙的政治产生与伊朗接收美国大使馆后出现的情况类似的激进化。

② 正如马拉瓦利所言：“尽管民主转型之前的工人斗争有所增加，各种要求的爆发却是在独裁结束之后，而不是之前。是民主制度解放了各种要求。民主政治的第一周有 17 次罢工，接下来的几周分别是 31、87 和 93 次。”参见 Maravall,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p. 6, 引自 chap. 6, n. 39。

③ 在一篇优秀论文中，安东尼奥·考斯特·品托 (António Costa Pinto) 恰当地呼吁注意社会动员在帮助解除旧政权强制机构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政变之后的政府合法性危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动员导致了葡萄牙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变动……军事政变后的第一天，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葡萄牙三个主要城市出现了强烈的解放氛围。行动先于立法：政治监狱被包围；原来唯一合法政党的总部、审查机构办公处与社团联合会都被占领……左翼政治运动的压力与‘解放’效应阻止了旧政权机构与政治精英的任何行动。”参见 Costa Pinto, “Dealing with the Legacy of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Purge and Radical Right Movements in Portugal’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1974—1976)”, 载于 Stein U. Larsent 等编: *Modern Europe after Fascism: 1945 — 1980’s* (Bergen: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④ 参见 Maravall,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pp. 2—3。在葡萄牙《金融时报》做过 10 年记者的戴安娜·史密斯 (Diana Smith) 陈述“1972 至 1974 年间，经济以超过 8% 的年增长率兴旺发达”。参见 Smith, “Portugal and the Challenge of 1992” (New York: Camões Center,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 p. 6。但是，由于在非洲的殖民战争耗费了政府预算的 30%—50%，国家存在着一场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

者。此外,到1974年为止,许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呼吁自由化并与政权有联系的政治家确信现政权不会进行民主转型,他们就成为军队反政权行动的现成的支持力量。政治,而不是经济,导致了政权的垮台与民主转型的启动。

下面我们考察民主转型过程中经济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已经说明葡萄牙民主的巩固是在1982年10月。强调下面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受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欧洲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之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海外人口的大量回归(这比法国吸纳的人口多5倍)以及1974—1975年间流产的革命之后出现的经济混乱,葡萄牙的经济处于严重困境,直至民主巩固以后才有好转。^①1983—1984年的主要稳定计划进一步加剧了大多数人的经济困境。但是,托马斯·布鲁诺根据他所做的广泛民意调查,证明了很少有人因为经济衰退而对民主政权体制本身进行抨击。在1984年的一场调查中,93%的被调查者承认经济危机存在。但是,正如布鲁诺所谈到的:“接着,这一调查询问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发现很少有人将经济危机与某一特定政府联系起来,而认为这是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没有人表示出对现政权的疏离倾向。”^②1989—1991年,葡萄牙是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③但是,既然这次经济繁荣发生于民主巩固之后,那么它更确切地说明经济增长强化了民主的巩固,而不是其本身促成了民主最初的巩固。葡萄牙的案例清楚地揭示出民主巩固于严重的经济困境时期,而不是政治绝望与抨击体制时期。

① 正如戴安娜·史密斯所指出的:“到1982年12月为止,葡萄牙已经有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5%的预算赤字、56亿贸易赤字、32亿贸易支付差额赤字(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的情况,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5%)145亿外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2%)。”同上书,p.9。

② Thomas C. Bruneau, “Portugal’s Unexpected Transition”, 载于 Kenneth Maxwell 和 Michael H. Haltzel 编: *Portugal: Ancient Country, Young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Wilson Center Press, 1990), p. 15。

③ 关于1986—1990年的繁荣,参见 Smith, “Portugal and the Challenge of 1992”。到1989年止,预算赤字已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4.7%,贸易顺差达20亿美元,1989—1990年的葡萄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4个成员国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关于这些及其他数据,参见 *Portugal Outlook 1* (1990): pp. 6—9。

第八章 中下级军人政权的危机：希腊

130

希腊的民主转型开始于1974年7月21日,结束于1974年12月9日,持续142天。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考察的南欧与南美诸国中最快的转型。^①希腊转型如此迅速应作如何理解呢?

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我们设定的、与希腊威权政体的制度基础有关的变量来理解其民主转型。1967年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领导的低阶上校们发动军事政变,军方接管了希腊政权。1967年,军队中的下层军官清肃了大约400名高层军官,这一事实进一步凸显了政变的低阶性质。^②这场军事政变并未得到海军与空军的积极支持。在我们所研究的民主转型之中,希腊的军人政府在国内的统治基础是最狭窄的。正如戴曼德罗斯(Diamandouros)所言,国王的反对“起初是潜在的,在1967年12月13日计划与执行均不周密的反政变中得以公开,在此之后弱化,但仍然持续”。这一“国王与上校们的冲突导致了希腊军官集团的鲜明裂痕,绝大部分海军军官与一大批空军军官反对他们的陆军同僚”^③。

^① 巴西的转型持续时间最长,始于1974年3月16日埃内斯托·盖泽尔(Ernesto Geisel)的就职演讲,结束于16年后第一位自由直选总统的就职。

^② Constantine Danopoulos, “Farewell to the Man on Horseback-Intervention and Civilian Rule in Modern Greece” (递交给 the Centro de la Realidad Contemporánea 组织的关于民主巩固的一次会议的论文, Santiago, Chile, August 10-11, 1989), p. 6.

^③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Regime Chang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1974-1983”, in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pp. 146-147.

对于政治社会,戴曼德罗斯谈到了“议会右翼几乎一致拒绝同军方合作”^①。这与巴西和智利的军人政权形成了明显对比,巴西和智利的军人政权长期得到传统议会右翼的有力支持。最后,民间社会不断增加的动员曾是1967年政变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动员在1973年重新开始,并在11月的国家工艺学校(National Polytechnic)学生起义中达到顶峰。军队的上校们在国内与政治社会的基础非常狭小的事实,意味着学生起义得到了广泛的国内与国际支持,由此进一步孤立与分化了军方。这导致了约安尼季斯准将(Brigadier General Ioannides)和他在军警与军队低层中的支持者发动的强硬军事政变。^②但是这场军事政变仅仅导致了军官集团更加深刻的分歧与清洗,进一步突出了政权的低阶基础。

军队的分裂与政治上的相互敌对使得希腊军人政府与土耳其相比显得行动无力,无法对1974年7月20日的塞浦路斯危机作出充分回应。这次危机起因于希腊军人政府错误地策动了一场反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Archbishop Makarios)领导的土耳其政府的政变,以及面对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时无力作出军事反应。在这些条件下,正如戴曼德罗斯所言:“联席会议利用战争威胁,重新强化了军队高层的指挥链,有效压制了约安尼季斯与强硬路线者的权力基础。这一举动预示着军队远离分裂的政权,使得寻求一种权力转移模式更加容易。”^③

我们想要强调希腊民主转型中四个重要的基本方面,它们与我们的概念框架直接相关。第一,权力转移是由作为国家一部分而不是政权一部分的集团进行的。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72小时之内,政权任命的、受军方高层支持的总统吉齐基斯将军(General Ghizikis)已经解除了中下级军官的职务,并在与军人政权有联系的文官政治家帮助下,商讨保守派政治领袖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Constantine Karamanlis)的回归问题。民众对卡拉曼利斯重返雅典报以热烈响应,这进一步强化了卡拉曼利斯与军方的协作。他很快宣誓

^①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Regime Chang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1974–1983”,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和 Whitehea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p. 147.

^② 同上书, p. 156.

^③ 同上书, p. 157.

就任总理之职。^① 第二,由于军方急切想从政府中退出,“作为国家机构的军方”无法向文官施加限制性条件,以此作为退出的前提。实际上,希腊学者与文武关系研究专家赛诺斯·范雷米斯(Thanos Veremis)认为,军方面对战争时的无能增加了卡拉曼利斯讨价还价的力量。高级军官希望他迅速接管权力,但是“卡拉曼利斯就职的一个条件是军队保证谨守以前的军事职责,停止进一步干涉政府”^②。第三,这种由国家机构(a state institution)向看守政府的权力转移避免了葡萄牙那样的“过渡政府”。第四,那些被中下级军官清肃的高级军官被要求重新履行积极职责,并被委任以新文官政府军队指挥链中的高级职位。康斯坦丁·达诺普罗斯(Constantine Danopoulos)估计,1967—1968年被清肃的高级军官中,大约有75%在1974年重返关键职位。^③ 希腊民主转型这四个方面的累积效应,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75年许多军官被宣布有罪并被判决,却没有遭到“作为机构的军方”的抵制。

132

就比較的视角而言,我们可以说,西班牙的政权内部有趋向民主化进程的强大主动性,而且政权能够携带着国家一起前进。与之相反,葡萄牙的政权在改变自身方面表现出微弱的意志和能力,一场很快得到民间社会动员支持的低阶革命推翻了政权,也对国家造成了许多破坏。希腊民主转型的后果更多得到了控制,因为国家的组成部分(高级军官)推翻了政权,并迅速将权力转交给了一个保守的但却是支持民主的政府。^④

我们认为希腊民主转型完成于1974年12月9日,当时议会召开,总理卡拉曼利斯向议会负责,而这些都是自由选举和1974年12月8日全民公决废除君主制的结果。在军人下台和议会召开之间的142天中,阻碍民主转型完

① 关于这72小时内一系列事件的精确讨论,参见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Transition to, and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Greece, 1974—1983: A Tentative Assessment,” 载于Geoffrey Pridham 编: *The New Mediterranean Democracies: Regime Transitions in Spain, Greece and Portugal* (London: Frank Cass, 1984), pp. 53—56。关于事件的细节和经过,也可见Demitras Pappas, “Greece: July 24–November 17, 1974” (Yale University, 1988, 未出版手稿)。

② Thanos Veremis, “Greece: Veto and Impasse, 1967—1974”, 载于Christopher Clapham 和George Philip 编: *The Political Dilemmas of Military Regimes*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 41。关于危机期间的文武关系,参见Takis Pappas, “The Making of Party Democracy in Greece”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Yale University, 1995)。

③ 达诺普罗斯于1989年8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宣读论文后与斯泰潘的口头交流。

④ 关于国家与政权的差异的产生和意义,可见罗伯特·费施曼的重要评论文章,“Rethinking State and Regime: Southern Europ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2(April 1990): pp. 422—420。

全实现的障碍消除了。内战以来,卡拉曼利斯曾积极谋划限制性立法,这损害了希腊政治,现在“他明确终止了 1948 年第 509 号立法,这是最后一项主要的内战歧视性立法(civil-war discriminatory legislation)”^①。他宣布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修改宪法,并恢复了许多自内战以来被取消的公民自由,最引人注目的是结束了共产党的非法状态。因此,议会召开之时,希腊的民主转型完成了。

希腊民主何时(或者是否,这是对某些观察家而言)巩固的问题更难回答。
133 最近,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对党赢得了 1981 年选举并掌握政权,我们认为这标志着民主的巩固。

就政治结构而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刚刚考察过的转型进程,高阶军人既没有要求“保留领域”,也没有挑战新选政府开展大规模军事审判的决策。1975 年,许多希腊军官被判有罪,判决并未遭到“作为机构的军方”的抵制。审判在一个选举年内结束,这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民主的巩固产生了积极作用。赛诺斯·范雷米斯对希腊做出了以下判断:

无疑,就对同情军政府的军队的大清洗而言,对独裁政府主要成员及其追随者的审判与监押有许多需要改进。但是自 1975 年以来,政府感受不到军队的威胁了,也不再受到它的阻挠……军官们……或许被军人统治的灾难性后果所震动,他们选择了遵循专业主义法则,这曾经是西方军官团体的标志。^②

军事审判的结果使得一系列宪法与立法改革得以进行,将军事权威领域限制在民主制度的界限以内。1975 年结束之前,一部新宪法已经被推行(这是一部民主宪法,但是反对声过于强大),再也没有法律、程序或者特权可以凌驾于民主政治和民主程序之上。与葡萄牙完全不同,希腊的宪政结构是民主诸方面中最先得到巩固的。

从行为来看,特别是就所有主要的参与者都接受了相互之间竞争的权利和竞争获胜后行使权力的权利这一点来说,希腊民主的制度与价值随着 1981 年选举而成为“最佳选择”。我们之所以认为是 1981 年而不是 1974 年,是因

^① Diamandouros, “Transition to Democratic Politics in Greece”, p. 60.

^② Thanos Veremis, “The Military”, 载于 Kevin Featherstone 和 Dimitrios K. Katsoudas 编: *Political Change in Gree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onel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 225. 康斯坦丁·达诺普罗斯在“Farewell to the Man on Horseback”中做出过类似的说明。

为 1974 年选举之后民主政治中的主要竞争者仍然需要一些重要调整。

在内战与 1967 年政变之间，两个最重要的不完全认同民主甚至是非民主的团体都是右翼团体，它们通常主张“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拒绝给予他们认为“不热爱祖国”的左翼人士和断断续续实行非民主式反对策略的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亲莫斯科的希腊共产党，KKE)以公民权利。^①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获释出狱后于 1968 年创建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甚至具有反体制色彩。1974 年选举期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最主要的团体是以前抵抗组织的成员，这一派别与共产主义者相比更加是“极左派”。他们与右翼相互之间怀有极度的不信任。^② 新政治体制的两个重要方面并未被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主要的共产党——希腊共产党(KKE)欣然接受。左翼主要政党激烈批评选举体制，认为这一体制是为了使最大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拥有过多代表，而使得反对派代表过少。就事实来看，卡拉曼利斯所建立的、并为多数保守派所支持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 Party)赢得了选票的 54.4% 和议席的 73.3%。与之形成明显对比，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与团结左翼选举联盟(the Electoral Alliance of United Left)赢得了 23.1% 的选票，却仅赢得了 6.7% 的议席。^③ 这意味着新民主党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宪法。事实上，与西班牙的非多数派政府相比，新民主党在达成宪法一致意见上仅付出了很少的努力。卡拉曼利斯利用他的压倒性多数得到了他想要的宪法，仅就有限的让步同反对派作了协商。反对派尤其反对强大的总统紧急事态处置权。按照尼克斯·艾黎维达托斯(Nikos Alivizatos)的说法，“争执导致了大的冲突，所有反对派政党于 1975 年 5 月退出议会，谴责新宪法为一部独裁宪法。结

134

^① 关于 1967 年政变之前希腊政治生活中反民主的越宪(para-constitutional)特征，参见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 Postauthoritarian Greece: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递交美国政治学会 1987 年年会的论文)。

^② 关于反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演进及其早期的极左倾向，参见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PASOK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Postauthoritarian Greece (1974 - 1988)”，载于 Speros Vryonis, Jr. 编: *Greece on the Road to Democracy: From the Junta to PASOK, 1974 - 1978* (New Rochelle, N. Y.: Caratzas Publishers, 1991), pp. 15-35。关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重要著作是 George Th. Mavrogordatos, *Rise of the Greek Sun: The Greek Elections of 1981* (London: Kings' Colleg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Greek Studies, 1983, occasional paper 1)。

^③ 参见 Richard Clogg,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Greece: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London: C. Hurst and Co., 1987), p. 60。

果,在 1975 年 6 月 9 日最后表决时,只有新民主党的代表批准了新宪法”^①。

但是,在接下来的 5 年中,所有主要政治参与者都在接受民主实践和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作了显著调整。针对 1977 年选举,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较少极左色彩、更多具有选举导向的计划方案,从而成为议会最主要的反对党。反过来,新民主党也不再滥用他们的议会多数优势。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都参加了 1981 年选举,并且接受了其他政党对民主政治的认同,而且在议会民主政治如何操作上逐渐达成了默许性谅解。^②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接受了大部分具体的选举和宪法规定,并且于 1986 年使得议会对宪法作出修订。两个共产主义政党都逐渐放弃反体制行动,尝试在民主政权的框架内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人们可以认为,从行为上看,民主政治最迟巩固于 1981 年。实际上,一些专家认为,从行为上看,民主政治早已在 1977 年就巩固了。

从态度上来看,上校们的政权从未像萨拉查和佛朗哥(还有皮诺切特)的长期独裁那样获得相当数量的民众支持,也没有在任何领域取得一些具有可比性的成就以维持自身的信誉。因此,当民主成为可行性选项时,上校们遭遇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的大规模反对。与我们考察的南欧或南美其他国家相比,在希腊,军政府的传统对民主巩固的阻碍更小。遗憾的是,我们仅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意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些数据是支持我们的观点的。我们认为,卡拉曼利斯建立的新的保守的新民主党,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亲莫斯科的希腊共产党与欧洲共产主义(国内组织)——的合法化与参与政治,以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进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在这些主要政党内部以及它们的大众支持者中间建立一种非常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态度。事实上,当 1985 年对所有南欧国家的民意调查都具有可行性时,有两点变得非常清晰。第一,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时期和葡萄牙的萨拉查时期相比,希腊人对于军事独裁统治更加反感。在一项调查中,认为先前的威权政体“完全坏(only bad)”的希腊人比西班牙或葡萄牙多两倍。(见表 8.1)

^① Nikos Alivizatos, “The Difficulties of ‘Rationalization’ in a Polarized Political System: The Greek Chamber of Deputies”, 载于 Ulrike Liebert 和 Maurizio Cotta 编, *Parliamen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p. 134.

^② 艾黎维达托斯写道:“在这几年中,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但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与新民主党似乎就议会游戏如何进行达成了某种一致。如果考虑到这两个政党明显相反的社会经济目标,那么这种一致将更令人惊讶。”同上书, p. 146.

表 8.1 对希腊、西班牙与葡萄牙威权政体的评价

对先前非民主政权的态度	百分率		
	希腊(1985年)	西班牙(1985年)	葡萄牙(1985年)
完全坏	59%	28%	30%
有好有坏	31%	44%	42%
好	6%	17%	13%
不知道/不回答	4%	11%	15%
样本数目	1998	2488	2000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Leonardo Morlino 和 José Ramón Montoro,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an”, 载于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Jügen Puhle 编: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6。

表 8.2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国内支持民主的态度比较(1985)

政体偏好	百分率		
	希腊	西班牙	葡萄牙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体	87%	70%	61%
某些情况下,威权政体、独裁政体较好	5%	10%	9%
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是一样的	6%	9%	7%
不知道/不回答	2%	11%	23%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Leonardo Morlino 和 José Ramón Montoro,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an”, 载于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Jügen Puhle 编: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6。

第二,或许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希腊人更加喜欢民主而不是威权主义,这一比率要比西班牙或葡萄牙高(见表 8.2)。在我们看来,这些以及后来由其他组织进行的调查表明,随着政府在 1981 年的变化,希腊已经成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

我们不再费力讨论所有其他变量,总而言之,它们没有对民主的巩固构成较大阻碍。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运用了大棒(上校军人政变之后,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被搁置)加胡萝卜(面对卡拉曼利斯政府的加入请求,欧洲经济共同体行动迅速,希腊于 1981 年被批准加入)两种手段,“国际影响”变量事实上促进了民主的巩固。关于合法性的政治经济,正如大部分西欧国家一样,1975—1981 年并不是经济好年景,但是与可触及的政治成就相比,希腊

人认为这并不太重要。

国家性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尽管希腊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希腊自古以来就有一支较大的群体散居国外,近代以来的希腊政治生活笼罩着民族统一主义色彩。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易使他们参与政治。为争取独立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记忆,历次战争中领土的缓慢融合,在1919—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中遭受的惨痛失败(在希腊历史上被称为“大失败”,导致超过100万贫穷的讲希腊语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土耳其人的散居地返回国内),冷战时期希腊政府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依赖,所有这些导致了希腊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剧与政治的恶化。与塞浦路斯合并(Enosis)的想法,一支希腊少数民族在阿尔巴尼亚的存在,马其顿王国不应以“历史上的希腊名称”命名的观念,这些都是希腊和巴尔干政治中的问题,反映出民族统一主义情感的扰乱效应。这一情感没有阻止1981年民主的巩固,却造成了我们将要论述的希腊民主中的“质量”问题。^①

137 巩固后的民主的质量这一主题确实已经超越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又迫切需要作出简明的讨论。当我们于1991年流传本书的最初草稿时,同事们常常对我们将希腊民主视为巩固的民主持保留态度。他们正确指出:前总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与政府中的其他领导人被控贪污;希腊的预算赤字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最高的,任何政府都无法加以控制;政治演讲的风格看上去十分尖利刻薄;连续的两场大选(1989年6月与11月)制造了虚置的议会(hung parliament)。但是,这些多重危机并未导致对民主制度的较大威胁,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可以被视为是民主巩固的迹象。我们以为,把上述问题视为巩固后民主质量不高的显示将更加准确。^② 在巩固的民主的类别内,一些民主国家深化了民主,另一些则没有。一些国家的民主相对质量高,一些国家则相对质量低。我们认为希腊的民主相对质量低,低质量的民主相比高质量的民主,自由程度低,而且更容易崩溃。尽管希腊民主有许多问题,但是仍然展示了灵活性与适应性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有用的。

内战的“历史记忆”现在更加像西班牙的情形(完全不像“二战”时期塞尔

^① “大失败”和民族主义、民族统一主义政治使希腊国家性问题复杂化,关于这方面大量文献的介绍,参见 Diamandouros, “Regime Chang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② 关于希腊的20世纪80年代是否是“失去的十年”的争论和“民主质量”问题的讨论,参见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Politics and Culture, 1974—1991: An Interpretation”, 载于 Richard Clogg 编: *Greece, 1981—1989: The Populist Decad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p. 1—25。

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内战的历史记忆)。在一场民意测验中,最大的单一群体(占41%)谴责共产主义者和政府力量对内战负有责任,第二大群体(占32%)甚至没有提供意见。^① 尽管在公开争论中存在很深的党派偏见,但是市民在私下里越来越倾向于表示,将会投票支持对立阵营的政党。这表明政党之间的“文化差异”更小了,可供民主选择的领域正在扩展。^②

最后,我们认为两个虚置的议会的事实要比政党回应共同问题的过程意义微小。1989年6月模糊的选举之后,从6月到11月,1946—1949年内战敌对双方的“后裔”,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与新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这一联合在1974年转型开始时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如果1949年可以视为希腊内战的军事终结,1974年选举可以视为内战的政治终结,那么1989年的共产党—新民主党联合政府,则是内战的文化终结。当1989年11月选举仍未能产生一个胜出者时,广泛的政党内与政党间的协商产生了一个全方位政党(all-party)政府,这一政府一直持续到1990年4月选举,新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成为微弱多数。^③

尽管希腊民主存在非常现实的“质量问题”,但是如果希腊民主崩溃,我们认为这并非是由于希腊民主不曾巩固,而是由于民主政治家们回应问题的方式使得危机加剧。如何避免以及分析希腊民主任何可能的危机,这与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理论与现实联系较少,而与“崩溃”的理论与现实联系更多。^④

138

① 参见由 Panayote Elias Dimitras 所写的对希腊民意调查的评论,“Greek Public Attitud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 (Summer 1990): pp. 92—115, 尤其是 p. 103。

② 例如,在1985年选举中,共产主义政党在雅典赢得了17%的选票,但是30%的被调查者表示将在以后考虑投票支持这样的政党。在198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5%和44%。表示在未来将考虑投票支持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新民主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不明显)。

③ Diamandouros, “Politics and Culture”。民间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增强的一个有趣指标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两个高峰组织——希腊工业联盟(the Greek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和希腊工人大同盟(the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Greek Workers)于1990年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内容广泛的共同协定。

④ 在此,我们提到的是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所编的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所分析的各种模式。

第九章 南欧：总结性反思

现在我们总结关于南欧的基本观点。无疑,其中有一些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清楚的是,考虑到世界各国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所有情形,这些南欧的案例发生在一个初始环境差异相对较小的条件之中。

——南欧国家的转型没有苏丹式的背景。

——南欧国家的转型没有全能主义或后全能主义的背景。

——南欧国家的转型并不是开始于由高阶军人领导的威权政体。

——南欧国家的转型并不是开始于一个强大的单一威权政党。

所有这些意味着在世界其他地区非常明显的初始限制性环境在南欧是不存在的。

我们希望强调的另一个主要观点与序列有关。南欧诸国自觉选择了首先集中于政治、其次社会福利政策、再次结构性经济改革的顺序,它们在结构上也是能够这样做的。我们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的最好序列。任何国家的民主都需要在决策规则、制度安排的建立、政治参与障碍的移除、选举的必须要素和政治社会的建立等方面达成谅解或默契。理想的社会经济政策就出于这样的设置。

在拉丁美洲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当奋斗中的新兴民主国家将“国家收缩(state-shrinking)”作为一件紧迫之事向前推进时,我们需要谨记一条警戒性的历史记录:所有这三个南欧新兴民主国家都通过不断增加的税收强化了它们的国家力量,用这一税收显著增加了社会福利支出与国家雇佣(见表 9.1)。

所有这三个南欧国家民主的巩固都先于经济改善甚至经济重构的开始。西班牙直到 1982 年才进行较大的经济改革,葡萄牙直到 1985 年才开始,希腊

第一次不成功的努力是在 1985—1987 年。^① 作为上述种种的结果,在民选政府执政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关键时期,没有一个南欧国家的涉及经济规划与运行的问题像对于政治权力规划与运行的争论那样突出。

表 9.1 税收收入、公共支出与公共雇用的增加:西班牙、葡萄牙与希腊(1976 年,1984 年,1988 年)

140

收入与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率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		
	1976	1984	1988	1976	1984	1988	1976	1984	1988
税收收入	25.0	33.2	36.7	31.0	34.6	36.6	29.2	34.2	35.9
公共总支出	26.0	38.7	41.7	37.3	41.6	43.7	20.9	44.2	51.3
公共雇佣支出	8.5	12.8	13.8	8.8	13.3	13.8	8.5	9.4	10.1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José María Maravall, “Politics and Policy: Economic Reforms in Southern Europe”, 载于 Luiz Bresser Pereira, José María Maravall 和 Adam Przeworski,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A Social Democratic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able 2.4, p. 103。

国家性从未成为葡萄牙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问题。在希腊,国家性在民主转型与巩固时期也不是一个显著的问题,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希腊民族主义与巴尔干(特别是马其顿)政治纠缠在一起时,国家性才演变成较大的问题。国家性能够导致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崩溃,但是西班牙的领导者成功地将单一制国家转变为多语言、多民族的自治国家,这表明新兴民主国家可以应付这样的问题。

国际环境的一些情形也需要讲一下。所有这三个国家都试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遵循共同体的规则,它们都在民主巩固之后才获得完整的成员资格。罗马条约的程序规定要为共同体内最贫穷的地区提供补助,这些规定最终使得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量受惠。在考量过这三个新兴民主国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之后,我们同意洛朗斯·怀特黑德的结论,即共同体自身

^① 较早见之于 José María Maravall, “Politics and Policy: Economic Reforms in Southern Europe”, 载于 Luiz Bresser Pereira, José María Maravall 和 Adam Przeworski,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A Social Democratic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7—131。也可参见 José María Maravall, *Los resultados de la democracia. Un estudio del sur y el este de Europ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5)。

141 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奖赏与激励模式,共同体对邻近地区的、正在巩固中的民主国家报以深刻而长期的关注,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期望“制造了民主化的切实而长期的压力”^①。

最后,我们认为政治制度的具体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而在目前的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文献中,人们对它的关注还不够。很显然,南欧国家选择议会制或半总统制(逐渐转向议会制)宪政框架赋予它们的自由水平要比选择美国式的总统制赋予它们的自由水平更高。我们认为在南欧没有一个新民主国家选择美国式总统制模式的事实提高了它们的自由水平。在西班牙,议会制使得失去支持的苏亚雷斯下台,使得他的继任者卡尔沃·索特洛(Calvo Sotelo)能够监押政变制造者,使得选举能够提前召集。在希腊,议会制使得新民主党与共产主义者结成形式上的联盟。在葡萄牙,半总统制使得一个军人总统与一个权力逐渐扩大的文官总理能够共存,尽管所谓的三个“总统内阁(presidential cabinets)”造成了不小的紧张。在单纯的总统制中,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不会发生。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关于议会制宪政框架有助于民主巩固的经验和理论证据。1981—1990年间民主政治连续10年未被扰乱间断的世界41个国家中,30个是单纯的议会制体制,仅有4个是单纯的总统制体制。1945—1979年间独立的93个国家中,只有15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在1980—1989年间能够连续运行,它们均是开始就采用了议会民主制。我们不认为这些数字是偶然产生的。^②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议会制组织形式具有有助于民主巩固的三个方面的能力,即效力、建构多数的能力和结束政府危机而不致使其演变

^① Laurence Whitehea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和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 23。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止,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一些规则招致了许多怨恨与抗议,特别是在西班牙的渔民、农民和牲畜饲养者中间。

^② 按照最初的宪政框架与后来的民主巩固对这 93 个国家进行分类的结果如下:在这 93 个国家中,13 个国家独立时采用了君主制,3 个采用了半总统制,36 个采用了总统制,41 个采用了议会制,斯泰潘和辛迪·斯盖茨(Cindy Skach)对以上所有数据进行皮尔森卡方检验(Pearson's chi-squared test),其结果使得他们推翻了上述分布具有随机性的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随机性地观测到这一分布的几率小于 1%。关于这些及其他数据的分析,参见 Stepan 和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45 (October 1993), pp. 1—22, 尤其是 pp. 5—15。

为政权危机的能力,这赋予了政治体制以总统制无法赋予的明显优势。^① 西班牙与希腊是单纯的议会制体制,葡萄牙是一个半总统制体制,但是自 1988 年以来其运行日益接近于议会制体制。^② 没有一个拉美、亚洲和后共产主义的新兴民主国家(匈牙利除外)最初选择和建构一个单纯的议会制形式。捷克斯洛伐克与议会制有些相像,但是总理或总统均不能解散议会或者召集新的选举。到 1995 年,与总统经由直接选举产生并且握有重权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总统经由间接选举产生)和斯洛文尼亚(总统经由直接选举产生,但权力很小)更加接近于民主的巩固。我们认为,议会制作为一个制度框架有助于民主巩固的相关论据,应当得到实践家和理论家们更加认真的考察。

最后,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南欧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民主的合法性与效力的意见如何呢? 答案是相当乐观的。(见表 9.2 与表 9.3)

**表 9.2 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回答“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比率
及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对比,1992 年(合法性指标)**

回答者的位置	百分率
西班牙	78%
葡萄牙	83%
希腊	90%
欧盟平均水平	78%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Eurobarometer*, 37 (1992)。

^① 参见 Linz, “Excursus on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载于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编: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Regim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71—74 和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载于 Juan J. Linz 和 Arturo Valenzuela 编: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87 以及 Alfred Stepan, “Parliamentarismo X Presidencialismo no mundo moderno: Revisão de um debate atual”, *Estudos Avançados* (São Paulo, Janeiro/Abril 1990): pp. 96—107。

^② 西班牙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没有任何半总统制的特征。在希腊,关于采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半总统制模式有大量的讨论,但是直选总统的立法从未获得通过;而且,1975 年宪法提供的强大的总统权力已经被 1981 年执政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推行的宪政改革显著削弱。1995 年葡萄牙在形式上仍然是半总统制,但是 1982 年以后,总统的权力已经被宪政改革所削弱,当第一位文官总统(恰好是一位前总理)于 1986 年就职时,政治实践变得更加像议会制体制。

表 9.3 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回答“对民主的运行方式非常满意”或者“还算满意”的比率及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对比,1985—1993 年(效力指标)

回答者的位置	百分率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西班牙	51	55	60	57	40
葡萄牙	34	70	60	75	51
希腊	51	49	52	34	39
欧盟	49	51	57	50	43

资料来源: *Eurobarometer Trend Variables*, 1974—1993 (May 1994)。

143 总体言之,所有的南欧国家都是民主巩固的国家,任何民主巩固均在 8 年之内完成,相对于其他西欧议会民主制国家,南欧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模式日益具有可比性。^① 尽管今天看来南欧三个国家民主巩固的完成相对容易,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转型是在长期非民主统治之后才开始的;而在希腊,由于内战的遗留影响,人们曾对战后的民主政治进行质疑。进而言之,南欧民主转型都是在民主化“第三波”的初始阶段开始的,不可能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②

补充:为什么对先前非民主政权的否定性评价不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

我们结束了对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在西欧历史上曾经持续时间最长的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的分析,下面提出一个在民主化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观点。一些研究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学者常将这两个过程与人们对先前非民主政权的反对与否定性评价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对先前政权的反对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有时候对新兴民主国家民主质量进行分类的指标就包括对先前非民主政权的评价。我们在概念、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反对

^① 这是前面引用过的 Lijphart、Bruneau、Diamandouros 和 Gunther 合著的,“A Mediterranean Model of Democracy?”一文的主要论据。

^② 对塞缪尔·亨廷顿而言,世界民主化“第三波”(1974—)是以葡萄牙为开端的。参见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1。

这样的观点。

从概念角度讲,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我们对民主巩固的定义是以现实和未来为导向的。因此,对我们而言,一个关键性指标是看是否有相当多数公民认同“对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民主制度是最好的选择”。分析而言,认为民主政治是现在和将来最好选择的肯定态度并不必然需要对过去的否定态度。人们可以作出相互独立的判断,既肯定先前政权的成就(至少不是完全否定),又支持民主作为他们喜欢的政府形式。

144

**表 9.4 对民主政体强烈肯定与对先前非民主政权
微弱否定的兼容性:西班牙与葡萄牙**

调 查 回 复	回答者的百分率			
	西班牙		葡萄牙	
	1985	1992	1985	1992
对民主政体的强烈肯定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体”	70	78	61	83
“某些情况下,威权政体、独裁政体较好”	10	9	9	9
“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是一样的”	9	7	7	4
“不知道/不回答”	11	6	23	4
对先前非民主政权的看法				
“好”	17		13	
“有好有坏”	44		44	
“完全坏”	29		29	
“不知道/不回答”	10		14	
样本数目	(2488)		(2000)	

资料来源:1985年的数据来源与表 8.1 和表 8.2 相同,1992年的数据来自 *Eurobarometer 37* (1992)。

从历史角度而言,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巩固的民主国家在转型时,并没有出现原政体的多数成员或民主转型的主要代理人坚定地信仰民主主义或者反对原先政权一切方面的情况。更确切地说,民主的多数派出现于以下情形之中,即面对着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他们所处的整个世界,精英与普通公民开始觉得民主是调控冲突的比较好的程序,或者是一种较少具有危险性的统治形式。对许多重要的精英人物而言,民主的行为要先于

民主的**态度**,因为这些精英可能会做出估算,打破民主的游戏规则(无论对其喜欢与否)不会给他们的利益带来正面结果。民主成为“最佳选择”,部分是由于信仰,部分是出于精英们对于遵守民主规则还是寻求其他统治方式各自成本的考量。

从经验角度讲,我们反对这种观点是因为我们有切实的证据表明,对近来的民主转型而言,当只有一小部分大众反对先前政权时,民主的巩固也是可能的。这方面的证据是,根据我们的标准,1985年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已经是民主巩固的国家,但是仅有不足30%的被调查者认为佛朗哥或者萨拉查政权“完全坏”,同时却有相当多数认为“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体”(见表9.4)。

如表9.4所示,如果我们将先前非民主政权“好”与“有好有坏”这两个回答合并起来,那么1985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有61%和57%的被调查者并不完全否定先前政权,还认为原先政权有一些好的特质。然而,在同一场调查中,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有70%和61%的回答者认为“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体”。前一个答案是对过去的评价,后一个答案是对现在和将来的偏好。这两个答案并非不可兼容。^①到1992年,葡萄牙有83%的被调查者(相对于1985年的61%)认为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体。对民主支持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拒绝回答或回答“不知道”的被调查者从1985年的23%降低到1992年的4%。我们猜测这段时间葡萄牙公民认为先前政权“完全坏”的比率有所增加,尽管我们没有相关数据。

让我们推测一下是何种心理过程和历史过程使得个人认为原先的非民主政权并不完全坏,但又在现在和将来偏好民主政权。对任何政权的评价都要涉及一系列标准、维度和社会成员的经历。认为在非民主政权之下生活了数十年的人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否定这一政权的所有方面,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曾在这一政权之中谋生,他们所经历的、生活上的成功与对该政权制度的参与联系在一起。此外,一些非民主政权(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与韩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西班牙,卡达尔中期的匈牙利)在社会生活

^① 事实上,对西班牙1978年民意调查的分析表明,在对关于佛朗哥政权和民主政权的问题做出回答的被调查者中,83.5%的人认为“对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而在这些被调查者中,仅有28.1%完全否定“佛朗哥政权的行为”,23.2%的人认为“有许多失误本应可以避免”,32.0%的人认可佛朗哥政权某些形式的行为(5.9%的人“完全认可”,15.6%的人认为这些行为“总体而言是好的”,10.5%的人认为这些行为“平常而没有太多过失”)。参见Juan J. Linz, “El legado de Franco y la democracia”, 载于Juan J. Linz等编: *Informe sociológico sobre el cambio político en España, 1975—1981* (Madrid: Euramérica, 1981), pp. 587—618。

的某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为其赢得了声誉。这些成就确实存在，对一位客观的观察家而言，否认这样的成就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出于意识形态的僵化与盲目才会否认这些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先前非民主政权的消极方面，这些方面已经影响到他们，或者他们对这些方面是有所认识的。一个社会（特别是在上述政权之中）中的大多数人仅有正面的或负面的经历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这一政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有时是谨慎的、允许人们在政权设定的限度内追求自己生活的自由化进程。实际上，更多的问题在民意调查中未被正式问及，这些问题表明，许多人批评先前政权的一些方面，诸如镇压的数量与自由的限度，但同时许多人也指出了先前政权的一些积极方面，诸如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①

146

有一个西班牙流亡者的故事。这位流亡者在多年以后回到了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这时的西班牙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内战之前的情形相当不同。这位流亡者为这种积极变化所震撼，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佛朗哥政权之下取得的，难道我在内战中坚持了错误的立场？”一个答案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欧洲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政权都可以实现这位流亡者所认为的许多积极变化，而且如果不是这一政权的话，甚至可以实现得更早。但是人们在评价先前政权的绩效时，却不会关注这一绩效为何以及如何实现的。

许多人对先前政权或许有一些积极评价这一简单事实，是否会构成他们向新的民主政权担负责任的障碍呢？经验数据表明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对先前政权没有消极评价的人们，特别是持混合态度（“部分好，部分坏”）的人们，可以完全支持新的民主政权。这些人的评价建立在民主所带来的新的积极方面之上，这些积极方面体现于政治生活和社会之中，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与自由、参与、限权、负责、政治过程的确定性相联系的价值积极回应上。我们不要忘记在非民主政权之下人们的一个重大忧虑（特别是当这一政权人格化时），即统治者死后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西班牙迟早要面对佛朗哥去世的事实，新的决策必须做出，而这种决策尚无清晰的规则，这将为不确定性（incertitude）甚至是暴力冲突打开大门，这使得在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人怀有一种不安的心情。正如亚当·普热沃尔斯基在总结民主政治的特征时对不确定性所作的正确强调，民主政治的特征

① 同上。

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可预测机制,通过此机制可以更换政府以适应变动的社会。民主国家有一套宪政框架,这一框架由许多规则和程序作保证,可以限制政治变动的不确定性,保证个人和团体的权利,而这些是非民主政权无法有效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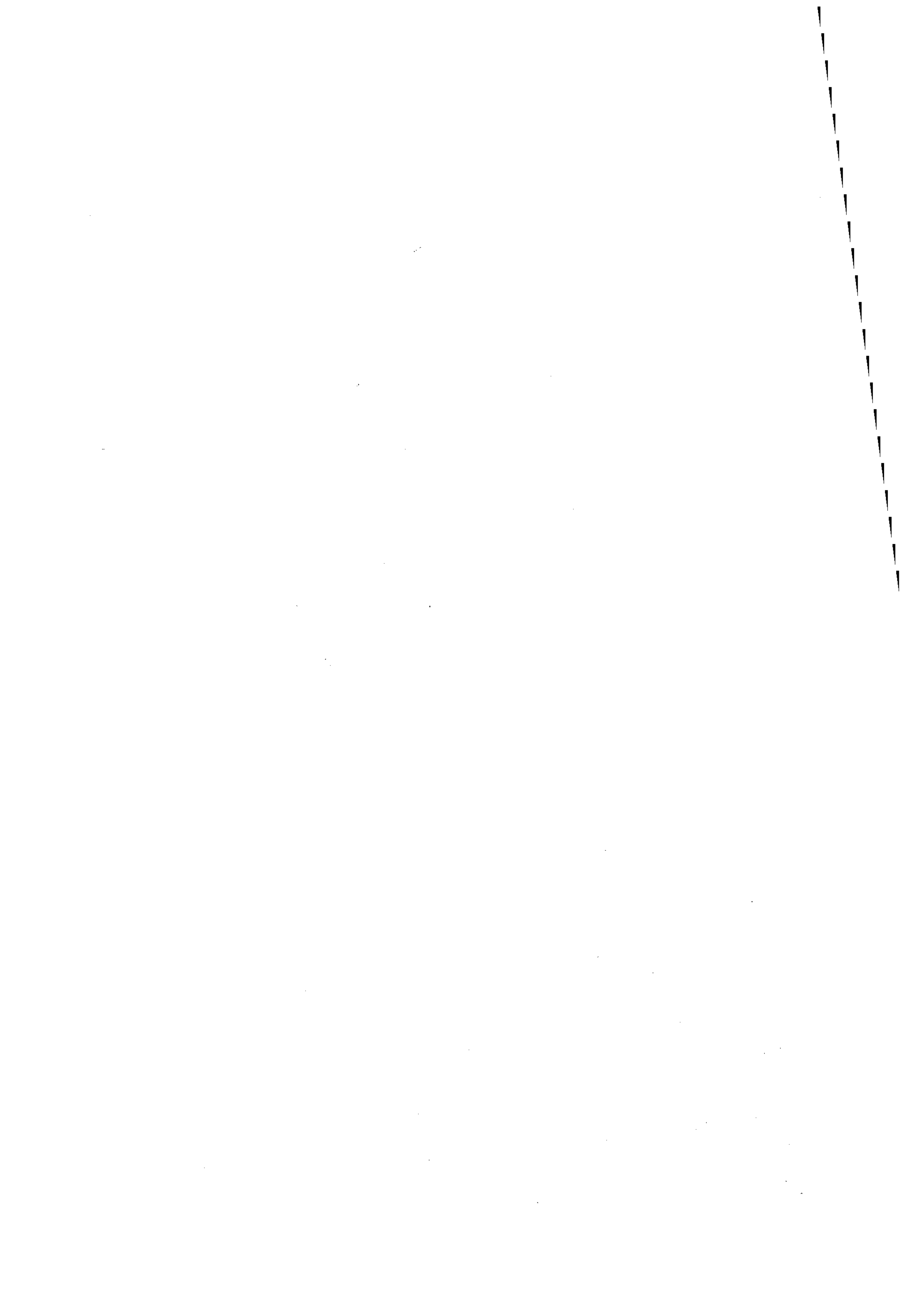
147 将民主的巩固与对先前政权的全盘否定联系起来的潜在假设源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即除了小范围、特权性和压迫性的少数人集团以外,非民主政权从未得到过其余团体的大量支持。一些人认为,南欧与南美的右翼威权政权仅仅得到了大土地所有者、主教、军队要员、银行家和少数意识形态积极分子的支持,而忽略了有许多非精英人士可能认为自己的未来会受到该政权的积极影响。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创造了利益格局与支持者。许多人在与政权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向上流动,获得高等教育的奖学金、体育成就的奖牌、文化活动的基金、干部制度中的晋升,以及成为成功的企业经营者,诸如此类。尽管他们反对政权的终极目标,作为民族主义者而抵制对苏联的依附,对大量细小的官僚欺诈表示不满,但是他们无法否认他们过着一种较好的生活,有时甚至是相当不错的生活,而他们社会内部的变动将会危及这样的成就。对许多非民主政权的支持者而言,最令人头痛的事情是:新的民主主义者往往认为,如果这些人在先前政权中取得了成就,这些人就一定是罪恶的,这就否认了这些人的个体合法性。

我们再次强调,多数民主国家必须构造出坚定的民主主义多数群体。那种认为只有完全的民主主义反对派才会忠诚于民主政治的看法事实上将会削弱民主政治。

我们关注人们对先前政权的态度,但这也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在希腊,认为先前政权“完全坏”的人口要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多很多,但我们并不据此认为希腊拥有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多很多的民主主义者。我们只是认为希腊的调查结果经验性地表明,希腊的前政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就以维持自身的信誉,反而做出了许多损害自身信誉的事情。事实是,对希腊独裁的强烈抵制使得前军人政权中的领导者因为侵犯人权而受到惩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智利的案例在某一方面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有相似之处,即认为非民主政权“有好有坏”的比率相对较高。关键性的区别是,大量智利的被调查者支持由皮诺切特政权建立的一些现存制度延续下去。在这一方面,智利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又是完全不同的。后面我们也将指明,多数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公

民能够对过去和现在作出复杂而独立的判断。中欧(不包括前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五年后的一项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的压倒性多数同时认为,经济状况是在共产主义体制之下较好,而政治体制则是在新的民主政权之下更好。因此,他们能够区分经济物品与政治物品,能够区分过去与未来。过去对他们自身而言并非完全糟糕,而未来的政治也是他们所热望的,尽管他们知道将要失去一些他们所珍视的东西。



第三部分

南美：受限制的转型

与我们已经分析的三个南欧国家类似,这四个拉美国家(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下文称为南锥国家(southern cone))转型开始之时,也没有一个是苏丹式政体、后全能主义政体,或强大的、文官化的威权主义政党政体。然而,尽管新兴的南欧民主政体国家没有一个始于高级军人政权,南锥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型之前却都是高级军官掌控的军人政权。在本书开卷的理论讨论中,我们断言,除非受到外来力量或者革命的削弱,在转型过程中,这样的军队仍将长期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转型以后,新生的民主政府也会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进一步指出,“军队的层级控制越严密,就越不会因内部矛盾而被迫退出;并且,迫使他们卸任的政治联盟力量越弱,军队就越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从而能够保留一些非民主的特权,并对民主巩固的政治过程附加限制性条件”。

那么,这些一般性命题在这四个南锥国家之中,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呢?进一步说,当我们将南锥国家和南欧国家进行比较时,高级军官这个变量自身,又在多大程度上使民主巩固的任务复杂化了呢?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指出,这四个国家的转型事实上经受着高级军官的严重约束。而且,我们也将指出,这四个国家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智利,尽管经济条件最好,但迄今为止军队仍有相当多的特权,以至于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民主政府都不能够符合我们关于完整转型的定义。另一方面,乌拉圭尽管经济问题长期存在,却是这组南美国家中唯一巩固的民主国家,但是因其治理(尤其是其效力)问题,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具有风险的”(risk-prone)巩固的民主。巴西的情况在1994年中得到改善,但是它在1992—1994年还不如1985年结束军队直接统治之时稳定。最近几年,阿根廷在首次民主选举出由阿方辛(Alfonsín)领导的政府之后,一直处于政权解体和军人再度重组的危险境况;虽然梅内姆(Menem)政府扭转了这两种情况,但梅内姆所扮演角色的某些方面,使我们难以将阿根廷视作巩固的民主政体。显然,要解释这些国家的差异,除了这些国家的转型都开始于高级军官控制的军人政体这一变量以外,我们必须研究其他变量,尤其是政治经济合法性方面的因素。这四个国家在政治社会和法治方面的特征也非常不同,政治社会和法治也值得进行广泛研究。

第十章 具有风险的巩固民主：乌拉圭

151

本章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将提出那个无疑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即乌拉圭是一个巩固的民主，同时也将评估，是哪些条件促使乌拉圭成为南美四个前“官僚威权主义”政体之中唯一巩固的民主。^① 第二，我们将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乌拉圭和希腊一样，可能存在风险，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依据民主崩溃的文献，而非“民主转型”的政治学和文献来分析风险问题。^②

在概念上，乌拉圭非常符合我们的理论框架。1973年至1985年的乌拉圭是威权主义政体，事实上，从1976年起它就一直被军队控制着，由等级控制的军队进行合法统治，直到1985年，军队联合组织才把政权移交给民选总统。^③ 且与我们的分析一致，过渡期中军方始终保持着当权者的地位，这就排除了临时政府出现的可能。

① “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概念(“bureaucraic-authoritarian” regime), 参见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ic-Authoritarianism: Study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以及 David Collier 编: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也就是说，相对于经典民主转型文献，如 O’Donnell、Schmitter 和 Whitehead 的四卷本研究成果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中的框架，引用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所编的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Regim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中的框架可以对其进行更好的分析。

③ 我们对乌拉圭的分析会比较概略。因为对关心乌拉圭转型的具体细节以及有关民主巩固的问题的读者来说，已有两本专著做了精彩的阐述，可参考 Charles Guy Gillespie, *Negotiating Democracy: Politicians and Generals in Urugu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以及 Luis E. González,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1)。当这两位杰出的学者在耶鲁大学撰写上述长篇学术专著时，我们有幸与他们一起工作过。

在我们的框架中,我们也指出,高级军官领导的军人威权主义政体通常对民主转型具有某种潜在的优势(作为机构的军方或许相信,摆脱军政府状态,他们的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但也是某种潜在的障碍(作为解脱的代价,军方或许仍会对新任民主政府加以强硬的限制)。乌拉圭同时验证了上述两方面的预设趋向。

为什么会开始民主的转型?是什么导致了军队和军政府的分离?最初,从1978年至1980年,乌拉圭不仅几乎没有军官赞同恢复自由民主,而且几乎没有谁准备尝试制度化的威权主义政权。并且,就有组织的镇压(并非屠杀)而言,乌拉圭是南美四个官僚威权主义政体国家中受压制最严重的一个。^①其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作为地下反抗组织的载体,也不如巴西、智利强大。尽管如此,在整个20世纪,乌拉圭军方从来不曾进行直接统治,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乌拉圭民众在民主体制下生活了更长时间,并且在历次总统大选中,乌拉圭两个传统的全国性政党(红党和白党)也从来不曾获得低于75%的全体投票率。由此,即便以西欧的标准来衡量,乌拉圭选民也早已形成了某种传统,包括对政党的高度认同,及对左—右倾向明确的判断力。^②甚至在军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倾向于对传统的两个政党“大家庭”中的一个表示认同。

此种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方压制政党,却不敢尝试去取而代之。事实上,1976年军队最终推翻平民傀儡领袖时,他们甚至煞费苦心发表宣言,绝不“企图分担取缔政党的历史责任”,“主权归属国家……正如……普遍选举所体现的那样”。^③到1977年,军方宣布他们将拟定一部新宪法来加强民主。新宪法将在1980年提交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候选人的总统选举将于1981年举行。此候选人由两个传统政党提名,但也要得到军方的认可。

令大多数观察者尤其是军方吃惊的是,乌拉圭向民主的过渡,正是伴随着民主反对派在公投中的获胜而拉开了帷幕。合法性和权力关系开始迅速地发生转变。正如我们在葡萄牙所见,选举驳斥或强化了权力竞争者们的合法性

^① 例如,大赦国际估计,官僚威权主义政体的前几年间,乌拉圭公民被囚禁的比例是1:600,而阿根廷相应的比例是1:1200,智利是1:2000。参见 Gillespie, *Negotiating Democracy*, pp. 50—87。

^② 在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p. 1—7 中,冈萨雷斯(González)提供了丰富的论据来论证其观点,即“民主崩溃之前,乌拉圭在拉美国家中有着最强大的民主传统”。事实上,达尔进一步指明,乌拉圭或许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其中“相对长期的民主系统,为内生的独裁主义政权所取代”,参见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40。

^③ 引自 Gillespie, *Negotiating Democracy*, p. 54。

要求。对于某些享有盛名的军官，全民表决的结果动摇了他们对其统治权利的信心。事实上，公投第二天看到的制宪工作组的宪法抄本甚至显示出，高层的某些军官仅仅把军政府称作“gobierno de facto”（事实政府）^①，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对传统的政治党派而言，经过这次公投，它们活跃起来，更无所畏惧，并重新获取了对其合法性的自信，在政治生活中脱颖而出。^②

在全民公决中，军方遭遇了失败。而且，传统政党作为一个新的强大势力而出现，在军政府（试图以各种方式掌握权力）和军队（开始讨论过渡期的方案，但保留部分反民主的立场）之间制造了裂缝，这也使军方遭遇了滑铁卢。在概念引入中，我们曾指出，尽管由高级军官控制即将卸任的政府一直存在风险，即可能会束缚向民主的过渡，然而，他们所能束缚的程度将取决于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为什么说政党力量已强大到足以与军方对峙，实现过渡并巩固民主了呢？

到1980年，军方没有任何针对游击队的防御计划。实际上，1973年军方掌权之前，游击队就已经被击溃，并且直到1980年，他们在乌拉圭都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另外，军方也没有清晰的经济规划，缺乏“建设性”或是进攻性议程。最后，两大传统政党也并非是危及军方统治的可替代性选择。全民公决前，一项耗时六个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上层社会的被调查者中，2/3的人认为政治开放能促进而非延缓经济恢复。更重要的是，1/7的上层被调查者相信，政治开放能够增进而非恶化现有的安宁和公共秩序。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的全民公决中，不止一个商业集团抽身出来，不再宣传和支助军方。^③一贯保守的农民协会（Rural Association）主席在电视访谈中，相当轻蔑地驳

① *Diario de sesiones de la Constituyente*, 1980。是 Juan Rial 和 Carina Perelli 让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

② 对公投及其结果的出色分析，参见 Luis E. González, “Uruguay 1980—1981: An Unexpected Opening”,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18, no. 3 (1983): pp. 63—76。冈萨雷斯把此次投票界定为军方创建全民表决的非民主政体的努力。也可参见 Howard Handelman, “Prelude to Elections: The Military’s Legitimacy Crisis and the 1980 Constitutional Plebiscite in Uruguay”, 载于 Paul W. Drake 和 Eduardo Silva 编: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1980—1985* (San Diego: Center for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for U. S-Mexican Studies,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6), pp. 201—214。

③ 有关民意测验和对军方缺乏进攻、防御规划的分析，参见 Alfred Stepan, “State Power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载于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 Theda Skocpol 编: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25—331。

回了乌拉圭需要军方来拟定宪法的观点,这对军方的统治资格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由于没有内部威胁,没有在市民社会或是政治社会中的强大联盟,随着作为机构的军方在公投中的失败(他们表示将会尊重公投结果),它同政治家们讨价还价的力量大大削弱了。正如在希腊,军方若不缓和其要求,平民政治家就拒绝继续有关承担统治责任的谈判。^①

这并不意味着军队组织就无法榨取退出的报偿了,事实上,他们获得了相应的利益。直到第一次选举结束,等级控制的军队一直掌握着权力,这表明军方的立场是:以压制转变的方式换来对权力让渡的磋商。在政党与军方达成的“海军俱乐部协定”中,最首要的限制是:作为两大主要党派之一的白党(Blanco Party),其克里马斯型领袖——维尔森·弗雷拉(Wilson Ferreira)不得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选举才能够进行。在1971年选举中(军人政变前的最后一次选举),弗雷拉就赢得了比其他候选人都多的个人投票。但由于乌拉圭选举制度的特殊性,他没能获得1971年的总统职位。若非军方禁止弗雷拉参加此次竞选,他本将是最有可能在1984年选举中获胜的竞选者。由此,对某些主要选民而言,后军人时代的第一次选举——黯然失色了。不论如何,白党推选了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且左翼联盟(Frente Amplio)表示同意参加选举,这些事实相对减轻了选举的不合理性。另外,军方能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它本身的自治权获取保障。不过,政党仍然拥有足够强的交涉力,以至于军方不得不答应:在进行民主统治的第一年末,这些特权到期终止。

军方对民选政府的统治权最具政治破坏性的削减发生于1986年12月。虽无书面文件证实,但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某种对“海军俱乐部协定”的非正式解释,几个主要政党和军方代表们默许:对发生于军方统治期间及之前的那些军官侵犯人权的行为,将不再进行审判。1986年12月,一些军官接到出庭的传票。紧接着那个周五,国防部长命令军官们不得在下周一出庭。乌拉圭的政治家们,在合法性流失的困境中挣扎了48个小时,如果他们坚持要求军官们出庭,就会面临军方的拒绝,从而导致其自身权威的危机。同时,作为另一种方案,他们也可以匆忙地通过一项特赦法,以民主体制威望的削弱为代价,

^① 最初的帕克旅馆(Parque Hotel)谈判中,面对军方的强硬要求,平民谈判代表一度退席,在军方缓和其条款之后,才重新出席商讨相对较成功的海军俱乐部协定。对谈判更深入的分析参见 Gillespie, *Negotiating Democracy*, chap. 6-8。

来避免这场即发性危机。^① 经过许多次痛苦的讨论，他们选择了后一种行动方案，这导致了大多数人的普遍沮丧。最后，大众收集了足够的签名（25%的选民），以促使对特赦的复决投票。1989年4月的公民复决中，57%的选民投票同意将特赦令暂时搁置，不加谈论。然而，民意测验显示，绝大部分的选民投票同意暂时保留特赦，更多地是为了避免危机，而不是认为这样合理。^② 而他们认为当时可能会发生军事危机，则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胡戈·梅迪纳（Hugo Medina）——军政分离谈判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也最有建设性作用的乌拉圭将军，在1991年接受采访，被问到如果公民投票赞成军方接受审判会是何种状况时，毫不含糊地断言：“即使我不承担发动政变的责任，也会由等级中的下一个军官来承担，他不接受，还会有下一个。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海陆空三军的想法。”^③ 尽管这个估计令人不寒而栗，但公民一旦就此做出表决，政党—军方议程中似乎就不存在需要争论的重要项目了。1989年12月乌拉圭举行自由选举，所有的候选人都被获许参加，并且，左翼联盟赢得了蒙得维的亚市市长职位，这个城市包含了乌拉圭半数的人口。

随着1989年12月公民复决和选举的举行，乌拉圭满足了我们所设定的完成过渡的所有条件。^④ 然而，虽然以巴西和智利的标准来衡量，高级军官向民主政府索取的“权力移交的报酬”并不高，但它现实地存在着，不仅在政策主权层面，而且在政治合法性层面。

尽管高级军官束缚着变迁的过程，我们仍然认为，到1992年，乌拉圭的民

① 对于当时困境的这个评定出现于1987年2月3日，斯泰潘于事件发生后不久在蒙得维的亚对当时的总统豪尔赫·桑吉内蒂（Jorge Sanguinetti）和参议员乔治·巴特尔（Jorge Battle）的采访中。也参见 Julio María Sanguinetti, *El temor y la impaciencia: Ensayo sobre la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91), pp. 63–68。

② 例如，1989年3月的 Equipos 民意测验表明，只有27%的被调查者认为军方会尊重这个决议。人们投票赞成特赦，主要是基于他们巩固民主的愿望。这个得到大众支持的法律的官方名称是，“Ley de Caducidad de la Pretensión Punitiva del Estado”（取消国家惩罚声明法）。

③ 胡戈·梅迪纳将军的第一次重要的公开谈话发表于 *Búsqueda* (March 7, 1991), pp. 32–37。这段引述摘自 p. 37。有关涉及“免罚法”所谓的复决投票的争论的说明，参见 Lawrence Weschler, *A Miracle, a Univers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ortur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pp. 173–236。

④ 关于此次选举，参见 Carina Perelli 和 Juan Rial, “El fin de la restauración: La elección del 26 de noviembre de 1989”, *Cuadernos de orientación electoral*, no. 10, (Montevideo: Peitho, April 1990)。也参见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的优秀文章，“Truth or Amnesty: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Uruguay and Chile” (Ph. D. diss., St. Antony'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3)。

主走向巩固——这或许是个有争议的判断。我们首先来检验巩固民主的行为层面。1968—1973年间，乌拉圭走向军事政变，乌拉圭图帕马罗游击队是拉丁美洲组织最严密的城市游击力量。冈萨雷斯指出，执政党中的主导派系是红党(Colorado Party)，而红党领袖却试图利用游击队的威胁，“施加……某种围攻，并以此挫败议会”。冈萨雷斯进一步补充说明，1968年后，“政府和大多数主要政党的领袖公然把‘半忠诚’的左翼推向了完全的‘不忠诚’——只有白党的多数派例外。不仅如此，到1971年，忠诚的观念更加含糊不清：甚至政府本身都不遵守现行的规定”^①。毫无疑问，早在1973年军事政变之前，军方就已经单方面地接管并支配着对抗游击队的肮脏战争，而且，冈萨雷斯恰如其分地写道：“可悲的是，军方干预最重要的催化剂正是各派系政治家对将军们遮遮掩掩的讨好。”^②归根结底，1968—1973年的乌拉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此系统中，大多数重要的政治行为者对民主制度是“不忠诚的”，最多是半忠诚的。^③

政治学习有助于民主的巩固。首先，公民能够吸取之前民主崩溃的经验，通过投票行为来影响议会格局。在乌拉圭，与1968—1973年民主的崩溃脱不了干系的主要右翼和左翼政治党派已经得到了选民的惩罚。1968—1973年，在两大传统政党内部，都有明显的不忠诚或是半忠诚的极右势力。红党的右翼势力，在1971年民主崩溃前的选举中获得了56%的选票，而在1982年的国内政党竞选中只获得了31%的选票，1984年则下降到24%。白党甚至显示了更为民主的势头，1971年，支持威权主义的党派赢得了34%的投票率，1982年降为26%，到1984年则仅剩3%。另外，左翼政党联盟中，1984年选举的获胜者是各个政党中的向心势力（与萨托利模型中危险的“离心分化趋向”相反）。正如冈萨雷斯总结的那样，“这个趋向中心的进程……弱化了政治谱系中所有反制度的力量”^④。

虽然对民主的巩固而言，政党忠于民主的行为相当重要，但同样重要的

① 引自 González,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 42, 41.

② Gillespie, *Negotiating Democracy*, p. 4.

③ 对民主崩溃的分析中，关于“半忠诚”和“不忠诚”分类的重要性，参见 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cy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8—45.

④ 选民投票率和相关引述，均来自 González,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p. 70—71。也参见 Juan Rial, “The Uruguayan Election in 1984: A Triumph of the Center”，载于 Drake and Sliva 编: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pp. 245—272。

是,所有的主要政党都能洞察其他主要政党对此民主进程的忠诚。如果所有的主要政党,都互相认可彼此的忠诚,就能降低失败者的成本(因为他们还有参加下次竞选的机会,而且少数人的权利也会得到尊重),同时也增加了“跨时期”脱离民主进程的成本(因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政治博弈”,已经成为一种观念)。^① 吉莱斯皮设计了调查问卷,来确认那些党派对其敌对党忠诚、半忠诚或是不忠诚的觉察。在 10 样本调查中,4—6 个政党是半忠诚的,多于 7 个的政党表现为不忠诚,1985 年,3 个主导政党的 12 个主要党派中没有一个被其竞争对手判定为不忠诚。相反,使用同样的程序,追溯到 1968—1973 年时段时,9 个主要党派中,有 4 个被不止一个敌对党派判定为不忠诚。^②

157

关于政治行为和民主巩固,另一个关键特征是,那些一度不被承认的持有权力的党派,是否渐渐再度得到认可。在 1971 年,红党和白党中的一些重要组织认为,左翼联盟是不被接受的。然而,从左翼联盟参与 1985 年的“海军俱乐部协定”起,其成员在民主体制中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正常的和合理的参加者。1989 年,来自左翼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当选为蒙得维的亚市市长。巴斯克斯的就任和执政无可厚非,而其作为蒙得维的亚市市长的行为,也被看做是公正无私的。事实上,1990 年的民意测验中,对于来自传统红党的总统拉卡列,只有 22% 的蒙得维的亚居民相信他关心全体选民的需要和要求,而巴斯克斯则得到了 63% 的被调查者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总统拉卡列(Lacalle)的选民中,有 17% 的人认为巴斯克斯比拉卡列本人更关心选民的要求和具体事务。^③ 到 1992 年中期,大多数分析家开始把巴斯克斯视为前总统豪尔赫·桑吉内蒂及其竞争对手白党在 1994 年总统选举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者。在接见我们的一个作者时,巴斯克斯曾说,“我有绝对的自信,不论哪个候选人在 1994 年大选中获胜,

^①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在谈及巩固过程中增加民主博弈“跨时”受益的重要性时,提出了与之相关联的论点。普热沃尔斯基反问,既然博弈必然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那么那些在相互博弈中遭受损失的人,为什么不去设法破坏产生此种结果的制度呢? 他进而指出,失败者之所以屈从当下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相信构成民主竞争的制度框架,将会给他们带来远景利益。参见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尤其是 pp. 18—19。

^② 来自于 Gillespie, *Negotiating Democracy* 中表 3.6 和 10.5 的估算。

^③ 1991 年 6 月 Equipos Consultores Asociados 的调查。

都将接任政府。我们的军方并不是反民主的。”^①正因为巴斯克斯是乌拉圭可能的总统人选,这就增强了他调节其政治同盟者行为的能力。在1992年,左翼联盟就已经被所有的重要政党纳入乌拉圭的民主政治体系。事实上,1994年11月的选举中,巴斯克斯赢得了比其他所有单个候选人更多的投票,几乎当选为总统。他之所以没有赢得总统职位,是因为在乌拉圭的选举制度中,政党总投票数是累积的。在三方几乎平局的情况下,巴斯克斯的同盟,进步联盟—广泛阵线(Encuentro Progresista, EP)的累计票数排在第三位,落后于红党6005票、白党13206票。然而,不论选举前还是选举后,当谈及需要对乌拉圭实行联合治理时,人们一直把左翼联盟视为政治体制的正当参与者。1994年选举后,参议员达尼洛·阿斯托里(Danilo Astori)作为EP中赢得最多选票的团体的领袖,在有关治理的讨论中,发挥了特别积极的作用。^②

那么,军方的情况如何呢?1989年,就议会撤销对军方控诉的决定进行公民复决之后,军方对民主政治体制,就不再构成外在或内在的威胁和支配。按照特赦法令,他们几乎回复到前威权主义政体模式下的“文—武”关系。在1990年,乌拉圭军方拥有的特权显然少于智利、阿根廷和巴西。^③自由选举之后,军方势力在乌拉圭政治中衰落的原因在于:他们其实没有同盟者。一次又一次的民意测验中,商业精英、政治家以及大众异口同声地拒绝军方参与政治。比如,“如果乌拉圭再次发生类似于1973年的情形,你认为军队掌权是好事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92%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专家都选择了“不”。同样,虽然民主的幻想早晚会破灭,但这并不足以让人去怀念非民主的过去。1968

^① 1992年3月25日斯泰潘在蒙得维的亚对其进行的访谈。巴斯克斯补充说明,就任市长后,他曾礼节性地拜会蒙得维的亚军队驻防地的全体司令官。其后,他曾为海军学院和武警学院的毕业典礼颁奖,并出席了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他表示也愿意参加陆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但迄今未被邀请。当斯泰潘向某个乌拉圭最高将军问及“若巴斯克斯当选总统,军队将会如何应对”时,被告知军队将会“做该做的事,但仅此而已”。有关政治空间和巴斯克斯的演讲怎样使其得以作为乌拉圭新的民主领袖脱颖而出的先导性论述,参见Carina Perelli, “Un líder transgresor: Tabaré Vázquez o la intendencia como espacio político”,载于Carina Perelli, Fernando Filgueira和Silvana Rubino, *Gobierno y política en Montevideo: La intendencia municipal de Montevideo y la formación de un nuevo liderazgo a comienzos de los años '90* (Montevideo: Peitho, 1991), pp. 109—151。

^② 有关1994年选举的最终结果,参见“Uruguay; Sanguinetti Seeks All-around Accords”, *Latin America Regional Reports: Southern Cone Report* (Feb. 9, 1995); p. 7。参议院中,红党获得7个席位,白党10席,左翼联盟9席,新空间(Nuevo Espacio)1席。下议院中,红党赢得32席,白党31席,左翼联盟31席,新空间5席。

^③ 有关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军方特权的分析和文件,参见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93—125,尤其是pp. 116—118。

年到1985年，乌拉圭大体上经历了五个独裁主义总统的统治，然后，由民选总统桑吉内蒂执政。1988年12月的民意测验中，要求被调查者“在七个不同类别中分别评价，哪个总统统治下的国家状况比较好”。在每一个单独的类别里，民主总统桑吉内蒂都获得了最高分。^① 1985年8月，根据信任度评估的九种制度中，政党制位居榜首，净得分+57，而军队制则是最后一名，净得分-73。只有5%的人口认为军队“值得同情”，7%的人“中立”，与之相对的是，78%的人认为军方“令人反感”。^② 可能除了希腊，我们抽样的13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像乌拉圭这样——开始于对军方政治角色的完全摒弃。

159

在没有敌对武装的情况下（民主统治的前七年里，仅有一次关于左翼的重大暴力行动），政党对不忠诚的反对党的排斥和大众对军方的排斥，形成了某种政治联盟，于是，对军队而言，试图掌权，或是想要阻碍1994年大选中可能获胜的左翼联盟总统候选人就职，都是极有风险的。在1992年，斯泰潘曾问现役的一个高层将军，如果塔瓦雷·巴斯克斯在1994年当选总统，在政治上会对乌拉圭产生什么影响？将军在回答中暗示，他也承认，乌拉圭的体制已是巩固的民主。即便1994年大选塔瓦雷·巴斯克斯获胜，保证政治秩序的任务也更多是通过政治的正常运行来体现，而非表现在军事行动中。他赞同地引述了乌拉圭一位资深政治家的评论，大意是：“左翼联盟，和其他所有政党一样，也需要与各个党派相协调以有效地统治。在乌拉圭，总统职位本身并不意味着权力。就权力而言，协调是必要的，而协调取决于互相认可的行为。”^③

1992年3月，在对乌拉圭进行多次研究访问之后，我们得出结论，乌拉圭的民主是巩固的。可是，此后不久，在一些现役军官的协助下，某个号称由退役的中层军官组成的团体，炸毁了前总统桑吉内蒂的临时办公室。自然，我们开始考虑上面的判断是否仍然能够成立。我们确信评价这次轰炸之意义的最佳方式在于考察其后的政治反馈。毕竟，在西班牙，由于1981年以后全国性政党和机构之间已不存在重大的半忠诚和不忠诚的行为，因此虽说西班牙长年累月地经受着恐怖分子的轰炸，但仍然是巩固的民主。在乌拉圭，所有的主要政治集团都立场鲜明地谴责这次轰炸行为。军队高层也以激烈的言辞谴责了这次轰炸。除了这次令人不安的恐怖行动，我们涉及乌拉圭民主巩固行为

① Equipos, December 1988 poll.

② Equipos, August 1985 poll.

③ 转引自 Interview, March 25, 1992, in Montivideo.

层面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到1992年，任何一个乌拉圭主要政党或组织，都不存在半忠诚或不忠诚的行为。^①

160 同样，在制度层面上，乌拉圭的民主也是巩固的。民主议会就职一年后的第二天，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终止了“海军俱乐部协定”，从而也结束了在法律上对民主政府政策自主权的束缚。而1985年到1989年，民主政府事实上的局限（源自于军队对侵犯人权审判的拒绝），显然也算是严重的束缚。然而，不论好坏，1989年有关特赦令的公民复决，至少在议程上排除了这个障碍。由此，议会可审查军队预算，任命一位平民国防部长（但力量相当微弱），且总统有权自由选择三军总司令。但毫无疑问，乌拉圭仍存在特定的文武关系问题。乌拉圭总统、议会，甚至国防部长，都不曾认真分析过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军队。同时，对胡戈·梅迪纳的访谈也显示出，对人权的看法，平民和军队之间仍存在严重的分歧。其他事例，如1993年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包围智利军事情报局在乌拉圭的避难所，从而引发了混乱和冲突……这导致我们认为，1993—1994年，乌拉圭的文武关系状况仍未达到理想水平。

尽管如此，既然乌拉圭实现了整体上的权力平衡，军方也就不再成为民主巩固的威胁了。就这一点而言，需要提到的是，1982年冈萨雷斯接任西班牙总理时，西班牙的文武关系同样处于很糟的状态。这与乌拉圭相似，但在文武关系相对混乱的情况下，西班牙依然走向巩固的民主。并且，之后的十年中，在梅迪纳有力的领导和策略下，文武关系的状况不断地得到改善。乌拉圭是否有相应的领导能力和策略以及必需的国库财力，来完成这项新的工程，这至今仍是一个疑问。然而，无论如何，1992年的乌拉圭，正如1982年的西班牙，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开端。

最后，对民主的支持态度是否与乌拉圭巩固民主的愿望一致呢？如果我们分别比较在乌拉圭和三个南欧巩固的民主国家中公民对民主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在巩固民主的态度层面，所有四个国家都是相似的。（表10.1）

161 这些数据表明了乌拉圭总体上对民主高度支持的普遍态度。然而，既然我们的分析涉及民主的巩固，我们就必须更加严密地分解和检验这些态度。如果存在某些群体，立场既不左也不右，也不属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若是他们对民主仍然持不支持的态度，就会成为民主巩固中的障碍。然而在乌拉圭，正

^① 然而，军方指出，没有迹象显示军方积极地涉入其中。当然，我们最终的评价将不得不等到我们能够确定，如果罪犯被审判或判决有罪，军方能否完全配合调查，并且支持法庭决议。

如表 10.2 显示,整个国家与政治领域对民主体制的支持都相当坚定和一致。

表 10.1 乌拉圭与南欧三个民主巩固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对民主政治的支持态度之比较

政治意见偏好	回答者的百分率			
	乌拉圭 (1991)	西班牙 (1985)	葡萄牙 (1985)	希腊 (1985)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73	70	61	87
“某些情况下,非民主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更好”	10	10	9	5
“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民主政权与非民主政权是一样的”	8	9	7	6
不知道或未作答	9	11	23	2

资料来源:关于乌拉圭的数据来自 Equipos, Consultores Asociados, Montevideo. 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数据来自 Leonardo Morlino 和 José Ramón Montero,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 载于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Jürgen Puhle 编: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6。

表 10.2 乌拉圭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按照地理区域和回答者的意识形态自我认同)(1991年12月)

政治意见偏好	按照地区的回答者百分率				按照意识形态自我认同的回答者百分率					
	蒙得维的亚 (1988)	蒙得维的亚	城市	全国	左翼	中左	中间	中右	右翼	未界定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79	78	69	73	74	81	80	75	69	57
“某些情况下,非民主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更好”	9	10	10	10	11	11	11	10	11	6
“对像我这样的人而言,民主政权与非民主政权是一样的”	6	6	9	8	8	4	6	11	9	10
不知道或未作答	6	6	12	9	7	4	3	4	11	27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Equipos, Consultores Asociados, Montevideo。

让我们转到最后一个政治概念,即乌拉圭的案例引出的——巩固民主的质量问题。显然,世界范围内,巩固的民主涉及三种迥异的逻辑可能性:(1)可

能提高公正、参与和支持的程度；(2)也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比如，高度的社会冲突和下层阶级的长期存在)，这或许会伤及民主的质量，但不会导致民主的崩溃；(3)某个巩固的民主也可能伴随着一系列它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最终催生半忠诚和不忠诚行为在数量和质量上走上新层面，从而导致政权逐步不稳定，最终走向民主的崩溃。在1978年有关民主政权崩溃的讨论中，林茨指出：“归根结底，崩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始于政府的无能，以至于出现问题时，只能以不忠诚的反对党的粉墨登场而告终。”^①

162 虽然我们认为乌拉圭的民主将走向巩固，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我们对乌拉圭民主的评价添加了“风险倾向”的限定。^② 如果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解决当前的关键问题，那么就可能存在某种风险，即重要的政治行为者(最高行政长官、政党、决策者或是社会运动)，可能会着手提出反体制的解决方案。这样，半忠诚和不忠诚行为的质量和数量就会随之增长。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要考察的知识和政治范畴更多地与“民主的崩溃”文献相关，而与“转型”文献没有较多关联。^③

在1995年，乌拉圭政治体制的风险倾向结构的三个要素是：已被察觉的效力危机；不断增长的理解和领悟，领悟到效力危机直接与特定的制度安排相关，而特定的制度安排则是乌拉圭民主竞争中长期存在的特质；军队：军队虽说不反对民主，但乌拉圭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在更安全的基础上，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把军队重组并纳入政治体系。其中，第三个要素更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在乌拉圭的风险性结构中，它能够潜在地与其他两个要素相互作用，给民主制度带来不利影响。

尽管在1980年，乌拉圭拥有人均收入282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于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四个国家中最高的识字率(94%)，以及极可能拉丁美洲最高的收入分配，但从50年代中期起，一直处于相对衰落的状态。^④ 一个经充

^① Linz 和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p. 50.

^② 在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 161 中，冈萨雷斯使用“risk-prone”来描述乌拉圭的民主。我们认为他的观点令人信服，并且，此概念也值得纳入对民主巩固的一般性学术分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希腊的民主政治卷入巴尔干各国的政治纠纷中，使希腊在90年代中期比80年代中期更具风险倾向。

^③ 当然，某些类型的转型直接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然而即使民主已得到巩固，仍可能存在风险倾向的特征。

^④ 有关数据对比的探讨，参见 González,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p. 2-4.

分证明的经验模式是，人们通常认为，民主政治体制比其经济体制更为合理，不论经济体制是否以市场为导向。^① 同样，即便公民对民主制解决他们经济问题的能力(效力)的信心不断降低，他们对民主“适当性”(或合法性)的信心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增长，西班牙在1976—1982年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将此称为区分合法性和效力。在西班牙，政变失败的危险年份(1981年)里有一个短暂时期，81%的人口相信，对他们这样的国家而言，民主制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只有43%的人感到民主制并没使西班牙人面临的问题得以解决。到1973年，西班牙这个合法性和效力之间38%的指标差就已降到了24%。^② 然而，在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1988年合法性和效力指标之间的差距为41%。在1990年，这个差距已增长到43%。而且，1988年12月，蒙得维的亚的被调查者中，只有13%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不断向前发展，却有31%的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衰落。三年后，上面这些数据分别进一步恶化到9%和39%。^③

163

仅就效力—合法性长期存在着差距而言，乌拉圭的民主存在着风险倾向。然而，要是人们发觉正是乌拉圭民主制度本身促成了政策无效，民主结构就会走向进一步的风险。正如我们在第五章论证的那样，当提出非民主的选择作为解决方案时，当现存的民主制度被视作导致经济问题的诱因时，民主制的经济问题就会变得特别尖锐。在乌拉圭，目前尚未提出非民主的解决方案，直到最近，对民主体制也只有相对较少的批评，因为政治家们为国家发展停滞而责备自己，并归咎于国际体系。但这种情况可能会转变。

在黄金时代(1918—1956)，乌拉圭实行两党制，总统产生于主导政党，并赢得双重的多数支持——选民的多数和立法机关中的多数。这种政党制度类似于民主国家(如美国)的总统制，很少出现分裂和两极化的情况。长期以来，乌拉圭特殊的选举制度(以同步双投而著称)，允许各个党派推举多个候选人竞选总统职位，并且，所有候选人(不论极左还是极右)获得的选票，都累积于其党派名下。^④ 到50年代末为止，这个选举体系一直没有出现重大问题。然而，从1960年起，乌拉圭的党派个数、政党内部的小派系数目以及各个政党的

① 对此的分析参见 Juan J. Linz,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 载于 Mattei Dogan 编: *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 Strains on Legitimacy* (Boulder, Colo.: West View Press, 1998), pp. 65—113.

② 参见第六章对此的讨论。

③ Equipos, *Informe de Coyuntura*, June 1990, and Equipos, December 1991.

④ 参见 Oscar A. Bottinelli, "El sistema electoral uruguayo: descripción y análisis", *Peitho*, Documentos de Trabajo, no. 83, 1991.

164 总统候选人数都显著增加。^①而且,由于获胜政党的内部往往分为2—4个小派系,因此总统当选时,得到的大众投票通常不超过25%。同样,由于内部分化,立法机关中,总统也仅能获得不到四分之一的成员的支持。在这种政党制度背景下,要制定出连贯的、为多数人认可的政策来改变乌拉圭萧条的现状,是极其困难的。如今在乌拉圭,那些最出色的分析家和政治家正努力证明,事实上,正是政党分化、选举制度和总统制共同造成了乌拉圭立法上的僵局和政策不能长存的状态。^②从博弈论的视角,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制度,唯一能改变它们的力量是议会和政党领导人,而他们却正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因此,制度改革很难得到多数的支持,除非他们清楚地觉察到危机的存在。不论怎样,如果人们日益认为,是乌拉圭政治体系内的制度安排恶化了乌拉圭的萧条,那么,对民主体制本身的指责就会越来越多。乌拉圭选择保留军人统治前的宪法和选举制度(尽管它们促使了之前的民主崩溃),这就意味着错失了独裁时期后宪法和制度创新的机会。

至此,我们开始探讨乌拉圭风险倾向结构中的第三个要素:军队。我们早已指出,乌拉圭军方已经放弃非民主特权,目前似乎也不可能成为其他非民主集团的合作伙伴。然而,乌拉圭长期的经济停滞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从而使文武关系恶化。从1985年起,乌拉圭军方处于双重的危机之中——关乎其使命的“存在危机”和预算大量削减引起的资源危机。^③民主政府削减了军费,但不同于西班牙,他们还没有着手重新考虑军队的组织、使命和部队结构问题,也没有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把军队纳入民主国家

① 有关此类问题的经典著作:Giacomo Sani 和 Giovanni Sartori, “Polarization, Fragmentation and Competition”, 载于 Hans Daalder 和 Peter Mair 编: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Sage, 1983), pp. 307—340。冈萨雷斯重述了部分他们的分析来表明,从1954年到1984年,乌拉圭发生了转变,比较而言,政党分裂程度几乎从最低发展到最高。参见 González,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p. 85—112。

② 乌拉圭各种政治论坛中, Juan Rial 和 Luiz Eduardo González 日益倾向于此种观点。他们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参见 González,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Democracy in Uruguay*, pp. 161—164, 和 Juan Rial, “Reforma constitucional: Invitación a una discusión necesaria”, 1991年11月给年轻乌拉圭政治家的一篇演讲。红党的主要领导人乔治·巴特尔(Jorge Batlle), 在1990年7月的公开演讲中,对“乌拉圭统治集团”(他称其为“Uruguayan nomenklatura”)进行自我批评时,指出“政府不是在多数基础上产生,正是由我们的选举制度所造成的。这不仅给政府制造了难题,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种体制使每个人都失去了责任心”。

③ 对此精彩的分析(尤其对存在的危机),参见 Carina Perelli, “El nuevo ethos militar en America Latina: Las crisis existenciale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de la región en los 90”, *Peitho*, Documentos de Trabajo, no. 80, 1991。

共同体。这种情形如果得不到改变,可能会使乌拉圭的民主更具风险性,一旦政治家间的不忠诚和半忠诚行为浮出水面,军队就会迅速找到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在1980—1995年间是不存在的。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并不存在此种半忠诚和不忠诚的行为,并且,眼下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引发“政变”的可靠联盟。^①而这种反民主的行为,以及这几种促使崩溃的力量的相互作用,正是未来民主遇到无法解决的危机时可能的后果。^②同样要强调的是,乌拉圭民主的制度、实践和价值,遏制了奥唐奈所谓“委托式民主”的并发症,这种“病症”困扰了很多总统制国家,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案例中,我们将对其展开讨论。^③然而,如果民主政治家不能或者不去重新调整乌拉圭体制的风险性结构,正如历史上大多数民主崩溃的案例,他们或许就成了此种后果的直接促成者。

165

①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正好相反。随着1994年阿根廷、甚至巴西经济的蓬勃发展,也随着政府能够在MERCOSUR(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拉圭新的共同市场)中就对乌拉圭更有利的项目进行协商,从1988年起,乌拉圭民众对将来的信心前所未有地出现显著好转。根据Equipos 1990年8月的民意测验,全国普查中,66%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经济状况“糟糕”或“很糟糕”。而在1994年10月,这个比例降到40%。除此之外,1992年8月,总统支持率跌到历史最低点——11%,而1994年10月就升到29%。甚至,与1992—1993年的政治预言相反,我们看到,执政的红党在199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几乎取得了胜利。上述及其他一些Equipos民意测验,发表于1994年10月24日的*El Observador*。

② 1994年11月选举后,许多政党领导人表示关注,随着乌拉圭向三党体系转变,传统的两党制作为支撑政府的基础可能会更加不牢固。在努力克服治理难题的过程中,所有立法机关中有代表的党派一致同意展开有关选举和社会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的商讨。参见“Uruguay: Congress Seeks to Update its Image”,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Southern Cone Report* (April 20, 1995): p. 7。

③ 有关乌拉圭民主积极方面的讨论,参见Juan J.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载于Juan J. Linz和Arturo Valenzuela编: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37, 和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 1 (January 1994): pp. 55—69, 尤其是p. 64。

第十一章 效力、合法性危机和民主国家的出场：巴西

在本书中，我们对南欧和南美的七个国家加以分析，其中，巴西民主的巩固经历了最多的磨难。巴西与其他六个国家前政体类型相同，都是威权主义政体，因此并不能以此解释产生差异性的原因。与西班牙和许多东欧国家不同，巴西不存在显著的“国家性”问题，因此这个变量也不能用来解释其民主巩固中的危机。^① 巴西与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共同承担着国际债务危机的沉重后果，然而，尽管其总债务的数额最大，超过世界上除美国外的任何国家，但贯穿 80 年代，其人均债务实际上少于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危机直到 90 年代初才得以缓解。^② 巴西的转型始于层层控制的军人政体，这无疑给民主进程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对此我们也将进行评价。巴西并不像智利那么受军方束缚，然而我们却看到，智利反而没有遭遇如此多重的国家危机。

巴西比较突出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政治经济合法性变量。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所有的南欧和南美国家甚或中欧国家里，巴西的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社会福利和教育水平最差，这显然不能对民主的巩固有所帮助。^③

① 然而事实是，在持续的国家财政（和政治）危机中，从 1992 年到 1993 年，巴西北部和西部发生了相当多的社会运动，要求对一些州再次进行划分以成立新的州，并且在发展相对同步、以白人为主的南里奥格兰德州、圣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出现了种族主义色彩浓烈的分离运动。Aspásia Alcântara 博士即将问世的著作中，将对巴西联邦主义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论。

② 如，参见世界银行 1980 年代的经常性出版物 *World Bank Debt Table*。

③ 比如，世界银行存有 41 个国家收入分配的数据。这其中，巴西最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排在前十位，而最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却排在 20 个最穷困国家人口中。参见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World Bank, 1990), pp. 236—237。也参见 Bolivar Lamounier, “Brazil: Inequality against Democracy”, 载于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和 Seymour Martin Lipset 编: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Areas: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9), pp. 111—158。

此外,本书中我们分析的四个南美国家中,巴西历史上的政党结构体系最为薄弱。在此背景下,1985年到1993年之间,巴西推出七个不同的改革方案,但由于政治社会无法构建巩固的政策同盟,这些方案均以失败告终,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①正如我们之后要考察的某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这种政治无效侵蚀着民主政体的各个基本层面。在巴西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宪政和法治的力量,不仅从未强大过,而且进一步萎缩了。长期的经济危机削弱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道德能力,使其难以发挥社会整合作用,不能向公民提供基本的服务。政治社会制度之中自主权和价值越来越贫乏。随着政府撤出,政治社会无法对任何政策方案提供持续的支持,社会变得更加紊乱,公民的价值也由此日渐衰微了。

我们对巴西的分析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将在比较的场景下,简要探讨巴西的初始转型。第二部分,我们将以文献证明,巴西高级军官如何对首届民主政府施加了严重的束缚。第三部分,我们将探究政治经济合法性危机的本质所在。第四部分,我们将证明,上述政治经济合法性危机是如何滋生了对民主某种程度的矛盾心理,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南欧和南美国家中都没有出现过。第五部分,我们将探究长期的危机在公民权、国家以及政体方面产生的那些更加隐晦和困难的问题,并分析某些必要和可能的改革。第六部分,我们将简要评估,巴西民众面对1993年的灾难深渊,如何在1994年修订并拥护了更有前途的改革计划来解决巴西的多重危机。

长期的受限的转型

巴西从威权主义的转型开始于1974年3月15日埃内斯托·盖泽尔将军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其统治基础上,盖泽尔和他最亲密的政治顾问,戈尔贝格·

^① 路易斯·卡洛斯·布莱瑟·佩雷拉(Lo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巴西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前财政部长,指出这些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缺乏稳定”,这也是他在1993年2月16—17日于伦敦大学拉美研究会召开的“巴西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会议上的主要发言内容。他认为虽然一些改革计划没有考虑到巴西的“惯性膨胀”,存在技术性的缺陷,但所有改革计划,甚至那些不存在技术问题的计划,都由于遭遇难题时无法维系其政治支持而致中途夭折。第八个,也是更为成功的改革计划(the Plan Real),在比前几个计划都广泛的政治支持协商基础上,于1994年7月1日推行,参见 Albert Fishlow, “The State of Economics in Brazil and Latin America: Is the Past Prologue to the Future?”载于 Alfred Stepan 编: *Americas: New Interpretive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8—79。我们将在这一章的末尾讨论这个计划(the Plan Real)。

168 多·科托·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 e Silva)将军,开始了其在市民社会寻找同盟者的复杂进程,试图压制安全共同体不断增长的自主性,因为在他们看来,安全共同体的自主性对军队相当危险,并且也是不必要的——既然所有左翼的游击队运动已经被摧毁。他们开始放宽对自由化的控制,但不久就转入斯泰潘分析为“政权让步和社会征服”的长期动态进程。^①直到1990年3月15日直选总统费尔南多·科洛(Fernando Collor)就任,巴西的民主转型才彻底结束。这16年的转型过程,几乎是葡萄牙转型历时(我们列举的南欧国家中,葡萄牙是转型历时最长的国家)的两倍。当我们考虑到1964年3月31日巴西才开始成为威权主义政体,其长期的转型历程似乎就蒙上了更多的戏剧色彩。

巴西不寻常的转型历程以及军方的“开放(*abertura*)”比其“封闭”多出六年的事实,似乎都直接表明,事实上,尽管威权主义政体从未完全地制度化,但在军队组织严密的等级控制下,军方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民主转型的步伐,并为其放弃政权索取较高的报酬。^②

1984年2—6月,巴西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直接选举(*Diretas Já*)运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力量要求直接选举。事实上,市民社会中的主要团体,包括商业团体在内,均未明确表示反对直接选举。^③然而,军方坚持间接选举,并且从1964年就已经开始酝酿,到1985年,首届文职政府最终由间接选举产生,但糟糕的是,间接选出并且深得人心的坦克雷多·内维斯(Tancredo Neves)尚未就任就去世了。于是折衷由前政府政党领袖、副总统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担任之后五年的总统,可

① 有关为什么盖泽尔和戈尔贝格发起此进程的访谈,参见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0—44。有关市民社会内部的最终推动军方的自由化计划走向民主化的征服的动力,参见 Alfred Stepan, “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载于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 Theda Skocpol 编: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1—343。

② 参见 Alfred Stepan 编: *Democratizing Brazil: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其中包括巴西两个主要理论家和政党领导人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和 Francisco Weffort 有关巴西转型的文章; Ralph della Cava, Margaret E. Crahan 和 Scott Mainwaring 有关市民社会的抵制的文章; Bolívar Lamounier 和 Maria do Carmo Campello de Souza 有关政治体制演进的文章。

③ 参见 *Veja* (January 16, 1985)。也参见 Alfred Stepan, “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载于 Evans, Rueschemeyer 和 Skocpol 编: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pp. 331—343。

到 1988 年,3/4 的巴西人民都希望缩短他的总统任期。^① 之前军人政权强加的限制条件,不仅影响了新的文职政府的产生,也影响其运作。对一系列关键的政策问题,文职政府充其量不过与军方共同分享统治权。第一任文职总统萨尔内任职期间(1985—1990),共有 6 位军人担任内阁部长。大多数时候,军方可以单方面决定是否派遣部队镇压罢工,现役军官仍继续控制着国家情报局,巴西引起争议的核计划从未在国会中讨论过,对土地改革中边界的划定,军方也发挥着主导作用。^②

军方对制宪会议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我们的界定中,巴西宪法被归为“在高度限制的条件下制定,反映非民主的制度和势力的实际力量”一类。军方苦心经营,恩威并施,成功地削减、缓和或扰乱了大多数提交表决的宪法条款,而这些条款,本可能会削弱军队的自治权。^③ 军方参与宪法的最戏剧性的例子,是他们与总统一同筹划在拉美率先进行议会制的实验,更确切说是“半总统制”,走类似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道路。制宪会议成员对更加趋于议会形式的政府是这样支持,以至于最初他们起草并通过的 77 个条款,均传达出政府的基本形式是议会制而非总统制的设想。第七十八条则明确确立了巴西的议会政治制度。然而,对其进行决定性表决时,军方挽回并扭转了原有的权力平衡。萨尔内,作为间接选出的总统,不希望其任期或是权力受到限制。军队也不愿意服从缺乏信任的议会表决,而希望保持与总统的平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势力联合起来。萨尔内总统和军方着手进行强有力的反击,“猪肉桶政治(pork-barrel)”(为争取选票而在地方项目投资的“贿赂”)和威胁并用,于是,在制宪会议最后一刻的表决中,总统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④

宪政、政治和经济的脆弱性的复合

在 1990 年代,得到军方支持的总统权力的行使,一方面加剧了巴西宪法、

① 有关 Sarney 缺乏支持的资料,参见 Bolívar Lamounier 和 Alexandre H. Marques, “A democracia brasileira no final da ‘década perdida’”,载于 Bolívar Lamounier 编: *Ouvindo o Brasil: Uma Análise da Opinião Pública Brasileira Hoje* (São Paulo: Editora Sumaré, 1992), p. 143。

② 更为详尽的资料参见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103—114。

③ 参见 Eliézer Rizzo de Oliveira, “O papel das forças armadas na nova constituição e no futuro da democracia no Brasil”, *Vozes* 82, no. 2 (July-Dec. 1988): pp. 21—27。

④ 上述讨论基于 1989 年 12 月斯泰潘在巴西利亚的广泛访问调查。

170 政治和经济的脆弱,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巩固巴西的民主。事实上,制宪会议的成员们并未改变最初的 77 个条款。因而,1988 年宪法更符合议会制宪法的特征,即立法机关的权力显著增强,以至于总统只能颁布法令,而在其他方面,尤其是预算领域,离开立法机关的支持,其统治没有任何效力。^① 然而,在总统制和电视民主的推动下,科洛总统颠覆了传统政治和政党政治家的典型,在一个议会中只控制 5% 的席位的政党的支持下,开始了其总统任职。

科洛在总统任期中,首先推出的主要政策——稳定政策(也就是“科洛计划”),很快显示出薄弱的议会基础对民主巩固的威胁。这显然与西班牙相反,西班牙的稳定协议,也就是“蒙科洛协议”,是政党经过复杂商讨后的结果,并得到了议会的正式批准。而在巴西,科洛总统的计划通过电视宣布,事先根本没有征求政党和议会的意见,全国为此震惊。从此,政策僵局和总统胁迫的危险博弈拉开序幕。^② 两个关键的“临时法令”立刻被法院指作是“违反宪法的”,并被撤销。然而总统向议会扬言,他将动员大众来支持他的计划。他宣称,“毫无疑问,我与可怜的大众有着亲密而深厚的关系”。他还警告议会,“必须尊重我,因为我是权力的核心”^③。甚至颇有影响力的前财政部长,一贯保守的参议员罗伯托·冈波斯(Roberto Campos),作为科洛总统最强大的支持者之一,也惋惜地指出,“这是司法上的滥杀,使大众对科洛计划丧失信心”^④。

不同于秘鲁的滕森总统,科洛总统无意尝试“自发政变”(自我政变),但在其总统任期内,差不多不到一半的时间中,他孤立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外,这就导致他试验了两个不同的强有力的稳定计划并都遭到失败。^⑤ 而他

① 某个重要的经济学者(1995 年成为巴西的计划部长)对此所作的分析,参见 José Serra, “A constituição e o gasto público”, *Planejamento e Políticas Públicas* no. 1 (June 1989): pp. 93–106.

② 对西班牙和巴西政治中政策计划的先导性比较说明,参见 L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 José María Maravall 和 Adam Przeworski,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A Social Democratic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Brazil*, May 3, 1990, 6。显然,这正是 Guillermo O'Donnell 在其对“委托民主”的巧妙分析中论述的类型,参见“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 1 (Jan., 1994): pp. 55–69。

④ 参见“Mounting Criticism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Novo Brasil Pla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Brazil*, June 7, 1990, pp. 1–3。冈波斯的话在 p. 2。

⑤ 参见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Os tempos heróicos de Collor: Aventuras da modernidade e desventuras da ortodoxia* (São Paulo: Nobel, 1991)。

本人也陷入贪污丑闻中。^① 在任何一个民主体制下，都常常存在“政府危机”的风险。到 1992 年 7 月，巴西面临着尖锐的政府危机。民主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危机必须在转化为体制危机之前得到迅速合理的解决，以重组新的政治联盟，尽力尝试把政策效力和民主的合法性重新结合起来。在最高执政官非直接选举的议会体制下，由于科洛的党派仅控制议会中不到 5% 的选票，他不能像通常那样被选为议会首相。尽管一开始大多数人积极地拥护他，然而面对 1992 年中期的政府危机，毫无疑问，那些至少暂时能赢得大多数的人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他的地位。巴西的总统体制下，唯一能组成新政府的途径，就是对科洛总统提出弹劾，而从一开始，所有主要政治参与者都以为这个过程将会极其困难和危险。^② 宪法危机导致了一种形势，其中主要的政治家们对那些危险的先例毫不在意，轻率地提前对议会政体进行全民公决，那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稍占主导的公众舆论希望总统引咎辞职，而总统本人却坚持要完成他的“使命”。^③ 虽然军方不应为这一事态的出现直接负责，但若没有他们对否决制宪会议的议会制计划的关键性支持，1990—1994 年的总统任期内，巴西民主的巩固本不会遭遇如此激烈的“立法—行政”冲突。值得庆幸的是，面临此种危机，巴西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重新结集了力量，成功地完成了 20 世纪南美洲的第一次弹劾。然而弱勢的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 (Itamar Franco)，由代总统最终成为总统，一开始时也是像科洛总统那样，无法推行连贯的经济政策。

① 有关科洛总统任期中贪污的广度和深度，最详尽的资料是长达 371 页的巴西国会汇报，Congresso Nacional, “Relatório Final da Comissão Mista de Inquérito”(August 1992)。对此报告的分析，参见 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 “O Relatório da CPI: Um Retrato do Brasil”, *Novos Estudos CEBRAP*, no. 34 (Nov. 1992): pp. 3—7。也可参见 James Brooke 的封面文章，“Looting Brazi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8, 1992, pp. 30—33, 42—45, 70—71。

② 1988 年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六条中规定，总统免职需要众议院中 2/3 的表决同意，之后是参议院(政治指控)或最高法院(刑事指控)的审议。弹劾程序更为复杂，事实上，履行立法机构的审议立项、清楚说明程序目前尚未通过(第八十五条)。

③ 1989 年总统选举中，科洛总统的支持大多来自他抵制腐败的誓言。到 1992 年 7 月，民意测验中，只有 19% 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其贪污的罪名的指控是冤枉的，而 71% 的人认为他不会被定罪。然而，47% 的人希望他随法律程序的进展，提出辞职，或是暂时离开总统职位。参见 *Folha de São Paulo*, June 25, 1992, 1。有关 Collor 辞职的军方及政治呼吁，参见 James Brooke, “Brazil’s President Damaged by Corruption Inquiry”,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92, A—9。

对民主的矛盾态度

在此既定的场景下,若是巴西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或乌拉圭这些巩固的民主国家一样,大众对民主持强烈拥护的态度,倒令人惊奇。事实上,在科洛总统任职两周年前夕,也就是上面讨论的贪污和弹劾危机发生两个月前,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与我们已探讨的四个民主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乌拉圭)相比,巴西民众对民主更明显地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见表 11.1)。

172

表 11.1 巴西与四个民主巩固国家(乌拉圭、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对民主政治支持态度的比较

政 体 偏 好	回答者的百分率				
	巴西 (1992)	乌拉圭 (1991)	西班牙 (1985)	葡萄牙 (1985)	希腊 (1985)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42	73	70	61	87
“某些情况下,非民主政府比民主政府更好”	22	10	10	9	5
“对像我这样的人,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是一样的”	24	8	9	7	6
不知道或未作答	12	9	11	23	2

资料来源:关于乌拉圭的数据来源与表 10.1 相同。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数据来源与表 8.2 相同。关于巴西的数据出自“*Avaliação do Governo Collor apos dois años de mandato*”, *Data folha* (São Paulo; Feb. 1992)。

1992 年的这些调查结果如此严峻,以至于我们详细列出了巴西有关此类问题的全部民意测验,来考察 1992 年 3 月的调查结果是否异常,或是否仅是某个更为持久的态度的一个缩影。幸运的是,关于我们这项研究,1988—1992 年期间,巴西有四个不同的组织分别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针对不甚相同的抽样人群,就同类的问题进行了六次问卷调查。对巴西政治而言不幸的是,在每一次单独调查中,针对三个核心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巴西的得分都低于西班牙、乌拉圭、葡萄牙以及希腊(见表 11.2)。

1986—1992 年期间,在 1989 年 12 月,紧随巴西 29 年来第一次总统直接

选举之后,民众对民主的支持达到最高点。^①然而,到1991年和1992年,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却降到新的低点。表11.1和11.2的调查结果十分清晰,即便仅凭借这些,也能判断出巴西的民主距离巩固还相差甚远。我们已指出,对民主的支持必须通过与其他研究对象的比较来评定。在乌拉圭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效力—合法性之间存在某种分歧。然而,此种分歧在乌拉圭并不会给民主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政党填补了大部分的政治空间,而且军方也不被视作是可替代的选择。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桑吉内蒂总统的民主政府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与军人政府相比,桑吉内蒂政府在全七个政策领域都更有效率。相对而言,巴西的情形就相当危险。效能和合法性均十分低下,民众中相当大的比例认为军人政府比文人政府更有效力。在1989年,5/7的民众认为1964—1985年军人政体下的状况,比在民主的文人政府前四年的统治之下要好(见表11.3)。

173

表 11.2 · 1988—1992 年巴西对民主政治态度的转变

政 体 偏 好	回答者的百分率					
	1988年 12月	1989年 9月	1989年 12月	1990年 3月	1991年 4月	1992年 4月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43	43	55	56	39	42
“某些情况下,非民主政府比民主政府更好”	21	18	15	17	17	22
“对像我这样的人,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是一样的”	26	22	16	17	28	24
不知道或未作答	10	17	14	10	14	12
样本类型	800 圣保罗	2083 全国	2510 全国	2480 全国	3650 全国	2500 全国
调查组织者	IDESP CEDEC CEDEC CEDEC IBOPE Datafolha					

资料来源:1988年12月的调查由 IDESP 的两位研究人员组织并发表在 Judith Muszynski 和 Antonio Manuel Teixeira Mendes, “Democratização e opinião pública no Brasil”, 载于 Bolívar Lamounier 编: *De Geisel a Collor O balanço da transição* (São Paulo: Editora Sumaré, 1990), pp. 61—80, 尤其是 p. 70。1989年9月、12月和1990年3月的数据出自一项由 CEDEC 的 José Alvaro Moises 组织的关于政治文化的多年研究项目,并将发表于一本即将出版的著作中。1991年4月的结果是由 IBOPE, 巴西最大的商业民意调查组织通过电话访问获得的。这一结果发表于 Bolívar Lamounier 所编的 *Ouvindo*

① 对选举中的参与增加如何提升对民主的支持这一问题的分析,参见 José Alvaro Moises 前瞻性的著作: *Cultura Política* 以及 “Democratization and Mass Political Culture in Brazil”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March 1992, 未发表手稿)。

o Brasil: Uma análise da opinião pública brasileira hoje (São Paulo: Editora Sumaré, 1992), pp. 137-158, 尤其是 pp. 150-151。1992年4月的调查是由 Datafolha, Folha da São Paulo 报社的一个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

174

表 11.3 巴西公民对不同时期政府绩效(1964—1985年军人政权期间和文官领导的民主政府最初四年)的满意度

评价项目	回答者的百分率			
	军人政权时期较好	新共和国时期较好	两者相同	不知道或未作答
总体状况	46	17	28	9
经济状况	52	13	26	9
通货膨胀	56	14	21	9
外部债务	37	18	30	15
腐败	35	18	32	15
政治自由	19	48	18	15
表达自由	16	50	17	17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Ibope (April 1989), N=2750, national poll。引自 Bolívar Lamounier 和 Alexandre H. Marques, “A democracia brasileira no final da ‘década perdida,’” 载于 Bolívar Lamounier 编: *Ouvindo o Brasil: Uma análise da opinião pública brasileira hoje* (São Paulo: Editora Sumaré, 1992), p. 149。

然而,对之前军人政府统治评价较高并不是最危险的因素,更危险的是未来偏好的问题。巴西民众中,相当大的比例坚持认为军人政府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自选,这与乌拉圭甚至阿根廷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1988年12月对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新民主的比较研究中,被调查人群中只有6%的蒙得维的亚居民和15%的阿根廷人认为军人政府的复辟会使状况好转,而圣保罗居民中却有40%的人抱此种想法。^①一年之后的全国调查中,对“如果军方重新掌权,国家状况将会好转”的表述,38%的人表示赞成,仅有45%的人表示不同意。^②

为什么这么多的巴西人对民主感到矛盾? 一个可能的假设是,这个国家

① 参见 Judith Muszynski 和 Anoto Manuel Teixeira Mendes, “Democratização e opinião pública no Brasil”, 载于 Bolívar Lamounier 编: *De Geisel a Collor: O balanço da transição* (São Paulo: Editora Sumaré, 1990), p. 71。

② 在 *Cultura Política*, no. 1 (Sept. 1989) 中,对此次测验进行了讨论。

维持着或许是最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最贫困的公民会以为,缺乏效力的政府和长期严峻的政治状况意味着,民主体制对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会发生什么积极影响。事实上,如果依据被调查者对其自身状况的关心程度,来分别分析这三个关于支持民主的经典问题之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情况。对于三个问题中的其中两个,最贫困的公民的确对民主体制支持最少,然而,对于另一个关键问题——“在某种情况下,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好”,他们却对民主体制表现出最多的支持。总体的情景表明,在满是不平等的巴西,各个群体对民主的支持都相对不高(见表 11.4)。

表 11.4 收入高低与民主偏好的相关性:巴西

175

政 体 偏 好	回答者的百分率				
	整体样本	收入多于 生活所需	收入恰好应 付生活所需	收入不足	收入很少, 生活困顿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42	52	49	49	35
“某些情况下,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好”	22	26	24	23	21
“对像我这样的人,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是一样的”	24	16	23	21	27
不知道或未作答	12	7	5	7	16
样本数目	2500	55	11	864	1247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Datafolha*, Brazilian National Survey, February 1992。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巴西民众对民主的矛盾心理时,发现在关于巩固的民主的三个场域——法治、可资利用的政府和强大的政治社会(我们在第一章已讨论过)方面,我们面对的是纷杂的信息。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乌拉圭,这三个场域毫无疑问体现着巩固的民主,因此对这几个国家,我们没有投入过多的笔墨。而巴西,则需要我们就民主的这些层面展开详尽的探讨。

民主与其说是一个规范的乌托邦,不如说是一个调解冲突的安排协议。国家自身必须尊重法律并作为公民解决纠纷时可供利用的资源而存在。对国家而言(在民主政府的管理下和民主制度的塑造下),要完成其调解冲突和整合社会的任务。第一,在整个领土范围内,国家必须是制度上规范地存在的实体。第二,在政治体制中,国家必须被视作是一个相对公平和实用的解决冲突

的工具。我们所处的时代,各个领域都回响着弱化国家角色的呼声。而民主的标准承诺则是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如果市民社会的某个群体,凭借其优越的经济资源和压制手段而拒绝承认市民社会中其他群体应享的权利,那么,如果民主的确是调解冲突和保证公民权利的工具,国家就必须现实而有效地存在。正是在此基本意义上,公民权和民主体制预先已假定国家规范化和制度上的存在。现代公民权和现代民主,需要一个现实国家。秘鲁这个国家,甚至在滕森总统的自动政变(auto-coup)前,就已严重萎缩,以至于公民权和民主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同样,在国家规范化和制度化存在层面,巴西也是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国家。数次研究表明,巴西民众中,压倒性的多数表示不相信国家有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尝试,甚至民众认为司法系统的存在根本是为了保护那些有权力的人,警察是不可信的(见表 11.5)。

176

表 11.5 关于司法体系与警察的公正性的评估:巴西(1989 年)

观点	回答者的百分率			
	完全同意	部分同意	部分反对	完全反对
“巴西的司法体系仅仅服务于有权势者”	58	26	7	6
“警察拘捕和杀害无辜人民”	39	39	9	9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 CEPAC-IBOPE 于 1991 年 4 月进行的全国调查,包括 80 个问题,涉及全国 3600 名被调查者。这一结果部分发表于 Rubens Figueredo, “Verdades e mitos sobre a cultura brasileira”, 载于 Lamounier, *Ouvindo o Brasil*, pp. 95—115。1989 年 5 月,圣保罗和平与正义委员会(São Paulo Commission on Peace and Justice)就公民对司法体系、警察机关和国家公正性的认知作了焦点团体分析(focus group analysis)。定性分析的结果有力支持了 CEPAC-IBOPE 的定量发现。参见 *Pesquisa direitos humanos: Primeira fase relatório final* (São Paulo: Comissão Justiça e Paz, Maio, 1989)。

就涉及对于危害贫困人口的乡村暴力的侦察和指控而言,警察系统和法律体系事实上形同虚设。在 1964—1989 年间,1566 人(包括农民工、本地人、一些律师和宗教信徒)死于土地争夺中的纠纷。关于这些血腥事件,仅有 17 人接受审判,8 人被定罪。然而,普通民众仍然缺乏诉诸法律的途径,对此的生动例证是:8 个定罪的案件中,3 个牵涉牧师,3 个涉及律师,另 2 个则有前来为本地居民辩护的国际组织的涉入。^①

在市区,虽然国家以警察机关的形式存在,但以世界民主国家的标准来看,巴西致命性武器的使用率极高。举例来说,衡量致命性武器使用过度与否

^① 参见 Paulo Sérgio Pinheiro, “Democracia, derechos humanos y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Obstáculos y resistencias. El caso de Brasil”, *Núcleo de estudos da violência*, (Dec. 1991): p. 11.

的一个指标,是执行公务发生枪战交火时警方死亡人数和公民死亡人数的比率。1990年,在纽约,交火中公民死亡人数和警察死亡人数之比是7.8:1。而1990年的圣保罗市,这个比率是28:1。在相对贫困的人口居多的圣保罗州,这个比率则接近于40:1。另一个需要探讨的关键指标是伤亡比率,也就是遭遇警民冲突时,受伤的公民与死亡的公民的数目对比。芝加哥1971—1974年,警方击伤人数和击毙人数之比是3:1(共击伤393人,击毙131人)。然而1990年,圣保罗警方执行公务过程中,击伤251人,击毙588人。也就是说,其伤亡比率是芝加哥的7倍。这个伤亡比率显然表明,很多公民或许并非死于与警方的枪战,而是直接由警方处决了。^①

上述指标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巴西许多报道都透露出民众害怕警察,以致在调解冲突时极少寻求警察帮助。我们将看到,这与智利形成强烈对比,在智利,76%的人口,甚至左翼阵营中也有72%的人相信,如果遇到困难,去警察局会得到较好的处理。^②

177

在巴西,国家的财政危机加剧了上述这些问题。例如,由于财政拮据,国家警察学院从1985年起就关闭了,它本来很可能成为新的民主政府进行新研究、社会化和培训的资源。^③

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主题,奥唐奈已进行过基本的观察。他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地图上,如果把民主政府有效存在的区域标为绿色,民主政府不连贯存在的区域标为灰色,民主政府的公共设施、法律和规范几乎不存在的区域

① 对上述及其他一些指标的开创性研究,参见 Paul G. Chevigny, "Police Deadly Forces as Social Control: Jamaica, Brazil and Argentina", *Nucleo de estudos da violência*, (1991) p. 11。Wanderley Guilherme dos Santos 的 "Fronteiras do Estado Mínimo: Indicações sobre o híbrido institucional brasileiro" 一文,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评论和论证,载于 *Razões da desordem* (Rio de Janeiro: Rocco, 1993), pp. 77—116。公共部门在司法领域周期性的失灵,往往引发市民社会对人权捍卫者的警惕心和敌意,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警方无限制的暴力,对此精确且复杂的分析,参见 "Police Violenc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ule of Law", in Teresa Pires di Rio Caldeira, "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ão Paulo"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2), pp. 159—233。

② 智利的相关数据参见 "Estudio social y de opinión pública", 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 Documento de Trabajo, no. 173 (Santiago, Chile, Feb. 1992), p. 65。巴西人对警察的警惕,在一首歌里有所体现,即 Chico Buarque de Holanda 的 "Help! Call the Thief!" ("救命! 快叫小偷!", 而不是 "救命! 快叫警察!")

③ 1992年4月7日,斯泰潘在巴西利亚对司法部长塞利欧·波尔扎(Celio Borja)的访谈。在同一访谈中,当要求波尔扎评论巴西人为什么对司法和警察系统如此疑虑时,他回答道:"他们有疑虑是对的。"但随即遗憾地表示,他确实没有可调度的资金来改善此种状况。

标为白色,那么,对于一个不断巩固的民主制度,这个地图应该越来越绿。遗憾的是,巴西政府的低效力、高腐败,对新自由国家无限制的破坏,以及财政危机,这些结合在一起无不表明,巴西在1985—1993年间,灰色和白色区域比绿色区域得到了更多的扩展。^①

1993年4月下旬,也就是科洛总统遭弹劾下台,新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就职的6个月后,巴西的通货继续以每月近30个百分点的速度膨胀。许多分析家开始质疑,1995年1月新总统就职典礼前,能否发生真正有建设意义的转变?众多政治家和公民表达了共同的担心,即总统选举将会使国家走向分化,并可能产生另一个少数政府。评论家们甚至忧虑,巴西一旦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伊塔马尔·佛朗哥总统提请辞职,就会立刻引发一场政治和宪法危机。^②

这种情况下,巴西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撰写了下面这篇社论,并发表于巴西最著名的周刊之上。

“走向政变”

下面是一组假设,关于这些假设,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在巴西存在某种形式的共识。

1. 国家没有通货。
2. 巴西经济正经历着本世纪最严重的危机,且在之后的两年内没有复苏的希望。尤其在当前的博弈规则下,更是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
3. 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服务危机,使市民不敢外出在街道上行走。
4. 早在十年前,行政权就开始瓦解。
5. 立法机关的权力缺乏威信。

或许我们可以在相当长时期里忍受这些灾难中的一些,甚至可以在较短时期里忍受所有这五个方面,但是,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容忍这一切。

^① Guillermo O'Donnell, "Notes on State, Regime and Crisis—or how I am finding it useful to think about countries that are not moving at all toward a consolidated democratic regime" (为有关“East-South Transformation Project”的一次会议所准备的论文, Toledo, Jan. 1991)。由于行文需要,我们冒昧更改了奥唐奈的某些色彩,但保留了他的基本观察。奥唐奈原作稍加修订的发行版本为“On the State, Democratization and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A Latin American View with Glances at some Post Communist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1 (1993): pp. 1355—1369。

^② 《宪政》(“Carta Política”),巴西最主要的时事通讯之一,在1993年4月5—11日那一期,就佛朗哥总统辞职后谁会继任,展开实地精英调查。在斯泰潘1993年4月的会谈中,一些议员表示,在支持佛朗哥总统辞职之前,宪法界定范围内的下一个继任者——涉嫌腐败的众议院议长,必须被排斥出局。

巴西正处在走向政变的途中。这样的状况不可能持续超过两年的时间。很难说政变将怎样发生。这取决于明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也取决于萧条期的引导政策。概念中或许更类似于1937年拥护总统的政变，而非1964年反对总统的政变。

……要说之所以不存在政变的危险，是因为武装力量已撤出政治舞台，纯属无稽之谈。发动政变的正是民间的肥猫（享有特权、有权有势、出资支持政治运动的人）……我们不是说政变正在进行中，而是说——目前的景况，将使中产阶级和企业家们走向政变。^①

即使没有上面这篇社论，我们也会认为已有足够的迹象证明1993年的巴西远非巩固的民主国家。事实上最后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巴西民主进一步被侵蚀，并切实改善巴西民主的质量。这些问题显然值得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我们仅将此限定于最初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观察，即表1.1中探讨的巩固民主的五个场域：活跃的市民社会、相对自主并受尊重的政治社会、法治、可用的国家官僚体系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那么，巴西的民主算是某种多因素的失败吗？或者在赫希曼的方法论视角下，是否还存在某种机会的可能性？

巴西的民主条件：不断调整的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来解决法治的问题。对现代国家民主控制的理论与实践而言，“问责”（accountability）的概念十分关键。但不幸的是，葡萄牙语中没有表达“问责”的词汇。与其最接近的词为“responsabilidade”，表示若某件事情出现异常失误，主管此事的人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然而，在现代民主实践中，“问责”概念蕴含着更广泛的内涵。这个概念的本意是指，所有财务记录需定期接受审查，且官员应遵循透明的程序使用公共基金，以履行其职责。进而，公共基金出于公益的合理使用和出于私利的非合理使用，也使用此概念来区分。把国家资源看作“自家财产”的官僚和公务人员，也将会被追究责任，并可

^① Elio Gaspari, *Veja* (April 28, 1993), p. 23.

能身陷监狱。^①

我们已看到,巴西的法治之所以如此不稳固,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公民认识到官员在司法行政中不能做到公正无私,更有甚者,官员经常触犯法律却免受惩罚。就此而言,对科洛总统的弹劾算得上是民主程序的一次胜利,也可看做是抵制“免罚”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理论视角出发,关于弹劾程序,值得强调的是,处于民主的多重危机中时,巴西共同体的各个主要部分都完成了其基本的民主任务。首先,对科洛政府贪污的指控,各大报纸和杂志在市民社会中进行了充分的报道。然后,作为政治社会的中坚力量,巴西议会并没有漠视此次指控或是去寻求军方的帮助,而是正确地承担起展开详细调查的责任。政府也扮演了适当的角色。首席检察官重组了办公室,开展独立的审查。司法部长也准许联邦警察执行某些必要的官方调查。随着多方调查结果的公开,市民社会这次通过大众示威的方式,呼吁政治社会表决通过弹劾提案,反对免罚。另外,整个过程没有外来势力的插手,国内的军方也不愿卷入其中去阻止或推动民主程序的运作。^② 虽然目前作任何判断都为时过早,但科洛弹劾案至少把官员和立法者的免罚问题提上了民主的议程,这或许有助于巴西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实行法治。^③

我们现在转到巴西“政治社会”及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民主政治社会必

^① 有关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官僚机构和世袭制下行政系统的经典区分的简明比较,参见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pp. 423—425。与世袭制的政治实践对照,官僚制统治的六个主要原则列举如下:(1)在连贯的基础上处理公务。(2)依照既定的规则处理公务。(3)各个官员的责任和职权均为统治权威的一部分。(4)官员和其他行政雇员不能占有行使职权时必要的资源,但需负责任地使用这些资源。严格区分公务与个人事务及国家收入和个人收入。(5)当前在职者不能占有公职本身。(6)通过书面文件传达公务。这也正是巴西民主的捍卫者不断尝试并努力去实现的目标。参见 *Veja*, p. 424。

^② 有关此次弹劾,尚无完整的学术研究著作出版。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是 Maria D'Alva Gil Kinzo 的“The Political Process of Collor's Impeachment”。这是一篇为“巴西:迈向现代化的努力”研讨会而准备的论文,会议由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举办,1993年2月18—19日。有关弹劾的政治进程,也参见 Marcos Nobre, “Pensando o Impeachment”, *Novos Estudos CEBRAP*, no. 34 (Nov. 1992): pp. 15—20。

^③ 例如,*Veja* (March 24, 1993), pp. 16—25 中涉及两篇比较巴西腐败的免罚和意大利的关押的文章。其中,*Veja* 指出,1988年里约热内卢州的监狱人口普查中,没有发现任何因滥用政治基金或寻租而被羁押的囚犯。1993年4月,司法部对巴西监狱中的12600名囚犯做了同样的调查,调查发现,监狱中确实没有白领阶层的囚犯,也没有巴西公开报道的历次贪污丑闻牵涉到的前国家官员。新趋势的另一个迹象体现在圣保罗监狱骚乱事件中,由111名囚犯被警察屠杀而引发的严肃的调查和空前数目的指控。这场骚乱发生于科洛弹劾案后不久。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科洛丑闻还是圣保罗大屠杀,都几乎没有相关人等被羁押。重组后的首席检察官,琼克伊拉(Aristides Junqueira)指出,只有刑事系统和司法系统发生改革,被证实的违法行为也得以判定罪责,公民抵制免罚的新共识才能免于转为更深层的愤世嫉俗的情绪。

须完成的一项首要任务是，民选政府必须积蓄足够的民主力量，有效地解决社会面临的许多主要问题以调和各种利益。我们已经提到，1985—1992年间7个稳定计划的失败，也可看做是巴西效力和民主力量匮乏的众多标志之一。

而这段时期，巴西的经济并没有完全崩溃。例如1992年，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是228亿美元，而巴西则有1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200亿的美元储备。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政治危机，前三任文职总统的稳定政策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工人们的实际收入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了，最终导致国家面临金融危机（由于被确定为无信用国家，巴西只能获得短期高利率的借贷），1992年的实际利率接近于30%。居高不下的实际利率，使得对于那些需要进入资本市场的人而言，私人部分的投资异常昂贵，同时，也导致巴西政府国内债务负担更为沉重，能够为公民提供的集体物资越来越少。从1985年到1993年，力不从心的巴西政府无意也无法解决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衡。而要获取立法机关的支持，几乎从来都要付出代价，即不把财政改革提上议程，或是给议员和州长们的选民发放专门的补助。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毋庸置疑，分散的政党体系与民粹主义、自愿主义的总统一一起，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分散的多党体制和总统制的结合，对民主的持续发展毫无裨益。^① 这是我们相信以下这一点的众多理由之一，即巴西1993年4月21日关于采用议会政体的全民公投，本来可以赋予国家易碎的民主体制以有价值的自由度。下面就来详细阐述为什么我们认为1993年4月议会制的失败是个不幸。

181

议会体制下，离开最起码多数的服从，政府就无法成立或持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制能更多地激发并产生联合的多数。而总统制促成联盟的鼓动力就相对小得多。^② 相对于总统制，议会制更能催生多党

^① 参见 Scott Mainwaring,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y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y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 no. 2 (July 1993): pp. 198—228。对巴西的案例，他进一步展开了详细的论证，参见 "Dilemmas of Multiparty Presidential Democracy: The Case of Brazil", 载于 Scott Mainwaring 和 Matthew Shugart 编: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即出)。

^② 有关议会制的一般论述，最初出现于林茨简短的文章 "Excursus on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载于 Linz 和 Stepan,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pp. 71—74。有关比较总统制和议会制优越性的文献不断增加，大多数集中于 Juan J. Linz 和 Arturo Valenzuela 主编的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一书中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一篇为议会的主题提供跨国的实证的支撑性论据的文章，参见 Alfred Stepan 和 Cindy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接下页)

联盟中的持续多数,因而它也就更有能力在立法机关中维持较多数目的政党共存。事实上,1979—1989年间,多达11个巩固的议会制民主国家的立法机关中,有3—7个“有效”政党共存(使用Laakso/Taagepera指标计算有效政党)。^①而与之截然相反,长期存在的总统制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中有超过2.7个的“有效”政党存在。使用同样的指标,1992年巴西众议院中有8.5个政党,这比世界上任何长期存在的、巩固的民主国家都多出3倍(表11.6)。

据我们看来,议会制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并以此赢得政党服从和联盟的构建,能够促进巴西政治社会对各种利益的调和。

183 既然错过了从总统制向议会制转变的历史性的机会,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怎样才能提高巴西政治社会的融合能力和政府生产能力呢?^②

与乌拉圭、智利,甚至阿根廷相比,巴西的政治文化中,对政党的认同相对较淡。然而,尽管政治文化相当重要,但是抑制或是鼓励政党扩散的特定动机也很重要。由此,作为一个好的案例,可以说巴西拥有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不乐观的选举制度、政党以及议会决策规则。由于某些政治领袖创立党派仅仅是为了作为资产来交易,或是要以此逃避党纪的约束,于是我们所谓的决策规

(接上页)*Politics*, (Oct. 1993): pp. 1—22。关于议会制能够比总统制更好地引导经济发展和推动困难时期的经济复苏,相关复杂的定量分析、论证参见Adam Przeworski和Mike Alvarez, “Parliamentarianism and Presidentialism: Which Works? Which Lasts?”为波兰社会学学会每三年召开一次的会议准备的论文, Lubin, June 27—30, 1994)。

我们偏爱议会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是一种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依赖的机构。立法机关能够解散政府,政府也能要求重新选举。相互依赖有助于生成多数的联盟,即使不能,也可以提供打破僵局的常规手段。相反,总统制是一个相互独立的系统。总统拥有某种固定且独立的授权,同样,立法机关也拥有某种固定独立的授权。离开多数的支持,或是在多党体制下,政府都能够而且确实能够产生,就像在巴西,这么一个少数政府通常都要面临与立法机关长期处于僵局的状态,而且宪法中没有可行的打破僵局的常规方法。此种情况下,立法机关能够对预算进行表决而不僭越政府的职责。

① 党派的“有效”数目用Laakso/Taagepera指标计算,Laakso/Taagepera指标依据各党派在国家立法机关的众议院中所持有的席位来估算政党的相对实力。参见Markku Laakso和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olitical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no. 1 (April 1979): pp. 3—27。参见Stepan和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pp. 8—9。

② 玻利瓦·拉蒙尼亚(Bolivar Lamounier)曾撰写两篇精彩的文章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探讨,参见他的“Brazil: Toward Parliamentarianism?”载于Linz和Valenzuela编: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pp. 171—219。他对议会失败观点的分析见pp. 215—116。关于1994年初巴西压抑的情绪,完整地记录在Lamounier, “Latin America’s Critical Elections: Brazil at an Impasse”,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 3 (1994): pp. 72—87。

则就为“寻租”行为提供了广泛而切实的动机。^①

表 11.6 议会制、半总统制和总统制持续民主国家立法机关中
“有效”政党的 Laakso/Taagepera 指标(1979—1989)

182

议会制		半总统制		总统制	
3.0 个或更多政党	少于 3.0 个政党	3.0 个或更多政党	少于 3.0 个政党	3.0 个或更多政党	少于 3.0 个政党
	基里巴斯 a				
	瑙鲁 a				
	图瓦卢 a				
	博茨瓦纳 1.3				
	圣文森特 1.4				
	多米尼加 1.5				
	牙买加 1.5				
	巴哈马 1.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6				
	巴巴多斯 1.7				
	圣卢西亚 1.7				
	新西兰 2.0				美国 1.9
	加拿大 2.0				
	英国 2.1				哥伦比亚 2.1
	印度 2.1				
	希腊 2.2				多米尼加 2.3
	奥地利 2.4				哥斯达黎加 2.3

^① 在巴西,拥有重要历史的资格最老的政党是 PMDB(民主运动党,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和 PT(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两者均于 1970 年成立。我们分析范围内的其他三个南美国家(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都存在一些其根源可追溯到 19 世纪的主要政党。对此开创性的定量分析和定量比较,参见 Scott Mainwaring 和 Timothy R. Scully,“Introduction: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载于 Scott Mainwaring 和 Timothy R. Scully 编: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34。

续表

议会制		半总统制		总统制	
3.0 个或更多政党	少于 3.0 个政党	3.0 个或更多政党	少于 3.0 个政党	3.0 个或更多政党	少于 3.0 个政党
	澳大利亚 2.5				
	所罗门群岛 2.5				
	毛里求斯 2.5				委内瑞拉 2.6
	爱尔兰 2.7				
	西班牙 2.7				
	日本 2.9				
联邦德国 3.2		法国 3.2			
挪威 3.2					
瑞典 3.4					
卢森堡 3.4					
以色列 3.6		葡萄牙 3.6			
荷兰 3.8					
意大利 3.9					
巴布亚新几内亚 4.0					
冰岛 4.3					
丹麦 5.2					
比利时 7.0					

注：瑞士与芬兰是“混合”体制，分别有 5.4 个和 5.1 个有效政党。

资料来源：这一表格复制自 Alfred Stepan 和 Cindy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Oct. 1993): pp. 8-9。也可参见 Markku Laakso 和 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no. 1 (1979): pp. 3-27。

a 由于正式政党的缺失,仅有不足两个“政治团体”(political grouping)。

任何立法机关的“决策树”中都有大量的分歧点,这可能会促进或是抑制政党的分化。其中一个主要决策涉及选举制度的类型,即国家选择不同的选举制度来决定立法机关的构成。在此,一面是多数表决制,另一面是某种形式的比例代表制(PR),往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决定。尽管一般认为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在议会中再现国家政治势力的相对比重,因而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但这种体制趋向于产生更分散的立法机关。相反,多数表决和单一选区制则旨在使议会更多地代表选举中最强势的国家主要政治力量,因此,多数表决制不会导致立法机关中出现过多的政党。^① 虽然对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而言,这种制度或许不那么有“代表性”(与比例代表制相比),但多数党至少不会助长立法机关的分散倾向,并且也能防止政党的分化。

在每个决策分歧点上,巴西都选择了最能导致政党分化的规则。巴西选择了比例代表制,在比例代表制下,政党要成为议会中的代表,或者需要一个较高的选票下限(5%),或者没有下限。巴西比例代表制的下限接近于零。仅有0.04%全国投票的政党,也能获得国会中的代表权。^② 关于政党秩序,同样存在决策分歧。一种是封闭式名单制,即由政党列出前几位候选人,因而成为党内秩序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另一种是开放式名单制,任何候选人均可以自由竞选,获得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就会认为,他所赢得的是“个人选票”,而非政党选票。另外,立法程序能够选择是否处罚那些改投它党的人。而巴西对此种行为没有任何制裁。^③ 同样,选举过程中的自由媒体宣传时间,国家能够在不提供给任何政党、只提供给主要政党、提供给每个正式政党(不论多小)三种情

184

^① 参见 Maurice Duverger 的经典著作,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Wiley, 1954)。也参见 Duverger 较近的著作,“‘Duverger’s Law’: Thirty Years Later”, 载于 Bernard Grofman 和 Arend Lijphart 编: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pp. 69—84。

^② 有关这一点的展开论述,参见 Scott Mainwaring, “Parties, Politician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raz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Oct. 1991): esp. 43 n. 7。

^③ *Folha de São Paulo* 中的调查报告, October 27, 1990, A-4。有关政党无秩序的详尽论证,参见 Scott Mainwaring, “Brazil: Weak Parties, Feckless Democracy”, 载于 Mainwaring 和 Scully 编: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p. 354—398。在此背景下,巴西的选举反复率极其之高。事实上,根据选举反复率的 Pedersen 指数,即选举中政党交替的议会席位或是选票的百分比,18 个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平均指数低于 9%(选票)。乌拉圭 1971—1989 年的 Pedersen 指数反复率是 9.1%,阿根廷 1983—1993 年是 12.3%,智利 1973—1991 年是 15.8%,而巴西 1982—1990 年的 Pedersen 指数是 40.9%,这是前所未有的高纪录。然而,巴西的反复性更多来自政治家选择,而不是选举本身的结果。例如,到 1990 年,1986 年当选的联邦议员中,超过 1/3 的人都变更了所属的党派。有关 Pedersen 指数的具体数据参见 p. 374。

况中做出选择。巴西目前的法律规定,所有的17个正式政党,每年分别在国家电视台及广播网有两个小时,州电视台及广播网一个小时的自由宣传时间!^①

那么,这个不寻常的体制,为政党分化和无序提供制度性的激励的体制,能够发生转变吗?根据1988年宪法,1993—1994年选举期间应成立宪法修订委员会;委员会召开上下两院的联合会议,并以简单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关于宪法条例的法律。遗憾的是,巴西错失了这次机会。如果修宪会议的简单多数原则已这么确定,他们原本可以有多种途径改变巴西的诱发性体制,来控制政党的分散。举例来说,如果他们选择德国类型的混合选举制(选票下限为5%的比例代表制和单一选区制各占一半),巴西的Pedersen指数极有可能削减一半。但很遗憾,正如表11.6中所示,虽然此时的Pedersen指数对议会制而言已完全正常,但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总统制民主国家相比,这个数字都相当高。但我们认为,不考虑巴西的反政党政治文化和目前的代议制民主,若是他们想把政党数目减少到更易于控制的范围,或要改善立法机关中的政党秩序,可用的激励体制的类别确实相当广泛。如果他们真正采用了这些体制,那么依据我们的判断,就能够增强巴西政治社会能力,以此融合各种利益,生成民主的力量。如果他们拒绝采纳这些,巴西的政治社会就可能继续被削弱而不是加强。这并非夸大其词。

在第一章我们曾指出,民主的巩固需要一个“有用的国家”。而且,我们也指出,尽管某些“政府收缩”论者不时发表攻击政府的言论,然而,为了私有化的审慎和有效进行,不可避免地需要合理有效的政府管理机构。^②政府促进私有化的策略,旨在调整政府结构,以克服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和全面巩固市场经济。同时,这个策略也需要限制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出售某些产业,并裁减不必要的人员,以此保证私营部门不会过度被束缚,并增强政府履行卫生、教育、法律和司法领域主要职责的能力。新旧民主政府都在尝试不同的方法,应对这项艰巨的双重任务,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① 选举最高法院的通告,转发在“Horario eleitoral gratuito recomeça dia 6”, *O Estado de São Paulo*, April 24, 1993, 6。

^② 正如迈尔斯·科洛(Miles Kahler)指出的,“正统理论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政府是用来调整政策、避免走向政府主义方向的唯一手段”。Kahler, “Orthodoxy and Its Alternatives: Explaining Approaches to Stabilization and Adjustment”, 载于Joan M. Nelson编: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cy Choice: The Politics of Adjustment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3—61, 引自 p. 55。

许多国际观察者虽然谴责科洛总统的贪污行为，却赞赏他在任时的私有化政策。然而我们认为，若对科洛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展开系统的研究，相关记录将会显露出，政治社会的分化和总统的一意孤行共同作用，产生了某种不甚理想的私有化类型，而这种私有化类型包含着危险的后果。举例来说，在这个国家，最严重的问题是逃漏税的美元值大于税收的美元值，而科洛总统仓促地推进政府裁员，这就延续了始于1979年石油危机的税收征管人员不断萎缩的状态。巴西在1979年有1.2万个联邦税务机构，而到1992年仅剩下5700个。^①而总统贪污以及一系列缺乏持续政治基础的摇摆不定的经济改革，更助长了纳税人的反感情绪。那些承认欠税金额，却不支付个人所得税的法人（因而不是一般意义的“逃税人”，而是事实上的“公然抗税者”）指数也从1988年（科洛就职的前一年）的1.6%上升到1991年的50.7%（科洛在任的最后一年）。^②

总统办公室起草的许多“政府收缩”改革计划，往往由于过于粗糙而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考虑欠周详的私有化计划就是其中之一，危及政府“大脑”最关键的部分。举例来说，在工商部，囊括巴西全部企业的计算机数据库被注销，大部分数据丢失。这就失去了税款有效征收的一个重要的潜在资源。类似地，在农业部，动物检验的一套主要设备彻底停用，这大大减弱了政府的质量控制能力，而这种能力对卫生管理和促进出口至关重要。此外，科洛总统否决了一个并行项目，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公务员的退休待遇，在此之后，很多巴西利亚最出色的公务员离开了政府机构。一些高级公务员几乎马上就被政府的其他部门再次聘用，目前每月领取双份薪水。而其他一些公务员要么离开公共部门，要么就继续意志消沉下去。^③作为私有化的推动者，政府本该提供更大的选择余地，更好地节约资金和智慧，并更有效地裁减冗余和不称职的职员。

186

① 有关政府税收能力日渐减退的背景性文章，参见 Lourdes Sola, “State, Structural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by Default”, 载于 C. Acuña, E. Gamarra 和 W. Smith 编: *Democracy, Market and Structur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② 巴西议会财政改革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提供给斯泰潘的数据，来自“Indices de Inadimplência—Brasil”中的一个表，将发表于即将出版的有关财政改革的“Relatório Final da Comissão Parlamentar Mista de Inquérito”上。也参见 Sola, “State,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

③ 1992年4月22日，斯泰潘对巴西议会经济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成员和一位参议员的访谈。上述行政事务法令是1990年12月12日的8112法令(Decree 8112, December 12, 1990)。

新自由改革的进行,应当有助于缩减政府不必要的开支,消除财政危机,并增加政府社会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净额。1986—1990年间,塞阿拉州的两个力主政府改革的首脑,塔索·热雷萨地(Tasso Jereissati)和西罗·戈梅斯(Ciro Gomes),把薪水单的总份数从15.2万份削减到11.2万份(薪水单份数并不必然代表职员人数,因为某些人甚至领取多达7份薪水),人事和债务支出在州预算中的比例也从69%下降到39%。节余的开支被塞阿拉州用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提高必需的社会服务。这个过程中,塞阿拉州政府开始了一项平民医药预防保健计划,成功地使婴儿死亡率在四年内下降了32%,开展了高度开放的自助住房计划,并进行了道路建设,且每英里的费用仅是其他州的1/4。在巴西所有州长中,塞阿拉的两任州长也享有最高的支持率。^①

187 科洛总统的新自由主义和政府收缩改革加剧了金融危机,妨碍了私营部门的投资,扰乱了政府秩序,削弱了大众对民主的支持。相对而言,热雷萨地和戈梅斯的改革结束了金融危机,增加了公共部门的社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了工业中私营部门的繁荣,调整并加强了政府机构,更深化了大众对民主的支持。

我们最后来评论巴西的“市民社会”。巴西曾经有着世界上最差的收入分配制度。从1980年到1992年,收入分配的状况进一步恶化。^②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巴西的经济危机明显不能归因于贫困人口对有效再分配的要求过度。事实上,充分的迹象表明,对巴西民主状况的改善而言,政治社会必须学会更有效地调和各种需求,除此之外,最贫困的人口也应该学会清楚有效地表达他们的需求,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行使公民权,也使其作为一个潜在的社会力量,被常规地纳入政治社会的决策考虑。关于巴西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最近的两个研究指出,要实现这一点,最明确的可行途径是加强教育。有关社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也证明,把巴西分为5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教育分为3个级别,15个对象群体中,14个群体的观察结果都显示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就越

^① 塞阿拉州降低婴儿死亡率的计划,赢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莫里斯·佩特奖(Maurice Pate Prize),参见 UNICEF, “Ceará, Como Reduzir a Mortalidade Infantil” (June 1991)。有关扭转金融危机的报告,参见 Ceará, Secretaria de Planejamento de Ceará, “A caminho do Ceará melhor: A rota das mudanças” (Fortaleza: 1993)和 “Hope from the North-East”, *Economist* (Dec. 7, 1991): pp. 18—20。

^② 参见 Lamounier, “Brazil: Inequality against Democracy”。

倾向于参加社会组织。^① 一项多年的舆论政治文化研究表明，民众受教育程度越低，对统治的批评就越少，因而距离政治就越远（支持无效 [nonresponsive] 政府或者非民主政府）。然而，体力劳动者中，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政府服务的批评就越多，但更支持政治参与和制度承诺（考虑到巴西当前的社会赤字和政治危机，这个态度即是对民主的支持）。^②

巴西是一个不巩固民主的范例。其中，部分问题可归因于转型时期军方的限制以及债务危机。然而，若民主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就更多是由于巴西的民主体制无法解决转型后出现的问题所致。简单地回顾巩固民主的五个要素，即作为公民的一种资源而存在的法律和司法系统、能够明确表达要求的市民社会、能够调和各种需求的政治社会、提供必需的集体物资的政府以及带来税收和财富的经济社会，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层面都存在选择因素，相关政策的制定会有利于状况的改善。因此，对巴西而言，民主的崩溃或是民主的巩固都无法断言。然而，除非上面探讨的五个民主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否则照此发展下去，巴西民主政治允许犯错的空间将会减小，而民主崩溃的机会将会增加。

188

1994—1995 年的巴西：走向民主巩固

我们看到，1993 年，一些有影响的分析家开始讨论巴西民主崩溃的可能性。然而，在巴西特定的背景下，军队并不被认为是合法和可能的统治者，国家主流思潮仍然支持民主，也没有任何主要团体投入大量资源来动员对政变的支持。虽不存在引人注目或是可靠的非民主的替代性选择，但为达成共识，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和愈演愈烈的政治动荡，著名的社会学家、圣保罗州参议员、财政部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公开促成了支持新稳定方案的议会联盟。他的“Plan Real”于 1994 年 7 月 1 日开始推行。到 1995 年 7 月 1 日，据经济学家报道，“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从每

^① 参见 dos Santos, “Fronteiras do Estado Minimo”, 表 15, p. 97。

^② 这是何塞·阿尔维托·莫塞斯在多年的大众舆论研究项目“Cultura Política e Consolidação Democrática no Brasil”（即将出版）中的主要发现。对此项目研究结果的简要英文评论，参见 José Álvaro Moisés, “Democratization, Mas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Brazil” (Center for the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 Juan March Institute, Madrid, estudio/working paper 1993/94, Feb. 1993)。

年几千个百分点到不超过 30%”^①。

许多政治分析家担心,1994 年的总统大选将会是左翼和右翼间第二轮的分化和冲突。事实上,对峙只发生在卡多佐和德西尔瓦(de Silva,著名联盟领导人)两位主要的社会民主候选人之间,主要关于不同的执政规划、不同的选民和不同的风格,以及谁来领导市民社会反对独裁主义……作为议会制的主要倡导者,卡多佐在第一轮中就当选为巴西总统。相对于费尔南多·科洛,卡多佐总统为最高执政官的职位带来了更多的立法机关的威信和经验。1995 年 7 月 1 日,“Plan Real”一周年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卡多佐的大众支持率高达 72%。在精英阶层,从 1993 年到 1995 年中期,有关民主的言论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且,几乎不再有任何关于民主崩溃的言论。^② 然而,所有严肃的分析家,包括卡多佐总统和他的计划部长何塞·塞拉(Jose Serra)在内,都密切关注着本章中已列出的问题,即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分化的政党系统、法治问题以及悬搁的漏洞多多的金融体制。^③ 在巴西特定的联邦政治体制下,金融体制的调整将会特别困难。虽然新总统似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要扭转巴西民众对民主的矛盾态度,仍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尽管如此,进入 1995 年,南锥地区最曲折的民主转型,也令人惊奇地走上巩固。

① 参见“Brazil: Happy Birthday”, *Economist*, July 8, 1995, p. 46。

② 1995 年 7 月 21 日到 7 月 24 日 *Jornal do Brasil/Vox Populi* 的民意测验提供的数据。有关 1993 年和 1995 年精英言论对比的观察,基于“Plan Real”一周年时玻利瓦·拉蒙尼亚在巴西的演讲。不过,在演讲中,拉蒙尼亚也强调了巴西政治体制进行重大调整的迫切需要。

③ 1994 年 12 月 2—3 日,巴西利亚的会议中,卡多佐总统和塞拉公开或私下都反复强调,需要拟定相应的政治策略来克服这些问题,我们参加了此次会议。我们必须注意到,卡多佐政府四年的任期限制,对民主改革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束缚,如果巴西采用议会制,就不会发生此种情况。

第十二章 从不可能到可能的 民主博弈：阿根廷

190

从1976年到1983年，阿根廷是高级军官领导的军人政体。但在此宽泛的背景下，阿根廷的军人政体中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对其演变过程和巩固民主的努力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阿根廷，乌拉圭军人政体囚禁的人数比例更大，并且进行了规模性的镇压。然而，1975年到1977年间，掌握武力的阿根廷职业军人和企业家，有时也促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恐怖统治。阿根廷“失踪”人数的比例，比乌拉圭多32倍，比巴西多300倍。虽然整个政治制度缺乏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也不具备全能主义政体的组织结构，但在许多关于清除异己的必要性声明中，军方也显示出全能主义的倾向。^① 军政府事实上更多是一种威权主义的“状态”，而非一种制度化的“政体”。^② 军方不曾像巴

^① 一些引证足以证明这些。伊韦里科·圣·让(Iberico St. Jean)将军曾宣称，“最先我们要消灭那些颠覆破坏分子，然后是他们的同伙，之后是……他们的同情者，再后来就是……那些仍然保持中立的人”。仅凭意识，无须行动就作为此种处决的充分条件的事实，则来自卢西亚诺·梅内德斯(Luciano Menéndez)将军的声明，“我们将会杀掉50000人，其中25000个破坏分子，20000个支持者，另外5000则是我们可能会犯的错误”。均引自James W. McGuire的重要研究，“Interim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Argent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于Juan J. Linz和Yossi Shain编：Between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79—210, 引自p. 183。有关军队恐怖统治类型和模式的更加详细的记录，参见Nunca Más: The Report of the Argentin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6)。有关对比南锥地区“失踪”率的表格，参见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 70。

^② 有关“威权主义状态”和“威权主义政体”的区分，参见Juan J. Linz, “The Future of an Authoritarian Situation 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Brazil”，载于Alfred Stepan编：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tics and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33—254。

西那样创建政党或是举行选举。他们也不曾像乌拉圭和智利那样,制定“引导民主”的宪法,并提交全民公决。此外,贯穿整个军人统治时期,军队内部导致临时政治联盟和现实经济政策突变的势力,与公共部门之间都存在相当多的冲突。没有迹象表明军方有通过竞选放弃权力的长期规划。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加尔特将军侵占马尔维纳斯,倒是创建新的军人统治基础和树立其个人领导的一个企图。在这样的整体情况下,当阿根廷于1982年6月14日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向英国投降时,阿根廷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任何主要阶层,都不把军方当作可靠的或是可能的同盟,并且军方内部空前的争执、互相指责和秩序缺失,也使许多军官对军队内部的武力冲突和军队组织的分化感到担忧。^①

阿圭罗在其提供的极为丰富的资料的比较研究中,建构了“后转变时期的军方权力”这一类别,其中的关键变量包括:前政体——军事化的还是平民化的;转变途径——通过协议性改革、军事政变,还是军队的失败以及体制的崩溃。在他的分类中,如果威权主义政体是军事化的,且转变途径是军队的失败和体制的崩溃,那么军方的相对地位就较“弱”。希腊和阿根廷是他列举的两个实例。^②

我们认为,此种分类十分有利于对转变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我们要着手分析军方的失败对民主巩固产生的政治后果,就必须相当谨慎地区分高级军官领导的威权主义军人政体和中下级军官领导的威权主义军人政体,以及政权事实上崩溃与否。正如希腊在塞浦路斯的惨败结束了其军政府的统治,阿根廷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失败和耻辱也促成了军人政府的倒台。与希腊一样,即将离任的军方也试图强加某种条件,作为他们放弃政权的酬劳。但军

^① 举例来说,1982年7月24日斯泰潘在布宜诺斯的访谈中,一位阿根廷将军指出,军队内部冲突可能会导致事实上的军队分化,俄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沙皇军队已分裂。对军队这一时期内部冲突最为生动的说明和系统的分析,见 Andrés Fontana, “De la crisis de Malvinas a la subordinación condicionada: Conflictos intramilitares y transición política en Argentina”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gust 1986, working paper no. 74)。

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期间阿根廷军方的职业无能,及其与镇压政治的关系的描述,参见西班牙上校加西亚·普鲁登西亚(Prudencio García)关于阿根廷军方(从军政府到梅内姆总统)的学术著作: *El drama de la autonomía militar: Argentina bajo las juntas militares*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5)。有关肮脏的战争的产生及发展和政治暴力的深入研究,参见 María José Moyano, *Argentina's Lost Patrol: Armed Struggle, 1969—197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参见 Felipe Agüero, “The Military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American and South Europe: Outcomes and Initial Conditions” (递交拉丁美洲研究学会第XV届国际会议的论文, San Juan, Puerto Rico, September 2—23, 1989)。

队内部的纠纷及其枯竭的威信,和迅速结束军人统治的紧迫性,无不意味着不论是希腊的还是阿根廷的军方当权者,早已不处于有利地位能向继任的政府提出限制性条件,来作为他们准许演变的酬劳了。

但往往被我们忽略的是,希腊和阿根廷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阿根廷军队组织是高级军官领导的,而希腊军队却不是,这就意味着阿根廷军方事实上并没有“崩溃”,由此,其巩固民主的任务就更加严峻地复杂化了。关于这一点,对基本事件的进展做一个简要的概略,就足以打破有关“崩溃”的臆断。1982年6月14日,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宣布投降。同一天,加尔铁里将军在压力下辞去全军总司令的职务,由克里斯蒂亚诺·尼古拉德斯(Cristiano Nicolaides)将军继任。而尼古拉德斯将军在没有军政府联盟中空军和海军允许的情况下,任命已退休的陆军将军雷纳尔多·比尼奥内(Reynaldo Bignone)为临时总统。1982年7月1日,比尼奥内就职总统。其后不久,军方宣布选举最迟于1983年末举行。选举如期在1983年10月举行,1983年12月,劳尔·阿方辛举行就任典礼,成为阿根廷的新总统。这18个月中并没有“崩溃”的迹象。^①因此,虽然在民主演变文献中,葡萄牙、希腊和阿根廷经常被放在一起作为遭受外部失败而崩溃的政治体制,但崩溃的隐喻混淆了这几个国家中某些关键的权力关系的差异。

192

在葡萄牙,中下级军官们因愤怒或者害怕卷入一场失败的战争而颠覆了政权,协助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改革政府,在一次相当广泛的动员过程中,国家走向“崩溃”。在希腊,中下级军官领导的军人政权,在一场类似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冒险中,几乎把希腊民众引入和土耳其的战争。这个中下级军官领导的军人政权最终被高级军官领导的军队推翻,并在24小时内把权力让渡给承诺要选举的文人临时政府。国家没有崩溃。而脆弱的中下级军人政权被推翻,选举之后,军队组织也把重心转移到对中下级军官侵犯人权罪行的肃清和指控之上。^②

阿根廷军人政府特殊的暴力本质,他们的内部冲突,他们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战败后18个月继续其政府统治的能力,包含着五个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的结果。首先,军方能够在战败后继续控制政府达18个月,并能把总

^① 对于这一点,前面引用过的 McGuire 的“Interim Government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尤其有说服力。

^② 对国家和政体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参见 Robert M. Fishman, “Rethinking State and Regime: Southern Europ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April 1990): pp. 422—440.

统职位移交给选举中的获胜者,这就意味着像葡萄牙那样,由临时政府推行改革政策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其次,尽管军方继续统治,事实上他们在权力方面已被削弱了。因为与乌拉圭不同,作为机构的阿根廷军队的分裂相当严重,他们害怕军队内部的武装冲突。而且,与乌拉圭军方相比,他们意识中交出政权的任务也更为紧迫。此种背景下,政党能够拒绝军方试图订立条约的提案。军方曾三次提出商定条约的提案,三次都被政党拒绝。这种权力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巴西、乌拉圭和智利,阿根廷转型之初没有那么多由政党商定的限制。阿根廷政党不接受像巴西 1985 年那样的间接总统选举,也不接受主要候选人像乌拉圭那样被排除在外。并且,他们更不必像智利那样,不得不同意政府最初运行时威权主义体制法规的关键部分仍旧生效。在南美这四个案例中阿根廷是唯一一个无条约,且最经典的自由演变的国家。

第三,这种权力关系状况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和希腊一样,新任民主政府为侵犯人权而起诉、定罪并监禁了众多的军官,这在南美国家案例中,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军方无限制的暴力及其考虑欠妥的对外军事冒险,严重削弱了他们在阿根廷政治中作为政治联盟的影响力。相应地,这就增加了选举政治的现实价值。

第五,在希腊,对军方的审判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而在阿根廷,审判几乎导致了民主的崩溃。这里关键的解释变量,就在于中下级军官控制的军人政府和高级军官控制的军人政府之间的差异。在希腊,作为机构的军队认为对前军政府中那些中下级军官领导人的审判和监禁,是对军队权威的再次巩固。而在阿根廷,军队组织认为监禁前军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行为,是对其制度的一个精神打击。从 1987 年 4 月到 1990 年 1 月,共有四次中层军官的军事起义,这削弱了阿方辛总统的权威,使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政策任务上,并迫使他做出致命性的让步。^①

我们无意过于强调文武关系的问题。阿方辛总统在职期间还有许多其他的难题。他既然宣誓就职,就应当迅速着手重整阿根廷民众长年累月的社会

^① 有关四次起义及其对阿方辛政府的影响的翔实的比较分析,参见 Carlos H. Acuña 和 Catalina Smulovitz, “¿Ni, olvido, ni perdón? Derechos humanos y tensiones cívicos-militares en la transición Argentina”, Buenos Aires, CEDES, *Documento CEDES*, no. 69, July 1991, 尤其是 pp. 19—31。

困境。可他没能赢得两院中多数的支持。更糟的是，他既不能够与庇隆主义贸易联盟达成一致的共识，也无法掌控后者，这导致了13次反对他经济计划的大罢工。1986年，劳尔·阿方辛的主要稳定计划“南方计划(Plan Austral)”被否决。1987年10月的选举中，他失去了对两院的控制。如果是在议会体制下，阿方辛几乎必然地会或是应该在这一次选举中离职。总统任职期间饱受谴责，来自军人的压力日益增长，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中没有成功的联盟，阿方辛看到了民众对其政府支持的滑坡，也看到了政府执行经济政策能力的下降，以及民主持续前景的不容乐观。^①到1988年7月，通货膨胀急速增长，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2%，且49%的民众认为将会发生军事政变。^②到1989年7月，阿根廷第一次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政府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劳尔·阿方辛颜面扫尽，提前6个月离职。然而到1992年6月，一次意外的大逆转中，许多阿根廷政治家和分析师开始指出，阿根廷结束了60年的衰落，其中一些甚至认为，阿根廷的民主已得到巩固。

194

这部分中，稍后我们会对某种新出现的层级关系进行考察，但这里我们先来简要地指出梅内姆总统上任后发生的两个重大转变。首先是关于军方的转变。1987年下层军官发动起义时，花脸起义军(the carapintada)得到了军队默许的支持，因为义军的主要口号是捍卫军队的等级制度，反对“不公正”的审判。然而，花脸起义军也显现出其自身的能动性，以致军队对他们日益警惕起来。起义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政治性特征。它们也越来越依从于下层军官领袖的个人动机。最终，义军不再声称捍卫军队制度，而转为非等级制的动乱，不仅针对阿方辛总统，更针对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此外，1989年10月，对于军政府时期军方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阿方辛政府时期的武装反抗行为，梅内姆总统予以大规模的赦免，并让某些被释放的军政府领导人发表已平反声明。此种新情况下，1989年12月，下层军官和众多待命军官再次发动起义，总统

① 反映1987—1989之间阿根廷民主日益损蚀的特质的三份文献分别是：David Rock,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 Democratic Regime: The Alfonsín Government, 1986—1989”; Andrés Fontana, “La política militar en un contexto de transición: Argentina 1983—1989” (两篇论文都是为在Shell Institute召开的会议准备的, Yale University, March 1990); 以及 Marcello Cavarozzi 和 María Grossi, “De la reinvencción democrática al reflujo político y la hiperinflación (la Argentina Alfonsín)” (为在CERC召开的一次会议准备的论文, Santiago, Chile, Aug. 1990)。

② 这些数据来自埃德加多·卡特伯格(Edgardo Catterberg)的民意测验，并在其资料详尽的著作中得到报道，参见 *Argentina Confronts Politic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Argentin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数据引自 p. 91 和 p. 110。

和全军总司令以军队秩序和政治民主的名义,联手粉碎了起义,花脸起义军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尽管阿方辛总统因军事起义而丧失权威,梅内姆总统却利用反高级军官起义的机会提升了权威。^①

195 另一个重大改善涉及公民对经济的认识。部分原因是由于民主体制的某些基本方面,同时也得益于梅内姆在任时阿根廷的特殊因素。民主体制的基本方面关涉政治经济合法性。我们在第五章曾指出,大多数威权主义体制在连续三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很难继续维持统治,因为它们的统治权利是建立在效力,而不是合法性的基础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主体制之所以能够抵抗经济不景气的冲击,有两方面的原因,即民主制的制度合法性,以及通过未来选举改变现状的期望。1988年11月,在阿根廷,70%的被调查者认为,过去五年中,国家的状况更加恶化了。然而仍有74%的人肯定,“民主制一直比独裁统治更优越”。仅有15%的被调查者(相对于巴西的40%)认为军政府复辟会使状况好转。接下来的6个月,经济进一步恶化。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情况会得到改善。然而,新一轮的选举开始了。尽管那个冬天,卡洛斯·梅内姆仅赢得了49%的投票,但公民中相信经济将会好转的比例,从32%上升到了72%。^②

我们接着探讨阿根廷经济问题的特殊因素。阿方辛总统经历了13次大罢工,统治也因此被削弱,而梅内姆总统在其统治的前三年中,没有遭遇任何罢工,尽管他的新自由政策给庇隆主义阵营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毫无疑问,梅内姆得益于庇隆主义集团松散的支持,而不是他政策的转变。同样,他也受益于来自于国内外的资本的广泛支持。阿方辛的就职是在债务危机最严重之时,而梅内姆不同,他就职时国际债务危机刚刚结束,国际资本正在寻求新的输出市场,这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最后,梅内姆总统回归法团主义的械库,并以此控制劳工。大多数劳工领袖和联盟的基金和权力都来自于官方的褒奖。于是,正如之前巴西的热图利奥·巴尔加斯(Getulio Vargas)和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梅内姆总统以官方嘉奖为武器,来加强建立新统治集团的联盟,拒绝给予其挑战者(如CTA)法律上的认可。自发性罢

^① 前面引用的 Acuña 和 Smulovitz, “¿Ni olvido ni perdón?” pp. 39—45 中,有对花脸起义军时代为何及如何结束的精彩分析。有关对梅内姆总统论据充分的批评,即以推翻法庭来之不易的判决的代价换来和平,参见前面引用的西班牙上校 García 的著作: *El drama de la autonomía militar*, pp. 269—276。

^② 上述民意测验参见 Catterberg, *Argentina Confronts Politics*, p. 110, 以及他的 “The Balance of Transition: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Efficacy in the Southern Cone” (递交拉丁美洲研究学会第 XV 届国际会议的文章, Buenos Aires, July 21—25, 1991)。

工被宣布为非法,坚持罢工的联盟则要冒丧失官方地位的风险,或者会失去国家对其特别行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和20世纪30年代的巴尔加斯和卡德纳斯一样,梅内姆政府获取了对各个联盟巨额社会福利基金的广泛控制,这是庇隆都未能达到的状态。^①

尽管没有劳工的强烈反抗,但梅内姆总统的第一个经济计划丝毫不比阿方辛总统的成功。迫于对再次恶性通货膨胀的畏惧,1991年2月,梅内姆总统任命多明戈·卡瓦洛(Domingo Cavallo)为新财政部长,卡瓦洛呼吁议会(庇隆主义者及其联盟占多数)和社会各个部门加以支持,以扭转不断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随着通货膨胀的缓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满意率从1991年3月的16%上升到1991年12月的68%。^②到1992年中期,阿根廷多数人认为,经过较长时期的政府低效力和低合法性之后,阿根廷开始发展成为某种具有适度效力和若干合法性的政体。

196

超越“不可能的博弈”?

奥唐奈在一部著名的著作中,运用博弈论模型来阐释阿根廷的选举政治,证明阿根廷1955—1966年间的政党民主是一个“不可能的博弈”。^③虽然我们不会完全套用奥唐奈的分类,但也将大致回顾一下三个核心假设和规则,事实上,正是这些假设和原则导致这个时期的民主成为某种不可能的博弈。

第一个核心假设是,既然庇隆主义党是最大的政党,那么应当不允许他们参加竞选,因为他们几乎毫无疑问会获胜,并且一旦他们在竞选中获胜,将不会实行民主的统治,而且也无法通过选举来免去他们的职务。1943—1955年胡安·庇隆(Juan Peron)掌权时,他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心理,使那些

^① 对梅内姆控制劳工的策略的简要却发人深省的回顾,参见 Rosendo Fraga, “1991, fin de un poder sindical”, *Ambito Financiero* Dec. 30 1991: p. 18。关于庇隆主义的法团模式及法团主义控制的根源,参见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31—350。

^② Estudio Mora y Araujo, Noguera y Asociados 的大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意调查。

^③ Guillermo O’Donnell, “An Impossible ‘Game’: Party Competition in Argentina, 1955—56”, in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pp. 166—200。

本身非民主的团体得以打着保护民主的旗号,来掩饰其不民主的行为。

奥唐奈提出的不可能博弈的第二个核心假设是,最大的反庇隆主义政党——激进公民联盟,不可能强大到足以赢得选举,除非对庇隆主义党加以某种限制。然而,即使激进党通过半自由的选举就职,他们也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因为庇隆主义在联盟中的势力是如此强大。

197 第三个基本假设是,资产阶级接受军队作为选举博弈的仲裁者。仲裁者具有两项主要功能。其一,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到合法性危机的存在(比如庇隆主义及其小党派同盟的胜利),仲裁者就有权终止该轮的选举博弈。其二,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到效力危机的存在(比如弱势的反庇隆主义政党无法进行有效统治),仲裁者也能够结束该轮的选举博弈。资产阶级授予军方仲裁者这些权力,主要是考虑到军方可作为可靠的同盟,或是暂时的统治者,不会试图建立永久的非选举型博弈。当然,博弈的假设是在一个间隔之后——在此期间,相应规则略有变动——另一轮选举博弈即将开始。

虽然奥唐奈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认为这种博弈规则,将会给阿根廷政治体制带来长期的双重危机,即涉及(对庇隆主义党)排斥程度的民主合法性危机和涉及对民选政府(激进党)有限支持的效力危机。这种双重危机,加上仲裁者通常不去尝试建立墨西哥式的独裁主义霸权(一旦这么做,就会失败),就共同促成了阿根廷长期存在的发展危机。各参与方不能建立联盟,从而以政策项目为基础,建立民主或非民主的体制。此种情况下,“理性参与者”将致力于积累和使用非民主的资源,且几乎没有人想继续任何特定的选举博弈。由此,奥唐奈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总结:

一旦博弈进行了一轮,参与者对博弈规则有了充分认识,就会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能有赢家的无效博弈。因此,理性的参与者就会变得“不忠实”(他抵制博弈,至少没有兴趣推动博弈继续)和“不负责”(既然最后每个人都会失败,任何可能的短期目标都应该追求)。这样,博弈不仅是无效的,同时也成为助长两极分化的动力。既然没有参与者希望继续,博弈因而很容易就被终止了。^①

^① Guillermo O' Donnell, "An Impossible 'Game': Party Competition in Argentina, 1955 - 1956", in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p. 180.

奥唐奈的经典分析发表于1973年,但我们认为,阿根廷1976—1983年的军人政体,就用武力改变阿根廷经济政治和展开新的博弈而言,也可看做是一种可怕的、基本上完全失败的尝试。军方及其同盟试图构造新的博弈模型,而新模型在效力和合法性两方面,都戏剧性地遭受失败。没有人愿意参与第三轮的“官僚威权主义”博弈(第一轮博弈开展于1966—1973年,第二轮在1976—1983年)。

就我们所套用的书中的分类而言,1953—1983年阿根廷的“奥唐奈”选举政治博弈,具备以下特征:民主并非各个城市中最佳的选择。民主一直伴随着大多数团体的半忠诚和经常性的不忠诚行为。主要参与者几乎没有动力继续当下的民主博弈。国家内部盛行着对选举政治体制的谴责。

198

考察相关再次民主化尝试案例的一个重要进路,就是观察导致之前崩溃的若干因素是否仍然存在,以及新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政治意识的增强,是否在根本上存在一个新的环境,来促进制度化和民主巩固尝试的再度进行。很明显,我们所描述的阿根廷选举政治的特征,本身就足以使民主巩固的博弈成为不可能。那么能否证明1992年后,阿根廷的政治将转变成为一个可能的民主博弈呢?由此,让我们再次对“不可能博弈”的三个核心假设进行粗略的考察。它们是否依旧存在,或是已经发生改变了呢?

我们首先来探讨在不可能民主博弈中资产阶级、军方和庇隆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对资产阶级而言,现实中决不仅存在单纯的选举博弈,因为庇隆主义作为选举中的优势力量,不仅是一个无法接受的选举联盟,也是一个不被认可的获胜者。而对庇隆主义者而言,军方是选举博弈中合理的仲裁者,或一系列博弈中可能的同盟,因此他们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充其量是半忠诚的。然而,1976—1983年,军方构建其自身博弈模型的尝试,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军方—政党的三方关系。军方肆意的杀戮和刑讯,意味着许多“不受拷打阶层”的成员,其子女已受刑讯并(或)“失踪”了。同样,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的冒险如果再持续几个月,就会导致英国在阿根廷的产权的普遍剥夺。马尔维纳斯的胜利或许能开辟第三世界中可能的政策同盟,但这会严重伤及阿根廷资产阶级的社会认同和经济联盟。军队也呈现出分裂和衰弱的危险状态。鉴于后马尔维纳斯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状况,到1983年,资产阶级不再把军方当做一个可靠的同盟或可信的仲裁者。最终,梅内姆采纳了,更重要的是,实施了某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党派长期倡导的大部分的新自由政策,于是在庇隆主义者心目中,此时的庇隆主义党从一个不被接受的同盟转变为一个基本上被

认可的同盟(在1990年代早期,甚至是一个事实上的同盟)。资产阶级、军方和庇隆主义政党之间不可能的民主关系,一去不复返了。^①

199 不可能民主博弈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对于选举博弈中的众多参与者而言,竞争、自由和广泛选举不可能实现。这也正是争议所在,主要是由于庇隆主义总是会获胜,却又不完全遵循民主的规则,并且,即使激进党赢得大选,鉴于庇隆主义的力量,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事实上,奥唐奈指出,早在弗龙迪齐(Fron-dizi)总统任职期间(1958—1962),作为最大的反庇隆主义政党,激进公民联盟(Radicales del Pueblo)就逐渐确信,“考虑到当时的普遍情况,他们决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②。1973年底隆主义阵营压倒性的胜利,以及他们对庇隆主义左翼游击队准军事暴力的容忍甚至纵容,进一步助长了人们所谓的“阿根廷政治铁律”——即自由选举中庇隆主义的胜利及其对少数人权利的摒弃。1983年的自由选举中,当劳尔·阿方辛和激进党人获胜时,他打破了一直以来的阿根廷政治铁律。1995年,梅内姆重新当选为总统。然而,激进党人(和左派联盟[FREPASO],1995年首都选票超过庇隆主义党的新党派)寄希望于到1999年,阿根廷政治体制能够着手进行政党规则方面的调整。如果民主博弈继续进行,三大政党中的激进分子相信他们能够获胜。获胜的期望也增加了各个党派领袖维持民主博弈继续的跨时的动力。

然而,旧博弈中的若干因素,仍困扰着某些激进党中的积极分子。庇隆主义联盟领导13次大罢工反对阿方辛的激进党政府,而当权的激进党人也无法维持有效的经济政策,这都可看做是不可能博弈的某种延续。尽管这样,1992—1994年,一些激进党的领导人开始在私下认为,如果梅内姆能够继续维持可行的经济模式,抑制贸易联盟的自治权,未来的激进党政府(不必应付不忠诚的军队和经济危机)有充分的可能比之前更有效率。

不可能博弈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于某种危险的言论,即阿根廷存在一个永

^① 芝加哥大学的卡洛斯·阿库纳(Carols Acuña)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吉希森(Edward L. Gilbson)在其优秀的博士论文中,均对保守党—企业—军方关系的根本转变展开了更为详细的探讨。阿库纳指出,民主成为现实中的最佳选择,军方成为不受欢迎的同盟,参见“intereses empresarios, dictadura y democracia en la Argentina actual (o, porqué la burguesía abandona estrategias autoritarias y opta por la estabilidad democrática)”(Buenos Aires: CEDES, Feb. 1992)。吉布森则关注政党的军队分支成为不受欢迎的同盟者,以及梅内姆和保守党派之间的新自由联盟,参见“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Argent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② O'Donnell, “An Impossible ‘Game’”, p. 188.

久的多数政党，而这个政党对民主最多只是抱着矛盾心理。我们已看到，1983年选举中庇隆主义的失败部分地冲淡了此种言论。而时间，不论是生物意义上的还是历史意义上的时间，也缓和了这些言论的力量。并且，随着主要政治人物的去世，一些政治争执也逐渐消亡。在某种程度上，阿根廷的不可能博弈更多地源于庇隆，他生前代表着阿根廷政治中特殊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极端。作为墨索里尼统治时期崛起的领导人，庇隆能够创立并维持某种半法西斯主义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学说。且庇隆主义在庇隆生前，更多的是某种运动，而不是政党。然而，庇隆的政策及其自相矛盾的学说，使其统治得以在政党和运动两方面都延续下去。1955年以后，鉴于军队和资产阶级的重要部门对庇隆难以排解的敌意，对庇隆而言，选举已决非现实中最佳的选择。于是，他庇护且促生了多种超党派和超民主的资源。

200

然而，梅内姆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接掌了政权。像佛朗哥的继承者一样，他无法继续维持一种不复存在的历史时代精神。同样，经过对庇隆联盟的打击，梅内姆及其党内最有可能的继任者，甚至会逐渐根据民主选举，而非运动的力量来进行权力决策。如果此种动向切实发展下去，那么不可能博弈的最后一个要素也将发生转变。

我们不能断言，之前不可能博弈的三个相互关联因素的转变，就足以实现民主的巩固。然而可以肯定，这些转变是逐步展开可能出现的民主博弈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上述三个因素的改变，增进了能够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博弈的行为类型。三大政党和主要商业集团没有表现出任何彻底的民主不忠诚行为。1990—1994年，由于效力的提升（而非下降），对民主制度的系统性批评进一步减少。基于三个主要政党均相信他们有机会获胜，且在未来实行有效的统治——进行民主博弈的跨时激励也增强了。最后，鉴于某种普遍的认识，即军方不再是可靠的非民主联盟伙伴，民主越来越成为现实中最重要、且日益成为最佳选择。然而，尽管我们认为在阿根廷民主已成为某种可能的博弈，我们仍然会密切考察那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即新涌现的有关民主质量的问题。

阿根廷民主的质量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巩固民主的五个场域，以及各个场域中如何合理地执行各种活动并发展相应规则，来加强其他场域的民主实践和价值（参见表

1.1)。我们首先从已探讨的五个场域来简要地评价梅内姆总统对民主质量的影响。

201 如果新民主政府的运作一向停留于(或超越)宪法的边缘,就会明显削弱法治及其主要的组织原则和立宪制度。基于对梅内姆总统统治风格的明确认识,当前阿根廷著名的法学家卡洛斯·尼尼奥(Carlos Nino)指出,“虽然人们对政变或是民主崩溃的恐惧已经日益模糊,但这些情绪却转化为对民主退化和缺乏的担忧”。同样,阿根廷政治社会学家胡安·卡洛斯·托雷斯(Juan Carlos Torres),也对民主的质量感到忧虑,认为如果梅内姆的统治风格不进行调整,将招致某种“伴随着低度公民权的低度民主”^①。由这些迹象判断,梅内姆总统对法治的矛盾态度,不仅削弱了宪政主义,也影响了民主实践的质量,以及政府机构、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规范。

在四年任职期间,梅内姆总统充分运用了一项宪法条款,即总统可以发布政令,如果他确定那是“必要和紧急的”。1853年到1989年之间,历届前任政府发布的政令不超过30条。而1989年到1993年之间,梅内姆总统发布了244条法令。此外,宪法要求立法机关对这些法令进行事后追认,而梅内姆总统的244条政令中,只有74%曾经提交议会,并且仅有4%完全通过追认程序。然而,几乎所有的法令依然生效。由于立法机关中梅内姆总统拥有多数支持,因此其法令不会受到挑战。^②

当梅内姆总统面对最高法院可能的反对时,他利用立法机关中的多数,把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从5个增加到9个。关于这个未公布的变动的议会讨论,仅用了41秒。更糟的是,梅内姆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当时陷于重大的腐败指控之中,某些指控与梅内姆本人也有关联。^③ 刑事调查即将展开。此种情况下,梅内姆成立了仅从属于最高法庭的高级刑事法庭,并赋予其相应的司法权,即有权重新审查和推翻全国任何法庭的判决。对这个法庭,梅内姆几乎全部安排了他的支持者。所有的被任命者终身任职。若是梅内姆在任职期间或

^① 1993年7月26—29日,斯泰潘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卡洛斯·尼尼奥和胡安·卡洛斯·托雷斯的访谈。

^② Mateo Goretti 和 Della Ferreira Rubio 的研究,引自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Southern Cone Report* (Sept. 9, 1993), p. 8。

^③ 阿根廷著名的调查记者奥拉西奥·贝韦茨基(Horacio Verbitsky)在相当长的一篇采访中,评述了有关腐败的指控、司法干扰和对宪法的藐视。参见“Menem es el jefe de la corrupción”, *La Maga* (March 11, 1992), pp. 1—3。也参见他的畅销书 *Robo para la corona: Los frutos prohibidos del árbol de la corrupción*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1)。

之后被判有贪污罪,他必须通过这个法庭来定罪。^①

尽管新闻界几乎没有对上述审查制度进行直接报道,然而“恐惧文化”再次弥散开来。本来在阿方辛总统任上,这种气氛几乎已消失了,而在梅内姆总统在任期间又浮现出来。举例来说,阿根廷记者同盟的领袖声称,在梅内姆政府统治的前42个月中,有139名记者收到匿名恐吓并且发生了55例的人身袭击。他坚持认为这些匿名事件“来自于那些和政府相关的人”。1993年议会选举前5个月的准备时期,主要的保守派报纸——La Nacion,提出控诉,声称他们的22位记者都收到了死亡威胁,特别警告他们必须停止对梅内姆总统的批评。^②

202

阿方辛总统就职后恢复了1853年宪法,其中明确禁止总统连续当选。1992至1994年间,梅内姆投入了大部分精力来更改这个宪法条款。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以至于他的内务部长在辞去职务时也提出警告:他相信某些梅内姆的政治特务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梅内姆的连任。^③ 主要反对党发表声明指出,梅内姆政府任何可能的修宪程序,都会使其处于“破坏合法性”的边缘。^④ 然而,1993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庇隆主义阵营战绩辉煌,而之后,前总统阿方辛做出了令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震惊的举动——与梅内姆总统签订个人协定,允许修宪委员会撤销禁止现任总统竞选连任的条款,以此作为某些改革的筹码。^⑤ 最终,阿方辛的政党,在一次充满憎恨和尖锐分歧的政党集会中,批准了梅内姆—阿方辛协定。1995年5月的选举中,尽管联合国儿童基

① 1993年7月25日,斯泰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卡洛斯·尼尼奥的访谈。

② 参见“Politics and Press: Menem's Attitude 'Authoritaria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The Southern Cone Report* (Sept. 9, 1993), pp. 6-7。

③ 参见Mario Daniel Serrafiero对宪法危机精到的阐释: *Las formas de la reforma: Entre Maquiavelo y Montesquieu*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1994)。关于部长的辞职,见第二卷, pp. 173-175。

④ 同上。

⑤ 关于阿方辛签订这个协定的原因,至今没有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这是避免类似于1949年庇隆遭遇的立宪崩溃再次发生的最好途径。另一些人则指出,他是为了自己再次涉足阿根廷政治,成为主要权力掮客。阿方辛强调,修宪提议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削弱超总统主义”。然而,塞拉费罗(Serrafiero)对梅内姆—阿方辛协定(有时称作Olivos条约)的严密分析则表明,事实上,大多数修宪提议并不能限制日益极端的总统特权。提案中的内阁首席官职位,号称为准首相,实际上几乎没有实权,这对削减总统全方位的权力毫无意义;而且,新的地方干预程序,尽管立法机关在其中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对民主体制而言,权限仍然过于宽泛。总之,修宪提案在事实上符合一定程度的宪法和法律合法性,即总统“授权立法”。有关Olivos条约的全文,以及对其各条款的精确注释,参见Serrafiero, *Las forma de la reforma*, 2: pp. 195-224。

203 金会(UNICEF)报告说阿根廷西北部的死亡率剧增,尽管贪污的事实继续被披露,尽管人权团体谴责梅内姆对军方模棱两可的评论——“我们打赢了这场肮脏的战争”(和五月广场的母亲们所受到的打击),梅内姆还是取得了个人的胜利,以两倍于其政党的选票实现连任,从而得以掌控总统职位,直到世纪之交为止。^①然而,鉴于阿根廷独立立法和司法的缺失以及总统主义的修宪历程,在阿根廷,高质量民主的巩固,还远远不能保证。

梅内姆总统的反对者们(尤其在激进党中),有时会以违反宪法为由讨论对他的弹劾。^②而他的同盟者则强调,梅内姆虽然处于宪法的边缘,但没有僭越。事实上,在对法律系统和立法制度尊重上,公共舆论对梅内姆总统相当不满。^③总统在宪法体系中的擦边行为和公众对其政治风格的认可程度,显然无法共同促进民主的巩固。由此,奥唐奈或许会指出,阿根廷呈现着“委托式民主”全部令人担忧的特征:(1)获胜的总统候选人本身是优势党派成员。(2)国会和司法机关的相关制度成为某种妨碍,它们的职责也成为不必要的障碍。(3)总统及其办公人员成为政治的主要部分。(4)巩固的民主下,当选的执政官处于某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而委托式民主的总统则把自己和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利益分离开来,成为“他”的政策成效的唯一负责人。对奥唐奈而言,委托式民主或许会,或许也不会转变为威权主义,但它不可能成为巩固的民主。^④

204 巩固的民主理想状态,应当是高效能和高合法性的结合。然而,即便在政府效力相对较低的时期,较高的合法性也能够促生经受得住经济低迷的巩固

① 此次选举中,激进党的得票遭遇其自由选举中百年不遇的滑铁卢,但左派联盟(Frepaso)作为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偏左翼反对党联盟浮出水面,并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事实上比庇隆主义党更多的选票。在竞选中,左派联盟更多地强调了诸如社会福利和腐败等问题。有关最终的选举结果,参见“Politics: Menem Exceeds all Expectation”,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Southern Cone Report* (July 1, 1995): pp. 2—3, 和“Dead Return to Haunt Menem: Government Would Prefer the Past to Remain Buried”,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Southern Cone Report* (April 20, 1995): p. 3。

② 例如,1992年2月,Jorge Vanossi 议员以对宪法的多重侵犯为由,提出详细的长篇指控。然而,由于梅内姆对议会和司法机关的控制,Vanossi 认为提案从未得到严肃的对待。

③ 例如,1991年12月,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卡特伯格民意调查中(N=500),61%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84%的被调查者认为,国民政府中存在“很多”或“相当多”的腐败现象,60%的人认为司法机关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自主权,只有14%的人认为政府尊重议会。

④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East South System Transformation Projec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1, working paper no. 21)。表现出较强委托式民主倾向的政治家有秘鲁的藤森,阿根廷的梅内姆,美国的佩罗和巴西的科洛。对奥唐奈著作的缩略版,参见 *Journal of Democracy* (Spring 1994), pp. 55—69。

民主。1990年代阿根廷高效力的代价是委托式民主以及仅仅过得去的合法性吗？如果是，那么当效力降低时，这样一种政治系统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①

^① 举例来说，人们一般会想到卡洛斯·安德雷斯·佩雷兹(Carlos Andres Perez)的统治风格给委内瑞拉民主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统治有效力时(由于高石油价格)，佩雷兹十分受欢迎，但1970年代卷入贪污事件。90年代早期，他再次回来执政时，统治失去了效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石油价格下降)，并再次陷入腐败。委内瑞拉民主几乎因此而崩溃。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密切关注阿根廷经济，并指出，1992—1994年低通胀/高增长的经济，隐含着三种潜在的缺陷，最终可能导致效力的下降。这三个缺陷分别是：(1)比索对美元的汇率过高，这会导致支付平衡问题；(2)私有化进程中，国家财产一次性的拍卖掩盖了结构性的预算赤字；(3)关键产业中相对较低的投资水平。阿根廷的经济不同于智利，甚至也不同于巴西，在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tequila effect)中受到较大波及，明显削弱，这进一步加重了上述担忧。1995年的经济低迷加剧了阿根廷新自由经济政策持续的“社会赤字”。

第十三章 不完整的转型/接近巩固:智利

智利军方,尤其是陆军,围绕过渡期条款进行斗争时所处的地位(具有制度性,并且与文官结成同盟),远远超越了巴西、乌拉圭或阿根廷。在巴西,由于军方自身的原因,1974年就开始自由化,并由此在经济日趋恶化、主要企业家纷纷加入民主反对派的情形下,走向其长期的“让步和征服”进程。在乌拉圭,到1980年,所有的主要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军方及其宪法提案。而资产阶级也不相信军方能制定必要的“防御”规划,或是可靠的“基本”规划,因此也不采取任何维护政权的行动。在阿根廷,军方的权力惨遭失败,并严重分化。然而在智利,截然相反,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资产阶级愿意放弃当下的政治领导权,作为对军方对抗左翼的防御规划的回报,也作为对军方用以引导经济的基本规划的回报。到1988年,军方掌权15年之后,军队更加团结一致,威权主义政权在市民社会中也仍然拥有坚定的核心支持者,皮诺切特也打算着依照宪法再进行至少十年的统治。^①

^① 有关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进攻”和“防御”规划的不同组合,以及市民社会对军方的敌对和支持程度的详尽分析,参见 Alfred Stepan, “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载于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 Theda Skocpol 编: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17—343。关于1973年智利民主及其崩溃原因的分析,参见 Arturo Valenzuela, “The Breakdown of Chilean Democracy”, 载于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编: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也有单独的平装本)。智利政治科学家特别关注的军人政权的基本规划,参见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El Proceso Político Chileno* (Santiago: FLACSO, 1983), 尤其是 pp. 163—171。有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参见 Garretón,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lean Military”,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和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95—112, 尤其是 pp. 98—103。关于说明皮诺切特如何把智利军方转化为新型政体基础的分析,参见 Genaro Arriagada, *El Pensamiento* (接下页)

皮诺切特放弃权力,仅仅是因为反对派联合和动员起来利用了皮诺切特宪法本身可能存在的一个弱点。1980年,皮诺切特将军及其追随者制定了一部威权主义宪法,并提交全民投票表决。不同于乌拉圭,在智利,大多数传统右翼势力和商业集团积极地争取宪法的通过。尽管投票程序存在相当的缺陷,这部宪法终究在进一步的公投中“获得认可”。1988年,宪法再次进行公投,公投中,如果被四人军政府一致同意的被提名者获得多数选票,他就能够作为“当选的”总统,在之后的八年中进行统治。^①然而,世人皆知,皮诺切特就是那个被提名者,可虽然他获得了44%的选票,却没能得到今后八年统治所需要的50.1%。^②

这就确立了1989年总统大选和1990年3月权力让渡的框架。^③同时,这也注定了极度受束缚的转型模式,以及在南欧及南锥国家所有案例中最不忠诚于民主的权力让渡。

在概念引入中,我们认为,对新民主政府而言,最限制性的宪法原则在于新任政府必须同意即将卸任的威权主义政权制定的威权主义宪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鉴于皮诺切特强势的谈判立场,他实现了这个要求。智利新民选政府允诺在1980年宪法(1989年有一定程度的修订)下实行统治,并且

(接上页) *política de los militares* (Santiago: CISEC, 1986)。有关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事实上比巴西和阿根廷(同样的政策努力,却迅速归于失败)走得更远的评定,参见 Alejandro Foxley, *Latin American Experiments in Neoconservative Econo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关于国内外主要专家就智利基本规划是否对劳工、政党和社会运动产生的影响的宝贵论文集,参见 Paul W. Drake 和 Iván Jaksic 编,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le, 1982—199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1)。

① 1980年宪法如何开启了可能性,民主反对派如何开始动员以使他们的机会最大化,相关讨论参见 Alfred Stepan, “The Last Day of Pinche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5 (June 2, 1988): pp. 32—35。

② 尽管民主反对派对此胜利表示极其满意,但看到智利非民主的统治者获得了迄今发生的民主转型中非民主统治者所获得的最高选票,他们仍深为不安。对此次公投和显示选民之所以组成统一民主阵线投票反对皮诺切特的民意测验的分析,参见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El plebiscito de 1988 y la transición a la democracia en Chile” (Santiago: FLACSO Cuadernos de Difusión, 1988), 和 Roberto Méndez, Oscar Godoy, Enrique Barros, and Arturo Fontaine Talavera, “¿Por qué ganó el ‘No’?” *Estudios Públicos* no. 33 (Summer 1989): pp. 83—134。有关公投的一系列调查,发表于 CERC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Contemporánea), 由 Marta Lagos 和 Carlos Huneeus 整理。

③ 有关1989年选举运动及其结果,参见 Alan Angell 和 Benny Pollack, “The Chilean Elections of 1989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 Research* 9, no. 1 (1990): pp. 1—23; Arturo Fontaine Talavera, Harald Beyer 和 Luis Hernán Paúl, “Mapa de las corrientes políticas en las elecciones generales de 1989”, *Estudios Públicos*, no. 38 (Autumn 1990): pp. 99—128。

试图困难地通过宪法本身规定的修宪程序,来消除其威权主义特征。

207 尽管民主决策方面存在上述持续性的限制,然而,1991年8月7日,艾尔文(Aylwin)总统宣布,智利的民主过渡已经完成,在1994年3月总统任期结束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民主。^①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观念上,明确转型是否真正完成都是相当重要的。在政治上重要是因为,如果在转型事实上尚未完成时,人们认为转型已完成,那么就有可能使主要的民主积极分子开始把不民主的限制当做可以忍受的,最坏的假设是——当做某种有用的统治方式。

这就是说,或许有必要回到我们对完全转型的定义。对于此定义,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出了三个要素:首先,政府经大众自由投票执掌政权;其次,政府有推行新政策的权威;第三,新主体制下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事实上不被其他机关分享。依照这种界定,到1994年3月艾尔文政府卸任时,仅有第一个标准完全符合。1989年12月的总统大选实现了大众自由选举,国会选举也一样,尽管对有关选举的法律存在很大的争议,导致民主联盟“Concertación”——可能失掉了多达17个的席位。^②皮诺切特的1980年宪法,尽管经过了1989年公投中通过的民主反对派商定的重大更改,仍然包含着某种明显特征,即新任民主政府依法必须与其他一些个人和机构分享权力,而这些机构和个人却并非源于民主的基础。

事实上,对于民主主权最主要的法律限制,是前任非民主政府赋予其本身的宪法特权,即对参议院47个成员中9个成员的任命权,这就反过来限制了民主政府制定新政策的权威。^③在智利的场景下,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1980

^① 艾尔文政府的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对此断言展开了详尽的反驳,参见 Eugenio Tironi, “Sobre el fin de la transición” *ASPI* (Oct. 21—Nov. 3, 1991): pp. 19—21。1993年,艾尔文总统适当改正了之前的言论,并注意到,在认为过渡已完成之前,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需要实现。

^② 关于选举法,尤其意外结果如何产生的演示模型,参见 Aeturo Valenzuela 和 Peter Siavelis, “Ley electoral y estabilidad democrática: Un ejercicio de simulación para el caso de Chile”, *Estudios Públicos*, no. 43 (Winter 1991): pp. 27—87。

^③ 参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1980*, articles 45(第45条)。1980年宪法某些关键性的威权主义特征如何通过1989年公投后的谈判而消除掉,对此精辟的分析参见 Carlos Hueeus, “En defensa de la ansción: El primer gobierno de la democracia en Chile”,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February 1995), pp. 9—13。对通过1989年和1991年的宪法修订被改变了的及未被改变的状况的评述,参见 Mark Ensalaco, “In with the New, Out with the Old? The Democratizing Impact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Chil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6, no. 2 (May 1994): pp. 409—429。

年宪法的争议性特征,以及皮诺切特发布的众多紧急补充“组织法”,确立了博弈规则,即选举系统、法院构成、管理机关和半自治机构这些威权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都需要两院 60% 的票数。^①执政联盟(Concertacion)实际赢得了 38 个开放投票议席中的 22 个,本该差一个席位就达到 60%。然而参议院 47 个成员中 9 个“指定参议员”的存在,意味着事实上执政联盟甚至还要两票才能实现简单多数,还差 6 票才能达到 28 票,才有可能在宪法框架下改变 1980 年宪法的非民主特征。^②

对新任民主政府权威的另一个法律限制是关于军人统治的继续。宪法赋予了皮诺切特将军在 1998 年 3 月之前作为陆军最高首领的无可争辩的特权,也赋予了军政府其他三个来自海军、空军和武警的领导人同样的特权。^③军政府的四个成员,在八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④

军方及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中的同盟者,束缚着民主政府制定政策和规范的能力,而随着军方建立了自身强大的物质、意识形态及领导的自治权基础,这种束缚就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艾尔文总统宣誓就职的 12 天前,皮诺切特签署了一项军队宪法基本法,并得到宪法法庭的通过,而该宪法法庭是皮诺切特于 1980 年成立并任命的。^⑤这项法律大大提高了军队在制度上的自治权。在关键的人事政策领域,基本法撤销了总统可命令军官退役的权利(这本来可以成为艾尔文总统的法律手段,用来开除某些声名狼藉的虐待或侵害人权的现役军官),并且,对主要将军任命的把关(keep-gating)成为全军总司令

① 参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1980*, articles 116—119.

② 对宪法和 1989 年选举结果存在的问题的精彩分析,参见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La redemocratización política en Chile: Transición, inauguración y evolución,” *Estudios Públicos*, no. 42 (Autumn 1991); pp. 101—135.

③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isposiciones Transitorias, Octava.

④ 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和权力,参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1980*, 95 条和 96 条。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两个非军职成员分别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公共行政长官,均由皮诺切特任命,并有相当长的任期。因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八个成员中,仅有两个与新任民主政府密切相关,即智利总统艾尔文和参议院议长加布里埃尔·巴尔德斯。

⑤ 参见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Ley Orgánica Constitucional de las Fuerzas Armadas,” *Diario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 no. 18.948 (Feb. 27, 1990); pp. 1678—1683。既然宪法法庭已正式通过这项法律,从而就需要某种宪法修订来改变它。

209 专有的特权,从而导致有抱负的军官们更加依赖于皮诺切特。^① 另外,鉴于军队的所有可选课程和所有出版物都在全军总司令的严密控制下,军官团民主再社会化的任务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② 最后,对军队而言,调节军费的民主力量也被严重削弱了。基本法确保此后军队预算不低于1989年的较高预算水平。更重要的是,智利的出口商品是铜,军方可从出口铜的国有企业销售额中抽取10%的外汇,并且军方有权保留任何出售军队财产的收入,其中包括大量的土地和建筑。^③

权力关系从来都不是静止的。相对于军方,艾尔文的就职典礼之后,民主政府的相对权力开始增长,这是因为民主政府通过选举而产生,也由于在财政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莱(Alejandro Foxley)精明的政治和技术指导下,经济表现优异,同时军方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丑闻。但尽管如此,取消这些合法的军方非民主特权的斗争,或许会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末。

1980年宪法除了其指定的参议员和特殊保障体系,还设计有其他许多防护措施。军人政体下制定的宪法和众多的宪法基本法,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法律想要改变它们,颁布前必须获得宪法法庭的批准。而1980年宪法设定了这个法庭的构成和功能,旨在将其与直接的民主压力隔离开来。当1990年民主体制接掌权力时,它面临着一个七人组成的宪法法庭,所有成员都由皮诺切特任命,在他们到75岁的退休年龄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撤职。此外,当他们最终换届时,七个法庭成员,现任总统也仅能提名其中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名两个,最高法院(1990年时,大多数由皮诺切特任命)提名三个,最后一个则需要参议院中绝对多数的通过(由于指定参议员,民主政

① 参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1980,第24—32条以及第53条。共和国总统没有任命权,但有权拒绝签署,从而不许可晋级。艾尔文总统很少行使这个特权。正常情况下,由皮诺切特推荐的军官晋级都会被批准。参见“Chile: Army Promotions Accepted”,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s: Southern Cone Report* (No. 24, 1994): p. 5。相对于西班牙,在这一点上,皮诺切特对军官晋级的控制远远超越了佛朗哥。

② 参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1980,第47条。基本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军队的宪法使命是“保证共和国的制度秩序”。

③ 参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le*:1980,第47条,第93—93条。对这些条款的充分探讨,参见 Guillermo Pattillo, “El gasto militar de Chile en la década de los ochenta: Un análisis introductorio”, in Guillermo Pattillo, Fernando Bustamante, and Miguel Navarro, *¿Cuál debe ser el gasto militar en el Chile de los 90?* (Santiago: CED—Editorial Atena, 1991), pp. 13—51。关于军队预算特权的国会和国会外的争论,相关评述参见 Claudio Fuentes, “Debate en torno al gasto militar: Nuevas Perspectivas”, *Fuerzas Armadas y Sociedad* 6, no. 4 (1991): pp. 24—49。

府未能拥有参议院中的多数)。^①

另外,随着民主反对派将在选举中获胜,并组成下届政府的趋势越来越明晰,皮诺切特将军开始致力于推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实体,以进一步束缚现任民主政府的政策自由。能说明这种无耻的不忠诚的转型的典型例证是,皮诺切特政府在即将卸任之时,给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极其丰厚的经济诱惑,让他们提前退休,从而他就能在这些位置上安排年轻的效忠者了。新政府上任前,某个著名的州立电视台被低价卖出,一个“独立的”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得到任命。皮诺切特颁布了保护大多数公共部门的任期的法律。举例来说,内务部有 556 个审定编制,而新当选政府在理论上仅有 12 个可任命的职位。^②

葛兰西用城堡周围的壕沟来比喻一个强大的威权主义国家。^③ 智利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加雷顿(Manuel Antonio Garretón),把这些保护措施称作“威权主义壁垒(enclaves)”,除此之外,斯泰潘也论述过,民主政府必须削减军方特权。^④ 不论使用何种术语,显而易见,在非民主特权的链条连锁机制撤销或大大削减之前,智利的转型无法完成,更明确地说,智利的民主

210

① 关于这种补充制度,见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第 81 条。1991 年,七位法官中的一个去世,总统艾尔文行使权力指定欧亨尼奥·贝拉斯科(Eugenio Velasco)接任,贝拉斯科是执政联盟(Concertación)的领导人物。我们对宪法法庭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1992 年 3 月 7 日斯泰潘在圣地亚哥与 Velasco 法官的会谈。

② 这些和其他众多法律和法令,就是所谓的“约束法”(leyes de amarre)。相关的讨论和详尽的论证,参见 Angell and Pollack, “The Chilean Elections of 1989”, pp. 1–23。现任艾尔文政府怎样才能控制中央银行,并解除某些法律的约束,比如涉及电视的法律约束,对此颇有见地的探讨,参见 Huneeus, “En defensa de la transición”, pp. 9–16。

③ 参见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238。

④ 有关“威权主义壁垒”的精彩论述,参见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La posibilidad democrática en Chile* (Santiago: FLASCO Cuadernos de Difusión, 1989), pp. 51–62。斯泰潘对特权的相关论述,参见他的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93–127。对斯泰潘 1988 年特权分析的后续具体评述表明,到 1995 年,大部分特权仍然没有得到改变,参见 Mark Ensalaco, “Military Prerogatives and the Stalemate of Chile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1, no. 2 (1995): pp. 255–270 以及 Wendy Hunter,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in Post-authoritarian Argentina and Chile” (为关于 Fault Lines 的美洲民主治理的会议准备的论文 *Governance in Americas*, North-Sout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ami, May 4–6, 1995)。1993 年竞选中,弗雷总统把消除非民主特权作为他政纲的一部分。然而,到 1994 年 11 月为止,民主政府想要质疑军方最为重要的特权,似乎只能等到弗雷政府阶段性改革的第四阶段,这或许是在 1997 年,而那时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总司令以及指定参议员的任期都已经结束。参见 “Chile: Phased Reform of the Constitu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port: Southern Cone Report* (Nov. 24, 1993), p. 3 和 Hunter,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也不能得到巩固。

211 主要参与者通过文章或是私人谈话,间接暗示我们,民主政府掌权之前,他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争取广泛的基础,以消除民主转型中的重要阻碍。对此的策略是把新总统对公众的吸引力,与国会就某些民主权利达成的一致意见结合起来。整体解决方案中,最先要考虑撤去指定参议员,以保证总统有权令军官退役,改变皮诺切特和其他总司令不可动摇的地位,调整宪法法庭的构成和使命,把智利的决策和执行制度由总统制转向半议会制模式,并且,地方官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然而,艾尔文总统政府卸任之时,这些政治优先议题中唯一实现的是地方选举,于1992年7月举行。

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尝试某种更广泛的解决,即清除非民主特权的连锁机制时,政府的主要官员答复说,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法院都没有选票。此外,他们强调,他们主要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虽然不要求宪法的更改,但需要他们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政策,以赢取参议院中部分右翼反对派的支持。鉴于对消除威权主义壁垒的危险和困难的认识,第一任民主政府决定,作为稳定和争取其他民主权利相关事务上少许政策支持代价,暂时保留这些非民主的特权。

就我们的理论框架而言,智利由此明确地证实了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出的假设。我们曾指出,对转型施加最多限制的前政府类型,是某种以高级军官为基础的非民主政府,而且,高级军官是团结的,在市民社会中也有强大同盟。此种情形下,我们认为,离任的军人政权有充分的能力对转型强加任何限制性条件,它们仅仅是在国家范围内撤回,但仍掌握着国家重大决策的使命和资源。这种情况已发生在智利。我们曾提出,六种制宪程序中,最不民主的一种是新任民主政府不得不同意旧威权主义政权下制定的宪法,并试图通过其中规定的博弈规则来增强其权力。这同样也发生在智利。由此,在政治上,与本书中探讨的任何拉美和南欧国家案例相比,智利的民主开始于最受约束的宪法环境之下。^①

从理论上来说,1990年3月11日执政联盟政府将从何着手,四年中他们

^① 波兰特殊的情况是,圆桌会议对转型制度的商讨也附加了类似的限制性条件,但这些条件最终被克服。智利和波兰的不同在于波兰的非民主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组织,而非高级军官的全部武力支持。另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尼加拉瓜,在那里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的总统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在事实上,并且某种程度上合法地与桑地军事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司令“共存”。

又能走到何种地步？民主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机制刚开始运行，且权宜退出的相对自治的军队势力又回到了国家机构中，国家的大部分均不在民主政府的控制中。而且，这些威权主义壁垒拥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联盟资源，因为在两次竞争激烈的投票中，市民社会给予威权主义政权及其同盟者高达43%的支持率。这一点上，智利与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国家的首次竞选中，旧政权同盟的支持率仅在7%—12%的范围内波动。

新任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力量是在政治社会中。尽管存在宪法上的限制，民主政府至少控制着政府，并且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参议院中也掌握着相对多数。四年之后，在国家、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中，新任政府会扭转此种权力关系，使之向有利的方面发展。

这一节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探讨关于智利的两种前景。其中一种前景中，或许至少要到1998年，智利的民主才能实现像葡萄牙那样的“共时性”成果。也就是说，当最后一个威权主义壁垒最终被移除时，智利将在同一天完成过渡，并实现民主巩固。

对第二种前景的考虑未免有些失礼。其中，民主巩固长期受阻的后果，或许会推动一系列的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会削弱民主统治的合法性和能力。或者更严重的是，甚至可能促使最初民主联盟的一部分倾向于受保护的民主宪法的“治理优势”。

让我们首先来考察“葡萄牙式”或者说“共时性”方案，这也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前景。1988年的公投期间，皮诺切特一再警告，反对党的胜利将会重蹈政党混乱、社会冲突和经济无秩序的覆辙。正是因为许多选举人仍然信任皮诺切特的防御和进攻项目，他赢得了43%的选票——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获得的选票一样多。然而事实上，正如在西班牙和乌拉圭，不论市民社会还是政治社会，都对之前民主的崩溃进行了反思，并运用他们的很多政治学习来推动民主的运作。和乌拉圭一样，政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管皮诺切特对十二党联盟有怎样的预测，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人的领导下，执政联盟内部显现出令人钦佩的共同合作及奉行一致政策的能力。政治暴力虽然继续存在，但程度不再激烈，成为更加边缘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所有政党都组织起来抵制此种行为。通货膨胀不仅没有加剧，而且相对于皮诺切特总统在任的最后两年时的状况，达到更低的水平。此外，鉴于政府经济政策坚固的经

济基础,智利的国际金融投资也再创新高。^①

213 鉴于皮诺切特司法、军事和政治权力资源的存在,侵犯人权的遗留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考虑到这些力量的交错关系,艾尔文政府判定阿根廷大范围审判的模式并不可行。事实上,他们认为阿根廷1984—1987年的文—武危机,可归因于某种进程,因为这个进程,国家的一个要素(军队组织)与国家的另一要素(民主政府的行政机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为了避免阿根廷式的冲突,也为了防止类似于乌拉圭政府的做法(被他们评定为过度“遗忘”政策),艾尔文政府选择了某种折衷的办法,在关于前军人政体下军方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推行“事实机制”。

政府发动了对1973—1985年期间侵犯人权行为和政治暴力犯罪的全面调查,并公布了结果。^②然而,折衷的决策规定起诉只能在个人之间进行,以此避免阿根廷那样的州内冲突。他们的方案并不能充分符合公正的要求(个体指控相当困难),也不能满足人权激进分子的期望。尽管有相当的保留,但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多数智利人都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这是当前形势下在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最好结局。

在众议院中牢固的多数联盟支持下,在努力实现某种意义的巩固方案,争取参议院中的部分民主权利的过程中,艾尔文政府——不同于巴西和阿根廷政府依赖法令的“委托式民主”,也不同于乌拉圭政府的僵局状态——证明是相当有效力的。在各个领域,他们都有能力制定并执行一整套连贯的计划,而

① 国际金融共同体对民主政府第一年表现的积极反应的典型行为,见 John F. H. Powell, Joyce Change 和 Dirk W. Damrau 的调查报告:“Chile: An Investment-Grade Credit” (New York: Solomon Brothers, May 1991)。其中,他们指出,“我们认为,智利应当被视作拉美第一个投资信用级别国家,原因如下:智利对于经济政策目标存在强烈的共识……智利的政治稳定是可持续的……慎重的宏观经济安排产生了健康的成果……智利受到外来冲击时的脆弱性已显著降低”(p. 1)。1995年,尽管墨西哥“货币危机”冲击了阿根廷,但智利可靠的经济表现,证实了这些判断是正确的。

② 艾尔文总统在一场煽动性的、全国电视转播的典礼上,向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提交了两卷报告。这个报告通常被称作为“Rettig Commission”。胡塞·扎拉凯特(José Zalaquett),作为调查团的八个成员之一和大赦国际执行委员会前主席,对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对侵犯人权问题的回应进行了比较,参见“Derechos humanos y limitaciones políticas en las transiciones democráticas del Cono Sur”, *Colección Estudios CIEPLAN* no. 33 (Dec. 1991): pp. 147—186。1992年3月5日,斯泰潘对扎拉凯特的访谈,加深了我们对“Rettig Commission”作为和不作为的理解。对此全方位的重要评估,参见“Human Ri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Agreements: Chile during President Aylwin’s First Year” (New York, Americas Watch, July 1991)。有关智利和乌拉圭的精彩比较分析,参见 Alexandra Barahona da Brito, “Truth or Amnesty.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Uruguay and Chil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93)。

且,这些计划不会遭到 1980 年宪法,或者虽逐渐削弱却仍然强大的皮诺切特保守联盟在事实上的否决。

表 13.1 智利与西班牙的合法性与效力

214

单位：%

指 标	智 利		西 班 牙		
	重新民主 化后 1 年 (1991 年 3 月)	重新民主 化后 2 年 (1992 年 3 月)	重新民主 化后 1 年 (1978 年)	重新民主 化后 2 年 (1980 年)	首次选举 后 11 年 (1988 年)
合法性					
“对我们这样的国家而言, 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86.6	79.1	77	69	87
效力					
“民主能够使我们(西班牙人/智利人)面临的问题得以解决”	78.7	67.0	68	45	56
样本数目(个)			5898	3132	4548

资料来源:关于智利的数据来自“Evaluación del segundo año de gobierno democrático”(Santiago: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Contemporánea, May 1992), table 33。关于西班牙的数据来自 José Ramón Montero 和 Richard Gunther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Spa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VI World Congress, Berlin, Aug. 21–25, 1994。

鉴于这种情况,相对于西班牙、葡萄牙和乌拉圭这些巩固的民主国家,到 1992 年中期,在对民主的支持态度方面,智利已经胜出。在 1992 年,我们的四个拉美国家案例中,智利是唯一一个公民对民主的合法性和效力均表示信任的国家。事实上,根据这些标准,智利和西班牙异常相似(见表 13.1)。对智利与巴西之间有关公民对高效力的认识的比较,尤其令人吃惊(见表 13.2)。

表 13.2 公民对于民选总统(智利的艾尔文,巴西的科洛)领导下的民主政治运转两周年后政府效力的认知

单位：%

指 标	智 利	巴 西
	(1992 年 3 月)	(1992 年 2 月 20–22 日)
“这届政府正在有效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	23.1	3
“这届政府尚未有效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这需要时间”	54.1	32
“这届政府无法有效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	12.8	29
“任何政府都无法有效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	8.3	30
不知道/未作答	1.8	6

资料来源:智利的数据来源与表 13.1 相同, table 58, 样本数目为 1500, 取自全国范围。巴西的

数据来自 Datafolha, 样本数目为 2500, 取自全国范围。

215 同样, 智利甚至比西班牙更多地强调某种事实, 即虽然民众认为前威权主义政体“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然而一旦民主体制走上正轨, 压倒性的舆论便支持民主。在西班牙, 表 9.4 显示, 44% 的西班牙人认为佛朗哥政权“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在智利, 1989 年 10 月, 55% 的民众抱有这种想法。^① 然而, 皮诺切特成为民主现有障碍的事实, 导致民主政府就任一年半后, 皮诺切特的威信就远远低于民主派的主要人物了。1991 年 12 月, 智利开展一项民意测验, 涉及民众对 31 位公众人物的积极或消极印象。民主政府的主要人选, 总统艾尔文、财政部长亚历杭德罗·福克斯莱和教育部长里卡多·拉戈斯(Ricardo Lagos)(社会学家, 争取民主党创始领袖), 受到绝对的欢迎。年轻的右翼民主党领袖, 安德烈·阿拉曼德(Andrés Allamand)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最终, 最不得人心的两个人物分别是皮诺切特将军和极左领袖博洛迪亚·泰特尔伯恩(Volodia Teitelboin), 泰特尔伯恩直到 1988 年还在谈论大规模起义的必要。^②

最后,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 巩固的民主需要有某种特定的国家机构, 使公民认为它实用并且相当公正。在巴西的案例中我们看到, 公民对警察怀有强烈的恐惧。而在智利, 尽管接近皮诺切特政权, 国家警察局还能够完整地保留某些职业形象。在智利, 民主反对党赢得选举两年后, 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显示, 76% 的人认为国家警察局(carabinero)会帮助他们或者与他们类似的其他人, 而在自认为是支持左派的被调查者之中, 这一比例为 71%。^③

鉴于 1992 年早期对民主体制合法性、效力和公正的赞同态度, 智利民主的态度层面似乎表明, 智利正走在通向民主巩固的道路上。同样, 鉴于多数政治行为者不忠诚和半忠诚行为的减少(军方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例外), 民主巩固的行为层面的因素也相当有利。这种情形让人更倾向于相信葡萄牙式

① “Informe Encuesta Nacional”, CERC, Santiago, October 1989, 表 8。

② 作者获取的 CERC 民意测验。

③ 参见“Estudio social y de opinión pública”, 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 *Documento de Trabajo*, no. 173 (Feb. 1992): p. 65。the Policía Civil de Investigaciones(PCI)也是有效力和非暴力的。1991 年到 1994 年 7 月期间, 智利最活跃的恐怖主义集团(Movimiento Juvenil Lautaro)的 53 个高层领导成员, 在“不流血行动”中被抓获并关押入狱。参见“Entire Lautaro Leadership in Gaol”,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port: Southern Cone Report* (Aug. 1994), p. 7。

前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所有束缚民主裁决机制进行决策的能力的法律限制最终都被克服时,在那一天,智利向民主的过渡以及智利民主的巩固,或许会同时发生。

这就引入了最后一个问题。假如不得等到 1990 年代末才能清除非民主特权,制定民主宪法,那么,如果需要的话,智利民主将付出何种代价?早在把皮诺切特导向失败的选举举行之前,智利民主反对党中的许多领袖人物,从左翼到右翼,就回顾了 1973 年智利民主崩溃的原因,并讨论了将来如何来巩固民主。对于智利本质上是一个带有强烈政党意识形态的多党体制的事实,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在过去,民主反对党领袖认为,这种结合倾向于产生少数政府、立法僵局,以及民选总统通过法令或是国会控制等范围以外的手段来统治的尝试。许多智利流亡者曾经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居住,在他们看来,现代的议会制度对智利而言,似乎是一个合适的选择。^①这时,出现了某种近似一致的共识,即总统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些人甚至指出,首任民主政府中,虽然联盟仍然团结一致,但在未来的总统竞选造成他们完全分裂之前,民主反对党应当走向议会体系下的半总统制。然而一旦掌权,面对皮诺切特联盟对宪法改革的抵制,以及他们本身奋力推进社会经济政策措施的愿望,政府就决定把政治改革推后。

216

然而,到 1992 年早期,执政联盟的两个主导力量,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内部出现了隐蔽却强有力的候选人开始着手他们的竞选,这不可避免地在执政联盟内部造成了某种紧张状态。^②我们的理论和比较分析引发我们思考:1985 至 1988 年期间智利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仍然正确。然而我们相信,在政治中,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选举竞争的逻辑和担任总统的诱惑,导致相较于 1990 年代初,在 90 年代末整合一个成功的议会制联盟对智利而言将更加困难。反过来,这也使聚集统治联盟的任务更加艰

① 他们都参加了 1989 年 8 月在智利召开的有关这一主题的会议。会议结束之时,争取民主党(PPD)领袖里卡多·拉戈斯,基督教民主党(PDC)领袖安德列斯·萨尔迪瓦(Andres Zaldivar),以及主要右翼民主党——民主革新党领袖,安德烈·阿拉曼德(Andrés Allamand),都对重新考察智利总统制的需要提出了观点,之后不久,基督教民主党秘书长杰纳罗·阿里亚加达(Genaro Arriagada),就此主题撰写了开创性的论文,主要涉及智利的多党总统制如何产生“双重少数”的政府,以及为何需要议会制。

② 两位主导的“前候选人”来自于执政联盟的两个主要政党,分别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埃杜阿多·弗雷(Eduardo Frei)和争取民主党的里卡多·拉戈斯。1992 年中期,关于 1993 年 12 月大选的民意测验中,弗雷拥有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最终拉戈斯放弃候选人资格,弗雷轻松获胜。

巨。为什么？

217 一些人指出,鉴于执政联盟的存在,以及众议院中多数一致的力量,尽管没有转变为议会体制,但智利已经实现了议会制的联盟价值。或许是这样。但1990—1994年,执政联盟的作用主要归功于1980年宪法施加的限制对联盟各成员的强大刺激。显然,联盟内部包含国内政治习得,但宪法和皮诺切特对部分国家机构的控制,也成为强大的凝聚因素。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随着皮诺切特的存在逐渐淡化,总统制下的多党竞争加剧,智利的联盟症结将再次变得更加棘手。^①

而皮诺切特继续反对侵害人权审判,并且凭借他的偏好和能力,阻碍民选政府进行宪法改革及清除军方特权连锁机制的努力。这一切的代价或许就是,在公民眼中,民主制在某种程度上渐渐失去吸引力,甚至合法性。到1993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我们预测的后果开始日益成为现实。尽管经济效益持续良好,艾尔文总统也拥有极高的个人声望,然而被调查者中,对民主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百分比从1990年8月的75%下落到1993年8月的37%。^② 1993年6月,皮诺切特展示了军队的武力,而总统也无力贯彻他宣告的针对军方特权的政策调整,在此之后,被调查者中认为“民主制完全确立”的百分比在1991年10月是25%,1992年3月是20%,而艾尔文政府即

218

① 这个命题的理论前提是,相对于多党总统体制,在多党议会体制下,将会存在更多的建立持续联盟的动机。对此论点,世界上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的数据提供了有力的经验主义支持。1980—1989年,在Laakso-Taagepera范围内,存在14个议会和半总统体制,和3—7个有效政党。10年期间总统制民主的“最高有效政党指数”是委内瑞拉的2.6个政党,智利在皮诺切特之前通常的政党指数接近于6——对议会民主制而言完全正常,而对总统民主制则是一个异常的例外。参见Alfred Stepan和Cindy Skach,“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s. Presidentialism”,*World Politics* 46 (Oct. 1993): pp. 8—9。有关议会制的一般观点,以及对智利总统制下的问题的分析,参见*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89—1993年,艾尔文政府具备显著的联盟和准议会制特征。弗雷总统政府则更多地表现为总统制模式。举例来说,弗雷总统事先没有征求任何社会党同盟意见,就免去了他内阁中最重要的社会党成员的职务。在议会制联盟下,这种行为几乎不可能发生。社会党秘书长警告说,“正是缺乏磋商逐渐削弱着建立可能性统治同盟的基础”。参见:“Chile: Socialist Angered by Loss of Top Post,”*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Southern Cone Report* (Oct. 20, 1994), p. 6。

② 马尔塔·拉戈斯(Marta Lagos)向我们展示了多种CERC民意测验,上述下滑也包含在其中。拉戈斯设计了这些测验,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他认为,对合法性指标下滑最恰如其分的解释,就是民众对军方持续控制政策议程关键部分的消极反应。参见“Informe de Prensa Encuesta Nacional”, CERC, Oct. 1993。

将卸任之时(1993年10月),则降到了16%的新低点。^①甚至1993年10月,有40.6%的被调查者事实上认为军方想要再度执政。^②

1995年6月,退休的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Manuel Contreras)将军,作为恐怖的前秘密警察(DINA)的首脑,因牵涉1976年在华盛顿暗杀智利主要的反对党领袖奥兰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被判入狱。然而,在他入狱之前,军队的直升机把已定罪的孔特雷拉斯神秘地接走,从他的农场转移到一个海军医院。4个月的逃离后,孔特雷拉斯最终被安置于有军队守卫的特殊监狱。在智利,1993—1995年,军方与此类似的威胁行为和对民主政府的蔑视,远比巴西、乌拉圭或阿根廷显著。此种举动,再次向智利民众强调,转型进行七年之后,仍然存在民主政权无法有效控制的重大政策领域。

最后让我们以反思结束。1980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当时政府的特权——国会必须坚持行政机关指定的严格的时间表,他们无法启动重要的资金议案,总统的职责也被限定于皮诺切特为他自己设计的结构之中。密特朗在野之时,常常把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宪法称作“永久政变(coup d'état)”。^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当选总统,正是密特朗赋予了戴高乐宪法最终的合法性。同样,假如智利民主政府发现1980年宪法中的某些特权相当有利于统治,从而把这些特权程序化和合法化,以改善“民主”的质量,而若是智利现行民主的质量,最终证实不如上述“民主”的质量,这将无疑是一个可悲的讽刺。

① 同上书,表5。

② 同上书,pp. 23—24。

③ Francois Mitterrand, *Le coup d'état permanent* (Paris: Plan, 1965).

第十四章 南美:总结性评论

在南欧共同体中,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都是在等级控制的军事政权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一事实在我们所研究的四个国家中都构成了有力的约束性条件。我们认为这个变量解释了南锥共同体和南欧之间在民主巩固方面的差别。

我们也相信其他一些因素,即便不直接和这一变量相关,也有助于解释南锥共同体民主巩固的艰巨程度。我们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总结本书的南欧部分,拉美也存在相似的情况,只是可能存在更多的问题。

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欧洲社会有一个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可以利用的积极的政治经济网络,并且欧共体成员国的身份对这些国家有财政激励。在南欧,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意味着占国民生产总值 5% 的经济增长。南锥共同体则没有类似网络的存在。美国领导的民主市场经济国家被视为外债的根源。20 世纪 80 年代南锥共同体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市场一体化带来了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5% 的外债负担。然而,90 年代中期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之间共同市场的建立有助于这四个国家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2. 希腊和葡萄牙在非民主时期是北约的成员。然而 1980 年代,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却减缓了他们从军事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变,因为北约支持基于军事政权的任务和认同。忠诚于北约的态度在这些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引发了政治家和公众的争论。但是成员国身份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充满紧张的问题“在民主国家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军事力量”不是公民和军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南锥共同体没有类似北约的关系,里根和布什政府鼓励拉美军队所从事的角色只和反走私等领域相关。

3. 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南欧国家“像关注政治权利的讨论那样关注经济的

发展方向和运行”，这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力关注民主巩固的政治方面。在拉美，部分由于债务危机的原因，经济问题很快变得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甚至最终超越了政治，我们认为这损害了民主的巩固。智利是唯一的例外，它的经济状况良好而政治状况却很糟糕。

4. 和欧洲不同，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实行不受限制的选举的议会。巴西尝试建立这样的议会，但却受到军队及总统的制约；智利的民主政治家也不急于把自己从独裁中解放出来；乌拉圭和阿根廷选择了修复的方案。尽管在阿根廷有过彻底改革的讨论，但最终我们看到的却是为梅内姆连任所设计的特别改革。

5. 所有南锥共同体的转型都是从固定总统任期开始的，并且保持了总统制。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这一改革引发了一些制度问题。在巴西，出现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僵局，“事故”总统若泽·萨尔内任职五年并且阻碍了宪法大会的议会化选择，他的统治常常依赖军队的力量。在阿根廷，选举日程表之间的差别阻碍了受欢迎的阿方辛总统在1984—1985年的选举中获得多数票，而使不受欢迎的阿方辛在1987—1989年继续执政，直到他在国会选举中被完全击败。在乌拉圭，前三任文职总统都是议会少数派。总统制的动力不足使有效的联合政府在三个国家都遭遇了空前的困难。智利新建立的联盟合作是否能够在皮诺切特影响力衰弱的情况下生存，仍值得关注。

6. 考虑到文武冲突限制了国家主权并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加上长期的经济危机以及总统领导下政府脆弱的联合能力，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对民主制下国家良好运转的期望会如此之低，甚至是在第一届民选总统结束他们第一任任期之前。^①菲利普·C.施米特提出了“一个冷冻时期”的说法，认为一些国家可能是被迫选择了民主制度，因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更为弱小。幸运的是，即便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第一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独裁制仍然是缺乏吸引力的。三个国家1989年的总统选举使人们对新总统的信任重新高涨。然而从民主理论和稳定的观点来看，阿根廷对梅内姆总统的全民投

221

^① 例如，1988年11月在阿方辛、桑吉内蒂和萨尔内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认为本国的状况“糟糕”或“非常糟糕”的人口比例在巴西是84%，在阿根廷是60%，在乌拉圭是57%，只有1%的巴西人、4%的阿根廷和乌拉圭人认为他们国家的情况“好”或“非常好”。认为国内状况“既不好也不坏”的人在巴西是15%，在阿根廷是36%，在乌拉圭是38%。以上数据来源于 *Proyecto Cono Sur*，见 Edgardo Catterberg 和 María Braun，“Notas para un balance de la transición”（为有关民主巩固的会议准备的文章，Santiago, Chile, Aug. 10-11, 1989），p. 19。

票和巴西科洛总统被弹劾更像是“委托式民主”(连带其所有的希望和危险),而不是民主的巩固。

7. 总之,和葡萄牙、希腊、西班牙不同,在我们所研究的四个拉美国家的案例中,只有具有危机倾向的乌拉圭因为其高度的合法性以及困难的政治经济状况才可以被视为民主巩固。智利转型过程中的军事特权使它不能被看做是巩固的民主。巴西 1993 年比 1986 年距离民主巩固更远。阿根廷虽然有轻度通货膨胀,但它的总统缺乏合法性。除此之外,四个国家市民社会要求的国家和政府的“透明”和“问责”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四个国家都实行选举政治。

附录:公民如何看待民主

1995 年 8 月,修改这本书时,我们得到了以拉丁美洲的标准衡量的结果。这一调查采用了普通的问卷和普通的方法。表 14.1 总结了和民主合法性、民主效益、对未来预期相关的结果。这一重要调查的所有含意需要项目协调人全面严格的进一步分析,然而即使在这一层次,我们依然能够关注和本书相关的调查结果。

阅读本书前几章,我们能够找到关于民主合法性的答案和对特定条件下独裁制的态度,即对乌拉圭民主巩固的支持态度和对巴西案例的关注。这一附录中的额外数据将给读者提供关于这两种模式的更具说服力的信息。

222 阿根廷和智利对民主合法性问题的回答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在本书关于智利的章节中,我们提出了智利公民对民主满意度下降的趋势,然而随后我们发现的 1995 年智利 52.2% 的支持率(低于 1991 年的 63.8%)和阿根廷 76.6% 的支持率的差别令人困惑。

对于是否倾向于独裁政府这一问题的回答表明,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独裁制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市场。然而在巴西和智利,数据则表明独裁制的继续有很大可能。事实上,持这样观点——“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民主和非民主政权没有太大区别”——的人的比例在巴西和智利比在阿根廷和乌拉圭高 4 倍。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巴西对民主的较低认同不是源于更多的独裁者或是“冷漠”的态度,而是许多人的“不清楚”回答,这种情况在巴西占到 13.8%,在智利是 2.4%。

表 14.1 对民主合法性和效力的态度和对未来的预期：
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1995 年

调 查 问 题	被调查者百分比			
	乌拉圭	阿根廷	智利	巴西
“以下说法中你最同意哪个？”(合法性指标)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80	76.6	52.5	41.0
“某些情况下,威权政府优于民主政府”	8	10.9	18.5	21.1
“对像我这样的人,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没有太大差别”	6	6.1	25.3	23.3
“不知道”	4.0	6.4	2.4	13.8
无答案	2.0	—	1.5	0.8
“一些人认为民主能够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另一些人认为民主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下列描述哪个最接近你的观点?”(效力指标)				
“民主能够解决问题”	54.0	52.9	47.6	45.6
“民主不能解决问题”	34.0	36.6	46.4	44.6
“不知道”	9.0	10.5	4.3	9.2
无答案	3.0	0.1	1.7	0.7
“你会将国家描述为……”(预期)				
“进步的”	29.0	30.6	52.6	43.7
“停滞不前的”	45.0	43.2	39.1	37.7
“倒退的”	22.0	22.8	5.8	15.8
“不知道”/N. A.	4.0	3.4	2.4	2.9
N	(1213)	(1200)	(1240)	(1200)

资料来源:Latino Barometer, Marta Lagos 指导的项目。全部的结果将在 1995 年末出版。非常感谢 Marta Lagos 给我们提供这些数据。数据的解释由我们负责。

在许多学者眼中,对民主效力这一问题的回答,即“民主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为以上差别提供了解释。然而,首先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民主效力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8.4%)远远低于在合法性问题上的差别(39.0%)。这再一次显示了认为合法性和效力总是紧密相连的看法既是一种概念错误,又是一种政治错误。

尽管乌拉圭和巴西民主效力的差别和两国民主合法性的差别是相符的,

这却不能解释完全的区别。^①更令人奇怪的是,在智利,对民主效力这一问题的回答比阿根廷更加消极。读者也许会认为这解释了智利和阿根廷合法性的差别,但可能也会感觉到这一结果和直觉相悖,因为智利的经济状况好于阿根廷,而且就民主的某些方面来说,智利也好于阿根廷。以这样的积极态度看待智利是正确的,因为 52.6%的智利人认为国家正在进步,而只有 30.6%的阿根廷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正在进步。同样,5.8%的智利人认为智利正在倒退,而有 22.8%的阿根廷人对他们的国家持这种态度。然而,智利强大客观的经济指标和智利人满怀希望的主观期望不能转变成他们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矛盾。然而,我们相信调查结果和我们的如下分析是符合的,即智利转型的不完善、90年代中期智利和阿根廷军队地位的差别以及智利民主运行的局限。

在一系列指标中,智利人比阿根廷人更满意于民主的质量。和阿根廷不同,在智利,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过去五年腐败明显增长(少于 14%),更多人认为通过电视的途径实现了公平(多于 7%),更多人认为选举更加清廉(多于 6%)。在经济领域,比阿根廷人多的智利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他们的父辈(多于 19%),比阿根廷人少的智利人认为过去五年贫困“增长很多”(少于 39%)。

表 14.2 对军队权力和信心的态度: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1995 年

调 查 问 题	被调查者百分比			
	阿根廷	乌拉圭	巴西	智利
“你认为在你的国家谁拥有最大权力?至少说出三个团体”				
“军队”	18.0	22.0	30.9	46.8
“你希望在你的国家谁拥有更多的权力?至少说出三个团体”				
“军队”	5.4	8.0	32.9	10.6
“你对……有最大信心?”(回答“最大”、“一些”的百分比)				
“军队”	37.5	44.0	58.7	54.3

资料来源:Latino Barometer(见表 14.1)。

^①事实上,47.3%的巴西人认为国家是“进步的”,只有 29%的乌拉圭人认为国家是进步的。这表明“民主比其他政府形式更受欢迎”(乌拉圭比巴西高 39 个百分点)这一答案是一个复杂的判断,不仅仅包括经济或其他形式的非政治进步。类似公正和平等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同对合法性的评价相关。

然而,如表 14.2 所示,在和军队的关系方面,智利和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有明显区别。阿根廷的数据很好理解,阿根廷比其他南锥共同体国家有更少的公民认为军队力量很强大。同样,在南锥共同体中,希望军队有更广大权利,并且信任军队的公民在阿根廷最少。这些数据加强了我们之前的论断,即军队作为自治且值得信赖的政治行为者的角色在阿根廷已被极大削弱。在巴西,希望军队拥有更多权力的人数是最多的,这和巴西低合法性的情况是吻合的。智利的情况是最复杂的,较多的智利人认为军队在他们的国家拥有强大势力,但只有在巴西才有更多的人信任军队。和阿根廷不同,智利军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与那些军队仍在政治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相同。

民主的崩溃和军队的统治给智利和阿根廷留下了不同的政治遗产,我们只能以这些遗产为线索进行研究,这需要我们更多的研究和分析。智利有很重要一部分社会特征受到 Unidad Popular 政府及与其相关的政党的影响。这些团体支持皮诺切特,并且在公民投票中继续这种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右翼政党和军队特权。在阿根廷,公民感到受政府或是一些政党威胁的情况低于政府倒台、游击恐怖主义或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暴力所带来的影响。然而 1995 年军队统治的悲剧在阿根廷没有发挥明显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破坏它的信誉。与此相对,部分右翼分子仍然认为左翼政党是社会的潜在威胁并且应该被取缔。在他们的眼中,很多左翼分子认为皮诺切特的政变是对民主的破坏,认为政变的牺牲者是进行合法选择的无辜公民,他们反对军队特权的继续存在。因此人权问题在智利和阿根廷具有不同的含义,它被写入智利的政治议事日程,但在阿根廷却没有被写入。智利军队特权的继续存在和对人权的限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审判是民主化进程中尚未完成的一部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智利对人权活动家提出的审判要求的回应和其他国家不同,乌拉圭(尽管不情愿)是通过举行全民公决决定的,阿根廷(尽管存在争议)是由通过两次民主选举的总统的赦免解决的,而智利的军队则进行了自我赦免。^①

在六年的民主统治之后,民主转型仍然是不完善的,军队仍然拥有广泛的特权并且有被赦免的权利。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

^① 这在 1995 年 6 月孔特雷拉斯将军定罪(他卷入一场政治暗杀)之后表现出来。在一次对“智利是否已调和”的问题的调查中,有 68.9%的人认为智利人尚未调和。在左翼中,有 63.7%的人希望有更多的审判,而只有 22.2%的右翼持相同态度。参见 Encuesta Nacional CERC(Santiago, July 1995)。

情况下,智利人对民主党的信任却越来越少。

表 14.1 显示在公众舆论这一场域,阿根廷似乎正在超越其之前的非民主成分,尽管梅内姆的领导方式和选民对他对法律和腐败的可疑态度表现出的容忍,会使我们想起阿根廷最近的社会和经济骚乱留下的后遗症。在智利,对过去、现在及未来政治的不安似乎不仅导致了我们在表 14.1 中所看到的较低的民主合法性,而且也带来了在巩固的民主国家所看不到的一些态度(见表 14.3)。

226

表 14.3 对政治自由和信任的态度:智利、巴西、乌拉圭、阿根廷,1995 年

调 查 问 题	被调查者百分比			
	智利	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
“所有政党都应该被允许”	38.6	62.8	59.0	67.0
“极端政党应该被禁止”	53.6	25.6	29.0	24.0
“没有政党民主也可以运行”	33.6	42.2	18.1	15.0
“政府的适当强硬无害于国家”	62.9	51.8	46.8	45.0
“对于政治人们通常会说出他们所想的”	28.5	31.3	46.4	NA

资料来源:Latino Barometer(见表 14.1)。

NA 表示数据无法获得。

在那些相信“民主能够解决国家问题”的人中,我们看不到四个国家对民主合法性信仰的明显差别。然而我们发现,在对民主的认可方面,四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和对民主潜在效力的积极态度是不相关的(见表 14.4)。

事实上,表 14.4 已经清楚地显示出那些相信民主效力的人对民主合法性的回答存在很大差异。在相信民主效能的人中,更愿意选择民主制度的人在乌拉圭是 89.8%,在阿根廷是 89.3%,在智利是 72.9%,在巴西是 55.2%。

如果效力和合法性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那些持同一种观念,认为民主无效的人中,对合法性的不同认识也应该相应地缩小。但事实却是这种差别很明显。这意味着在较低的社会合法性之下,对效力认同的缺乏会对公民的回答产生较大影响。巧合的是,这和我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萧条的欧洲效力缺乏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是吻合的。^① 在选择民主制度的人中对民主效力

^① 参见我们的“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s”,载于 Robert A. Pastor 编: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9), pp. 46-47, p. 58。

相信和不相信的差别分别是,乌拉圭(分别是 89.8%和 71.5%)18.3%,阿根廷 24.2%,巴西 26.2%,智利 39.8%。

表 14.4 对民主解决国家问题能力的认识以及乌拉圭、
阿根廷、智利、巴西对民主的态度(被调查者百分比)

调查问题	效力指标							
	“民主能够解决问题”				“民主不能解决问题”			
	乌拉圭	阿根廷	智利	巴西	乌拉圭	阿根廷	智利	巴西
有关合法性“下列表述中你最同意哪个?”								
“民主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形式”	89.8	89.3	72.9	55.2	71.5	65.1	33.1	29.0
“某些情况下,专制政府优于民主政府”	3.9	5.3	11.7	16.8	14.5	18.3	25.7	27.7
“对像我这样的人,民主和非民主政权没有太大差别”	3.8	1.9	13.4	17.2	8.3	11.7	37.9	30.7
无答案或“不清楚”	25.0	3.5	2.0	10.8	5.7	4.9	3.3	12.7
N	(660)	(617)	(590)	(547)	(411)	(427)	(575)	(535)

资料来源:Latino Barometer(见表 14.1)。

在不相信民主效力的人中优先选择独裁制的人数比例通常较高。那些不信任民主效力和选择独裁制的人在乌拉圭(14.5%)和阿根廷(18.3%)很少,但在智利(25.7%)和巴西(27.7%)则较高。缺乏效力通常导致更多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人民民主不会带来明显的不同”。但和前一结果相似,这一比例在乌拉圭(8.3%)和阿根廷(11.7%)较少,而在智利(37.9%)和巴西(30.7%)则较多。智利的高比例多半是由于“民主的赤字”,而在巴西则是因为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者”和“政治不知情者”。

在这一补充部分的最后,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基于经验的合法性和效力的类型,并且对四个南锥共同体国家的公民进行归类。我们分类的第一个标准是合法性。在合法性这一标签下我们又分为三个类型。如果被调查者认为“民主制度优于其他任何制度”,那么我们称他们为民主者;如果他们认为“在一些情况下独裁政府优于民主政府”,我们则称他们是专制者;如果他们认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民主制和非民主制没有太大差别”,那么我们称他们为疏离者。

我们分类的第二个标准是效力。我们能够简单地根据不同的回答将公民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民主能够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另一类则不相信。这两个标准构成了合法性和效能的六种不同组合。如果既支持民主又相信其效能，我们称之为有信心的民主者；支持民主但不相信其效力的，我们称之为忧虑的民主者(见表 14.5)。

表 14.5 民主合法性和效力的类型

合 法 性 指 标	效力指标	
	“民主能够解决问题”	“民主不能解决问题”
民主更优	有信心的民主者	忧虑的民主者
某些情况下,专制政府更好	专制者(潜在民主者)	专制者(对民主没有积极预期)
对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太大差别	疏离者(即便民主有效)	疏离者(不期望民主运行)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些接受访问者的分布。使用这些变量和拉美标准(Latino Barometer),我们能够将每一个南锥共同体国家的接受访问者归入不同的类型(14.6)。那些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且能够解决国家问题的人(在一些西班牙和南欧研究中被称作满意的民主者)在乌拉圭是 57.4%,在阿根廷是 54.9%,在智利是 37.9%,在巴西是 31.6%。^① 那些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却不能解决国家问题的人(在南欧研究中通常被称作民主的批评者)在乌拉圭是 28.5%,在阿根廷是 27.7%,在智利是 16.8%,在巴西是 16.2%。这两组都对民主制度有偏好,他们加起来在乌拉圭占到了接受访问者总数的 85.9%,在阿根廷是 82.6%,在智利是 54.7%,在巴西是 47.8%。

那些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专制政府更好”的人对民主制度能够解决国家问题表示不信任,但是也有一些人尽管接受独裁统治,但仍相信民主潜在的效力。这类人在乌拉圭(2.5%)和阿根廷(3.3%)较少,在智利(6.1%)和巴西(9.6%)则较多。

最后,还有一些对民主制和独裁制都持冷漠态度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对民主解决国家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我们发现在智利和巴西有很多持这种态度的人,即使他们相信民主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他们也会认为对于像他们

^① 参见 Leonardo Morlino 和 José R. Montero 的重要文章,“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载于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Jürgen Puhle 编: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1—260。

这样的人,民主没有带来太大差别(智利 7.0%,巴西 9.8%)。相反,乌拉圭只有 2.4%,而阿根廷只有 1.2%。

表 14.6 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西在民主合法性和效力类型中的经验分布,1995 年(百分比)

229

合法性指标	国家	效力指标		
		“民主能够解决问题”	“民主不能解决问题”	总数
		有信心的民主者	忧虑的民主者	民主者总数
	乌拉圭	57.4	28.5	85.9
民主更好	阿根廷	54.9	27.7	82.6
	智利	37.9	16.8	54.7
	巴西	31.6	16.2	47.8
		专制者(潜在民主者)	专制者(对民主没有积极预期)	专制者总数
某些情况下,专制政府更好	乌拉圭	2.5	5.8	8.3
	阿根廷	3.3	7.7	11.0
	智利	6.1	13.0	19.1
	巴西	9.6	15.5	25.1
		疏离者(即使民主有效)	疏离者(不期望民主运行)	疏离者总数
对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太大差别	乌拉圭	2.4	3.3	5.7
	阿根廷	1.2	5.0	6.2
	智利	7.0	19.2	26.2
	巴西	9.8	17.2	27.0

资料来源:Latino Barometer(见表 14.1)。两个问题都没有回答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入。因此百分比是基于两个问题都回答了的人数计算的。调查的数量乌拉圭是 1031 人,阿根廷是 1002 人,智利是 1135 人,巴西是 955 人。因为没有回答其中一个问题而未被计算的被调查者的百分比在以上四国分别是 14.3%、6.6%、8.4%、20.4%。在巴西未被计入的人口,几乎有一半回答了民主的问题,并且他们中有一半认为民主更好。

不巧的是,在南欧研究中所问到的问题不能使我们作出相似的类型区分,因为只有合法性这一标准被考虑到。那些回答“民主更好”的人在希腊是 87%,在西班牙是 70%,在葡萄牙是 61%(如果我们忽略了回答“不知道”的人群,则三个国家的数据分别是 88.8%、78.6%、79.2%)。民主人士可以通过对与民主效力相关问题的回答进行分类:下列陈述你同意哪个?(1)我们的民

主运行良好；(2)我们的民主有许多缺陷但仍在运行；(3)我们的民主状况在恶化，并且即将完全瘫痪。如果将前两个答案视为积极的态度，那么对民主的合法性和效力持这种积极态度的受访者(葡萄牙 77%，西班牙 75%，希腊 84%)在南欧新的民主国家的比例要高于南美南锥共同体国家。如果我们将第三种回答视为对民主效力的消极态度，那么“忧虑的民主者”在葡萄牙的比例是 9%，在西班牙是 12%，在希腊是 11%。带着避免缺乏严格比较的态度，读者能够通过图 14.1 来观察南欧和南美在转型开始 10 年后自信的民主者和忧虑的民主者的相对比例。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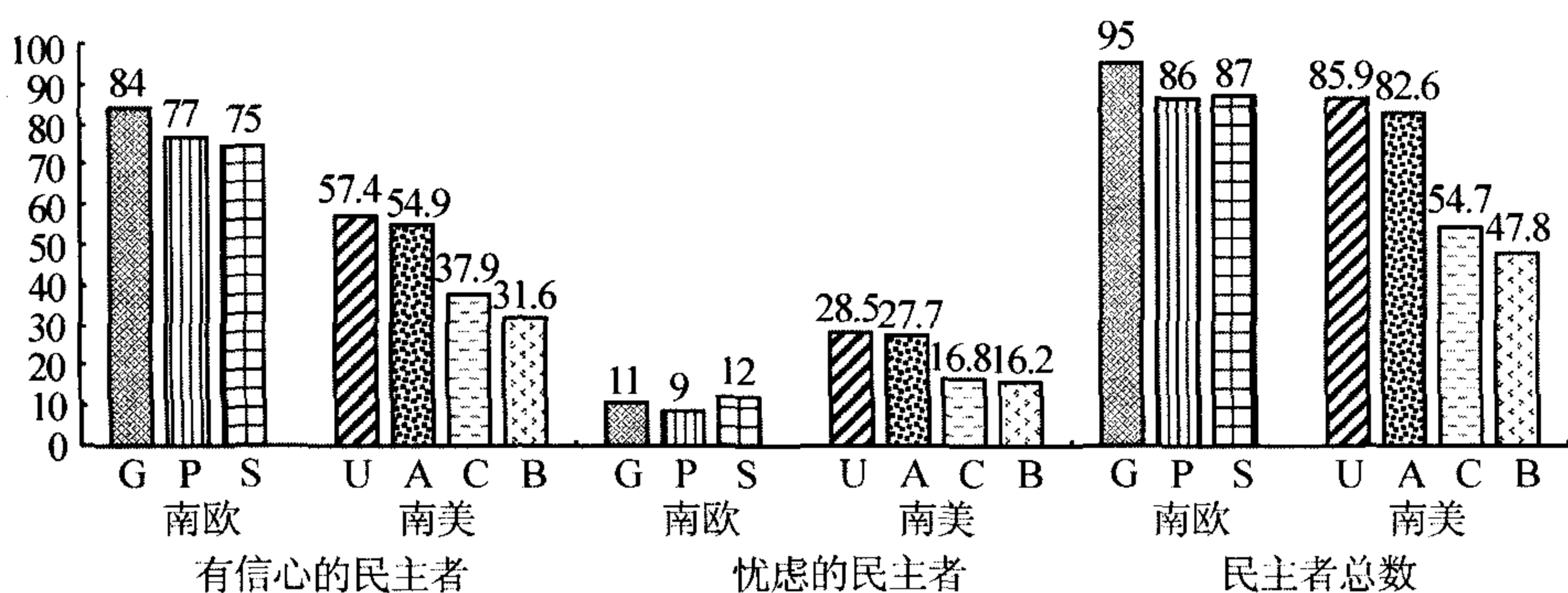


图 14.1 南欧 1985 年(大约民主转型后 10 年)和南美南锥共同体 1995 年(大约民主转型后 10 年)自信和忧虑的民主者

代码：南欧 G=希腊，P=葡萄牙，S=西班牙，南锥共同体 U=乌拉圭，A=阿根廷，C=智利，B=巴西

资料来源：南欧，Leonard Morlino 和 Jose R. Montero,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 载于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和 Hans-Jurgen Puhle 编: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1-260。南美，Latino Barometer (见表 14.1)。在表 14.6 中，只计入了两个问题都回答了的被调查者。

第四部分

后共产主义欧洲：最为复杂的转型路径和任务

1989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欧洲(包括苏联)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启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过程。1989年的时候,这一区域只有9个国家,而现在有27个国家,其中有15个国家是由苏联解体形成的。很明显,要对这一巨大的转型过程的特殊性进行准确描述,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也是对该区域进行研究的学者的工作,而这些学者必须具备必要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本书第四部分的目标,必须在空间范围和经验上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并且必须首先在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

我们每章的基本意图都是基于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之上的,并且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进一步阐述。我们希望,通过将后共产主义欧洲系统地纳入理论构建过程,能够突出必要时也可以重新表述或者否定现有民主化理论的某些方面。最后,通过阿尔伯特·O.赫西曼(Albert O. Hirschman)所说的“逾越”(trespassing)过程,我们打算不仅扩展民主理论的范围和有效性,而且意图对于分析后共产主义欧洲的世界历史转型过程做出些许贡献。

我们第四部分的七章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按照如下结构排序。第十五章关注的是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史前史,试图对该区域的共同因素和不同因素做出正确的判断。^①由于苏联帝国外围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大部分是苏联政策强加的,我们需要考察这些政策的影响,了解它们为什么发生转变,是如何转变的,以及转变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此外我们会进一步分析,本书第一部分开始讨论的全能主义和后全能主义政权的特殊遗产,是如何体现在有助于民主巩固的五个基本场域之中的。

第一个摆脱苏联帝国边陲地位的国家是波兰。第十六章我们会探讨,为什么波兰不同于欧洲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它从来没有完全形成苏维埃全能主义政体,而这点又怎样从1970年代开始为波兰挑战共产主义体制提供了特有的资源。但是,作为该区域第一个以圆桌会议声明(round table pact)启动转型的国家,从民主巩固的角度来看,波兰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却往

^① 所谓史前史,主要是指共产主义时期。更早的历史当然也是相当重要的。对中东欧国家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政治史进行分析的经典著作,可参见 Joseph 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以及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我们在本书这部分有所引述;其中后一本著作对“二战”之后各国转向共产主义的独特性进行了非常好的解释。也可参考 Hugh Seton-Watso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1918 — 194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往被低估。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就是反对派的风格在波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公民社会领域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阻碍了民主的、有效的政治社会的构建。若将巴西的情况联系起来，将更有助于解释这一点。

本书第一部分在对非民主政体进行分析时，我们曾提出，后全能主义内部存在显著的变化，包括初期、僵化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第十七章我们将通过考察案例来拓展我们的分析，一个是成熟的后全能主义的典型（1980年代后期的匈牙利），一个是僵化期的后全能主义案例（1968—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是相当初级阶段的后全能主义国家（1988—1989年的保加利亚），我们的研究兴趣在于把握政治结构，并对后全能主义连续统内不同起点的国家可能的民主转型的不同路径进行分析性的预测。

本书第一部分我们还对苏丹式政体进行过分析。我们认为，如果某种政体近似于全能主义和苏丹式理想类型的混合，那么就不会出现和西班牙和匈牙利一样的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的变迁路径。我们进一步指出，在这样背景下（可能是革命，或者国际力量的变化）发生的政体转型，民主的巩固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支撑民主政治体所必需的五个场域中的每一个场域，都难以形成民主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第十八章对罗马尼亚的分析将使我们从经验层面探究这一理论性观点，因为齐奥塞斯库政权同时具备着苏丹式政体和全能主义政体的要素。

处理好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三角关系，被认为是西班牙民主转型得以成功的关键。而无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许多后苏维埃国家的民主转型失败的关键。没有哪章可以公正地评判苏联民主转型失败的重要性和难度。但是，在先前对国家性问题进行理论性探讨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为敏锐地考察这一失败的某些方面（第十九章）。我们还将探讨，为什么国家解体对俄罗斯的民主设计者来说是一个难题。

从前苏联派生出的许多新兴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其民主巩固的失败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族群之间的内战和经济紊乱，部分是由于相互冲突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特点造成的，而这又对法治、民主的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及经济社会的创建造成极大的困难^①。不过，在前苏联范围

^① 这些新的政治体是肯·朱威特(Ken Jowitt)所明确预言的“新的世界失序”的典型例子，其社会很弱，而国家也很弱。参见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234 内这些新生国家转型的起步阶段,爱沙尼亚 1918—1933 年之间的民主经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经济实力也相对比较强——与前苏联的其他继承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具备了相对较为优越的条件去启动其转型(第二十章)。这样,爱沙尼亚可以满足我们关于民主的界定。爱沙尼亚(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拉脱维亚也是如此)转型进程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数量巨大的以俄罗斯语为母语的人口。由此,波罗的海国家为我们考察事实上的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提供了特殊案例,以探讨以下问题:在这些国家之中有时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的逻辑是相互冲突的,是否存在超越这些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是不可克服的,如何考量其代价)。

在本书最后,我们将从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引申出一系列广泛但是必要的假设,以分析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民主前景。第二十一章我们的分析包括了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所有国家,我们用民主的效力和合法性理论来证明并解释这些国家的差异性。

第十五章 后共产主义的史前史

235

对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民主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对后共产主义欧洲区域内部的巨大差异进行任何严谨的比较政治分析,必须特别注意我们在第二章曾经讨论过的国家性问题。此外,比较研究者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在第一篇中所讨论的三个变量的内在相关性。这些变量分别是国际影响、强制性及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全能主义与后全能主义政权的独特遗产。

国际影响与转型

当我们将比较的视野来观察苏联及中东欧前华沙条约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转型时,这些国家转型最具独特性的一个变量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影响。洛朗斯·怀特黑德是关于南欧和南美国家转型的四卷本经典著作的编者之一,他指出:“在这里所讨论的和平过渡的案例之中,内部力量是决定转型进程和结果的首要因素,国际因素仅仅具有第二位的作用。”^①很显然,这样的论断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是不适用的,如果考虑到1989年共产主义瓦解的速度以及以下事实,即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国开始转型之时,其国内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② 许多

^① Laurence Whitehea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和 Whitehea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 4。

^② 在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6, 普热沃尔斯基分析了这些政权是如何像决口的大坝一般被冲毁的。也见 Samuel P. Huntington 对“滚雪球”效应的解释, 参见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 33。

学者对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地区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和合法性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是,仅仅用经济停滞和合法性缺乏,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国家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地急剧瓦解(这些问题在1989年之前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探究该区域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特殊联系。

事实上,东欧国家从1948年到1989年,使用“独立”、“主权”和“国内”等用以描述政治的词汇都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在苏维埃帝国与中东欧“帝国边陲(outer empire)”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① 这些联系反过来又削弱了主要的民主国家和市场国家正常的国际影响,这种影响对南欧和南美来说尽管不是决定性的,却是非常重要的。至此,我们必须暂时停止一下,以讨论比较研究者是否应该对苏联的国际影响进行探讨。

1989年之前对该区域国家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都存在两个分析性的问题。最初,大多数文献视角单一,将该区域国家均视为“卫星国”,很少分析每个国家在前共产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性。近来,许多学者过度反对冷战视角,开始强调每个国家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较少强调该区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共同点。但是,我们比较研究的兴趣在于民主转型的难题,以及民主在得到巩固之前要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阐明这些共同点和差异性是如何同时对民主转型产生影响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影响,以及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后果。

苏联不仅是一种体制,也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中心,而且还是一种主要的乌托邦思想的源头。“二战”之后,苏维埃在东欧的扩张,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收益。然而,在“极端斯大林主义”时期,由于意识形态主张,这个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得到了强化。事实上,1968年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理论明确指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用于反对世界社会主义与全球革命运动的利益。”^②这一论述被用于证明对布拉格之春改革试验的镇压是具有正当性的。

^① 例如,“outer empire”概念的创造和使用可参见 Alex Pravda 编的 *The End of the Outer Empire: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1985 - 1990*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age Publications, 1992)。而“inner empire”这一词汇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形容苏联与前15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② 关于引文及讨论,参见 Mark Kramer, “Beyond the Brezhnev Doctrine: A New Era in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9-90): p. 25。

有限主权由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区内贸易、计划与投资网络(经济互助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以及军事同盟(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 the Soviet-led Warsaw Pact)而得到强化。此外,苏联政治局对东欧领导层更迭的高度介入,以及他们从外部对意识形态框架和党
237
国行政结构的监控,为东欧华沙条约国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高度的共同性,以及对共同霸权的高度依赖。^①

此外,在击溃“卫星国”仍在不断涌现的反抗霸权活动之时,苏联军队的存在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苏联军队驻扎在华沙条约七个国家之中的四个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这四个国家之中的三个国家,民主德国 1953 年骚乱、匈牙利 1956 年革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后,苏联军队都被用于改变国内局势。1981 年波兰运用苏联军队的可预见的威胁,是波兰政府启动戒严法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的关键性因素,而团结工会正是葛兰西式的波兰公民社会内部的主导力量。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国家是独立的,那么一些思想家,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等所宣称的“共产主义的不可逆转性”就明显是错误的。正如约瑟夫·罗特席尔德(Joseph Rothschild)正确指出的,1956 年匈牙利是“一场胜利的革命,但被过于强大的外国军队所镇压”^②。如果匈牙利在地理位置上类似于西班牙或巴西,那么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将会处于弱势,民主转型可能在 1956 年就开始了。同样,如果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在巴西或者西班牙所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已经完成从后全能主义政体向威权政体的转型,而后者的转型选择范围更为广阔。^③ 但是,事实却如提摩西·
238

^① 关于东欧在这种结构中的嵌入过程,参见 Robert L. Hutchings,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Consolidation and Conflic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以及 Christopher D. Jones,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Autonomy and the Warsaw Pac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1)。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毫无疑问秘密地参与或者公开参与了颠覆或者推翻巴西(1964)和智利(1973)等民主政权的活动。然而,西方国家对智利皮诺切特和巴西军队的支持从来都是含糊其辞的,因为这些政变被理性地冠以民主名义,甚至被政变对象认为是民主的,同时受到民意部门和一些政治强人的反对,这些反对者也冠以民主和人权的名义。更为重要的是,对皮诺切特等统治者的民主抗议,往往能在意大利、德国甚至是美国动员广泛的政治同盟者,并在智利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但是在苏维埃帝国内部,民主反对派没有类似的网络。

^②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0.

^③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发生何种转变的阐述,参见 H. G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Skilling 认为,“这是一股正在积蓄的强大动力,在其党内和社会之中普遍存在,这意味着,除非有来自外部的干涉,这一转(接下页)

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1986年撰文评述的,“一个春天之后,是十五个冬天”^①。

民主德国1953年的事件,波兰1956年和1981年的事件,捷克1968年的事件,特别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都没有证明共产主义政体的不可逆转性。但是,这些事件却揭示出,由在意识形态上高度自信、在地缘政治上有意愿动用武力的共产主义霸权控制的外国军队的存在,阻碍了潜在的民主转型。

为什么苏联霸权一再有意愿使用武力?部分原因在于,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动用武力的成本非常小。考虑到核恐怖平衡,西方允许苏联在1956年动用武力镇压匈牙利,在1961年修建柏林墙。而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一直不需要西方国家对其直接投资,于是,对于苏联的武力行动,西方世界反应消极,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显著的机会成本。苏联领导人也一直相信(至少在口头上具有这种信念),其社会经济和信仰体制必然取得全球性的胜利。在这种东西方利益考量的背景下,苏联镇压东欧所付出的代价,要低于对东欧采取宽容所要付出的代价。

中东欧华沙条约国家的国际联系及其对于霸权的依赖性,并不像“中心—边陲”理论家所分析的西班牙、葡萄牙或希腊等边陲国家的情况,也不像依附理论家所论证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或者巴西等国的情况。^②这种背景下,如果霸权国家国内不发生变化——在这里,苏联国内因素十分关键——无论是中东欧国家的精英(依赖于苏联的政治控制),还是民众(受到以霸权为可靠支持的国内精英的强制),要启动可能导致民主转型的政治进程,是极其困难的。

南斯拉夫并不是苏联集团的组成部分,但是铁托在东西方之间“不偏不倚”的策略,缓解了要求其转向我们所界定的民主的国际压力。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分化和统治”的原因,将南斯拉夫归结为事实上“最热衷于共产主义”的国家。与此类似,民主理论家们也将南斯拉夫归为一

(接上页)型过程只会加速而不会减慢抑或停滞,最终结果将是被彻底修正的社会主义,其形式是民主,内涵是民族主义……布拉格的试验似乎注定要失败,原因在于外部而非国内”(pp. 842—843)。但是,作为比较研究者,我们相信,没有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需要的是西方式的民主,他从未建议采用多党政治。但是,他确实欣赏自由化。处于布拉格的历史和环境之下,我们认为,这种自由化可能创造一种氛围,其他政治力量可以继续积聚能量从而推动民主转型进程。

^① Timothy Garton Ash, “Czechoslovakia under the Ice” in *The Use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P. 62.

^② 然而,美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的武力使用是首先以门罗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伪装的,后来则采取镇压和低强度的战争干预等其他措施。

个与其他所有共产主义体制都不同的类别,因为他们认为,工人自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可能演化为民主。大量的向外“逃亡”,特别是对德国人来说,也缓解了民主化压力。自由化的显著推进——特别是在旅行及大学自由方面——使西方减少了对南斯拉夫仍然存在的“民主赤字”的批评。到1989年,各个共和国的许多掌权者还可以基于与邻国和国内少数民族相对的民族主义立场,抵制充分民主化和自由价值观。这样,主导民族统治的“民族—国家”的独立要求,淹没了我们所定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化。^①

239

苏联的强制行为与合法性及其国际影响的政治经济分析 修正

是什么导致了霸权的内部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西方有何影响?对于中东欧的帝国边陲的维护成本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那些比我们更为优秀的学者已经撰写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著作,并且还在进行研究。然而,由于比较研究的兴趣在于权力关系的转换,因此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有一些变化看起来是根本性的。

最初的变化发生在霸权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方面。1985年共产党的新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同他的核心支持者确信,苏联正处于危险的停滞期,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重组。^②戈尔巴乔夫变革的手段,开始是改革(perestroika),随后是公开化(glasnost)。而这两种策略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欧、西方的地位及其考虑的镇压的政治经济学。为了改革成功,需要促进资本和技术的流动,这事实上又需要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网络。与冷战时期的环境相比,在后冷战时期这种关系网络能更好地建立起来,并能更好地推动资源流动。

^① 关于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存在的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独裁,参见 George Soros, “Nationalist Dictatorships versus Open Society” (New York: Soros Foundation, January 1993, 小册子)。

^② 关于停滞的普遍理解,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克服这种困境,有三方面的基本资料,即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Edward Wilkes Walker, “Structural Pressures, Political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ureaucratic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Origins of Perestroika”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以及 Archie Brown 的权威著作,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此外,新的投资的另外一个最大的来源就是减少的军费开支。事实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其顾问就得出如下结论,即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比之前估计的要少,而军费开支却超出了先前的估计。^① 在一场捍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抵制党内强硬路线的理论辩论之中,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 (Shevardnadze) 在 1990 年党代会上严词质问大会,代表们是否真的以为苏联的利益可能在于或者事实上在于继续维护其极端沉重的军费开支,依据他的判断,这种政策将导致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崩溃”。

我去了外交部,获得了一些可靠的信息。我发现,在过去的 20 年间,我们与西方世界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就耗费了 R₇₀₀ 万亿的卢布,接近于军事力量对峙的开支……

现在有望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两大超级强大的国家之间有可能建立全新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如果我们继续像以前那样,同志们——我这样称呼是出于全部职责——承担 1/4,我是指在我们的军费开支预算方面承担 1/4——我们将毁灭我们的国家——此后,我们就不再需要防务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军队来保卫崩溃了的国家和贫困的人民。

捍卫一个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的体制毫无意义。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摆脱困境:采取政策创造安全的环境,同时减少防务费用……

我们的计算显示,在当前的五年计划时期,以新思维为基础制定的外交路线,产生的和平收益总计将达到 R₂₄₀₀ 亿—R₂₅₀₀ 亿卢布。如果不整合进入世界性的经济、金融机构和关联体系,我们的国家将没有前途。我们应当摆脱自我隔离,奋力向前,加入世界体系——以前我们曾经将我们自己排除在外。^②

苏联的防务开支甚至高于谢瓦尔德纳泽所提到的数字。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苏联在与安全相关方面的花费是美国的 3 倍多,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平均开支的 6 倍,是日本的 20 倍。此外,在所有这些开放的、高度信息化的市场经济

^① 戈尔巴乔夫的一位重要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在接受斯泰潘访问之时,强调了这点。莫斯科,1989年10月24日。

^② 参见谢瓦尔德纳泽 1990 年 7 月 3 日在苏联共产党第 28 届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印于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July 5, 1990, pp. 7-10*。需注意的是,他没有过多地讲到军事对峙,而是强调意识形态对抗。

中,在军事技术和全球性竞争的出口产业之间,存在着比苏联更大的溢出收益(spillovers)。因此,从比较经济的角度来看,从“结束冷战”之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就是苏联。图 15.1 表明,苏联的防务开支至少 3 倍于任何一个我们在本书中论及的南欧或者南美国家。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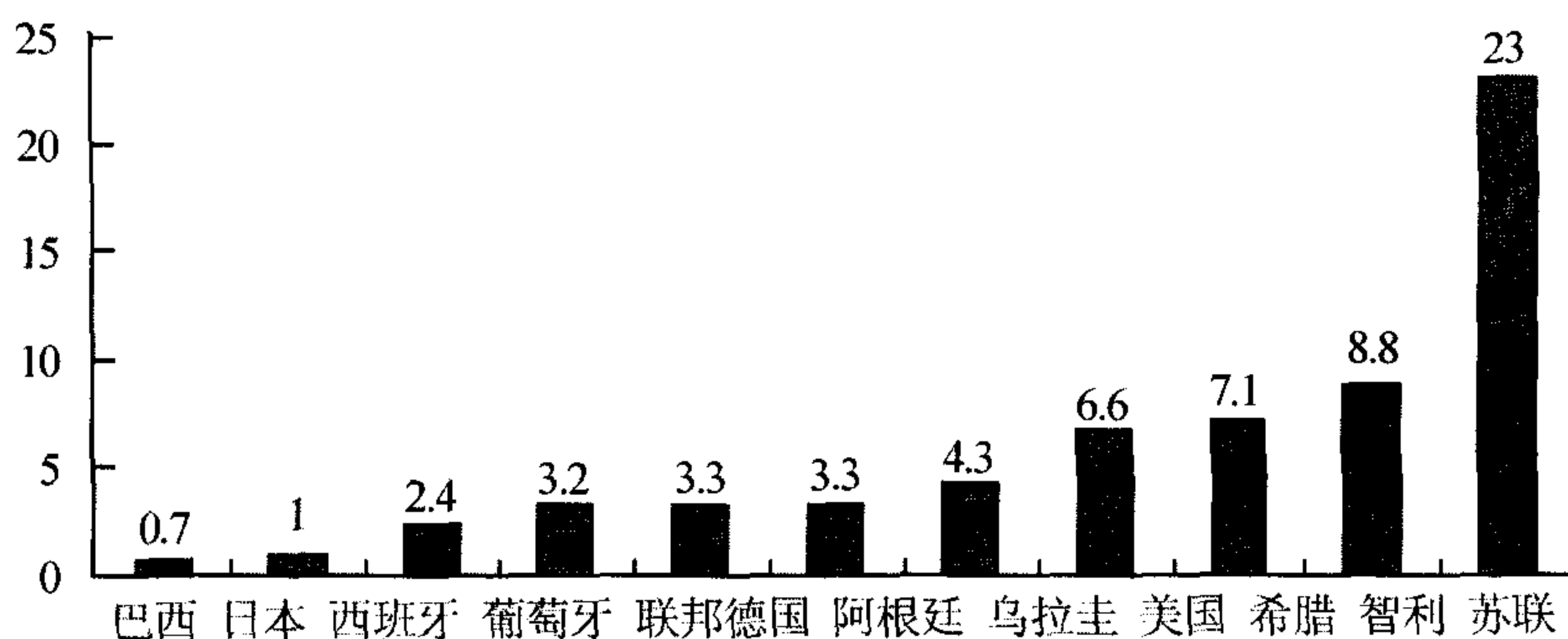


图 15.1 防务开支占 GDP/GNP 的百分比,1983—1989

资料来源:1989 年关于苏联的数据引自 Dimitri Steinber, “The Soviet Defense Burden: Estimating Hidden Costs”, *Soviet Studies* 44, no. 2 (1992):258。其他所有数据都是 1984 年的(乌拉圭除外,其数据是 1983 年的),引自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SIPRI Yearbook*, 1984 (Stockholm: SIPRI), pp. 129—131, 以及 1986, pp. 243—247。

关于对东欧的影响,权威的苏联分析家认为,整个经互会将在改革和公开化过程之中获得经济和政治收益。^① 依据 1988 年的一份为一次有关“东欧在缓和美苏紧张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会议特别撰写的重要文献,这些重量级的苏联专家进一步辩论了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对于东欧和苏联究竟是不是好事。这篇文章显然强烈批评了苏联以前对东欧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我们将大段引述这篇文献,因为它写于 1989 年东欧剧变之前。

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行政—国家模式(administrative-state), 都是 1950 年代在苏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没有经历过时间的检验,因

^①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和美国一些重要分析家已经指出,作为“帝国边陲”的东欧,对苏联来说已经从资产变为负担了。例如,可以参见 M. Marrese 和 J. Vanous 关于苏联给予东欧补助的极高估计, *Soviet Subsidizing of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 Soviet Perspective*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3)。关于数据的评论和相对比较低的估计值,请参见 Charles Wolf, Jr.,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Soviet Empire”, 载于 Henry S. Rowen 和 Charles Wolf, Jr. 主编: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and St. Martin's Press, 1987), pp. 121—142。

此表现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低效性……我们很难将共产党在苏联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条件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有的模式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建立起来的……改革过程已经形成了一种多方面的政治现实,它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就一体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经济、科学、技术利益和关系相互关联的强度而言,经互会国家远远落后于欧共体国家……维护和平是两大体系之间关系积极发展的前提,这又必然需要以新的政治思维去指导大国,以应对全世界范围的危机情势,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情势……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对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即使危机进一步发展,也不能使其影响东西方关系。^①

写作该文6个月之后,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向联合国做出重要声明,在1990年底之前,在西方国家的裁军行动之外,苏联将从东欧和苏联靠近东欧的西方军区撤军240000人、坦克10000辆以及战斗机820架。正如查尔斯·加蒂(Charles Gati)指出的,“这一声明为1989年的戏剧性变化创造了条件,其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事件。莫斯科准备将苏联军队从东欧势力范围撤离,戈尔巴乔夫通过这一暗示,提醒该区域的共产主义领导者注意,苏联的坦克将不再保护他们的统治。不久之后,东欧人民就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将被推翻——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逃亡”^②。戈尔巴乔夫发表这一声明时,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四国集团”(the Gang of Four)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强势领导人,均对他关于公开化的声明表示抵制并进行批评,只有保加利亚在理论上对其改革给予肯定。

随后各章我们将指出,在所有单独场合,区域性霸权(苏联)均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去削弱“四国集团”中的每一个国家。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关

^① “东欧在缓和美苏紧张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由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World Socialist System,莫斯科)的研究者为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召开的会议撰写,该文章被广泛引用,因为苏联领导人允许其全文刊载于 *Problems of Communism* 37, nos. 3-4 (May-August 1988): pp. 55-70。

^② Charles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East European Politics in Transform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6-167. 亚历克斯·普拉维达(Alex Pravda)提供的一些证据证明,东欧领导人早在1986年11月即被告知,苏联将不会用武力支持其统治。参见“Soviet 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in Pravda, *The End of Outer Empire*, 尤其是 pp. 17-18。

于民主德国的数据,但是我们确实获得了 1986—1987 年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公民都认为,公开化和改革将有益于他们的国家(参见表 15.1)。

表 15.1 “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对于您的国家(回答者本人的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

答 案	回答者所占百分比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有利	64	53	40
不利	8	8	10
不好不坏	24	34	38
其他/无回答	4	5	12
个案数	556	436	541

资料来源: *East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Gorbachev and Soviet Reforms* (Munich: Radio Free Europe, Audience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Department, July 1988)。重印于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68。

戈尔巴乔夫希望中东欧国家采取苏联式的“体制内”改革,但是他严重低估了这些政权的不合法性以及不受欢迎的程度,也严重低估了他关于公开化和改革的声明以及反对苏联军队干涉这两者结合可能造成的不稳定性。^① 鉴于苏联在东欧存在霸权,戈尔巴乔夫关于变革的宣言,从各个方面改变了华沙条约国家内的权力关系。它削弱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内反对公开化的势力,增强了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内改革派的势力,他们试图与民主反对派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同时鼓舞了所有东欧国家的民主反对派。

1989 年中期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其一,勃列日涅夫主义所主张的苏联有干涉权利的意识形态自信日益变得苍白无力。苏联领导层、东欧政府首脑和反对派都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第二种相反的力量。民主派关键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积极分子坚持认为,他们不相信苏联会放弃干预。事实上他们在等候着某个切实的先例,某个共产主义政权在改变制度的时刻,苏联会坐视不管。一个他们用来解释他们的谨慎、不愿

^① 关于这一判断的证据和论证,参见 Pravda, *The End of Outer Empire*, pp. 1—34, 以及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pp. 102—103。

动员军队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有可能下台,而强硬分子或民族主义者将执掌政权。正如苏联1991年8月的政变企图和1993年12月俄罗斯举行的选举结果所示,他们的忧惧并非没有根据。^①

244 无论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考虑是什么,1989年苏联政策的失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该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现存共产主义政府不断弱化,而民主派反对者日益增强。^②在这种背景下,军队的镇压将急剧改变苏联的改革进程。与西方的经济和金融关系也将严重倒退。戈尔巴乔夫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也将被迫取消。关于1989年苏联的失败,罗伯特·达尔的解释是,干预的成本将高于容忍所要付出的代价。^③

(共产主义模式的)全能主义和后全能主义政体类型 对民主巩固的影响

许多分析家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转型与南欧和南美地区的转型的一个主要差异是“共时性问题”。东欧和苏联在政治民主转型之外,必须同时完成市场经济转轨。^④我们当然认为,这两个方面的深刻变革都是必要的。但是,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化。

这一区域的所有政权在某个时刻都是“全能主义”政权,波兰在某些方面除外,我们将进一步论证(可能有不同意见),它从未完全建立起全能主义政

① 对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它是如何被戈尔巴乔夫改变的、为何会发生改变,参见 Robert A. Jones, *The Soviet Concept of “Limited Sovereignty”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以及 Mark Kramer, “Beyond the Brezhnev Doctrine: New Era in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9—1990), pp. 25—67。

② 然而,一些精英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可以帮助他们维护权力,并且吸纳温和的反对派,只要这些人不广泛使用暴力。这意味着,华沙条约组织的共产主义统治者并没有启动与西班牙和巴西类似的以民主政体为目标的转型,当然,匈牙利不是这样,而波兰也有独特的转型方式。民主转型是被迫进行的:在民主德国,并不是圆桌会议,而是向联邦德国的逃亡以及街头呼吁迫使国家进行民主转型。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事件导致了政权崩溃。这些政权的领导者并没有民主转型的计划,这一事实导致了革命(“*revolution*”)的广泛使用(如“*velvet revolution*”,天鹅绒革命)。“革命”一词不能用来描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任何一个南欧或南美国家的转型,葡萄牙除外,因为它是在中下级军官政变之后发生了革命。

③ 罗伯特·达尔关于容忍成本的著名理论,参见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5。

④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进一步提及,有必要进行三个层面(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转型。参见“*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ierre Adler 译,载于 *Social Research* 58 (Winter 1991): pp. 865—892。

权。有些国家后来变成了“后全能主义”政权。依据我们在表 1.1 的分类,现代巩固的民主政体存在五个支持性的场域,即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机器以及经济社会。我们在表 4.3 中进一步分析道,当一个转型启动的前提基础接近于全能主义或者后全能主义理想类型之时,在以上五个场域内必须完成各不相同但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该政治实体的民主才能得以巩固。

我们所考察的南欧和南美国家之中,没有一个非民主政体属于全能主义政体或后全能主义政体,故我们研究本书第四部分所提及的国家(包括波兰)时所面临的挑战,在类型上不同于我们在研究其他国家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的观点已经在表 1.1 和表 4.3 中有所陈述(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重新阅读这些表格),在随后几章中,我们会从经验层面进行进一步探讨,在此还是有必要就全能主义政体或者后全能主义政体给民主的五个支持性场域带来的影响这个一般性问题进行探讨。

245

公民社会

这一术语的经典界定,是指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和团体。如果我们使用该定义,关键是要注意到东欧和苏联在转型时期存在的大多数工会、集体农庄、文化社团、传播体系以及其他组织(波兰的情况有所不同)都创建于全能主义时期,在后全能主义时期依然受党国的供养。在某些相类似的条件下,处于秘密状态但却名声在外的情报机构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这些组织,并使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转型之中没有发挥作用。这一现象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都十分突出。相反,在南欧和南美威权主义政体下,尽管许多工会、企业家和新闻组织受到残酷压制,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受到党的控制,甚至也没有完全受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控制。

宗教需要进行专门讨论。在所有社会之中,宗教都是当权者们最难控制的社会现实。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要求尽可能限制宗教在公民社会之中的作用。然而,宗教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正教具有国家高于教会(caesaropapism)的传统,倾向于依附于国家,并有可能成为国教,从而没有为反对力量提供基础。它最多是为文化上的不同政见提供有限资源。因此,除了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东正教没有为新的主要领导或者议题形构提供资源。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特别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新教不同政见者(特别是 1980 年代后期的民主德国)的存在促成了一个不同的公民社会。

246 在民主的社会之中,宗教、教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志愿团体,在团结人民、澄清道德立场(这些道德立场往往具有政治涵义)反组织多样化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的世俗化可能会削弱社会的活力。共产主义致力于使社会世俗化,控制并渗透进宗教组织,阻止其进入精英行列,使其无法开展忠于教会的教育。里查德·罗斯(Richard Rose)收集的资料说明了这些政策的效果,这些政策只有在天主教国家,如波兰,是失败的。从未或者很少去过教堂的被调查者所占的百分比,在白俄罗斯是71.1%,在乌克兰是60%,在捷克共和国(在共产主义之前即已推进世俗化)是68%,在保加利亚是66%,在匈牙利是6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斯洛伐克仅占41%,在罗马尼亚仅占46%,在斯洛文尼亚仅占44%,而在波兰,只占16%。^①

不仅仅是大部分组织——在其他国家一般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被纳入了共产主义欧洲的党国体制,而且这些组织的物质资源也来源于国家的补助,现在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些组织没有追求自治的要求,而在自主的公民社会之中,它们可能为了那些被意识到的利益而行动。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来自保加利亚集体农庄、波兰矿山和俄罗斯工厂的工人,各个国家科研系统的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资助组织之中的供职者担心,如果他们支持来自于市场导向的民主派提供的理想方案,他们将投票反对他们自身物质利益的提供者。值得强调的是,这一遗产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党国权贵(nomenklatura)。东欧国家的许多公民每天都生活在一种未来目标与当前物质利益之间的紧张之中。

研究这一遗产的著名分析家,波兰社会学家埃蒙德·莫克日茨基(Edmund Mokrzycki)指出,不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即是对这一体制的具体化——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就该词的极端意义而言),是错误的;它具有自我平衡的机制,有其自身的动力,并具有再生产其自身结构性特征的能力”^②。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连续两次选举之中,与旧政权有联系的团体的强力表现,在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1992—1994年期间,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政党的重新执政,均说明这些与“真正的社会主义”

^① 关于去过教堂的数据,参见 Richard Rose 和 Christian Haerpfer, “Adapting to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11”,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212 (1993): 表 35。

^② 参见其具有思想感染力的“The Legacy of Real Socialism, Group Interest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Utopia”, 载于 Walter D. Connor 和 Piotr Ploszajski 编: *Escape from Socialism: The Polish Route* (Warsaw: IFiS Publishers, 1992), p. 269。

相关联的团体扎根于社会实际利益的程度是多么深。此外,莫克日茨基和其合作者认为,大部分关于“民主转型”的文献并没有将这个问题纳入分析:

在拒绝“真正现存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之中,民主被宣扬为一种承诺……但是,1989年以后出现了一种非常关键的悖论。尽管在西欧和美国的经验之中,民主被同一社会团体宣扬并被制度化,在东欧——最为生动的是波兰的例子——那些受到自由资本主义形式的制度化民主威胁的团体,正好是那些明确追求民主的社会团体……现存的关于转型的文献没有对列宁主义之下发展演变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对政治民主化过程产生的影响给予充分关注。^①

247

政治社会

接下来我们考察政治社会。在后全能主义留下的相对扁平的背景之下,对未来的理想化要求和当前的物质利益之间的紧张,给政治表达带来了问题。政治家在首次选举之中频繁宣称,要代表独立企业和独立工会的利益,但是,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中还不存在这样的团体。民主的政治社会并不仅仅是政治利益的表达问题,还与政党有关。但是,东欧45年的党国统治和苏联超过70年的党国统治,使整个区域对“政党”一词赋予了消极的含义。事实上,东欧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运动没有一个自称为政党的如,在波兰称为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捷克斯洛伐克称为公民论坛(Civic Forum),在匈牙利称为匈牙利民主论坛(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波罗的海诸国称为国民阵线(popular fronts),而在保加利亚称为民主力量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此外,该区域的魅力型领袖,波兰的瓦文萨(Walesa)、捷克斯洛伐克的哈维尔(Havel)、俄罗斯的叶利钦(Yeltsin)都拒绝加入或者领导政治党派。

在这里将对共产主义欧洲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与东欧和苏联形成鲜明对比,西班牙、乌拉圭和智利的反对党为了建立一个更为稳固和更具自主性的公民社会而斗争,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都致力于描述可供选择的政治蓝图,而

^① Edmund Mokrzycki 和 Arista Maria Cirtantas, “The Artic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in Poland”, *Social Research*, 60, no. 4 (1993): pp. 787–819.

这样的蓝图需要政党担负领导作用。^① 在民主转型开始之前,这些政党就已经设计了具有竞争力的可供选择的政治计划,以清楚地阐明,如果他们通过民主选举掌权,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在某些国家,完整的政党系统持续秘密存在,这样在非民主政体之下,就出现了“合法”或“非法”但却真实可见的政治社会。^②

248 法 治

以下我们将考察法治及其基本组织原则——宪政主义原则。当然,巩固的民主都具有相对自主的法治。如果法典高度强调尊重先例和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些法律传统和规范就有助于创造并且维护法治的相对自主性。此外,独立的司法体系对于解释旧的法律、使新法律符合宪法并使国家执行法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高度斯大林主义控制之下,法律的概念完全不同。苏联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在1927年写道:“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法律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战胜了任何法律。”^③在斯大林时代,官方权威的法学家帕舒卡尼斯(E. B. Pashukanis)进一步使法律原则完全依赖于共产主义革命前景。^④帕舒卡尼斯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政策与计划将取代法律”^⑤。我们

① 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巴西的情况非常例外,其公民社会以变革著称,而政党尽管存在而且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其认同却不断发生变化。

② 参见林茨关于西班牙佛朗哥执政后期的“可被容忍的”(tolerated)和“非法的”(illegal)反对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合法”(a-legal)反对的讨论,“Opposition to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载于Robert A. Dahl编: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71-260,尤其是 pp. 216-230。在智利和乌拉圭,在转型之前10年,一个国外的政治分析家在为期两周的访问之中,往往也能够会见每个事实上的政党的代表,这些政党以后会通过政治途径(或是作为一个政党,或者作为多党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参加首次选举。我们将看到,在所有东欧国家之中,只有匈牙利(1988年12月以后)在转型之前的政治社会的发展程度与此比较类似。

③ 对全能主义时期的法律所做的分析,参见Harold J. Berman, *Justice in the USSR* (New York: Vintage, 1963); 引文来源于p. 26。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首次出版了Berman的著作。

④ 在不遵守先例和法律内在逻辑原则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具有相似性。纳粹起草了 *Volksgesetzbuch* (People's Code)用以取代19世纪的civil code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其第一条是如下表述:“最高的法律是德国人民的福祉。”(第1条)“德国人的血统、荣誉和世代相传的健康必须保持纯正并得到捍卫。这是德国民法基本精神。”(第2条)“法官在进行裁决之时不受任何干涉。他根据总体的事实情势,并依据受国家社会党的世界观支持的法律解释来执行法律并进行自由宣判。”(第20条) *Volksgesetzbuch: Grundregeln und Buch I. Entwurf und Erläuterungen*, 由Justus Wilhelm Hedemann, Dr. Heinrich Lehrmann, and Dr. Wolfgang Siebert (Munich: C. H. Beck, 1942 阐述)。

⑤ 参见Tom Bottomore编: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76。

认为,由于政策与计划均是由领导人和党一国制定的,那么就没有法律制度可以约束或者限制领导人和党一国。当然,这与全能主义的理想类型相符合,即具备了全能主义四个特点中的一个特点:领导者“不受约束地实施统治”。

领导人的统治“不受约束”的体制在理论上是不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的,后者强调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国家乃至主权范围内的所有公民都赞同一系列“自我约束”的机制。^①在法律制约之下的民主国家的自我约束具有如下特点:法律之间的等级十分明确,在进行修订之时具有相对严格的规范和程序,并且这些规范和程序是事先制定的。^②

的确,在那些向后全能主义方向演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法律对国家机器有些约束。但是,党在党一国之中的“领导地位”仍然可以影响绝大多数法律手段,而且,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党的主动性及其对法律的诠释。杰出的奥地利学者 T. H. 里格比(T. H. Rigby)在 1980 年撰写的论文之中阐述了后全能主义的社会主义法律“自我约束”的脆弱性:“苏联宪法,哪怕是其最近的一次修正过程,都非常令人费解,并且不尽完善地指导着体制内的权力分配……苏联体制的核心要素,即党国关系,是由自由裁量而不是由法律决定的……苏联政权……从来没有将自己限制在由其自身制定的法律之中。”^③

249

后斯大林主义时期新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一些规范,其目标与其说是给所有公民创造一种普遍的规则,不如说是创造一种特殊的程序,旨在限制领导人控制其他政党精英。只有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国家,当涉及某些问题,并且党事先决定扩展法定权利(比如,1983 年以后匈牙利的私有产权)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重要程序才被建立起来。关键在于法律文化,尤其是根植于法律等级之中的“自我约束”的民主宪政文化,必须由新兴民主国家创造出来。

^① 关于民主宪政的“自我约束”的丰富讨论,参见 Jon Elster 和 Rune Slagstad 编: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尤其是 Jon Elster 所撰写的导言, pp. 1-18。

^② 例如,所有历史悠久的欧洲大陆民主国家的法律实际上都具有四个层级,这种层级体系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存在宪法法院,这种层级体系也会受到宪法法院的支持。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这四个层级分别是:(1)宪法,其修改必须依照事先确定且相对严格的程序,并且必须获得特定多数(special majorities)支持;(2)由议会通过,但是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3)由内阁颁布的法规,一般具有时效限制(limited duration),并且需要获得议会的批准或者通过才能生效;以及(4)行政命令,可以由政府部门颁布,但是不能同以上任何层级的法律相抵触。

^③ T. H. Rigby,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载于 T. H. Rigby, Archie Brown 和 Peter Reddaway 编: *Authority,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 12。

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相比,一些历史悠久的威权主义专制政权,如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以及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在建设宪法文化的道路上留下了比较多的东西。所有这些国家的法学院都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方法,并且学生能够接触到其他国家的法律知识——包括民主国家的。在这三个国家之中,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原则尽管遭到取缔或者在实践中被临时中止,但是,无论在规范层面还是经验层面,均没有受到全新的法律体系或者法学思想的根本性挑战。^①

可资利用的国家机器

250

下一个任务是讨论可资利用的国家机器。在向民主转型开始之时,全能主义或者后全能主义政体对于国家机器的可用性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依照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观点,当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往往是业余人士)得到职业官僚阶层的支持时,现代民主才能良好运行。官僚本身是非民主的,但是他们可以使民主有效运转起来。^②然而,如果先前非民主政权的官僚是依据旧政权制定的政治标准招募的,而旧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已经深深卷入了官僚系统,那么对于新政权来说,官僚的服务能力将成为一个问题。在典型的全能主义或者后全能主义政体的民主转型初期,可能潜在的存在如下问题:(1)政党和国家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事实上,政党往往掌控着国家)^③,

^① 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对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第3条至少给予了形式上的尊重,而这一条确立了法规之间的位阶制,并得到一般法律原则的补充。此外,尤其是在该政权最后一段时间,行政对法律控制和行政法院的屈服程度,甚至超过了佛朗哥统治之前。葡萄牙的最后一个独裁者是法学教授马塞罗·卡埃塔诺。在他所撰写的标准法律文本之中,对西方法学的原则充满敬意。

^②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赞成他的所有观点,但熊彼特所作的经典论述值得大段引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的民主政府必须能够指挥……训练有素并且具有良好声望和传统的官僚提供服务,这些官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这样的官僚,可以使关于外行所领导的政府的争议平息下来。这也可以潜在的回应这个国家中经常出现的如下质疑:民主政治已经证明,其自身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政府……官僚应当具备行政效率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这还不够。它应当足够强大,可以指导,在必要时候可以教导那些对政府部门进行领导的政治家。为了做到这点,它必须提出自己的原则,并且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以坚持这些原则。它必须拥有与其权利相称的权力。”摘自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p. 293。

^③ 文献最为丰富的是民主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1985年出版的两卷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手册》之中,对该问题进行了特别论述和权威性描述。在S. E. D. (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国家机器(staatsapparat [state apparatus])的条目之下,就该问题进行了特别阐述。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党的领袖,而党的最高领袖也出席国务会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对国家具有完全的约束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手册》明确写道:“国家的领导职务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担任,他们实际上是以党委委员的身份领导国家”(2:1274)。事实上,国家机器并不是职业官僚的自治体,而是党的工具。(接下页)

这意味着政党崩溃、分裂或被广泛拒绝之时,国家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可能受到影响^①。(2)当许多可能很忠诚而且高效的公务人员由于犯罪而被团体解雇,或者当行政职位迅速被反政府力量(但是可能没有能力)“占据”之时,国家机器的效力会受到影响。大规模的清洗(比如在民主德国所发生的)或根本缺乏显著的变化(比如在罗马尼亚所发生的)都会使民主存在问题。(3)告密传统也会引发问题。与全能主义类似的政体,甚至早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都有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及组织计划。这种政权中存在一种鼓励普通公民(不仅仅是情报专家)去告发或者监视其他公民的倾向。^②这一告密的传统也给新的政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绝大多数传统都要求对国家机器进行“清洗”(净化),尽管这违反正当程序而且侵犯人权,并且给政权带来了合法性问题。^③如果新的民主政权推行大规模清洗政策,另外一个结果

(接上页)“(德国统一社会党)组织最为重要的职能在于领导国家”(2:1275)。党组织通过国家和秘密警察形成了控制机制(2:1188—1189)。在国家机构之中,2125054个民主德国人直接为政府工作(Klaus König, “Bureaucratic Integration by Elite Transfer”, *Governance*, no. 3 (1933): pp. 386—396)在这些人中,近50万人是由政党任命的党国权贵[Gerd Meyer, *Die DDR Machtelite in der Ära Honecker* (Tübingen: Francke, 1991), p. 89]。1989年政权更迭之前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研究指出,这些党国权贵包括了所有的中级和高级职位,另外一小部分职位留给了国民阵线之中德国统一党之外的成员[Gero Neugebauer, “Die führende Rolle der SED”, 载于 Ilse Spittmann 编: *Die SED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utschland Archive, 1987), p. 70]。超过99%的军官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同上, P. 69)。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 Dietz, 1973)一书对干部政策(Kaderpolitik [cadre policy])进行了非常宽泛的界定,即“选拔、培养、考核并分配有才能的干部,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贯彻工人阶级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目标”(p. 390)。

① 最为极端的政党分裂的例子发生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讨论苏联党国的分裂。

② 例如,在民主德国,人口不到1800万,情报部门所保存的档案涉及600万人,而其中的400万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情报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是85000人;Gauck Behörde指出,1982年的精确数字是81487人,偶尔达到99000人。参见 David Gill 和 Ulrich Schröter,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Anatomie des Mielke-Imperiums* (Berlin: Rohwolt, 1991), p. 34, p. 37。总的情报员数量至少是109000人,大多数签署了合作声明,而实际数字可能更多,因为在政权更迭过程中许多文档已被毁。Gauck在一次电视出场中提到,可能有15万人。他在其书中提到,有10万人是领工资的。参见 Joachim Gauck, *Die Stasi-Akten* (Hamburg: Rohwolt Taschenbuch, 1991), p. 27。

③ 这些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最为严重(所有这三个国家在1989年都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早期”或“冻结”的后全能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了一项清洗法案,它违背了民主法律的基本原则,侵犯了公民自由(参见第十七章)。在保加利亚,清洗问题使民主力量联盟分裂为“革命民主派”和“程序民主派”。德国的继承者联邦德国通过一种在大多数新民主国家十分难以采纳(而且对民主非常危险)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例如,在新加入联邦的各州之中,行政部门27%的雇员来自于原来的联邦德国,最高层之中有51%来自于联邦德国。在州司法部,来自联邦德国的官员高达70%。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些数据来自 Daniel V. Friedheim 在耶鲁大学即将完成的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更迭的博士论文。也可以参见 König, “Bureaucratic Integration by Elite Transfer”。

是那些受清洗政策所威胁者及其家庭可能为了他们的利益转而投票支持改组后的共产党,将其作为一个压力集团。

252 这些全能主义或早期的后全能主义的传统在类型上与我们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讨论的威权政权的传统存在明显区别。^① 非正式的告密传统(以及因此产生的清洗需求)不是很严重,因为对公民的大多数监控工作都是由国家情报部门或是强力机构完成的,而不是由普通公民完成的。确实,许多威权政权由于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泛滥而留下了糟糕的人权记录。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新的民主政府在惩戒践踏人权者方面收效甚微。然而,由于等级性的军人政权的侵权范围远远低于全能主义政权或早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而且,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缺乏正式的国家政党(巴西仅有一个脆弱的官方政党),国家机器的许多成员在威权主义时期仍然在岗,或者其职位并没有被完全政治化。就此而论,许多国家机器在转型时期以及转型之后,都具有“可用性”,可以被新的民主力量利用。^② 在这点上,民主德国和西班牙在转型之前,它们的国家机器政治化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民主德国有 50 万个党国权贵职位,而在西班牙几乎没有。在佛朗哥去世之前 10 年,进入公务岗位要通过竞争性的考试,而考试者只通过数字来标明。事实上,直到 1960 年代,西班牙政府之中唯一需要执政党党员身份的职位是省长,因为这个职位同时也是该党省级党部的领导。^③

经济社会

在这里,我们简要讨论民主巩固的五个任务之中的最后一个,即经济社会。我们不过多地讨论共产主义类型的全能主义政体对于市场意味着什么,

① 然而,接近于理想的苏丹式政体的政权,旧的官僚机构的可用性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依据定义,苏丹式政体不尊重任何的科层准则。正如我们(和韦伯)所指出,在苏丹式政权之中,没有任何“国家职位”,只存在“家族职员”。

② 例如,乌拉圭军队在 1973 年执掌政权时废止了选举,但是丝毫没有改变原有的选举登记制度和选区制度。同时,他们也保留了乌拉圭非常专业、中立的选举法院。因此,1980 年军队决定就宪法举行全民公决之时,职业官僚采用了乌拉圭传统的防止操纵的民主投票程序。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反对派能够从“可资利用的国家机器”中获益,从而挫败了军方提出的半威权宪法。

③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党国权贵职位,多数被任命者也是在被提名为省长以后才成为党员的。事实上,在 1960 年代早期的一个著名案例之中,Sevilla 省长的被提名人拒绝入党,仍然获准任职。关于西班牙公共服务的日益专业化和独立化,参见 Miguel Beltrán Villalva, “Política y administración bajo el Franquismo: La Reforma administrativa y los planes de desarrollo”, 载于 Raymond Carr 编: *La época de Franco* (Madrid: Espasa Calpel)。

因为这个主题已经引起广泛探究。然而,我们还是要指出,依据我们的判断,绝大部分评论都没有澄清现代市场经济在社会、政治和国家建设方面所必需的主要前提条件。发达的市场经济既不是机械性地设定出来的,也非自然而然形成的。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社会尽管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但都是被社会性地构建起来的,这种构建是经济动机与社会规范、政府政策以及国家所颁布的用以对契约、私有(公共)产权以及银行业和信用体制进行管制的规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共产主义形式的全能主义政体下,如上所列(至少)有效的、社会构建的经济社会的组成要素是不存在的。最容易创造出来,而且通常是第一个展现出来的要素是市场调节的范围。然而,在一个有效的经济社会得到巩固之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首要而且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有效国家的问题。^① 革命性剧变可以废除指令经济,但是,如果党国仍然四分五裂,并且不存在有效的政治权力,新的经济社会的管制架构如何被构建起来? 俄罗斯就是一个例证。还有一个问题是产权问题。如果私有财产的权利被承认,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新的私人所有权如何建立。通过归还(restitution)? 从何时开始? 共产主义之前? 纳粹之前? 公有企业如何出售? 通过拍卖? 谁有足够资本? 有足够多的有效购买者吗? 应该给国外资本固定的配额吗? 应该实行管理者收购(buy-out)? 这是否会被视为党国权贵收购? 自发的私有化是否被允许? 这在事实上是对公有财产的盗窃吗? 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常常出现在共产主义全能主义和后全能主义政体崩溃之后的议程之中,类似的问题也是大多数苏丹式政权的各种各样的遗产。然而,在智利式或者西班牙式的威权主义政权之中,很少出现类似的问题。

253

后共产主义的多种路径

在这一章,我们试图评估俄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共同点,因为他们都曾处于苏联强权体制之中,苏联力图将类似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强加于所有这些国家。然而,我们在之后章节的基本任务是,将这个共同遗产视为

^① 关于国家在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的研究是一个空白。事实上,当我们向北美一位研究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杰出经济学家询问关于这个主题的学术文献时,他评论道:“经济学家忽视国家在转型中的作用,简直就是犯罪。”

最为重要的背景因素,探讨区域内民主(或非民主)转型路径的差异性。我们也希望探讨政治体在完成民主巩固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方面的显著差异性。区域内差异的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源于它们在共产主义之前的历史及其地理位置。但是,这些差异的某些重要方面,也可以用其独特的政体类型(或亚类型)和/或其国家性问题的严重性来加以解释。

苏联意识形态自信的逐渐丧失,以及采用强制手段控制帝国外围和帝国内部的地缘政治意愿的逐渐弱化,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权力关系。然而,这一新的国际环境对不同国家的后果迥然不同,这要求我们进行比较性的路径依赖分析。例如,按照我们的标准,1970年代后期的波兰接近于威权主义政权(而不是全能主义或后全能主义政权)。由于在苏联镇压的政治经济学之改变,曾经在波兰被镇压的民主反对派重新开始活动。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的匈牙利,民主反对派的四方谈判(four-player game of democratic opposition)在过去甚至都不能启动,最终得到了批准。在“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权(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中,老迈而保守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领导人需要外部支持才能维护其强力统治,当他们的中层干部不再相信政权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或者至少不愿意大规模使用暴力来镇压抗议人群之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那些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国内变迁的政权,例如苏丹式全能主义的罗马尼亚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后全能主义的保加利亚,非民主精英在摆脱了长期在位的领导人的控制之后,对政权进行了重构。

在苏联南部的大部分全能主义政体之中,苏联的国家性危机使得那些掌握共和国权力的非民主精英将国家从党一国转变成族群国家(ethnic state),不容忍多元主义,不尊重少数民族权利,也没有建立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这些变化当然和后共产主义政治文化相关,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特点是种族威权主义(ethnoauthoritarianism)、族群冲突和国家弱化(state erosion),而不是民主化和充分自由化。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十九章中将论证的,关于“民族解放”的讨论优先于关于民主化的讨论,而关于“主体民族”(titular liberation)集体权利的讨论优先于关于个人权利的讨论。作为我们对后共产主义政体进行新的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贡献,我们将探讨这些主要差异的根源及其影响。

第十六章 威权共产主义、伦理性公民社会和矛盾的政治社会：波兰

255

本章将对波兰民主转型背景下的政治和文化进行探讨。我们提出了四个有内在联系的观点。首先,我们指出,波兰是东欧唯一一个一直近似于威权主义而不是全能主义政体的国家,即使在1949—1953年期间全能主义趋势最为强大之时也是如此。第二,我们将说明,从1976年至1988年,波兰的主要思潮、结构和话语冲突是如何在国内的“伦理性公民社会”和国际性的威权主义党国政权之间发生的。第三,我们认为,正是因为1988—1989年间,波兰是在党军(party-soldiers)领导下的威权政体——同时也是东欧第一个转型国家——由执政当局启动并得到反对派接受的“协议式转型”,其约束条件可以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智利和巴西的情况相比。第四,我们将探讨,新的民主政体是如何从伦理性公民社会之中起源的,而协议式转型、迅速建立的半总统制体制以及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魅力型领导人是如何催生一个矛盾的政治社会的。波兰必须超越这一状况才能巩固其民主。

无法建立全能主义的原因

我们首先对政体类型进行评估。与本部分我们将要考察的其他国家相比,波兰社会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全能主义政权。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波兰也作过建立全能主义政权的某些努力(类似于内战之后的西班牙),因而波兰也存在全能主义国家机构,也存在官方的政党意识形态,这点与东欧其他国家一样。但是,波兰政治的一些基本要素并不真正符合我们在第三章所讨论的全能主义政体型式的要求。我们特别认为,波兰在事实上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多元主义。我们相信,这种事实上的社会多元主义增强了公民社会抵抗

256 政权意识形态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全能主义政权推行激烈社会动员的勃勃野心,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全能主义渗透的遏制,反过来又影响了政权的领导风格。因此,我们认为,就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四个典型特征而言——最为明显的是一元主义,其次是动员、意识形态和领导——波兰具有全能主义的一些特点,但是更类似于威权主义。^①

无论什么时候,波兰天主教会都保留了相对自治的领域,从而使其可以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有能力防止自身和波兰民族完全融入全能主义的结构之中。这一事实上的社会多元主义,使天主教会创造出了一套复杂的相互承认的权力模式,天主教会甚至可以和国家进行谈判,这在我们所说的任何其他极权式的共产主义政体中是不存在的。例如,1950年4月,政府同意允许在公立学校之中进行宗教教育,并对教会出版物不予以干涉。作为回报,教会同意避免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并要求牧师不要从事积极的反对活动。^② 在这个世界上最为笃信天主教的国家中,无神论的党一国甚至临时性认可了这一让步,这将限制其整个意识形态霸权目标的实现。^③ 1953—1956年间,党和国家

① 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考察了所有东欧国家的全能主义历史,他也认为,只有在波兰,全能主义从未建立起来。“波兰从不是一个全能国家……这一结论并非错误,因为其精神生活的某些形式——首先是天主教会——保留了自治方式。同时,农民仍然保留了大量私有财产。另外,归功于1944年的华沙起义以及战后的武装抵抗及其他抵抗运动,绝大多数波兰人既接受了新政权,也接受了苏联的控制,但是他们从未对苏联‘解放者’抱有任何幻想。实际上,波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警察国家。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对波兰内部的自治具有重要意义。[哥穆尔卡]……缓和但是没有完全阻止波兰的反全能主义运动;正因为如此,全能主义的观念基本上被完全抛弃了。”参见 Milovan Djil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Leninist Totalitarianism”, 载于 Irving Howe 编: *1984 Revised: Totalitarianism in Our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pp. 145—146。

② 关于共产党和天主教会之间权力斗争中的让步与对抗的讨论,参见 Ronald C. Monticon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ommunist Poland, 1945—1985: Forty Year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esp. 26—130。另一项关于波兰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共存”的分析,以及1945年后波兰教会在政治中的作用的分析,可参见 Bogdan Szajkowski, *Next to God... Polan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Pol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关于波兰天主教会在威权政府/反对势力的动态比较研究,参见 Hank Johnston 的文章:“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Church Opposition to Authoritarian Regimes: Religio-oppositional Subculture in Poland and Cataloni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8, no. 4 (1989): pp. 493—508。

③ 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人均拥有牧师数要远远高于拉美。例如,在1968年,波兰每10万人中有52名牧师,而同年在20个拉丁美洲国家之中,这个比率最高的是智利,每10万人有27名牧师。巴西是13人,古巴是3人。参见 Luigi Einaudi, Richard Maullin, Alfred Stepan 和 Michael Fleet, *Lat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Catholic Church* (Santa Monica: Rand Corp., 1969), p. 18。

再次尝试控制教会,此时,波兰大主教史提芬·维辛斯基枢机主教(Cardinal Stefan Wyszyński)也被监视居住。^①与匈牙利或克罗地亚不同,波兰并未让枢机主教接受审判,由此可见苏联扶植的波兰共产党对天主教会的畏惧程度。对于教会的打压激起了波兰社会更为广泛的反抗,并拉大了“我们”波兰民族和“他们”苏联扶植的党—国之间的距离。正如约瑟夫·罗特席尔德概括的,“波兰天主教会不仅通过其信众重新燃起的激情补偿了战后的物质损失……那些原来不相关的甚至反牧师的社会组织也对教会表示忠诚,以此来表示他们在政治和精神上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②。1956年,温和民族主义改革派共产党人哥穆尔卡上台,为使其政府更受欢迎,允许宗教重新进入公立学校。^③事实上,在1956—1989年的许多情形下,政府都暗中要求,甚至公开请求教会在波兰政治中发挥缓冲作用,对危机进行调控以防止引发苏联干涉。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86年枢机主教维辛斯基的雕像被安放于华沙最主要街道的一所教堂之外。

257

有限多元主义对一元主义进行抵制的另一领域是农业。即使在1940年代末,波兰斯大林主义者也只能采取柔性手段,通过集体化和合作社实现农业

① 参见 *A Freedom Within: The Prison Notes of Stefan Cardinal Wyszyński*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在其中枢机主教记录了他被拘留之前、期间和之后政府对教会政策的变化。也可参见 Andrzej Micewski, *Cardinal Wyszyński*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除在1953年共产党试图控制教会的这一象征性姿态外,“被政府接受的爱国牧师被安置在教会的关键位置,进步的天主教徒的PAX运动受到当局的支持”。但是,教会对此表示反对时,这一政策就失败了。参见 Dieter Bingen,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 Political Actor”, 载于 Jack Bielasiak 和 Maurice D. Simon 编: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 An Outline of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尤其是 pp. 241—251。

② Joseph Roth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87。

③ 关于允许在波兰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的细节,参见 Monticon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ommunist Poland*, esp. 26—28。蒙蒂科恩(Monticone)研究了政府和教区代表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56年建立,以处理“相互关系中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12月8号签署的联合委员会公报建议,政府和教会都应采取全面的、相互理解的政策。蒙蒂科恩认为,“这一协议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在大多数家长支持的情况下,学校在课余时间可以教授宗教……结果是……波兰绝大多数学校都开展了宗教教育”(pp. 27—28)。哥穆尔卡针对教会所采取的自由化政策,包括释放被监控在家的枢机主教维辛斯基,被认为是其“十月之春”的一部分。波兰这一时期的自由化与发生在苏联的去斯大林主义过程相联系。正如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l)指出的:“在1956年,他(哥穆尔卡)同主教的关系良好……保证主教从监禁中得到释放是哥穆尔卡的第一批政治举措之一。作为回应,主教帮助哥穆尔卡巩固其统治并限制那些不稳定因素。” Nicholas Bethell, *Gomulka, His Poland and His Communism* (London: Longmans Press, 1969), pp. 248—249。也可见 Lawrence Weschler, *The Passion of Polan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尤其是 pp. 211—218 关于去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波兰大事时间表。

258 国有化。哥穆尔卡对强制性集体化的一贯抵制是其“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这一道路被莫斯科视为异端和空想。传统的农民公社要远多于集体化的国家农庄。事实上,独立的、私人所有的农庄占了绝大部分,它们在波兰农业所有制中的比例从未低于70%。^①这是国家渗透不完全的标志,也是在全能主义国家之外存在社会权力和自主性的又一表现。

最后,从小斯大林主义者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到相对宽容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哥穆尔卡(1956—1970),到大规模向国外借款进行试验的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 1970—1980),再到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的军人政权,这些领导人的转换过程所体现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转向,一直是一种威权主义而非全能主义的政策更替和领导风格变化模式。事实上,在波兰推行全能主义最为竭力之时(1949—1953),主席兼第一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仅仅是在包括思想家雅克布·贝尔曼(Jakub Berman)和经济学家希拉里·闵克(Hilary Minc)在内的三人领导小组中资格最老的。这一集体的权力共享模式是波兰区别于极端全能主义、独裁和个人崇拜的一个例证。

为何这种威权共产主义的特殊模式会在波兰出现?波兰这种独特的公民社会的反抗性是如何导致了这一模式,并使波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同民主反对派妥协,进而建立双头政制的?

国家性这一变量在波兰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与苏联又极为不同。波兰的犹太人被灭绝、德意志少数民族被驱逐出境、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口被并入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些后果使得波兰族人成为国内的绝对多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也成为国内的绝对多数。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②

^① 参见 Andrzej Korbonski, *Politics of Socialist Agriculture in Poland: 1945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12—312; 以及“Peasant Agriculture in Socialist Poland since 1956: An Alternative to Collectivization”, 载于 Jerzy F. Karcz 编: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Agri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411—431; 关于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波兰相对可靠的、非正式的非农业私营部门的数据,也可参见 Janine Wedel, *The Private Poland*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6), p. 54。

^② 在 1939 年末,波兰人(其中 92% 的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只“占西部地区的 90%……在中部地区占 80%……在南部占 60%”。参见 Jan Tomasz Gross,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The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K. A. Jelenski 指出:“荒谬的是,因雅尔塔协定而产生的共产主义波兰实现了一个最为极端的古老梦想……它——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单一民族单一宗教的国家,天主教成为所有人的信仰。”参见其论文“Paradoxes of Polish Nationalism”, 载于 Leopold Labedz 编: *Poland under Jaruzelski: A Comprehensive Sourcebook on Poland during and after Martial Law*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83), p. 391。

此外，波兰人对民族的支持程度，在欧洲各国之中感情最为炽烈，历史也最为悠久。波兰曾经是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由于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征服和瓜分，从1795年到1918年，作为一个国家的波兰消失了。在这一没有国家的时期，天主教会成为波兰民族寄托对文化和制度强烈热爱的对象。在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后，德国和苏联的瓜分使波兰国家又一次正式消失。这次对波兰的重新瓜分导致了对波兰人的高压统治，波兰军队被发配到苏联，波兰知识分子受到有计划的杀戮。卡廷大屠杀，先前被指为德国人所干，后来被确认为苏联所为。^① 尽管同南斯拉夫一样，波兰也形成了欧洲最强大的抵抗运动，但是与南斯拉夫不同，波兰的抵抗运动与流亡政府存在密切联系。在华沙起义中，当波兰抵抗运动的战士同纳粹艰难战斗之时，红军只是袖手旁观。直到在1945—1947年的内战中，波兰抵抗力量战败，苏联对波兰的军事控制才完全建立起来。^② 由于波兰在“二战”中是盟国成员，属于战胜国，苏联不能（像对东德、匈牙利或斯洛伐克一样）通过声称代表盟国对纳粹合作者进行占领而使其入侵合法化。^③ 因而从一开始，波兰的国家性就成为民族主义抵抗者反抗苏联霸权的资源，为抵抗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59

这样，我们要讨论全能主义对其暴力机构的控制问题。完全的全能主义政权非常依赖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它必须从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安全部门，尤其是军队进行全面控制。与其他任何东欧国家不同，波兰在1945—1947年间进行了反抗苏联和共产主义武装的内战。其后果是产生了充满矛盾的文武关系。波兰军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东欧，只有波兰军队的总司令是一名俄国公民——苏联元帅和国防部副部长康斯坦丁·鲁克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有波兰人血统）。这只会使共产主义政府的“外来”色彩更为明显，降低了其合法性。^④ 苏联试图建立与波兰民族传统

260

① 参见 Jan T. Gross 两项杰出的研究，*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以及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② 例如，只有“在1948年至1955年波兰军队才进行了主要的改造，并确定了他们向当时的苏联模式发展”。Paul C. Latawski, “The Polish Military and Politics”, 载于 Jack Bielasiak 和 Maurice D. Simon 编: *Polish Politics: Edge of the Abyss* (New York: Praeger Press, 1984), p. 271。

③ 在1989年10月和1990年7月，来自共产党和军方的许多官员和分析家向斯泰潘反复强调这一点。

④ 关于在1949—1956年间大部分有苏联背景的波兰高级将领，参见 George Sanford, *Military Rule in Poland: The Rebuilding of Communist Power, 1981—1983* (London: Crown Helm, 1986), p. 57。Latawski, 一名研究波兰外交政策和历史的学生认为，在1949年后，“军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苏联军官的进入，他们最终占了军官总人数的一半”。Latawski, “The Polish Military and(接下页)

的联系,在东欧各国之中,他们只允许波兰保留了战前的军服式样。但是在关键时刻,军队通过对行动的模棱两可和拖延,事实上制约了全能主义的国家权力。早期的一个重要例证是,1956年6月军队没有向波兹南罢工者开火。^①在另一些时候,军队在党内斗争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怀厄特(Wiatr)认为,“1956年10月,当苏联试图胁迫波兰领导人停止非斯大林化之时,波兰军队表达了对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党的新领导集体的支持,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抵抗苏联干涉的决心”^②。

在结束对全能主义的这些评论之前,我们应当对政治多元主义和罗马天主教会再进行一番总体性的观察。当然,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罗马天主教会都在同保守派和法团主义威权政权合作,最突出的是西班牙,其次是葡萄牙。^③而我们的论点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极权国家之中一个强大的天主教会存在,往往会成为多元主义的潜在源泉,因为它具有跨国性的正式组织基础。教廷可以对那些反抗一元论的同化和灭绝措施的团体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教廷还可以批准或者撤销地方主教做出的一些决定,这些主教可能受到压力同意与全能主义政权进行合作。例如,在波兰,有一两次某些波兰牧师几乎接受了同共产主义政府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都被罗马教皇公开否决或拒绝了。

当然,有些政治体系不存在这种更高层次的国际权力资源(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东正教的范围以国家为界,不具有跨国性,并且在历史上就已接受了一种“国家高于教会”的模式,国王或者国家首脑既是世

(接上页)Politics”, p. 271, p. 288 n. 12。也可见 Dale Herspring, “The Polish Military and the Policy Process”, 载于 Maurice D. Simon 和 Roger E. Kanet 编: *Background to Crisis: Policy and Politics in Polan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尤其是 pp. 222—224。

① 有关波兹南事件,参见 A. Ross Johnson, Robert W. Dean 和 Alexander Alexiev, *East Europe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The Warsaw Pact Northern Tier* (Santa Monica: RAND, 1983), p. 60。关于赫鲁晓夫“波兰人在1956年是如何诽谤我们”的讨论、苏军进驻华沙的谈话,以及编者关于波兰军队武装抵抗的可能性的评论,参见 Jerrold L. Schecter 和 Vyacheslav V. Luchkov 编: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90), pp. 113—120。

② Jerzy J. Wiatr, *Four Essays on East European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Warsaw: Scholar Agency, 1992), p. 62。相似的结论见 Andraej Korbonski, “The Dilemmas of Civi-Military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Poland: 1945—1981”,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8, no. 1 (1981): pp. 3—20。

③ 但即使在西班牙,教会最终也导致了威权模式合法性的丧失。Juan Linz, “Church and State in Spain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Return of Democracy”, *Daedalus* 120, no. 3 (1991): pp. 159—178。

俗权威也是精神权威。^①而在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社会中,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力资源,因为伊斯兰教之中,每个信徒都可成为传教者,而且并不存在一个正式的跨国性的等级机构。对作为国际行动者的天主教进行补充说明,对于我们分析波兰是极为适用的。1978年10月16日,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Kraków)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枢机主教成为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从而动员了更大规模的反政府力量,其后果我们将在随后进行说明。

我们不想过分强调我们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波兰建立全能主义的努力,给后共产主义波兰带来了一些在典型的后威权主义国家所不具有的后果。最重要的后果是,尽管私有农场占有重要地位,但国家在经济中仍然起着指令作用,工业和服务业则几乎被完全国有化。即使波兰从未完全建立全能主义,在1945—1989年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也给后共产主义波兰留下了大量结构性利益集团。^②共产主义威权主义的事实也意味着,反抗若要有效,就必须根植于公民社会,因为作为表达政治社会意见的反对党,从不被正式允许或非正式地容忍。

反对派的出现和共产党的弱化

在1956年哥穆尔卡允许教会在公立学校传教之后,教会再没有受到过致命威胁。^③1956年后波兰和南斯拉夫一样,大学和研究机构得到了发展,在与政治相关的政治社会学、哲学、历史 and 经济学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自主性和创造性。^④尽管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监控,波兰的知识分子和公民在

^① 关于“国家高于教会”和东正教教会,参见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和 Claus Wittich 编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 pp. 1159—1163。

^② 参见 Edmund Mokrzycki, “The Legacy of Real Socialism, Group Interest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Utopia”, 载于 W. C. Connor 和 P. Ploszajski 编: *Escape from Socialism: The Polish Route* (Warsaw: IFiS Publishers, 1992), pp. 269—281。

^③ 研究波兰天主教和团结工会的德国学者迪特·宾根(Dieter Bingen)注意到,“在1957年5月哥穆尔卡解释说,他看到了信徒和非信徒、教会和社会主义的共同需要”,尽管教会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在许多政体中所固有的官退/民进机制——在这一时期之后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教会再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按照宾根的术语,教会成为“波兰政治体制的稳定之锚”。Dieter Bingen,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 Political Actor”, p. 213, p. 236。

^④ 在1970年代,华沙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起草一系列致力于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独立演讲。这一努力主要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支持,“用通俗的话说即‘飞行大学’(The Flying University)受到欢迎……1978年1月,60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签署了一份号召成立学术演讲团的声明……在第一年中,飞行大学即向主要郊区5000人以上的民众发表了120场演讲”。参见 Janusz Bugajski 和(接下页)

国际旅行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的自由。

262 从比较和理论的视角来看,波兰反对派的道德和组织风格使波兰成为东欧的先锋。波兰和其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关键差异在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平行关系”^①。波兰公民社会的这种“自组织”程度只有在威权政体中才可能存在,在全能政体以及我们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政体之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关系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1968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抗议,但是基本上没有得到工人支持。事实上,工人被政府组织成为特殊的帮派以破坏示威游行,进而试图分化工人和知识分子。在1970年末1971年初,工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知识分子没有加入。但是,在1976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KOR,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Workers),以帮助那些在罢工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工人。在1980年由瓦文萨(Lech Walesa)和工人们领导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时,其他的公民社会团体,从知识分子到教会,都提供帮助使波兰的抵抗力量紧密合作、相互配合。在团结工会运动的高潮,有1000万工人加入,他们代表全国大部分的雇佣劳动者。团结工会运动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关于党一国是人民唯一代表的口号都被粉碎了,于是在1980年8月团结工会成为所有共产党国家中第一个获得法律承认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运动也使得政府的党政干部体制有所松动。波兰政府同意,今后工厂中的人事任命将以“才能而非党员身份为基础”^②。

(接上页) Maxine Pollack, *East European Fault Lines: Dissent, Opposition and Social Activ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 226; 也可参见 Karol H. Borowski, “Secula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Poland”, *Religious Education* 70, no. 1 (1975): pp. 70–76.

①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平行关系”的概念由斯泰潘提出, “State Power and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载于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 Theda Skocpol 编: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17–343。在市民社会的复杂和重要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形成的波兰反对派, 其结构类似于巴西, 这一结构由“新工会主义”、基本社区团体、“人民的教会”和知识分子组成, 它不仅在政权的自由化, 而且在民主化过程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参见斯泰潘主编论文集, *Democratizing Brazil: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尤其是 pp. 143–296。

② Włodzimierz Pankow,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Management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Poland”, 载于 Jadwiga Koralewicz, Ireneusz Bialecki 和 Margaret Watson 编: *Crisis and Transition: Polish Society in the 1980s*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87), pp. 112–115。关于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团结工会中的政治文化的深度研究, 参见 Andrzej W. Tymowski, *The Unwanted Revolution: From Moral Economy to Liberal Society in Poland (The Social Origins of Reform and Counter-Reform)*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1995), 尤其是 pp. 126–241。

波兰拥有东欧最庞大和最优秀的民意调查传统。这些调查不断反映出对于全能模式的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反对。在 1981 年 11 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有 60%—80% 的被调查者声称自己喜欢多中心权力模式——那就是组织充分自治，中央计划受限制，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增加，党员活动缩减……大约 70% 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支持独立、自主的团结工会的活动”^①。

263

波兰社会对抗国家的自组织模式，事实上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公民社会组织者的启发。在波兰的自组织社会之中，人们敢于组织、行动、思考和生活，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名言，“似乎他们是自由的”。事实上，团结工会在其存在一年后即拥有了强大的权力和合法性，以致盖莱克之后雅鲁泽尔斯基之前的第一书记史提芬·卡尼亚(Stefan Kania)不得不尽力否认波兰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也就是趋于崩溃的党和团结工会)。

以葛兰西的术语来说，在 1981 年秋团结工会掌握了公民社会的主导权后，党能保持其权力，仅仅因为它控制了军队和安全部门等暴力机构，以及苏联对政权挑战者的限制。当波兰共产党有进一步弱化的迹象时，对此进行抵抗的自组织社会也就日趋强大。1981 年 12 月 13 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已不再提共产党以及同志一词，并认为自己仅仅是“军人和波兰政府的领导人”——宣布，“我由此宣告民族救国军事委员会于今天成立”，而波兰被置于戒严法管制之下。^② 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丧失，明显体现这一点的是，政府领导人和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部长都不再是党的官员，而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下的党的军人。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共产党政权，在 1981 年至 1989 年 8 月团结工会首位总理上台期间，波兰共产党政权是被军方控制的，他们虽然是共产党员，但首先是军官。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既是总理也是国防部部长，他委派高层军官担任一些重要部委、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他创立并通过民族救国军事委员(Wojskowa Rada Ocalenia Narodowego, 或 WRON)进行统治，委员会中 21 名成员都拥有高级军衔，他们是国家的领导权威。波兰学者亚德韦加·斯坦

^① Ireneusz Bialecki, “What the Poles Thought in 1981”, 载于 Koralewicz, Ireneusz Bialecki 和 Margaret Watson 编: *Crisis and Transition*, p. 30。

^② 作为一份文件，戒严法极像那些拉美高级军官组织的领导人颁布的许多文件，通过它们使其对权力的占有合理化。这份文件也缺少全能主义甚至后全能主义文件中可见的意识形态话语。雅鲁泽尔斯基暗自指出“长期的冲突”和“混乱”已使国家处于“深渊的边缘”，这可以解释“我承担的责任和重担”。文件的全文可见 Robert Maxwell 编: *Jaruzelski: Prime Minister of Poland*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5), pp. 28—30。

264 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把这一戒严政权描述为:雅鲁泽尔斯基试图重新界定制度化的政权,将党国转变成为“威权官僚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军人政权”^①。军队的主导地位,同时由党员军人形成的一套不同于共产党的机构,使得这一政权推行自由化并将团结工会视为合法、可接受的甚至必要的可同其进行谈判的“角色”。如卡宾斯基(Korbonski)正确指出的,波兰军队在历史上成为政治“缓冲”力量,有时会在国内进程中扮演否决角色,尤其是否决针对共产主义的政策。在1981年,尽管缓冲角色被中止了,军方成了政府,但形成了由安全部门(由内务部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领导,他担任这一职位直至1990年夏)、军队、与苏联联系的党(由坚持《华沙条约》的军官,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领导)、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的独特的五方权力关系。^② 必须认识到,正是这五个组织的互动决定了最终转型的时间和速度。

协议式转型

当戒严法在1981年12月13日宣布后,波兰形成了以团结工会(以及被组织起来的劳工、知识分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运动)和天主教会为一方,等级化的军队和安全部门及其控制的党的残余力量为另一方的权力格局。团结工会运动的信息由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law Geremek)所说的“不可

^① Jadwiga Staniszkis, *Poland: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0.

^② 参见 Cindy Skach, “Military Regimes and Negotia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oland and Braz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1, 未发表手稿)。还有许多从军事维度考察波兰威权政体的分析,见 George C. Malcher, *Poland's Politicized Army: Communists in Uniform* (New York: Praeger, 1984), 这是一本考察和记录1981年后波兰政府军事化的著作。波兰社会学家泽西·维亚特(Jerzy Wiatr)也讨论了党内军人的演变发展,参见 *The Soldier and the Natio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sh Politics, 1948—1985* (Boulder, Colo.: West view Press, 1988), Andrew Michta's book, *Red Eagle: The Army in Polish Politics, 1944—1988*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该书对军事威权主义的实质性分析较少,但对近来的军事机构进行了翔实的历史记录。安德烈·科波斯基(Andrzej Korbonski)在其作品之中对波兰历史上的文武关系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和分析。特别参见他与 Sarah M. Terry 合作的论文“The Military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Poland”, 载于 Andrzej Korbonski 编, *Soldiers, Peasants and Bureaucrat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and Modernizing Societi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Press, 1982), pp. 152—180, 以及“The Dilemma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Poland, 1945—1981”, 载于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8, no. 1(1981): pp. 3—20。

摧毁的帝国”——超过 1000 个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机构广为传发。尽管天主教会将自己纳入反对派阵营,但它偶尔被政府用作非官方的调停者和缓冲器。这一系列的行动者(即使我们承认苏联跨国影响的存在)与巴西和智利威权政体中的极为相似,而不同于全能主义或是后全能主义国家中的行动者。 265

这一对权力主体的分析使我们认为波兰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它是协议式转型的代表,类似于我们对巴西尤其是智利的分析,反对派为转型付出了代价。在智利和波兰,协议式转型意味着民主始于旧政权的机构,并且旧政权仍然在立法和国家机构中保持着很强的地位。让我们看一下充满矛盾但却真实的协议式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在 1987—1988 年间,波兰威权政体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反对。1987 年 6 月教皇保罗二世进行了他的第三次波兰之行,呼吁重新实现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政府认识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 1987 年 11 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议的一揽子经济改革在全民表决中被驳回,因为它没有达到合格选民的必要多数票。全民表决的失败(在全能主义政权中是不可能的,在圆桌会议之前的后全能主义国家也没有先例)在共产主义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它导致了政权的进一步瓦解。

1988 年 5 月新一轮的团结工会罢工开始,最先由年青一代发起,但随后有更多的军工企业工会加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温和当权派的雅鲁泽尔斯基和作为温和反对派的瓦文萨都面临着内部激进派的潜在挑战。最终,由经典的四方(激进的当权派、温和的当权派、温和的反对派、激进的反对派)博弈而启动的转型出现了。

1988 年夏初,内政部部长基什恰克将军在会见瓦文萨时询问他是否愿意进行试探性的对话。瓦文萨在 1988 年 7 月 21 日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8 月 26 日,在第二次团结工会罢工期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政治局会议中提议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① 随着关键的谈判前期工作的进行,政府明显表露出它想得到团结工会对自己经济政策的支持,而团结工会要求以政府的合法承

^① 我们对于圆桌会谈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兰宪法理论家维克多·奥夏滕斯基(Wiktor Osiatynski),他注意到了圆桌会谈并做了广泛深入的档案和访谈研究,将其发现公布在“The Round Table Negotiations in Poland”中(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和中欧大学联合建立的东欧宪政研究中心,工作论文,1993 年第 1 期)。也收录在 Jon Elster 主编的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end of Communism* 一书中(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6 认作为回报。^① 我们指出这些是要强调,政府虽希望谈判,但仍想显示其拥有强制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政府和反对派都高估了政府的力量。^② 事实上,尽管有圆桌会议,但双方仍被“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环绕,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如果知道结果,他们将不会做出那些本不该做的让步。^③

波兰的圆桌会谈当然也是 1989 年东欧那些不平凡事件中的一环。会谈的结果是,40 年来东欧地区第一次完全自由的参议院的选举举行了。1989 年 6 月选举中,团结工会出人意外地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由于其部分先前的附庸农民党同盟的背叛使共产党无法组建政府,因此在 8 月,40 年来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总理上台。第一个非共产党总理的出现是受到国际权力关系影响的。苏联如干涉波兰,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结束同西方的缓和政策,这将有损于其改革计划。戈尔巴乔夫因此而面临着一个他从未料到或渴望的抉择:

① 关于 1988 年 8—12 月谈判之前谈话的重要性(及对四方参加动因的说明),参见 Jadwiga Staniszkis, *The Dynamics of the Breakthrough in Eastern Europe: The Polish Exper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195—202, 及 Osiatynski, “Round Table Negotiations in Poland”, pp. 7—12。关于团结工会为何加入圆桌会谈和对其得失的辩论,参见 Bronislaw Geremek, “Post-Communism and Democracy in Poland”, *Washington Quarterly* 13, no. 3 (1990): pp. 251—231。

② 政府方面的主要谈判者(后来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继任主席),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后来告诉奥夏滕斯基,“(拥有力量的)假相使我们避免了罗马尼亚的命运。如果党的领导人认识到自己的虚弱,那就将不会有任何圆桌会谈和平的变化”。(p. 7)团结工会方的主要谈判者兹比格涅·布雅克(Zbigniew Bujak, 后来成为 ROAD 党的创立者之一)告诉奥夏滕斯基,团结工会当时已接近“仅在维持现存秩序和可能引发大崩溃的真正改革之间的临界线”(p. 47)。奥夏滕斯基据此得出,“在 1989 年 4 月几乎没有人相信在圆桌会谈后这条线会很快被逾越”。圆桌会谈六年后,许多协议内容,如总统办公室,仍被保留。

③ 其实如亚当·普热沃尔斯基在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7 中所说的:“如果每个人都被笼罩于罗尔斯之幕中,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不知道在最终民主制度中自己将拥有什么力量,那么所有人都会采取一种最大化的解决方式:引入相互制衡并使少数派影响最大化的制度……当各种力量间的关系还不明朗时,成文宪法往往会削弱对不断增加的权力的回报,以此为最终的失败者提供保障并减少竞争风险。”因此,“当力量关系未知或不明朗时被采用的制度最有可能虽经历多种情况但依旧被保留”。也可参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6—137, 他在此首次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在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概念。“原初状态意味着要设立一系列公正的程序,以便使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入争论的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为达此目的,我假设各方是处在一种无知之幕背后。他们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他们不得不仅仅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评价。”

1991 年在阿尔及利亚,政府未同反对派就制度达成任何事先协议,这导致 FIS(伊斯兰救国阵线)在第一轮选举中获胜后,政府随即取消了第二轮选举并宣布军事接管。一旦无知之幕被选举结果吹散,为实现转型而进行谈判就会愈加困难。

干涉波兰还是让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上台执政。波兰威权共产主义新的权力关系左右着戈尔巴乔夫的决定。^①但是，一旦决定做出，波兰的例子就会反过来有国际性的示范作用，它会在东欧改变所有的后全能主义、类全能主义甚至苏丹化政权中的权力关系。

波兰对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历史影响如今已被广泛正确地认识到。然而波兰也为“第一”付出了代价。波兰的协约式转型推迟了它自己的完全转型，更重要的是它的转型道路对于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造成了无法预想的损害。我们同意简·T. 格罗斯(Jan T. Gross)所做的估计，“一个即将消亡的时代的逻辑所设定的重大情势，不仅仅标志着旧秩序的终结，而且——这一点常不被当时的人所知——是新的时代必须加以控制的遗产……今日波兰政治危机的根源是制度性的”^②。

圆桌会议协议有三个重要妥协。雅鲁泽尔斯基身边的党内军人们想通过即将到来的1989年选举阻止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主要想实现法律承认。为诱使团结工会参加1989年选举，党内军人顶着党政权贵的强烈反对，同意波兰当时唯一的议会(the Sejm)的35%的议席可以进行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团结工会在那时不相信完全过渡到民主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坚信，通过选举可以实现合法化并开启自由政治竞争的进程。与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相比，波兰反对派虽然与政府谈判，但政权仍直接掌握在等级军人手中，团结工会接受的是更为有限的胜利。然而，波兰的妥协意味着，在1989年8月至1991年12月，共产党及其同盟在下院占有多数，虽然其附庸农民党，如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那样，不久后就宣布独立。^③

^① 亚历克斯·普拉维达极好地掌握了波兰的进程同苏联反应性的许可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波兰由‘处于守势的自由化’走向权力共享，成为转型的先驱，这也促使苏联的政策由自由化转向反应性的默许。在波兰政治转型和苏联政策演变中有三个关键结合点：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它在选举中的获胜和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政府的形成。在每个事件中，波兰人都决定着变化的时间和性质，尽管在每一步中他们都不时关注莫斯科的反应，而莫斯科为维护稳定，没有进行阻碍而是许可了他们的行为。” Alex Pravda, “Soviet 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 The Means Justify the Ends”, 载于 Alex Pravda 编: *The End of the Outer Empire: Soviet - 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1985 - 1990*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 24.

^② 参见 Jan T. Gross, “Poland: From Civil Society to Political Nation”, 载于 Ivo Banac 编: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7, p. 65.

^③ 这一极为复杂的宪法制定过程产生了两个问题：团结工会是否有足够的票数通过它希望的宪法，在国会中的共产党多数是否拥有共同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合法性。

268 第二和第三项妥协是关于参议院和总统制的创建。这是一项复杂的交易。党内军人和党国权贵都希望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以确保“普遍利益”(例如,共产党)。政府首先提议议会和其他团体可以间接选举总统。这遭到团结工会的反对。为打破僵局,政府提议建立参议院并允许其自由选举,如果在国会和参议院中赢得政府要求的简单多数,就可以选出总统。就总统权力进行多次讨论后,团结工会同意设立总统和参议院。^①

在签署圆桌协议的一周内,以波兰议会对宪法进行修正的形式,圆桌会议赋予总统如下权力:第一任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法定任期为六年。按其职权,总统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军队总司令。他在国际事务中有权代表波兰,提名总理人选请议会批准,并可在特殊情况下将其解职。重要的总统法令要求总理副署,但当总统“考虑到执行问题——如外交政策、防务和国家安全时可以例外……总统也有权宣布为期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②。

从转型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协议给波兰完成其转型和巩固民主的进程留下了两个棘手的后果。虽然参议院拥有同等权利,但国会65%的议席将通过非竞争性的选举产生,这意味着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组织在起草民主宪法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作用。同时总统(最初设想将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担任)在国内安全、防务和外交事务领域拥有特殊权力,还具有某种紧急权力,这都被写入了现存的宪法。随时间推移,这些让步的严重性将日益显现。因为在协议式转型条件下起草宪法极为困难,总统的宪法“权利”将自我延续下去。

269 依据其反对派地位和开放自由竞争的国会议席选举中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工会组建了波兰的转型政府。这一社会合法性也要归功于财政部部长巴尔采洛维齐(Balcerowicz)的稳定计划所获得的巨大支持,这一计划是东欧国家中最为大胆创新的,它奠定了1993—1994年波兰经济在东欧国家中快速增长的基础。^③然而我们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变。团结工会,像在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的民主反对派一样,同意协议式转型。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南美国家的转型是始于非民主政府控制着65%的下院及与

^① 由于通过宪法的困难,到1992年年中,这些修正需要额外权威作为总统的“宪法权利”。在圆桌会议中对参议院和总统的讨价还价,参见Osiatynski, “Round Table Negotiations in Poland”, pp. 40—43。

^② Osiatynski, “Round Table Negotiations in Poland”, pp. 45—46。

^③ 如亚当·普热沃斯基所言:“如果人民相信政府,选民将采纳‘骑马疗法’,采用波兰描述的巴尔采洛维齐计划……但在波兰,绝大多数的人(90%)支持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尽管新的经济政策在最初几个月使生活境况严重恶化。”参见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 165。

其平行的执行机构这一现实条件。

政治社会和民主巩固存在的问题

本章以下部分,我们将对根植于公民社会的民主反对派同党内军人之间进行的协议式转型给波兰带来的后果进行尝试性分析。在第一章中,我们认为巩固民主首先所需的是就产生公共政策的制度安排达成一致。这种安排需要政治社会一定程度的自治,也需要公众和主要权力主体相信,这些民主制度安排比其他任何替代性的安排都更为适合。波兰是如何向这些条件迈进的呢?

首先是政治社会。民主政体的核心特点是它要在共识程序之内表达冲突。巩固的民主是这么一种政治体,正常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架构内被接受并被合法化。现代民主政体也要求通过政党来聚合并表达社会的组织化利益。所有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后威权主义的波兰,均存在代表问题。在扁平的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独立资本甚至劳工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团体仍然处于自我界定的初级阶段。对于资本来说,他们陷入困境,不知如何代表那些仍未被组织起来或甚至不存在的利益,这明显体现在波兰议会的一次人事任命听证会上,一名被提名为产业部部长的候选人说:“我代表的对象现在还不存在。”^①代表的功能被进一步复杂化,尽管东欧的大部分后共产主义政府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社会,但是在转型之初,几乎无人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拥有实际的物质利益(与潜在的理论上的利益相对而言)。因此,代表还未出现的物质利益很困难。^②即使在那些物质利益存在的情况下——如产业工人——在1989年至1990年也难以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来代表社会民主空间,因为对于声称代表劳工利益的共产党,社会的态度是深刻矛盾的。^③但

270

① Staniszkis,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p. 184.

② Staniszkis,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p. 216。如普热沃尔斯基写到,甚至“在一些私营企业制度脆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法国、墨西哥和韩国,政府不仅主导着资本积累,而且还发展出了当地的中产阶级。东欧国家没有本地中产阶级,且流行强烈的反中央经济统制情绪,因而政府在不远的将来还不能发挥相同的作用……在波兰,到1989年底,私人储蓄占GNP的1/3,但仅占资本总量的8%”。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 159, p. 156。

③ 这是Iván Szelényi的著述中的主题,见他的“Socialist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Dilemma and Prospects”,载于Rudolf L. Tokes编: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87—208和“Soci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Central Europe, Fall 1990”,载于Banac,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在其中,他说到:“最不令人吃惊的就是新组建的社会民主党被毁灭性打击所羞辱。”

是,随着私有化的进程,管理层和资本主义被认为对这些问题负有责任,这使得在1993—1994年,有越来越多的后共产主义政党也宣称自己代表社会民主空间。

由于反对派斗争的长期性和道义性,后共产主义的代表性这个普遍性问题与政治社会的可证性(authentication)和合法性问题混在一起,并赋予了波兰独有的特性。公民社会和民主等其他许多重要的政治词汇一样,也可以被不同的理论家和社会运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① 在波兰以及在巴西(稍有不同),公民社会形成了某种很独特的在政治上强有力的涵义。在波兰,公民社会是指一个非强制性的活动领域,该领域不是由国家创立的,并且在事实上独立于国家。我们也认为,波兰是“公民社会对抗国家”两分法的特殊案例,深深根植于波兰民族反抗外国控制的国家权威的文化之中。^② 在抗争阶段,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有价值的概念,因为它可以在“他们”(莫斯科支持的党一国)和“我们”(波兰公民社会)之间进行鲜明的区分。^③ 公民社会的相关话语进一步强化了反对派在反抗党一国斗争中的地位,因为它被融入了“真理”的道德

① 关于“公民社会”在不同哲学范畴内的含义和它如何被应用于东欧的讨论,参见 Jean L. Cohen 和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关于以不同方法研究“公民社会”如何成为东欧反对派运动的理论、实践和生活的核心的优秀论文集,参见 John Keane 编: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88)。对“公民社会”的修正和批判正在出现,如可见 Klaus von Beyme, *Systemwechsel in Osteuropa* (Frankfurt an Main, 1994), pp. 100—123, 声称“公民社会”是“旧知识分子最后的意识形态”的章节。

② 有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对国家”的两分模式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通过政府内的反对力量和改革派,党的国家实际上渗透并操纵着社会规范。参见 X. L. Deng,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he Case of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July 1994): pp. 293—318。我们认为 Deng 的批判适合用来评价 1980 年代的匈牙利。

③ 现今关于波兰公民社会的不同方面有许多文献和研究。其中包括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3); Jadwiga Staniszkis, *Polan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ed., Jan T. Gro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zej M. Tymowski, “The Unwanted Social Revolution: From Moral Economy to Liberal Society in Poland” (The Social Origi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1989) (Ph. 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5)。

Rudolf L. Tokés 主编,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包括有关波兰的论文: Jacques Rupnik, “Dissent in Poland, 1968—1978: The End of Revisionism and the Rebirth of Civil Society”; 两篇论文 Iván Szelényi, “Socialist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Dilemmas and Prospects”; Alex Pravada, “Industrial Workers: Patterns of Dissent, Opposition and Accommodation”, 将波兰公民社会置于中欧进行比较。有关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参见 Z. A. Pelczynski, “Solidarity and the Rebirth of Civil Society in Poland, 1976—1981”, 载于 John Keane 编: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88), pp. 361—380。(接下页)

话语和“生活在真理之中”的存在主义宣称之中。这套话语对 1976—1989 年间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特殊影响。在任何解放运动之中，“团结”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妥协”和“内部冲突”则具有否定性的意义。考虑到反抗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所进行的斗争的艰巨性，直接、自发和反传统的运作模式需要一套可被理解的战略和战术。渐渐地，直接、自发和反传统的工具性的方面演化成为个人和集体行动的伦理标准。总之，这些话语和行为成为一些波兰分析家所称的“伦理性公民社会”，毫无疑问，这是波兰反对派以及最终波兰式民主转型道路最有力量和最富创新的部分。^①

“伦理性公民社会”思想有助于非常强大的政治反对派，而许多理论家和实践者走得更远。他们非常急切地希望摆脱党一国的常规和谎言的束缚，因而将反抗行为的情境伦理提升为“反政治的政治”(politics of anti-politics)这一普遍性的原则。^②而“反政治的政治”的目标在于创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由空间。

不幸的是，尽管伦理性公民社会使波兰成了民主转型的先驱和英雄，但也 272

(接上页)也有关于波兰过去和现在公民社会领导人的自传。历史学家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的回忆录(他是保护工人委员会(KOR)的创始人之一)收入于 *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此外,1981年春季版的 *Telos* 第47册,着力研究“波兰和社会主义的将来”,该卷包含了许多波兰和东欧学者关于民间社会的论文。匈牙利学者 Andrew Arato 的“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oland 1980—1981”, Adam Michnik 的“*What We Want to Do and What We Can Do*”,以及 Tadeusz Mazowiecki(他是团结工会的专家,曾任但泽全体罢工专家委员会主席)的“*Solidarity's Tasks*”,不仅反映了波兰知识分子的不同观点,并且反映了在关键的1980年至1981年间民间社会领袖们的思想。Michnik 早期一篇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章“*The New Revolutionism*”见于 *Survey* 22 (1976): pp. 267—277。也可参见 *Survey* 17 (1971): pp. 35—52, Leszek Kolakowski 的有思想的文章“*Hope and Hopelessness*”。

① “伦理性公民社会”概念由 Piotr Ogorodzinski 进一步发展,参见“*The Four Faces of Civil Society*”(Warsaw, 1991, 未出版的手稿)。

② David Ost 认为波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部分“排斥国家不仅是因为不能在其中获胜,而且是因为不愿意在那个舞台上赢得胜利……反对派不想拥有权力甚至要将其抛弃……因此‘反政治’不仅仅是拒斥国家,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相信正义秩序的本质不是好的政府和当权者,而是拥有生机活力、充满思想、自治并富于创造力的社会”。参见 David Ost,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Opposition and Reform in Poland since 198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

更强烈的反政治思想和更有影响的言论,参见匈牙利人 George Konrad 的著作, *Anti-Politic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和 Václav Havel 的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London: Hutchinson, 1985)。Havel 宣称:“人类为了更自由的生活每天进行着徒劳的但从不休止的斗争,但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政治中不能自拔,不要搞政治投机或沉溺在对未来的幻想中。”(p. 88)也可参见捷克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Jiri Ruml 的文章,“*Who Really Is Isolated?*”载于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178—197。

不可避免地在理论和实践上给民主的政治社会带来了体制上的问题。伦理性公民社会代表“真理”，但是巩固民主之中的政治社会常常代表“利益”。在政治社会之中，行动者很少是“民族”，而往往是“团体”。“内部差异”和“冲突”不再被集体压制，而是在政治社会之中被组织性地表达出来。妥协和制度化不再被视为消极价值观，而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反政治会危及民主政治。在新的民主政体之中，人们不再寻求同国家权力的平行地位，而是寻求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事实上，伦理性公民社会之中的大部分对反对有效价值观和话语，对于巩固民主之中的政治社会来说，则是无效的（见表 16.1）。

表 16.1 “反对派的伦理性公民社会”和“巩固民主中的政治社会”的话语比较

价值观或者态度	反对派的伦理性公民社会	巩固民主中的政治社会
行动基础	真理伦理学	利益
行动者	伦理民族	团体
对“内部差异”的态度	轻视	接受,并将其视为正常
对民主阵营“内部冲突”的态度	竭力压制	竭力组织、聚合并表达
对“妥协”的态度	消极	积极
对常规化制度的态度	消极	积极
对“反政治”的态度	积极	消极
对“国家”的态度	外在于国家进行运作	竭力对其加以控制

对波兰新生的民主政体来说，在从反对性的伦理性公民社会向巩固民主的政治社会转换过程之中，要实现规范、话语(discursive)和行为变迁，最好的情况是已经存在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而且具有可持续的领导艺术。然而，波兰协议式转型，给这一完全转变增加了难度。国会之中 65% 的席位仍然掌握在共产党和他们以前的小党联盟之手，从相当程度上说，总统办公室和国家暴力机构的关键位置仍控制在戒严法的制定者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内政部部长基什恰克将军手中，后者从戒严法开始实施之时就一直在该职位上任职。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继续坚持“我们”对“他们”的两分模式。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和感情，维护团结工会作为民族运动的统一。他们也想将这种作为关键的资源去大胆地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这意味着，伴随着内部矛盾、团体冲突以及在团结工会之外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政党的努力，“我们”内部也暗流涌动。按照波兰社会科学家亚德韦加·斯坦尼斯基的说法，团结工会作为议会内的“非

党派集团”同政府进行合作,在事实上阻止了不同利益的识别和表达。^①

即使团结工会在1990年代中期分裂为两个主要的党派集团:公民运动民主促进会(Ruch Alternatywny Akcja Demokratyczna)[ROAD]和中间联盟(Center Alliance),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两个集团仍然“维持着与团结工会思想和价值观的联系……ROAD和Center Alliance的特色——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于,他们都拒绝将自己定义为政党,从而提供一种清晰而明确的自我定位,至少到现在都是这样。两个集团都试图呼吁社会继承团结工会的遗产、共识标准和集体立场”^②。

波兰政治社会的问题由于莱赫·瓦文萨的选择而更加复杂。团结工会的非政治化直接导致其分裂为许多小党,这使其政治力量在1990—1992年间受到削弱,从而使先前的共产党和农民党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人意料的胜利,使得前共产党人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在1995年当选为总统。

伦理性公民社会的领袖瓦文萨是东欧最具有魅力的领导人,他的非政治化选择对政治社会产生了有害影响。他没有选择直接运用其巨大的影响和能力来竞选政治职位,他没有在国会中创建政党,或者坚持成为第一位总理。相反,他选择待在波兰初级的政治社会之外,仍然担任公民社会的领袖。当他最后决定参与政治之时,他是作为无党派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的。

团结工会政府运用团结工会运动的道德资本,通过技术性和非政治性的方式来进行运作,这迅速使其最初的问题复杂化。对技术性和非政治的关注, 274
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的失败,尽管他在组阁之时和瓦文萨进行了商谈。^③ 这些失败的原因在于,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和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团结工会政府距离越来越远。

团结工会领导在议会和政府中做出的下一个致命的反政治决定是没有在1990年初要求实现议会的全面自由选举。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中的伙伴,执

^① Staniszkis强烈批判了第一届团结工会政府的非政治倾向。参见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pp. 203—206。

^② Jack Bielasia, “The Dilemma of 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in Connor and Ploszajski, *Escape from Socialism*, p. 209.

^③ 这一观点最初在同提摩西·加顿·阿什的交谈中引起我们的注意,后来由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领袖确认。

政的共产党(PZPR)在1990年1月宣布解散。在1990年4月,瓦文萨非正式表达了他参选总统的雄心。^①考虑到1989年选举中团结工会压倒性的道德胜利、在选举后共产党无法组建政府、共产党的解散和瓦文萨希望提早进行选战的呼声,在我们看来,在1990年秋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是具有历史可能性的。但是,团结工会在议会和政府中的领导人想推迟议会选举。这导致了团结工会著名的分裂,政治社会的领袖马佐维耶茨基和公民社会的领袖瓦文萨在总统直选之中相互对抗。^②团结工会的总理不仅被瓦文萨击败,甚至还输给了一位民粹主义者,一位非政治性的流亡国外的不知名人士,斯坦·蒂敏斯基(Stan Tyminski)。在总统竞选中,瓦文萨进一步加深了团结工会的分裂并坚持他的非政治立场。他以无党派总统候选人身份竞选。作为候选人,他声称需要保持政治的自发性和反形式性(antiformal),反对制度化。波兰民主的巩固需要政党的支撑,并使议会和总理的授权常规化,但是瓦文萨在竞选中却表现得像一位“围着斧头转”的干涉主义总统候选人。^③

我们现在来讨论政党及其在政治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巩固的民主制度要求有一系列政党不仅表达利益,而且寻求通过连续性的计划和组织性的行动来聚合利益。在第一个团结工会政府上台26个月之后,波兰在1991年10月进行了议会两院的第一次完全竞争性选举。现代政治社会的一个措施是,设定一个最低限制,只有得到全国选票3%或5%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这一措施使议会中只有少数政党才能聚合利益。但是在波兰,经过激烈的斗争,这一最低限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④妨碍进一步聚合的一个因素是,虽然瓦文萨保持其非党派立场,但他给许多政治团体发出模糊的信号,他将支持他们。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这些由前团结工会分裂出的团体声称将继承团结工会运动时期的共识性信条,不会主张其他的纲领,也不会寻求成为以利益为基础的政党。关于不可商议的价值观(non-negotiable values)的道德争论仍然占据了主流话语。具有反政治组织风格的非政党团体正在增加。一些评论家指出:

① 提摩西·加顿·阿什在其“Polish after Solidarity”中回顾了这一时期主要当事人写的波兰语书籍。参见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3, 1991): pp. 46—58。

② 有关在早期议会选举中失去的机会,参见同上书, p. 54。

③ 引自 Gross, “Poland: From Civil Society to Nation”, p. 63。

④ 瓦文萨支持设立较高标准或建立简单多数选举制,以鼓励较大的政党。先前的共产党希望采取比例代表制,因为担心简单多数选举制会削弱其势力。瓦文萨的许多团结工会盟友都反对他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制。参见 David McQuaid, “The ‘War’ over the Election Law”,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2, no. 3 (1991): pp. 11—28。

在转型的早期阶段……利益集团当然是非常脆弱。利益分立在政治舞台上事实上还不存在……除了小党地位以外,大多数新兴组织的显著特点是,他们将规范性的、往往具有排他性的价值观作为其政治行动的基础。就总体而言,这些小党依赖价值观、传统和规范进行运作。^①

最终有 29 个政党进入了国会。没有任何一个党的得票超过 14%。最大的四个政党严重对立,并且没有控制超过 50% 的议席(见表 16.2)^②。

我们应用标准的 Laakso / Taagepera 加权公式来构建议会之中的“有效”政党指数,结果显示,波兰有效政党指数为 10.8。正如表 16.3 表明,在近 10 年来,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上任何既存的民主政体之中的有效政党指数。

在这种情形下,波兰新兴民主制度之下第一次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发现要组成一个政府极为困难。在两个月的危机之后,政府最终组成,但是要组成一个能实现计划的联盟还是非常困难。^③ 在最初的 7 个月间,先后更换了 3 位总理,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可以组成稳定的多数联盟。总理和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之间的关系变成危险的冲突关系,导致了那种在非民主国家之中存在的紧张氛围甚至行动。

表 16.2 1991 年 10 月大选后波兰议会中政党的有效数目

276

政 党	议 席
民主联盟	62
民主左翼同盟	60
天主教选举运动	49
波兰农民党—规划同盟	48
独立波兰联邦	46
中间公民联盟	44
自由民主大会党	37

① Bielasiak, “Dilemma of Political Interest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 211, p. 210.

② David McQuaid,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 Postmortem”,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Nov. 8, 1991): pp. 15–21.

③ 细节参见 Louisa Vinton 的三篇文章, “Impasse Reached on Talks on New Government”,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Nov. 29, 1991): pp. 19–25; “Poland: Government Crisis Ends, Budget Crisis Begins”, *RFE/RE Research Report* (Jan. 17, 1992): pp. 15–20;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Search of a Program”,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March 27, 1992): pp. 5–12.

续表	
政 党	议 席
农民协定	28
团结工会	27
啤酒爱好者党	16
德裔少数民族党	7
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cy)	5
基督教民主党人党(Party of Christian Democrats)	4
波兰西部联盟(劳工少数党)	4
现实政治团结联盟	4
X 党	3
现实政治联盟	3
西里西亚自治运动	2
民主党	1
正统信仰者党	1
维克波尔斯科和卢伯斯基地区居民联盟	1
皮埃尔斯特农民选举联盟	1
波德尔地区居民联盟	1
彼得格斯克斯农民联盟	1
维克波尔斯科和波兰的党	1
团结总统的克拉克夫联盟	1
妇女反逆境同盟(Women's Alliance against Adversity)	1
民主社会运动	1
团结 80	1
总席位	460
有效政党指数	10.8

资料来源: Polish election results from "New Digest for October, 1991", *Kes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Th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is found in Markku Laakso and 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no. 1 (1979); pp. 3-27.

表 16.3 波兰议会 Laakso/Taagepera 政党有效指数(1991):
与世界其他持续的议会制、半总统制和总统制民主国家的比较(1979—1989)

277

议会制		半总统制		总统制	
3 个或以上政党	少于 3 个政党	3 个或以上政党	少于 3 个政党	3 个或以上政党	少于 3 个政党
	基里巴斯 a				
	瑙鲁 a				
	图瓦卢 a				
	博茨瓦纳 1.3				
	圣文森特 1.4				
	多米尼加 1.5				
	牙买加 1.5				
	巴哈马 1.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6				
	巴巴多斯 1.7				
	圣卢西亚 1.7				
	新西兰 2.0			美国 1.9	
	加拿大 2.0				
	英国 2.1				
	印度 2.1				
	希腊 2.2			多米尼加 2.3	
	奥地利 2.4			哥斯达黎加 2.3	
	澳大利亚 2.5				
	所罗门群岛 2.5				
	毛里求斯 2.5				
	爱尔兰 2.7			委内瑞拉 2.6	
	西班牙 2.7				
	日本 2.9				
联邦德国 3.2		法国 3.2			
挪威 3.2					
瑞典 3.4					

续表

议会制		半总统制		总统制	
3个或以上政党	少于3个政党	3个或以上政党	少于3个政党	3个或以上政党	少于3个政党
卢森堡 3.4					
以色列 3.6		葡萄牙 3.6			
荷兰 3.8					
意大利 3.9					
巴布亚新几内亚 4.0					
冰岛 4.3					
丹麦 5.2					
比利时 7.0					
		波兰 10.8			

a. 由于没有正式的政党,这些国家属于少于两个“政治集团”的类别。

注:瑞士和芬兰属于“混合”体系,分别是 5.4 和 5.1 的政党有效数。

资料来源:此表 Alfred Stepan 和 Cindy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载于 *World Politics* 46, no. 1 (1993): pp. 8—9。同样参见 Markku Laakso 和 Rein Taagepere,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载于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no 1 (1979): pp. 3—27。

278 缺乏宪政的半总统制

讨论直选产生的总统和向议会负责的总理的关系很重要,在这里需要进行简要补充说明。我们两人在其他地方都曾经指出,如果在一个民主政府之中两个首脑的合法性来源各自独立,我们有充分理论依据担心其潜在的问题。^① 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其先驱性的分析之中,将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政府称为“半总统制”: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办公室在法

^① 参见 Juan J. Linz,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载于 Juan J. Linz 和 Arturo Valenzuela 编: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7, 尤其是 pp. 58—69。也可见 Alfred Stepan 和 Ezra Suleiman,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A Model for Import? Reflections on Poland and Brazil”, 载于 H. E. Chehabi 和 Alfred Stepan 编: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393—407。

理上和事实上都享有很大的权力,总理向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① 在1980年—1989年这十年之中,在民主政体持续的37个国家之中,只有法国和葡萄牙两个国家符合迪韦尔热的界定。^② 奥地利、冰岛和爱尔兰的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总理向直选产生的议会负责,但迪韦尔热和我们都认为,这三个国家不是“半总统制”,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总统在事实上都不享有重要权力。^③ 芬兰常被当作“半总统制”,因为芬兰总统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直到1988年芬兰总统还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是以政党板块为基础间接选举的。^④ 中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结果,只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其自由选举中选择了典型的议会体制——总理是行政首脑,而总统由非直接选举产生。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选择了半总统制,这可能是受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启发。

考虑到后共产主义转型时期的混乱,以及在法律上和历史上相对薄弱的宪政传统,在这些国家的法律定义和公众期待方面,最为重要的行政职位是总统。^⑤ 然而,这些国家的总统往往会遭到立法机关的反对,从而造成僵局、冲突,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暴力冲突,就如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所发生的一样。

我们提到,警惕“二元首脑制”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我们的意思是,如果 279

① 参见迪韦尔热的经典论文,“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 (1980): pp. 165—187。这一政治体制在 Matthew Soberg Shugart 和 John M. Carey 的著作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3—57 之中,被称为 *premier-presidentialism*。

② 参见 Alfred Stepan 和 Cindy Skach,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World Politics* 46, no. 1 (1993): p. 1—22。

③ “奥地利、冰岛和爱尔兰的宪政是半总统制的。政治实践是总统制的”参见 Duverger,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p. 167。

④ 芬兰在1988年之前,先由公民选出一个按比例分配的选举人团,然后这个选举人团再通过三轮投票选出总统。现在芬兰总统是直接选举的,除非总统候选人没有获得绝对多数,遇到这种情况,就将由选举人团选出总统。关于芬兰总统选举的讨论,参见 Shugart 和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pp. 266—269。关于1988年之前芬兰宪法之中半总统制的性质,以及双重行政首长之间的权力关系,参见 Jaakko Nousiainen, “Bureaucratic Tradition, Semi-presidential Rule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The Case of Fin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6, no. 2 (1988): pp. 229—249。

⑤ 比如俄罗斯、格鲁吉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要了解总统制在后共产主义欧洲的作用,参见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 no. 4, 3(合计特刊), no. 1 (1993—1994)。也可参见 Ray Taras 编: *Presidential Systems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未出版手稿,题目是暂时的。

总统是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总理却向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僵局和宪政冲突。如果总统拥有指挥安全力量和处理紧急事务的特殊权力,那么僵局有可能变得十分危险。从理论上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二元首脑制”导致的僵局和冲突会减少到最小。其一是,总统是政党或者政党联盟的领袖,政党联盟在议会之中赢得了绝对多数,这样就不会产生僵局和危机,因为这种权力关系可以确保总统权力在宪政上具有绝对优势。我们可以设想另外一种可能稳定的情况是,总理是政党领袖,该党或者所在联盟是议会多数,这样的政治体制就能够按照议会制的模式来运转,尽管总统在国防、国内安全和外交事务上享有特别的权力。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常作为一个典型来进行模仿,不仅在波兰是这样,在东欧和在前苏联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有一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条件帮助法国半总统制避免了潜在的理论难题,这种难题在我们看来是半总统制所固有的,指出这点很有意义。第五共和国建立于1958年,但是1962年的全民公决才确定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1965年进行了第一次总统直选。在法国半总统制的前26年,总统是政党领袖,能够领导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这样使总统在宪政上获得了优势地位,在总理和总统之间不存在僵局或者宪政冲突。但是,从1988年到1990年的27个月里,总统没有控制多数议会,而是总理在这段时间控制了议会多数。这样,总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政首脑。在这被称为“共治”(co-habitation)的27个月时间之中,也没有产生僵局和宪政冲突。在1990年议会选举以后,总统所在政党联盟赢得了议会多数,政治体制转变成为总统占主导地位的状态。法国半总统制在前30年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没有出现总统和总理同时失去议会多数的情况。^①

280 以上补充说明,在波兰半总统制开始之时,并不具备法国所具有的支撑性条件。波兰总统瓦文萨并不是政党领袖,他也没有在议会之中建立多数联盟。同样,由于波兰政党过于碎片化,在下议院第一次自由选举之中,没有一个波兰总理曾赢得明显的多数。

波兰案例更为复杂的情况在于,在政治家相互面对之前,总统办公室和议

^① 法国其他用来帮助产生议会多数的变化措施有:在选举法中规定一个高门槛,得票最多者通吃,鼓励政党制度化(与波兰不同)。参见 Stepan 和 Suleiman, “The Fifth Republic: A Model for Import?”载于 Chehabi and Stepan 编: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pp. 396—398。

会各自的权限并没有在宪法中得到明确界定。^① 正如我们所知,波兰的总统办公室起源于圆桌协议之时共产党政府的要求。这个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界定,但是可能成为主要的权力机构。此外,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之中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总统权力一开始就是事实上存在的,而非民主选择的结果。

瓦文萨在1990年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之中,虽然超过了主要对手团结工会政府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以及先前并不知名的来自加拿大的波兰商人斯坦·蒂敏斯基,却仅仅获得了39.9%的选票。蒂敏斯基获得了21.1%的选票,马佐维耶茨基的得票率为18.0%,其后三位候选人一共获得了18.8%的选票。这个选票结果当然不是富有历史声誉和超凡魅力的团结工会领袖所期待的。在第二轮和蒂敏斯基的竞争之中,瓦文萨获得了74.3%的选票,但是投票参与率低得可怜,只有53.4%。^②

在第五章中我们讨论过,最为顺利的制宪过程应该是一个没有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在任总统参与的制宪会议,通过自由讨论然后选择最适合本国的立宪政府。瓦文萨是在波兰第一届民主选举的议会开始讨论之前被直接选举为总统的。这一情况使得制宪过程变得复杂,并且加剧了少数派总理和无党派的总统之间的冲突。

一些例子能够说明波兰宪政冲突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在第一届自由选举的议会组成不久,议员们就接到了来自总统瓦文萨的一份长达八页纸的文件,瓦文萨提议制定并立即通过一部“小宪法”(little constitution),然后最终把这部“小宪法”融入新的宪法之中。瓦文萨在建议书中提议,总统具有提名总理人选的权力,并且可以主动解除总理职务,并解散其内阁,从而确保总统的权力超过总理。另一方面,议会具有反制权,可以通过多数投票来解除总理职务,但该权力的使用受制于总统的否决权;除非议会能获得超过2/3以上的多

281

① 如果这样一个体制要正常运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总统和议会的权限非常重要。

② 克里斯托弗·杰希维茨(Krzysztof Jasiewicz)在他的研究中认为,1990年的选举对瓦文萨和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结果。参见其文章“Polish Elections of 1990: Beyond the ‘Pospolite Ruszenie’”,载于Conner和Ploszajski, *Escape from Socialism*, p. 194。Frances Millard同意此观点,她说:“11月25日第一轮的结果令人震惊。瓦文萨没能获得他要的第一轮的胜利。”不是马佐维耶茨基,而是蒂敏斯基这个她描述为“不知名”的侨居国外的波兰商人获得了第二多的票数。Frances Millard, *The Anatomy of the New Poland: Postcommunist Politics in Its First Phase*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 1994), pp. 115—132, 引自 p. 129、128。有一个关于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的观点是,一个有巨大感召力的总统可以克服后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的非政治化问题。波兰总统选举的低参与率和瓦文萨在总统选举以及近期的民意测验中获得的低支持率,表明上述期望不可能实现。

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①

议会批评了这个建议,而瓦文萨最终也撤回了提案。然而在许多场合瓦文萨都表示,他将用总统的职权来捍卫自己的政策观点。比如,在撤回他的“小宪法”提案之后不久,他回到自己的根据地格但斯克(Gdansk)宣布:“我将以选举我的大众(masses)的名义来提出我的要求。我将重新回到大众的怀抱。我将不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承担任何责任,但我将会和你们在一起。”^②四月,和总理就谁有权任命国防部长这一关键职位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后,瓦文萨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他将呼吁议会“授予总统更大的权力,让总理从属于总统,就像法国的体制那样……从我们现有的经验来看,大家可能都同意,唯一适合于波兰的政府是一个超越党派的政府,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政府”^③。

两位先前的亲密支持者担心,来自于总统官邸贝尔维德尔(Belvedere)的行为可能导致民主崩溃。曾经协助瓦文萨竞选总统的亚德韦加·斯坦尼斯基在关于总统独裁和二元首脑制问题上写道:“波兰现在还看不到民主的崩溃,但是可能已经濒临失败的边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将会出现政变(以推翻当政者)。”^④中间联盟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ński)曾经担任瓦文萨总统的主要助手,但是,当有记者问道,“贝尔维德尔是否已经真正构成了对民主的最主要威胁?”他回答说:“一个权力中心外在于任何实际控制之外,并且该权力中心试图控制所有其他一切,正是这种政治安排构成了一种威胁。毕竟,当总统将宪法草案提交到议会之时,他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想得到所有权力。”^⑤

但事实上,瓦文萨总统并没有控制所有的权力,他也没有发动政变的企

^① 瓦文萨的5页建议案包含在1991年12月3日他给国会领袖Wieslaw Chrzanoski的信中。信的复印件现藏于国会图书馆内。信的具体内容,参见Louisa Vinton,“Five-Party Coalition Gains Strength, Walesa Proposes ‘Little Constitution’”,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Dec. 6, 1991): pp. 7-8。

^② 引自自由欧洲电台(Jan. 17, 1992): p. 15。一个可以深刻看出瓦文萨对自己总统身份认定的有趣的采访,参见Wiktor Osiatynski,“A Profile of President Lech Walesa”,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 no. 4, 3, no. 1 (1993-1994): pp. 47-50。在同一期pp. 47-50,奥夏滕斯基也采访了瓦文萨的继任者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③ 引自FBIS-EEU (April 30, 1992): p. 14。

^④ Jadwiga Staniszki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1992), p. 27。

^⑤ *East European Reporter* (March-April 1992): p. 51 中的记者访问。

图。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指出,正是波兰的半总统制导致了波兰的宪政冲突和政府内部冲突,这对于民主的巩固是一种障碍而不是有利因素。

作为由新选举的议会所任命的第一位总理,扬·奥尔绍夫斯基(Jan Olszewski)发起了一系列反对总统的运动。为了捍卫他的政府并使总统难堪,总理违反了议会先前做出的一项决议,释放了64名被认为是过去共产党政权合作者的人士,而总统则要求对共产主义合作者和官员加以警惕。与此同时,内政部长还宣称,要调动特殊警察部队去威胁(并可能拘捕)总统及其主要助手。由于这些行为,经议会投票,内政部长被解除职务,参议院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介入刑事调查。^①

截至1992年8月,仍旧分散的议会在4个月里选举了波兰的第三任总理。新总理汉娜·苏霍科卡(Hanna Suchocka)认为如果总统和总理不和,就不可能进行治理,因此,她所组建的联盟加快了“短期宪法”(short constitution)新版本的起草工作。她强调,总统的“宪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由此,她支持将来源于圆桌协议的总统特权规范化。议会也接受了她的这一建议,尽管波兰并不具备使半总统制像法国那样良好运行的任何条件。这样,波兰进一步使“二元首脑制”成为其脆弱民主制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由于政党碎片化和二元首脑制的僵局,波兰推进预算平衡和混合经济的努力停滞了。正如《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报道的,“尽管实体经济(real economy)在缺乏政治引导的前提下出现了惊人的反弹,但是关键的发展却被严重延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大量私有化计划彻底停止,在这六个月的时间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又进一步损坏了波兰在西方的信用”^③。

283

民意、选举和波兰的民主

在第一个后共产主义政府掌权三年之后,波兰民意是否还对民主的政治

^① 参见“Reversal of Fortunes”, *Warsaw Voice: Polish and Central European Review* (July 26, 1992): p. 5.

^② 本段基于斯泰潘和议会宪法委员会的讨论(1992年7月22—26日),华沙。

^③ 《经济学人智库》认为,政治僵局造成了1992年波兰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障碍。但是,由于波兰经济仍保持着相对良好势头,所以EIU评论说“尽管这个国家的政治出现了问题,经济还是顶住了6个月的政治真空这一不利情况继续发展”。EIU对1992年下半年经济的预测是,“在浪费了6个月以后,波兰的经济政策可能会有所好转”。参见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Poland* (3d quarter, 1992), 分别是 p. 6、p. 4、p. 8。

社会表示强烈支持？或者是，如同一些分析人士所担心的，波兰民意事实上已经对民主的某些原则和实践表现出一种危险的矛盾态度？

让我们来看一些指标，以帮助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从最少令人不安的指标开始，这就是波兰极低的政党认同率。考虑到波兰高政党碎片化指数，这点不足为奇。从1990年11月到1991年8月，两位训练有素的匈牙利政治社会学家拉斯洛·布鲁斯特(László Bruszt)和亚诺什·西蒙(János Simon)，在7个东欧国家和3个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同时进行了比较民意调查。这项研究的发现印证了我们关于波兰低政治认知感(political definition)的历史—结构分析。在东欧5个国家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到目前为止，波兰接受调查者对某政党或者政治运动表示亲近的百分比是最低的(见表16.4)。

表 16.4 东欧五国的政党认同度：1990—1991

问题：“在我国的政党和政治运动之中，您是否接近于某政党或者某政治运动？”

国 家	百分比		
	是	否	不知道
波兰	17	72	11
保加利亚	67	28	5
捷克斯洛伐克	53	46	1
匈牙利	51	47	3
罗马尼亚	64	30	5

资料来源：László Bruszt 和 János Simon,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ent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de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10 Countries* (Budapest: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284 这次调查还显示，在波兰，明确表达对多党制偏好的回答者所占百分比最低。更糟糕的是，1992年5月总统、总理和议会的强烈冲突，使波兰民意对于政治社会之中这三个关键部门的不喜欢程度，超过了对其他主要组织的不喜欢程度。事实上，波兰流行着一句话，大意是任何人卷入到总统、总理和议会的“百慕大三角”冲突，都会受到伤害。相反，最受欢迎的三个机构是相对中立的部门：军队、警察和廉政调查官，这些机构被认为是为公民提供了服务，而且没有卷入到“百慕大三角”冲突之中。有趣的是，强烈支持反堕胎的教会，不受支持的程度越来越高(见表16.5)。

表 16.5 对主要政治机构的不赞成率：1990年2月，1991年10月，1992年5月

机 构	不赞成率		
	1990年2月	1991年10月	1992年5月
议会下院	14	54	60
政府及各部门	14	48	53
总统	N/A	43	52
天主教会	12	25	44
地方权威	N/A	33	33
警察	N/A	21	21
军队	15	10	12
廉政调查官	N/A	9	10

资料来源：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CBOS, Warsaw)。数据和翻译由负责人 Lena Kolarska-Bobinska 提供。

表 16.6 波兰公众对各种紧急事态措施的支持：1992年5月1—3日

措 施	百分比				
	非常赞成	有些赞成	有些反对	非常反对	很难说
“铁腕手段推行法律，禁止民主”	11	19	19	37	14
“由政府颁布政令进行统治”	10	35	16	15	24
“由总统颁布政令进行统治”	9	24	17	30	20
“严格限制罢工权”	14	29	21	21	15
“创建新的政府，由总统兼任总理”	14	18	14	29	25
“号召总罢工”	7	20	21	41	11

资料来源：同表 16.5。

杰出的波兰社会学家科拉斯伽·波宾斯卡(Lena Kolarska-Bobińska)主持的华沙民意研究中心，没有设计任何问题来探讨1989—1991年间公开反民主的情绪。然而，在1992年5月的政治危机之中，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以评估人们是否接受政府(或总统)采取紧急事态措施，颁布政令实施统治，禁止民主(见表16.6)。

对调查结果可以进行各种解读。如果我们将那些赞成“铁腕手段推行法律，禁止民主”者视为反民主，那么，30%的被调查者反对民主。如果我们将那些回答“很难说”的被调查者视为对民主怀有疑虑者，那么1992年5月就有44%的波兰被调查者反对民主或对民主怀有疑虑。然而，到1992年7月底，

当人们就总理的任命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时,有迹象表明,“百慕大三角”之间的冲突趋于消失,反对民主者从 30% 下降到了 25%。

我们提请读者重新查阅表 16.1。依照我们的判断,伦理型公民社会的核心态度并不是威权主义,但是他们与洛克式的自由民主概念却有着根本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表 16.1 所描述的核心态度更接近于非政治性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它们似乎反对将民主政治之中的冲突制度化。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的三个经典的反政治指标上(倾向于赞成解散政党和议会、偏好一党政治、同意由强人实施统治),在 1991—1993 年间的历次民意测验中,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和奥地利相比,波兰具有更强的反政治性(见表 16.7)。最后一个可以证明波兰至少对民主的政治社会存在疑虑的证据,来自于波兰(和巴西)与四个民主巩固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乌拉圭)的政治态度的比较(见表 16.8)。

表 16.7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赞成威权主义的被调查者所占百分比:1991—1993 年

国 家	赞成者所占百分比		
	“同意解散政党和议会” (1992 年)	“偏爱一党体制” (1992 年)	“赞成强人统治” (1993 年)
波兰	40	31	39
匈牙利	24	22	26
斯洛伐克共和国	20	14	19
捷克共和国	19	8	22
奥地利	8	N. D.	22

资料来源: Fritz Plasser 和 Peter A. Ulram, “Zur Stand der Demokatisierung in Ost-Mitteleuropa”, 载于 Fritz Plasser 和 Peter A. Ulram 编: *Transformation oder Stagnation? Aktuelle Politische Trends in Osteuropa* (Vienna: Schriftenreihe des Zentrums Fur angewandte Politikforschung, 1993), 2: pp. 46—47。

尽管我们确信,对于民主制度的这种矛盾态度,伦理性公民社会的非政治性遗产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不能精确估计其作用的大小。许多分析家认为,首先要从经济滑坡和市场转型中断中去寻找解释。然而,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指出,从客观上说,波兰 1992—1994 年间的 GNP 增长到目前为止在后共产主义欧洲各国之中是最高的。^① 从主观上说,从 1993 年到 1994

^① 参见本书表 21.1。

年10月,在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诸国所做的民意测验之中,波兰公众对经济的评估排在第二位。但是,就公众对于政府和总统两个行政权力机构的总体信任度而言,波兰在各国之中是最低的(见表16.9)。

286

表 16.8 波兰和巴西对民主的支持:与乌拉圭、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个巩固民主的比较

关于所喜欢的政体的观点	回答者所占百分比					
	波兰	巴西	乌拉圭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
“民主政府优于任何其他政府形式”	31	42	73	70	61	87
“对我而言,民主政权和非民主政权没有差异”	40	24	8	9	7	6
“有时候,非民主政府可能优于民主政府”	13	22	10	10	9	5
DK/NA ^a	16	12	9	11	23	2

资料来源:关于波兰的资料来源与表16.5相同,调查于1992年11月进行;关于乌拉圭的资料来源,与表10.1相同;关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资料来源,与表8.2相同;关于巴西的资料,参见“*Avaliação do Governo Collor após dois anos de mandato*”, *Datafolha* (São Paulo:1992年2月);2500人的全国性样本。

a. DK/NA,表示“不知道”或者数据无法获得。

表 16.9 被调查者对经济体制的支持率以及对于政府和总统的信任水平:中东欧六国,1993年11月至1994年3月

国 家	经济体制的支持度	回答者所占百分比		
		对政治体制之中行政权力的信任度		
		政 府	总 统	两者信任度之和
波兰	50	25	20	(60)
保加利亚	14	13	40	(53)
匈牙利	27	21	65	(86)
罗马尼亚	35	27	48	(75)
斯洛伐克共和国	31	32	62	(94)
捷克共和国	67	57	67	(124)

资料来源:Richard Rose 和 Christian Haerpfer,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III: Learning from What Is Happening”,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230 (1994):表23,表52,表58。

关于表16.9的启示,让我们重新讨论具有二元行政首脑的半总统制的可能危险。从通常的理论来说,总统与立法机关以及来源于总统或者立法机关

287 的政府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有害于民主,如果彼此互相尊重并且并不试图削弱对方。然而,如果半总统制之中一方的支持者认为民主合法的治理结构的另外一个分支消失或被关闭,国家将变得更为美好之时,民主体制将会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有可能丧失其总体的合法性。因为这些质疑者的一方或者另外一方将会认为,这个政治体制是不尽如人意的,因为他们所支持的一方没能获得压倒性优势。在一个纯粹的议会体制之中,因为不存在二元行政首脑,所以民主制度框架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并不存在。当然,民主的议会内部也存在冲突,但那只是党派之间关于政策的冲突。然而,在半总统制之中,政策冲突常常体现为民主的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

表 16.9 显示,尽管波兰经济表现强劲,政府和总统却相互质疑对方的合法性。1995 年 1—2 月,这种冲突演变为一轮特殊的危机。总统要求现任政府辞职,他在与关键人员私下会晤之时,甚至在某些公开复杂的讲话之中都暗示,如果政府不辞职,他将单方面解散议会并提议进行新的选举,即使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他拥有这样的权力。瓦文萨总统在国会的演讲清楚地阐明了他行为的道德合法性(尽管事实是,表 16.9 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六国总统之中,他获得的认同率最低),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以自己是直接选举的总统这一事实作为支撑。奥唐奈当然会把瓦文萨的演讲当作“委托式民主”的典型话语。^① 瓦文萨在演讲之中,花费了一些时间来批评议会和政府的低效:

对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些决策被耽误了。唯一迅速的决策是那些服务于个人和党派利益的决策……波兰没有时间再坐在这里等候黄灯。鉴于此,如果政府和议会不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果不做一些有益于波兰的事情,那么,我要求你们辞职,因为历史不会原谅你们和我们。如果你们没有任何新的主意,或者[提供]其他人选,仅仅简单地保留现存的东西,那么,我将做出决定,我确信,这是为了波兰的利益……在民主选举之中,国民赋予我为了国家而承担责任……我正在尝试使用民主与和平的方式来改变事态。但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将采取我所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②

^①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 1 (1994): pp. 55—69, 尤其是 p. 64。

^② 瓦文萨总统 1995 年 2 月 6 日在议会的演讲内容刊载于 1995 年 2 月 7 日的 *Gazeta Wyborcza*。部分摘要被翻译成英语 "Walesa: Trying to Make Repairs", *Transition*, 1, no. 4 (1995), pp. 56—57。

多数联盟更换了总理。但是,总统对议会的奚落和威胁,无助于增进这两个民主合法权威的民主正当性。

1993年,波兰的政治社会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议员们注意到,立法机构政党过于碎片化,很难建立持久的多数联盟。于是1993年5月28日,他们通过了一部新的选举法。这部选举法得到了亲团结工会(pro-Solidarity)联盟的所有七个党派的支持,最后还得到了一些反对党的支持,规定一个党如果不能在全国获得超过5%的有效选票,就没有资格进入议会下院。至于政党联盟要进入议会,甚至需要获得8%的选票。为了进一步鼓励大党,选举法规定,只有获得至少7%的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来重新分配比例代表制投票所保留的剩余议席。

288

新选举法关于选举制度的另外两条规定,也有利于加强体制之中一个或者两个最大政党。首先,波兰选举法在总体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采取了d'Hondt公式来计算议席的分配。阿伦·李帕特在他关于选举制度的最具权威性的经验和理论评论之中,专门讨论了d'Hondt公式的影响。“在常用的各种公式之中,d'Hondt方法……最缺乏比例性,在制度上最为偏爱大党。”^①最后,一些选区被重新划分,以此来减小“选区规模”,即一个选区所能选出的代表的数量。选举研究一再证明,总的选区规模越小,立法机构之中政党的数量就越少,不均衡的比例代表制就越容易出现。^②

就在这部选举法——所有四个方面均明显偏向于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在议会获得正式通过之前,在由团结工会分裂出的政党的多数议员的帮助下,来源于前团结工会的政府总理汉娜·苏霍科卡被打倒。令大多数议员惊讶的是,曾经是团结工会领导人的瓦文萨,却要求在1993年9月提前举行大选。

“理性选择”并不总是导致理想的“理性结果”。选举法中新的鼓励措施能

^①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3.

^② 这是道格拉斯·雷的经典作品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14—125 的主要论点,同时也得到了 Rein Taagepera 和 Matthew S. Shugart 的比较研究成果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以及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的支持。关于选举法的其他细节,参见 Louisa Viron, “Poland’s New Election Law: Fewer Parties, Same Impasse”, *RFE/RL Research Report* 28 (July 12, 1993): pp. 7—17。这一最低门槛原则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够产生预想结果的条件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们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他们在其自身所创建的新的规则之中赢得成功。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

四个天主教政党原想建立一个联盟,但在截止日期之前,只有两个参与了联盟。他们最终只赢得了 6.4% 的选票。在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四个主要天主教政党却没有一个跨过 5% 的门槛。^① 自由民主大会党(The Liberal Democratic Congress),虽然和 1989 年后经济改革方案的倡导者有些差异,但是也没有和另外一个同样支持改革计划的前团结工会的主要政党民主同盟(the Democratic Union)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对联盟之中如何分配议席存在分歧。自由民主党也没有跨过门槛。事实上,苏霍科卡联盟帮助制定了选举法,但是 7 个政党之中有 6 个没有跨过他们自己设计的门槛。

瓦文萨总统拒绝支持任何政党,但他自己创建了一个支持改革的无党派集团(BBWR),并以 5.4% 的得票率跨过了门槛,但却因为 7% 的限制条款而没有资格分享剩余议席。最终,投给那些最后没有跨过门槛的政党的票数总和竟然占了总票数的 34.4%(见表 16.10)。^②

选举法专家汇编了各种公式来衡量道格拉斯·雷(Douglas Rae)所称的“制造的多数”(manufactured majorities)或者李帕特所说的“票数/议席比例失衡性”。李帕特通过简单的比例失衡指数来分析选举之中最大的两个政党的总的得票数和他們所获得的总的议席数的偏差。^③ 他计算了 1945—1980 年间世界上所有 21 个持续的民主国家的平均“比例失衡指数”。平均失衡指数最高的民主国家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达到 12.3%,它采用的是相对多数和绝对多数选举制度。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 15 个民主国家之中,失衡指

^① 参见 Anna Sabbot-Swidlicka, “The Political Elections: The Church, the Right and the Left”, *RFE/RL Research Report* 40 (October 8, 1993): pp. 24—31, 尤其是 p. 25。

^② 对 1993 年的选举的分析,参见 Edmund Wnuk-Lipinski, “Left Turn in Poland: A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Warsaw, Nov. 1993); “Bulletin of Electoral Statistics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Dat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8, no. 2 (1994): pp. 369—373; Louisa Virton, “Poland Goes Left”, *RFE/RL Research Report* 40 (October 8, 1993): pp. 21—23; and Voytek Zubek, “The Reassertion of the Left in Post-Communist Poland”, *Europe-Asia Studies* 46, no. 2 (1994): pp. 801—837。

^③ 对分析得票率与议席率失衡的各种模式(比如 the Rae index, the Loosemore-Hanby index, the Lijphart index, and Michael Gallagher's least-squares index) 的优势和劣势的评论,参见 “Disproportionality, Multipartyism, and Majority Victories”, 载于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pp. 57—77。李帕特认为道格拉斯·雷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式来分析“可控的多数”,“可控的多数”用来表示一个党或政党联盟虽然在投票中没有获得多数,但仍旧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

数最高的是卢森堡,为 3.2%。1993 年波兰议会选举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最大的两个政党获得了 35.8% 的选票,却赢得了 65.9% 的议席,因此根据李帕特的公式,比例失衡指数为 35.1%(见表 16.11)。

表 16.10 得票率及对应席次:1993 年 9 月波兰议会下院
选举之中跨过门槛和没有跨过门槛的政党

选举门槛	政 党	得 票 百分比	席 次 百分比
超过最低得票门槛	SLD(民主左派联盟,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	20.41	37.10
	PSL(波兰农民党)	15.40	28.60
	UD(民主同盟)	10.59	16.08
	UP(劳工同盟, Union of Labor)	7.28	8.90
	KPN(独立波兰联邦, 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ce Poland)	5.77	4.70
	BBWR(支持改革的非政党集团)	5.41	3.40
	德意志少数民族党(不受最低得票门槛限制)	0.70	0.80
小计		65.56	100
低于最低得票门槛	祖国天主教选举委员会 (Fatherland Catholic Election Committee)	6.73	0
	团结工会	4.90	0
	中间联盟	4.42	0
	自由民主协会 (Liberal Democratic Caucus)	3.99	0
	现实政治联盟	3.18	0
	自卫党 (Self-defense)	2.78	0
	X 党	2.74	0
	共和联盟	2.70	0
	人民联盟	2.37	0
	啤酒爱好者党	0.10	0
	其他	0.89	0
小结		34.44	0

资料来源:依据 Edmund Wnuk-Lipinske, "Left Turn in Poland: A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Warsaw (Nov. 1993), 以及

“Bulletin of Electoral Statistics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Dat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8, no. 2 (1994): 第 371 页数据汇编。

291 表 16.11 1993 年 9 月波兰国会(下院)选举比例失衡 Lijphart 指数和世界 21 个持续民主国家平均比例失衡 Lijphart 指数,依据选举制度进行划分:1945—1980 年

选举制度	国 家	比例失衡指数
	波兰	35.1
	卢森堡	3.2
	挪威	3.1
	冰岛	3.0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2.8
比	爱尔兰	2.4
例	意大利	2.2
代	德国	2.1
表	奥地利	2.0
制	芬兰	1.6
	瑞士	1.5
	瑞典	1.2
	以色列	1.1
	荷兰	1.1
	丹麦	0.9
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日本	4.2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2.3
	加拿大	8.1
相对多数制和绝对多数制(Pluality and majority)	新西兰	6.3
	联合王国	6.2
	澳大利亚	5.6
	美国	5.6

资料来源:关于波兰的资料,同表 16.8。关于其他所有国家,参见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60。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波兰政治社会的主要行动者并没有在他们自身创

建的新选举规则之中“理性地”调整他们的行为来进行选举运作。^① 他们的行为使改组之后的共产党及其在 1988 年之前的盟友农民党,不仅赢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而且从理论上说,有能力在议会之中单独起草并通过宪法。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结论部分要讨论的,绝大多数认为“共产主义恢复”或者“民主终结”的可怕预言并没有真正实现,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共产主义时期的执政党以及 1993 年议会选举之后的绝大多数议会之外的社会团体和党派似乎都认为,民主是“国家的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波兰最近的选举历史上,无论是 1991 年选举结果之中用以衡量政党碎片化程度的 Laakso-Taagepera 指数的出人意料之高,还是在 1993 年选举结果之中用以衡量比例失衡的 Lijphart 指数之高,都说明,波兰在调整其看待政党的态度和行为,以使其政治社会能促进民主巩固的征途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对波兰的政治社会进行了这些批评性分析之后,我们还将提醒人们注意到波兰的一些特别成就,以此作为本章的结束语。与后共产主义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波兰在将 1989 年政体转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方面,贡献最为突出。波兰公民社会和团结工会的持续压力,增加了戈尔巴乔夫及苏联与东欧其他地区进行博弈的变数。这一具体的事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也帮助波兰走上了民主巩固的不归之路。

波兰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就是,其 1993 年和 1994 年的 GNP 增长率超过了西欧任何国家。这一成绩增强了波兰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信心。尽管国有部门的私有化进程没有像捷克共和国那么快,但是,波兰新中小私有企业充满活力,意味着从 1995 年初开始,大约有超过一半的经济活跃人口正在私有部门工作。

正如波兰经济所展现的强劲势头一样,波兰社会的某些方面也发生了同样变化。当我们在担心波兰公民社会是否有能力来有效应对政治社会之时,我们并不总是对波兰的公民社会表示悲观。在 1989 年历史性巨变之前就有悠久传统的波兰公民社会,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良好成绩。比如,原团结工会的两位领袖亚当·米赫尼克和海伦娜·武奇茨娃(Helena Luczywo),创办了欧

292

^① 正如一个波兰的分析家评论的,“如果 KLD 可以加入民主联盟, PL 可以加入 KKW, KdR 可以不从 PC 中分离出去,那么所有这几个联盟都可以在下院中获得议席。尤其是 KLD 和民主联盟, PC 和 KdR, 还有 KKW 和 PL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政治领袖……如果忽视新选举法暗含的规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Wnuck-Lipinski, “Left Turn in Poland”, p. 16.

在 17 个都市之中发行。

由于这些重要成就,以及其他许多成就,再加上其重要的地缘位置,许多国内外的观察家都相信,波兰在 1990 年代末期加入欧盟的机会是很大的。而这一选择也可以鼓励波兰政治家以负责的、民主的方式行事。^① 波兰卓有成效的过去以及充满机会的未来,将极大地防止民主崩溃,有力地支持民主巩固。

^① 就像我们在第二十一章里讨论的那样,对许多存在严重国家性问题和紧张的种族冲突的国家来说,加入欧盟是遥不可及的事。因此,欧盟并没制定可以对南欧各国和波兰起到积极作用的激励或阻碍政策。1995 年 11 月,原共产党领袖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被选为波兰总统。在竞选过程中和竞选之后,克瓦希涅夫斯基(不像俄罗斯共产党领袖)认为加入欧盟和北约是波兰的两大首要任务。只要这两大任务不变,波兰将继续按照欧盟的要求来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第十七章 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多种形式：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293

欧洲 27 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 26 个国家(我们已指出唯一的例外是波兰),在极端斯大林主义时期或南斯拉夫“离经叛道”之前,曾经一度几乎接近全能主义的典范。之后,它们中的大多数向后全能主义典型靠近。后全能主义这个术语本身表明,其创设者最初并不把这种政体类型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其实是曾经历全能主义模式的体系变化的结果。因此,后全能主义(与民主、全能主义、威权主义或苏丹式政体不同)并不是一种创始的类型,而是一种进化的类型。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或能够创立一个后全能主义政体,除非之前已经存在了一个全能主义政体。

从概念上讲,从政体内部转向后全能主义的两种主要路径,可以被称之为“选择式后全能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 by choice)和“衰退式后全能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 by decay)。在前一种路径中,政体精英(通常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安全感)可能集体决定对最高领导人的完全独裁权力进行限制,降低恐怖统治的作用(如果已经很显著),并开始容忍一些非官方组织在事实上已经完全扁平的公民社会中出现。在“衰退式后全能主义”(或勉强默许的后全能主义)中,意识形态承诺可能完全变得空洞,动员可能退化成官僚政治的仪式,小型的抵抗或相对的自治可能出现,而这更多的是由于应对外部压力时政权的无能或勉强默许,而非出于任何自主选择。政权外部的力量同样能制造出“社会征服式后全能主义”的情况,其中公民社会团体为相对自治的领域斗

争并取得胜利。^① 无论通过何种路径,根据定义,所有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都从全能主义政体中产生。^②

294 自全能主义开始的变化通常不是变为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政体,而是一个特殊的后全能主义政体,这个经验事实证实了林茨关于从全能主义到威权主义没有一个连续谱的主张。^③ 然而,如果不参考全能主义就不能理解后全能主义这一事实,同样解释了它可以被设想为一个从几乎全能的体系到先前全能主义的要素几乎都存在的体系(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讲)的连续谱。这同时说明了对从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的政体转型的发生点进行判定的困难性。

因为后全能主义是一个连续谱,我们将花大量的篇幅来展现各种不同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的一些生活面貌。我们也试图将后全能主义类型中主要可能的变体进行概念化并加以讨论,其范围包括从与全能主义边界接近的早期后全能主义,到没有演变为更多多元主义重要倾向的僵滞的后全能主义,甚至再到可能向民主或威权主义发生类型变化的成熟后全能主义。只有在我们理解了后全能主义类型内的这些变体之后,我们才算准备好了学习、评估甚至预测在全能主义政体内能够或确实发生的范围广泛的转型路径。欧洲的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是从后全能主义的出发点开始它们脱离共产主义的转型的。所有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都受到1989年“多米诺骨牌式”事件的影响,但是下面我们将看到,实际转变的类型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后全能主义亚类型。

根据经验来看,我们说的后全能主义中的变体指的是什么?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案例中,变体非常明显。我们将证明,匈牙利到1989年2月时(也就是波兰圆桌会议开始的那个月)实际上已经接近从后全能主义向一个未定的民主或威权主义的政体发生类型变化的转型。与之形成对照,我们相信我们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保加利亚最晚在1988年时,就公民社会的自治团体而言,已靠近全能主义的一极。相比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自

^① 当然还有其他走出全能主义的路径。民主政体的征服与占领也能结束全能主义,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与日本发生的那样。在这些案例中,从没有过后全能主义政体,而是全能主义,然后是占领和自由化,再是民主化的顺序。见表4.2,非民主之前的政体类型对民主转型路径的含义。

^② 从全能主义向后全能主义政体转变的具体事例,从经验上看可能包含一些选择式后全能主义、衰退式后全能主义及社会征服式后全能主义的成分。

^③ Juan J. Linz.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载于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编: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pp. 251-283.

1977年出现了与赫尔辛基过程相联系的人权组织“七七宪章”后十几年中,已经具有了在公民社会领域内的一些重要的后全能主义特征。然而,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80年代的去全能主义化——实质上是个“衰退式去全能主义化”的案例——并不如匈牙利那样深入或广泛,匈牙利有着“选择式去全能主义化”的更多要素。

如果我们称匈牙利为成熟后全能主义的范例,保加利亚为早期后全能主义的范例,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可被看做是僵滞的后全能主义的范例。实质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有着不同的国家机构、法治、经济、公民与政治社会混合体。这些不同的混合构建了政体以及反对派的大部分谈判能力,开启且/或阻止了特定的转型路径,同时促进产生了各种各样巩固任务的组合。

295

在这一章中,我们的目的是解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有着怎样明显不同的转型路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伴随着什么结果。在匈牙利,一边是日益由改革派领导的共产党,另一边则是一个有组织的民主政党反对派,它们谈判并达成下届政府由自由选举产生的协议。在这些选举中,反对派圆桌会议中的最大政党赢得了多数席位,并组成具有强有力的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柏林墙被拆之后,学生和艺人领导了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强硬政体垮台,并将权力移交给了一个由公民社会反对派著名领袖瓦兹拉夫·哈维尔领导的临时政府。^①在保加利亚,非改革主义的共产党经历了一些社会抗议,但还是能够控制转型。其共产党经过一次内部政变,摆脱了旧的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通过参与圆桌会议获得了一些合法性,并最终战胜了仍然微弱的民主力量,赢得了第一次竞争性的选举。

当然,所有这些案例都受到关于合法性的扩散效应及政治经济这些变量的强烈影响。然而,我们的中心论点是,解释这三个显著不同转型(谈判、垮台和控制)的最有力方法是:考察后全能主义政体类型变异的原因与影响。

在研究这三个案例之前,让我们简要提及一个残酷的悖论。匈牙利(和威

^① 如果我们不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后消失了而把它排除在外的话,它本来能作为早期后全能主义导致政体崩溃的一个案例。像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崩溃已经势不可当时才开始对转型进行谈判的努力。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可信赖的谈判者都是非常无力的。但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案例中,政权领导层的接替变化以及或许是民主德国案例中的国际层面给了当时的在任者更多的喘息时间。

权主义的波兰)越来越多地试验各种经济改革,并逐渐向西方国际信贷开放,最终导致它们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中的两个。负债增强了政体转型的压力;然而,这又给民主的巩固留下了困难的经济遗产,尤其是没有对转型之前或之后进行重新安排的匈牙利。相比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没有从事经济试验或改革,也几乎没有接受西方外债,因此面临着较少的推动转型的经济压力。不过,捷克斯洛伐克的缺乏外债当然没有很荒谬地成为民主巩固阶段的一项资产。

匈牙利:始于成熟后全能主义的谈判转型

对于熟悉南欧和拉丁美洲谈判式转型及协议的标准工作的读者来说,到目前为止,在转型动因方面他们最熟悉的东欧国家就是匈牙利了。^①事实上,用来描述西班牙和乌拉圭转型的大部分基本词汇都能用来描述匈牙利的转型。^②政体温和派(Regime Blandos)寻求与一些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结盟;政体温和派致力于利用他们作为自由化发起人的角色来加强其对抗自身内部强硬派的地位;温和派和反对派领导人一样越来越多地关注于转型的政治机能,以及扮演显著角色的精英谈判。为何在如此不同的政治体系中发生如此相似的政体转型政治过程?

在我们即将分析的所有中东欧政体中,匈牙利政体经历了一系列最急剧的变化。匈牙利经历了1945年的自由选举,1948—1953年的非常全能主义的时期,然后是导致1956年人民革命成功的改革时期,1956—1962年的共产主义的反革命(communist counter-revolution),以及从1962年开始的去全能

^① 参见,例如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和 Laurence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 Higley 和 Richard Gunther 编: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n and South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Giuseppe di Palma,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② 实际上,一位西班牙社会学家对匈牙利与西班牙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参见 Carmen González Enríquez, *Crisis y cambio en Europa del Este: La transición húngara a la democracia*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Siglo XXI de España, 1993), 尤其是 pp. 50—80 关于协定和 pp. 340—368 对匈牙利与西班牙转型的政体比较。

一位匈牙利重要的公共舆论专家,亚诺什·西蒙学习了西班牙语以研究西班牙转型,时不时地在西班牙发表他的作品,且通常是与拉斯洛·布鲁斯特一起。参见他们的“La mayoría más silenciosa” (Madrid and Budapest, 1990, 未出版手稿)。

主义化。^① 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成熟后全能主义典范。

在 1945—1947 年间，波兰经历了一场波兰游击队与苏联支持力量之间的内战。然而，在匈牙利，可能由于其对苏联而言战略位置不那么显要，苏联军政府允许它在 1945 年 11 月举行了被称之为匈牙利截至那时为止最自由的选举。独立小农党赢得了 57% 的选票，社会民主党 17.4%，共产党 17%。^② 然而，在 1947 年较不自由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了 22.3% 的最多单一选票，之后运用各种策略使议会休会一年。从 1948 年至 1953 年，匈牙利经历了东欧最强烈的斯大林化时期，从对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 (Jozsef Mindszenty) 的公开审讯，到对农业的强制性集体化，再到对 2000 名共产党的“地方地下工作者”的草率处决。许多匈牙利评论员称这个时期为“全能主义”^③ 时期。

297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作为其反对斯大林运动的一部分内容，赫鲁晓夫 (Khrushchev) 让更温和的伊姆雷·纳吉 (Imre Nagy) 替代了匈牙利的小斯大林——麦特雅斯·拉科西 (Mátyás Rákosi)，前者开启了“在任何人民民主中发起的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④。匈牙利的去全能主义化已经开始，但结果是一个断断续续的过程。拉科西于 1955 年 4 月重新掌权，至 1956 年 6 月再次被苏联解职，由艾尔诺·格罗 (Ernö Gerö) 接任，后者此后又在广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下由纳吉接任。在纳吉掌权期间，匈牙利的抗议迅速变成了革命性的。在罗特席尔德看来，匈牙利从 1956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的事件是“有着全国性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目标的真正

① 关于这些变化，本章将进行分析。而关于前共产主义匈牙利，特别是该国 1922 年后的双轨选举规则（在城市实行秘密而自由的选举，在农村的选举是非秘密的，并且受到操纵），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威权主义时期相当有影响的出版业，以及法治空间，参见 Andrew C. János, *Politics of Backwardness in Hungary: 1825—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查尔斯·加蒂认为选举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直到 1946 年为止，斯大林担心他可能会因为要求得到波兰与德国而必须拿匈牙利与西方进行交换。参见他的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8。

③ 例如，拉多夫·安多尔卡 (Rudolf Andorka) 提交给 1990 年 7 月在马德里举行的第 12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论文“Transition from a Totalitarian to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he Case of Hungary”提出，“1947 年后，匈牙利明显地成为一个权力基于苏联军队存在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全能主义国家……斯大林去世后有了全能主义的第一次松弛”(p. 1)。

④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4.

的国内胜利的了的革命。革命仅仅被压倒性的外国力量打败”，即苏联坦克。^①

298 匈牙利政体从 1956 年的反革命镇压到 1989 年 2 月的几乎发生类型变化的演变足可用一本书来分析。我们的文章必然更加受限定，并受民主理论的影响。我们相信去全能主义化的动态过程应该并能够被分析。我们同样相信后全能主义不是且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此外，我们相信一些后全能主义政体演变的具体力量和过程是对民主化感兴趣的学者们的重要质询领域。因此，我们现在将尝试说明去全能主义化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同样将尝试说明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巩固的民主的五个场域中的每个场域，在匈牙利 1989 年政体改变前是如何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的。我们同样将说明每个场域中的变化是如何日益互相加强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分析并阐明相互作用变化的动态过程。我们将按照变化发生的大致顺序依次展开：意识形态、经济、国家机构、法治、公民社会以及最后的政治社会。

匈牙利成为后全能主义的第一个领域是意识形态领域。1956 年的革命之后面对的是镇压以及对纳吉的处决，但它同样给赫鲁晓夫的苏联以及以纳吉的继承者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为首的领导层留下了一个大难题，即如何防止警察再次突然发动革命。寻求消极的顺从，而非用全能主义的方式来煽动狂热，成为卡达尔政治风格的一个特点。反映后全能主义转变的第一次公开阐述是由卡达尔在 1962 年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倡“结盟政治”时清楚表达的。在全体会议上，卡达尔清楚地将自己与斯大林主义的独裁者麦特雅斯·拉柯西的全能主义野心拉开距离，当时他宣称：“尽管拉科西之流说过谁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反对我们，但是我们要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与我们在一起。”^②

去全能主义化的下一个大步伐是 1968 年引入的新经济机制，尽管它在 1972—1979 年有部分逆转，但它用市场和准私人财产表现了任何华沙条约国

^①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p. 160。关于对政体分裂过程以及导致这个经常被忘记的全能主义内部可逆性案例的社会抗议的分析，参见 Paul Kecskemeti, *The Unexpected Revolution: Social Forces in the Hungarian Upris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② 1962 年，卡达尔仍在继续完成再集体化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结束了其 1956—1962 年的再巩固阶段，但是没有领导人发表这样一番典型的后全能主义意见，承诺保持这样一个近似于全能主义的体制。关于卡达尔演说的背景，参见 González Enríquez, *Crisis y cambio en Europa del Este*, p. 9。

家的最普遍的试验。^① 如果没有之前的走向后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改变,这个试验不可能开始,但是新经济机制本身进一步腐蚀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并代表了选择式去全能主义化过程的开始。从经济角度写匈牙利改革的文献已经很多,但是关于随后的社会与法律变化怎样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文献却相对较少。从新经济机制中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的大量互动推动了匈牙利社会与政体进一步远离全能主义极点。这方面有大量的证据。国家对法律上的工作灵活性的控制减轻了,1968年工人被允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工作、搬迁并且可以合法地在私人、小规模行业里从事兼职。^② 国家对工人收入来源的几乎垄断被削弱到以下程度,即“大约 3/4 的人口取自第二经济的总体收入比例等于第一经济中支付的至少 2/3 的工资”^③。国家对住房的垄断同样打破了。到 1984 年止,匈牙利所有新住房的 55% 是由第二经济建设的,并且对私人买卖与所有权开放。^④

匈牙利同样对增强法治,尤其是我们称为经济社会的而非指令经济的指导框架,进行了重要的改变。1982 年通过了一系列的对许多第二经济中产权合法化的规定。^⑤ 其政治重要性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社会来说,它减少了党一国的专断权威,并增强了合法保护权利从而进行法治的氛围。另一方面,对于党一国官员来说,这使得党国权贵家庭将其“投资组合”多样化,并参与到

① 正如查尔斯·加蒂解释的那样,“新经济机制于 1968 年开始,给经济引入了合理的度量尺度。通过关注农业、小规模工业及服务部门,这些改革成功创造了计划与市场在某种方式上能够共存以及生活水平同样提高的经济。卡达尔的‘匈牙利炖牛肉式(goulash)共产主义’——可能是改革(perestroika)的早期版本——同样得到了他的政权的相对政治宽容及开放的帮助——可能是公开化(glasnost)的早期版本”。参见他的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 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5。

② 参见 Anna Seleny 的“Hidden Enterprise and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n Socialist Hungary”, *Law and Policy* 13 (April 1991): pp. 156—158。这篇文章以及她的 1993 年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博士论文“The Long Transformation: Hungarian Socialism 1949—1989”, 在关于新经济机制在法律、社会与政治领域如何有许多意外的结果,以及它如何在匈牙利创建了一个“经济社会”方面是前沿性的。关于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对抗的语言与意义”的讨论,参见她的“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Hungary, 1979—82”,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8, no. 3 (1994): pp. 439—466。

③ Seleny, “Hidden Enterprise and Property Rights”, p. 162。

④ 参见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41, 表 19.5。这本书是由一位匈牙利经济改革的长期顾问、现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首席人物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写的,这本书一发表就立即成为有关指令经济的问题及对其进行部分改革的努力会受到哪些限制方面的经典。

⑤ Seleny 的“The Long Transformation”中有详细讨论。

第二经济中。^①

这个新的指导框架因此开始改变第二经济及国家机器中成员的工作和沟通机会。共产主义结束的7年之前,就奠定了“掏空”(hollowing out)国家部门以及“干部权贵阶层收购”的基础。对于非农业的国家合作部门来说,重组以及对公共财产的重构几乎立即就开始了,因为大约100人的团组可以合法地“从非农业的国家合作部门脱离,并带走设备和资金”^②。正如安娜·塞莱妮(Anna Seleny)所说,匈牙利的第二经济成为普通公民以及那些没有明显政治目的,但处于高位、有良好联系并开始有政治牵连的个人们高度信任的关系网。我们在这本书中可能将比别的地方更多地分析匈牙利第二经济的扩展与制度化如何使得从经验上或分析上难以区分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一些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了,如捷克斯洛伐克;其他的则适应生存下来,如匈牙利。在匈牙利,第二经济的复杂网络是旧干部权贵阶层适应能力与倾向的重要部分。政治发生类型的变化直至1989年才开始。但是经济发生类型的变化在1982年就开始了。

尽管在经济社会、法律与国家领域有着重要的变化,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卡达尔从未允许改变其政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到1987年为止,事实上从没有过重要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并且公民社会的社团生活是非常缺乏的。在这些领域中,匈牙利仍然是早期的后全能主义。

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卡达尔政体的政治经济——以及党——国——处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之下。尽管1979年重新恢复了经济试验,但其经济仍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问题。外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急剧增加。事实上,到1989年,公共外债激增到超过160亿美元。该国的人均债务为1561美元,居世界首位,远超巴西的622美元人均负债。^③党内的改革派开始越来越多地批评卡达尔并寻求党内与社会中的结盟。到1987年时,社会中的独立团体在党内改革派的默许之下也已开始批评卡达尔。秘密出版物《贝泽罗》

① 关于国有企业经理理性选择机会的新结构的结果,参见 László Urban, “Hungarian Transition from 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载于 András Bozóki, András Körösnéyi 和 George Schöpflin 编: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p. 88—95。

② Seleny, “Hidden Enterprise and Property Rights”, p. 163.

③ 人均负债从 *World Debt Tables, 1991—1992* (Washington: World Bank) 中公共与公共保证的长期债务数据计算出,在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p. 1051—1053 中有报道。人口数字来自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3*, pp. 59—67。

(*Beszélő*)在1987年上半年发行了一个特刊“社会契约”，开始主张“卡达尔必须下台”。《贝泽罗》正常的发行量是4000份。“社会契约”再版发行且售出了12000份，被党内改革派广泛阅读，其领导人物雷热涅尔什(Rezső Nyers)与伊姆雷·波茨盖依(Imre Pozsgay)还私底下与作者们进行了意气相投的讨论。^①我们相信如果不是已经有政体内的权力斗争，并且如果政体温和主义者与反对派温和主义者没有一些合法性的话，这些事件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到1987年10月时，匈牙利的第一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举行了它的组织会议，并有波茨盖依出席。^②

在1989年之前，匈牙利确实没有可与波兰的团结工会或者民主德国甚至捷克斯洛伐克的街头群众那样相提并论的社会运动，但是把匈牙利的转型看做只是由当政者的改革派发起与掌控的，那将是错误的。1988年大量的主要是自我组织的社团成为新的参与者。新的社会运动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个生态组织有效地组织了反对在多瑙河上建水坝的示威。1988年出现的其他两个重要团体所关注的焦点是，明确提倡一个能帮助形成更加有力与更多自治的公民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通信领域，新闻记者与其他专家组建了一个宣传俱乐部以促进言论自由。在法律领域，135名律师创建了一个法学家独立论坛(Independent Forum of Jurists)来向公民(之后的政治)社会提供足够的专家意见，从而审查与修改当政者以及新的社会团体提出的日益增多的法律与宪法提议。^③

301

东欧新选举产生的政权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一，是由“扁平的”后全能主义经济与社会图景带来的政治代表性的问题。然而在匈牙利，经济改革于1968年开始——有1953年的先例——并在1982年法律承认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表达利益的更加多样化与多元化的环境。安娜·塞莱妮很好地捕捉了这一关系。

① 上述是基于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布拉格(1992年12月16日)与“Social Contact”的主要作者、政治哲学家亚诺什·基什(János Kis)的谈话。后来，亚诺什·基什在自由选举后成为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主席。

② 波茨盖依对匈牙利民主论坛的支持性关系在Robert M. Jenkins, “Movements into Partie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ngarian Opposition” (Program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25, Harvard University, 1993)中有详细讨论。

③ 对这些新的社会运动的极好的分析包含在Andrew Arato的“Civil Society in the Emerging Democracies: Poland and Hungary”一文中，载于Margaret Latua Nugent编：《From Leninism to Freedom: The Challenges of Democratization》(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pp. 127-152。

总体来说,私人交易比许多官员预计的发展得更迅速,且其法律与政治制度结果令人惊讶。财政部在1982年至1989年间被迫采取的看起来无休止的更改、休整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表明,一旦财产权被授予团体,从而赋予其新的法律选举权,那么拓宽这些权力的压力便自然而然产生了……这些法令的最终结果是拓展了第二经济企业家的财产权和行动空间……一旦个体企业家与各种组织团体被赋予法律地位,它们就会迫切要求更进一步的改革。负责“代表”小的传统的制造商与零售商法律私人部门的传送带组织陷入了内部混乱,因为政府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其经济图景,却没有详细说明它们的授权。1987年企业家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利益代表组织,以帮助使政府作出针对私人部门的让步(例如,税收政策);一年之后,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政党。1982年的私人财产权改革是一个转折点……要将经济、强烈动摇的政党意识形态、社会态度与行为稳定化是不够的,它与作为制度—政治体系的国家—社会主义不相容。在大范围内使私人企业家身份合法化,向国家的不仅对生产而且对经济组织与社团进行控制的权利要求发出了挑战。^①

企业家组织起来后不久,科学工作者联盟创立了,之后还有其他的独立联盟。虽然这些联盟相对较小并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但是它们把后全能主义的边界推向了一个更加多元主义的方向。正如安德鲁·阿雷托(Andrew Arato)所说:“所有这些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受到波兰团结工会模式不同方面的影响,把自己看做是在从底层推动社会自我组织的结构,同时用经济与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参与要素来建设公民社会并为之奋斗。”^②

匈牙利反对派力量开始组织的最后领域是政治社会。社会运动中具有更多政治倾向的成员发展了主要的政党。民粹主义和有些农业与传统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于1987年在洛基泰莱克(Lakitelek)开会,并组建了匈牙利民主论坛(MDF)。1988年3月,一个主要政党即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the Federation of Young Democrats)组建成立。1988年春季,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绿党、新闻记者、改革经济学家以及独立学生与工人组织的松散联盟形成了一个更加城市化与社会自由主义的群体,且被称为自由创议网络(the

^① Seleny, “Hidden Enterprise and Property Rights”, pp. 165—166.

^② Arato, “Civil Society in the Emerging Democracies”, p. 139.

Network of Free Initiatives)。到 1988 年秋季,这个团体构成了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Alliance of Free Democrats)的基础。匈牙利政治的一个突出事实是,上述政党中没有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性政党;相反,它们是在匈牙利的成熟后全能主义中出现的。到 1988 年年底时,这种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结合,促使通过了一项新的关于结社的法律,该法律反过来又为多党体系铺平了道路。这项新的关于结社的法律一通过,三个历史性的政党——独立小农党(the 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及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就宣布它们重新恢复活动。^①

关于匈牙利转型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匈牙利共产党甚至是在波兰圆桌会议完成以及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在波兰组建之前,就开始接受竞争性政治。要准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退一步看看卡达尔与共产党合法性的变化背景。在第五章中我们指出,对一个政体合法性的传统衡量是一个特定政体是否被其公民认为是“在当时环境下最合适的政体”。19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参照“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卡达尔政体的经济与政治政策被广泛看做是相对成功的。考虑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地缘政治限制,匈牙利人最相关的参照组是苏联与东欧。

然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甚至在所谓的“辛纳屈主义(Sinatra Doctrine)”被正式表述之前,相关的参照组日益变成西欧,尤其是匈牙利的多瑙河上游的邻国奥地利。^② 表 17.1 显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 4 年后的 1989 年,匈牙利人是如何日益消极地看待他们在包括生活质量、平等与个人政治效能的等领域的处境的。

从表 17.1 可以清楚地看到,到 1989 年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看做是相

^① 关于这些反对派政党的出现及日益正规化,参见 László Lengyel,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ungary (Autumn 1989)”,载于 András Bozóki András Körösenyi 和 George Schöpflin 编: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p. 30—44, 以及 Jenkins, “Movements into Parties”。关于压力的有效动员导致了比政权原来打算的更民主的结社法律,参见 Gábor Halmas, “Representa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Hungary: The Recodification of the Right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Law and Policy* 13 (April 1991): pp. 135—147。这是“社会征服式去全能主义”动因的明显例证。

^② 弗拉基米尔·提斯玛尼尔诺(Vladimir Tismaneanu)解释说,“辛纳屈主义”是“苏联允许每个东欧国家进行各自不同改革的决定”。从效果上看,它允许它们走“自己的路”。参见他的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 216。

对失败的,并且奥地利被认为在所有三个调查度量中是最好的,这甚至包括了在大多数共产主义体系中被认为是最强的比较优势——平等。在这个总体背景下,到1987年时,一个复杂的转型博弈的要素在匈牙利已经到位了。

表 17.1 匈牙利人对他们生活质量、平等与个人政治效力降低的评估:
五国的比较,1985年与1989年

国家	回复者比例	
	1985年	1989年
“哪个国家的人们生活得更好?”		
奥地利	49.9	80.3
匈牙利	28.7	12.7
苏联	4.3	0.9
捷克斯洛伐克	0.3	0.6
南斯拉夫	0.3	0.3
罗马尼亚	0.0	0.1
“哪个国家的人们中有更多的平等?”		
奥地利	9.8	48.9
匈牙利	17.8	19.6
苏联	38.2	9.5
捷克斯洛伐克	1.1	3.9
南斯拉夫	0.8	1.3
罗马尼亚	0.4	0.9
“哪个国家的人们有最多的参与政治事务的可能性?”		
奥地利	14.1	52.3
匈牙利	23.0	24.0
苏联	25.0	4.7
捷克斯洛伐克	0.6	0.8
南斯拉夫	1.1	2.6
罗马尼亚	0.1	0.0

资料来源:László bruszt 和 János Simon, *La mayoría más silenciosa*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1990)。基于他们为匈牙利盖洛普民意调查(the Gallup of Hungary)做的一份民意调查。

即使我们对1985年的回答中的一些谨慎,或者民意调查专家所称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持怀疑态度,但在1989年人们如此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态度这一事实,反映出其本身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表格不包含其他的答案,以及DK/NA,因此,加起来不等于100。

的分裂可能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国家的一部分“向下延伸”来动员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从而提高它自己在国家内的权力位置。^① 这为妥协设定了框架。然而，如果公民社会不是足够强大，那么一旦达到了那个国家团体的目标，国家的一个部门给予的东西就会被夺走。可是，如果社会的反对力量足够强大，一个“政权妥协与社会征服”的辩证关系将随之产生，它将推动整个体系向边界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朝着自由化的方向，最后是跨过民主转型的界限。^② 知道存在这种政治过程发生的可能性提醒我们考虑一些转型，作为由部分国家与公民社会竞标的案例。因此，虽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视角通常是正确的，但公民社会的部分增长与授权可能是因为国家的部分与公民社会的部分暂时结盟，当然，双方都坚信自己将成为最终获胜者。匈牙利共产党中没有任何派别，甚至如波茨盖依这些最先进的改革者，在开始政体妥协时接受这一事实，即这可能会导致权力的丧失。那为什么政体妥协与社会征服的辩证关系会导致匈牙利跨过从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到自由竞争民主的边界呢？

到 1987 年，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与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党一国中至少存在着 4 个明显派别：(1) 希望戈尔巴乔夫倒台以及对在匈牙利强制推行 1968 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正常化战略”感兴趣的强硬派；(2) 在年迈的领导人卡达尔周围的维持现状派；(3) 由卡罗伊·格罗斯(Károly Grósz)领导的希望经济分权，但对除了日益增长的以法律约束国家之外的政治改革很少感兴趣的温和改革派；(4) 由波茨盖依领导的对经济、法律与政治改变感兴趣的改革派。从 1988 年中开始，两个共产党改革派互相支持，并都利用它们控制的政党机制来协助形成对卡达尔的压力。^③ 卡达尔的主要挑战者是 1987 年 7

① 关于斯泰潘对国家间冲突与公民社会的“求婚期”的观点，参见“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载于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 Theda Skocpol 编：*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17—346, 以及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1 and chap. 3。

② 关于斯泰潘对巴西“政体妥协与社会政府”辩证关系的分析，参照他的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尤其是 p. 39, pp. 45—46。

③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党内的两个改革派和它们的许多技术官僚联盟与波兰式的两分性“公民社会对抗国家机构”动因无关。实际上，匈牙利公民社会团体有更多的空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国家机构内的改革派与公民社会创建的许多网络。参见 X. L. Deng 改写的关于“公民社会对抗国家机构”的传统思维的重要作品，“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he Case of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July 1994): pp. 293—318。Deng 恰当地引用了匈牙利社会学家 Elemér Hankiss 的作品来作为匈牙利“制度双重性”的重要例证(p. 301)。

305 月当选总理的卡罗伊·格罗斯。格罗斯利用这个通常软弱的位置作为讲台，在其竞选成为卡达尔继任者的活动中批评卡达尔。一项杰出的对党内领导人竞争的研究表明“格罗斯的战略是追寻对精英有克制的动员与激进化以向卡达尔领导层施压……格罗斯超越意识形态既向政党，也向非政党寻求意见与支持，通过这样做给予作为国家领袖的卡达尔的权威以致命的破坏”^①。

格罗斯在这个竞争中的一个战术盟友是他的改革对手、在媒体中有巨大影响力的波茨盖依。波茨盖依不仅帮助非政党的社会运动获得了一些媒体的渠道，而且反过来得到了它们的帮助。波茨盖依参加了匈牙利民主论坛于1987年9月举行的重要组织会议，并保证它们的声明能在一份政党控制的报纸上发表。事实上，波茨盖依在会议上发了言并敦促出席者提供一份改革的替代计划。一位研究匈牙利民主论坛从社会运动向政党转型的学者提供了如下判断：“波茨盖依通过人民爱国阵线(the People's Patriotic Front)提供的资源——有组织的支持与媒体渠道——确实为帮助匈牙利民主论坛起到了作用……如果没有政党改革派联盟提供的具有决定性的保护，这个团体可能就不能形成一个组织……这个联盟使两个阵营都受益。它给波茨盖依与他的改革同僚们在内部[共产党]斗争中以广泛的支持。”^②

政体妥协与社会征服之间的动态关系在1989年初事件的升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匈牙利政治学家安德拉·克勒谢尼(András Körösi)描述了一个权力日增的公民社会及许多主要政党是如何通过承认多党选举的合法性，来将匈牙利的后全能主义政体推向跳出类型的政治变化的边缘的：

使事件向前推进的是波茨盖依在1989年1月底时的行动。波茨盖依意识到如果不对1956年的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就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当卡罗伊·格罗斯在瑞士欣赏阿尔卑斯山时，波茨盖依在电台采访中宣布，匈牙利1956年发生的事件不像共产党的官方史料中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而是“民族起义”。其效果是戏剧性的。格罗斯在两周内召集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在这两周里，成百上千的社会与政治组织表示它们同意波茨盖依，或者至少欣赏他的讲

^① George Schöpflin, Rudolf Tökés 和 Ivan Völgyes, “Leadership Change and Crisis in Hungary”, 载于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 – Oct. 1988): p. 34, p. 36.

^② Jenkins, “Movements into Parties”, p. 67, p. 60.

话。由于受到公众舆论与媒体的支持，波茨盖依与改革者们赢得了这场战斗。2月份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不仅接受了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而且接受了多党体系。^①

随着匈牙利共产党接受多党选举，尤其是波茨盖依关于多党竞争“可能使权力丧失”的明确声明，一个新的政体—社会关系开始浮现，民主转型接近诞生了。^② 参照我们关于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动员与领导层的政体标准，匈牙利到1989年2月时已经到达了——在波兰富有戏剧性的选举事件之前——远离后全能主义界限的边缘。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已被别人很好地讲述。^③ 然而，作为比较主义者，我们希望考察匈牙利的成熟后全能主义是如何开启转型路径的，这条路径不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也不适用于东欧的任何其他一个后全能主义政体。在表4.2中我们把这条路径称为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

我们已经提供了理解匈牙利为何首先做出这个选择的大部分要素。但是，并非所有可行的选择都实现了。让我们进一步明确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需要的条件，以及为什么这个可能的路径在匈牙利实际发生了。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路径四个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1)政权中的温和派与民主反对派中的温和派都有一些权力地位；(2)上述“玩家”都相信，考虑到所有的选择，谈判是首选方法；(3)双方温和派玩家具有并/或形成战略与战术谈判能力；并且(4)温和派玩家成为各自方面的主导者。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证明政权中的温和派与民主反对派中的温和派都有一

^① András Körösnéyi, “The Decay of Communist Rule in Hungary”, 载于 Bozóki, Körösnéyi 和 Schöpflin 编, *Post-Communism Transition*, pp. 6—7.

^② 对波茨盖依的引述来自一份共产党的官方日报 *Magyar Hirlap* 中的访谈，并被引用于 Charles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1. 关于波茨盖依声明的象征性重要意义，参见 András Sajó, “Round Tables in Hungar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2, August 1991), p. 5.

^③ 三份杰出的研究是 László Bruszt 和 Davi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载于 Ivo Banac 编: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London: Granta Books, 1990), pp. 47—60, 其中详细叙述了象征—权力关系如何借着纳吉的重新安葬朝着民主人士的方向发生了进一步改变；以及前面引用过的西班牙社会学家对西班牙与匈牙利的转型作了有趣比较的那本书, González Enríquez, *Crisis y cambio en Europa del Este*, 尤其是 pp. 362—368.

些权力地位。谈判成为双方温和派玩家的首选可能性,因为双方都明白单靠自身的努力不可能获胜,双方都意识到社会与经济危机的深度,并且双方都担心任何对1956年事件的重演对它们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匈牙利革命的记忆实际上帮助了双方温和派玩家坐到谈判桌前,并帮助他们成为各自方面的主导者。拉斯洛·布鲁斯特与达维德·施塔克很好地描述了1956年的遗产如何影响了政权及其反对派。“对于共产主义精英来说,1956年那种当社会被推动超出其界限时能被释放出来的暴乱的记忆时刻缠绕着他们。它超过了所有的社会恐惧,如此深地铭刻在共产主义领导层的心里,以至它本能地愿意做任何事情来防止另一个1956年。随着经济与政治危机在1988年里深化,党的领导人在演讲中提及1956年的次数也日益增多。”^①同样,布鲁斯特与斯塔克认为,对于大多数民主反对派来说,

苏联1956年干预的教训使得新浮现的社会与政治团体的领导人不愿质疑政权的合法性,相反,却寻求与其领导人的妥协。戈尔巴乔夫没有自动改变这些考虑,因为他的容忍限度在这个时期既没有清晰地表明,也没有被测试过……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结束的第一次清晰测试是苏联接受波兰的非共产主义的马佐维奇政府[1989年8月]。^②

1989年初的反对力量是由许多政党与社会运动组成的。现有政权曾试图与反对力量中的每个部分进行单独谈判。然而,民主反对派谈判能力方面的一个主要进步是它们拒绝单独进行谈判。它们在1989年3月23日首先建立了自己的“反对派圆桌会议(Opposition Round Table)”。参加反对派圆桌会议的8个团组代表了相矛盾的利益与观点,但是它们通过内部达成一项协议而极大地提升了它们的战略与战术谈判能力,即任何与当政者的圆桌会议的主要目标不应该是关于社会政策或者权力共享,而必须是关于达到决定匈牙利未来权力的自由竞争的根本细节。^③与任何其他东欧圆桌会议不同的

① Bruszt an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p. 24. 着重号为原书所有。

② 同上书, p. 25。

③ 参见 László Bruszt, “1989: The Negotiated Revolution of Hungary”, *Social Research* (Summer 1990): pp. 365—388, 尤其是 p. 375; András Bozóki, “Hungary’s Road to Systemic Change: The Opposition Round Table”,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7, no. 2 (1993): pp. 276—308, 尤其是 p. 285; 以及 Sajo, “Round Table in Hungary”, pp. 20—25.

是，谈判是在政权与一个已经组成的政治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之间进行。政治团体必须在它们能够或即将谈判之前在它们内部达成一致。实际上，在重要事件如纳吉的重新安葬中，政治社会召集并组织了公民社会。

当全国三边谈判(圆桌会议)开始时，当政者的一些部分还没有完全接受自由与竞争性选举的原则。然而，在围绕纳吉重新安葬与波兰选举的民族感情的异常发泄不断重构政治空间的背景下，波茨盖依与共产党改革派开始占据优势，并走向接受民主选举的不确定性。^①

谈到这点，我们需要暂停一下来研究共产党党内的改革派为什么能接受选举的不确定性来作为最好的出路，并使得党内的其他重要人物、国有企业经理与军队默许他们的决定。在共产党改革派看来，对政权的成功打压，例如1991年8月苏联政变联盟的企图那样，能够导致像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清洗。但是，共产党改革派认为他们有相当好的机会能在竞争性选举中表现出色。实际上，一项1989年6月的调查显示，他们能赢得最高相对多数26%，而且如果总统选举立即举行的话，没有哪个反对派候选人具有波茨盖依的知名度与支持率。^②即使他们不能赢得最高相对多数，他们也很有希望成为在民主多党体系中的合法竞争者。正如布鲁斯特与施塔克提到共产党改革派的打算时说的的那样，“他们对反对派的软弱的感知以及他们对自身选举前景的评价给了他们信心……正因如此，他们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受‘产生不确定结果的确定机制’的原则，这也正是自由民主的核心所在”^③。

308

^① 作为工会民主联盟(Democratic League of Trade Unions)全国秘书的拉斯洛·布鲁斯特是反对派圆桌会议与政府—反对派圆桌会议的官方参与者。因为是工会官员并懂波兰语，布鲁斯特被派往波兰圆桌会议作观察员。他的“1989: The Negotiated Revolution of Hungary”尤其敏锐地说明了波兰与匈牙利事件的互动比较动因，以及这个动因如何帮助了共产党改革派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共产主义)党中占据支配地位。

^② 1986年6月的同一份盖洛浦民意调查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得票仅为9%。最重要的是，迟至1989年秋天，波茨盖依才确信由于反对派领导人缺少知名度，他能赢得直接总统选举。关于民意调查，参见Elemér Hankiss, “In Search of a Paradigm”, *Daedalus* (Winter 1990): p. 206。关于对许多在1989年曾鼓舞了共产党改革派的各种民意调查的研究，参见László Bruszt and János Simon, “The Change in Citizens’ Political Orient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Hungary (Reflected by Public Opinion Survey and Electoral Studies, 1990—1991)”, (Budapest: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91)。至1989年7月6日，Sajo对圆桌会议中亲波茨盖依的参与者的总体意见描述如下：“平民总统选举的得胜者是波茨盖依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Sajo, “Round Tables in Hungary”, p. 25。

^③ Bruszt an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p. 45。他们在引用“不确定结果原则”时的参考文献是Adam Przeworski的“Democracy as a Contingent Outcome of Conflicts”，载于Jon Elster和Rune Slagstad编: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9—80。

当然,部分党内强硬派以及秘密警察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不确定的原则,但是党一国的一些重要部分,尤其通常是“务实保守派”的国有企业经理,必须仔细考虑到底是支持镇压还是可能站在共产党改革派一边更符合其利益。虽然我们不会进一步去讨论“旧干部权贵阶层收购”卸任后的经济保障可能性使得国有企业经理们成为波茨盖依的主动结盟伙伴,但是我们确实相信国有企业经理们对把他们作为公共部门经理位置上的资产“转化”成个人经济资产的内心期望,可能帮助解释他们对共产党改革派在共产党内上升的被动默许。^①

309 正如拉斯洛·乌尔班(László Urban)所说,第二经济开启的机会结构改变了他们的理性选择考虑。

为什么改革派在共产党内以及政府内逐渐掌权,而且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反对改革的保守派阻挡并取代?简短的回答就是,改革派轻松地掌权正是因为务实的保守派让他们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务实保守派的政治支持者,即旧政体的寻租者,要照顾他们自己的生意,不组织政治抵抗对抗体制改革,能给他们提供较高的积极回报。^②

一份对新的精英的前沿调查显示,对于一些国有企业经理来说,这个打算被证明是正确的。1993年的匈牙利,81%的新私人部门的经济精英曾在1988年时受雇于党一国中涉及经济的领域(50%是国家经济部门中的管理类工作,30%是经济指挥职位)。^③

那军队怎样呢?镇压尤其不能依靠苏联军队,因此可能不得不用匈牙利军队以及匈牙利秘密警察。南斯拉夫军队有着绝对优势的塞尔维亚军官兵种,并认为主动支持于克罗地亚的战争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清洗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波兰军队从1981年至1989年在党一国中处于领导地

① 匈牙利国有企业经理的“被动默认”行为,与我们讨论过的转型案例(如西班牙、乌拉圭或智利)中的资本主义商业精英的被动默认行为没有数量上的不同。实际上,在这一系列转型案例中,一些企业家曾一度是民主反对派的“积极联盟伙伴”的只有巴西。参见 Fernando H. Cardoso, “Entrepreneurs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e Brazilian Case”, 载于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37—153。

② 参见之前引用过的 Urban, “Hungarian Transition from a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载于 Bozóki, Körösi and Schöpfl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p. 91—92。

③ 然而,如果考虑1988年整体的旧经济精英,则23.4%到1993年止经历了职位大调整,且47.6%被迫提前退休。参见 Szonja Szelényi, Iván Szelényi 和 Imre Kovách, “The Fragmented Hungarian Elites: Circulation in Politics, Reproduction in Economy”, 载于 Iván Szelényi, Edmund Wnuk-Lipinski 和 Donald Treiman 编: *Circulation of Elites? Old and New Elit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y*。

位,罗马尼亚军队帮助旧权贵阶层征服了罗马尼亚起义。与上述都不同的是,匈牙利军队在匈牙利转型中保持了绝对中立的立场。考虑到匈牙利近期的政治历史情况,匈牙利军队再次认为对谈判达成的和平改变被动接受将不会损伤到其利益。亚诺什·西蒙在第一次评估军队对1989年匈牙利转型的作用时说,“在1956年[匈牙利]军人或者支持革命,或者离开了军队,但是却没有支持苏联入侵的有组织的力量……从政体改变的一开始,苏联部队的撤退就在议事日程上。”军队的赌注得到了信任方面的回报。在一份对公民信任的机构的年度调查中,1989—1992年间的每一年里,军队在6个机构中的得分最高。^①

310

考虑到党内的总体立场、国家机器及军队站在一边,政治组织反对派站在另一边,对于为什么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不仅是可能的路径而且是现实的路径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现在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匈牙利成熟后全能主义的特性对于即将开始的民主政府以及议会在民主能被巩固之前必须处理的任务有什么启示。在表1.1中我们清楚地说明了人们如何能把巩固的民主概念化为由五个内在联系的主要场域组成。也许现在涉及匈牙利是否巩固了民主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对五个政体场域进行研究,那么尽管匈牙利存在着我们将讨论的重要的国家性问题与公民社会代表问题,可是相对于从1989年开始转型的其他东欧国家,匈牙利具有关于巩固的任务方面的重要优势。

我们将考虑的第一个场域是政治社会。与东欧的任何其他后全能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匈牙利的政治社会在转型之前就已开始承担了它的大部分组织结构。事实上,虽然直至1990年3月才开始举行基础选举,但是到选举前15个月即1988年12月为止,最终赢得1990年选举后匈牙利议会席位的6个政党中的每一个都已经形成了。^②此外,与波兰不同的是,有组织的政党,已经

^① János Simon, *Fieldmarshal's Baton and Peace (Judgements o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Hungary during the Regime-Change between 1988 - 1992)* (Budapest: Erasmus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993), 引自 pp. 7-8, 调查数据在表 3。

^② 关于投票与席位的表格,参见 András Körösi, “The Hungarian Parliament Election, 1990”, 载于 Bozoki, Körösi 和 Schöpfl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p. 72-81。实际上,这6个政党是1994年选举后重返议会的唯一6个党。没有新的政党进入议会。没有旧的政党被排除出去。参见 Attila Ágh 和 Sándor Kurtán, “The 1990 and 1994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Hunga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载于 Attila Ágh 和 Sándor Kurtán 编: *Democrat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Hungary: The First Parliament, 1990 - 1994* (Budapest: Hungarian Centre for Democracy Studies, 1995), pp. 13-26。

开始了从单一的公民社会中的成分到政治社会中的竞争性成分的必要转变，并成为圆桌会议中反对派的最重要部分。

311 从我们的理论与比较角度看，政治社会向良好运转的能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不同于菲律宾、韩国或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匈牙利选择了一个纯粹的议会制政府类型。波茨盖依希望在议会自由选举之前举行总统直接选举。事实上，他在圆桌会议上得到了匈牙利民主论坛关于在1989年11月举行总统直接选举的支持。^① 在我们看来，如果这样一个选举发生了，匈牙利将有一个半总统形式的政府，伴随着这种形式的政府所具有的一些问题。同样地，宪法修改程序、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以及政府组成过程，都有可能被直接选举赋予合法性的在任总统在一定程度上复杂化。结果，两个反对派民主政党（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与青年民主党）都拥有成熟的组织体系且具有进行战略与战术行为的充分能力，它们能够搜集到宪法要求的全民公决签名的数量，全民公决的五个项目之一就是议会选举应该在总统选举之前还是之后举行。在情绪高涨的运动之后，“议会选举先行”的选择赢得了微弱多数。新选举出的议会，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进行总统间接选举。^②

匈牙利与波兰在政治社会场域的比较是极其鲜明的。匈牙利圆桌会议没有导致权力共享方案，而是议会的直接全民选举。政党的早期构建以及相对不受限制的谈判导致了1990年3月与4月的自由竞争选举，然而在波兰，第一次完全竞争性的议会选举直至1991年10月才举行。这意味着在波兰，民主政党在自由议会选举前的21个月里承受了担当政府责任的后果。^③

匈牙利没有我们在第五章中认为最理想的宪法制订方案，因为一个新的宪法不是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或是国民代表大会制定，然后呈交全民

① Bruszt an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pp. 48—50.

② 以上的讨论是从阿尔弗莱德·斯泰潘与亚诺什·基什于1991年7月5日在布达佩斯的采访中，以及前面引用的Bozóki、Bruszt与Stark的文章中获悉的。

③ 这也许能帮助解释以下事实：据报道波兰第一次自由议会选举投票率为42%，在匈牙利1990年3月的第一轮议会选举投票率为63%。同样，在波兰“评论家们将低投票率归咎为团结工会领导下政府的严厉经济紧缩措施……以及超过80个竞争政党与几十个社团带来的混乱”。参见 *Kes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1990*, pp. 37464—37465, p. 37325。然而，我们愿意指出，出现在几乎所有“基础选举”投票上的政党数量通常都极其繁多。在大部分情况下，投票者很快就把它们削减下去，正如在匈牙利一样。实际上，在匈牙利，54个政党在1989年注册，其中只有12个满足要求，出现在了全国的名单上。事实上，甚至只有19个政党出现在省的名单上。与波兰形成对比的是，匈牙利政治社会的初期结构允许组织得相当好的政党体系出现。参见 González Enríquez, *Crisis y cambio en Europa del Este*, pp. 149—150, 以及 Körösnéyi, "The Hungarian Pailiament Elecion, 1990", pp. 74—81。

公决。相反，圆桌会议的所有主要政党以及两个主要的民主政党在议会选举之后，协同对现存宪法进行了大量修改以使它能继续运转。^① 然而，在政党已经存在并且没有在任的选举产生的总统来先做决定的背景下，对可能的统治方案的争论广泛渗透着当代欧洲民主宪法思想与实践。^② 匈牙利的途径，虽然是次理想的，但迅速地制定了政治社会的游戏规则、法治，以及政府与国家权威层次判定程序。匈牙利从未有过我们分析过的波兰以及我们即将分析的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与俄罗斯的那种宪法僵局。同样，虽然匈牙利的宪法制定程序缺乏投票决定的国民大会的完全“原始合法性”，或者对宪法进行全民公决的“批准合法性”，但是修改宪法的相对一致的程序避免了某种程度的“多数人的强迫”，我们将看到，多数人的强迫导致了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重要少数群体质疑宪法的合法性。匈牙利同样没有面临导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解体的苏联式虚构联邦体系所产生的决策瘫痪。最后，匈牙利的法律权威层次拉开了诸如困扰着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及叶利钦的俄罗斯那样的法律之战的序幕。不过，尽管如此，匈牙利修改共产党制定的宪法，而不是创建一部新的宪法，这个事实仍然是 1995 年政治冲突的根源。

在经济社会场域，财产法、合同法、资本市场以及银行结构，在匈牙利比在东欧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地在转型前开始了。我们所称的制度化经济社会的大部分规制框架在民主选举的安托尔(Antall)总理政府就职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位分析家这样总结道：

旧政权的行为让安托尔政府做事容易多了：对第二经济的合法化，其

^① 关于宪法修改程序及其结果，参见 Andrew Arato, “Legitimation and Constitution Making in Hungary”(1993 年 8 月 16 日在迈阿密海滩举办的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准备的论文)，以及 András Bozóki,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ed Change in Hungary”，载于 Bozóki, Körösnéyi 和 Schöpflin 编: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p. 60—71。

^② 匈牙利在宪法修订程序中，采取了著名的德国(之后西班牙的)“建设性信任投票”方案。因为不信任投票只有在绝对多数拥护替代政府时才能通过，所以它能帮助避免产生过多的政府不稳定。匈牙利同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宪法法院，它在许多情况下都制衡了政府滥用权力的倾向。关于宪法法院，参见 Ethan Klingsberg, “Hungary: Safeguarding the Transition”，*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 no. 2 (1993): pp. 44—48。他们设计的选举法同样帮助避免过多的政党分裂，因为一些选区是单一席位，而其他选区是基于高达 4% 下限的比例代表制。然而，德国法律保证选区内的个人候选人的选举以及在全国层面的比例合理性水平。与之不同的是，匈牙利法律使得最成功的政党的大量超额代表成为可能。这个超额代表的要素导致了道格拉斯·雷所称的 1994 年选举中的“以人为方式制造出来的多数”(manufactured majority)。

中存在着能使匈牙利在政治转型后相对于东欧其他国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企业家技能；能够为私有化努力提供重要的中间服务的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体系的启动；对新私人公司的开办及现存国有企业向私有制形式的转变来说必要的法律机制的建立；制定了东欧存在着的最宽松的外国投资法律。^①

在上述引用中，不仅是第二经济的规模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新的市场是制度化的并因而是可预测的框架的一部分也很重要。我们关于匈牙利相对发达的经济社会的陈述不仅仅是我们的学术判断。利己的金融领袖只有在他们相信风险是可接受时才会以低价格购买债券。制度化的经济社会帮助产生了这种低风险的环境。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比较“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评估者是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与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and Poor's)。令人惊讶的是，在匈牙利1990年选举后的3年内，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有着长期资本主义经济与变化无常的经济社会背景的国家)中，只有智利比匈牙利高一个信用等级。^②外国投资者同样对匈牙利的比较吸引力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例如，在1991年，他们在匈牙利投资了与在剩下的全部东欧国家总和一样多的钱。^③

至于可用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东欧的每个国家都有清洗旧权贵阶层成员以及秘密机构的要求。在匈牙利相对开放的教育体系允许许多政策专家在西欧或美国进行常规访问或教学的情况下，共产党改革派与民主反对派的许多部分有着高级别的非正式接触，并且匈牙利国家机构日益屈从于经济进步、

① 参见 David Bartlet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ation: Property Reform and Democracy in Hungar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winter 1992): pp. 73-118, 引自 pp. 104-105。

② 在标准普尔从最有信用的级别 AAA 到 D(没有信用)的 21 级范围中，智利为 BBB 级，匈牙利只低一级为 BB+。墨西哥与匈牙利同级。石油富有但政治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被评为更低的 BB 级。巴西、阿根廷及俄罗斯没有排名。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使用的是一套有些不同的方案，但是匈牙利的排名在阿根廷之上 3 个级别，在巴西之上 4 个级别。如果记得匈牙利在 1988 年时还是拥有比巴西多两倍多的人均外债的话，那么匈牙利的排名会是所有这些里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参见 John F. H. Purcell et al., "Rating of Sovereign, Sovereign-supported, Local Government, and Supranational Issuers" (New York: Solomon Brothers, January 8, 1993)。我们文章中的排名取自 1993 年 6 月 16 日上述文献的最新版本。

③ 匈牙利人口只占东欧人口的 10%，但是在 1991 年接收了比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总和还多的外国私人资本——超过 14 亿美元。Dirk W. Damrau, "The Rol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East European Privatization: Hungary, Poland and Czechoslovakia", 载于 John R. Lampe 编: *Creating Capital Markets in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46, 引自 p. 44。

制度及规制框架,我们将看到,对革命清洗及事后审判的社会要求在匈牙利比在如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僵滞的后全能主义国家低得多。在这些情况下,绝大多数技术专家甚至法官都被新的民主政府中的大部分认为是有用的。一项有限的清洗法律在议会得到通过,但被宪法法院推翻。^① 1993年议会进一步试图通过事后清洗法,但是他们的焦点限定在了那些在1956年革命中扮演了主要强制角色的人。^②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帮助匈牙利处理由过分的净化法律导致的潜在国家危机的三个因素。第一,包括前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的政治行为体,通过圆桌会议参与了向民主的谈判转型,他们至少获得了一些政治资本。在后全能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前共产党没获得这种政治资本的资源,我们将看到,那里的政体彻底崩溃了。第二,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阿尔帕德·根茨(Arpád Göncz)的职位及权力在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中有着根本的合法性,他娴熟并权威地运用宪法赋予的调制权力,将存有疑义的立法提交宪法法院解决。第三,尽管宪法法院修改了比西欧巩固的民主的标准还多的议会法律,但是它在其宪章内行事,并保持了其合法性及权威性。

我们讨论的五个场域中的最后一个公民社会。在这里我们有些似非而是的论点。一些匈牙利的分析家把1988年称为公民社会年,而把1989年称为政治社会年。^③ 这本应为我们第一章中讨论的类型的互相支持的关系准备好基础。然而,1989年后的政治社会有效地解散了公民社会。政府中的议会大多数在1990—1993年间强大得足以倾向于忽视公民社会的输入。政府同样阻止了本来能使公民更广泛地控制及接近媒体的立法。我们同意像阿雷托那样的一些分析家们,他们相信通过建立公民社会对政治社会发挥调解作用的更加有效及更加多样的途径,匈牙利的民主将得以改善。许多潜在的重

^① 参见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summer 1992): pp. 17—22 中关于匈牙利宪法法院推翻追溯法的决定的特别论坛。

^② 参见 Edith Oltay, "Hungary Attempts to Deal with Its Past", *RFE/RL Research Report* 2, no. 18 (1993): pp. 6—10.

^③ 这个阶段意在引起对在1988年公民社会的迅速增长及随后在1989年立即转变到政治社会的注意。正如布鲁斯特与施塔克解释到:"从社会运动到政党的转变能用月而非年来计算。"他们接着解释,领导人对公民社会反对国家机构的动员"是短暂的;动员在1989年6月16日达到高潮,但就在同一个星期就开始衰退。1989年的夏天不是组织社会而是与其他政党谈判的季节"。Bruszt and Stark,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pp. 52—53.

要利益,例如社会民主选区,都没有在转型时出现的反对派政党中真正得以表现。^①

315 在匈牙利,对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的不平衡是否能逆转存在着争论。亚诺什·西蒙对1985年、1989年及1991年提出的一些公众意见问题进行了研究。两个发现给我们留下了尤其重要的印象。第一,在所有12个问题领域中,投票的公民在1991年比1985年希望从政府中得到更多。第二,在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持续向上的趋势中,公民越来越多地说,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在地方及国家层次“能对此做一些事情”。^② 如果媒体是自由的,如果人民有权组织起来,而且如果选举是公平的,那么未来的选举能为公民社会在政治社会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性而提供机会。

让我们简短谈谈“国家性”来结束我们对匈牙利的讨论。在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中,匈牙利被严重削弱。匈牙利失去了之前领土的2/3、战前总体人口的3/5以及匈牙利语人口的1/3。^③ 生活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政府统治下的匈牙利人以及塞尔维亚控制下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成为匈牙利政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对于民主人士来说,这个问题是积极支持生活在国外的匈牙利人的人权。对于一些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就像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及奥地利右翼势力一样,这是一个领土收复的问题。如果民主政府没有“保护”所有的匈牙利人,那么它丧失合法性的潜在可能性,以及基于失地抨击体制的政治的潜在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90—1994年统治联盟内的一些重大争斗就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联盟内重要政党匈牙利民主论坛的一个副主席,伊什特万·楚尔高(István Csurka)发表了一份种族主义宣言。^④ 在较不发达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也许会转向日益

^① 例如,关于为何社会民主选区代表不足的讨论,参见 Tamás Kolosi, Iván Szelényi, Szonja Szelényi 和 Bruce Wester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Field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Dynamics of Class and Party in Hungarian Politics, 1989—1990)”, 载于 Bozóki, Körösnéyi 和 Schöpflin 编: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pp. 132—162。

^② János Simon, “Post-paternalist Political Culture in Hung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s during and after the ‘Melancholic Revolution’ (1989—1991)”,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June 1993); pp. 226—238.

^③ Joseph 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p. 155.

^④ 参见 Edith Oltay, “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 Rent by Dispute over Extremists”, *RFE/RL Research Report* 1, no. 47 (1992)。George Soros 在匈牙利及在《纽约时报》op-ed 页上有效地挑战了楚尔高的宣言。

增强的民族主义与非民主的进程。^①事实上，匈牙利民主论坛对楚尔高的挑衅煽动言论含糊其辞，并反应缓慢。最终，由于匈牙利民主论坛在民意调查中空前低的地位、1994年选举的迫近，加上渴望成为“可结盟的”，执政党驱逐了种族—民族主义派别领导人楚尔高。

小国边界上的战争、城市里的难民、加上对保持生活标准的焦虑，以及欧盟对小国与他们的邻居签订协约的施压，可能导致内部及外部冲突的领土收复民族主义在匈牙利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胜利的选举方案。实际上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两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即楚尔高的匈牙利真理与生活党(Hungarian Truth and Life Party)以及绿党(Green Party)，分别得到了1.6%和0.7%的选票，且没能进入议会。这个得票数比1993年法国或1994年意大利的极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得到的1/5的得票数还少。^②

316

尽管有1994年的选举结果，但相信民族主义以及国家性问题将从匈牙利的政治日程上消失将是错误的。这些问题无疑将以一种更加现代的形式重现，且可能影响匈牙利的民主质量，但依据我们的判断，它们不大可能阻挡民主的巩固。成熟后全能主义与现在已是民主的匈牙利已经相当好地处理了它的国家性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僵滞的”后全能主义瓦解后的转型

现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国，作为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奥地利板块的组成部分，是东欧地区法律传统最为浓厚的国家之一。从1918年获得独立到1938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东欧地区唯一经历了连续民主的国家，一直到慕尼黑协定之后德国瓜分并占领了它。最后，捷克斯洛伐克还是

^① Richard Rose and Christian Haerpfer, "Adapting to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 II", 载于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212 (1993): 表 19 报道的对有关国家进行的关于来自邻国的威胁感的调查中，只有已经应付了匈牙利威胁的罗马尼亚得分较高。

^② 在法国，勒庞(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在1993年的第一轮议会选举中得到了12.4%的选票。在意大利，之前名为意大利社会运动(the Italian Social Movement)的新法西斯民族联盟(National Alliance)得到了1994年意大利议会选举的13.5%的直接比例代表制投票，这在 *Kes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1993*, pp. 39381-39382 及 1994, pp. 39918-39920 上分别有报道。

东欧地区工业最发达和人口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① 这种前共产主义遗产,以及布拉格位于维也纳西部,是中欧最靠近柏林的首都,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欧洲政治中心这样的事实,意味着背后隐藏着国家性问题的同族的捷克共和国,有理由拥有成为西欧发达民主的一员的美好前景。

然而,与匈牙利截然相反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通过谈判实现转型。在持续 10 天的公众游行之后,这个政权瓦解了。由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产生的临时政府有着强烈的反政治倾向,抵制任何发展全国性政党的机会。此外,这一临时政府对正式的决策机制极度不感兴趣,以至于它没有把重点放在修改空洞的苏式联邦宪法上,直到对重新谈判和挽救联邦来说为时太晚。最后,选举产生的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了一份具有追溯力的、在道德和民主意义上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最为含糊的国家清洗法。^② 要理解为什么上述事情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权内部统治者和民主反对派的一些核心特征是很重要的。

首先看统治者。只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才在两次大战之间拥有参与政治体系的法定权利。正如戈登·斯基林(H. Gordon Skilling)所说,事实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认为是“奥地利社会民主的合法继承人”^③。1941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支持苏联抵抗纳粹的占领。无论是苏联还是当地的共产党从“二战”中发展起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要比在波兰有利得多。事实上,在战后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以 38% 的相对多数票脱颖

① 有关对战争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与民主的肯定的相对评价,参见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8), pp. 3-23, 尤其是 pp. 13-18。就综合企业整体而言,波希米亚——或者捷克国——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要比奥地利部分发达。

② 有关与匈牙利的比较,参见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Spring 1992) 标题页里的“Backward-looking Justice in Czechoslovakia”和“Forward-looking Justice in Hungary”。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运动称为“清洗”(lustration);它来源于拉丁文“purifying” sacrifice 这一概念。这一法律受到许多国际法律和人权组织的谴责。编列合作者名单所需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寻求国内档案部门工作人员的合作。若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档案中,那么他就会近似于被假定为有罪。只有那些被指控只是低水平参与合作的人才有权上诉。高级共产党官员几乎没有上诉的权利。参见 Vojtech Cepl, “Ritual Sacrifice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Spring 1992): pp. 24-26。一种从人权角度进行的强烈批判,请参见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Helsinki Watch Committee)执行理事 Jeri Laber 在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3, 1992 的文章。对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模糊的清洗程序的比较研究,参见 Herman Schwartz, “Lustration in Eastern Europe”, *Parker School Journal of East European Law* 1, no. 2 (1994): pp. 141-171。

③ 参见 H. G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10, 引自 p. 6。

而出。^① 从而，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打下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48年共党政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全面的压制，“使得这个国家变成了人民民主国家中最具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国家”。这种教条的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主义一直延续到斯大林逝世。1957年，共产党领袖批判了“去斯大林化”这一措词，认为它同义于“软弱和对反动势力的屈服”^②。历来比较软弱的天主教（尤其在捷克）遭受了比在东欧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彻底和有效的压制。^③

经莫斯科初步批准，斯洛伐克领袖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于1968年开始一项由党领导的谨慎的改革，这一改革很快发展成为和平的、仍然由党领导的布拉格之春。然而，苏联坦克带领着华沙条约其他一些成员国的军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并开始了勃涅日列夫主义时代。^④ 从1969年到1989年期间，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担任主要的领导人，刚开始是党总书记，然后是主席。他是一个比匈牙利领袖卡达尔灵活并折中得多的领袖。实际上，布拉格之春之后，发生了可能是东欧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产党员清洗运动。将近1/3的党员退党或被清洗。具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员，即使留在党内，也是保持沉默或者被边缘化，这与匈牙利截然不同。^⑤

再一次与匈牙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以党执政的国家坚持经济上的

① 关于“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的相对势力，参见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1989—1997 和 Tim D. Whipple 主编的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Václav Havel and the New Leaders of Czechoslovakia Speak Out*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1) 一书里 Jan Urban 的文章 “The Politics of Power and Humiliation”, pp. 269—270。

② 上述两句引言均来自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p. 166。

③ 关于该政权实施的控制天主教堂的全面的五点战略以及1986年后教堂的些许恢复，参见 Sabrina Petra Ramet,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zechoslovakia, 1948—1991”,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Dec. 1991): pp. 377—393。在1993年对10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捷克受调查者中“从未”或“很少”去教堂做礼拜的比例是第二高的（68%），与相应比例只有16%的波兰有着天壤之别。参见 Rose 和 Haerpfer, “Adapting to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表35。在同一项调查中，捷克共和国的无信仰者比例最高（47%），几乎是两人中有一人。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无信仰者比例最低（2%）。出处同上，表34。

④ 关于布拉格之春的经典著作是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⑤ 扬·乌尔班（Jan Urban）是天鹅绒革命市民论坛（Civic Forum）的领袖之一。他的父亲曾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高级成员。乌尔班写道，苏联入侵之后，“大约有50万共产党员被清洗掉，大约80万党员失去他们的工作。从那一刻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CPCz）把自己放到了与社会中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势力对立的立场上……该党再也无法改革。从此以后，它只能通过贪污腐败和制造恐惧来控制人民。‘改革’一词成了咒语。”参见 Urban, “Politics of Power and Humiliation”, p. 276。

正统性。转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从未尝试过任何市场或改革试验。因此它极少借鉴西方,从而也不用遭受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由于负债而不得不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压力。^① 196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活,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几乎体会不到在波兰、匈牙利或斯洛文尼亚那里通常能感受到的活力、卓越与激情。由于缺乏民主德国人在联邦德国所能享受得到的发达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因此也就不存在大量出路选择足以引起政权的瓦解。^② 胡萨克对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全盘认同以及党内改革的缺乏,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反对戈尔巴乔夫思想。

319 该政权与全能主义理想类型距离最远的场域在于多元主义的程度——尤其是在允许公民社会表达异议方面。苏联,甚至是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安全与合作会议(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35个成员国之一,于1975年签订了赫尔辛基最终法案(the Helsinki Final Act)。所有赫尔辛基法案的签约国一致同意对人权进行国际监督。捷克斯洛伐克对赫尔辛基法案的遵守为其国内人权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机会。^③ 尽管经常遭到监禁,一些组织,比如七七宪章(Charter 77)和保护受迫害者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Unjustly Persecuted),依然开展着活动,从1977年一直到1978年天鹅绒革命发生,都或多或少持续着。^④ 和匈牙利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全能主义并没有朝着任何能够最终跳出模式的变化方向发展,但是,作为对顺从的回报,政权当局很少努力去动员群众的热情。

到此为止,由于我们首先讨论了威权主义波兰和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匈牙利,因此还未真正对后全能主义文化生活的面貌和氛围加以描述,虽然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讨论了典型的后全能主义对政治的规避和空洞的意识形态。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引用两位雄辩的作家瓦兹拉夫·哈维尔和提摩西·加顿·阿什的话,他们探讨了在僵滞的后全能主义中“过着虚伪的生活”对政权的局

①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 427.

②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in Conceptual History", *World Politics* 45, no. 2 (1993): pp. 173-202.

③ 关于赫尔辛基权利法案对东欧民主化的重要性,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89-94.

④ 关于这些独立组织的一个有用的详细目录,参见赫尔辛基监督报告: *Toward Civil Society: Independent Initiatives in Czechoslovakia* (New York: Helsinki Watch, 1989)。

限性和政治反对派在组织上的局限性意味着什么。^① 我们用“僵滞”这一说法是为了理解这样一种概念：该政权既不处于后全能主义早期的几个月（就像从多元主义角度来看不的 1989 年的保加利亚），也不处于从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朝可能跳出模式的方向演变的阶段（就像 1980 年代末的匈牙利）。从 1968 年到 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僵滞的、由内部腐化导致的后全能主义政权，在一些小地区则是通过社会征服而形成后全能主义。

在后全能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内，影响最大的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是七七宪章运动，它的成员虽然都十分爱好和平，却经常遭到监禁。^② 宪章运动派的创始领袖之一，剧作家瓦兹拉夫·哈维尔，描写了那些努力“生活在真理中”的独立思想家们所形成的“并行文化”。1981 年，有 1000 万波兰人注册加入法律认可的独立工会。哈维尔于 1984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前一年）写道：“成百上千，或许成千上万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人——老的，幼的，富有天赋的，天生愚笨的，有信仰的，无信仰的——都在‘并行文化’的庇护下聚集起来，而这完全是由一个几乎不能容忍任何事物、思想极端狭隘的政权导致的。”^③

提摩西·加顿·阿什，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同样于 1984 年的写作中恰当地解读了捷克斯洛伐克僵滞的后全能主义特征。鉴于一个全能主义政权极力去“动员群众激情”，加顿·阿什继捷克伟大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之后，称胡萨克为“忘事总统”（the President of Forgetting）。“忘记过去是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政权曾经对其人民说：忘记 1968 年。忘记你们的民主传统。忘记你们曾是享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忘记政治。作为回报，我们给你们舒适的生活……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相信我们或我们虚幻的意识形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只是你们表面的、公开的服从。”^④

320

领导阶层，远不具有领袖的个人魅力，缺乏具有改革意识的全能主义理想

① 没有哪一文献比我们要参考的瓦兹拉夫·哈维尔和提摩西·加顿·阿什的作品更好地说明了僵滞的全能主义意味着什么。现在发现，我们所用的“僵滞”一词效仿了被加顿·阿什称作“Czechoslovakia under the Ice”之中的一篇随笔。

② 关于七七宪章运动早期历史的一份出色的探讨，参见 H. Gordon Skilling, *Charter 77 and Human Rights in Czechoslovaki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③ 参见 Václav Havel, “Six Asides about Culture” (1984), 载于 Jan Vladislav 编: *Vá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 128。

④ Timothy Garton Ash, “Czechoslovakia under the Ice”, 收录于 *The Uses of Uni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p. 62。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类型的党内军事人才,是一帮十足的急功近利的后全能主义者。加顿·阿什写到:“这个党派无异于一个只追求自身利益的联盟……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是僵滞的——一个自布拉格之春以后长达十五年的冬天……这个被清洗过的、受惊吓的、腐败的统治机器不再有任何改革的动力。比较年轻的政党领袖具有强烈批判精神——但也只是愤世的嘲笑和私下的批评;而大部分的捷克人不再对党指望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政治(事实上是整个公共生活)如此极端无足轻重的国家。”^①

哈维尔发现,一个曾经起着动员作用的党组织内部缺乏真正的政治多元主义,成员之间互不信任、关系平淡。“后全能主义体系统治下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消除……由此产生的缺口被意识形态仪式所填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治事务的兴趣自然也就衰退下去……个人无须相信他们所有故弄玄虚的东西,但必须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他们不得不在虚伪中生活。”^②

哈维尔在他写给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的著名的信中几乎提到了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的所有有关后全能主义的主题;他谈到了“自我疏离”,谈到了“伪装原则”,谈到了“政治隔离”,谈到了“逃离当局所欢迎的公共活动范围”。^③哈维尔提出的希望是,并行文化将会增长,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与后全能主义党政国家的“第一文化”长期处于紧张关系。同时,他还坚信“集团核心的权力转移将会影响情形”的前景。^④

提摩西·加顿·阿什在1984年的写作中认为,一个波兰式的“自我组织”型社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无法获得发展,但和哈维尔一样,他对一种由外及内的变革抱有希望。

当然,宪章主义者认为捷克的团结就像是冰下之火。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地下出版物反传统文化的发展、个人思想的逐渐疏离加上经济和政治的停滞不前,这些至少已经使得底层的冰冻开始融化。假如冰冻

① 同上, p. 63。

② Václav Havel 等编,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Armark, N. Y.: M. E. Sharpe, 1985), 引自 p. 49 和 p. 31。

③ Havel, “Letter to Dr. Gustáv Husák”, in Vladislav, Vá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pp. 3—35.

④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Vladislav, Vá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p. 105.

从上面真正开始融化,将会如何?在莫斯科政变之后?……他们从1968年的自身经历懂得了……一个看似充满迷雾、冷漠无情、支离破碎的社会如何突然地被改造成一个清晰明了、团结统一的公民社会;个人思想如何能变成公共思想;一个国家如何能重振雄风。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冰下奋斗着、期待着……^①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冰层下如何生活?1988年、1989年,除了七七宪章以外,还涌现出了许多团体,但他们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他们是公民社会中的反对团体。当然与波兰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人口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与1988年底发展成为政党的匈牙利社会运动相比,它们是渺小的、无组织的、反政治的。七七宪章的一个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扬·乌尔班,在他的一篇写于斯洛伐克分离前夕的自我批判的文章中说到:

1989年夏,我们收到了一份写给党的宣传人员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是建立在捷克斯洛伐克秘密机关(StB, the Czechoslovak secret police)为政治局准备的一份分析报告基础上的。在这份文件中,StB估算“反社会主义对立派”的中坚力量大约由60人组成,他们背后约有500个支持者和合作者。他们的估算是正确的;并且一直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这个政权是不可征服的,一直到它自己瓦解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反对派……我们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非社会。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敌人和他——怀恨的私生子——突然逃之夭夭了。没有了他,我们被遗落在一个未知的、分裂成原子的非社会里——带着统治这个社会的权力。如果共产党员讨价还价的时间能长一些,或是试图进行反抗,新的掌权的精英至少已在如何组织政治支持以及把它机制化的重要性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由于轻而易举地获得权力,我们反而变得盲目,而没有去思考它的本质与机制……由于我们自身在改革之前就作为政治产物以反政治的姿态存在,所以我们注定要失败——除非我们

^① Ash, "Czechoslovakia under the Ice", p. 70.

本身变成政治家。如今,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失败了。^①

这些引言让我们洞悉,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探讨的,为什么在后全能主义政权中,更有可能的转型道路是瓦解,而不是谈判;为什么反对派,惊喜于意外的成功,却通常未发展起一条明确的政治路径。

我们已经讨论得足够多了,现在可以分析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于匈牙利,没有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匈牙利满足了这一公约要求的两个必要条件(和四个有利条件)。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却一个条件都不满足。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强硬政府不给改革中间分子任何在党—国中的发展空间。此外,反对派虽表现得很有道义,却不具有与当政者谈判的能力,事实上,它缺乏用于开展战略和战术谈判所必备的制度组织性。

我们对后全能主义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的第二个角度是,找出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之间的不同点。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会瓦解(正如上面引自厄本的观点),而(正如下面将要论证的)保加利亚政权通过一个调整、镇压和谈判的复杂过程,最终能够把转型置于控制之下?对我们而言,上述句子中最关键的词是“瓦解”。

我们认为,政权瓦解是一种需要投入更多概念上和经验上的工作去研究的现象。可以拿它与“被推翻”和“通过谈判转型”相对照。瓦解不同于政权被推翻,因为它没有权位的大动荡,没有对电视台、政府办公楼、军事基地或通讯网络进行侵占,不管是通过在政变中使用武力,或是通过革命积极分子或是群众。那里没有逮捕、枪杀,也没有原政权领导人在反对派接掌政权、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国家救助政务会(national salvation junta)或军人集团后,为了自保而迅速逃离。从而,也就没有暴力。

政权瓦解也不同于通过谈判进行改革和转型的模式,因为执政者不可能就他们交出权力的条件进行谈判。他们不可能通过强加规则来支配转型、拖延这个过程,或者对未来施加一定的控制。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假如他们试图握紧权力直到选举,就会激起众怒或引发政变。执政者不再指望强制的统治工具来支持他们。此外,从民主反对派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理由就转型的条件展开谈判,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拥有不可抗拒的相应的实力。

^① Jan Urban,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Powerful” (Prague, Nov. 1992)未出版手稿, p. 22。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瓦解是呆板、僵化、缺乏精英代表的后果，这些使得他们无法抢在危机和变化之前做出及时的决定。^① 政权当局并没有主动走在反对派需求之前，而是在行进中被动地做出反应，就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领导层那样，或者当场做出反应，就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这两个案例中，执政者都如此的失去控制，以致用来描述这种转型的最贴切的短语是“政权瓦解”。

所以我们的假设是，政权瓦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外部力量，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当政权受到挑战时，内部发生了众多的、几乎是同时的背叛，尤其在强制性统治机器的中间阶层。^② 为了解释瓦解这一现象，有必要引进“合法性”这一概念。政治中的合法性可以说就是广大人民的信仰问题。然而在面临挑战初期，强制机构人员所认为的合法性则通常取决于上百的、成千的，或至多数万的必须做出和(或)执行命令的国家机关成员的信仰。

323

在危机情形下，按照韦伯的说法，问题在于统治者手下的强制执行人员是否相信使用武力的命令具有合法性。韦伯认为：“通常情况下，要控制大量人民，需要有一群工作人员，即一个特殊的团队，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受到信任，负责执行一般政策以及具体命令……习俗、个人优势，或者纯粹只是团结带来的诱人或理想的动机，这些都不足以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来维护现有的统治。此外，通常还有一个要素，即对合法性的信仰。”^③

我们没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数据。不过，为了准确探究韦伯提出的问题，丹尼尔·弗里德海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针对秘密危机管理小组(Einsatzleitungen)的119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一项出色的调查。

弗里德海姆写到，他“所选的样本是柏林、德累斯顿(南部)和罗斯托克(北部)这些地区的秘密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从中央、地方和当地三个层面来

^① 关于政权转变中时机选择的关键作用，参见 Juan J. Linz, “Il fattore tempo nei mutamenti di regime”, *Teoria Politica* 2, no. 1 (1986): pp. 3-47.

^② 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是其中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幸运的是，耶鲁大学的丹尼尔·弗里德海姆正在写一篇关于民主德国瓦解的论文，并保证它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他的初步发现成果刊登在“Regime Collapse in the Peaceful East German Revolution: The Role of Middle Level Officials”一文(向第八届欧罗巴主义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芝加哥，1992年3月27日-29日)。克劳斯·奥菲在他的 *Der Tunnel am Ende des Lichts. Erkundungen der Politischen Transformation im Neuen Oster*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94)第2章里也分析了民主德国瓦解的过程。

^③ 参见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 pp. 212-213. 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再参见同一卷韦伯关于国家威胁使用武力的讨论(pp. 53-55 and pp. 314-315)。

看,这些小组均聚集了高层党支部书记、政府代表、正规警察、军队和秘密警察指挥官,他们手中掌握着是否使用武力镇压 1989 年秋游行示威者的决定权”^①。根据韦伯的标准,这是有关统治者“强制执行人员”的很好的例子。这些执行人员在 1989 年秋究竟是怎么想的?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人们一直重复问我们,为什么东欧的共产党员没有开枪镇压游行示威者以维持他们的统治? 弗里德海姆的调查给出了有力的答案。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组问题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强制执行人员中,有 97.4%的人加入共产党(SED)时相信,“没有其他政治体制能够更好地实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目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消亡之前,仍有 65%的人相信这一点。然而,他们对国家使用武力镇压所谓非法抗议的合法性的信任度却骤然下降(见表 17.2)。

324

表 17.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强制执行人员对国家有权
使用武力镇压其所谓非法反抗的信任度的下降

问题:(1)和世界其他任何政府一样,即使有某些公民的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总是试图执行它的法律。当你开始你的党内工作生涯时,你是否相信国家有权使用警力抵制非法抗议?(2)1989 年秋,随着越来越多的公民离开你的国家或者上街游行,你是否依然相信国家有权这么做?

回答	占被调查者的比例	
	过去	1989 年秋
完全相信	78.4	8.8
几乎完全	18.9	21.2
小 计	(97.3)	(30.0)
抱有怀疑	0.9	31.0
不相信	1.8	38.8
小 计	(2.7)	(69.9)
合 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Daniel V. Friedheim, Ph. D. dissertation in proce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本数据复制已征得同意。

一些分析家们认为,假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早期对抗议者们使用大规模强制措施,那么这个共产党政权可能就能避免随后的瓦解。然而,当弗里德海姆问 GDR 强制执行人员,他们认为是否有可能使用武力时,他们的回答表明,在当时欧洲背景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如此使用是不合法的,也

① 来自他的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论文的一份草稿。引用已经作者本人同意。

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

把这一有关 GDR 经验事实的补充考虑进来，让我们更为正式地陈述关于政权如何瓦解的观点。当一个政体处于危机的生死关头时，国家一些主要的强制执行人员却开始躲避、反叛或离去。看到这一支有效队伍突然消失，示威队伍便不断壮大，精神上得到了鼓励。在某一时刻，可能会由于反政权示威者太多，政权捍卫者过少，导致政权领导者完全丧失了谈判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权更多的是自己瓦解掉，而不是被推翻。^①

让我们仔细了解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整个过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始倒塌。8天以后，即11月17日星期五，在一个政府批准的悼念在纳粹侵略中第一个受害学生的游行中，其中的学生把它变成了一场反政权的示威游行，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星期天早上，哈维尔和绝大多数持异议者的领袖在乡村度假，那些学生决定继续抗议罢工。当天下午，他们在一家公共剧院宣读了罢工宣言，当时剧院里聚集了许多戏剧导演和普通观众。一场关于和平总罢工的讨论拉开了帷幕。

325

在进一步探索事情进展之前，让我们首先设置一些参数以帮助读者理解“内部瓦解从多早便已开始”。11月21日，星期二，在布拉格，哈维尔第一次在一场露天集会上发表了演讲。11月26日星期天，Letná 发生了一场大型的示威活动。11月27日，星期一，发生了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总罢工（采用了十分和平的方式，许多工人同意罢工后通过加班把错过的工时补上）。然而，政权当局却遭遇了核心机关内部大规模的背叛，甚至在哈维尔发表演讲之前。^②

共产党青年联盟(the Youth Un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主席瓦西里(Vasil Mohorita)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占有一个席位，且该联盟拥有自己的报纸，叫《青年前线》(Mladá Fronta)。11月19日，星期天晚上，青年联盟发布了一份请求，要求对殴打学生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对国家使用武力表示谴

^① 关于上街抗议者的害怕会随着抗议人数的增多和政权强制姿态的弱化而减少的一个有用的模型可以参见 Gary Marks, “Rational Sources of Chaos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 载于 Larry Diamond 和 Gary Marks 编: *Re-examining Democrac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1992), pp. 47-69, 尤其是 pp. 53-55。还可以参见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44, no. 1(1991): pp. 7-48。

^② 有两篇文献对天鹅绒革命进行了逐日的、长达一本书的叙述，再现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它们是 Bernard Wheaton 和 Zdenek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Czechoslovakia, 1988-199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和 John F. N. Bradley, *Czechoslovakia's Velvet Revolution: A Political Analysis*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2)。

责。“大部分年轻人呼吁而且支持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根本和实质的改革……我们认为当前形势寻求一种政治解决办法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是不民主的……在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对特定事物实行永久的禁止。”^①星期一上午,该共产党青年联盟“把它所有职员办公设备交给了罢工委员会,这些设备带有电话和复印工具,为罢工委员会直接联络群众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②。当天,“一位巡警要求守卫一所技术高校大楼的学生把玻璃窗上的罢工海报取下来,学生没理会他,之后在该高校或其他学校、院系,再没有类似警方行为的报道”^③。

11月21日,星期二一大早,政府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后,发表了多种宣言,表示他们将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方法”抵制进一步的反社会主义行动。^④但是,当天下午,哈维尔在他的第一场大型公众游行中发表了讲话。游行者们明显看出了警察的摇摆不定。“在游行中碰到的警察都有意展示着他们翻领上国家的颜色,这标志着他们与游行者是团结在一起的,也被视为是支持哈维尔的。”^⑤

11月22日,星期三,警察开始把他们的所作所为用文字表达出来:“我们,作为布拉格北部地区警察队伍中基层党组织的共产党员,转而投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你们……最近几天发生的事迫使我们为了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而不得不选择一个立场……那些法治官员们不再可能利用我们来掩饰未解决的政治和其他问题。”^⑥

同一天,在哈维尔演讲之前和之时,国家统治机构内部的其他部门也遭遇了背叛和反抗。国家电视台总监被要求参加了一个集会,在集会上,他的1500名员工中有700名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字,提出包括播放有关警察残酷行径的录像在内的许多要求。他最终有条件地做出了让步。^⑦在国家无线电台,“300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CPC)基层组织成员聚集起来,谴责了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并表达了对市民论坛(C. F.)的支持”。他们还要求每天开放两

① 全文参见 Wheaton 和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pp. 209—210 附录 B。

② 同上, p. 60。

③ Bradley, *Czechoslovakia's Velvet Revolution*, p. 78。

④ 同上, p. 79。

⑤ 同上, p. 85。

⑥ 文件的全文参见 Wheaton 和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pp. 204—205。

⑦ Wheaton 和 Kavan, *The Velvet Revolution*, p. 67。

个小时广播用于公众讨论，“以反映出不同部门人民中的多元主义趋势”^①。

1948年，布拉格外面的工厂工人在共产党政变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工厂里的民兵是政权储备的强制机构的一个关键部分。11月21日，星期二，布拉格城市委员会(the Prague City Council)强硬领袖米罗斯拉夫·斯蒂潘(Miroslav Stepán)向“布拉格工人，即人民民兵组织成员，以及其他武装单位”求助，“以对付反社会主义势力”。^②民兵接踵而至，聚集在愤慨的群众集会中，并公开表决脱离民兵身份。^③在此背景之下，后来被哈维尔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军队指挥官瓦克拉维克(Vaclavík)将军在电视上慢吞吞地发表了讲话，据布拉德利(Bradley)透露，他在讲话中说“军队不会袭击人们”。布拉德利还补充道，“原因显而易见：士兵们不再遵守上级的命令。这是对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一个致命打击”^④。

327

11月24日，星期五，国家内部起初的背叛(原定总罢工实际发生的前三天)已经在政权的精英阶层引发了危机。在中央委员会一次全天会议中，包括镇压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建议都被考虑了进来；会后，总书记杰克斯(Jakes)提交了他及其秘书处和政治局的辞呈。^⑤一直到12月4日，胡萨克宣布辞去总统职位。12月29日，共产党议会投票选举唯一的候选人瓦兹拉夫·哈维尔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瓦解？让我们参考瓦兹拉夫·哈维尔的一个充满智慧、具有预言性的言论。正如他在1975年著名的“致古斯塔夫·胡萨克博士的信”里表达的那样，对他而言，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希望在于出现僵化的政权无法做出反应的某个时刻。“政府当局在麻痹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在使自己陷入瘫痪，从长远来看，他们最终使自己丧失了麻痹生活的能力。”哈维尔认为，当那一时刻到来之时，“惯性的固定负载将会全面崩溃，历史将重新登上舞台”^⑦。哈维尔的希望实现了。这个政权使自己丧失了能力而瘫

① 同上，p. 68。

② 同上，p. 70。

③ 同上，参见文章附录B中的13号文件和17号文件及正文pp. 70—71。

④ Bradley, *Czechoslovakia's Velvet Revolution*, p. 93.

⑤ 同上，p. 98。

⑥ 就匈牙利而言，关于目击者对许多重要事件的叙述可以参见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pp. 78—130。

⑦ Václav Havel, “Letter to Dr. Gustáv Husák” (1975), Vladislav, *Vá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pp. 3—35, 引自 p. 27。

疾,最终瓦解。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假设是,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这种内部瓦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的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体,尤其是意识形态虚假风气的增长、对政权表面上的支持以及公民社会为持不同政见者提供的适度空间——这为其他选择奠定了基础。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后全能主义政体比在其他任何类型的政体更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在一个完全的全能主义政体或在1989年保加利亚那样的早期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意识形态承诺要更趋于真实,至少对于那些执行强制政策所必需的骨干来说是这样的。在一个成长中的、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体中,改革派共产党员具有比较强的谈判能力。在大多数威权主义政体中,政府倾向于通过发动新的政变或利用选举脱离统治的办法来作出反应。

328 在有关西班牙和巴西的章节里,我们本来可以把事件描述得非常近似于、在很大程度上可比于布拉格学生、专家、群众和罢工者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它们对政体的转型和最终消亡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当权者们可以信赖警察(或必要时武装部队)的忠诚与顺从,从未考虑在如此压力下放弃权力。没有瓦解的发生,也没有瓦解的前景。

国家性与柔性分离:一个新制度主义分析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国家性问题。1992年12月31日午夜,天鹅绒革命发生后仅仅三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①已经有相当多的出色的研究准确地关注到了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差异。捷克属于奥匈帝国中奥地利板块的一部分,而斯洛伐克属于匈牙利板块的一部分。在帝国时期,捷克成为帝国中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斯洛伐克仍然停留在耕农水平。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使用不同的、但能够相互理解的

^① 对这一主题的全面叙述,可见 Jiri Musil 编: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Press, 1995)。乔恩·厄尔斯特(Jon Elster)在他的文章“Explaining the Breakup of the Czechoslovak Federation: Consenting Adults or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中独到地探索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六种可能的解释,载于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no. 1 (1995), pp. 36—41。其实,我们这里提供的是第七种解释。有关分裂的文章有四篇,其中两篇出自主要政治参与者(Petr Pithart and Jan Carnogursky),这些文章刊登在 *Scottish Affairs*, no. 8 (Summer 1994)。

语言。斯洛伐克历史上比捷克更信仰天主教。1939—1945年期间，斯洛伐克沦为半独立的纳粹傀儡国。在共产党统治期间，斯洛伐克经历了快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采取的是以苏联为指导的补贴型工业化模式，它导致了斯洛伐克在1989年后市场经济改革运动中更大的结构脆弱性。结果，1992年之前，斯洛伐克的失业率达到11.3%，而在捷克只有2.7%。^①

在承认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存在这些社会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分析家们过分强调群众民族主义情绪对捷克斯洛伐克分裂起着决定作用是错误的。媒体经常提到，国家性问题受到群众“非理性的”和原始情感的左右。然而，根据我们的判断，现有的证据充分表明，1992年6月选举过后，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策划分离；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群众强烈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要求，无论在捷克或斯洛伐克，都从未成为主导因素（见表17.4）。^②

表 17.4 捷克(CR)和斯洛伐克(SR)公民对国家安排的偏好
(1991年11月—1992年7月)(按百分比计算)

329

国体安排类型	1991年11月		1992年5月		1992年7月	
	CR	SR	CR	SR	CR	SR
单一制国家	39	20	34	12	38	14
联邦制	30	26	28	33	19	27
“以大陆为基础的共和国”	20	6	22	6	18	8
邦联制	4	27	6	31	3	30
两个独立国家	5	14	6	11	16	16
不知道	2	7	4	7	6	5

资料来源：经同意复制于 Sharon L. Wolchik,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ost-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p. 180.

基于民意调查协会(the Institution for Opinion Research)所进行的调查。

注：除了该表显示的结果，另外布拉格独立社会分析协会(AISA)主任还为我们提供了1992年

① 对这些和其他差异的讨论及证明，有两篇优秀的文献回顾，它们分别是 Jiri Musil, “Czech and Slovak Society: Outline of a Comparative Study”, 载于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1, no. 1 (1993), pp. 5—21 和 Sharon Wolchik,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ost-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8, no. 1 (1994), pp. 153—188.

② “捷克斯洛伐克很多公民一致认为，民族冲突的增加、国家形式问题面临的重重困难，主要应归咎于政治领导人……1991年底，自由欧洲广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捷克71%、斯洛伐克65%的被调查者赞同或强烈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客们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参见 Wolchik,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Czechoslovakia”, p. 176.

10—11月一项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该结果显示，尽管政治领导们已经同意将1992年12月31日定为分裂日，但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只有22%和19%的被调查者希望两个国家完全独立。“以大陆为基础的共和国”这一选择没有充分定义，但通常理解为一个建立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三个单位基础上的体系。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公民希望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国家的未来。1992年7月，“捷克82%和斯洛伐克84%的被调查者同意，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不应由政客们决定，而只能由公民们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①。

1992年7月，为了进一步确认在联邦（现存的模式）、邦联或分裂三个可能的选择中，人们“最不喜欢哪个”、“最偏爱哪个”，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捷克（47%）和斯洛伐克（46%），最不受喜爱的选择都是分裂。^②

害怕分裂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在捷克，只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分裂后能得到改善，在斯洛伐克，只有34%的人这么认为。^③ 意见的主要分歧在于采用哪种机制设置，联邦或邦联。在捷克，最受偏爱的模式（62%）是现存的联邦模式。在斯洛伐克，微弱多数（38%）的人也是最偏爱联邦模式，但35%的被调查者最偏爱邦联，20%的人偏爱分裂。^④

既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多数群众并不要求分裂国家，那么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并且是如何走向分裂的呢？在能够撰写出一份可靠权威的专著之前，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我们认为，假如没有充分关注这种苏式联邦体制与那些在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权突然瓦解后意外继承国家权力的民主领袖的反政治风格之间的互动，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专著。我们的研究所使用的假设带有浓厚的新制度主义色彩。具体而言，假若没有易于产生僵局的苏式联邦体制，我们怀疑，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差异早已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⑤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些关于制度、态度、错失的机会以及战略精英选择的基本观点和数据。

1992年11月政权瓦解之后，新的民主党人继承了两院制议会（国民大会），但从法律和事实上却可能成为三院制。下议院，即众议院，有150个成员，以人口为依据。上议院同样也是150个成员，捷克和斯洛伐克各75个成

① 同上，p. 178，着重号为我们所加。

② 关于民意调查协会在这次调查中使用的办法，参见同上，pp. 180—181。

③ 参见 Wolchik,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Czechoslovakia”。然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两个组成部分都认为，对方从联邦政府的分配机制中获利最多。

④ 同上书。

⑤ 事实上，考虑到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意的分布状况，或许分裂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着（由于错过时机）最终显得不起作用而又僵化不变的制度。

员。按照法律规定,捷克和斯洛伐克均可以独立商议问题并投票表决。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那些事关联邦运行的问题,宪法的否决权却相当大。一项措施只有在得到两院各 60% 成员的赞成票才能获得通过,不论他们出席与否、投票与否。戴维·奥尔森(David Olson)很好地诠释了少数群体的这种否决权,他认为,哈维尔继承的后全能主义宪法“为少数成员(30)提供了在议会中的否决权,假如他们立场相当坚定或仅仅是缺席……随着联邦主义的日益重要……联邦议会无法就它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国家性问题——通过任何提交的法律”^①。这种陷入僵局的潜在危险早已为戈登·斯基林指出;他在他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典著作中评论道,1968 年后的宪法意味着一个极少数群体就能否决掉“政府项目的批准和对政府的信任票”^②。斯基林继续指出,该宪法并没有真正影响党政国家,它仍然是单一制。由于党一国主导一切,宪法只是一种摆设。一旦发生转型,宪法陷入僵局的潜在性就变得更加现实,因为和标准的西欧议会民主不同的是,在这种苏式制度中,当发生僵局时,不论总理或国家首脑都无权解散议会和要求重新选举。^③

我们刚才分析的此类宪法在党一国体制中可能只是摆设,但在新的民主 331
环境下,它若能更长时间保持不变,便能承受住新的风险。

作为比较学家,我们认为,在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权瓦解后的关键时期,新上任的民主党员可能已经很快地把许多关系到民主制度未来和决策安排的根本问题提上日程。其中一个可能靠前的日程内容是,决定是否选举组成一个制宪议会来批准一项新的更可行的联邦宪法。另外一种选择方式是,由天鹅绒革命当局支持下的哈维尔在他当选总统后不久要求现有的联邦议会修宪。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引证过,这是西班牙阿道弗·苏亚雷斯通过“政治改革法”成功使用的一种方式。

于 1990 年 6 月在超联邦范围内进行选举这一决定(或更确切地说,非决定)以及苏式联邦宪法的否决性特征,严重制约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性问题的解决方式。和西班牙阿道弗·苏亚雷斯不同,哈维尔不决定形成一个全国性

① David M. Olson, “The Sundered State: Federalism and Parliament in Czechoslovakia”(递交 Emory 大学苏联、后苏联和东欧研究中心召开的关于东欧和苏联的比较议会制发展的会议的文章,亚特兰大,1993 年 4 月 9—10 日)p. 7。

②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appendix B.

③ 本书作者与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及苏维埃式体制研究专家 Leon Lipson 的私人交谈。也可参见 Paul Wilson, “Czechoslovakia: The Pain of Divor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9 (Dec. 17, 1992): pp. 69—75。

政党；当他作此决定时，宪法解体的潜在危险加大了。

关于苏式联邦宪法，什么事发生了，而什么事没有发生？不幸的是，在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整个风气没能产生对正式机制问题的足够关注。实际上，和匈牙利或西班牙反对派领导风格截然相反，哈维尔和他的很多亲密顾问都有强烈的反政治、反制度思想。

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前夕，天鹅绒革命的领导者们越来越转向批判他们原先反政治和反制度思想的代价。哈维尔的一个密友彼得·皮特哈尔特(Petr Pithart)原先是市民论坛协调中心(th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Civic Forum)的负责人，后来从1990年到1992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理；他说，哈维尔“低估了沿承下来的宪法的阻碍作用。他觉得天鹅绒革命的热忱将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他们”。正如我们在讨论西班牙时指出的那样，一个统一的全国范围的政党可能有所帮助。然而，皮特哈尔特继续指出，就在天鹅绒革命结束几天后，来自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的领袖们就斯洛伐克市民论坛中的政党机构问题找哈维尔谈话。哈维尔坚持主张他们在斯洛伐克建立各自独立的政党。他们只好离去，最终成立了人民反暴力党(People against Violence)。^① 皮特哈尔特说，这反映了“在有关组建政党的任何事情上普遍存在消极的态度。哈维尔是其中的一个标志。他完全把自己与政党脱离开来”^②。扬·乌尔班继承皮特哈尔特成为市民论坛的协调者，他甚至更批判哈维尔的反政治。“他当选总统，成为市民论坛的领袖和代表，但很快地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于任何政党之上的非党性总统……早在1990年2月，经过好几周的相互隔离之后，由市民论坛(捷克)和人民反暴力党(斯洛伐克)共同组成的代表团不得不强迫哈维尔与他们进行官方会晤。哈维尔在一个接待室里会见了他们，甚至没有邀请他们进入会议室。”^③

332

这种对政治和政党的不屑毫无疑问地导致了这样的事实：1989年的选举活动很大一部分是由位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一些团体组织进行的。实际上，在联邦议会占有席位的总共11个政党中，只有一个政党，即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拥有来自两个共和国的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奠基性选举(founding election)”从意识形态或组织上，对创建一个联邦范围的政党几乎都不屑一

① 1993年12月16日，在布拉格与斯泰潘的交谈。

② 同上。

③ Urban, "Powerlessness of the Powerful".

顾。和西班牙一样(与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同),捷克斯洛伐克确实也有始于全国范围选举的一整套“奠基大选”程序;然而,和西班牙不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阶层并没有为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党做出努力——事实上,不鼓励创建一个政党。^①

柔性分裂发生一年后,斯泰潘分别对皮特哈尔特和乌尔班进行了采访,问他们是否相信哈维尔和市民论坛的领导者们可能顺利使得现任议会修改虚设的宪法。没有人能够准确把握历史上复杂的反事实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当盖棺定论时,皮特哈尔特和厄本都认为,1989年底或1990年初,市民论坛本来能够实现一些关键的变化,比如为两院或制宪议会建立简单多数体系。其他各种不同的方案也可能避免宪法的僵局。但关键在于,重大的制宪问题当时却没有被提上日程。结果是,哈维尔虽然在1991年、1992年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始终没能修改宪法。就解体问题,始终没有举行任何公投。1992年6月举行的投票表决,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均没能获得群众对分裂的压倒性多数支持。然而,它确实选举出了捷克共和国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和斯洛伐克总理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他们掌握着相对多数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议程以及否绝对方的权力。

在1992年6月的“尾声”选举(terminating election)中,弗拉基米尔·麦恰尔领导的政党(HZDS)在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下议院席位竞争中只赢得了12%的选票,而在斯洛伐克上议院席位竞争中赢得的最高相对多数票也只有33.8%。然而,在苏式的两院制联邦权力体系中,这足以使他的政党拥有绝对的权力去否决他们反对的任何联邦体系内部的重大改革。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的联盟赢得了27%的联邦有效票,同样使该联盟拥有绝对的否决权(见表17.5)。

333

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6月选举的两大主要问题是联邦关系的未来以及可选的发展模式。大选之后,瓦茨拉夫在捷克以最高相对多数票(不是绝对多数)脱颖而出;他支持快速过渡到市场的撒切尔式改革,主张中央政府发挥更强劲的作用。而麦恰尔以最高相对多数票(不是绝对多数)在斯洛伐克胜出,他偏爱以缓慢的、更集权的奥地利方式过渡到市场,并主张赋予斯洛伐克更多

^① 关于选举程序和创建全国性政党的重要性,参见本书有关西班牙的第六章以及 Juan J. Linz 和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载于 *Daedalus* (Spring 1992): pp. 123—139。

实质性的自治权。然而,从本质来看,苏式的联邦体系事实上赋予了这两位共和国总理否绝对方的权力;麦恰尔也许接受一个拥有社会经济自治权的邦联国家,但可能遭到克劳斯的否决。克劳斯可能赞同一个联邦国家(只要他能加快他的经济改革日程),但麦恰尔可能会否定他执行市场计划的能力。考虑到他们的不同目标和相互否决权,对双方领袖来说,最理性的解决办法是分割国家。这次分裂,假若说不上一帆风顺,也是和平的,因为两国的界限得到了合理的划分,并且针对双方都想要的部分如何划分,每位领导人都能根据他们对各自立法机关的控制获得一个投票权。^①

保加利亚:始于早期后全能主义的政权控制下的转型

335 有关保加利亚转型的二手的专题文献远远少于关于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献,因此我们的分析不可避免地比较带有尝试性。然而,以我们的一些访谈作为补充,本文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信心断言,与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不同的是,保加利亚早期后全能主义政体发起并自始至终掌控着整个转型;政权的领导者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胜出,靠的不仅仅是相对多数票,还有他们对权力重组的最新主张。是什么原因让保加利亚以如此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截然不同的道路走出后全能主义?从此前的早期后全能主义政权的性质以及民主反对派在政权中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考虑到其周期性和非法性)中,似乎可以找到很大部分的解释。

从全能主义政体的四个维度(多元主义、动员、意识形态、领导阶层)来看,保加利亚在多元主义方面——与匈牙利或者甚至是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到1988年之前一直仍然接近于全能主义的理想模式。

^① 由于一些我们这里不便探讨的原因,捷克共和国从分裂中获得了巩固民主的更好机会。从社会政治学角度看,分裂或许有助于捷克共和国更好地巩固民主,因为这一新的国家几乎没有德国人或犹太人(由于二战的缘故),也几乎没有斯洛伐克人(由于天鹅绒分离),除了摩拉维亚情绪这一可能的例外,它近乎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它应该没有什么重大的国家性问题。同时,捷克共和国在分裂当时选择单一议会模式也有助于避免一些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归因于独立选举产生、掌握巨大权力的总统和独立选举产生、拥有广泛权力的总理。而且,根据我们之前关于议会制的观点,议会制应该有助于创造一个环境,在此环境下,政党能够获得发展且拥有形成持久联盟的动力。应该注意的是,瓦茨拉夫·克劳斯是一个建立政党的政界老手。

分裂却使斯洛伐克多少陷入更困难的境地,因为麦恰尔想要建立一个多数民族国家,但他的国家却有匈牙利、吉卜赛、乌克兰等重要的少数民族。甚至在1994年选举之后,他勉强持有微弱相对多数票。在斯洛伐克,民族国家和民主或许存在着逻辑的冲突。

表 17.5 1992 年捷克斯洛伐克“尾声”选举：各党在联邦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得票和获得席位情况。

对照于上议院否决下议院通过的任何与联邦有关的重要法律所需要的票数

政党	在竞争联邦 下议院席位 中所获的总 票数(%)	5%起始点后 赢得的联邦 下议院席位 (%)	在斯洛伐克 赢得的上议 院票数(%)	起始点生效 后在斯洛伐 克赢得的上 议院席位 (%)	在捷克上议 院赢得的票 数(%)	起始点生效 后在捷克上 议院赢得的 席位(%)	在上议院获 得的席位数	上议院否决 下议院通过 的任何重大 联邦法律所 需要的席位 数
麦恰尔领导 的政党(斯洛 伐克民主运 动)	12	16	33.85	44	—	—	33/75	30/75
瓦茨拉夫领 导的联盟 (ODS — KDS)	26	32	3.66	—	— 33.43	43 49	37/75	30/75

资料来源：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News Digest for June 1992, 38944—45, and David M. Olson, "The Sundered State: Federalism and Parliament in Czechoslovak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Parliamentary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USSR, at the center for Soviet, Post-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Emory University, Atlantic, Ga, April 9—10, 1993.

为了证实这一断言,为了揭示该政权的本质,让我们具体引用德扬·丘拉诺夫(Deyan Kiuranov)有关保加利亚民主反对派诞生问题的一项有价值的研究;丘拉诺夫是成立于1989年2月,保加利亚最具影响的生态公开性组织(Ecoglasnost)的领袖之一。^①他指出,1988年之前曾经有一些个人反抗行动,但“不幸的是,这些真正的英雄举动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效应……他们全心投入,而我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②。丘拉诺夫认为,保加利亚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非政府反对组织是匈牙利人权协会(the Hungary Rights Association),它是由一位名叫爱德华·基诺夫(Edward Genov)的前政治犯于1988年1月在一个小型省城里成立的。基诺夫和其他激进分子很快便被“驱逐出国”^③。然而,支持他们的小型团体在这个国家纷纷成长起来。这些团体“经常遭到逮捕和骚扰;他们被有效禁止有组织地碰面,更谈不上集体行动。实际上,是警察迫使他们转而采取团体前阶段的策略:个体行动。然而,与以往‘烈士’不同的是,他们是为社会所知的(归功于自由欧洲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这使得一切发生了改变”^④。

大约在人权协会成立和解散的同时,位于鲁赛(Ruse)的一个反污染团体创建了一个拥有300名初始人员的支持团队。但是,丘拉诺夫指出,“该团体在开完成立大会之后,再没有集会过”^⑤。在索菲亚,一个团体观看了有关鲁赛反抗运动的电影;1988年3月,30位著名人物(其中有些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成立了鲁塞支持委员会(the Ruse Support Committee)。该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政治局召唤了这30位签字者,谴责他们“创建与现存机构并行的组织”^⑥。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指责实际上是一个界定性的声明,它

336

① Deyan Kiuranov,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lgarian Opposition (January 1988—April 1990)” (芝加哥大学和中欧大学联合成立的东欧宪政研究中心,工作论文,未发表手稿,1991年4月)。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文献也描述了民主反对派晚到的、零星的出现,参见 Roumen Daskalov 和 Boris Nikolov, “Bulgaria, 1989: The Birth of the Opposition” (索菲亚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未出版手稿) 和 Richard Crampton, “The Intelligentsia, the Ecology and the Opposition in Bulgaria”, 载于 *World Today* (Feb. 1990): pp. 23—26。还可以参见 Roumen Dimitrov, “March across the Institutions: Formation of the Bulgarian Opposition, 1989—1991”, *Bulgarian Quarterly* 1, no. 2 (1991): pp. 43—52。

② Kiuranov,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lgarian Opposition”, p. 7.

③ 同上, p. 8.

④ 同上。

⑤ Kiuranov,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lgarian Opposition”, p. 9.

⑥ 同上, p. 9, 着重号为我们所加。

表明,在多元主义这一条件上,1988年的保加利亚仍然接近于全能主义政体。无论如何,政权当局“阻碍了委员会的其他一切活动。成立后两个月,它便销声匿迹了”^①。其他团体成立随后又被疏散。正如理查德·克兰普顿(Richard Crampton)指出的那样,“这种敌对反应在1988年底、1989年前几个月有所加强。这些独立团体中最棘手的领袖都被驱逐了,而很多留在国内的则遭到骚扰和诽谤,这些让人更多的是回想起斯大林主义大清洗,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②。

1989年2月到1989年11月期间,其他一些重要的独立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最主要的要属生态公开性组织(Ecoglasnost)。1989年10月、11月,在索非亚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掩护下,生态公开性组织成为第一个明确开展政治协调公众抗议活动的团体。然而,甚至连生态公开性组织本身都感觉它的生存面临危机,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1989年11月党内政变推翻托多尔·日夫科夫的统治。日夫科夫从1954年开始统治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到1989年保加利亚政治局把他开除。生态公开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德扬·丘拉诺夫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尽管有生态公开性组织的抗议,1989年11月初,政权当局依然掌控着全局。事实上,生态公开性组织的领导者们曾担心,一旦CSCE代表团离城,他们就会遭到政府的大规模镇压。^③“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一直不相信日夫科夫政权会垮台——实际上,事情过后一段时间我还是不相信。生态公开性组织已经为后CSCE阶段做好了充分的防卫准备。我们假定我们一些显要的领袖将会被驱逐。我们计划成立一个无领袖的组织。一些人由于没有公开活动而幸免于难,从而能够尽力去协调一些活动。”^④丘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同样明白,是政权本身,而不是反对派,导致了日夫科夫的垮台。“尽管也思考过相反情况,但我的观点是,绿伞(green umbrella)反对派的活动并非反日夫科夫政变的直接起因……它从本质上属于政党内务。尽管我很希望是,但我并不能把复杂的宫廷政变归功于生态公

① Kiuranov,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lgarian Opposition”, p. 10.

② Crampton, “Intelligentsia, Ecology and Opposition in Bulgaria”, p. 24.

③ 在匈牙利,有组织的反对派同样相对较晚才活跃起来;但不同的是,在保加利亚,支持民主的团体在社会上得到极少的响应,且“保加利亚人普遍觉得,日夫科夫政权仍然有足够的实力解除反对派的武装并阻止任何改革的实质努力”。参见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221.

④ 引自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对德扬·丘拉诺夫的采访,索非亚,1992年9月4日。

开性组织或反对派。”^①

337 第一个独立工会的领导者之一，波德科雷帕(Podkrepa)也持相同观点：“1989年11月的政变是一个党内政变。1989年11月及12月大部分时间，党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党内政变发生一个多月后，我们仅仅向公众发出过一次罢工的呼吁。”^②这一事实与佛朗哥政权后期的罢工发生率、波兰和圣保罗工业带的罢工形成对照。

我们的结论是，保加利亚独立组织的民主反对派的活动仅仅在1989年中期才表现为一股有生力量。在此之前，保加利亚政权在多元主义方面一直接近于全能主义模式。^③甚至在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从1977年到1989年也持续存在着政治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中，有诸如哈维尔等卓越的反抗斗争领袖，且就一系列问题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实际上，随着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的瓦解，哈维尔和他的支持者们作为一种明确的道德选择浮现出来，在公民社会中掌握了实质性霸权。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早期后全能主义保加利亚，反对派的力量相当薄弱，几乎没有闻名全国的领袖，而且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已经被政权当局深深地渗透，导致其领导者屡次被曝光为“告密者”而失去信誉。从数量上与威权主义波兰、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或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匈牙利相比，1989年保加利亚出现的独立运动要少得多。由于权力总是相对的，民主反对派的这一缺点反而强化了非民主政权的能力。现在，让我们转而讨论保加利亚政权是如何发起并控制整个转型的。

党内反日夫科夫政变的两个关键领导人之一，佩特尔·姆拉德诺夫(Petar Mladenov)最后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推选为总书记，并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被人民大会(People's Assembly)选举为保加利亚总统。从他1989年10月24日提交给日夫科夫、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特殊辞呈可以明显看出，

^① Kiuranov,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lgarian Opposition”, p. 15.

^② 引自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对 Boyko Proytchev(波德科雷帕的政治顾问)的采访，索非亚，1992年9月2日。

^③ 甚至个人经济动力都受到严重的压制，导致多元主义的发展非常平淡无奇。几乎毫无个体经济活动，且“基本上未体验过市场般的动力”。参见 Jacek Kochanowicz, Kalman Mizsei 和 Joan M. Nelson, “The Transition in Bulgaria, Hungary and Poland: An Overview”, 载于 Joan M. Nelson 编: *A Precarious Balance: 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4), 引自 p. 10。还可以参见同一卷 Ekaterina Nikova, “The Bulgarian Transition: A Difficult Beginning”, pp. 125–162。

他支持政权但反对日夫科夫。起初，日夫科夫并没有把辞呈传播开来，而下面则是姆拉德诺夫后来传播出去且从未否认的信的摘录。它清楚地表明，他至多是一个坚定的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员。他在信中开篇指出，他的父母均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度过了6年求学生涯。他接下来又强调：

我被任命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和动员部门的主任…… 338
1977年我当选为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我在我们党最高统治机关从事工作已经超过18个春秋了）……我觉得，日夫科夫同志的恼怒和粗鲁[对姆拉德诺夫]的真正原因是，他自身也意识到了他正在把这个国家引向经济、财政和政治的水深火热中……[日夫科夫]“成功地”把保加利亚与世界隔离开来，甚至把它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隔离开来；如今，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处在齐奥塞斯库家族腐败政权的独裁统治之下。总而言之，托多尔·日夫科夫的政策使得保加利亚远远偏离了时代主流……我觉得，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若要让保加利亚适应这个世界，我们的政策就必须更新。即便我们不相信任何其他的人，我们也不得不相信苏联和苏联共产党。^①

在日夫科夫垮台后的第一个月，到底姆拉德诺夫想要改革抑或政体自由化，尚不清楚。但是，当日夫科夫垮台一个月后开始出现公众反政权抗议活动时，姆拉德诺夫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2月启动了一系列自由化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把宣布共产党是社会唯一领导力量的条款1从宪法中删掉。^②

另外一个表明政权控制改革步伐的有关保加利亚转型的重要文献是对保

^① 信转载于 *The Insider: Bulgarian Digest Monthly*, no. 1 (1990): pp. 41–42。在同一期第39页，Kostadin Chakurov, 1988–1989年期间日夫科夫的一个亲密的政治顾问，也证实日夫科夫收到了这封信。

^②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BCP)第十四届(不同寻常的)代表大会上，姆拉德诺夫发表了题为《关于党的重组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建设》(On Restructuring the Party and Building a Democratic Socialist Society)的报告，提出了自由化的基础。报告呼吁一个“以社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并指出保加利亚共产党将要“去斯大林化”。根据 Keesing's 报告“随即引来了一场反映改革者与保守者之间分歧的激烈的争论”。参见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News Digest for February 1990*, p. 37253。

加利亚圆桌会议制的深入研究。^① 在匈牙利的圆桌会议制中,民主反对派首先举行反对派圆桌会议并确定了谈判的坚决原则,即使他们还未就是否进入谈判达成一致;与匈牙利不同的是,保加利亚的圆桌准备会议由安德烈·卢卡诺夫(Andrei Lukanov,政变的领导者之一,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负责协调,他“主持所有的会议,制定日程安排并带领讨论”^②。

反对派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了,因为一些曾经是反对派组织共同创始人的民主反对派领袖,比如 G. 坦波夫(G. Tanbuev)、S. 普罗德夫(S. Prodev)和丘拉诺夫等,都重返保加利亚共产党,其中很多人甚至在圆桌会议开始之前就那样做了。^③

339 1990年1月圆桌会议开始之后,亚历山大·利洛夫(Aleksandar Lilov)当选为共产党领袖,而且,在科拉罗娃(Kolarova)和季米特洛夫(Dimitrov)看来,利洛夫能够“把权力完全掌握在手中并做出让步这样的事实,被大众视为改革和民主化的证明,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因素。不得不强调的是,所有主要的让步都由党的领导人利洛夫正式宣布并大力宣传”^④。由于控制议会,保加利亚共产党还有权把选举日期定在1990年6月,这要早于羽翼渐丰的反对派所要求的时间。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又一大胜利是,他们说服了许多投票者,使他们相信保加利亚困境的罪魁祸首是日夫科夫而不是共产党(即1990年3月以后的保加利亚社会党[BSP])。^⑤

执政党把独裁统治人格化,有功于独裁的垮台并表现出自由化发起者的姿态,反对派内部依然存在分歧,从未视苏联为民族主义的敌人,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几乎空白;在上述早期后全能主义的背景之下,保加利亚执政党赢得了第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这与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有所不同。

① 参见 Romyana Kolarova 和 Dimitr Dimitrov, “Bulgaria”, 载于 Jon Elster 编: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进一步参见 1991 年未出版的原稿“Round Table Talks in Bulgaria”。

② Kolarova 和 Dimitrov, “Round Table Talks in Bulgaria”, p. 12。

③ 同上, p. 8。普罗德夫再次担任党报编辑,“让它变得和反对派新闻舆论一样多彩有趣”,也有利于树立党的新的自由化形象。参见 John D. Bell, “‘Post-Communist’ Bulgaria”, *Current History* (Dec. 1990): pp. 417–429, 引自 p. 420。

④ Kolarova 和 Dimitrov, “Round Table Talks in Bulgaria”, pp. 33–34。

⑤ 比如,在一项选前的民意调查中,60%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支持者把保加利亚的危机归咎于“日夫科夫及其黑手党”,只有7%把它归咎于前共产党。对这些选前民意调查的分析,参见“The Political Change in Bulgaria: Pre-Election Attitudes”, 载于 *Stability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ulgar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Sofia, 1990), p. 15。

我们和多数选举观察家都认为，保加利亚在 1990 年选举中占有许多结构上的优势，但选举基本上还是公平的。事实上，很多选前的民意调查对保加利亚社会党起到了轻微的助推作用。这使我们相信，选举当天没有重大的舞弊行为。民主势力联盟(UDF)在大部分主要城市中获胜，但在农村却表现不佳，因为在那里，即使他们的现代化主张为人所知，很大一部分年纪相对比较大的农村人口也并不信任他们。^①

一些分析家们对此评价比较苛刻，认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地方激进分子操纵了农村投票者的恐惧心理。“那里的人们被警告说，假如他们投了反对派的票，将会被剥夺基本的生活供应。1990 年 6 月以后，保加利亚南部大量穆斯林村民由于支持权利与自由运动(the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或民主势力联盟(UDF)而在事实上被切断了生活必需品供应。”^②保加利亚社会党在 1990 年 6 月选举中取得胜利意味着该党掌控了议会和政府，并在参与 340
圆桌讨论和授权人民代表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它的统治。

选举过后，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改革(形式上或实质上)的激情有所下降。新近更名的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占领着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总部。保加利亚社会党在 1990 年 9 月的一次党代会上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称此次会议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第三十九届党代会(而不是第一届)。在入围最高委员会(the Supreme Council)的 151 名党代会代表中，几乎很少有人强烈认同自己属于改革派。反日夫科夫的党内政变的领导者之一，且曾于 1974—1983 年间担任

^① 参见“The Political Change in Bulgaria: Post-electoral Attitudes”, in *Stability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ulgaria*, pp. 19—38.

^② 参见 Plamen S. Tzvetkov, “The Political of Transition in Bulgaria: Back to the Future?”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2): pp. 34—42, 引自 p. 34, n. 1。对比较分析感兴趣的分析家可能会把保加利亚与巴拉圭进行详细的比较。在巴拉圭, Stroessner 将军的亲密盟友推翻了他的独裁统治, 由于发起自由化改革而赢得声望, 且利用科罗拉多党的资源打倒了一个内部分裂、力量薄弱的反对党, 凭借在农村地区的特别强势赢得了第一次自由选举。

1991 年 6 月的一项调查或许能为我们了解保加利亚社会党(BSP)在农村取得的胜利提供线索。在调查中, 城市和农村的被调查者对“与革命前的体制相比, 你是否更喜欢当前的统治体制”的回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肯定回答分别占了 80% 和 70%。然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有关当前体制的一连串 8 个问题, 农村中回答“不知道”的比例为 42%—64%, 而城市只有 17%—26%。不容忽略的是, 对“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想法的权利”这样的说法, 在农村有 45% 被调查者回答“不知道”, 而在城市只有 17% 的被调查者回答“不知道”。我们推想, 农村如此高比例的人回答“不知道”, 反映了社会控制环境导致了人民的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 农村人尤其偏爱一个国家控制下的经济(78%)。参见 NAPOC survey, “Divisions within Bulgaria: Results of a Surve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havior”,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199 (1992): question 57, 58, 63.

日夫科夫主要意识形态专家的亚历山大·利洛夫,重新当选为党主席。^①

在反对派看来,前共产党的胜利给健康的民主实践在政治社会中的巩固造成了一些困难。公民社会中反对势力最迅猛的发展出现于选举之后而不是之前,街道瞬间取代议会成了政治中心。1990年夏天,一些主要的城市涌现出了大批宿营的年轻的反对者。1990年8月26日,在一个仍然无法解释却危险的事件中,保加利亚社会党总部,据国民大会(General National Assembly)的官方说法,“在一场集体迫害中被焚毁”^②。保加利亚社会学家叶卡捷琳娜·尼科娃(Ekaterina Nikova)因此这样描述这段时期:“从1989年到1992年整个期间,保加利亚政治一直停留在前政治或反政治阶段。革命的论调依然活跃,伴随着对过去、对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对莫斯科及其他各类‘同谋’的不合时宜的偏执的成见。”^③在与早期后全能主义政权垮台后的东德政治颇为相似的情况下,许多前民主反对派领导人由于被揭露曾是前政权统治下的“警方告密者”而失去了合法性。^④

对民主制的态度,最危险的或许要属一些民主势力联盟(UDF)成员不愿接受由保加利亚共产党(BSP)领导的“形式民主”。UDF的一个派系,“深蓝调(Dark Blues)”,反对UDF最初的“浅蓝调(Light Blues)”主流,它对BSP通过形式上的多数原则重写了新民主宪章的道德合法性表示抗议。他们的抗议策略包括退出国民议会上有关宪法的争论。^⑤尤其让他们愤怒的是,这一宪法使得他们很难对前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提起控诉。在新闻界或斯泰潘所做的大量采访中,该派系质疑,形式上的民主宪法程序是否应该优先于公正这一道德原则。按照我们的分类,1990—1991年间,深蓝调派系有时仅仅算是在

① 详文参见 Duncan M. Perry, “The 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 Congress: Conservatism Preserved”,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Oct. 26, 1990): pp. 4—8.

② 对这场火的分析,以及关于保加利亚社会党 BSP 指控该事件是反对派煽动下的暴力以及民主势力联盟(UDF)反过来指控这场火是由 BSP 焚烧罪证引起的,可参见 Mark Baskin, “The Politics of the Attack on BSP Headquarters”,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Sept. 28, 1990): pp. 8—12.

③ Nikova, “The Bulgarian Transition”, p. 137.

④ 最不利的例子涉及 UDF 领导人佩达·拜伦(Petar Beron),他被指控曾为国家安全部门当了多年告密者,因此被迫于1990年12月辞职。参见 Rada Nikolaev, “Between Hope and Anger”,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Jan. 4, 1991): pp. 5—10.

⑤ 1991年5月,50名UDF代表退出国民议会,表明他们不愿与保加利亚社会党BSP合作,但“2/3的反对派代表留了下来,他们认为,以一种更加示好的态度面对共产党员也许能把后者拉拢到民主中来”。参见 Plamen S. Tzvetkov,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in Bulgaria: Back to the Future?”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2): p. 35.

野的半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甚至在 1991—1992 年期间，即 UDF 赢得 1991 年 10 月大选之后，深蓝调激进分子菲利普·季米特洛夫(Filip Dimitrov)担任总理已经一年后，他们也只是参加一些半忠实的活动。^①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直到 1995 年，保加利亚依然是一个发挥作用的民主体系。1991 年被选举下台后，保加利亚社会党开始朝更民主化的方向进行内部改革。在 1991 年 12 月第四十届保加利亚社会党党代会上，党内领导阶层开始吸收大量年轻人担任要职。相反的，民主势力联盟(UDF)面临着更大的困难。1994 年，为了表示对深蓝调长期控制 UDF 的抗议，民主党和其他来自生态公开性组织的主要派系纷纷离开 UDF。生态公开性组织，这一在 1989 年 10—11 月反政权游行中最为显著的公民社会反对派，事实上与 BSP 结成了选举联盟。1994 年 12 月，在第二次直接大选中，UDF 的总得票率遭遇下
342
滑，而 BSP 联盟以 43.5% 的票数赢得了 52% 的席位。1995 年 1 月，随着保加利亚社会党人詹·威德诺夫(Zhan Videnov)宣誓就任总理，政党权力实现了自 1991 年以来的第二次和平交替。^②

1995 年初，UDF 因此再次处于在野位置，但在是否发展成一个政党或保持运动性质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比如说，UDF 仍然给予其组织内 17 个不同派系平等的票权。换句话说，UDF 还有待于从诞生于早期后全能主义环境下、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运动组织的原始的前政治形态，发展成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党。

从先前政体类型的角度来看，1989—1995 年间，保加利亚或许表现得过于民主。对保加利亚案例的分析需要比我们更专业的观察家倾注更多的研究。然而，这里我们提出解释这种“过度”民主的两个假设：一个与制度选择有

^①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1992 年 8 月 31 日到 9 月 4 日在保加利亚进行的采访。一些反对派成员“主张最终的和解，反对报复保加利亚社会党官员的想法”，而另一派系(深蓝调)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尖刻的态度，屡次称保加利亚社会党为‘谋杀者’或‘黑手党’，给人感觉好像 UDF 一旦取得胜利便会对政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洗。BSP 和 UDF 的一些成员都把它称为‘麦卡锡主义’政策”。参见 Bell, “Post-Communist” Bulgaria, p. 427。J. F. 布朗对深蓝调的批判更进一步。他认为，他们导致了 1992—1993 年危险的政治冲突。最该受到指责的不是“前共产党员(即如今的社会党人)，相反的，是‘全能主义’的反共产党人威胁要发动一场暴乱”。参见 J. F. Brown, *Hopes and Shadows: Eastern Europe after Commu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05—114, 引自 p. 113。

^② 这里关于 1994 年选举的信息要归功于 Dessislava Zagorcheva 所写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题为“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ulgaria and Hungary”(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January 1995)，以及 Stefan Krause, “Bulgaria: Socialists at the Helm”, *Transition 1*, no. 4 (1995): pp. 33—38。

关,另一个与保加利亚转型前的公民社会的一个被忽略的方面有关。制度选择方面涉及保加利亚最初使用的议会框架及其持续采用的对少数派代表有利的比例代表制。政府的议会形式为脆弱的保加利亚民主注入了总统制或半总统制所没有的灵活性。比如说,当姆拉德诺夫总统由于可能曾经命令使用坦克对付抗议者而卷入丑闻时,议会有权于1990年8月推选反对党UDF领袖哲列夫(Zhelyu Zhelev),一位富有威望的持不同政见的哲学家担任总统。(随后,1991年7月,宪法引进了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的半议会制。)

深蓝调派在1991年10月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帮助他们进一步回归正常的政治轨道。选择采用比例选举产生议会的方式还意味着,政治利益驱动下的针对保加利亚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攻击从某种程度上软化了,因为两大主要党派都不时地采取一些政策,以便和穆斯林权利自由运动(MRF)结成可能的“盟友”;MRF在最初几场选举中所投的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MRF在BSP少数派政府和UDF少数派政府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搭档。^①

343

我们的第二个解释保加利亚过度民主表现的假设是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个意外发现。就反对派组织而言,我们坚信保加利亚到1988年之前一直接近于全能主义理想模式。然而,大学里的生活和研究者的生活却不如这里所意味的那么接近全能主义理性模式。只要学者们不组织反抗活动或不写批判性的文章,他们就能在国家图书馆中读到出乎意料的广泛多样的材料——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多得多。这意味着保加利亚比我们归类中的早期后全能主义要拥有更多的知识资本。我们很乐意对保加利亚早期后全能主义政体存在的这一特性给予关注。^② 尽管这一假设比较乐观,我们更关注的却是早期后极主义的一些遗留物(即近乎沉闷的公民、政治和经济社会,以及政党和多数群众的强烈的反政治情绪)在多大程度上消极地彼此

^① 实际上,尼科娃断言:“季米特洛夫政府事实上是一个少数派政府,它的命运决定于与MRF的合作。UDF-MRF联盟纪律严格,在重大问题上以一个集团的身份投票……在东欧独特的形势下,一个小型的、以民族为基础的运动却事实上扮演了一个全国政党的角色,从而挫败了UDF和BSP极端分子的联合行动。”参见Ekaterina Nikova, “Bulgaria’s Transition and the New ‘Government of Privatizati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East European Studies Meeting Report, no. 82, p. 1。MRF从1990年到1994年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增强了保加利亚解决其潜在的国家性问题的能力。

^② 这一发现是在斯泰潘查阅布拉格、莫斯科和索非亚多家图书馆截至1989年的藏书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得到了保加利亚学者,比如经济学家Maria Todorova和社会学家Deyan Kiruanov的确认,1989年之前他们曾在莫斯科和保加利亚开展过研究。

相互加强着。因此，巩固民主的一项艰难但必要的任务是如何重建这些舞台。^① 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记录一些真凭实据。在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撤除议会和选举，拥有一个能够快速决策的强势的领导是否是最佳的选择”这一问题，被调查的保加利亚人中，45%表示强烈同意或有点同意。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则更接近我们的“从态度上”支持民主巩固的标准，因为他们分别只有18%和16%的人强烈同意或有点同意这一反民主的观点。^②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后全能主义政体存在各种各样的类型，而且存在从后全能主义政体开始演化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准备探讨下一种对民主转型和巩固来说更为艰难的政体类型。我们认为它是最困难也是理解最少的政体类型——融苏丹式倾向和全能主义倾向为一体。

^① 针对多元主义在经济社会的重要性及其在政治社会中的表现，赫伯特·基奇特(Herbert Kitschelt)指出：“保加利亚向民主的转型是由共产党走在前列、一点一滴形成的，然后它获得了地位，得以规划大部分的经济改革，因为反对派势力中缺乏相应的能够有效组织政治经济改革的精英分子……但保加利亚政治景观中缺乏一支像波兰、匈牙利那样的真正主张自由、支持市场的政治势力。”参见 Herbert Kitschelt, “Emerging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Eastern Europe”(为关于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的会议准备的论文，华沙，1994年9月23—26日)，引自 pp. 14, p. 32。

^② Richard Rose 和 Christian Haepfer,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III: Learning from What Is Happening”,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230 (1994): 表 45。

第十八章 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影响下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

在东欧原华沙条约国家中(包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及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拥有许多特殊性。^① 罗马尼亚的转型最迟发生,政权的终结也最具暴力色彩。罗马尼亚远远未达到召开全国性圆桌会议的政治状态;其继任政权制造了令人震惊的违反人权行为;其国内民主派反对力量尚未赢得任何全国性选举;其前共产党政权高级官员不仅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赢得政权,而且得以连任。这些情况在东欧转型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②

解构罗马尼亚的例外性

用什么可以解释这种例外性?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即相对于本书所

^① 本章所用的一些材料来自 Alfred Stepan, "Romania: In a Sultanistic State", *Times Literature Supplement*(Oct. 1992). pp. 26—27。对能得到转载的许可,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② 当然,关于这种例外性,部分原因可追溯至共产党掌权之前的历史时期。在东欧国家当中,罗马尼亚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中最缺乏民主的国家之一,同时本土的法西斯运动异常强大(如米加勒天使兵团和钢铁卫队)。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见 Eugene Weber, "Romania", 载于 Hans Rogger 和 Eugene Weber 编: *The European Right: A Historical Prof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501—574, 以及 Henry L. Roberts, *Romania: 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grarian State*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从这一章的研究目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最好的齐奥塞斯库传记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 Mark Almond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Nicolae and Elena Ceaușescu* (London: Chammans, 1992), Anneli Ute Gabanyi 的 *Die unvollendete Revolution: Rumänien zwischen Diktatur und Demokratie* (Munich: Piper, 1990)。这两本书对于理解齐奥塞斯库垮台的政治复杂性很有帮助。Martyn Rady 的 *Romania in Turmoil: A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1992) 一书包括了七章关于后齐奥塞斯库时期历史的描述,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当代罗马尼亚史著作。也可以参见 Daniel Nelson 编: *Romania after Tyrann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提及的其他转型进程,关于罗马尼亚转型的基本“史实”大多存在着争论。例如,导致齐奥塞斯库倒台的暴动首先在一个叫蒂米什瓦拉的小镇开始,在下列问题上就存在激烈的争论:蒂米什瓦拉有多少民众遇害?是谁杀害了他们?是否蒂米什瓦拉及后来布加勒斯特的暴动是内部引发的由共产党人所操纵乃至一手策划的事件,目的是利用这一事件导致政权的自我终结?^①在罗马尼亚国内,对这种国家例外性的主要解释包括各种不同版本的“被捕获的革命”论(captured revolution)及阴谋计划论(well-planned conspiracy)。^②随着1989年冬天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倒台,整个国家充斥着病态的欢呼、恐惧、谣言、慌张、信息堵塞及理想的幻灭。关于将发生的一切归因于阴谋论的说法,获奖诗人安德烈·科泽斯库(Andrei Codrescu)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科泽斯库在美国流亡25年后回到了罗马尼亚,他的诗歌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个副标题为“理解投影的含义”的篇章。^③这一篇章描述了一群年轻的学生、诗人、农民及前政府官员站在照相机前,急切地表达他们的看法:在这个处于兴奋中的国家及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秘密警察部队的恐怖分子仍被认为是一个可以逆转革命的威胁,电视新闻频道及罗马尼亚街头充斥着关于水源被蓄意投毒而造成1万、6万甚至10万人死亡的谣言。尽管对于许多人从旧政权皈依革命存有异议,但与其他人一样,科泽斯库对革命者有能力利用电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一现象感到惊奇,并为革命事件的自发性特征所折服。

345

6个月之后的回访,让科泽斯库由情绪高涨转向了悲观绝望。在救国阵线这一新的组织架构之下,旧共产党人以新共产党人面目出现,不仅仅“捕获了革命”(新政权由扬·伊利埃斯库及他的前共产党盟友掌控),还“捕获”了革命的话语与含义。伊利埃斯库总统调动矿工治安维持队攻击革命学生(这些

① 对罗马尼亚感兴趣的比较政治学者非常幸运,因为两位在该领域钻研多年的人类学家对齐奥塞斯库下台的迷思提供了极佳的解读。参见 Katherine Verdery 和 Gail Kligman, “Romania after Ceaușescu: Post Communist Communism?” 载于 Ivo Banac 编: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17—147。关于蒂米什瓦拉谜团的非常必要的分析,参见 pp. 118—122。Michel Castex, *Un mensonge gros comme le siècle: Roumanie, histoire d'une manipulation* (Paris: Albin Michel, 1990), 该书提到蒂米什瓦拉谜团应归结为苏联克格勃的阴谋。

② Verdery 和 Kligman 进一步认为“1989年12月前后所有罗马尼亚人对事件的描述都具有‘阴谋心态’的特征”。Verdery and Kligman, “Romania after Ceaușescu”, p. 119。Nestor Ratches 在著作中用了40页的章节对阴谋理论作了一个回顾,参见 *Romania: The Entangled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91), pp. 80—119。

③ Andrei Codrescu, *The Hole in the Flag: A Romanian Exile's Story of Retur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2)。

学生被科泽斯库视为布加勒斯特所发生的革命中最为可靠的力量)。科泽斯库痛苦地发现,当伊利埃斯库在公开场合对矿工们的爱国热情及纪律性表示感激时,自己的许多朋友也在为其欢呼喝彩。与此同时,在蒂米什瓦拉进行的尸体清点工作中,周围的流民墓场也被计算入内,死亡人数被明显夸大。科泽斯库彻底感到幻想破灭、不知所措,对他来说,整个革命好像是捏造出来的,就像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指挥的美妙的克里姆林宫音乐声的伴随下,上演了一场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担当编剧的电影。^①

346 科泽斯库了解事情真相的困难同样困扰着我们。我们确切地知道在齐奥塞斯库倒台过程中被害人数是 2000 而不是 6 万。从我们的了解看来,科泽斯库的想法很可能符合事实:他认为有一个反对革命的舞台剧在上演,甚至存在虚假的交火,故意的假情报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在起义期间,位于布加勒斯特主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大楼里的伊利埃斯库力量是被秘密警察部队的效忠派所控制的,那么为何中央委员会大楼毫发无损而周围的建筑物却遭受了严重破坏?

我们特别关注科泽斯库的著作是因为其“被编剧的革命”这一说法。这一说法意指存在着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阴险计划,这个计划的某些部分使其设计者能够最终“捕获革命”。在分析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件时,这种解释仍可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在所有发生共产党政权转型的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转型的事实经过最令人感到困惑不解。因而,相比对事件的其他各种描述,“被编剧的革命”这一解释可以使我们尽可能少地陷入模棱两可与自相矛盾的境地。科泽斯库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它描述了所发生的各种相互关联的事件,而在于它记载了“神话”如何被“反神话”所取代这一过程。在我们看来,与其他东欧转型国家相比,对罗马尼亚事件所作的任何描述都必然无法令人感到满意。更确切地说,我们所需的是对事件中的虚假故事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以及故意的假情报究竟发挥了什么功能进行解释——即对革命本身进行解构。关于这些问题,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及杰尔·克林格曼(Gail Kligman)两位人类学家做了极为杰出的研究。两位学者都对那些被认为真实的事实描述和证据作了细心的筛选甄别,查阅了几乎所有的文献材料。不过,他们真正关注的是术语本身,经由这些术语,发生在罗马尼

^① Andrei Codrescu, *The Hole in the Flag: A Romanian Exile's Story of Retur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2), p. 206.

亚的事件——矿工、示威人群、救国阵线、革命及新共产主义，被人们所体验、描述及理解。这样做会有许多的斜体术语，但它们有助于说明事情的真相。^①

分析罗马尼亚的转型，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性质，并将罗马尼亚政治置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东欧原华沙条约国家中，罗马尼亚国内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最为薄弱。事实上，由于公民社会力量太过弱小，以致两个具有革新精神的罗马尼亚社会组织——“公民联盟(Civil Alliance)”与“社会对话组织”中的许多成员抱有这种想法：为了给公民社会一个发展的机会，罗马尼亚应回归君主制。

当我们将罗马尼亚与波兰、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等置于一起进行考察时，罗马尼亚所具有的例外性最为明显。无论怎样对后面几个国家进行政治学上的归类，这些国家在政治转型发生前都已经为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提供了生存空间，而罗马尼亚却是一个例外。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罗马尼亚，国家机构中不存在任何自主或半自主的干部升迁机制，甚至统治集团的上层也像家庭佣人一样被雇用、受宠、虐待直到最后被开除。从1972年埃列娜·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șescu)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到1980年代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在一家”，个人独断主义在罗马尼亚呈愈演愈烈之势。

347

本质上说，齐奥塞斯库将罗马尼亚看做他个人的领地。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极端的家族财产式政权称为“苏丹式政权”。与中东政治紧密相连对这个术语来说并不那么恰当，实际上，这类政权有着极广的地理分布，如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政府，尼加拉瓜的独裁者索摩查，都存在极强的苏丹式倾向。从我们的判断来看，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具有的全能主义与苏丹式相结合的倾向进行深入理解，不仅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共产党阴谋论”分析框架或“被捕获的革命”这一说法，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我们清晰了解罗马尼亚的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②

① Verdery and Kligman, “Romania after Ceaușecu”.

② 全能主义与苏丹式的结合并不是像通常想象的那种结合。肯尼斯·朱威特中肯而具有探索性地提出，许多列宁主义政权都具有世袭制倾向。他认为，在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之前，苏联与罗马尼亚政权都具有极强的世袭制倾向。他更进一步分析并加以扩展，用我们在第三章曾引用的马克斯·韦伯的用语来说，就是1957年以苏丹式形式出现的世袭主义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内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参见 Kenneth Jowitt,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Romania 1944 – 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190–197, 引自 p. 193。关于德志统治时期列宁主义与世袭主义的结合及这类结合如何与罗马尼亚传统的个人庇护结构相一致，可参见该书 pp. 147–149。

全能主义：反苏的斯大林主义及后全能主义转型的落空

考察齐奥塞斯库统治的苏丹式成分之前，我们先来检验其所具有的全能主义因素。具体而言，罗马尼亚是否曾接近于后全能主义状态，换句话说，罗马尼亚的整个全能主义控制体系是否曾发生过松动？如果曾发生过松动，那么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是否与其他东欧国家情况不同，全能主义在罗马尼亚又复活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理解个人专断主义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操纵，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同样有利于对苏丹式政权的解读。

当大部分东欧国家在赫鲁晓夫的影响下进行非斯大林化运动时，德志(Gheorghiu-Dej)及其亲密副手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事实上却正在抵制非斯大林化运动。然而，在德志统治的最后两年(1963—1965)，反苏的民族主义与国内自由化相结合，使政权的内部支持度急剧上升。

德志于1965年3月去世后，齐奥塞斯库毫无疑问成为地位最为显赫的政治局成员。三天之后，他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极为讽刺的是，齐奥塞斯库成功地利用对“集体领导制”的倡议及对同僚的尊重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的确，正如肯·朱威特与玛丽·艾伦·费舍尔(Mary Ellen Fisher)在他们极为深刻的研究著作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齐奥塞斯库权力的扩大主要归因于他迎合了那些希望党的领导走制度化道路的领导人的要求。1965—1968年是罗马尼亚发展的重要时期，与早些时候在苏联所发生的情况类似，这一时期党内精英之间弥漫着相互疑忌的气氛。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应归因于政权正在向后全能主义转变。^①

然而，齐奥塞斯库极富技巧性地利用了民族主义，将自己从集体领导制中的领班人转变为无可争辩的领袖。齐奥塞斯库是唯一谴责1968年苏联入侵

^① 朱威特引用了1965年齐奥塞斯库在党代会的一次重要演讲作为其呼吁一个更加体现集体化原则的领导体制的例子。他也指出“另一个导致恐惧气氛的重要因素是精英联盟对秘密警察部队掌权人杰赫西(Draghici)的恐惧，惧怕其可能获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同上，p. 226；也可见 pp. 192—197，pp. 224—228。朱威特所持的观点类似于其分析斯大林死后苏联后全能主义领导制模式时所持的观点，“党内赞同赫鲁晓夫所提倡的党的基本规定，即应排斥斯大林那样的苏丹式领袖及其利用秘密警察对付其他领导人的可能性”，Kenneth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251。关于齐奥塞斯库时期罗马尼亚集体领导制的起落的最广泛的分析，可见 Mary Ellen Fischer, *Nicolae Ceausescu: A study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9), pp. 66—140。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这一行动极大地增强了他在国内外所获得的支持度。齐奥塞斯库所获得的国内外支持使他在领导集体中获得了更大的相对独立性,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批评之外。关于民族主义是如何帮助齐奥塞斯库巩固政权的这一问题,一位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领袖提到:“1968年末,在东欧各国中,唯有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支持。如果要批评齐奥塞斯库,我们需要先越过一种内心的抗拒,因为任何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举动都可以被视为亲苏的表现。”^①另一个类似的状况涉及西方国家领导人,正是他们为齐奥塞斯库提供了打击国内反对力量士气的资源与道德优势。从戴高乐到尼克松,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前往罗马尼亚并赞扬齐奥塞斯库的独立自主政策。来自国际上的喝彩声使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齐奥塞斯库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将反苏运动与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紧紧结合,而齐奥塞斯库则在事实上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反苏斯大林主义模式”。^②

在1969召开的罗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集体领导制寿终正寝。齐奥塞斯库操纵大会修改了党章的一些规定,使得自己在集体领导制之外获取了更大的行使权力的自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原本拥有任命和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权力,这一点也是罗马尼亚集体领导制最为集中的表现。齐奥塞斯库将这一权力转移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因为他个人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更大的个人掌控权。他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因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更难为苏联所操纵,更加民主,而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来也应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③

349

① 出自1992年6月23日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布加勒斯特对帕维尔·坎佩亚努(Pavel Campeanu)的采访。另一位政治观点有所不同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奥维迪乌·特勒斯内亚(Ovidiu Trasnea),1984年国际政治学会的副主席,给出了与坎佩亚努不同的评论,他认为“齐奥塞斯库在1968—1971年间成功地从人民中得到同情,这是他最为辉煌的时期”。马廷·莱蒂(Martyn Rady)也对1968年齐奥塞斯库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而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一情况作出了评论:“齐奥塞斯库对苏联的挑战使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在公众眼中他的生存与罗马尼亚的生存紧紧联系在一起,任何反对他的声音都可被认为是一种对国家的背叛。”Rady, *Romania in Turmoil*, p. 42.

② 马克·阿尔蒙德(Mark Almond)提到,“在今天看来,以其改革愿望为由将杜布切克与齐奥塞斯库归入一类是难以想象的。”参见Almond, *Rise and Fall of Ceaușescu*, p. 67。他更进一步指出,齐奥塞斯库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否定斯大林,在他死前的四个月,他还断言“斯大林在其职位上做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所有事”。

③ 出自前面所提到过的对奥维迪乌·特勒斯内亚的采访,亦参考了Fischer, *Nicolae Ceaușescu*, pp. 152—159。

1971年,齐奥塞斯库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访问中国,并且第一次访问朝鲜(后来他成为朝鲜的常客)。马克·阿尔芒德评论道:“比起正在北京上演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似乎对平壤金日成所受的宗教式膜拜更感兴趣。”^①回到罗马尼亚之后,齐奥塞斯库迫不及待地抹去了较宽松的后全能主义式文化生活的痕迹。^②1974年,在一个模仿君主加冕典礼的仪式上,齐奥塞斯库就任罗马尼亚总统,最终集党和国家的所有权力于一身。^③

苏丹式的衍生

1974年之后,罗马尼亚政权的全能主义特征没有丝毫的减少,与此同时,苏丹式特征却在不断加强。两者的结合,导致罗马尼亚政权范围内完全不存在任何非暴力变革的空间。

在第三章中,我们曾详细说明了一个具有强烈苏丹式倾向的政权在领导阶层、社会多元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动员四个相应领域具有自己的特征。我们先来看看领导阶层这一领域,苏丹式政权在这一领域的特征最为明显。齐奥塞斯库的政策和个人作风清楚表明他不受任何理性与法律的制约,集体领导制与党章在他面前形同虚设,他的统治是高度个人独裁与专断的。

350 在我们看来,苏丹式政权由于其个人专断性及所有权力均源自苏丹这一事实,具有极强的“家天下”倾向。“苏丹制”与全能主义个人独裁的最大区别在于苏丹具有一种极端倾向,即为其家族成员安排重要的政治岗位。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之下,他的妻子埃列娜正式或非正式地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埃列娜拥有多个头衔,包括第一副总理、罗共人事干部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等。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四个兄弟都占据要职。与此同时,其他的政府部长职位根据齐奥塞斯库(通常被称为领袖)的个人喜怒不停地轮换。齐奥塞斯库的哥哥伊列(Ilie),是罗马尼亚国防部总政治部的领导人;他的弟弟尼科拉(Nicolae),掌管着令人咬牙切齿但权力极大的罗马尼亚

① Almond, *Rise and Fall of Ceaușescu*, p. 70.

② 1970—1972年间,摩西·马里察(Mircea Malitza)担任罗马尼亚文化部部长。在出访中国和朝鲜后不久,齐奥塞斯库批评马里察的政策过于宽容,进而取消了一个西方管理学的实验课程,大规模缩减了外语学习,并使所有的意识形态课程都围绕其个人思想来设计。参见斯泰潘对摩西·马里察的采访,1991年6月22日,布加勒斯特。

③ 细节可参见 Fischer, *Nicolae Ceaușescu*, pp. 160—170, 以及 Almond, *Rise and Fall of Ceaușescu*, pp. 70—71。

秘密警察部队的人事大权；他的另外两个弟弟罗恩(Ioan)与佛罗里尔(Florea)，分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及罗共中央机关报《火花报》的要员。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其他占据要职的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尼库(Nicu)，被普遍认为将成为其父亲的继承人。^①

罗马尼亚政权的领导方式也变得越来越个人专断化。齐奥塞斯库的160部“著作”被译成13种文字，罗马尼亚哲学词典中关于齐奥塞斯库式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内容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者加起来还要多。^② 玛丽·爱伦·费舍尔在1970年代中期曾提到：“罗马尼亚所有官员的报告与文章都必须引用齐奥塞斯库的观点，指明曾受领袖思想启发和指引。”^③

在政策领域，齐奥塞斯库的苏丹式领导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没有任何技术专家指导或党内协作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设计了众多的大型工业项目。许多突发奇想的设计及无休止的主干道整改方案，再加上被称为东欧最臭名昭著的建筑——人民宫(The Palace of the People)的兴建，使得布加勒斯特的许多历史建筑遭到严重破坏。^④ 超大规模钢铁厂的兴建也是这种领导方式的产物。^⑤ 齐奥塞斯库个人专断政策中最具破坏性的是提高人口出生率与反堕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工厂里的所有女性都受到了羞辱性的妇科检查，被迫不情愿地怀孕，以致出现大量弃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罗马尼亚

① 关于齐奥塞斯库政权“王朝性”层面的论述，参见 R. de Fleurs, “Socialism in One Family”, *Survey* 28, no. 4 (1984): pp. 165–174, 以及 Ronald H. Linden, “Socialist Patrimonialism an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ase of Roman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no. 2 (1986): pp. 347–379. 关于占据要职的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的名单，参见 Vladimir Tismaneanu, “Personal Power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Roman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4, no. 2 (1989): pp. 177–198, 尤其是 pp. 192–193.

② 参见 Vlad Georgescu, “Romania in the 1980s: The legacy of Dynastic Soci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 no. 1 (1988), p. 82, and Vladimir Tismaneanu, “Ceaușescu’s Social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34 (Jan.-Feb. 1985): p. 63.

③ Mary Ellen Fisher, “Idol or Leader?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the Ceaușescu Cult”, in Daniel N. Nelson, ed., *Romania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1), p. 118.

④ 阿尔蒙德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The Architect of Socialism”来展示苏丹制的片段。Almond, *Rise and Fall of Ceaușescu*, pp. 153–171.

⑤ 关于这些政策及其他一些政策的武断性，参见 Daniel N. Nelson, *Romania: Politics in the Ceaușescu Era*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1988), 尤其是 pp. xiii–xvii, and Vlad Georgescu, “Romania in the 1980s: The Legacy of Dynastic Soci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 no. 1 (1988), pp. 66–93.

医疗系统的脆弱,在孤儿中出现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①

351 全能主义的与苏丹式的倾向的结合,使得所有个人、团体和机构都受到“苏丹”专断行为的干扰。在社会多元化这一政治评估领域,苏丹式的实质在于从党的高级官员到孕妇,没有人能够免于苏丹专制权力的影响。提斯玛尼尔诺(Tismaneanu)巧妙地描述了齐奥塞斯库的个人专制权力:“他像绝对主义时期的专制君主那样羞辱党内官僚(他的奴仆),并将人民看做是自己的财产。”^②这种权力的极端个人化意味着在罗马尼亚不存在任何程度的机构自主性与社会多元性。在共产党内部及一些重要的国家机构如军队系统中,职位升迁体系被完全破坏。正如提斯玛尼尔诺提到的那样,“党的领导地位已经被总书记及其家族的权力所取代。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些官员必须争先恐后对领袖表现自己的顺从……在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之下,共产党的精英群体完全瓦解,政治决策机构完全沦为总统及其夫人手中的橡皮图章”^③。

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会也没有任何自治权。1980年代末,一小部分神职人员开始向政权提出抗议。但正如被称作罗马尼亚的沙卡洛夫的米哈尔·波堤斯(Mihail Botez)所提到的那样,“所有对‘国家—教会’合作模式持强硬反对态度的神职人员都被驱逐出境或自动离开了这个国家。对罗马尼亚来说,他们是微不足道的”^④。

1977年,鸠谷爆发了煤矿工人罢工事件,这是1989年事件之前罗马尼亚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社会骚动。这场罢工的最重要的两位领导者是康斯坦丁·多布列和一位叫朱洛卡的工程师。罢工在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部队的干预及齐奥塞斯库的民粹主义说教之下最终得以平息,不久,多布列神秘失踪,而朱洛卡更是丢了性命。^⑤ 1979年,布加勒斯特的15个市民试图建立一个工

^① 参见 Gail Kingma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in Ceaucescu’s Romania: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no. 3 (1993): pp. 364–418; Daniel J. Rothman 和 Sheila M. Rothman, “How AIDS Came to Romani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8, 1990, 5–8; and Rady 在 *Romania in Turmoil* 一书中有关环境和艾滋病的章节, pp. 78–82。

^② 出自圆桌会议上的讨论,参见 *Romania, A Case of Dynastic Socialism (Perspectives on Freedom no. 11, general ed., James Finn)*, p. 30。这本让人着迷的著作在 pp. 5–91 中重现了1988年末10位罗马尼亚持不同政见者举行圆桌会议时的情况。

^③ Tismaneanu, “Personal Power and Political Crises”, pp. 192–193。

^④ 上页注释中提到的圆桌会议上的讨论。Romania, *A Case of Dynastic Socialism*, p. 76。

^⑤ 同上, pp. 80–81。

会,关于这一事件,尼尔森描述道:“齐奥塞斯库反应极为迅速,主要的组织者韦塞尔·帕拉斯契夫立即被逮捕,其命运不得而知。”^①

与已进入后全能主义状态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没有给第二文化的发展留下丁点的空间。极端的例子包括所有打字机必须在警察局登记(1983年5月第98号法令),与外国人交谈而不向相关部门汇报可以被定罪(1985年12月第408号法令)。^②

352

上一章中,我们曾向读者说明了保加利亚市民社会中自主性组织的数量远少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实。然而,从比较的角度看,全能主义与苏丹制相结合的罗马尼亚对自主性组织的压制,远甚于保加利亚,当时后者已接近于全能主义与后全能主义的临界点。根据自由欧洲电台所进行的比较研究,1989年6月保加利亚拥有13个自主性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具有较高的公共知名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至1989年6月,罗马尼亚仅有2个总部设在境内的自主性组织,而且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在罗马尼亚都不具有公众知名度(见表18.1)。

斯泰潘采访过几位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91—1992年期间,这几位持不同政见者经常受到表彰,原因是他们曾经英勇无畏地印制并派发旨在批判政权的材料。他们对同一个事件有多种不同的描述,因为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单独进行的,实际上,他们甚至需要自己动手制造印刷工具。当他们试图传播他们的批评文章或者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时,他们都在行动之前或之后不久被逮捕。^③ 在本书考察的国家当中,唯独罗马尼亚没有出现成熟的、真

① Nelson, *Romania: Politics in the Ceaușescu Era*, p. xiv.

② 参见 Georgescu, “Romania in the 1980s”, p. 84。在斯泰潘所作的采访中,大量的作者强调这些控制机制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与后果。

③ 拉杜·菲利佩斯库(Radu Filipescu)1992年曾担任人权与选举观察组织 Apador 的负责人。他曾经三次以个人名义制作并派发(在另一人的协作之下)单页的传单作为抗议政权的象征,其中两次遭到逮捕。加布里埃尔·安德烈埃斯库(Gabriel Andreescu),罗马尼亚公民社会的两大组织之一“社会对话”的主要成员,曾花了3年时间试图将一本关于持不同政见者情况的书籍私运出罗马尼亚。当斯泰潘问他罗马尼亚国内有多少人阅读过他的关于不同政见的报告,他回答说,“我害怕太多的人看到这些东西”。安德烈埃斯库因通敌罪被逮捕过,也曾遭国内流放。尽最大努力试图创建持不同政见者刊物的,大概要数记者 Petre Mihai Bacanu(1992年他担任了罗马尼亚最重要的独立报纸 *Romania Libera* 的编辑)。在8个月的时间内,Bacanu 与其他6个同事用废弃的材料制作了“like Gutenberg”,一种可移动的印刷设备,用来制作发行报纸。他们制作了2000份双面印刷的报纸,但在报纸散发之前他们7个人就遭逮捕。被发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试图将组织扩展到30个人以形成一个网络。Bacanu 最后在齐奥塞斯库逃离罗马尼亚的那天被释放出狱。以上这些记述出自斯泰潘1991年6月21—25日、1992年8月25—31日在布加勒斯特对相关人士进行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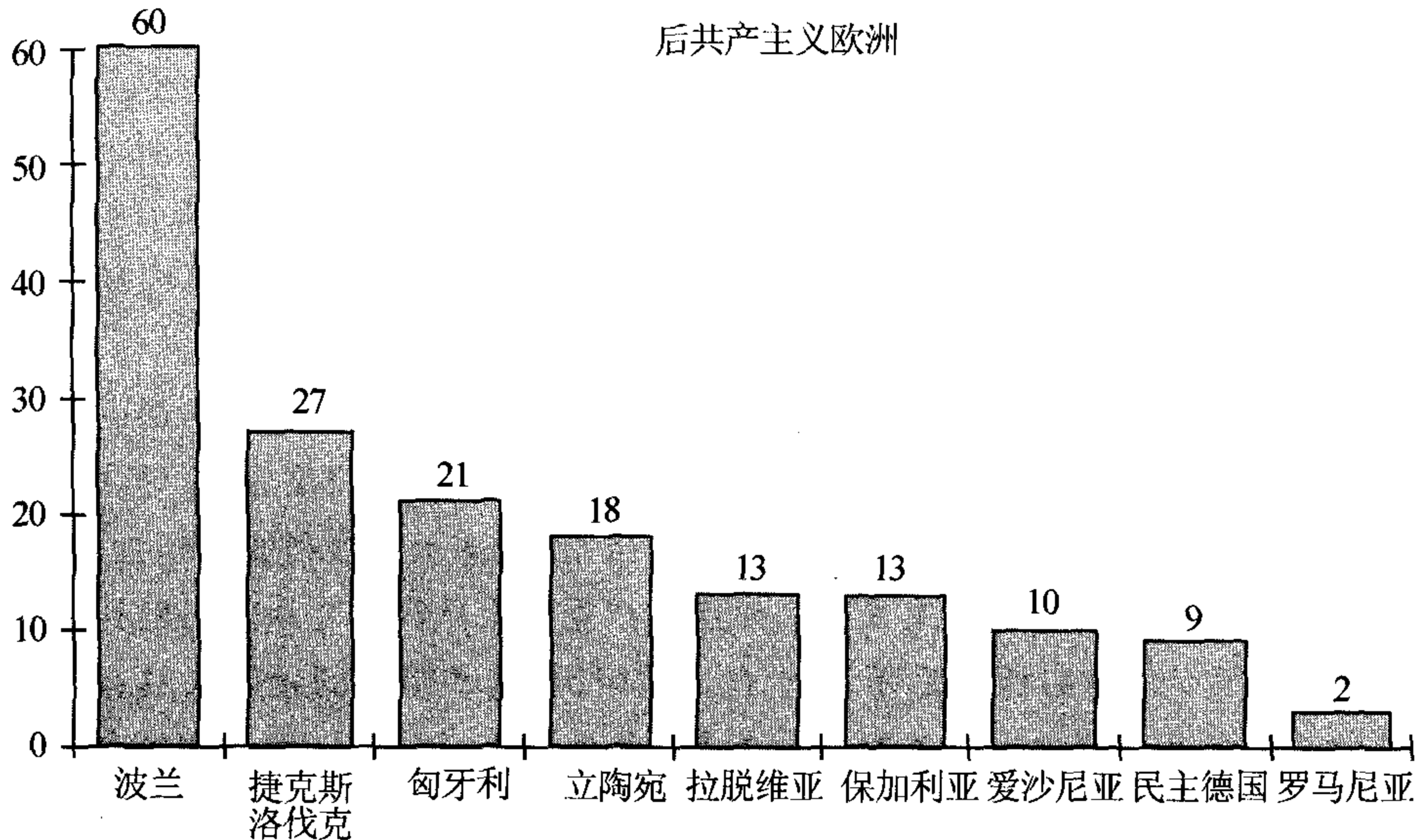


图 18.1 东欧独立运动的数目, 1989 年 6 月

资料来源: Jiri Pehe, "An Annotated Survey of Independent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 RAD Background Report/100 (Eastern Europe), June 13, 1989, pp. 1-29。

353 正的地下出版物。^① 没有任何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 统治者及其秘密警察部门具有强大的渗透力, 使整个国家完全处于恐惧气氛当中。

我们并不是说在罗马尼亚整齐划一的国民当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私下的不同政治见解。不, 它存在着。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例子涉及一个文学评论家。1977—1983 年间, 作为官方指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在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尼科拉·门诺列斯库的指导下, 一个叫做“星期一圈子(Cenaclul de Luni)”的诗人团体经常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聚会。“星期一圈子”的一个成员, 诗人波哥坦·勒夫特注意到, 虽然这个团体尚未有刊物或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他们在逐步形成自己看待事物的新标准。“最好的文学评论家拒绝为歌颂

^① 将来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寻找到一些地下出版物得以出版的案例, 但从目前来看大部分政治活动人士都坚持认为他们从未看到过这一情况的发生。让我们列举一些所采访的重要政治活动家们的说法: “罗马尼亚不存在地下出版物, 偶尔会有人散发一些传单, 但并没有哪怕只涉及一个议题的定期刊物出现。”(Pavel Campeanu) “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的地下出版物, 但有特别幽默的政治笑话。”(曾因政治问题入狱的国家自由党的参议员 Sorin Botez) “没有任何形式的地下出版物, 只是偶尔会出现传单。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因为所有的打字机都必须在警察局登记, 而且每年都要审查一次字样。在齐奥塞斯库时期人们对反对派并不怎么留意, 因为他们并不重要。”(Calin Anastasiu, 社会科学家, 作为反对派的代表在 1992 年 9 月赢得过选举)

政权的糟糕作品喝彩,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价值尺度,而诗人们则通过一种‘微现实主义’的形式描写社会。我们并没有从事政府所禁止的活动,比如直接批评政权,但我们通过评论的方式描述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镜头。我们能够将一个官方的活动制度转变为自由的、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性的制度。”由于官方对“星期一圈子”的活力感到恐惧,1983年,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意识形态部门负责人解散了这一团体。^①

另一个给反政权知识分子以精神鼓舞的事例是两本被广泛传阅的书籍的出版。隐修哲学家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的追随者们编写了这两本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的著作。两本著作在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引入了持不同意见的理念与多元主义的思想,因而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②然而,作为表达思想、生活独立性思潮的事件,“星期一圈子”和两本苏格拉底对话式著作在罗马尼亚被最为热烈广泛地谈论,正表明了在国内并不存在公开的持不同政见组织。

在全能主义统治的波兰,在转型发生前8年就存在一个由工会领导的平行社会,工会拥有的成员数高达1000万人。在具有代表性的后全能主义统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其国内的平行社会由一位剧作家所领导,这位剧作家帮助一个组织在转型发生前的12年内发表了570篇报告。在全能主义—苏丹主义的罗马尼亚,领导者是诗人、文学评论家与哲学家,他们都在其著作或言论中暗含不同的政见与声音,但他们都没有成为全国知名的公开反对力量的组织者。同时,“苏丹”也没有感觉到有全国知名的民主运动或民主人物能够对自己的政治控制力造成威胁。

现在我们转向另一个领域,来看看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确实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体系是全能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但一般来说,这一体系的存在与苏丹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标准特征在这一意识形态体系里普遍存在,如重视集体财产权、党的先锋队角色、乌托邦式目标的表述等等。大规模工业化政策与消除城乡差别的纲要式计划(铲平7000个传统村庄,强制农民住进三

^① 出自1991年8月27日斯泰潘在布加勒斯特对诗人及重要的文化杂志 *Contrapuncte* 的编辑艾奥恩·波哥坦·勒夫特(Ion Bogdan Lefter)的访问。

^② 一本重要的关于文化政治的书籍用一个章节介绍了康斯坦丁·诺伊卡哲学学派。参见 Katherine Verdery, *National Ideology under Socialism: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Ceausescu's Roma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56—301。

层或四层楼房),表明这一抽象的意识形态正以整体化(totalizing)为名对社会各领域进行征服。然而,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苏丹化倾向也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1980年代,这一表现更为明显。苏丹化倾向弱化了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而齐奥塞斯库的意识形态表述也变得越来越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和私人机会主义化。在第三章我们曾提到过一个观点,即苏丹制具备高度专制控制的符号以及对领袖的极端赞颂,但并不存在复杂的具有引导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数不胜数的关于齐奥塞斯库的分析都强调他对意识形态的操纵自如,下面我们将举例进行说明。

我们的一位成员曾向一位罗马尼亚社会科学家请教意识形态对齐奥塞斯库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具有揭示性:

他对意识形态问题非常重视,但他亦具有灵活性,特别留意国内或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以他最偏爱的一个口号是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在他的脑海中,这是一个需认真对待的工作,然而他一直具有解读意识形态的偏好,在其当政的最后三四年里,他丰富社会主义理论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弱。口号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被不停重复……他的意识形态几乎无法再说服他人。对齐奥塞斯库的效忠程度及认同在呈曲线下降。^①

一位欧洲学者在齐奥塞斯库当政时期所撰写的著作中亦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一方面意识形态越来越无法对齐奥塞斯库加以约束,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其追随者行为指导原则的作用也越来越弱。“齐奥塞斯库主义,”他写道,

由于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违背,因而给人一种非真实的、虚构的感觉以及一种充斥不安全、焦虑及不规范行为的卡夫卡式恐怖气氛。作为一种运作方式,它被赋予了权力极端集中、非理性以及夸大式象征等特点……作为政权内部其他中坚分子的一个参量,齐奥塞斯库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因此也表明了可预测参量和标准的无效性,这些参量和标准完全决定于齐奥塞斯库—佩切斯库集团的运动态度。^②

355

① 出自先前所提到的斯泰潘对奥维迪乌·特勒斯内亚的采访。

② Trond Gilberg,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Romania: The Rise and Fall of Ceaușescu's Dictatorship*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p. 56.

于1982年离开罗马尼亚的计算机专家吉尔菲·辛科维奇,其父曾是罗马尼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在1986年提出了下列几个疑问:“今天的齐奥塞斯库究竟是谁?他是一个共产党人吗?或者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是否因缺乏合法性而备受困扰?他是否代表了一种教条?恐怕他什么东西也代表不了……他正接近于艾迪·阿明(Idi Amin)、希特勒(Hitler)、雷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博卡萨,而不是仍受教条驱使的其他共产党国家领导人。”^①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辛科维奇用于比较齐奥塞斯库的四位独裁者当中,除了希特勒之外,都是苏丹式政权的典型。

在本文关注的范围里,作为一种现存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事实上已沦为一具僵尸。凯瑟琳·维德里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罗马尼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治所进行的系统研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研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罗马尼亚并没有得以生根发芽,因为在1980年代,几乎没有人对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严肃的哲学探索。”^②事实上,弗得理的中心论观点可以这样表述:齐奥塞斯库所支持与认可的极端民族主义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罗马尼亚本应具有的普遍性地位。“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打断了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布道过程,因此无论共产党怎样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一过程仍成为损害罗共合法性的重要因素。”^③

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政权特征是关于社会动员领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一特征最难以进行清楚分类。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的确近似于理想的全能主义类型,因为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能进行广泛而深入动员的政权创立的组织”。一位罗马尼亚社会科学家评论道:“没有其他东欧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政治化组织。甚至那些本应不存在任何政治特征的小组织,如‘养蜂者协会’,也由政府一手操办。比起其他东欧国家,这个政府体系更深入地干涉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④当然,星期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志愿性”工作,而由国家发动持续不断的社会动员,既不具有后全能主义的特征,也不具有苏丹主义的特点。

① 见前面所引用过的关于圆桌会议的讨论。Romania, *A Case of Dynastic Socialism*, p. 19.

② Verdery, *National Ideology Under Socialism*, p. 4.

③ Verdery, *National Ideology Under Socialism*, p. 269. 林茨曾与一位由共产党加泰罗尼亚派支持的加泰罗尼亚政府高级职位候选人进行过私人交谈,这位候选人曾是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宾客,在谈到政权时,他认为与齐奥塞斯库政权最相近的是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权。p. 4.

④ 出自先前所提到的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对奥维迪乌·特勒斯内亚的采访。

356 如果说罗马尼亚在社会动员方面存在背离全能主义模式的特征,那么这一特征就是动员的主要目的并非为调动狂热,而是通过减少私人空间和任何形式的不用批准的活动的范围,来保证“苏丹”对人民的严格控制。当然,对齐奥塞斯库进行仪式化的阿谀奉承,既有全能主义因素也有苏丹主义色彩。到1980年代,激进分子和政府骨干队伍都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更确切地说,布加勒斯特的每一个组织和机构都被指派了特别的任务额和领域,完成自己的仪式性责任(ceremonial obligation)。^①

归结起来,通过我们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特别是对1974—1981年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政权在社会多元化、领导阶层、意识形态与社会动员等四个领域的分析,可将罗马尼亚定义为一个体现了很强的苏丹式性质和很强的全能主义性质的政权。

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复杂的历史过程。然而,对一个结合了全能主义和苏丹制特质的政权的性质的理解,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大部分民主转型方案在这个国家都受到了阻碍。同样,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从苏丹制转型后的一个时期内,有组织的民主力量仍然像预测的那样弱小;它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因摧毁了苏丹而获得支持的非民主力量,能够声称自己具有最为可靠的革命性。

“协议式转型”中博弈方缺位

从非民主政权转向民主政权的一个最普遍方式是“协议式转型”。这本书中,我们已经分析了西班牙、巴西、乌拉圭和波兰等全能主义政权的“协议式转型”,也分析了匈牙利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所实现的转型。从本质上说,“协议式转型”是一个四方博弈,在政府之中有强硬派和温和路线,在反对阵营中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从理论与政治两个角度来看,这类民主的协议式转型有两个结构性先决条件:(1)在公民社会和政治领域存在有组织的全国知名的非暴力民主力量,以及(2)在原政权中存在具有意愿和自主性协商进行“协议式改革”的温和派。在一个苏丹式和全能主义相结合的政权中,两个先决条件都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反对派力量,特别是当他们以温和、民主、可见的形式出现时,

^① 关于这种强制性动员与奉承的描述,参见 Nelson, *Romania: Politics in the Ceaușescu Era*, p. 60.

往往被迫销声匿迹。而在政权内部,隶属于苏丹个人的家奴中不可能出现能进行政治转型协商的温和者。因此,四方博弈并没有成为可行的转型路径,因为最重要的两个博弈方根本就不存在。

退出苏丹制:暴力与国际影响的特别角色

357

罗马尼亚民族式苏丹制与全能主义相结合的独特性也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暴力如预见的那样在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为什么罗马尼亚在前华沙条约国家中最迟发生转型。在一个苏丹式政权内,政权引导式民主转型的动机和媒介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共产党的自主性被苏丹主义所侵蚀,事实上排除了实行保加利亚和平模式的可能性。在保加利亚模式中,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可以超越最高领导的权力。由作为组织的军人发动武装政变来解脱也不太可能,这不光是因为并不存在军人政府,而且,一如韦伯所说,在一个苏丹式政权中,由于长时期受到苏丹个人意愿的随意操纵,所有的国家职位和国家组织都缺乏组织自主性。最后,苏丹制与全能主义相结合的政权事实上也排除了这样一种转型可能,即市民社会中具有良好组织性的民主派反对力量在没有暴力因素影响的条件下推翻政权。由于不存在非暴力政权转型的可能性,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与其他形式的政权相比,具有强大苏丹式特征的政权更可能在暴力或革命剧变中终结。^①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有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权、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古巴的巴蒂斯塔(Batista)以及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

这种状况不仅意味着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政权引导型或社会引导型的转型,还意味着外部事件相比内部事件在政权转型过程中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①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具有强烈苏丹式特质的政权在革命起义中被推翻的现象。Jeff Goodwin 和 Theda Skocpol: "Explaining Revolu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no. 4 (1989): pp. 489—509; Richard Snyder, "Combining Structural and Voluntaristic Explanatory Perspectives: Paths Out of Sultanistic Dictatorships", 载于 H. E. Chehabi and Juan J. Linz 编: *Sultanistic Regimes*; 以及 John Foran and Jeff Goodwin, "Revolutionary Outcomes in Iran and Nicaragua: Coalition Fragmentation, War, and the Limi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载于 *Theory and Society* 22 (1993): pp. 209—247。在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前几个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朱塞佩·迪·帕尔马深刻观察到:“齐奥塞斯库正接近于中美洲那些世袭掠夺式的专制政权,因此,公开的压迫和公开的矛盾发生的可能性在变大。”见他的著作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240。

358 色。由于事件的扩散效应,通过自由欧洲电台或匈牙利与保加利亚电视台等媒介,苏联对公开性与改革的关注及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乃至保加利亚的剧变在罗马尼亚国内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① 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以及相比之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影响力的弱小,可以在齐奥塞斯库倒台不久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得到证实(见表 18.1)。如果对这些先决因素给予足够重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罗马尼亚的苏丹式的及全能主义的政权在华沙条约国家多米诺骨牌式崩塌中最后一个倒下。

表 18.1 对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前各类影响民意的重要因素的评估

因素	%
东欧的政治变化	61
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变化	53
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	33
罗马尼亚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28

资料来源:自由欧洲电台 1990 年对罗马尼亚 1500 名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出自罗纳德·林登(Ronald Linden)于 1990 年 7 月 21—26 日在英国哈罗盖特所召开的第四届苏联与东欧研究世界大会上所提交的报告。

对“革命”的“捕获”:苏丹制的角色

大部分关于罗马尼亚转型的学术文献或大众读物都对“被捕获的革命”这一问题感到困惑。扬·伊利埃斯库及其他新共产党人能够毫不费劲地控制住

^① 大量采访表明,活动人士与观察家们特别强调外部事件的重要性。甚至华沙条约国家中倒数第二个崩溃的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的政治变迁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前教育部长马里察评论道:“从 1988 年至 1989 年,我们为能看到保加利亚电视台而感到欢欣。罗马尼亚人能看到南斯拉夫、匈牙利、苏联及保加利亚的电视节目,能获得这种相对的自由度让我们感到吃惊。我们一直瞧不起保加利亚,但到了 1980 年代晚期,一些人开始向保加利亚学习。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糟糕到不能再坏了。我们看了保加利亚日夫科夫的倒台,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也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出自斯泰潘 1991 年 6 月 22 日在布加勒斯特的采访。安德烈埃斯库明确地承认保加利亚人的示威游行对自己的影响,“我看到保加利亚‘社会生态公开性’运动的成功,我也想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社会生态组织”。出自斯泰潘 1992 年 8 月 26 日在布加勒斯特的采访。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人们感到和平的转变不可能发生。用诗人勒夫特的话来说,“在 1980 年的波兰事件、1986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特别是 1989 年东欧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式崩塌之后,我感到我们罗马尼亚可能是一个特例,齐奥塞斯库绝不会接受和平转变的可能”。出自斯泰潘 1992 年 8 月 27 日在布加勒斯特的采访。

蒂米什瓦拉发生的人民起义，这被众多评论家归因于苏联的控制或一个预先策划的阴谋。我们认为，苏丹制本身就可以有力地解释这一现象。

政权的苏丹制成分使得伊利埃斯库能将齐奥塞斯库本人视为政权的化身，并暗示正是他，伊利埃斯库，通过对“九头妖”的斩首行动，完成了罗马尼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变。没有其他东欧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个人的道德愤慨上，进而忽略了对制度的批判。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更小范围内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罢免了其主要的领导人，但这些行动都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政权的抗议游行，无法阻挡民主反对派力量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的要求。

罗马尼亚政权的极端个人独裁与专制，使得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团体捕获了革命。原政权高度个人独裁化的性质使得新的领导人，哪怕与原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苏丹应对这个国家之前所发生的所有邪恶事件负全责。他们通过自己在推翻政权活动中所扮演的显著角色，摆脱了与苏丹式政权的纠葛。

在罗马尼亚，关于国家拯救委员会的广播电视节目将焦点放在批判原政权的个人专断性质上，委员会的公报也在讨论“可憎的齐奥塞斯库家族独裁统治的垮台”。事实上，这一现象能很大程度地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临时政府中伊利埃斯库的同僚们能够迅速地用一个“司法谋杀”结束苏丹的统治。^① 要理解新政权及我们对其自由民主色彩的怀疑，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罗马尼亚所发生的对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审判”及“司法谋杀”，这一事件是与法治及公开审判的原则相违背的。尽管全世界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判决与正式处决的镜头，但处决行动的迅速却让许多人对其操作过程产生了怀疑。这一现象给人一种感觉，即罗马尼亚的新统治者想利用人们对齐奥塞斯库的憎恨使自己避开人民的谴责，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深深地卷入或参与了苏丹的统治。无论如何，对审判和简单处决行为的炫耀对新政权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开始。革命的成功被认为是基于苏丹自身的垮台而不是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不是基于与齐奥塞斯库紧紧相连的广泛压迫性政权机构的崩溃。^②

^① 关于该审判的“肮脏”，参见 Almond, *Rise and Fall of Ceaușescu*, pp. 224—226, 以及 Vladimir Tismaneanu, “Romania: Democracy, What Democracy?” *East European Reporter* 4, no. 2 (1990): p. 30.

^② 这遵从了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的革命临时政府的逻辑与动力，Yossi Shain 和 Juan J. Linz 所编的 *Between States: Interim Government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一书中也对相关问题作了分析。

原政权的苏丹式特质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罗马尼亚的前共产党高级官员赢得了首次自由选举,这一现象在前华约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选举不仅类似于保加利亚,在农村获胜,而且在每一个主要城市都获得了胜利。^① 我们之前已经将原因说得很清楚,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不存在全国知名的民主领袖或团体,也不存在有组织的民主资源。民众起义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几乎是自发的,且被政治所操纵,因此无法产生替代性的政府。在这种环境之下,伊利埃斯库及其盟友们在选举中的其中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仅是“二战”前存在的罗马尼亚传统政党:国家自由党(其领导人在国外流亡多年,革命发生后回到罗马尼亚参加总统竞选)以及国家农民党,第三个对手则是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民主联盟。两个传统政党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在推翻苏丹的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匈牙利人的政党则易受困于民族主义的攻击。^②

与上述情况相比,扬·伊利埃斯库不仅在终结“九头妖”的过程中获得了个人声望,而且革命后他还马上废除了与苏丹个人相关的许多极端过分的措施与政策,从而进一步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后的几周内,强制性妇科检查被取消,避孕套的销售重新出现,消灭传统村庄的运动停了下来,纲要性计划被抛弃,打字机登记条例被废止,出版活动也得以迅速扩散。齐奥塞斯库统治之下的罗马尼亚并不存在个人护照,如果公民被官方允许持临时性护照前往国外,他必须立即将不可或缺的个人身份证上交相关部门保存。齐奥塞斯库倒台一年之后,罗马尼亚外交部声称接近1000万罗马尼亚公民拥有了个人护照。^③ 同样重要的是,伊利埃斯库能够利用他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帮助自己赢得总统选举并帮助救国阵线(NSF)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外汇储备被用来购买肉类食品投放市场,救国阵线临时政府拨款300万美元为救国阵线的出版机构购置新的印刷设备,同时又人为地造成新闻用纸短缺,

① 在其他前华沙条约国家中,只有保加利亚的与前共产党政权紧密相关的力量曾获得过选举的胜利。然而,保加利亚的民主反对派力量强大到能够同时赢得四个主要城市选举的地步,并且在第二轮选举前确保了总统选举的胜利。在非华沙条约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反对派在第一次全国选举中失利,但在所有主要城市都获得了胜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任何的民意调查表明伊利埃斯库在1990年5月的选举活动中曾落后过。

② 关于1990年5月罗马尼亚的选举,参见Rady, *Romania in Turmoil*, pp. 160—174; Roger East, *Revolution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p. 145—146; 以及Nestor Ratesh, *Romania: The Entangled Revolution*, pp. 142—144。

③ 出自1992年6月25日斯泰潘在布加勒斯特对罗马尼亚外交部长Adrian Nastase的采访。

使得反对派出版机构在获得新闻纸资源等方面面临困境。^① 虽然反对派力量获得了一些进入国家电视台的渠道,但救国阵线在影响选举前电视台播放什么节目的决策过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② 实地前往罗马尼亚考察之前,我们曾相信,如果给予反对派力量更多的时间进行选举活动,他们可能会赢得1990年5月的选举。然而,经过两次实地考察之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反苏丹的标志性人物,伊利埃斯库具有个人优势,通过控制国家机构又进而具有了结构优势,因而其支持度实际上随着选举活动的进行在不断攀升。^③ 在这种情势下,在选举日进行舞弊变得没有任何必要。1990年5月20日,伊利埃斯库以85%的支持率当选罗马尼亚总统,救国阵线则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获得66%的选票。^④

过渡政权的非民主话语

361

政权转型的特殊性质通常会影晌继任政权所具有的话语与实践类型。在罗马尼亚这个案例中,转型的特殊性在于它卷入了一场革命起义,但紧接着过渡政权并没有召开圆桌会议或订立相关协议。在第五章中,我们曾分析了一个过渡政府怎样及为何常常会为民主性质的转型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可预见的(亦是可观察到的)主要问题在于,过渡政权倾向于在革命的名义之下进行说教与行动,并且相信他们的行动可以不受民主程序的限制。非民主的革命话语与行动常常会被认为是正常的现象。如果一种政权转型是在革命的名义而不是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那么新的权力拥有者尽管会通过选举活动增强自己的合法性,但其统治常常会以非民主的话语与实践的形式进行。

^① 举个例子来说,救国阵线在拉西镇(Lasi)接管了所有齐奥塞斯库时期办的报纸。“革命后这些报纸除名字外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拉西镇的反对派出版机构却经常无法得到纸张供应,并受到前秘密警察机构所派的暴徒的恐吓,且不被允许使用城市里的印刷厂。参见“‘24 Hours’: An Independent Daily Newspaper Fighting for Survival”, *East European Reporter*, 4, no. 2(1990): p. 43。

^② 参见 Crisula Stefanescu: “Roman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1, no. 23(1990): pp. 42—45。

^③ 伊利埃斯库的主要批评者,同时也是选举民意调查工作的负责人帕维尔·坎佩亚努向斯泰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1991年8月31日在布加勒斯特进行的采访。

^④ 存在一些舞弊行为,但高票获胜主要是基于选举前的结构性因素。不过,关于选举的不规范的细节,可参见 Vlad Socor,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Produces Electoral Landslide”,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1, no. 27(1990): pp. 24—31。

在伊利埃斯库及其救国阵线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不久,他们采取了极为不民主的手段对付已被自己击败的反对派力量。在选举与正式就任总统这段间隙期内,伊利埃斯库的行为表明他将革命置于民主话语和实践之上:使用“警戒行动审判”的形式对付盘踞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他号召(同时提供详尽的交通安排)煤矿工人到布加勒斯特保卫政府并清除城里的“小流氓”。在两天内,矿工们不仅在布加勒斯特野蛮地殴打学生,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两个反对党的总部大楼。^① 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定义性特征在于,它有责任维持法治并在法律范围内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矿工们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新近当选总统的扬·伊利埃斯库前往火车站对他们发表公开演讲。演讲更像是由一个非民主的革命者所发表的,找不出任何民主国家首脑的痕迹。

我感谢这些天来你们所做的一切,也感谢你们这几天所证明的一切:你们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具有高度的公民责任感与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困难时期都可以依赖的伟大力量。整个事件是全欧洲所发生的大事件的一部分。现今存在一个代表极端右派势力的行动,在他们的思维中,欧洲所有的极右势力都应当掌握政权……他们所做的一切,所有他们用来谴责我及其他一些人的口号,如指责我们没收了革命等,就好像真的有人能够把革命盗走一样。事实是极右势力正在试图将罗马尼亚革命转移到自己手中。我们必须保持警觉性……我们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依靠你们。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向你们救援!……祝福大家。^②

362

全能主义兼苏丹制与民族主义:困难的遗产

1992年9月—10月间,罗马尼亚再次进行了总统与议会选举。总统扬·伊利埃斯库轻松连任。尽管国际观察家并没有发现选举有太多的不规范现

^① 参见 Michael Shafir, “Government Encourages Vigilante Violence in Bucharest”, *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1, no. 27 (1990), pp. 32—39.

^② 伊利埃斯库 1990年5月15日对矿工的讲话:“再见!谢谢你们!”全文重刊于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East Europe*, June 18, 1990, pp. 60—70.

象,但是民主派反对力量联盟(民主大会)在议会选举中还是仅仅获得 21% 的选票。

如何进一步理解 1992 年 9—10 月罗马尼亚总统与议会选举之后罗马尼亚的政治走向?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政治走向,我们必须抛开由“编剧式革命”、“被捕获的革命”及新共产主义等解释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当我们谈论发生在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的“编剧式革命”时,我们会低估推翻齐奥塞斯库压迫式政权时“群情激奋的运动”(肯·朱威特使用的令人难忘的措辞)所具有的重要性。用“革命”一词则会让人高估了这些“群情激奋的运动”背后所代表的有组织反对派力量及其领导人与行动计划的重要性。“被捕获的革命”这一说法忽略了伊利埃斯库所具有的临时性投机主义特质及弱点。而新共产主义这一说法则过分强调了齐奥塞斯库垮台之后政府的纪律性和凝聚力,忽略了 1991 年救国阵线内部出现的影响深远的派别分化。实际上,在 1992 年选举之前的一年时间里,面对 1991 年 9 月的政府统治危机,救国阵线中的反伊利埃斯库派别成立了一个包括一些传统自由主义者在内的联合政府,支持政府总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亲密合作政策,并在 1992 年 3 月控制了党的大权。^①

但是,正如总统与议会选举所展现的那样,苏丹式统治留下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政治与社会景象。^② 公民社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法治体系极为脆弱,政治联合充满争吵,大部分的政治倾向都走向了妥协。^③ 在这种情势下,罗马

363

^① 参见 Dan Lonescu, “Romania’s Ruling Party Splits after Congress”, *RFE\RL Research Report*, 1, no. 16(1992): pp. 8—12.

^② 杰尔·克林格曼强调,齐奥塞斯库及其被起义推翻所留下的遗产中,包括了我们所称的“政治社会”的缺失。起义期间,公共意志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表达,然而公共权力不可能总是通过连续不断的街头示威活动来实现……一方面它要推翻一个独裁者,另一方面也需要体现民主参与的公众气氛及创建一个公民社会。当前发生的事件具有仪式化与戏剧性色彩。它们像是从齐奥塞斯库时期传承下来的东西,政治行为被彻底地仪式化,而不是向民主实践迈进。现在所需要的是利益的制度化,这种利益的制度化需要以正式或非正式联合的方式进行。Gail Kligman, “Reclaiming the Public: A Reflection on Creating Civil Society in Roman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 no. 3 (1990): pp. 393—437, 引自 pp. 410—411。

^③ 国家自由党及生态党都出现了分裂现象,1991 年 10 月至 1992 年 4 月间,两党各有一部分人加入政府。1990 年 5 月曾遭矿工们殴打的学生领袖马里安·蒙泰努(Marian Munteanu)于 1990 年 11 月成为公民联盟的第一主席,但一年后就与公民联盟闹翻,自己成立了一个名为罗马尼亚运动的政党,这个政党使用了许多“二战”期间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钢铁卫队的口号与标志。1992 年 5 月,在罗马尼亚战时全能主义及民族主义领袖爱恩·安东内斯库(Iron Antonescu)将军 100 周年诞辰之际,几乎所有的议员一同起立用默哀的方式对其进行悼念。Vladimir Tismaneanu, “Endangered Democracy: Emerging Pluralism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民主的新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比勒基奥(Bellagio),1992 年 12 月)。

尼亚的反对派力量没有能力发起一场由卓越政治人物领导的有纪律性的民主联合运动,也无法将它的信息传遍罗马尼亚每一个角落。而就在1989年,反对皮诺切特的政治力量在智利却做到了这一点。罗马尼亚的反对派力量仅仅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1%的选票,而反对派力量的总统候选人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Emil Constantinescu)则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以39%对61%的劣势不敌伊利埃斯库。反对派力量的虚弱及伊利埃斯库势力的强大,解释了为什么后者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992年10月的总统竞选中赢得了胜利。^①

364 在分析民主派反对力量为什么弱小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了苏丹制及全能主义遗产的问题。然而,罗马尼亚同时还具有一个即将处于沸点的国家性问题,这一点亦被齐奥塞斯库的继承者加以利用。罗马尼亚国内有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匈牙利人,总人数约为170万,大多集中在特兰西瓦尼亚一地。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呼应,罗马尼亚新宪法的第一条将罗马尼亚界定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第四条规定国家是基于“罗马尼亚人民的联合体”,第十三条规定“罗马尼亚的官方语言为罗马尼亚语”^②。为了反对这一“民族—国家”政策,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人民民主联盟,有时突出自己民主派反对力量的特点,有时又着重于其自治论者的特色。在1992年和1995年,匈牙利人民民主联盟的身份问题两度造成了反对派力量的内部分裂。在这种情势下,伊利埃斯库政府像齐奥塞斯库那样,利用和夸大了国家一体性所受到的威胁。1995年1月,罗马尼亚发生了由国家性问题所引发的民主派反对力量的分裂,并由此形成了邪恶的“褐—红—苏丹式”四党暂时联合统治的局面。一个分析家用以下的一段话描述了新的亲伊利埃斯库联盟:

① 民主派反对力量极力将18个政党整合成一个名为“民主大会”的联盟。然而,由于反对联盟中存在代表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的政党,国家自由党的主要力量于1992年4月脱离了联盟。由于这一事件,民主大会在决定总统候选人问题上浪费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民主大会的两大主要力量,一个是“二战”前就已成立的国家农民党,其领导人是80多岁的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君主主义者考奈留·科波苏(Corneliu Coposu),另一个是更为现代的公民联盟党。帕维尔·坎佩亚努的民意调查显示国家农民党拥有11%的支持率,而公民联盟则将获得9%的选票,然而联合的代价是国家农民党获得了民主大会所获选票的55%,而公民联盟获得的选票却少于总数的20%。1992年的选举活动中,两党在民主大会中的协作显得非常糟糕。结果,民主大会竟然无法在被伊利埃斯库及前共产党高层控制的农村发起强劲的竞选活动,在议会选举中仅获得21%的选票。这些观察性描述出自斯泰潘在选举前后与参与者的交谈。

② 参见 Aurelian Craiutu, “A Dilemma of Dual Identity: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of Hungarians in Romania”, 载于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no. 2(1995): pp. 43—49。

盲目爱国者的大罗马尼亚党(PRM)及社会主义工人党(PSM),加上已经灭亡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继承人,在联合统治的名义下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式化……第四个协议签字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罗马尼亚国家团结联盟(PUNR),他们早就已经加入了政府……在协议的签署仪式中,几个人特别引人注目:伊列·佛德特,前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总理,现在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席;阿丁尔·帕尼斯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副主席,原齐奥塞斯库家族的“宫廷诗人”;科涅留·弗坦·吐多尔,另一个齐奥塞斯库家族的“宫廷民谣歌手”,现在是公然反对闪族人的大罗马尼亚党的主席;坚定的反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福纳尔也与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站在一块而载入史册。^①

四党联盟逐步增加对隶属于反对派阵营的市长们的压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认为对少数派或反对派力量过于心慈手软。《东欧宪法评论》中的宪法观察文章提到:“总体上看,133个市长被政府任命的官员所取代……62个向法院提交诉讼请求的市长中只有4个获得成功。尽管议会里的反对派力量、国际组织及选民对此做出了反应,但执政当局似乎仍决定将市长清洗运动继续下去。”^②

到1995年,罗马尼亚似乎处在一种荒谬的境地之中。与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其他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相比(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及保加利亚),从五个分析场域看,罗马尼亚都是离巩固民主最为遥远的国家。公民社会仍然非常弱小;政治社会仍未塑造出精力充沛的可代替性统治力量;法治进程时断时续,特别在地方政府层面及吉卜赛人、匈牙利人等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上更加突显;政府行政部门改革仍未开始;经济社会仍有待发展。这些问题大多能直接追溯到(正如海地具有相似的问题结构那样)苏丹制遗产这一点上。

最显著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罗马尼亚的受访者认为现政权比起原政权有了一个本质性的改进。^③ 这一明显的自相矛盾当然

① 关于这一联盟的具体情况,可参见 Michael Shafir, “Ruling Party Formalizes Relations with Extremists”, *Transition* 1, no. 5 (1995), pp. 42–46, 引自 p. 42。

② 参见 “Constitution Watch: Romania”, 载于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no. 2 (1995): p. 22。

③ 例如,在1993年仅有35%的人对前共产党政权持有正面的看法,68%的民众对当时的政权持有积极的评价。这一33%的评价差大大超过了在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波兰所作的相关调查的数据,略超过斯洛文尼亚,仅次于捷克。参见 Richard Rose and Christian Haerpfer, “Adapting to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II”,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12 (1993): p. 47。

365 可以用他们对苏丹以及苏丹对他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苏丹式的与全能主义的渗透强烈的恐惧感来解释。考虑到对过去的恐怖记忆,一些反对派领导人自我安慰道,如果他们能够增强罗马尼亚的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力量,他们会在1996年的总统与议会竞选中做得比1990年或1992年更好。

罗马尼亚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选举,许多民主形式的机构已经到位,民众也认为现在的政权比起过去有了一个积极的转变。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罗马尼亚的民主与本书所研究的其他中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与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民主更是有很大差异。在罗马尼亚,至今仍没有一个非前共产党机构干部(不仅仅是党员或与共产党有关联)的政治人物获得过政治权力。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就是没有决裂(*ruptura*)。这种延续性与出自共产党(无论叫什么名字)自身的改革并将权力归还于自由选举制的情况极为不同。在这些政治体中(如波兰、匈牙利与立陶宛),非共产党人可以建立政党并有能力赢得选举,从而有一个可观察的决裂。然而迄今为止,在罗马尼亚,这种决裂仅仅部分地发生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前的全能主义控制的遗产与苏丹制遗产相结合,再加上转型发生方式的特殊性(作为一个后果发生),造成了当前的特殊情况。

第十九章 “国家性”问题与转型： 苏联与俄罗斯

366

在本书所关注的国家中,我们认为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国家性问题最为严重。捷克斯洛伐克同样面临严峻的国家性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危害性并不那么大;而在民主德国,国家性问题则以一种独特形式表现出来。在成为巩固的民主国家之前,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并非经济问题,而是公民身份问题与国家性问题。在关于民主转型的文献中,国家性问题曾一度被忽视,但现在正日益成为政治活动家及相关理论家关注的中心领域。^①

作为对非民主政权政治转型感兴趣的比较学者,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我们能从苏联与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中学到什么。常常,在报道如南斯拉夫发生的种族清洗运动造成的极大恐慌,车臣分离主义斗争酿成的流血性后果,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及格鲁吉亚频频发生的种族冲突时,人们非常简单地使用“原初的身份认同”及其后果对这些暴力冲突事件进行解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面对这种“非理性情感”,无论是欧盟那样的国际行为体还是某种国家管理方式,都无法抑制这种新时期的民族主义带来的难以避免的冲突。

然而,在对国家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我们曾提出政治认同的偶然性与变化性胜过其原生性与不变性。政治认同具有可修订性,可由政治制度与政治

^① 关于为什么与民主转型相关的经典文献几乎完全忽视国家性问题及其可替代性概念方法的分析,可参考本书第二章的论述。

367 选择加以建构或削弱。^① 我们曾在西班牙这一案例研究中证明,选举结果的选择问题在帮助建立民主的国家权力以及多重互补的政治认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论怎么对问题进行界定,在我们看来,苏联和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国家性问题都比西班牙严重。^② 因而,我们想要强调政治结构、制度、动机及选择导致的后果,在之前关于民主化、民族主义及国家性问题的新争论中,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关于苏联国家性与转型问题,我们提出三个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观点。第一,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状况也大同小异)所看到的特殊制度设置及苏维埃模式联邦主义原则,为其种族划分的政治化提供了动机及资源动员的机会。可以确信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的苏联,由于强制性经济资源中心所拥有的实际控制力以及联邦宪法无法落到实处的事实,这种动机与资源动员机会所具有的影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和。不过,无论用什么方式解读这一现象,我们都希望能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到这种由结构造成的潜在国家性问题上来。

第二,我们认为在上述结构背景下,针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后全能主义式中央权力结构而在苏联国内进行的以改革与公开性为主题的、强调自由化而非民主化的转型,以及在各加盟共和国而非全联盟层次进行的首次多党竞争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性的后果。这种转型道路,逐渐消蚀了苏联“党一国”式意识形态及其强制性经济控制权力,对建立中央政府民主合法的国家结构作用甚微,并且直接促使排外式种族民族主义成为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① 社会科学的各类研究在不同侧面表明了历史、制度及想象力在塑造并不停地改变着国家、民族主义与公民权的概念。参见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2, rev. ed.); 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关于苏联的情况,可参见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和 Alexander J. Motyl 编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of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实际上,我们相信波罗的海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对由各种历史事实产生的怨恨混合到了一起,这些怨恨来自其先前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它们较迟且是被强迫加入苏联,相比之下他们较为良好的财富状况及宗教和语言的差异——很难在苏联这一大架构下解决。较好的解决问题方式是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承认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达成的秘密条约不具合法性,并在条约签订五十周年之际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让波罗的海三国居民表明他们是否自愿加入苏联。如果他们投票决定不加入苏联(很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很快就可以通过给予当地人民完全公民权而促成一个和平而迅速的分裂。同样,也很难再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保留在苏联内。

第三,在我们看来,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除了面对那些前共产主义政体所共有的问题之外,还继承了苏联特殊而严重的国家性问题及公民权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与巩固过程显得异常复杂,不管所做的是什么选择。经济重构优先于民主国家重构使得这个本已虚弱的国家更为虚弱,最初的国家经济改革方案与高效的经济社会的建立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进而导致政府的三大权力部门共同丧失了权威与合法性。

368

国家对民族主义的矛盾结构

苏联离奇解体的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众多的政治行为者都没有认真考虑苏联面临着潜在的极其严重的国家性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其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很严肃地提出“国家正出现危机”,“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缓慢”,“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正受到腐蚀”,“奴态的吹嘘与颂扬受到了怂恿”。由于这些原因,他提出“改革是必要而迫切的”,改革的延误将意味着苏联会“充斥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①

在这种面临威胁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民族政策问题视为几乎是完全成功的一个政策领域而提及。

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真实而独特的案例。列宁的民族政策结出了丰硕果实:革命与社会主义剔除了民族压迫与不平等状况,保证了所有加盟国家与民族经济、知识与文明的进步……任何不具偏见的人士都会承认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说我们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我们国家的生存是不可能的,各共和国[也]不可能共同构造一个基于兄弟情谊与合作、相互尊重与帮助的共同体。

在访问各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地区时我遇到了许多老百姓,我一次又一次地了解到人们内心的感受,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在人类进步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的一员,他们珍惜并为自己的国家属于一个大家庭而感到自豪。这是苏维埃爱国主义最生动具体的表现。^②

^①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pp. 3-7.

^②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pp. 104-107.

369 戈尔巴乔夫并非唯一持有这一错误感知的人。我们曾与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及改革盟友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及原苏共政治局中强硬路线的主要反对者叶戈尔·利加切夫(Yegor Ligachev)分别进行过交谈,两人都承认自己在改革与公开性开始启动时并没有对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潜在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①这种政治上的无觉察也并不仅限于苏共的领导者。在1991年政变失败之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苏联种族划分研究领域的学界领袖提到:“在进行改革的这些年,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里,民族运动、民主主义煽动与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公众、民族问题专家、出版机构及政治权威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境地。我们应如何解释这种情况的发生?”^②我们将尝试予以解释。

一个重要原因(与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类似)在于苏联领导人低估了苏维埃式联邦主义可能带来的潜在冲突。这种形式的联邦主义可以在历史、意识形态及党国权力一体化等方面找到根源。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多种族帝国,苏联的国家构成是建立在一些隐藏着潜在冲突的原则之上的。^③由于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民族体在成为苏联一员前都拥有过独立的历史时段,苏联中央政权花了不少力气来赢得各实体的顺从,并通过构建一种具有高度两重性的联邦制度来维持国家的一体性。一方面,加盟共和国被设计为一种初级

① 出自1989年10月24日斯泰潘与雅克夫列夫在莫斯科的谈话及林茨与利加切夫于1991年11月11日在耶鲁大学的谈话。费多尔·博拉提斯基(Fedor Burlatskii),一个卓越的改革家及前戈尔巴乔夫的智囊,1990年在哈佛大学作过一次演讲,他认为苏联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博拉提斯基认为,只要经济改革能够加速,民族问题就会不复存在,波罗的海三国也会同意留在苏联。这种强调经济首要性的观点,是戈尔巴乔夫圈子的普遍看法。

② Galina Staravoiatova, "Nationality Policies in the Period of Perestroika: Some Comments from a Political Actors", 载于 Gail W. Lapidus, Victor Zaslavsky 和 Philip Goldman 编: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4。关于苏维埃学中民族性研究被边缘化的激烈讨论,参见 Orest Sutelny, "American Sovietology's Greatest Blunder: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Issue", *Nationalities Papers* 22, no. 1(1994): pp. 141-156。

③ S. N. 埃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一位帝国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家,结合两种合法性原则来描述这一努力:“在意识形态层次,新政权基本的合法化模式——一种强烈的普救式与分离式导向——即普遍原则可以穿透国界……在被过度强调的社会主义祖国框架内对不同社会文化遗产进行表达……它同样包括各个共和国全方位自治性的合法化,给它们提供了全面的政府形式……因此,它们之间的区别受到了法律的保障,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受到俄罗斯中央集权式霸权的影响。”他评价说:“这些政体中内在的矛盾可能为一个强大的全能主义政权所压迫。”参见他的“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Empire: Some Interpretive Observations”,载于 Motyl,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p. 220, p. 205。关于如何将帝国观念用于分析苏联的讨论,也可参(接下页)

国家的形式,国家机构的民族特征得到法律尊重,来自各“有名无实的国家”的精英们也广泛存有增强自己国家(特别是他们自己民族的)利益的积极性。^①另一方面,各加盟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意识形态、党国权力一体化的政权的一分子,这个政权不仅垄断了重要事件的决策,而且使所有非俄罗斯族人(乌克兰人除外)游离于苏共中央书记处、克格勃和军队等部门的主要实权职位之外。^②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某些方面情况有所恶化,总体上矛盾与冲突还是受到了抑制。只要中央集权化的党国权力完全控制整个联盟,这种矛盾的国家结构在控制民族主义方面仍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然而,当我们考察改革时期的情况时,我们会发现,同一结构在不同的条件和政策下会产生不同的动力,尤其是假如这种结构隐藏了众多的把种族划分政治化的动机,正像苏维埃式联盟主义所表现的那样(见表 19.1)。^③

370

我们引用某一史学著作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部分的论述,这些文字抓住了苏联民族政策中具有矛盾性的几个方面:

(接上页)见 Alexander J. Motyl, “From Imperial Decay to Imperial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载于 Richard Rudolph 和 David Good 编: *Nationalism and Empire: The Hapsburg Monarchy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15—43。关于“外部帝国”的说法,参见 Alex Pravda 所编的 *The End of the Outer Empire: Soviet East-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1985—1990*,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① 对这一现象所进行的历史分析倾向的比较分析,可参见罗纳德·萨尼(Ronald Suny)的论述。他认为,鉴于俄国帝制式的政权被称为“国家的牢狱”,对许多团体来说,“苏联变成了新国家的孵化器”,“苏联民族性的历史过程能用国家构造民族进行表述,但这一过程并不让人感到非常满意”。参见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p. 87, p. 160。

② 举个例子来说,在一本写于 1980 年的著作中,塞维林·比亚勒(Seweryn Bialer)曾作这样的叙述:“党的中央书记处没有一个职位由非俄罗斯人担任。在党中央机构将近 150 个高级官员职位中,只有 3 个由非斯拉夫人担任。”在“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不论其政府的自治程度如何,主要的 3 个决策官员几乎毫无疑问都是俄罗斯人……第一个是克格勃头目……第二个是该加盟共和国范围内军事系统的首脑,第三个是该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第二书记”。参见他的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19, p. 214。

③ 塞维林·比亚勒,在其上面曾提到过的 1980 年代所写的书中,独具预见性地指出了这些结构性矛盾可能给苏联带来的潜在危机。“苏维埃式联邦主义的概念和实现过程包含了一个潜在危险……在实践中,除了一些无价值的边缘性领域,各种民族联邦制自治权利都被否定了。与此同时,这些象征性的制度和管理机构后来成了发动争取民族自治斗争的基础”, p. 201。“这些制度机构……由当地的本土精英所掌控……为之后这些精英们争取民族自治权的斗争提供了现成的机器。”

表 19.1 改革前的苏维埃联邦主义：矛盾结构的共存，原则和动机

I 并入联邦的类型

理论上，任何联邦都有三个主要的并入类型：传统的对核心政治实体的身份认同、自愿申请加入、武力吞并。传统的身份认同和自愿加入在成员间造成冲突的可能性最小。然而在苏联，多数主要的非俄罗斯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武力并入联盟的。爱沙尼亚(1918—1940)、立陶宛(1918—1940)和拉脱维亚(1918—1940)曾经长时间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却因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而被武力吞并。比萨拉比亚曾正式从俄罗斯脱离并入罗马尼亚版图，然而后来又成为苏联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主体。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克兰、希瓦、布哈拉在一战后都有一到四年的独立时期。而白俄罗斯、克里米亚、伏尔加鞑靼地区以及哈萨克—吉尔吉斯大草原，从某种程度上说拥有过将近一年时间的独立时期。在苏联主体共和国俄罗斯中，有大量新加入的民族曾经拥有自主和自治权。一些已经成为沙俄帝国一部分的民族并非其传统的成员，而是在 19 世纪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独立后被并入沙俄的。^a

II 加盟共和国政治身份、管理组织以及选举代表原则

在加盟共和国中有两个身份和代表原则：简单地域原则或族群、语言和宗教原则。苏联将这两个原则融入到其地域性民族联邦主义中。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每一个，都是以不同民族为基础而建立并以该民族名称来命名的。如果在加盟共和国国内民族形成相对集中，那么就会成立相应的自治区。除 15 个加盟共和国外，还有 38 个地域管理机关被设置作为族群祖居地：其中 20 个作为自治共和国，8 个作为自治州，以及 10 个自治区。这些管理机构理论上都可以作为选举代表的基础。在改革前，当选举并非激烈竞争而且中央牢固控制各联邦政治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构无足轻重。然而，一旦引入一定程度的选举竞争，动员传统的——而且是暂时的结构——民族的可能性就极大地增加。^b

III 个体公民身份认同原则

在大部分加盟共和国，个人的主要合法身份是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在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上的热望(和预期)是：最终将民族的身份认同融合(整合)进对苏维埃公民这样一个更高级的身份认同中。由于身份认同原则是以一个人的血统而不是其居住地和居住地来区分，一个人即使其家庭已在另一共和国定居数代，他仍然不会获得一个新的民族身份。这种国家强制的民族身份认同事实上阻碍了多元的、补充性政治身份认同的出现。^c

IV 脱离原则

联盟的大部分宪法对于脱离程序只字不提，却对各共和国间关系的强制机制和仲裁的规定不惜笔墨。苏联宪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不仅斯大林的 1936 年宪法，而且勃列日涅夫的 1972 年宪法，都确认了加盟共和国有脱离的权力。1972 年宪法第 72 款明确指出：“每个加盟共和国保有从苏联自由退出之权利”。然而，该宪法却对如何行使脱离权绝口不提。因此，这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极高的冲突可能性，如果存在法治方面的进步，如果选举变得具有竞争性，以及如果一个共和国想要行使其宪法的特定权利而退出联盟。

V 国际代表权和外交自治原则

中央确立了大部分加盟共和国拥有在国际上代表本共和国和签署条约的权力。1944 年，苏联宪法授权加盟共和国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和签署条约、互设外交人员以及参加国际组织。1944 年的修正案主要是受到一种动机驱动：苏联想要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中有投票资格的成员。尽管这一修正案有着极大的虚伪性，但是它表明了中央衰落和竞争性政治的情况下，联邦间冲突和资源动员的可能性。^d

续表

372

VI 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事业激励结构

在苏联,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中央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内为主导的族群团体创设了一个复杂的特别激励和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体系。在大多数的加盟共和国,各民族在大学、党和国家职位和文化组织中的代表比例被过分扩大。为了回报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共和国书记的稳定的长期任期,民族政治精英们会设法阻止民族内反对情绪的出现,只要中央政府能够提供关键的强制的和经济的资源。这里埋藏着冲突的种子:民族政治家们,他们拥有特定族群民众支持、对共和国机构拥有控制权,有能力和动机以政治家的身份动员、扩展本民族政治资源,尤其是一旦他们旧的权力基础、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无法再保障他们的政治生命的时候,更是如此。^e

注释:a. 参照 Alexander J. Motyl, *Soviet,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尤其是 pp. 30—45, 146—160;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9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尤其是 pp. 20—83。

b. 参照 Philip G. Roeder 的精彩文章“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Jan. 1991): pp. 196—232。他提出了资源动员学说用以反对民族情绪的方法论。

c. 参照 Leokadia Drobizheva, “Perestroika and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载于 Lapidus, Zaslavsky 和 Goldman 编: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pp. 98—99, and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for his discussion of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ethnicity”, 尤其是 pp. 110—112。上文所提及的联邦成员政治身份认同和个体公民政治身份认同原则的共存,其中包含着自相矛盾和冲突的种子。这意味着许多民族(不仅是俄罗斯人)散居在其他共和国或者民族自治区而不是他们自己“名义民族”的共和国内。其后果之一,就是在 15 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他们的许多居民和公民的民族身份从法律上不被这个新独立国家所认可。此外,除通婚的情况外,民族身份以血缘来确定而不是以长期定居来确定。因此,许多新独立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是苏维埃联邦主义的不受欢迎的遗产,它助长了新兴的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情绪并与之相互影响。

d. 联邦比较研究方面的专家 Stephen Kux, 称这样的规定为“独一无二”。参照他的文章 *Soviet Federal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39 (March-April 1990): p. 12。

e.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pp. 196—232, Bialer, *Stanlin's Successors*, pp. 210—211; and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pp. 117—124。

苏联的国家构造是在一个独特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国家着手克服民族主义及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事实上构建了一整套的制度,同时,一个培养并促进有意识的、长期的、可进行政治动员的民族性的发展过程也得以开始。不论共产党怎样定义其目标,苏联国内的本土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国家构建过程提供了各种社会和文化基础:首先是让各种族的精英们组织低层次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活动,然后让精英们去动员更加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只有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激进改革时,只有当共产党人开始一个最终使苏维埃制度失去合法性的过程,并允许民族主义者用政治声音表达他们的选择时,这种对帝国的公开挑战才最终得以出现。^①

①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p. 126.

在本文的下一部分,我们将开始探讨戈尔巴乔夫如何及为什么开始一个使国家失去合法性的历史过程,它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苏维埃共和国的分裂:无民主化之核的自由化

大量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遭遇了一系列复合的、相互关联的严重问题。^① 尽管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概念,在他掌权之前已经在亲近俄共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但是戈尔巴乔夫并非受某个集团所迫而发起改革的。就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主要顾问自己作出改革苏联体系的决定这一点来说,苏联可以归为**政权自发变革**的类型。^②

然而,为什么这种“政权自发变革”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和苏联的解体呢?表19.1清楚地表明:答案绝不仅仅在于早期的民族主义和非理性情绪。三种重要的社会科学方法可以用于分析表19.1:理性选择、资源动员和新制度主义。^③ 甚至在改革前,业已存在的制度结构已经为各民族共和国的精英们提供了**理性驱动力**来玩弄种族政治,以及通过设置种族话题来培养自己的支持者。民族地区的精英们拥有对文化组织、大学、国家人事的特殊控制权这一事实,使他们有机会接近他们能动员的社会资源,如果政治发展到这样

① 分析苏联改革起源和过程的主要作品是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另可参见他的原始文章合集“*New Thinking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92)。此外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回顾,请参见 Edward Wlikers Walker, “Structural Pressures, Political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Bureaucratic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Origins of Perestroika” (Ph. D. dis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2)。

②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首部著作中不无痛苦地强调改革是统治政权的选择。他的《改革》一书的开头章节中的一个副标题是“是什么激发我们实施改革?”而且他继续写道:“改革驱动力发端于共产党的自发行动,以及党的领导……改革并非自发而是一个控制的过程。”Gorbachev, *Perestroika*, pp. 41—42。在本书中,我们还考量了另外两个“政权自发变革”的重要案例,西班牙和巴西。然而,在两个案例中,由“政权让步和社会征服”的复杂而辩证的过程,将自由化推向核心的民主化进程。在苏联的案例中,由于党和国家的相互交织,而出现了一种复杂性,很难判定重构中有多少是党或者国家推行的。尽管有着这样的复杂性,但并不影响我们作出准确判断:重构活动明显是由政权内部发起的,而在外部则遭到反对。然而反对改革的力量在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中都能找到。另外,考虑到在一些城市外的社会的消极性,可以说由苏联当政者发起的社会动员——和其他案例相比——一开始便显得苍白无力。

③ 最早确定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苏联民族政治学的是 Motyl, *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尤其是 pp. 30—45, pp. 146—160。而关于新制度主义的精彩分析,参照 Rogers Brubaker,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Post-Soviet Eurasia: An Institutionalist Account”, *Theory and Society* 23(1994): pp. 47—78。

做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更是如此。^①事实上,党和国家创造的制度甚至还制造了一些以前从来不曾存在的民族。^②新制度主义的另一个看法是,制度除了产生结果之外,还会对决策者的可能的选择造成约束。业已存在的制度制约着戈尔巴乔夫所能作出的有效选择。他对党和国家内部阻止改革计划的成员施加压力。公开性的自由政策通过允许更加自由的新闻体制,起初有助于动员改革的支持者(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以及暴露和打击那些公开反对改革的行为和群体。^③然而在其主要顾问雅克夫列夫的支持下,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使用选举作为其政权变革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认为选举在解释苏联解体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表 19.1 中呈现的结构为民族动员提供了一套非常广泛的潜在的动力和机会。但是,只要宪法依然是虚设的,只要党和国家有着充分的强制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资源可以确保对共和国族群内民族精英的控制,那么民族主义,虽然永远不会消失,就不会动员到威胁苏联(实体)整体性的程度。

374

然而,在表 19.1 中所呈现的结构下,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政体改革战略直接动员了苏联基于地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名义上的民族来反对国家。这一策略是由于三个相互联系的现象造成的:政权类型、选择实施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以及选举序列。

戈尔巴乔夫继承的是什么类型的政权呢?让我们详尽地引述阿奈·布朗(Archie Brown)关于戈尔巴乔夫研究的精彩论述:

虽然在全能主义独裁统治的斯大林时代和随后的高度集权而非后全能主义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但许多概念的扩展都试图把 1980 年代后期前任何时期的苏联都贴上“多元主义”的

① 先前提及的文章,在概念上有效地使用了资源动员的方法。参见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pp. 196—232。

② 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Victor Zaslavsky),和前面提及的萨尼一样,甚至断言这样的结构“促进了建立民族的独一无二的过程”。参见 Victor Zaslavsky, “The Evolution of Separatism in Soviet Society Under Gorbachev”, 载于 Lapidus, Zaslavsky 和 Goldman,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p. 71。

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有效主导自由化的策略,例如,由巴西盖泽尔和戈尔贝格将军所推行的旨在反对他们在安全机构中强硬的反对者的政策。参见 Alfred Stepan, “State Power and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 载于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和 Theda Skocpol 编: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7—338。

标签。

政治多元主义意味着独立于国家的政治组织(或者,对于苏联来说,独立于党和国家之外),而这对从列宁到契尔年科(Chernenko)的苏维埃领导人来说都是决不能容忍的。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包含在“公民社会”观念中的社会多元主义都极少存在于苏联社会……在1985年之前,成立任何不经国家法令允许和监管的组织都是决不允许的,即使这一组织不是公开的政治组织亦然……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以及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统治时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处于20年以来的最低潮,而且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镇压了。^①

这里我们不准备用我们的类型学详尽地描述1917—1991年的一个经验的、历史的苏联。然而,戈尔巴乔夫所继承的苏联既不是另一个全能主义政权,也不是一个苏丹式的政权。^②本章的真正问题是:在我们第三章所讨论的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连续谱中,前戈尔巴乔夫政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按照社会多元主义标准,这个政权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正如布朗在引文中极其清楚地表明的那样。

375 相比之下,选择性的去全能主义化在苏联肯定没有像在匈牙利走得那么远。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匈牙利1982年法规相比,它创造了准私有财产并扩大了全国范围内契约关系的领域,从而为1988年全国范围内企业和工会组织自治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在匈牙利,转型前已有三个主要的反对派政党集团存在。而在苏联,则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存在。^③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机构的僵化、领导层的老龄化、意识形态语言的刻板、动员能力的丧失、大众的消极情绪使得苏联几乎成了衰退式后全能主义的案例。^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这样的衰退和堕落,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政权比民主德国更加远离全能主义的理想类型。1980年代中期的

^① 参见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pp. 16—17, p. 8.

^② 一些总书记长期任职的中亚共和国事实上呈现出苏丹式的特征。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时代也有苏丹式的特征。

^③ 关于匈牙利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本书第十七章的讨论。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从来没有发生过标志着后全能主义的、类似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的事件。

^④ “衰退式的后全能主义”和“选择性后全能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本书第三章尤其是第十七章有特别论述。

民主德国,也许是由于频繁地遭遇合法性问题,并需借此反对对手联邦德国,其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仍然固守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而这种忠诚被认为是证明党的领导地位以及一定程度的动员的合法性之必需。^①

同东—中欧相比,苏联尽管有着这样的衰退导致的后全能主义特性,然而其遗产中有着三个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需要加以强调。第一,对于苏联的主要人口来说,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版本的共产主义是本国的创造,而不像对于许多中欧国家那样是外国的舶来品。第二,对于苏联的主要人口来说,共产主义持续了75年而不是中欧的40年。第三,一些中欧国家(波兰人)的人民从来没有完全生活在一个全能主义体制之下,另一些国家的人民,如匈牙利,在全能主义体制下仅仅生活了15年。而苏联公民则视生活的地区不同,在几近全能主义的政权下生活了30年或40年不等。^②

早在1920年代早期俄国内战后,列宁就已经建立起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而苏联公民在斯大林治下又生活了数十年,这一事实必须加以充分的强调。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运动,当然起到了使苏联摆脱斯大林时代恐怖统治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赫鲁晓夫时代,一些全能主义的特征又同时被重新引入并得到强化,比如对宗教的攻击、救世主式“埋葬西方世界”的承诺、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大量使用武力以重新确立全能主义统治等。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更多的是一个“衰退式后全能主义”,而非“选择式后全能主义”的政权。总之,我们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继承的政权,是其他政治体系世世代代所从未经历过的,事实上也是除共产主义苏联外所有其他社会所不曾经历的。“十月革命”、内战、斯大林主义,以及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抵抗纳粹征服的英雄主义而唤起的爱国主义,这些综合起来对于苏联社会的深刻影响,远远超过中欧国家由于苏联占领或者“解放”而被迫建立起来的短暂的全能主义(在许多国家,仅仅存在于1948—1957年)所产生的影响。

376

在此背景下,经历了70多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之后,苏联的自由化甚至是1980年代后期的党—国体制的瓦解,也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迅速

^①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十七章中所讨论的弗里德海姆调查显示,即使在民主德国,1980年代后期以后,强制机构领导人对于使用武力的信仰,与纯粹的全能主义相比,也在逐渐丧失。

^② 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我们可以说苏联事实上从来没有可用的前全能主义时代的民主和有限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和工业化结构。但是在这方面,苏联并非是无二一的。一些中东欧国家也同样不曾发展出前全能主义时代的民主或者先进的资本主义结构。

崛起的结果。用于应对外部帝国的威胁的许多结构和传统,都在苏联时期被彻底破坏或者严重摧残(比如东正教),以至于重新恢复这些结构和传统成为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35年的全能主义统治,连带着完全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塑造了所有苏联公民的生活。事实上在1980年代前期,任何想要获取一个体面的职位和社会地位的人,都必须在这一体系内被招募、训练和改造。在广袤的苏联,只有在一些中心城市地区,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形成了硕果仅存的“非苏维埃”文化。甚至在废除、拒斥或抨击这种意识形态时,也会出现一种由这种体制塑成的独特的苏维埃精神。

这有助于考量苏联社会新崛起的精英在自由、民主思维方式上的弱点。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怀疑,支持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比如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的上层精英(他们由于多种原因能够了解其他观念和经历)被那些并不了解其他观念或经验的第二梯队或“省级”精英所替代,对于“民主”过渡毫无助益。

377 戈尔巴乔夫开始掌权的苏联,是一个深深打上了70年共产主义统治社会烙印的国家,是一个在边陲拥有权力的人试图保持其权力的社会。一旦戈尔巴乔夫着手采取切实的行动和政策弱化党—国体制的意识形态结构,各共和国的精英们便开始寻求新的权力来源、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特别是新的身份认同。因此对于地区共和国的政治精英来说,苏联的民族联邦主义和源于民族文化的潜在的合法性,无论多么苍白无力、多么歪曲造作或人为制造,在这个时候都变得非常有用。通过诉诸特定形式的民族主义(那种名义上的民族),同时在他们的统治区域反对“少数民族”群体以及中央集权的苏联,在边陲共和国执掌权力的人,发现这些手段很容易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起来。^① 如此看来,苏联解体过程中崛起的民族联邦主义,是全能主义统治对社会的破坏和苏联独一无二的民族联邦主义制度安排共同结出的恶果。^②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独立如何超越了民主。但是这将会在后面谈及,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讲出故事了。

政治家是动员希望和不满的专家。但是动员什么样的希望和不满? 如何

^① 在承认政治精英投机主义者在运用民族主义不遗余力的同时,我们并不想否认在每个地区都有一些群体,他们真正是以历史文化作为彼此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在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中间尤其强烈,特别是在亚美尼亚,在把自身传统和外部联系结合起来的教会成员中间更是如此。

^② 欧内斯特·格尔纳认为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是一个“真空社会”。参见 *Home of Unrevolution, Daedalus* 122, no. 3(1993): pp. 141—254。

动员？由谁动员？戈尔巴乔夫继承的是一个“扁平的”、后全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图景。我们之所以称其为扁平的，是因为在我们所分析的南非和南欧的一些威权统治中，许多社会建筑，诸如教堂、商业组织、利益集团、职业协会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在智利和乌拉圭甚至还有政党）努力保持了其一定的独立性或身份。然而在全能主义时代的苏联，这些组织要么成为渗透性组织，要么被整合进党—国体制中，从而根本无法发挥像在苏联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相应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在“公民社会”和正在形成的“政治社会”的边界上，随着自由的增加，则不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群体。事实上，尽管有着如此扁平的图景，但在1987—1988年还是有大量的民主组织、阵线、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群体专注于形形色色的目标，从生态环境到纪念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牺牲者，不一而同。这些群体大部分由30—50岁左右的受过教育的人组成，他们都没有参加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经验。主要的政治组织，如诞生于1989年夏末的“莫斯科投票人协会”，其领导人开始计划参加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运动。

在1990年1月，一个命名为“民主俄罗斯”的政治同盟组织了5000候选人来竞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所有级别上的苏维埃席位。^①“民主俄罗斯”有能力组织莫斯科的两次大规模游行，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获得了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65个席位中的57个。在选举后，“民主俄罗斯”在RSFSR议会中成功组成了议会党团，但是它们在鼎盛时期也只是占据了全部席位的30%。尽管“民主俄罗斯”在支持改革和自由化、呼吁民主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它们却仅仅停留在运动的层面，而远不是一个政党。 378

对于像“民主俄罗斯”这样的组织，它们未成为真正意义上全苏联的政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领导人，对于创造出一个组织良好的民主政党持有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叶利钦从“民主俄罗斯”的支持中获益并借此获得权力，然而到头来他却并不想把它作为一个政党来领导，甚至都不愿意帮助其成为一个政党。由于这样的背景，如果举行选举，政治家们动员希望、不满、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可预期的最简易的方法，便是和民族相关。事实上，加盟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准国家，而且在苏联，民族是唯一的、部分合法的区分。

这使得我们开始质疑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受约束的选择。我们没有足够

^① 参考 Yitzhak M. Brudny 的“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c Russia, 1990—1993”一文，*Post-Soviet Affairs* 9(April-June 1993): pp. 141—170。

的关于苏联的知识来作出判断:戈尔巴乔夫是否可以选择不维持现状,或者像中国在1990年代所做的那样,只是努力改革经济体系而不触及政治体系。当然,许多人会说勃列日涅夫后期的苏联面临着一种情况,即越来越缺少足够的意识形态、经济资源来维系彼得·豪斯洛纳(Peter Hauslohner)所谓的和苏联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①。然而,既然戈尔巴乔夫作出重建体系这一决定,并把选举作为重建的关键,那么他将面临转型语境下两个根本性的选择:是“自由化”还是“民主化”?^②这一选择在学者中存在着相当尖锐的争论,而这个争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参照的框架。一些(但不是所有)学者,他们是苏联问题专家,受戈尔巴乔夫不断使用民主化一词的启发,并基于“改革”和“公开性”毋庸置疑地动员了许多自由主义力量这一事实,而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倾心于民主。在许多苏维埃制度学文献中,在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事实上没有太大区别。通常两者在过程上是等同的。^③

然而,作为民主转型比较研究的学者,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严格意义上讲,从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从未在任何时间毫不含糊地表示:自己将致力于推行民主化,或者将努力使得党—国体制或者中央政府实行民主化。也就是说,在全苏联范围内自由竞争、多党选举的获胜者将会组成中央政府并将承担推行公共政策和管理国家机器的责任,这一原则从未实行甚至连计划都没有过。

在当代民主和民主转型的理论家中间,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存在一个共识,这一共识甚至多数欧洲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也予以认同,即承认在民主体制下,权力的结果必须是偶然的,而且不能被一个历史决定确保或者固定,^④政治反对派必须有合法存在的

^① Peter Hauslohner, “Gorbachev’s Social Contracts”, in Ferenc Feher and Andrew Arato, eds., *Gorbachev: The Debate* (Atlantic Highland,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pp. 61—83.

^② 关于他们本质区别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一章。

^③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提出的那样,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而且,从经验上看,自由化通常发生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形下。对于苏联问题专家在看待戈尔巴乔夫和民主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参见 Stephan Whit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42, no. 1 (1990): pp. 3—24 和 John Gooding, “Gorbachev and Democracy”, *Soviet Studies* 42, no. 2 (1990): pp. 195—231.

^④ 正如亚当·普热沃尔斯基在讨论民主转型中不确定因素的角色时所持的观点:“民主妥协不可能是本质的妥协;它可以是偶然的制度性妥协……如果和平过渡到民主是可能的话,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如何使不确定制度化。”参见他的“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载于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Schmitter 和 Laurence Whitehead 编: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9—60.

权利,党内民主无论多么重要,都永远不可能替代竞争核心权力的多党选举,而且无论何种程度的社会多元主义都不可能替代政治多元主义。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9年的想法,和以上几点是完全相反或者至少是模棱两可的(见表19.2)。

表 19.2 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关于竞争性民主的言论:1987—1991年

1. 关于反对派和共产党角色:1987年

“在我国不存在官方的反对派。共产党在苏联担负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我们把深化党内民主、加强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的公开开放作为优先选择的原因。”^a

2. 关于在公开性和民主化背景下结果的非偶然性:1987—1988年

“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是在我们的人民在1917年曾经并永远作出的社会主义的抉择的边界内的讨论和科学的工作,这正是我们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b

“我们将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来引导我们的改革。我们将专注于社会主义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因为那里产生了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公开性计划的每一部分以及作为整体,都将完全基于更加社会主义更加民主的原则。”^c

3. 在“第一次多元候选人半竞争性选举”举行前关于多党政治体系可能性的言论:1989年2月

“根本没有必要讨论它(也就是多党制改革)……两党制、三党制全都是胡言乱语。即使你有三个或者四个政党,你可能还会面临没有人可以开口自由说话的暴政……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企图兜售给我们的。”^d

4. 关于共产党的先锋队角色:1989年11月26日(共和国选战开始、柏林墙倒塌时)

“我们支持真正的民主……在社会有机体中,共产党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被称作苏维埃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在一党体系内发展人民大众的独立自主的行为和社会生活民主化,这是我党崇高的和艰巨的任务。”^e

5. 关于共产党在发展多元主义中的角色:1989年11月26日

“在现在这一复杂阶段,维持一党体系作为权益之计,是由稳定社会和集中所有健康的社会力量用以解决改革的艰巨任务所决定的。但是最终党还是要推进多元主义的发展……我党决不能屈从于民粹主义者的妖言惑众以及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的潮流,或者屈从于无法控制的集团利益。”

6. 关于他继续统一共产党的任务:政变失败后的新闻发布会(1991年8月23日)^f

“我对于原本可以为党的改革作出贡献的力量的流失深表遗憾。我看到我在这一事业中的角色。我并不打算放弃我(在党内)取得的位置。”^g

注释:a. Mikhail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p. 23.

b. Mikhail Gorbachev, “*Politika partii, politika obnoveniya*”, *Kommunist* 4(1988)4. Emphasis added. Cited in Neil Robinson, “*Gorbachev and the Place of the Party in Soviet Reform, 1985—1991*”, *Soviet Study* 44, no. 3(1992): pp. 423—443.

c. Mikhail, *Perestroika*, p. 23.

d. Victory Yassman, “Gorbachev’s Formula for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Perestroika: Full Ahead

but Keep Right”, *Radio Liberty: Report on the USSR*, March 10, 1989, p. 19.

e. Mikhail Gorbachev, “The Socialist Idea and Revolutionary Perestroika”, *Pravda*, November 26, 1989, pp. 1–3. English Transilation in *FBIS—Sov—89—226*, November 27, 1989, pp. 78–79. 在 1990 年 2 月 5 日,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 戈尔巴乔夫最初支持废除把共产党领导地位奉为主桌的宪法第 6 条, 并且推荐采用总统制来确保改革的进行。

f. 同上。

g. Mikhail Gorbachev 的新闻发布会英语版参照 *FBIS—Sov—91—164*, August 23, 1991, p. 28.

苏联在 1989 年和 1999 年举行了选举。^① 1989 年的苏联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明显有助于削弱一些改革的反对者。然而在我们看来, 该选举却有着根本的缺陷。1989 年的中央立法机构选举并不是多党选举。选举要求产生新的立法机构, 而不是产生新的政府。立法机构从来没有制定出新宪法, 而没有它, 重建联邦只是一句空谈。

1989 年的自由选举在许多方面确实弱化了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 甚至在中央也是如此。“地区间代表组织”的一群代表, 他们中的许多成员想要推进真正的民主化, 并开始批评戈尔巴乔夫和党—国体制的非法性。结果, 在苏共党内批评戈尔巴乔夫默认弱化党—国体制的强硬路线开始抬头。尽管 1989 年的选举为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和高加索共和国动员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机遇, 但也为其他共和国在模糊的主权概念之下, 绕过意识形态的红线, 挑战中央政府创造了基础, 这种情况发生在独立运动曾遭失败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战役, 自 1989 年末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 1990 年的大部分时间, 随之而来的, 却是对党—国体制核心的、累积的、无可挽回的侵蚀。

381 下面让我们更清楚地审视选举, 尤其是苏联和选举情况极其相似的南斯拉夫的选举序列。^② 在两个国家, 选举都被允许, 但是在两个国家, 最民主和竞争最激烈的选举都是为了争夺地方权力。这一点, 在二战后全联盟范围的竞争性选举从未举行过的南斯拉夫尤其明显。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选举在 1990 年夏秋举行, 民族问题成为头等的关注。

苏联的情况则更为复杂。第一次选举事实上是 1989 年 3 月全联盟范围内选举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然而, 这些选举并非多党选举,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社会并未形成。我们不应忘记, 直到 1990 年 3 月, 就在俄罗斯选举前数周, 苏共才宣布放弃基于苏维埃宪法第 6 条的一党垄断。只有在第 6 条

① 此外, 1991 年 5 月和 6 月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分别举行了重要的总统选举。

② 后面的几页主要引自我们的文章 *Political Identity and Electoral Sequence: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 no. 2 (1992): pp. 123–140.

被废除后,其他政党才被准许登记。^① 尽管有许多不同民主团体和运动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席位,然而直到 1989—1990 年选举之后,议会政党——更准确地说是政党核心小组会议——才真正出现。

我们无论怎么强调这一基本区别都不为过,那就是在南欧、拉美和大部分中欧国家,在第一次真正选举前政党早已合法存在,而苏联则不然。其后果之一就是,在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俄罗斯,尽管有表达社会利益的民主化运动,然而向政治社会的转型被延迟了。和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民主德国的“新思维论坛”、立陶宛的“改革运动”组织一样,在俄罗斯出现的“民主俄罗斯”也是一个伞型组织,它在其后的危机中显示出和其他运动的极大相似性。然而,和这些伞型组织不同的是,“民主俄罗斯”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中协调一致过。

1989 年 3 月的选举,在苏联激发自由精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创造出一个自治的政治社会或者民主的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这些选举却有着一些明显的局限性。^② 人民代表大会 2250 个席位中的 1/3 不是由公众选出,而是预留给了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甚至,提名过程允许许多共产党员控制当地选举委员会并会见其支持者。在许多地区,所有选举委员会中的候选人都是共产党支持者。事实上,1/4 的选举存在着仅有一名来自本地选举委员会的候选人参选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反对派候选人只有靠边站。

382

从这一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人民代表大会 2250 个成员,将通过间接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这种间接选举的方法进一步弱化了(更有权力的)上议院的选举的公信力,并产生了大量的不公平。举个例子,叶利钦以 89% 的民众支持赢得了在莫斯科的选举,然而起初竟然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败北,直到其中一名成员为了支持他而自动让贤,他才获得在最高苏维埃中的一个席位。然而

^① 对于后面对俄罗斯的分析,我们应当注意 1990 年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仍然不是多党选举。在 1990 年的俄罗斯选举中,“民主俄罗斯”并非我们意义上真正的政党,而仅仅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边界上出现的运动。由于这样的国家—社会背景,斯蒂芬·费什(M. Stephen Fish)认为 1989—1990 年的政治开放“太过突然、太过片面。它强烈而且是负面地影响了替代性政党的成长和效力。迫近的选举降低了雄心勃勃的激进的领导人参加政党的动力,并且鼓励了高度个人主义形式的政治投机”。参见他的一本重要著作 *Democracy from Scratch: Opposition and Regime in the New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3。着重号原书所加。

^② 对于 1989 年选举局限性的精彩的讨论,参见 Victor Sergeev 和 Nikolai Biryukov, *Russian's Road to Democracy: Parliament, Commun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ldershot,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3), pp. 101—151。

对于其他一些不怎么知名的代表来说,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因此,尽管苏联的第一次选举是全盟范围的,然而问题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最重要的和争夺最激烈的选举都不是全联盟层次上的,而是在共和国层次上的。

认识到全联盟选举法的缺陷,各共和国议会制订了许多法案以避免诸多对自己不利的行动,并帮助挑战全联盟议会的权威。选举法在各共和国间稍有不同,然而相对于全联盟议会来说,选举通常可以给各共和国议会以更多的合法性基础。几乎所有的共和国议会都唾弃了确保共产党和主要公共组织席位的做法。选举中的不公平确实发生在一些共和国议会选举中,尤其是在中亚和少数民族地区。然而,从整体来说,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不仅声称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而且声称拥有比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更强的合法性。

在整本书中我们一直都认为:选举可以设置议程、塑造行动者、重建身份认同、帮助把(统治者的)服从要求合法化或者非法化。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地方选举起到的正是所有以上的作用。西班牙在全国性选举的过程中,国家在更牢固的基础上被重新强化。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地方选举所做的事情却恰恰相反。以下所用数据引自赫尔辛基委员会选举观察组,他们所写的报告极好地说明了地方选举战役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在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之下,地方选举从来都不是全联盟范围选举的附属品。地方选举通过削弱中央,强化统治精英们的独立和主权诉求,以及在各共和国中动员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

383 摩尔达维亚(1990年2月25日选举)

选举战役提高了一种必要性,即共和国内每一个以争夺权力为目标的运动都必须提出主权计划,这是摩尔多瓦的最低要求……莫斯科无论是不得不同主导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的“人民阵线”直接接触,抑或和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卢钦斯基合作,都无足轻重了,因为莫斯科行将面临的是如何安抚共和国对于主权的要求。^①

乌克兰(1990年3月18日选举)

为了竞选而成立的反对者的民主党团,成功地将选举战役聚焦于选

^① *Elections in the Blastic States and the Soviet Republics*(由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编纂,华盛顿,1990年12月),p. 89。

民最关切的问题,诱使共产党不得不被动按照他们的套路出牌。选民们最关切的问题是更大的政治自治和民族、文化事务。^①

要求使用乌克兰语的呼声不断增加,最终使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重要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自1990年1月1日起,乌克兰语将成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而俄语将仅用于民族群体间的交流……长期被压抑的民族情绪正在横扫乌克兰民众。^②

乌克兰导向独立的自决运动极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③

格鲁吉亚(1990年10月28日选举)

到选举的那天,所有参与角逐的政党,包括格鲁吉亚共产党都支持独立。^④

为了兑现其支持民族主义的承诺,格鲁吉亚共产党论坛要求保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并引入格鲁吉亚公民概念……宣称格鲁吉亚公民只可以在本国国内服兵役。^⑤

选举中的独立和民族主义计划恶化了共和国和中央的关系。民族主义者在格鲁吉亚的豪赌,和在其他许多共和国发生的一样,恶化了与共和国内少数民族群体的关系,并侵蚀了未来民主化的核心内容——对所有居民,不管其民族是什么,给予完全的公民权。选举观察组注意到在格鲁吉亚,“最终的获胜者加姆萨胡尔季阿,他发表过许多警告非格鲁吉亚民族的言论。如:在1990年6月,他认为通婚‘对格鲁吉亚家庭和语言是致命的破坏’”^⑥。“由于对格鲁吉亚独立民族权利发展的恐惧,一些非格鲁吉亚民族群体在企图保护自己……因此,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分别在1990年8月和

384

^① *Elections in the Blastic States and the Soviet Republics*(由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编纂,华盛顿,1990年12月),p. 115。

^② 同上,p. 119。

^③ 同上,p. 135。

^④ 同上,p. 165。

^⑤ 同上,p. 170。

^⑥ 同上,p. 169。

9月宣示主权。”^①

在没有首先进行全联盟范围内自由竞争性民主选举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地方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五个相互关联的复合的引起国家分裂的动态过程。第一，事实上在地方选举结束后，全国范围内中央的合法性已遭到彻底破坏，因为地方上支持主权独立的势力可以通过选举宣示比中央更强的民主合法性。^②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地方比俄罗斯表现得更显著了。俄罗斯共和国的选举为叶利钦创造了新的民主的合法基础，他在1990年5月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以此为基础，叶利钦在1990年6月12日签署了俄罗斯主权宣言。在这年6月，他又成为俄罗斯直接选举的总统。在1991年7月，他签发的第一个总统令是禁止共产党在企业中的一切活动。由于共产党只有工作单位的细胞而没有地域性组织，因此这样的禁令事实上等于给俄共判了死刑。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不仅是破除中央集权的“9+1”协议的结果，而且是这一总统令的结果。^③

第二，在苏联各共和国内部参与竞选的组织中，没有一个拥有全盟影响的主要政治组织可以用来抵消地方民族主义的势力，由于宪法第6条直到1990年3月才被废除，在此之前共产党是唯一的全盟范围内的合法政党。而南斯拉夫的选举也完全被非全盟范围的政党和运动所主导。

第三，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过程中，政治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封闭，这无助于全盟范围的民主实体的形成。而在西班牙的选举过程中和选举之后，政治身份认同则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并有助于（各政治力量）参与重建西班牙民主的国家结构。

第四，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如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内，民族冲突的预期导致新当选的总统压制主体民族群体中不同的声音，这些声

^① *Elections in the Blastic States and the Soviet Republics* (由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编纂，华盛顿，1990年12月)，pp. 165—166。

^② 对国家侵蚀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全联盟范围内服兵役的公民人数的急剧下降。在1990年末，立陶宛只履行了它所分摊的兵役的39.5%，拉脱维亚是35.9%，亚美尼亚是22.5%，而格鲁吉亚则只有18.5%。到1991年中期，这些数字又下降为：立陶宛30.8%，拉脱维亚12.4%，亚美尼亚16.4%，格鲁吉亚8.2%。最重要的是，到1991年中期，在前6个月莫斯科自己也只是完成了其配额的50%。参见Steven Foye, “Student Deferments and Military Manpower Shortage”, *Report on the USSR* (Aug. 2, 1991): pp. 5—8。

^③ 韦伯意义上的“国家”早在苏联1991年8月政变失败便解体了。这次政变的导火线是党、克格勃和军队内的全联盟力量的一些成员，试图阻止“9+1”协议的履行的努力的失败。该协议可能为苏联解体的事实予以法律上的认可。

音要求对少数民族群体显示出更加宽容的态度。

第五,国家性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统治能力危机阻碍了经济政策的形成及实施。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任何中央或者相等同的权威发生政治大变动或者崩溃,都是先于经济危机发生的,并且进一步使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反之则不然。^①

让我们用一位苏联社会科学家所写的预言性的语言作为我们对选举序列探讨的结论,这些预言是在政变和苏联最终解体之前作出的。他洞察到了地方选举已经对苏联事实上的分裂造成的冲击程度:“地方选举造成了名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从‘公民的’向‘族群的’转换这一过程……在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之后,‘法律间的冲突’和‘主权问题的公开’便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联盟中央的权力危机和统治无能的情形急剧增加。”^②

我们不会进入对苏联国家终结的详细讨论中,因为其他人在这方面已经有广泛的论述。共和国选举导致了著名的“主权问题的公开”并强化了“法律间的冲突”。这导致寻求新的联盟法律,而这一法律将在权力向共和国转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试图在1991年3月17日通过全民公决来支持联盟,全民公决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各加盟共和国拥有平等主权的全新的联邦——其中任何民族的公民的个人权力和自由都将得到完全保障——你认为有必要保留苏维埃共和国吗?”投票者中共有76%的人对于这一问题投了赞成票,这被戈尔巴乔夫认为是联盟的胜利。然而,对全民公决进行的全面的分析,显示了更多模棱两可的甚至是破坏性的结果。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3个(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按照戈尔巴乔夫所要求的方式进行了全民公决。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则抵制了戈尔巴乔夫的公投。其余的6个共和国,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决问题后面加入了他们自己的问题。其结果是,各共和国自己所设计的附加的问题,为共和国的决策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如在俄罗斯,附加的问题使公决成功地变成了

386

^① 1990年的上半年,南斯拉夫联盟总理马尔科维奇实施相对稳健的政策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四位数降低到两位数。然而,自国家危机爆发后,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一下子飙升到超过1万亿。乌克兰在1989年有4.1%的GNP增长率,但是自国家危机完全爆发后的1991—1994年间,其GNP的最好成绩也就是1991年负增长12%,1994年负增长23%。俄罗斯尽管有数不清的问题,然而在1990年其工业生产仍然有平稳的增长。1992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8.8%,1994年则为-21%。以上经济数字参见表21.1。

^② Andranik Migranian, “The End of Perestroika’s Romantic Stage”(莫斯科,1991年7月,未出版手稿),p. 7.

“是否要举行俄罗斯总统直接选举”的公投。对于这个俄罗斯公决问题的正面回应是：建立一个替代联盟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中心的主要步骤开始了。联盟和9个加盟共和国的条约草案最终于1991年4月23日签署。其结果是推动了阴谋活动的孳生。新的联盟条约预定于1991年8月21日签订，而政变就始于8月18日。政变的失败又极大地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所有维系苏联统一的主要组织和机制——苏共、克格勃、军队、警察和苏联总统都被削弱了。与之相反，赢得1991年6月俄罗斯直选总统而拥有正统合法性的叶利钦，通过领导反对政变的行动并为俄罗斯争取更多的主权，极大地加强了其地位。1991年12月25日，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这一国家解体过程的速度和本质，给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复杂的遗产。^①

苏联解体：民主转型及其巩固的遗产

在第一部分我们详细讨论了所有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除了这些问题，苏联基于地域原则建立的民族联邦主义的先在本质和其解体的速度和方式，为民主转型和巩固增加了新的复杂的问题。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那些比我们更训练有素的专家们用一本书的篇幅来仔细分析。然而，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比较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三个共通的问题，它们都可以在前苏联的15个后继国家中找到，即独立优于民主化、集体权利优于个人权利以及经济重建优于国家重建。

^① 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最终解体的细节参见 John B. Dunlop, *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Sovie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有价值的文献请参见 Alexander Dallin 和 Gail W. Lapidus 编: *The Soviet System: From Crisis to Collapse*, rev.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尤其是 part 7, “From Coup to Collapse”, pp. 565—647。也可参见 Alexander Dallin, “Caus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Post-Soviet Affairs* 8, no. 4 (1992): pp. 297—302; Sunny, *Revenge of the Past*, pp. 145—154; and Graeme Gill, *The Collapse of a Single Party Syste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尤其是 pp. 144—185。事实上,所有的理由都强调,那些失败的政变试图进一步破坏的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制度仍然维持着苏联的存在。关于戈尔巴乔夫全民公决及其如何赋予在其后院放火的共和国领导人以新的合法性的讨论,参见“Reports on the Referendum on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March 17, 1991”,载于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Independence Referendums in the Baltic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Successor States: A Compendium of Reports, 1991—1992*, 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编, Washington D. C. (August 1992), pp. 15—63。戈尔巴乔夫问题的措辞在 p. 20 上。

独立优于民主化

在大部分彻底实现民主转型并最终成功地巩固民主的政治体中,政治反对派在我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时期,最为热切渴望的目标通常是民主。而且,当掌握政权后,政治反对力量必须切实推行民主的实践和民主的制度,以使民主成为“最佳的选择”,甚至对于那些起初对民主摇摆不定甚至反对民主的群体,也当如此。

苏联解体惊人的速度和独有的方式缩短(或者排除)了自由化,赋予转型之路以全民投票式的“民族自由”的特点,并且几乎把关键的民主化排除出关于规范和制度的重要的政治议程之外。在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导致各加盟共和国于1992年1月最终走向独立之前,一些前苏联后继国家中,不要说民主化,甚至连自由化都几乎没有开始。在许多加盟共和国,甚至是那些其领导人支持政变的共和国,苏联的土崩瓦解导致了在职者狂热地寻求新的权力基础。阿纳托利·哈扎诺夫(Anatoly Khazanov)是前苏联卓越的人类学家,他洞察了这一现象:“民族和地方精英们,一些是仅仅换上新的意识形态外衣的旧权贵,另一些是刚崛起的新贵,击败了忠于中央的精英。他们都把独立作为确保他们地位的保障。然而,他们对于民主原则仅限于嘴皮子上的热衷,并没有把它作为优先考量的目标。”^①

罗纳德·萨尼同样强调,苏联解体的惊人速度没有给新近建立的民主组织以时间去获得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存在,遑论去获取权力了:

在大部分加盟共和国,伴随民族主义而来的是设防自保的本地精英们为夺取地方权力而作拼死斗争。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旧精英们换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以保持他们的地盘并压制民主运动。即使在一些南部共和国,诸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那里的民主分子有力量打倒或者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部族政治的残留结构也依然存在,某种程度上严格地说,哈萨克斯坦也可归为此类。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是俄罗斯,前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占据高位并且

^① Anatoly Khazanov,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ationalism during Perestroika and Afterwards”, *Nationalities Papers*, no. 1(1994), p. 168. 着重号后加。

牢固地掌握着经济权力和命脉。^①

乔纳森·埃维斯(Jonathan Aves)在他对苏联解体后新出现的国家的评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88

共和国精英们能够很好地迎合民族主义议程,这不仅让他们从中央控制下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他们在众所周知的大众运动中游刃有余并以策略取胜……考虑到这一过程的戏剧性,其迅速和规模以及持续性的因素是非常众多的……已经建立新宪法和立法机构的后继政权里,几乎没有一个是被苏联最高苏维埃承认的……中亚共和国的总统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是一个例外,他是前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第一书记。^②

集体权利优于个人权利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上,巩固的民主体制必须尊重个人权利。公民权越是具有包容性,越是容易平等地获得,民主的品质就越高。我们在第二章中认为,我们并不认同大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家关于权利的认定,他们坚持认为所有权利都必须是个人的和普世的。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权利似乎没有必要一定要是普世的。事实上,合作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一些形式的集体权利(比如语言、教育或者宗教权)让与给了群体。^③然而,所有的民主理论家都接受一个信条:诸如此类的集体权利——我们认为其诉求在一些多文化和多民族的政治体中应当慎重实施——必须保证决不侵犯个人权利或者产生事实上的二等公民。

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基于民族地域而建立起来的联邦国家之一。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前,苏联在给予各共和国内“主体民族”特别的集体权利的问题上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紧张关系。维克多·扎斯拉夫

^①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p. 156, 着重号后加。

^② 参见他的“Assessing the Prospects of the New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22 no. 1(1994), p. 211, 212。着重号后加。

^③ 关于不违背民主原则的协合式团体权利的实践的评论,参见 Arend Lijphart,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21 (1969): pp. 44 — 59, 以及 Keneth D. MrRae 编: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Accomodation in Segmented Societies* (Toronto: McClland and Stewart, 1974)。

斯基(Victor Zaslavsky)准确地洞察了这些紧张关系：

整个联邦的政治管理体制是为民族的不平等而精心安排的结构。它用两种方式划分民族群体，一种是按照公认的领地原则和组建国家中那样的等级阶层原则来划分，另一种则没有领地。它把以前的民族群体按照四个等级阶层来组织，等级则由相应的民族权利和特权的大小来决定。而且，民族领地的边界经常按照“分而治之”的政策被主观地任意划分，这造成了与历史传统和现存的民族地理状况之间的明显冲突……另一类似的政策，即用于内部护照的国籍注册和对行政区内当地民族的优惠待遇，在事实上起到了极大的反作用。所有这些政策都最终被证明在本质上是反精英统治的……他们在少数民族中间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在许多情况下它导致了一种具有潜在爆发性的种族的劳动分工……在那些主体民族被分割成无数少数民族的共和国内，形势尤其紧张。^①

很明显，即使有着最谨慎的民主政治技艺，国家结构和国家认可的不平等形成的遗产也将是难以应对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名义民族的独立优先于民主化的形势下，对于大多数苏联后继国家的领导人来说，独立意味着对“名义”民族的集体权利进行深化、法律化和现实化。 389

在俄罗斯，以上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叶利钦在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维埃中央的斗争中，经常告诫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的地方精英要“尽可能多地拿走主权——只要你吞得下”^②。因此，在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发表的几个月内，“俄罗斯联邦内的每一个自治共和国”都纷纷效尤。^③ 由于“21个主要的主体民族中只有5个”成为民族自治共和国，这一事实使俄罗斯的形势更加复杂。^④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叶利钦努力通过坚持推行俄罗斯主权宣言而达到破坏联盟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通过

^① Vicotr Zalavsky, “Success and Collapse: Traditional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载于 Ian Bremmer 和 Ray Taras 编: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5, p. 39.

^② 参见 Gail W. Lapidus 和 Edward W. Walker,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Federalism: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载于 Gail W. Lapidus 编: *The New Russi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p. 83.

^③ 同上, p. 83.

^④ 同上, p. 87.

鼓励俄罗斯自治(也就是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头目(恰巧也是一些非常保守的共产主义者)在新联盟条约问题上直接和他自己谈判,来达到削弱叶利钦权势的目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俄罗斯自治地区成为新联盟条约中的一员,而叶利钦则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是企图破坏俄罗斯联邦。叶利钦对自治地区的著名的言论“尽最大可能争取主权”应当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予以考虑。

伊安·布莱默(Ian Bremmer)认为:在整个苏联,独立成了“以民族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由”,以及许多群体“宣告自己独立”的热切目标。^①他继续说道:“主体民族和低一级的主体和非主体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控制……第一序列的主体民族可能会利用自由的辞令来和中央打交道,但同时却反对它们领地内更低级的主体的和非主体的民族发出这样的诉求(发挥其控制力)。”^②

这种情况,尤其在俄罗斯,通常会导致非主体民族的两种类型的行为,从而引发国家性问题和民主化问题。其一,非主体民族被驱动着脱离联盟,并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主体民族地区。其二,它们同中央勾结起来并把非民主的直接管理规则强加给主体民族地区。^③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在独联体国家(CIS)中有6000万人居住在他们的民族—国家或者主体民族地区之外,那么集体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的问题将更加严重。事实上,苏联解体后,有250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外。^④这样的新情况引起了苏联后继国家中存在的三角关系问题,即在民族国家里的野心勃勃的精英、在这些政治体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和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祖国之间存在的三角关系。^⑤这种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对可能成为合作民主制度的设计者构成了危险,因为已经有足够肥沃的土壤来破坏国家的合法性,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其理由是“没有保护国外本民族兄弟”,而对于国内的威

① Ian Bremmer, “Reassessing Soviet Nationalities Theory”, 载于 Bremmer and Taras, *Nations in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p. 15. 着重号为原书所加。

② 同上, pp. 16—17。

③ 关于“控制”和“勾结”关系的极好的正式模型,以及大量实践参照,参见上书, pp. 11—12。

④ 参见 Khazanov,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 171。

⑤ 参见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载于 *Daedalus* (Spring 1995): pp. 107—132。我们将在下章中利用这一三角关系来检验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的公民问题。

权主义者来说,则是根本不想给予“第五纵队的外国人”以平等的公民权。^①

经济重建优于民主国家重建(俄罗斯的案例)

一个拥有清晰的法律等级和有能力汲取社会剩余以及推行新的民主政府的政策的较强国家,对于民主巩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许多民主公民权只有在完整的国家、可实施的法治和可用的国家机构的条件下才能取得。甚至市场导向的经济计划比如私有化,如果由一个能制定并采用明晰的管制框架的国家来实施也会有效率得多,因为基于法律的经济社会可能会因此出现。^②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么也必须由新的民主力量建立起来,否则民主将无法得到巩固。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民主化通常必须发端于国家的政治重建,给予国家新的基于共识和宪法的权力。在我们已经证明过的、存在国家问题的西班牙,情况尤其如此。全国范围的选举以及共识性的宪法的创制,是建立合法的国家权力基础的两种形式。只有这样的权力才能持久,经受得住联邦关系和经济体重建的震荡。

39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联邦内垂直关系时代,俄罗斯所面对的是:需要完成非同寻常的任务,然后才能转变成为一个连贯的民主政治体。在党一国体制终结的背景下,完成这些大量的任务不仅需要经济重建,而且要求创造出新型的民主权力。旧的统治结构和苏联解体方式的相互交织,使得俄罗斯尤其易于发生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横向的权力冲突。而且,现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宪法几乎没有关于行政、立法机构发生权力之争时的冲突管理机制。举个例子来说,宪法根本没有赋予司法仲裁系统以重要角色。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当党一国统治时,国内民主治理框架的缺失并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然而,在越来越多的民主条件成熟时,治理的民主程序的缺失,将导致俄罗斯各联邦间的僵局和权力的缩水。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看来,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应当是国家的民主重

^① 即将成形的民主被这两种要求抵消了。为了应对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拥有驻军,用以保卫所有独联体国家的外部边界,并正在和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积极谈判以求建立类似的安排。此外,俄罗斯还提议把它自己的军队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军队合并。这些信息来自于 Eric Schmelling 的有趣的文章“*The Near Abroad: Being Too Close*”(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January 1995,未发表论文),based o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Daily Report*, November 15, 1994, and December 2, 1994。

^② 所有这些观点在本书第一部分已经阐明。

建,以便于产生民主权力结构。然而(在俄罗斯),事实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991年10月28日,也就是在8月政变后不久,叶利钦向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全体公民的致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主要政策。他告诉代表大会和整个国家,“现在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时刻。现在是决定未来几年或几十年——俄罗斯民族未来和整个国家命运的时刻。我们必须勇敢地踏上彻底改革之路,这需要所有阶层民众的支持。作出主要决定并开始行动的时间到了”^①。

我们非常同意——叶利钦对于国会和人民的呼吁同阿·苏亚雷斯首相向国王卡洛斯和全国公民的致词非常相似,该致词我们在关于西班牙的一章中已经详细分析过。然而,叶利钦关于其行动的具体的优先考虑,和苏亚雷斯首相的相比,则有根本的不同:后者强调的是政治和国家的民主重建应当作为首要的优先目标,相反,对叶利钦来说“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决定性的行动将不得限于经济领域。首要的是经济稳定……其次是私有化以及产生一个和强有力的私人部门联合的健康的混合经济”^②。

直到演讲的结尾,叶利钦才勉强提到了统治治理结构:

我们可以说俄罗斯有一个清楚明白权力来源的时代到了,那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议会和最高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以及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将苏共蹂躏下的权力制度提取出来的动态过程已在进行了。我们并不害怕被指责为不民主,在这一方面我们将坚定行事……从事改革的重任落在俄罗斯政府肩上。对于政府目前的冗余结构而言,这个责任实在是太重了。这一责任只能为这样的政府所承担:它拥有公众普遍的信心、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并能够使人民坚信其行为是正确的。^③

叶利钦在演讲中对最为重要的——如何产生这样的政府——却完全闭口不提。他没有提到在这个新近独立的国家里应举行新的选举。他没有提到新选出的议会产生新的民主宪法的可能性,而只有民主宪法才能为民主权力的运行创造基本的框架。

^① 参见 Boris Yeltsin, “Speech to the RSFSR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Deputies and to the Citizens of Russia, October 28, 1991”, 载于 Dallin 和 Lapidus 编: *The Soviet System*, p. 632。

^② 同上。

^③ 同上, pp. 636—637。

叶利钦在1991年10月时仍然享有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他在1991年6月经过民主程序当选总统,他领导了1991年8月反对政变的行动,然后他领导俄罗斯走向了完全的独立。在此背景下(尽管在1990年3月,国会的大多数议员是在共产党支持下当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以876对16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叶利钦总统的“大爆炸”式的自由市场改革,也就是他的首要和其次的优先选择。^①1991年11月,还是同一个苏维埃时代的议会,投票授予叶利钦法定权力,以实施一年的经济改革。

在我们看来,叶利钦优先选择经济重建而不是民主国家重建,削弱了国家、削弱了民主,并最终削弱了经济。选择恰当的时机在所有政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尤为重要。叶利钦和他的主要顾问在1991年秋天的关键几个月里,把努力全部放在经济计划上并极力向议会和人民证明其优点。我们认为他应当优先考虑扩大自己政党的基础,像西班牙的阿·苏亚雷斯所做的那样,首先确保旧政权时代的议会尽早举行自由选举。可以肯定的是(在俄罗斯)任何这样的努力都没有。让我们详细引用一个亲历者和观察家的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叶利钦)和他的顾问没有选择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而选择了依靠叶利钦本人的领导魅力和权威,来实施经济改革计划以维系这个国家……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和震惊的是叶利钦没有采取的决定和行动。他竟不支持采取新的宪法……新政权在将社会的民众支持制度化上少有作为。叶利钦没有建立政党,更不用说举行选举以促进政党发展。而且,尽管不断地重复来自“民主俄罗斯”的呼声,但他却拒绝举行1991年秋天的选举。^②

393

^① 投票在叶利钦向国会和民众致词后一周举行。关于投票时的政治氛围和环境,参见 Dunlop, *Rise of Russia and Fall of Soviet Empire*, p. 265。

^② 参见米歇尔·迈克弗尔(Michael McFaul)的精彩文章,“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Russia”, *World Politics*, 47, no. 2(1995), p. 226。1991年10月迈克弗尔在莫斯科采访了许多“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社会学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批评,参见 Lilia Shevtsova, “Russia’s Post-Communist Politics: Revolution or Continuity?”载于 Lapidus 编: *The New Russia*, pp. 5—37, 尤其是 pp. 8—10。也可参见 Timothy J. Colton, “Boris Yeltsin, Russia’s All-Thumbs Democrat”中题为“The Political mismanagement of economic reform”的有说服力的章节,载于 Timothy J. Colton 和 Robert C. Tucker 编: *Patterns in Post-Soviet Leadership*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p. 49—74, 尤其是 pp. 60—65。

更多的研究需要进行,因为历史真相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叶利钦 1991 年 9 月在他取得反对政变胜利之后,立刻运用因此而得到的魅力的光环和权威,要求举行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比如,在 1991 年 11 月)的话,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将说服议会接受他的提议。这将需要许多的政治活动、政治谋略以及联盟共建,并诉诸舆论。在 10 月,叶利钦的支持率仍然有 61% (已经从 7 月的 71% 下跌了)。1991 年 9 月和 10 月他说服议会接受他的提议的能力依然很强,正如苏维埃时代选出的国会以绝对多数支持他的经济计划所表明的那样。^① 考虑到 1991 年 6 月叶利钦成功的总统选举中,“民主俄罗斯”已经获取足够的经验,作为“民主俄罗斯”领导人的叶利钦,如果引入更多元的力量与之结盟,并建立一套政治工具来支持他,那么他一定会在新的选举中有不俗的表现。^② 凌驾于政党之上的总统的自我形象,使得这样的政治策略无法实现。然而,如果叶利钦采取了此策略,而且如果选举在 1991 年 12 月举行了,那么一个新的有合法基础的、独立的俄罗斯议会将会投票支持他的经济计划,这个议会还会迅速一致地制定出宪法修正案,并最终彻底重写苏维埃时代宪法。这个新的议会将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宪法基础。这样做,也许会有短期的成本,实施“大爆炸”式的经济改革也可能会被延迟数月,然而,其长期的收益却是实质性的。

在他的《为俄罗斯而奋斗》一书中,叶利钦在回忆时也认为他错失了机遇。“我认为在挫败政变后,错失了最重要的机遇:重建议会体系。我私下怀疑:也许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为新的立法机构选出像样的候选人。关于解散旧的议会并为新的选举设置期限的观点在不断地流传(还有国家的新宪法),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情形。”^③ 叶利钦的回忆录揭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叶利钦事实上没有提到一种可能性,即他可以帮助“民主俄罗斯”或者

^① 关于反事实的分析,参见 James D. Fearon, “Counterfactual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43 (Jan. 1991): pp. 169—195。关于叶利钦在 7 月和 10 月极高的公众舆论支持率,参见 Archie Brow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载于 Amin Saika 和 William Maley 编: *Russi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6。Brown 还认为叶利钦“应该在他的公众地位还非常高、足以说服人民代表大会投票支持他解散旧的议会时,努力促使采用新宪法并为 1991 年末或者 1992 年初的新自由选举设置期限”, p. 33。

^② 迈克弗尔认为:“民主俄罗斯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叶利钦的支持,该组织将会赢得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而在当时,民主俄罗斯是唯一拥有全国影响的合法政党和运动。在刚刚成功组织了 1991 年 6 月叶利钦成功的总统选举,然后带领大众挫败 8 月政变阴谋后,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对于选举胜利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

^③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Random House, 1994), p. 126.

任何其他政党形成强有力的机构作出民主转变。建立民主的政党并不在他认知的和改革的视野中。第二,上文的引用已清楚表明:叶利钦不愿冒险举行选举。但是,正如亚当·普热沃尔斯基和其他民主理论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民主建设恰恰是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接受选举不确定性的过程。民主政治家们所要完成的任务正是通过组织选举运动和政治结盟来赢得选民的支持。但是,叶利钦关于总统超然独立于政党之上,而不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联盟的领导人的观念,以及他统治的风格,都使这样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

由于民主国家权力的宪政重建的缺失,苏维埃时代的立法机构和亲市场经济反苏维埃的行政机构之间开始了一场殊死的权力斗争。直到叶利钦在1993年10月用军队掌握主导权之前,这样跌宕起伏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样的权力斗争对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伤害,而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之下,国家的民主建设又被一再推迟。叶利钦决定保留的苏维埃时代的议会,事实上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和叶利钦政府内支持“大爆炸”式的经济改革的改革者们的利益大相径庭。事实上,在“盖达尔计划”以绝对多数被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的6个月,他的计划就以632对231被议会否决。^①

此外,宪法给予议会大量的质询、审查行政机关的特权。这样,议会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政策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此外,现存政府宪政结构没有被创造出来以促进和引导民主竞争。

395

伊扎克·布鲁德尼(Yitzhak M. Brudny)非常有见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宪法结构的特征,使得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变得无可调和。首先,俄罗斯的总统制在1991年建立以来,就明显地属于“总统议会混合型”。在这样的体制下,总统和议会都拥有对内阁及各部的控制,然而两者之间权力的分工却从没有明确界定……关于总统任期的法律事实上产生了两个相互竞争的国家首领,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其次,俄罗斯关于总统任期的法律没有提供任何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政府内两大权力部门之间的冲突……俄罗斯议会党人,否认总统发起全

^① 关于这一时期俄罗斯立法和行政权力多元冲突的清楚有力的分析,请参见 Yitzhak M. Brudny, “Ruslan Khasbulatov, Aleksandr Rutskoi and Intra-elite Conflic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1991—1994”, 载于 Timothy J. Colton 和 Robert C. Tucker 编: *Patterns in Post Soviet Leadership*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75—101。

民公投或者解散议会的权力,反对倾向于保存这些特权的总统选举。^①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卢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可以利用苏联时代的宪法特权来向政府各部和机构下达直接命令。他发出的命令经常和叶利钦签署的总统令相龃龉。在1992年,哈斯布拉托夫发出了66个这样的命令,而在1993年的前6个月,他做出了630个以上这样的命令。^②

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仅仅在发起后的4个月后便宣告流产了。议会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并宣称其有权任命和监管中央银行行长。议会的任命造成的结果是和叶利钦—盖达稳定经济政策完全南辕北辙的经济政策的出笼。政府在议会上的弱点同时也意味着,国有企业经理可以通过他们在议会中的同盟者的立法,产生出“内部人”控制绝大多数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结果。这同一种政治联姻也意味着国家要继续给予那些未进行结构改革的企业大量的补助。^③

卷入横向国家权力(立法和行政)斗争的双方都自称拥有民主合法性。俄罗斯的半总统制甚至表现出比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波兰更加危险的趋势。^④事实上,在激烈斗争的俄罗斯,双方都自称拥有一些特权,而这些特权是在任何一个现代的巩固的民主国家中根本找不到的。

在和总统冲突的过程中,议会成功地把苏维埃时代的宪法经典教条——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加入到俄罗斯新宪法中。^⑤这一短语和哈

① 参见 Yitzhak M. Brudny, “Ruslan Khasbulatov, Aleksandr Rutskoi and Intra-elite Conflict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1991—1994”, 载于 Timothy J. Colton 和 Robert C. Tucker 编: *Patterns in Post Soviet Leadership*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85—86。

② 同上书, p. 86。

③ 参照前文引述的迈克弗尔的文章。关于俄罗斯私有化后内部控制的有说服力的补充经验研究, 参见 Katherina Pistor, Roman Frydmar 和 Andrzej Rapaczynski, “Investing in Insider-dominated Firms: A Study of Russia Voucher Privatization Funds”, 以及 Joseph R. Blasi,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ussia”。两篇文章都发表于世界银行和中欧大学私有化工程的联合会议, December 15—16, 1994, Washington, DC。

④ 参见第十六章关于波兰背景下半总统制的补充性分析。

⑤ 同上书, p. 228。这一短语源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的分析, 以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巴黎公社的赞誉。在《国家与革命》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部分, 其标题是“取消议会制”, 列宁认为要以公社“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列宁认为巴黎公社完成这一任务, 通过“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巴黎公社作为办事机构的例子, 是基于公社直接建立并管理法庭和其他行政机构这一事实。通过这种方式, 直接民主不仅将导致议会政治的消亡, 而且最终将实现“国家的消亡”。所有详尽的历史研究无不表明, 当列宁开始着手建立苏联的结构时, 他却迅速地把“苏维埃”以及任何形式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抛诸脑后, 取而代之的是集权的党—国制度和超国家主义。尽管历史事实如此, 然而关于反议会民主和“一(接下页)

斯布拉托夫支持的修正案使得俄罗斯成为“会议政体”(assembly regime)而不是半总统制政体,或者甚至不是议会制政体。^①也就是说,苏维埃将直接选举、监督甚至管理国家行政和管理机构。这种会议政体还将行使司法权,因为无论苏维埃面对何种情况,它都将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制宪会议存在。^②从巴黎公社“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原则出发,哈斯布拉托夫和其控制的议会认为他们拥有更高的合法性,并一度试图弹劾叶利钦。到1992年10月,哈斯布拉托夫甚至还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只听命于他和苏维埃的议会保卫军。

叶利钦从自身立场出发,基于其直接总统选举诉求更高的合法性。甚至他还走得更远:他频繁地发出黑色警告要直接诉诸全民公投。在对巴西和阿根廷的讨论中,我们分析了被奥唐奈称作“委托式民主”的总统制类型,这种总统制通常有着诉诸极端的全民公投和反制度主义的特征。^③叶利钦在反对议会的斗争中,其作为已非常接近于奥唐奈(关于“委托式民主”的总统制类型)的描述,甚至还加上了更加激进的成分:叶利钦以立法机构的苏维埃起源来否定其合法性。俄罗斯社会学家丽莉娅·谢夫索娃(Lilia Shevtsova)含蓄地认可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叶利钦“踏上了自上开始的‘革命自由主义’道路”,其特点是“使用个人感召力使政治过程人格化,[并]依靠总统权力的垂直系统来推行其政策”。^④

397

德怀特·泽姆勒(Dwight Semler)在他对俄罗斯1993年前6个月宪政发展的评论中,生动地描绘了在宪政改变缺失的情况下,一个潜在的民主的部门

(接上页)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的讨论依然成为后苏维埃时代政治争论的重要部分。关于苏联政治文化和哲学中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摇摆效应、直接民主、反议会民主,在前面曾引用过的由俄罗斯社会学家Sergeyev和Biyukov所著的*Russia's Road to Democracy*一书中有详细讨论。

① 关于哈斯布拉托夫计划的精彩讨论请参见Brudny,“Khasbulatov, Rutskoï and Intra-elite Conflict”。

② 1977年苏联宪法(基本法)——它的许多精神依然存在于俄罗斯1991—1993年宪法中——正式给予了苏维埃名义上的对国家所有权力的控制。宪法第2条称:“苏联所有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行使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基础。一切其他国家机关处于人民代表大会控制并向其负责。”

第108条给予苏维埃控制行政和立法权。“苏联国家权威的最高实体是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有权处理苏联司法体系内的任何事务;有权制订和修改苏联宪法……以上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不可侵犯的特权。”参见John N. Hazard编:*The Union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载于Albert P. Blaustein and Gisber H. Flanz所编的系列,*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Dobbs Ferry, N. Y.: Ocean Publication, Oct. 1990)。

③ Guillermo O'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5,no. 1(Jan. 1994):pp. 55—69,尤其是p. 64。

④ Shevtsova,“Russia's Post-Communist Politics”,p. 9。

(行政)如何习惯性地质疑另一个潜在的民主的部门(立法)的合法性。举例来说,在1993年2月,

叶利钦不断重复他的观点——目前的政治形势使俄罗斯已无法治理……叶利钦声称他不会屈从于宪法,因为它只不过是苏联时代的一个文件的重复而已,并且被一个鼠目寸光的议会胡乱地修改。他警告说:如果没能就权力共享达成一个明智的协议,那将意味着“独裁统治或者无政府主义的俄罗斯”——这样的言论,加上叶利钦将要实行“紧急状态管制”的谣言的广泛传播,使形势变得更加充满火药味。

紧张形势在3月20号达到了高潮,这天叶利钦进行了一次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议会侵犯了分权原则,并攻击宪法法院没能够制止议会的不法行径。叶利钦宣布为了保存国家,他已经签署了一个法令以建立一个特别的总统制政体。虽没有试图解散议会,然而叶利钦清楚明白地表明,新“政体”将使任何反对总统命令的法案都归于无效。^①

在1993年9月和10月,宪法危机最终以武力得以解决。叶利钦单方面解散了议会。1991年8月,叶利钦的形象是站在一辆坦克上保卫“白宫”,而1993年10月的象征,则是叶利钦的坦克“粉碎”了“白宫”。

我们需要重申我们主张的观点,我们坚信这一主张已经得到很好证明,即叶利钦在1991年秋天优先选择经济重建而完全忽视议会、宪法和国家的民主重建的决策,更进一步削弱了已经虚弱不堪的国家,并剥夺了经济改革计划成功实施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政治连贯性和国家一致性,并造成了政府内部三个权力部门之间的合法性的相互否定。^②

^① Dwight Semler, “Special Reports: Crisis in Russia”,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 no. 3(1993): pp. 15—19. 在宪法法院和立法机构的强烈抗议后,叶利钦最终软化了原来的立场,1993年3月的危机最终烟消云散。

^② 当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叶利钦和国会对抗时选择支持叶利钦时,同时还应注意到俄罗斯的民主组织机制在1993年9月以大量的其他方式受到极大破坏。正如阿奇·布朗所观察到的,危机的暴力解决还意味着“宪法法庭的无限期延迟和20多家报纸的暂时关闭,以及政府审查制度和电视控制的加强”。参见Brow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p. 33。

1991年秋,叶利钦如果采取民主战略,将会有助于在1992—1993年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和完成更成功的经济改革,这一反事实分析,请参见McFaul, “State Power,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rivatization”, 尤其是 pp. 238—243。

后苏维埃时代的半总统制：结论性的补充

处于转型中的苏联和俄罗斯，其政治发展强调了一些我们在本书中曾强调过的主题。关于后苏联（非波罗的海国家）和后南斯拉夫国家的混合总统制产生的民主问题，可以而且应该作为一个主题来写许多专著。^① 既然比较政治学家们已长期关注于这一问题，让我们简短地把前苏联国家和俄罗斯半总统制政府的特征罗列出来，因为半总统制在这些国家有着异常复杂和易于爆发政治危机的特点。

1. 总统制和旧的非民主的、部分不具合法性的苏联时代的制度的长期联姻，造成了一个全新的而又含混不清的总统制模型，从而使得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变得异常复杂。

2. 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由于1991年6月叶利钦的当选，诞生了具有合法性的总统制，并开始了双重合法化的过程，所有的总统制政体都必须和立法机构和平共存，而立法机构也拥有其民主的合法性并拥有自身独立的职责。由于俄罗斯缺少一个可以明确界定不同政治行为体的权力和角色的宪法，这一双重合法性的经典问题在俄罗斯变得更为复杂。

3. 关于总统制和半总统制民主政体中的共性问题，我们还应当加上苏联独特的“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的传统给予立法机构和其主席以超常的权力而造成的问题，而这一权力和基于分权原则的民主模型是根本不兼容的。

4. 出于暂时的实用主义的考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支持选举一个和自己政策意见相左的副总统，而这样的副总统通常都因为支持反对总统的政变阴谋而结束，频繁的政变阴谋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其他总统制危机的常见现象。^②

5. 在马修·S.舒加特(Matthew S. Shugart)的分析中，最不稳定的半总统制是他称之为“总统一议会制”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议会可以对内阁投不信任票。舒加特认为“如果宪法既允许议会多数可以解散内阁，同时又允许总统单方面解散内阁，那么就没有关于内阁向谁负责的制度性界

^① Ray Taras 正在编写一本类似的专著，初步命名为 *Presidential Systems in Communist Stat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② 举几个有限的例子，在巴西，副总统 João Goulart 完全反对总统 Janio Quadros 的政策。在菲律宾，在一场针对总统 Corazon Aquino 的主要政变中，副总统 Salvador Laurel 承认他自己最多只是（对总统）“一半的忠诚”。

399 定,行政—立法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这种制度性安排无论在何时使用,都会产生不稳定……最为凶险的,是在魏玛共和国(造成的恶果)”^①。这种不稳定的类型成了前苏联非波罗的海地区所有后继国家的标准。撤换总理的确是保护总统的“保险丝”,然而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导致决策领导中不断的危机。这对于经济改革过程影响尤其巨大。事实上,1991—1994年乌克兰的半总统制导致了三头政治:总统、总理、议会及其主席,这种三头政治引起了数不清的不确定和冲突。^②

6. 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可以解决政治行为体间的冲突,这种诉诸人民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但它时常导致民粹主义式的政治动员而不是政党政治。它还导致了召开全民公投的无休止的口水战,使整个讨价还价和政党建设过程变得更为复杂,而这两者对于构建某种程度上自治和稳定的制度化的政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7. 正如我们和其他学者在其他地方所认为的那样,总统制和强有力的半总统制,如果没有历史悠久的政党系统结构,将无助于政党政治的形成。总统总是喜欢凌驾于政党之上,并不认同自己作为某个政党成员的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叶利钦没有利用机遇把“民主俄罗斯”从一个运动型的政党转变成为真正的政党。这种总统凌驾于政党之上的趋势由于后苏联时代的宪法而变得更加恶化,宪法规定总统不能够领导政党甚至不可以成为某个政党的成员,这和

^① 参见 Matthew S. Shugart, “Of Presidents and Parliament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 no. 1(1993), pp. 30—32。对他分析方法的完善,参见 Matthew Soberg Shugart and John M. Carey,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关于乌克兰半总统制的重要研究,参见 Andrew Wilson, “Post-Communist Presidents. Ukraine: Two Presidents, but No Settled Powe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d Slavic Studies, Philadelphia, November, 1994)。修正版出现在前面曾引用的 Ray Taras 的文章。另外参见乌克兰政治学家的精彩作品, Oleg Protsyk, “Do Institutions Matter? Semi-presidentialism in Ukraine and France” (Master’s thesi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June 1995)。前苏联后继国家中的总统陷入两头政治和三头政治的漩涡中,他们不断寻求在现有的总统权力(相当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之上扩展总统权力。举例来说, Shugart 和 Carey 在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一书中,发展出一种把总统权力用数字估算的方法, pp. 148—158。他们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打了 7 分。1994 年末,希望落空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Kuchma)提出了一个关于总统权力的新法案。按照 Protsyk 的估算,库奇马的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会产生按照 Shugart-Carey 方法估算出的 19.5 的总统权力分值,这甚至比按照俄罗斯新宪法(1993)中“超总统制”的总统机关而估算出的 14.5 还要高。关于俄罗斯总统制,参见 Stephen Holmes, “Superpresidentialism and Its Problem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2, no. 4(1993), pp. 123—126。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完全不同。

8. 并非所有前苏联的总统一议会冲突,都一定会导致像俄罗斯发生的总统炮轰议会的暴力危机。然而在一些后苏联共和国中,使用非民主方法解决总统与议会间的紧张的趋势增强了:总统越来越频繁地强令议会休会,用命令来统治,并使用令人怀疑的闪电式的投票来扩展自身权威。^① 400

许多因素造成了前苏联后继国家在民主问题上的困难,但其中之一,并非不重要的是早期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未达成一致:如何在决策结构上制度化地导入人民的民主渴望。由是观之,制度的确重要。

^① 在土库曼斯坦在苏维埃时代有 99.9%的民众在全民公投中投票支持扩展总统权威,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 2000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在暂停国会后,单方面决定公投问题并迅速举行全民公决,其结果是扩大了自己的权威。

第二十章 当民主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 冲突之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15 个新国家从 1991 年的苏联解体中产生。这些国家是以前苏维埃联邦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为基础产生的。这些新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是根据苏维埃联盟中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来命名的。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1991 年所产生的大多数新国家，它们在人口上是多民族的。^① 虽然如此，管理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精英们以每一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获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途径。一旦掌权后，管理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大多数精英们便会采取这样一种战略，那就是试图将他们的多民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作为一本致力于研究民主化的著作，这些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去研究两个主要的问题。是否存在这样的境况，即民主和民族国家成为相冲突的逻辑？^② 如果这种境况存在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获得一种包容的民主？^③ 我们认为在诸如从前苏联新独立出来的国家中，这

① 另外，他们中的少数民族身份是由登记在苏维埃内部护照中的国籍所注明的。这种身份认同不是主观界定的，而是以出身、血统为基础的，无关个人的人身、语言和文化特征。我们认为身份认同通常是由社会建构的，是复合的、可变的。然而，苏联的这一套官僚政治的规则，固定了苏联内部的单一的不可改变的身份认同。我们相信，这样一种以领土为基础的法定身份认同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作为同是联邦体系的印度和加拿大，虽然也把出生地登记在护照或个人档案上，但它们并不会把个人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从属登记在上面。甚至南斯拉夫的苏联形式的联邦体系都不会把个人的种族记录在护照上。

② 这一章是对阿尔弗莱德·斯泰潘的“*When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State Are Competing Logics: Reflections on Estonia*”一文的重大修改和扩展版本，载于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1994): pp. 117—141。非常感谢允许我们引用这篇文章。

③ 对于现代民主的包容性的讨论，见 Robert A. Dahl 的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7。

些问题和政治的复杂性可以通过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出来的“‘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这三角分析框架来进行阐述。^①

我们决定在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内部来详细地探究这种内在的三角关系。选择这三个国家的原因有三个。首先，这三个国家过去有民主国家的经验，它们相对发达的经济和它们作为欧盟潜在成员国的身份，使它们拥有在前苏联的 15 个新兴独立国家中最支持民主化的条件。这些国家的民主破产决不是必然的。第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些国家在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之前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准确地来讲就是单一民族国家逻辑和民主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俄罗斯对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语少数民族来说是一个庞大的、不稳定的、具有潜在侵略性国家主义的、自认为的“祖国”。对于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的不当处理，不仅会导致不稳固的民主，还会威胁到一个或更多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完整。第三，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个非常稳固的研究基础。^② 接下来就让我们分析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联整合的遗产，以此开始我们的比较性的分析。

402

① 我们要再次引起读者对罗格斯·布鲁贝克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的注意，在这些研究中，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种三维关系中：跟随单一民族国家战略的精英，国家中跟随单一民族国家政策的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的祖国。布鲁贝克的计划是致力于研究这种三维关系中的三种成分之间的“力量领域”(fields of force)。我们的目的与其紧密相关，但我们特别注重于这些发展中的关系是如何影响民主化的。关于大量的对布鲁贝克的著作的参考，详见本书第二章的注释。

② 这些基础包括正在进行当中的主要的比较调查，分别在汉斯-迪特·克林格曼(Hans-Dieter Klingemann)及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指导下进行。戴维·莱廷和布鲁贝克也经常发表一些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如语言和民族主义等话题的重要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这一章后面将充分引用这些成果。Antol Lieven 的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是最好的全面介绍与波罗的海国家民主化有关的重要的历史和政治事件的著作。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情况，参见 George von Rauch 的 *The Baltic States: The Years of Independ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以及 Tõnu Parling, *The Collaps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of Authoritarianism in Eston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关于苏联时代，参见 Romuald Misiunas 和 Rein Taagepera 的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这是对 1983 年原版进行扩展和修改的一个版本。关于爱沙尼亚，参见 Rein Taagepera 的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Westview Press, 1993)。这本书对民族国家与俄罗斯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进行了精确的评估。关于拉脱维亚，参见 Rasma Karklins 的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Latv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与 Taagepera 的书不同的是，Karklins 的这本书认为民族国家战略对事实上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相对没有问题。

波罗的海国家沉重的遗留问题

早先的非民主国家体制的历史和特有的遗留问题对于任何关于民主化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没有一个地区,它的历史比在波罗的海国家更具有重要性。在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中,先前的非民主的体制,前苏联,从人口上、文化上、经济上甚至是生态上,粗暴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政体。

表 20.1 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口统计。1920 年代、1930 年代与 1980 年代的比较

群 体	百分比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1934 年	1984 年	1939 年	1989 年	1923 年	1989 年
名义民族	88.3	61.5	75.5	52	69.2	79.6
俄裔族群	8.2	30.3	10.6	34	2.5	9.4
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	NA	4.9	1.4	8.0	NA	NA
波兰裔	NA	NA	2.5	2.3	15.3	7.0
犹太人	NA	NA	4.8	0.9	8.3	0.3
德裔	2.2	0	3.2	0.1	NA	NA
立陶宛族	NA	NA	1.2	1.3	—	—
其他	0.8	3.3	0.8	1.4	4.7 *	4.0 *

来源: Antol Lieven 的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32—434。在立陶宛的其他项的星号指的是 Lieven 对此的估计是“大部分是白俄罗斯人”。关于波罗的海国家一系列时间的有价值的人口数据,也可见 Romuald Missiunas 和 Rein Taagepera 的 “The Baltic States: 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353。

NA 表示数据无法获得。

403 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当中,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拥有最坚固的民主政治的经验。这两个国家和立陶宛在 1918 到 1940 年间是独立国家。1920 年代,它们拥有多党竞选体制,并且爱沙尼亚对于文化少数派的宪法安排在欧洲也属政治上最负责的。^① 然而,民主确实实于 1927—1928 年在立陶宛失败,

^① 李帕特特别指出爱沙尼亚是因为它对其少数民族的具有开拓性和民主性的宪法程序。参见他的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83—184。关于对爱沙尼亚 1925 年文化自治法律的完整描述,参见 Karl Aun 的 “The Cultural Autonomy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Estonia, (*Yearbook of the Estonian Learned Society in America* 1(1951—53): pp. 26—41.)

接下来于1934年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失败。然后是秘密条约《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1939年的签订,这个条约将波罗的海共和国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军队于1940年6月入侵这些国家并将它们吞并。1941—1944年纳粹德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侵占与这之后苏联对它们的重新吞并,对于任何民主进展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与前苏联的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历史上的民主经验是可以利用的。然而,当这些国家在1991年重新独立时,却拥有根本不同的人口构成。因此,对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来说,在民族国家的目标与包容性的民主目标之间存在着挫折与冲突(见表20.1)。

根据1989年的人口普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口有160万,其中大约100万是爱沙尼亚族人,60万是非爱沙尼亚族人。首都塔林只有50%多一点的俄语人群,而纳瓦,这个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边界城镇,俄语人口占94%。这种民族的混合,特别是1940年被苏联吞并后大量俄罗斯移民的进入,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都会产生紧张。何况,在爱沙尼亚人和波罗的海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他们的环境并不是最好的,而是充满了失败感和种族的屈辱感。^①

404

波罗的海国家的那些俄语少数民族真如人们所称呼他们的那样,只是这些国家的“临时居住者”吗?他们能成为新兴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忠诚的公

^① Misiunas 和 Taagepera 在 *The Baltic States*, pp. 354—355 中制作了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中他们做出了关于1939—1945年间由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政策导致的人口流失的有根据的猜测。单是爱沙尼亚,他们估计这些流失的人口包括1940—1941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和处死的人口(1.5万),1941年和1944—1945年间苏联军队动员的人口(3.5万),1941年撤离到苏联的人口(3万),以及苏联在1944—1945年间驱逐出境和处死的人口(3万)。他们估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的流失人口中,只有大约2万爱沙尼亚人在1945年之前回到了爱沙尼亚。他们所引用的关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数据显示出更严重的状况。例如,1944—1945年间苏联在拉脱维亚驱逐出境和处死的人口就达7万,在立陶宛则是5万。在1941—1945年纳粹侵占期间,在立陶宛有20万人被驱逐出境和处死,在拉脱维亚是9万,在爱沙尼亚是1万人。在这些人口当中,据估计分别有18万人、7万人和1000人是犹太人。在Rose和Maley的关于波罗的海民族的研究中,42%的被访者表示他们家庭中的某人曾经被驱逐过、监禁过或处决过。关于被苏联侮辱的历史记忆比关于被德国侮辱的历史记忆强烈很多,列苏联为他们苦难的源头的被访者比列德国为他们苦难的來源的被访者多了8倍(Rose和Maley,问题216)。显然,很少有犹太人能够幸存下来并回忆起波罗的海犹太人特别是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惨遭的大屠杀。Richard Rose和William Maley,“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a Survey Study”,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p. 222(1994)。

民吗?^① 在 1993 年的一个在统计数据上有代表性的民意测验样本中,爱沙尼亚的相当数量——35%的非波罗的海人说他们是在爱沙尼亚出生的。这个数据在拉脱维亚是 52%。绝大部分参加了民意调查的非波罗的海人说他们已经在波罗的海国家居住了超过 21 年:具体数据是爱沙尼亚 78%,拉脱维亚 86%,立陶宛 81%。在剩下的波罗的海少数民族人口中,爱沙尼亚的 15%,拉脱维亚的 9%和立陶宛的 10%的人都说他们作为长期居民在这些国家已经居住了 11 至 12 年的时间。^② 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裔的确是一个外缘的、难以处理的遗产,但他们并不是临时的居住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时曾经从 200 万下降到 140 万的拉脱维亚的人口,由于战后 535000 个非拉脱维亚族移民而增加了。1939 年在战争开始之前,本地人口占 75.5%,而在 1989 年却已经下降到 52%。拉脱维亚独立时拉脱维亚人在其 7 个主要的城市中都只占少数,从祖玛拿的 47%,到东部城市陶格夫匹尔斯的 13%。在拉脱维亚,俄裔占总人口的 34%,白俄罗斯族占 4.5%,乌克兰族占 3.5%,虽然他们是俄语人群,并且失去了与原来国家的大部分的联系,然而,俄罗斯却为他们提供公民的资格。^③ 里加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④ 里加的俄裔共同体是有其历史地位的,并且其一些主要领导人支持拉脱维亚独立。硬要将里加转变为纯粹拉脱维亚式的文化与政治的城市,是与其传统不一致的。在人口问题上,波罗的海国家中,将民族国家的逻辑与自由民主的逻辑相协调最困难的国家是拉脱维亚。

在人口统计方面和文化方面,最容易走向自由民主的国家是立陶宛。立

^① 在新兴(重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中,不可避免地会在俄裔、俄语人群和非波罗的海人这些术语之间产生混淆。正如表 20.1 所显示的,独立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大量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人口。这些少数民族大部分是俄语人群但并不必然是“俄裔”。可能在表 20.1 的其他项中的人口大部分都是现在是独联体成员国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语人群。在这一章里,我们把名义上的民族的成员(例如,种族或文化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称为波罗的海人。我们把其他人称为非波罗的海人或波罗的海少数民族。当研究数据明确指明是“俄语人群”,以示与“俄裔”不同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确定数据。由于身份认同是由社会构建并不断改变的,我们(在戴维·莱廷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俄语人口,无论是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还是其他独联体的加盟共和国,正在发展成一种新的“俄语少数民族”在外散居者的身份认同。

^② 参见 Rose 和 Maley 的“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pp. 52—53。这些数据都是建立在 1993 年 9—10 月的一个调查上,这个调查包括有 6136 个访问,波罗的海国家的 7 个主要的民族,每个都有 1 个有代表性的数据样本。

^③ 参见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pp. 433—434。

^④ 例如, Lieven 在 *The Baltic Revolution* 中引用数据证明 1867 年里加的 42.9%人口是德国人, 25.1%是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占 23.6%。

陶宛同样经历了被苏联吞并和占领的历史,尽管大部分的天主教徒保持着反苏情绪。可以确定的是,在立陶宛改革运动组织(Sajudis)的领导下和独立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的人格魅力的指引下,1989—1991年的立陶宛反苏民族主义动员与波罗的海的任何其他地区一样热烈,或比其他地区更加激烈。虽然如此,但是立陶宛在独立时俄裔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9%。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占人口7%的波兰少数民族不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家乡。由于在立陶宛的民族政治精英中存在较少的人口方面的“担忧”,因此在心理方面和政治方面,对立陶宛来说都较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更易于对其居民采取一种包容的公民身份战略。^① 由于非立陶宛人只占其人口的很少比例,以及少数民族的异质成分并不多,因此立陶宛人在公民资格上从来没有推行过排外政策。非立陶宛人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所有的研究数据都证明立陶宛拥有很大程度的人口上的融合。因此,对于这一章的目的来说,立陶宛并不真正存在着民族国家逻辑和自由民主逻辑之间的重大冲突。

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它们恢复独立的时候都拥有独立的国家状态和民主的传统。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是,这三个国家并不是自1917年后或内战之后,而是自1940年后才成为苏联一部分的。但是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差不多50年的整合,使它们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与“帝国外围”(outer empire)的中欧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

恢复国家地位和重建一个民族之间的不同区别成为波罗的海国家民主建设过程中的中心问题。这个过程的含混可以从1991年在位于里加的议会门外的一个路障上所涂的口号中看出,这个口号是从1863年波兰人民反抗沙皇的斗争中得来的:“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这个口号所暗示的承诺是独立和民主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波罗的海民族和其他民族。^② 然而,不久之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关于公民资格的争论,即属于某个民族代表着拥有特权。大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俄语民族)被定义为是外来的“殖民者”或“临时的居住者”。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同时拥有两个民主选举团体的会议这样一个事实更能象征以上的问题了。其中一个选举团体,共和国最高

^① 关于立陶宛的包容的公民资格的授予,参见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pp. 309—410。

^② 同上书, p. 303。

苏维埃,是一个主要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组织占优势的议会,是于1990年春由所有的居民选举产生的。另外一个选举团体,被称为“公民大会”的这个一致倾向于独立的选举团体,其选举人只局限于1940年以前的居民及他们的后代。^① 我们可以说,由倾向于独立的人民阵线占优势的最高议会是新兴多民族民主国家的一部分,而公民大会则是民族的代表。在这方面,波罗的海国家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甚至在独立之前就在国家内部给予一个民族民主的代表。这种两重性是由当时的模糊的优势所造成的。这种模糊性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到反映:这两个团体的成员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叠。重要的是,起草1992年宪法的宪法大会是由官方的最高议会和同时存在的爱沙尼亚公民大会各自命名的30位成员组成的。让我们来分析这种向独立和民主的或非民主的代表和竞争形式的双重转型的复杂性。

向独立和民主转变:互补和冲突的要素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对损坏生态的项目的抗议或要求重建艺术纪念碑的活动,使爱沙尼亚开始出现活跃的表达不同政见的活动,如爱沙尼亚的国家遗产协会(National Heritage Society),这个组织在1989年1月曾经要求建立一个单独由1940年前的公民及其后代选举产生的公民大会。在拉脱维亚,1987年在里加自由纪念碑(Freedom Monument)前的对1941年斯大林主义驱逐(Stalinist deportations)的周年纪念活动,表达了民族情绪。1987年关于拉脱维亚经济自主的计划反映了对当时经济的沮丧感。1989年夏天,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承认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条约的存在,这意味着苏联统治的非合法性。波罗的海国家的共产党开始分裂为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者和支持人民阵线与改革运动组织者,1988年8月,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对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这样的莫斯科改革者感到同情。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来自各种各样不同的背景,其中最主要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既有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技术专家,而且大多数都有共产党的背景。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主要

^① 对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控制的议会与最终产生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爱沙尼亚人大会的民族爱沙尼亚公民委员会之间的两重性和竞争的极好的分析,参见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pp. 170—182。

是由共产党核心机构的自由主义派别所建立的。1989年和1990年，立陶宛共产党和爱沙尼亚共产党经过多数投票决定脱离苏联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从中间派分裂出去。最高议会通过了主权宣言、新的公民法律、对自然资源和工业的控制权的声明，最重要的是对苏联吞并的合法性的驳斥。

在1990年2月和3月最高议会的选举中，除了精神病患者外，所有的成年永久居民都享有投票权。^①要取得候选人的资格，只需是在共和国居住了10年的永久居民。政党几乎没有时间去准备选举，候选人是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某个政党成员的身份去参加竞选的，但通常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政治组织的支持。人民阵线在这些竞选中成为占优势地位的议会组织。^②在爱沙尼亚，105个代表中（其中4个代表军队），人民阵线得到了46个席位，工人集体联合议会（Joint Council of Work Collectives）（支持爱沙尼亚作为苏联共和国的地位）在俄语人群的支持下赢得23个席位，而由共产主义者和支持独立的但又与前苏联有一定联系的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民主选举联盟（Democratic Election Coalition）“自由的爱沙尼亚”，取得了13个席位。在爱沙尼亚选举出来的105个代表中，大约27个被认为是俄语人群的代表。

拉脱维亚的最高议会由201个席位组成。人民阵线赢得了其中的131个席位。主要由共产党及其支持者所领导的反对独立的反对派团体获得了59个席位。其他的8个席位由无党派者所获得。

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裔共产党员与莫斯科的强硬派合作建立了苏联忠诚运动，以反对改革者以及人民阵线中倾向于独立的秘密力量。亲苏力量在爱沙尼亚被称为“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国际运动”，在拉脱维亚被称为“国际阵线”，在立陶宛被称为“联合”。有时候官方工会，有时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工人集体联合议会（OSTK），都会做出努力去动员“大联盟（All-Union）”工厂的讲俄语的工人。1989年8月，由工人国际运动和工人集体联合议会号召的一次普遍的罢工得到了5%—8%的工人的支持。同样的努力在1990年5月遭到失败。大多数工人都拒绝腐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领导，但

408

^① 参见 Jan Ake Dellebrant, “The Reemergence of Multipartyism in the Balti-States”, 载于 Sten Berglund 和 Jan Ake Dellebrant 编: *The New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 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Cleavag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1), pp. 74—106.

^② 1990年由人民阵线获得胜利的选举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建国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1992年爱沙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个选举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举动，那就是剥夺在1990年前的选举中有投票权的俄裔族群和俄语人群的公民权。

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能够使他们自己与其共产主义的过去说再见。

在共产党的亲苏派别中,也有一些不能够转变去支持独立的波罗的海人——不像一些倾向于独立的共产党领导人,如立陶宛的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拉脱维亚的阿纳托利斯·戈尔布诺夫斯以及爱沙尼亚的阿诺尔德·吕特尔。一些不支持独立的共产党领导人离开了波罗的海,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则继续活跃在那里的政治领域。

在1990年2—3月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选举中,苏联的忠实追随者赢得了俄语人群的多数人的选票。然而,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俄语人群的很多选票,但在立陶宛的独立宣言之后,俄裔少数民族在第二轮投票中对人民阵线的支持却减少了。其最后结果是,人民阵线的139个候选人被选举(包括5个俄裔、2个波兰裔和2个犹太裔),62个平等权利(Equal Rights)候选人被选举,其中8个是拉脱维亚族人。^①

当然,仍然有一些俄裔少数民族不能接受独立以及莫斯科反对革命失败的现实。例如,纳瓦议会公然反抗爱沙尼亚宪法,破坏边界邮政,并创建了一个亲苏的准武装力量工人特遣部队(the Workers Detachment)。1992年前共产党员在纳瓦的地方选举中获得胜利。然而,边界地区的分裂威胁在1995年似乎暂时中止。

1990年夏天,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正处于完成由被选举的代表所决定的向独立和民主转变的过程中。虽然是建立在人民阵线异质的联盟以及为单独候选人投票的基础上,选举还是具有竞争性及公平性的。接下来的政治将不是关于是否要民主的辩论——正如我们曾经界定的那样——而是关于何种民主的辩论:是以几乎所有的永久居民的公民资格为基础的包容的自由民主,还是针对1940年前的居民的后代的、排外的“民族的民主”。^② 第二次转变正在

^① 对于1990年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选举的优秀的比较叙述,参见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pp. 214—315。

^② 关于“民族民主”的概念,参见 Juan J. Linz 的“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一文,载于 Fred I. Greenstein 和 Nelson W. Polsby 编: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75) 3: pp. 326—330。在这篇文章中,林茨将民族民主描述为这样一个政体,只是针对占优势族群的民主,而在种族划分的基础上将其他族群排除出民主的过程。关于这个概念的应用,参见 Yoav Peled, “Ethnic Democracy and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Arab Citizens of the Jewish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no. 2 (1992), pp. 432—443, 以及 Vello Pettai 的 “Emerging Ethnic Democracy in Estonia and Latvia: The Dynamics of Sovereign Nationalism and Minority Identitis” (波罗的海研究促进学会第十四届会议论文,芝加哥,1994年6月8—11日)。

进行中。

爱沙尼亚在比较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特别由于它与俄罗斯的重要联系——开始它的转变过程。1991年1月，当苏联的“黑贝雷帽”军事部队（或 OMON）袭击并杀害大约 20 名波罗的海国家的示威者时，当时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爱沙尼亚总理的邀请下来到塔林，马上签订了俄罗斯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互相承认条约。叶利钦要求俄罗斯军人不要向平民开火。爱沙尼亚裔美国社会学家（1992 年的总统候选人）雷恩·塔克佩拉（Rein Taagepera）认为叶利钦对爱沙尼亚的支持破坏了一部分自称为俄罗斯拥护者的计划，这些人要求直接强迫爱沙尼亚接受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叶利钦的作用在尝试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中同样重要。苏联的军队于 1991 年 8 月 21 日向塔林前进。第二天爱沙尼亚即宣布独立。两天之后，叶利钦以俄罗斯的名义，在所有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之前率先承认爱沙尼亚为一个独立国家。^①

409

要了解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对俄裔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们不应该忘记全能主义和前（重新）独立时代的遗产的影响。如果没有参考过去，我们将很难理解人民阵线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或者改革运动组织在立陶宛的作用。它们是运动而不是政党。它们是在反对莫斯科和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联合起来的有着不同的领导人和议程的派别的联合。这些伞形组织的组成部分将会以互相对抗与分裂的形式结束。但它们是历史的催化剂。在转变过程中共产主义成分是很重要的，事实是在长期的全能主义的统治下，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持政见不同者，都曾经在某个时刻在政权的组织中工作过。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机关，另外的一些在政党或共青团，另外还有一部分在作为政府的喉舌的文化机构工作，为体制效口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妥协。这种过去与苏联政权体制存在着牵连的遗留问题，使得新兴的倾向于独立的精英们面对毁坏性的互相谴责，以及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没有什么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眼光狭隘者”或政治流亡者的持续的攻击，显得非常脆弱。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已开始赞成对公民资格实行包容政策（被称为独立基础上的对几乎所有居民实行自动的公民资格的“零选择”）的政治家，也向排外的民族主义选择转变。这种排外的选择将公民资格限定于 1940 年以前的公民及其后代身上，因此剥夺了许多在波罗的海出生的俄语人群的

^①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p. 202.

公民权利。

410 让我们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从包容的公民战略到排外的公民战略的转变。1990年5月6日,拉脱维亚发表主权宣言两天后,拉脱维亚最高议会的主席阿纳托利斯·戈尔布诺夫斯在拉脱维亚电视台进行俄语演讲,他承诺所有想成为拉脱维亚公民的人都能够成为拉脱维亚的公民。他同时也签署了一个正式文件,保证拉脱维亚的非拉脱维亚族居民的政治与文化权利。他坚持,谈论“二等公民”是不严肃的事情。然而到1992年夏天,这同一个拉脱维亚领导人却提倡进行一次旨在将公民资格限制在1940年以前的公民及其后代身上的公民投票。^①

波罗的海的俄裔:文化上不可同化在政治上却可整合?

对于一个民主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其少数民族是否向多样的互补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政治忠诚开放,如果是的话,他们是否能得到公民资格?如果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政治自由能够得到保证,他们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忠诚的公民,还是会把他们最基本的忠诚留给他们的“祖国”?显然,这样的问题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样的情形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幸运地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调查方法来进一步探究这些主题。

1990年6—8月由著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汉斯-迪特·克林格曼指导进行的一次独立前的调查表明,俄裔以及爱沙尼亚族人和拉脱维亚族人,拥有相对较强的对各自共和国的身份认同感,以及相对较弱的苏联身份认同感(表20.2)。

表20.2揭示了三方面。第一,尽管苏联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超级大国,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裔族群对苏联的认同感还是相对较弱的,虽然在爱沙尼亚这种认同感要比在拉脱维亚稍微强一些。第二,1992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独立,苏联解体而独立的俄罗斯出现之后,拉脱维亚只有4.2%的俄语使用者认为他们的第一身份认同是俄罗斯,而53.2%的俄语使用者认为他们的第一身份认同是他们所居住的共和国。在爱沙尼亚的俄语使用者中,以上的比例分别是12%和38.3%。第三,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数据表明,波罗的海的俄裔少数民族是能够拥有多样的和互补的身份认同的。即是说,客观上和文化上,

^①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p. 304.

他们是俄语人群；但主观上和政治上，他们是接受对他们所居住的共和国的认同的。

表 20.2 两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在属于苏联的时期(1990 年 6—8 月)和独立后(1992 年)的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非爱沙尼亚族及非拉脱维亚族人的身份认同

411

		问题：首先，你是如何认识你自己的；其次呢？							
		百分比(%)							
答 案	年份	爱沙尼亚族		非爱沙尼亚族		拉脱维亚族		非拉脱维亚族	
		首先	其次	首先	其次	首先	其次	首先	其次
“我所居住的共和国”	1990	66.9	30.9	37.3	26.7	72.8	24.5	38.5	39.5
	1992	52.3	34.8	38.3	37.4	63.1	36.6	53.2	35.2
“我所居住的城镇、地区”	1990	30.3	28.3	32.5	28.3	25.6	55.3	41.6	24.5
	1992	44.0	40.4	40.4	21.5	32.9	39.1	37.1	25.2
“苏联”	1990	0.5	2.0	21.5	21.2	0.9	1.7	10.6	17.4
“俄罗斯”	1992	—	—	12.0	20.9	0.2	0.2	4.2	15.5
“其他国家”	1992			0.3		0.7	2.1	1.3	6.9
“欧洲”	1990	1.0	11.5	2.1	4.1	0.5	10.7	0.9	5.7
	1992	2.4	3.5	3.5	5.9	0.9	13.6	0.8	9.0
“全世界”	1990	1.3	3.6	6.6	9.8	0.2	7.8	8.4	13.1
	1992	1.3	2.7	5.6	7.0	2.3	8.5	3.4	8.1
访问数量(人)	1990	621		387		449		460	
	1992	629		380		587		481	

资料来源：Hans-Dieter Klingemann 和 Mikki Titma 的 *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n Baltikum, Eine Vergleichende Umfrage in Litauen, Estland und Lettland im Juni-August 1990*, 1992 年的数据来自 Hans-Dieter Klingemann 的 *Values and Elections (Preelection Survey) in Estonia, Lithuania and Latvia*。1992 年的问题有一点不同：你认为你首先属于哪个地理位置？其次呢？

另外一组问题说明非波罗的海少数民族，虽然没有波罗的海族群感觉那么强烈，但也仍然为作为各自共和国的居民而感到自豪。表 20.3 表明超过 3/4 的波罗的海人为他们作为他们各自的共和国的居民感到自豪。

在 1990 年的同一个调查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共和国的未来如何？”只有 42% 的非爱沙尼亚族人、30% 的非拉脱维亚族人及 28% 的非立陶宛裔人支持完全维持现状(见表 20.4)。

412 表 20.3 “你对你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感到多自豪?”1990 年波罗的海民族的回答

答案	百分比					
	爱沙尼亚族	非爱沙尼亚族	拉脱维亚族	非拉脱维亚族	立陶宛裔	非立陶宛裔
“非常自豪”	39.5	11.3	72.7	21.1	45.8	13.1
“自豪”	49.0	65.3	24.9	63.5	43.0	66.4
“不是很自豪”	10.4	18.7	1.6	13.5	10.3	15.3
“根本不自豪”	1.2	4.6	0.7	1.9	0.7	5.1
访问数量(人)	621	387	449	460	837	163

资料来源:同表 20.2 中引用的 1990 年的调查。

表 20.4 波罗的海国家不同民族对与苏联未来政治关系的不同态度:1990 年 7—8 月

答案	问题:“你希望你的共和国的未来如何”					
	百分比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族	非爱沙尼亚族	拉脱维亚族	非拉脱维亚族	立陶宛裔	非立陶宛裔	
苏联以外的独立国家(独立选择)	87	15	84	26	80	27
苏联框架内的独立共和国,可与其他共和国缔结条约(邦联选择)	11	35	9	32	15	39
苏联联邦框架内的独立共和国(现状选择)	1	42	3	30	2	28
其他答案	1	4	1	1	1	0
不知道	0	4	3	11	2	6
访问数量(人)	620	387	449	460	837	163

资料来源:Hans-Dieter Klingemann 和 Wolfgang G. Gibowski 的“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m Baltikum”(提供给作者的未出版的原稿)。

虽然表 20.4 给了 1990 年时支持独立的非波罗的海人较低的百分比,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拉脱维亚的数据却显示出,非拉脱维亚族的国家忠诚者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由社会建构并可改变的。事实上,拉斯玛·卡尔柯林斯关于拉脱维亚的研究表明,1989 年 6 月,只有 9% 的非拉脱维亚族人支持独

立，而1990年10月却有26%的人倾向于独立。1991年3月，有39%的非拉脱维亚族人支持拉脱维亚独立。^①

由于苏联全能主义国家内部俄裔身份认同本身存在的危机，前苏联的俄裔在外散居者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显现出一些独特的特征。1917—1991年的俄罗斯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苏联国家所覆盖的民族国家和文化体。苏联国家本身潜心于其“国际主义者”的国家建构。夸张地说，成为俄国人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讲俄语。散居在外者中大部分人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义为“俄语人群”而不是“俄罗斯人”，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在苏联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和在新兴的独立的俄罗斯内建构俄罗斯文化—民族身份认同的情况。但是，仍然有证据表明，目前在俄罗斯国内特别是在俄罗斯国外，俄罗斯“民族主义”还处于虚弱状态。我们不要忘记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中心要素，俄罗斯东正教，在过去被迫害、被毁坏、被“私有化”了。大部分的人口已经被去基督教化了。俄罗斯的历史在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中被掩盖。“伟大的卫国战争”被说成是对“苏联祖国”的保卫。俄罗斯的爱国纪念碑是苏联的纪念碑。所有这些过去的历史使散居在外的少数民族的要求的表达，更多地限制于“语言”上面，而不是在“民族”要求上。这同样对居住于祖国的俄罗斯人，特别是在“邻国”的俄罗斯人将他们的身份认同定义为潜在的国土统一论者(irredenta)的意愿施加了一些限制。^② 所有这些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语少数民族的未来可能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什么呢？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俄裔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去文化”化(decultured)，只要他们意识到他们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个人生活机会比他们返回俄罗斯的生活机会要好——一个财富调查数据所反映的看法——他们将会更乐意去融合，或者可能在长期内被同化。^③ 事实上，在对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移民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假设，俄裔希望他们的后代学习一门波罗的海国家的

① 参见 Karklins,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 50.

② 另外，正如我们在第十九章讨论过的那样，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大部分的政治单元是非俄罗斯族人，并总共有1200万人。

③ 对于波罗的海俄裔来说最主要的是他们返回俄罗斯后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个人生活机会是否会得到改善。研究表明波罗的海的俄裔对他们在俄罗斯获得工作和住房的机会感到非常怀疑。这就使离去的选择充满风险并变得不可能。事实上，戴维·莱廷和杰里·霍夫在1993年在爱沙尼亚进行了一项涉及1461人的调查，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莱廷估计只有3.1%的俄语少数民族表示了对离开选择的真正的兴趣。见 David D. Laitin 的“The Russian Speaking Nationality in the Post-Soviet Dispora”(美国政治学会年度会议论文，纽约，1994年9月1—4日)，p13。

语言,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交流技能。^① 然而,审慎地讲,要求中年的、只会说俄语的产业工人去学爱沙尼亚语,只是为了保住工作或能够投票或为了能够得到国家服务,这将会引起对于他们或她们的工作安全的担忧,以及对国家是为所有居民服务还是只为爱沙尼亚族人服务的怀疑。

在可预见的将来,语言政策将会是波罗的海国家俄语少数民族的主要关注。大多数的俄裔人口在产业上拥有工作。爱沙尼亚人和俄裔之间的语言鸿沟是非常巨大的。45%的爱沙尼亚俄裔和33%的拉脱维亚俄裔声称他们了解一门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剩余的大部分俄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只有适度的可用性要求。然而,对于爱沙尼亚1979年和1989年的人口普查的分析表明,在爱沙尼亚首都的俄裔人口中,会说爱沙尼亚语的在1979年和1989年只占12%和15%(见表20.5)^②。

414 总之,独立前后,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爱沙尼亚)的俄裔少数民族人口单在语言方面,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内是绝对不可能从文化上融合进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认为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裔少数民族人口在政治上则能很快速地融合进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呢?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是俄裔少数民族对于其祖国身份有较低的积极认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认同双重(特别是地理)身份,他们强烈意识到他们(包括他们的孩子)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生活机会比回到他们所谓的祖国的生活机会要好,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还有他们对于在他们的共和国已经发生的政治变化的整体积极的评价。在我们看来,拥有这些特点的人是一个国家的潜在的忠实公民,而这个国家能给予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利和少量的文化保护,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的保护。

遗产对于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民主过程中和转变之后所作的选择,同样可以降低或提高民主巩固的可能性。下面就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作出的选择,特别是由爱沙尼亚族人和拉脱维亚族人的政治精英

^① 例如,林茨对于移民到巴斯克国家(与爱沙尼亚一样拥有非常复杂的语言)的双亲俱全的少年进行调查,调查表明这些少年并不拒绝教育系统以巴斯克语进行教学的想法;39%的回答者希望小学能加入西班牙语必修课和巴斯克语选修课,35%希望教授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的必修课,18%希望巴斯克学校教授必修或选修的西班牙语课。参见 Juan J. Linz, "Los jóvenes en una España multilingüe y de nacionalidades", 载于 Francisco Andrés Orizo 等编: *Juventud española 1984* (Madrid: Ediciones S. M., 1985), pp. 325-436。数据来自 p. 384。

^② 参见 Peteris Zvidrins, "Changes of Ethnic Composition in the Baltic St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22, No. 2 (1994): p. 377。

所做的选择。

表 20.5 由访问中所使用的语言得出的波罗的海共和国人民的语言知识(1992 年访问的报告)

语言知识	百分比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族	俄罗斯族	拉脱维亚族	俄罗斯族	立陶宛族	俄罗斯族
只会俄语(或只会非波罗的海语言)	—	45	—	33	—	22
只会波罗的海语言	74	1	52	4	64	4
会波罗的海语言和俄语(或其他非波罗的海语言)	26	54	48	63	36	74

资料来源：Hans-Dieter Klingemann, Jurgen Lass 和 Katrin Mattusch 的文章。数据由 Hans-Dieter Klingemann 提供。应该注意的是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中对语言知识的主观估计是非常不可靠并且受到了社会的压力。也就是说以上的数据几乎可以说是对俄语少数民族对波罗的海语言的知识的夸大的表述。

选择：包容性与“他者化”的话语

随着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可能性的增加，爱沙尼亚的政治领导人开始强调爱沙尼亚民族国家的逻辑和权利，而不是强调独立和民主本身。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法律和政治的步骤去提高对民族国家的热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公民法律从对于国家公民资格的广泛的、包容的定义转向狭窄的排外的定义。^①在独立的运动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提议，那就是任何一个在爱沙尼亚出生或者参加了独立运动的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选择成为爱沙尼亚的公民。但是到最后，爱沙尼亚族的民族主义者想要把独立的国家和其民族视为一体的愿望太强了，以至于没有东西能抵挡得住。公民资格后来只给予那些在 1940 年爱沙尼亚被吞并之前出生在爱沙尼亚的个人及他们的后代。这就意味着，例如，那些是爱沙尼亚人的后代，但却从没到过爱沙尼亚的加拿大或美国公民拥有在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而那些 1940 年之后出生在爱沙尼亚并且一生都在爱沙尼亚居住的俄裔却得不到公民资格。这样一种排除性

415

^① 参见 Peet Kask, “National Radicalization in Estonia: Legislation on Citizenship and Related Issues”, *Nationalities Papers* 22, no. 2 (1994): pp. 379–391.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只有 1992 年之前就是公民的个人才能在 1992 年 9 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投票、组织政党,或被选举。事实上,在一个将要走向新兴的民主国家这样一个关键的、基础性的时刻,这样的公民法律剥夺了爱沙尼亚将近 40%人口的公民权利。

语言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情,因为正如我们所见的,大部分的俄裔族群并不会说爱沙尼亚语。1989 年 1 月,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规定爱沙尼亚语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法律。预期在两年之内,懂得爱沙尼亚语将是强加给在服务业和贸易业的所有工作岗位工作的人的要求。在四年之内,所有的国家官方通信都要使用爱沙尼亚语。对于许多年纪较大的、受教育较少的俄裔来说,这带来了使他们失去工作的威胁,甚至在私人部门也是这样。同样的,这也意味着,如果他们要向国家咨询他们的权利与服务,他们也要使用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政权正在开始使它自己与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一大部分民众疏远。

所有这些立法和政治决定都遭到一些爱沙尼亚族人和非爱沙尼亚族人以政治审慎和政治民主的名义提出的反对。然而,在民族国家逻辑和与这个逻辑相联系的有着法律和道德理性的强大支撑的团体的基础上,这些决定都被坚决地加以维护。在语言方面,提出的假设是,如果一个国家是这个民族的表达,那唯一能存在的官方语言就只能是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爱沙尼亚,这种信念由于一种恐惧而感觉非常强烈,这种恐惧就是作为有着非常复杂的语言的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爱沙尼亚会很容易消失。将公民资格限制在被吞并前的爱沙尼亚的居民身上的法律和道德权利,是建立于与波兰的类比的基礎上的,波兰的“权利”排除了波兹南的德国人,其中包括希特勒帮助其定居的德国人(也包括那些在那之前就居住在波兹南的德国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占领力量 and 他们的军队人员都没有权利获得被占领国的公民资格。爱沙尼亚的外交官坚持 1939 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爱沙尼亚被非法占领,因此整个 1940—1991 年这段时期都应该被归类为一个军事占领时期。基于这点,所有在 1940 年之后进入爱沙尼亚的俄国人及他们的后代都是非法的占领者,而没有要求获得自动公民资格的权利。^①

将投票权利限制在公民身上并把自动公民资格限制在那些被吞并之前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个人身上的观点,受到了欧洲国家的普遍惯例的支持,欧洲国

^① 这一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 Vello Pettai 即将要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受到分析和证明。

家也将外来工人和他们的孩子排除出成为他们所工作和所出生的国家的公民的可能性之外。因此,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工人在德意志民族国家里并没有投票的权利,除非他是地方议会的代表。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暂时停顿一下,来思考不同形式的移民在分析上的不同。如果一个移民作为其他国家(或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以观光客、难民、庇护寻求者或移民的身份来到另外一个国家,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毫无问题地拥有给予或不给予他们公民资格(通常是在放弃其他公民资格的条件基础上)的权利。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对于那些在这个国家出生的外国人的小孩,虽然有一些原因可以促使他们获得公民权利。一些如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就拥有给予任何一个出生在美国的人以自动的公民身份的传统。

从分析的观点看,那些迁移到他们自己的较大政治单元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更大的单元内部人员可以“自由”流动的移民,在我们看来是不同于传统外国移民的一种类别。从标准上来说,我们相信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使得“在国家内部”的移民应该成为一种特殊的种类。应该这样假设,当次单位独立时,在新兴国家内部的移民有权利获得公民资格,除非他们宁愿要其他的公民资格或拒绝申请获得公民资格。否则,他们将会被剥夺先前的地位。他们并不是在了解他们是作为外国人的情况下来到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的。

从波多黎各岛迁移到纽约的波多黎各移民是美国居民,虽然在文化上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并不是外国来的居民。他们不需要申请移民许可证。如果波多黎各独立了,这些波多黎各人也将继续,正如他们之前那样,是美国的居民。然而,美国可能会让他们在波多黎各公民资格和美国公民资格之间进行选择。假设美国和波多黎各都不允许双重公民资格,那新兴的独立的波多黎各也会做出同样的行动。然而,因为他们曾经是美国居民(虽然他们是波多黎各人,并且可能对英语一无所知),否定他们作为美国的公民将剥夺他们已获得的权利。在必要的修正的情况下,对于在波多黎各的非波多黎各裔的美国居民也是同样的情况。否认他们在新独立的波多黎各的公民资格——在那里,直到独立之前他们一直是有投票权的公民——将会同样否认他们已获得的权利。

417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关于公民资格的排外性的定义,在这一点上受到欧洲共同体的默认。一位监督1992年9月份的选举的欧共体官员告诉记者,欧共体将不会公开对爱沙尼亚的公民法律和语言法律进

行评论。

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力的,因为它利用了过去的悲伤与不公平。这个观点表达了文化和语言上的渴望,而这些渴望在历史的烛照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它拥有自己的逻辑,也拥有可以利用的法律和政治上的先例。

在一个不可同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内坚持对于政治参与、权利和公民资格作出更广泛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将会经常冒陷于争论的风险。为了逃离这个陷阱,我们必须引入民主的价值和逻辑,以及这个政体的生存能力与和平。简而言之,我们需要通过引入其他重要的价值来丰富这个争论中的术语。我们可能也需要,正如这一章所做的,使这两个逻辑之间的冲突问题化,从而使国内和国际的行为者做出更多的努力来调和民族自我肯定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并且对万一失败而可能出现的危险更加警惕。

这样做的重要性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原因包括民族国家的逻辑产生了一种政治语言和一组描述性术语,它们的话语效果就是产生对立的身份认同并反对多样的互补的身份认同,后者使得民主生活在事实上存在的多民族国家中成为可能。例如,术语“殖民者”被广泛地用来描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口中的俄裔部分。这个术语的含义是俄裔是不合法的存在。但“殖民者”这个词在描述上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把相当数量的人口排除在民族国家之外,其数量远远多于对公民权适当的法律限制所排除的人。例如,大约有10万到15万的俄裔在1940年之前是爱沙尼亚的居民,因此,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在法律上是爱沙尼亚的公民。但是殖民的语言是如此的有力和如此的排外,以至于这些合法公民中的许多人开始感到在民族国家中已经没有他们可以参与的政治空间了。

另一个潜在的分裂性术语是“暂住的”(transient)。由于在1944年到
418 1991年获得独立期间,多达700万的俄国人确实迁入和迁出爱沙尼亚——该国只有150万人口,以此我们可以理解“暂住”的含义。这些苏联公民主要是军事人员和在有限的时间内建造工厂的建筑工人。然而在描述上,它也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因为除了10万—15万1940年前的俄裔,目前8.7万爱沙尼亚俄裔人口是1940年后在那里出生的,并且一生居住在那里。如果不算是文化或语言上的爱沙尼亚人,在地理上他们也算是爱沙尼亚人了。“暂居”这个词,就像“殖民者”一样,掩盖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波罗的海国家视为家乡的事实。

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同样也惧怕对国家不忠诚的俄国移民会在他们之中持续构成一个第五纵队。然而许多城市移民主要是制造业工人，大量研究显示，比起加入政治团体，他们更关心子女在社会中的未来。当然，很多俄国移民因苏联的帝国力量而获得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好处，在由莫斯科的国家部门直接经营的工厂中工作。但当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如果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国家安全得以保障时（也为俄罗斯人提供了安全的栖身之所），俄裔人很可能不再为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的一员为集体利益而工作，而是开始为个人的利益而工作。比如戴维·莱廷假设，爱沙尼亚的俄裔日益接受了竞争同化的逻辑，每个家庭都学习爱沙尼亚语和尽力适应本地文化。在家庭间的囚徒困境中，莱廷预计每个家庭都将主要采取“背叛”（defecting）和同化（assimilating）的策略。^①

关于爱沙尼亚民族国家的讨论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有力的一部分是关于“生存和灭绝”之间的二分法——同样，这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考虑。世界上只有 100 多万的爱沙尼亚语使用者，并且许多与之紧密联系的芬兰—乌戈尔语已经消失了。但自从 1970 年代以来，所有证据都显示爱沙尼亚人在人口统计上抵制非爱沙尼亚人。^② 在独立的爱沙尼亚中，几乎不存在爱沙尼亚族人成为独立国家中的少数的可能性，人口或是文化的灭绝更是不可能的。但短语“语言灭绝”的使用，则使得在社会中建立一种排除俄裔的政治而不是包容性的政治更为容易。^③

对“真正的”民主的回应

419

尽管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后，其政府和议会使公民资格由包容性转

^① 参见 David D. Laitin, “Language Normalization in Estonia and Catalonia”,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3, no. 2 (1992): pp. 149–166。我们更愿意使用短语“develop multiple and complementary identities”来取代莱廷的“defecting”。但无论是莱廷还是我们自己的用语，其发展一系列生存技能的情势逻辑的本质是相同的。更广泛的关于国家合理化和苏联背景下的少数民族的讨论，可参见 David D.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44 (Oct. 1991): pp. 139–177。

^② 如可参见 Rein Taagepera, “Baltic Population Changes 1950–1980”,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12, no. 1 (1981), p. 49。

^③ 如果调查中声称更想要爱沙尼亚公民身份的俄语使用者被授予爱沙尼亚公民资格，爱沙尼亚民族仍将在公民整体中占绝大多数，但国家中的非公民比例将会显著下降。

为排他性,但仍有相当高百分比的俄语使用者(爱沙尼亚为 43%,拉脱维亚为 50%)在独立 18 个月后对政府体制现状感到满意。更高百分比的俄语使用者(爱沙尼亚为 79%,拉脱维亚为 71%)对 5 年后的政府体制持肯定态度。在拉脱维亚,尽管拉脱维亚族和非波罗的海人对过去的评估极为不同,但他们对现在的政府体制的评估却极为相似(见表 20.6),这个发现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关于非波罗的海人能够在政治上被整合的假设。

表 20.6 1993 年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及非波罗的海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五年后的政府体制的态度

态度	回答者人数的百分比			
	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人	拉脱维亚的非波罗的海人	爱沙尼亚的爱沙尼亚人	爱沙尼亚的非波罗的海人
对独立前的政府体制				
肯定	36	66	32	65
中立	14	12	13	14
否定	50	22	55	21
对现在的政府体制				
肯定	43	43	58	50
中立	19	18	16	14
否定	38	39	26	37
对 5 年后的政府体制				
肯定	81	71	88	79
中立	8	13	6	10
否定	11	16	5	11

资料来源:Richard Rose 和 William Maley, "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Studies in the Public Policy*, no. 222 (1994), questions 122-124。

在关于西班牙的讨论中,我们认为,对现在、尤其是对未来的态度比对过去非民主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更为重要。我们相信表 20.6 强调了这种普遍的论点。非波罗的海人比爱沙尼亚族人和拉脱维亚族人更赞同过去的非民主体制。然而,对于建立民主的可能性,非波罗的海人对现在、尤其是对未来的

态度为以后建立多民族民主的可能性提供了乐观的前景。^①

是什么造成了波罗的海人和非波罗的海人普遍相似的乐观态度？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所有的波罗的海居民相信他们的政治权利总体上来说都得到了提高(见表 20.7)。

420

表 20.7 “在允许人们……方面你认为比起过去的苏联体制，我们现在的体制是更好，差不多，还是更差？”

回答	爱沙尼亚族人	拉脱维亚族人	立陶宛族人	平均	爱沙尼亚俄罗斯族	拉脱维亚俄罗斯族	立陶宛俄罗斯族	
“说任何你想说的”								
更好	95	81	87	87	75	71	70	72
差不多	3	12	8	8	17	15	18	17
更差	—	2	2	2	4	5	2	4
不知道	2	5	3	3	4	8	9	7
“去国内想去的地方旅行或居住”								
更好	83	38	64	62	35	30	50	39
差不多	8	34	20	21	20	23	25	23
更差	6	16	6	9	35	32	16	28
不知道	3	12	9	8	9	15	9	11
“如果愿意，出国或在国外居住”								
更好	93	83	90	89	78	76	83	79
差不多	2	4	3	3	8	6	6	7
更差	3	4	1	3	7	6	4	6
不知道	2	9	5	5	7	12	8	9

^① 拉依沃·威利克(Raivo Velik)，爱沙尼亚塔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曾做过一项关于种族认同发展的研究，也为发展多样和全面的民族认同提供了乐观的依据。他采用了彼得·瓦恩里希(Peter Weinreich)发展的“认同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三个爱沙尼亚城市随机抽取的 266 名俄裔进行了分析研究。1993 年 4 月，在这项研究中，72% 的俄裔坚定地认为“此刻住在爱沙尼亚的俄裔的认同是爱沙尼亚人”。与我们认为的散居在外的俄裔人发展了与俄国内的俄罗斯人分离的文化和政治认同的观点相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爱沙尼亚进行的民意测验的俄裔中，只有 18% 的人更认同自己为俄罗斯人而非爱沙尼亚人。然而，他们估计俄国国内 54% 的俄罗斯人相信爱沙尼亚的俄裔更认同自己为俄罗斯人。威利克在研究的结尾得出的结论是“多样身份认同的新元素正在爱沙尼亚的俄裔共同体内发展，其成员正在使自己适应本国的新的社会环境”。可见 Raivo Velik,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djustment in Estonia: Research Note”, *World Affairs* 157, no. 3 (1995): p. 148, 也参见他的“A Strategy for Ethnic Conflict Accomodation”(该文是为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五次世界会议准备的，柏林，1994 年 8 月 20—25 日)。

续表

回答	爱沙尼亚 族人	拉脱维亚 族人	立陶宛 族人	平均	爱沙尼亚 俄罗斯人	拉脱维亚 俄罗斯人	立陶宛 俄罗斯人
“加入任何想加入的组织”							
更好	86	72	86	81	73	67	72
差不多	8	12	7	9	10	12	11
更差	1	4	1	2	5	4	3
不知道	6	12	6	8	13	17	14
“决定是否参加政党活动”							
更好	84	70	83	79	59	59	69
差不多	9	12	7	10	15	13	11
更差	1	3	1	2	9	5	2
不知道	5	14	9	9	17	23	18
“生活中没有非法拘捕的恐惧”							
更好	64	41	57	54	39	29	44
差不多	14	28	23	22	31	31	25
更差	11	7	4	8	12	9	6
不知道	10	23	16	16	18	30	25
“决定是否相信上帝”							
更好	81	76	89	82	74	76	80
差不多	14	17	7	13	19	16	15
更差	1	—	1	1	1	—	1
不知道	3	6	3	4	6	8	4
“保护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的权利”							
更好	86	80	84	84	79	75	70
差不多	8	11	9	10	10	8	7
更差	1	1	1	1	1	1	—
不知道	4	7	5	5	9	16	13
“保护国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							
更好	29	18	43	30	24	13	29
差不多	29	30	26	28	16	17	32
更差	21	23	16	20	48	51	24
不知道	21	28	15	21	12	20	15

然而,我们也需要对表 20.7 中的一些警示性的信号加以注意。爱沙尼亚

和拉脱维亚的俄语使用者认为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游和居住的自由没有得到多大提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与他们对自身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仅作为完整的公民居住甚或作为定居的外国人的权利的忧虑相关。这种不安全感无疑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的，即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后，关于定居的外国人地位的严格法律频繁地被议会讨论。事实上，在1993年6月，一项关于外国人的法律以59比3的票数被爱沙尼亚议会通过，这引起了非居民对留在爱沙尼亚的合法权利的焦虑。该法律被欧共体所有12个成员国批评。在外交批评的压力下，总统梅里否决了该法。但这项法律给俄语使用者留下了不安全感的后遗症。实际上，该法的一个主要的议会支持者，凯里奥·波尔德维亚(Kaljo Põldvere)，十分清楚这正是起草该项法律的人的意图。在议会的争论中，波尔德维亚说：“通过现在的法律手段我们要创造出一种形势，使殖民者感到脚下的土地在颤抖。”^①更令人警醒的是，表20.7表明，在保护俄裔的权利方面，认为现有的政府体制更糟与更好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在爱沙尼亚为2比1，在拉脱维亚为4比1。^②

对我们认为共同的政治庇护能够改善少数群体对国家政策和制度的看法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在包容性的立陶宛，仅有24%的俄罗斯人称对其权利的保护差于旧制度。相反，在排他性的拉脱维亚，51%的俄罗斯人认为境况更差。有趣的是(也可能是积极的发现)，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族人也认为现在的体制在保护俄裔权利方面差于前苏联。

最能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人和俄裔少数民族产生分裂的问题是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只有3%的爱沙尼亚俄裔和6%的拉脱维亚俄裔认为这种选举中的投票权应该限于1940年之前的公民及其家庭。但44%的爱沙尼亚族人和49%的拉脱维亚族人认为应该采取排除性的标准。在包容性的立陶宛，如我们期望的，只有12%的立陶宛族人支持。1940年以前的公民标准见表20.8。

表20.8也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发现——街上的人们(反对他们的政治领

422

^① 引用和关于外国人的法律的争论的描述可参见 Kask, "National radicalization in Estonia", pp. 385-388, 引自 p. 386。

^② 在爱沙尼亚，另一个值得担忧的指数是俄裔少数民族认为他们没有中立的政治保护屏障。在爱沙尼亚，当被问到他们是否相信警察时，32.8%的少数民族的回答是“根本不”。只有14.7%的拉脱维亚族人表现出了相似的忧虑。在立陶宛，相反，非立陶宛人和立陶宛人都对警察表现出了更大的信心，并且他们的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数据来自1992年汉斯-迪特·克林格曼所进行的调查中的问题136，见表20.2。

导)有意愿接受一个比现在法律所允许的更具包容性的议会选举权。比如,如果把关于议会选举权属于“每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十年的定居者”和“在这里的每个独立的个体”的肯定的答案综合起来,56%的爱沙尼亚族人和42%的拉脱维亚族人赞同比现行的条例更具包容性的选举权。

表 20.8 “关于谁应享有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的问题,下列哪种说法最符合你的观点?”波罗的海国家人们的不同回答

答案	回答人数的百分比					
	爱沙尼亚人	爱沙尼亚 俄罗斯人	拉脱维亚人	拉脱维亚 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	立陶宛 俄罗斯人
1940 年前的公民及其家庭	44	3	49	6	12	2
每个出生在这里的人	31	22	25	24	38	18
定居十年以上的人	23	37	15	30	25	22
独立时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2	19	2	15	11	16
任何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前苏联居民	1	16	1	12	10	35
不知道	0	2	7	13	4	6

资料来源:同表 20.5, question 120。

1993年9—10月,接受俄语而非波罗的海语问卷调查的人在关于公民身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且显示出不确定性。在爱沙尼亚,17%的人把自己界定为爱沙尼亚人,41%的人把自己界定为苏联人(一个已经不存在了两年的国家),只有8%的人把自己界定为俄罗斯人,4%的人认为自己是来自另一个苏联共和国的人,6%的人用了其他的回答方式,23%的人回答说“不知道,我没有护照”。在拉脱维亚,35%的人说自己是拉脱维亚人,20%的人说自己是苏联人,4%的人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4%的人说自己是其他的苏联共和国的人,22%的人回答了其他,15%的人不确定。包容性的立陶宛与之相反,96%的人说自己是立陶宛人,2%的人说自己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99%的波兰

人称自己为立陶宛人。^①这些数据反映了新独立国家的政策导致的非爱沙尼亚人和非拉脱维亚人关于公民身份的不确定性。 423

爱沙尼亚公民资格法(1992年议会选举和1992年6月宪法全民公决依其举行)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可以由这样的事实表明:110万到了选举年龄的居民中,登记的人只有66万,在如纳瓦这样的位于俄罗斯边境的城市的全民公决中,77000居民中只有6000人有资格投票。

我们的讨论集中于公民资格、议会选举中的投票权及民众的包容性。这个问题不同于语言 and 文化的同化、能使用两种语言的程度、少数民族在不同区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学校里的语言政策、公众对双语教学的支持以及相关的同化的时间这些问题。这其中内在的悖论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完全同化的民主国家必须以不排除某一部分人的议会选举权的公民身份为先决条件。

必须以自由的价值引导关于这些问题的或多或少普遍的和非歧视的政策,尤其是要承认少数族群的权利,不排除实现共同文化和语言的条件。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会疏远少数族群,甚或疏远多数族群。但这些问题不同于民主包容性的要求。我们不能在此提出要求去创造一个文化多样的、部分双语的社会,在要求最小程度的文化融合的同时允许少数族群同化或保持自己的认同。然而,我们认为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即使不能完全地满足任何一个人——这些办法可被两个族群的大部分人认为是可接受的,并且甚至是平等的,也有助于构建对国家的忠诚并创造稳定、自由和民主的政策。^②

许多俄裔和其他苏联移民不会获得公民资格。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些人中许多被拒绝的人不再抱有获得公民资格的希望,而那些获得了公民资格的人也不会被认为是具有一定文化权利的少数族群,而被认为是二等公民。然而,鉴于住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的不同标准、对生活在俄罗斯的未来的预期、缺少家庭关系及回去之后的前景,他们很想留在这里。“离开”的选择,如 424 我们所看到的,只被极少的一部分人考虑。重要的是,考虑离开的人中几乎有一半把“政治权利和人权受到了制约”作为他们的理由。同样重要的是,几乎

^① Rose 和 Maley, “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question 229。很多俄语使用者称自己为苏联人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不想选择俄罗斯人,并且他们也不被允许选择成为爱沙尼亚人或拉脱维亚人。苏联“公民身份”是唯一他们曾经拥有的公民身份。

^② 多语和多民族背景下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对要求使用国家语言的场景和少数群体能使用自己语言的场景加以区分。学校里的语言和文化政策也是如此。普通的选民和公民在这些问题上比理论家、行动主义者和政府更为灵活和宽容。西班牙双语区的案例可参见 Linz, “Los jóvenes en una España multilingüe”, pp. 325—436。

没有人(非爱沙尼亚族人的 2.9% 和非拉脱维亚族人的 1.5%)把“我不能适应”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作为可能成功移民的理由。^①

波罗的海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不同于印度的英国人、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或是隶属于苏联卡累里亚的芬兰人——这些人都做好了返回故土的准备,他们的国家也已经准备好了接收他们和帮助他们。这些俄罗斯少数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将会作为定居的外国人(来自一个潜在的、强大的、敌意的邻国)留在这些国家——他们曾相信自己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或者他们将会作为这些投入构建民族、要求同化,但又不愿特别推动同化的国家的二等公民留下来。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与南欧、南美甚或中东欧都不相同。这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特有的遗产。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建设新的民主国家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必须克服的历史的重担。但这个遗留问题被这些国家独立后所做的一些决策进一步激化了。不幸的是,当考虑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民主得到进一步增强的前景时,不能忘记民族国家和民主的竞争性逻辑;幸运的是,在立陶宛这几乎不算一个问题。民族建立的过程也加深了平等的、甚或更加必要的国家建立过程——建立武装力量和统一的警察力量(不同于其他组织,他们中有一些与民族党派相联系)——的复杂性。

未来:多民族民主或领土收复

和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可能会被邻国,尤其是像俄罗斯这样强大的邻国,视为是要求收复领土的,这些国家对未来存在的威胁感到忧虑。如果这些国家给受挫的少数族群的要求以支持,或者给予领土上的所有居民文化和政治权利的保护,那么是否这些潜在的主张收复领土的人民就会对祖国更加忠诚呢?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是否可以认为公民资格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促成了对国家的背叛?也许可以。但我们关于立陶宛的数据显示,在立陶宛,给予少数群体公民资格是与其对国家制度的肯定态度相联系的。

拒绝给予少数群体相应的权利是最容易的,并且当少数群体没有外部祖

^① 表 20.2 引用的 1992 年 Klingemann survey 中的 question 139。

国的支持时,可能是最有效的。在许多中东欧国家,吉卜赛人就是这种状况。^①“二战”后德国战败,盟国对德国的占领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可以通过驱逐境内几乎所有的德意志少数人口来解决他们的德国问题。然而,俄罗斯的大小和现在的地缘情况使强制驱逐波罗的海的俄裔居民不能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425

如果转向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民族国家的逻辑已经开始威胁到国家的领土完整,甚至可能是爱沙尼亚的民主。如果爱沙尼亚对人口中的俄裔的态度太过强硬,叶利钦或是他的民族主义的继承者可能会感到使用武力防卫的压力。1992年9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柯兹瑞夫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攻击爱沙尼亚对俄裔人权的侵犯,并提出把爱沙尼亚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②到1995年,他明确指出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使用武力保卫俄罗斯少数民族权利的正当性。^③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爱沙尼亚新法的心理和政治影响,这比法律中的文字所能表达的意思更加有害。非居民被排除在1992年9月20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之外,也不能够组建政党。这两条意味着在爱沙尼亚领土定居的俄裔中的绝大部分在这个新独立国家的第一次选举中没有发言权,不能参与政党体系的创建,不能在1992—1994年的国家议会中担任职务。40%的人被排除在外导致了选举议题甚或民族国家问题的方向的倾斜。在1992年选举中,三个在公民资格和语言问题上持强硬民族国家立场的政党赢得了101个席位中的46席,成为第一届议会中的主要力量。因为不需要拉拢俄裔的选票,即使是比较温和的党派,如社会民主党,也采取了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因为得不到任何俄裔的选票的支持,更具合作性的人民阵线仅获得了16个席位。1990—1992年的议会中有23名俄裔代表。在1992—1994年的议会中,该数字为0。^④

和以前一样,这并不是由原始的、不可阻挡的民族主义驱动的。事实上,

① 参见 Claus Offe, “Ethnische Politik im osteuropäischen Transformationsprozess”, in *Der Tunnel am Ende des Lichts, Erkundungen der politischen Transformation im Neuen Osten* (Frankfurt/Main: Campus, 1994), pp. 135—186。参见类型学, p. 145。

②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3, 1992, p. 9.

③ 参见“Meri Dismayed at Kozyrev’s Remarks, Latvia Likewise”, *Baltic Independent* (April 28—May 4, 1995): p. 6。

④ 参见 Vello Pettai, “Emerging Ethnic Democracy in Estonia and Latvia” (波罗的海地区研究协会第十四届年会会议论文,芝加哥,1994年6月8—11日)。

426 在 1992 年的最初阶段,关于是否允许在爱沙尼亚居住 20 年或以上的俄罗斯人,或至少那些已经正式申请爱沙尼亚公民资格的 5017 名俄裔居民享有投票权,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允许那 5017 名俄裔居民具有投票权纯粹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只占俄裔居民整体的 1%,并且也是俄裔整体居民中最倾向于爱沙尼亚独立的。这个问题被付诸全民公决,整个过程中,大部分有组织的政党进行活动,反对给予这 5017 名俄罗斯人投票权;同样重要的是,总统、总理以及议会发言人都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沉默。公决的结果非常接近:52%的选民反对给予这些数量微小的亲爱沙尼亚的俄裔投票权,48%的选民支持这些人的权利。问题是,政治领导人本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影响结果,但相反,在这个政治过程中,没有一个关键人物在促进包含多样和全面认同的国家观念合法化方面发挥作用。在最后一刻,1940 年前的居民的后代——即使他们一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也被允许在公决和选举中投票,这使得公民资格的排他性更深了一层。^①

在一个并非所有居民的语言和种族都是相同的国家中,语言法也威胁了民主国家的观念。这里,法律所产生的印象比法律本身更加恶劣。因为尽管在将来很多工作都要求使用爱沙尼亚语,但也有很多工作是不需要的(如东北主要讲俄语的城镇纳瓦, Kohtla-Järve 及 Sillamäe 中的工厂)。但并没有人试图传播这一关键的消息。国家是否具有足够的意愿,能否提供足够的老师在俄语使用区中教授爱沙尼亚语也是不清楚的。戴维·莱廷认为,1990—1991 年很多俄罗斯人注册了爱沙尼亚语学习班,暗示了俄罗斯人被同化的意愿高于爱沙尼亚人对其进行同化的意愿。^② 鉴于对俄国人的仇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十年来他们甚至一直拒绝学习最基本的爱沙尼亚用语。然而,从民主政治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的逻辑经常与民主国家相异。在语言这一问题上,必须明白的是,爱沙尼亚政府负有义务。^③

在 1991—1993 年间,基于对公民身份的狭隘界定的爱沙尼亚民族国家建设的逻辑、语言和政治,导致爱沙尼亚族人和非爱沙尼亚族人互动和民主竞争

① 这是根据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1992 年 6 月在爱沙尼亚所做的广泛的访谈得出的,可参见 Kask, "National Radicalization in Estonia", *Nationalities Papers*, pp. 383—384。

② Laitin,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p. 163.

③ 尽管大部分俄罗斯人确实过去不学习爱沙尼亚语,但关键问题是,在独立的爱沙尼亚中,他们,更可能的是他们的孩子,是否愿意学习爱沙尼亚语。调查数据显示了比过去积极得多的态度。爱沙尼亚的俄语使用者中只有 37%的人反对学习波罗的海语言。参见 Rose 和 Maley, "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问题 206。

的政治和社会空间大大缩小。然而到目前为止，波罗的海的俄语使用者选择了被动和不抵抗，这揭示了为什么该地区没有种族冲突。在1993年的调查中，比起波罗的海人，非爱沙尼亚族人和非拉脱维亚族人“加入街上的示威游行以抗议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的可能性更小。惊人的是，有高达50%或51%的俄裔说他们“绝不会”加入政治性的抗议示威活动，而仅有38%的爱沙尼亚族人和39%的拉脱维亚族人这样说。即使是关于公民身份和投票权的问题，也只有38%的爱沙尼亚俄裔和27%的拉脱维亚俄裔说他们可能会考虑通过示威游行来争取自己的权利。^① 427

但1991—1994年的事件意味着以前不曾存在的民主的障碍，是政治家在民族国家政治的建设过程中不小心甚或是有意地创造出来的，并且也忽略了政治的共识性和合作性——简要地说，忽略了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制造一种有利于巩固民主的政治形式。^②

我们是在苏联解体为15个新国家的广阔背景下讨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例子的，但即使在这些国家中，其国家、民族多样性和民主的关系存在一些基本相似的问题，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也仍有着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应被忽视。波罗的海国家在1918年后曾享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独立。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尽管它们中有许多曾在沙皇专制统治瓦解后短暂地成为独立国家——是因苏联而获得存在和国界的政治实体。独联体国家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帝国的一部分的事实，意味着俄罗斯人以及其他的斯拉夫少数群体已经作为附属公民在这里生活过许多代了。不同于波罗的海国家，在独联体的一些国家中，俄裔是一个现代化的群体。^③ 相反，由于1918年以前德意志人的大量存在及他们的路德教或天主教的文化，波罗的海居民比俄罗斯人更加现代化，或者至少是更加西化。

在那些联邦国家的从属单位中——其主要民族不同于联邦的主要民族——情况又是不同的，比如车臣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车臣的俄罗斯人不是 428

① Rose 和 Maley, "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p. 45.

② 反对多数民主及赞同共识或合作实践的论点可参见 Lijphart, *Democracies*.

③ 事实上，有三个条件使得波罗的海人和俄罗斯人的潜在的融合，尤其是民主和和平的融合比独联体南部国家中穆斯林和俄罗斯人的融合更加容易。第一个是地缘政治条件。鉴于波罗的海国家和欧盟在地理和政治上的相似性，波罗的海国家无疑比独联体国家更愿意回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欧盟关于公民资格被侵犯的批评。第二个条件是军事上的。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使用武力比起对欧亚大陆边缘的国家使用武力更受到制约。第三个条件是社会和文化上的。俄罗斯人和穆斯林存在的差异可能大于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存在的差异。

散居在别的国家的人。他们是联邦中的少数群体,俄罗斯不是他们外部的祖国。车臣的悲剧因此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视为内部冲突而非国际冲突。从这方面来讲,车臣的俄罗斯人和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是不一样的。俄罗斯通过干预以保护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在国际法层面是完全不同的。^① 因此,从地缘政治和从分析的角度来讲,波罗的海、欧亚大陆边缘和新的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国家从属单位中的俄裔少数民族,是处于三个十分不同的境况中的。

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和民主建设:类型学补充

波罗的海政治使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地处理国家建设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建设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四种基本可能,每种可能中都有相当大的变数。类型分类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关于国家建设的战略。国家关于少数人或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的政策可以是包容性的,也可以是排除性的。第二个维度关于民族建设的战略。民族领导人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民和民族应该是相同的,或者在观念上他们能够接受人民中包含不同的少数群体,甚至是民族。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结合形成了四种类型(见表 20.9)。

表 20.9 多民族政治体中的国家、民族和民主建设的战略的类型

民族建设战略:关于人民/ 民族关系的观念	国家建设战略:对非本民族的少数人或少数民族的政策	
	排除战略	包容战略
人民和民族应该是相同的	类型 I:驱逐,或至少是有系统地鼓励选择“退出”	类型 III:努力以民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不特别承认少数群体的政治或文化权利
人民和民族可能不同	类型 II:给予公民自由而非政治权利,使其孤立于政治进程之外,因此没有“发言”的选择	类型 IV:设计一系列承认少数群体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安排,努力包容少数民族

尽管从经验上讲,在任何具体案例中,每一类型内部都会有很多变化,案例也有可能是不同类型的结合体,但我们还是首先分别分析每一类型的纯粹形式。在类型 I 中,政治家在观念上把人民定义为民族,对那些被定义为非本民族的外国人采取公民资格的排除策略。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导致了政治体系

^① 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戴维·莱廷对爱沙尼亚和巴什阔尔托斯坦共和国内的俄语使用者进行了有趣的比较。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得出独立国家中的少数群体和联邦国家附属单位内的少数群体的差别。参见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更倾向于选择驱逐外国人,至少,由于歧视性的政策,类型 I 的战略可能导致鼓励非公民选择退出现有的政治体系——通过迁回他们所认为的家乡,或例外的,通过给予特殊的补偿。

在类型 II 中,政治领导人接受了人民和民族之间的区别,对公民资格采取了排除性的战略。其政策结果是给予非本民族的、定居的外国人市民权利 (civil right),但不是政治权利。

429

类型 III 就公民资格问题采取了包容性策略,在原则上结合了民族 (nation) 身份和民众 (demos) 身份,少数民族只有融入主流文化后,才被允许进行政治性参与。类型 III 中,人民或政治实体的多样性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国家设计的同化政策是很多的。对于那些不能或不愿意被主要民族同化的人来说,这种国家进行的同化战略可能包含着相当多的歧视,并且可能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其结果将是一个各种各样但非多元化的社会。

最后,在类型 IV 中,无论对于居主导地位的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或少数民族来说,公民资格的战略都是包容性的。人民中所有的常住人口都被视为政治实体中具有完全政治权利的成员。只有那些进入国家并知道自己不是公民的外国人才会被排除在外。此外,政治体系给予少数人的群体权利以不同程度的承认。当然,要成为合格的自由民主国家,无论个人是否少数群体的成员,群体的权利都不能侵犯个人权利。这些群体权利包括组织代表少数的政党的政治自由、双语教学的可能性和一些公共服务。就是说,类型 IV 接受了多元社会,多样性不被认为是完全消极的。

第四种类型下的解决办法的范围很广,从允许少数群体的私人组织享有文化的和受教育的生活到多种合作性的政策。合作性的政策包括公开支持社区组织和公共服务,也包括允许在地方或国家层面上使用两种语言。在某些情况下,要承认多民族的社会现实,联邦主义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

除非国家转向强制性的政策,否则纯粹的类型 I 的战略不太可能“成功”。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政策可能会导致内战,或者与少数群体的外部的祖国发生冲突。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类型 I 的战略会与自由民主的要求相容。

430

纯粹的类型 II 的战略如果被少数群体被动地接受,有可能创造一种“种族民主”:在这种政治体系中,只有国家中占多数的民族才能完全参与民主的政治进程,而少数群体只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这样的种族民主当然不能满足达

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所提出的民主包容性的标准。^①

类型Ⅲ和类型Ⅳ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民主概念。在一定的环境下,从中期或长期来看,类型Ⅲ中的同化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建设。但是该政策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民族国家建设者的目标,也取决于少数群体的成员是否准备好了放弃自身的认同、语言和文化而接受主要民族的单一性。成功也取决于少数群体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祖国。如果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存在,那么它将会大大增加类型Ⅲ的复杂程度。如果国家同化战略失败,类型Ⅰ可能会被尝试。但民主,甚或可能是国家完整的风险就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在一个强大的祖国存在并且实施抗议的情况下。

如果类型Ⅲ的政策要被视为民主,即使有义务采取民族建设的政策——在文化上同化少数群体,它也必须满足适用于文化少数群体的特定条件:表达、集会和组织的自由;组织政党;提供候选人竞选官职;以和平手段争取分享权力。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人权外,少数群体还必须享有政治权利。

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少数群体(少数民族)的不满和要求可以公开地表达。得到代表的机会能够(但不总是)使某些少数群体及其组织中的个人获得一些特殊的好处。因为结构性的原因,语言或种族上的少数群体(不同于民主进程中基于意识形态的少数群体)不能希望成为多数,这种现实(根据定义)使得在一个多数民主中,少数群体获得重要收益的可能较小。因此,少数群体往往要求实现类型Ⅳ中的模式。即使不能实现这种共识性或合作性的模式,享有政治代表权的事实也为少数群体提供了分享权力的机会。在国家层面上,如果多数群体分成派系,并且在选举中,或者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多数群体需要与少数群体结成明确的或是潜在的联盟,并且/或者需要得到少数群体及其代表的支持,那么这些情况下少数群体就能够最好地分享权力。在某些时候,少数群体的开价可以很高(如以色列犹太教的少数党派)。

类型Ⅲ中少数群体参与民主进程的重要影响在于,它能引起高度冲突的模式。多数群体坚持进行的同化过程可能会导致少数群体产生挫败感、变得激进或导致温和派和激进者的分裂以及一些成员的背叛行为。暴力行为并非不可能,并且对它的镇压十分困难,还可能会导致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从而严重威胁民主的稳定和国内和平。暴力冲突的循环也可能引起外国(包括外

^① 参见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pp. 5-10.

部的祖国)干预。当少数群体的要求很多而多数群体也同样不愿作出任何妥协时,类型Ⅲ就会变得不稳定、不能独立存在;如果不想摧毁民主,向类型Ⅳ靠拢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很明显,类型Ⅲ的包容性民主国家对少数公民和政治实体都有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有助于类型Ⅲ政治实体的稳定,或促使其向类型Ⅳ发展。但如果操作不当,结果也可能是民主和国家的危机。

类型Ⅲ或者是已经向类型Ⅳ发展的民主政治体能够孤立任何种族、文化或是宗教少数群体中的极端分子,但它不能阻止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采取的反民主的行动(如西班牙的埃塔恐怖分子)。这种情况下,民主领导人大体上可以依靠少数群体中的爱好民主和平的大部分人的支持,从而削弱极端分子对政治体的影响。^① 少数群体和民族主义者的需求不一定要通过摧毁民主、大规模的暴力和内战来实现。但民主并不能保证防止极端主义的出现,正如它无法防止犯罪的出现一样。民主政治体的优势在于暴力活动(无论其动机与理念是什么)最终都将被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定义为罪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政治气氛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这样演进的例子(无论埃塔恐怖分子的行动是多么令人遗憾的、危险的,并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当,他们的活动能够最后结束,不再破坏民主的巩固和稳定。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在一定的环境下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必须看到民主政府在面对种族、民族主义或宗教冲突时可能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正如我们在当代的例子,如在印度看到的那样。^②

432

类型Ⅳ既可能是国家领导人最初的选择,也可能是在尝试类型Ⅲ失败后所转向的选择。^③ 类型Ⅳ可以提供一系列稳定的解决办法,在某些情况中,这些办法可以促成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的形成,或至少是一个承认公民文化和语

^① 参见 Francisco José Llera Ramo, *Los vascos y la política. El proceso político vasco: elecciones, partidos, opinión pública y legitimación en el país Vasco, 1977—1992* (Bilbao: Servicio Editorial de la Universidad del País Vasco, 1994), chap. 4, pp. 97—119。该书中大量表格记录了属于类型Ⅳ的巴斯克地区反民族极端恐怖主义的公共舆论的演进。

^② 在另一本出版物中,林茨认为在总体的民主背景下对人权最持续的侵犯的例子发生在国家冲突和种族、宗教和/或语言冲突相结合的民主国家中(如克什米尔)。见他的文章“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s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Historical and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s”,载于 Asbjørn Eide 和 Bernt Hagtvet 编: *Human Rights in Perspective: A Global Assessment* (Cambridge: Blackwell, 1992), pp. 177—221。

^③ 如西班牙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当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面临着潜在的国家冲突时,苏亚雷斯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迅速地转向类型Ⅳ的政治体。

言多元性的民主国家。

适用的类型：波罗的海的选择

如果民族主义的俄罗斯作为大多数波罗的海少数群体的祖国行为者而存在,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现实状况被接受的话,它们如何与我们的类型相联系? 立陶宛是最容易讨论的一个。立陶宛并没有在合作的方向上太过深入,但它自独立之初就对几乎所有常住居民采取了包容性的战略,这使其明显符合类型 IV。立陶宛可以成为一个巩固了的多民族的民主政体。当然我们承认,立陶宛族人的大多数比较团结的事实使得其比爱沙尼亚,尤其是拉脱维亚,更容易选择类型 IV。

1991—1995 年间,大多数拉脱维亚族的政治领导人明确拒绝类型 IV 的政治体。许多拉脱维亚领导人可能赞同类型 III 的同化战略。然而,从历史上、文化上和地缘政治上讲,少数群体一起构成了拉脱维亚所有最大的城市中的多数,这使得其在短期,甚至在中期,与拉脱维亚人实现同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同样的理由,类型 I 也是一个危险并且困难的选择。类型 II 中对少数的政治隔离可能是可行的——如果俄国方面的冲突不会随之而来的话——但结果将不会是一种自由民主,而是一种种族民主。然而,如果少数群体积极抵制这种排除战略,类型 II 战略的失败的后果很可能是冲突和威权主义。

433 与立陶宛相比,爱沙尼亚精英的政治战略与拉脱维亚更相近。大多数的爱沙尼亚族政治精英不认为类型 III 是理想的模型。^① 鉴于爱沙尼亚政治精英至少愿意给予少数群体少量的文化和政治权利,1992—1993 年,他们向欧盟(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表示正在向我们声称的类型 III 的政治体发展。^② 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从社会上和政治上讲,在爱沙尼亚,主要的竞争模型是类

^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表 20.8 中,普通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公民在对待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的问题上,比政治精英的态度更为开放。鉴于爱沙尼亚政党体系的高度分化,即使是一个小的俄裔政党在组建政府时,也可能要求获得一些议席,从而使精英和大众间的不和谐的观念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② 在文化而不是政治领域,类型 IV 的俄裔人的集体要求甚至得到了一定的接受。一项关于文化自治的法律允许少数民族在建立地方议会和教育机构中充当某些角色。爱沙尼亚总统也主办了“roundtables of ethnic minorities”。然而 1994 年春天俄罗斯频道的关闭及 1993 年教育法禁止国家支持高中以上的俄语教育是国家实施的高强度的类型 III 的政策,见前面所引的 Velik 的文章“A Strategy for Ethnic Conflict Accommodation”。

型 II 的种族民主。类型 II 的种族民主在爱沙尼亚所受到的抵制比在拉脱维亚少。爱沙尼亚族人在爱沙尼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大于拉脱维亚族人在拉脱维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爱沙尼亚的经济也被俄裔少数群体视为强于拉脱维亚。^① 拉脱维亚的少数民族比爱沙尼亚少数民族有着更强的政治参与的历史传统。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上繁荣、政治上可能比较稳定而俄裔人口比较被动且被疏远了的爱沙尼亚与自由民主相混淆。爱沙尼亚自由民主的希望在于，来自欧盟的国际压力、爱沙尼亚对于危险的俄罗斯的慎重考虑及爱沙尼亚族人和非爱沙尼亚族人对民主质量的更高要求这几方面结合起来，可能会促使爱沙尼亚政治体系更具包容性。^②

① 比如，爱沙尼亚被测验的俄语使用者中有 64% 的人同意“比起俄罗斯，爱沙尼亚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提高生活水准的机会”。在拉脱维亚，只有 44% 的俄语使用者同意这种说法。见 Rose 和 Maley, “Nationalities in the Baltic States”, 问题 209。然而消极被动不等于赞同。事实上，立陶宛只有 17% 的俄语使用者不同意“政府公平地对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俄裔人”。拉脱维亚有 54% 的人不同意，爱沙尼亚 61% 的人不同意。同上，问题 159。

② 1995 年，爱沙尼亚政治体系仍旧同时吸收排除性和包容性的压力。在排除性方面，1995 年 1 月 19 日，1992—1995 年议会末期会议中的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的公民法。期刊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中的 Constitution Watch 部分指出：“新法把居住的条件和申请时间由三年增加到六年，并且在已经实施的强制性的语言考试上又对所有申请者增加了新的公民考试（用爱沙尼亚语）。新法测试关于宪法和公民资格法的知识，被非公民共同体的领导人批评为苛刻和不公平的。”然而，在包容性这方面，Constitutional Watch 也指出，1995 年 3 月 5 日的选举中，一个俄语使用者政党的联盟——“我们在爱沙尼亚的家”——赢得了议会 101 个席位中的 5 个。由于议会中党派的高度分化，该联盟在党派间谈判中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使前总理埃得加·萨维萨尔（他加入了执政党联盟）成为反对公民资格排除性政策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事实上，萨维萨尔成为了内部的总理，该职位使他能够在国家权威对待非波罗的海民族群体问题上发挥重要影响。可见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 no. 3 (1995): pp. 11—13。

第二十一章 后共产主义欧洲:对比较研究的总结

考虑到在后共产主义欧洲,特别是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地区,转型所引发的混乱还在继续,很多读者毫无疑问会认为,在本书结论部分,我们将对冲突进行反思,而不是对民主进行反思。虽然在我们的理论路径上,对冲突的关注超过了对权力、国家和公民资格的关注,但我们也关注,在这些争论之后,民主实践是否能成为“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所有国家进行简要比较。可以肯定,就这 27 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之中的一些国家(例如,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塞尔维亚人主导的残余南斯拉夫)而言,如果进行切实评估,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国家现在(1995 年)还不是我们所定义的民主国家,并且几乎没有重量级的行动者试图将推进民主提上日程。^① 然而,在另一些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例如,捷克、匈

^① 然而,虽然在残存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黑山和前科索沃省),当前政府是非民主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残余的南斯拉夫所承受的向民主转型的压力要超过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一般估计。提波·范拉迪(Tibor Varady),南斯拉夫米兰·帕尼克(Milan Panic)政府的司法部长指出,在 1992 年 12 月的总统选举之中,当帕尼克总理对米洛舍维奇进行挑战之时,西方派出的选举观察员不到 30 名,而且大部分人还是在选举前几天才赶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1988 年智利导致皮诺切特被击败的那次公民投票,西方派出了数千名观察员,而且许多人在选举之前数月就开始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根本上在于西方评论认定,塞尔维亚会一致支持塞尔维亚扩张主义,这种“原始的民族主义”(primordial nationalism)是如此强烈,米洛舍维奇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尽管科索沃的穆斯林(大约占有所有潜在选民的 10%)被排除在外,在选举日的投票之中米洛舍维奇可能有 5%—10%的选票作弊,且缺乏来自西方的选举观察员以及财政和技术支持,帕尼克仍然赢得了 43%的选票。我们的观点是,在 1992 年 12 月的选举之中,米洛舍维奇在政治上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一些分析家在对智利和塞尔维亚进行比较之时只能耸肩感叹:“米洛舍维奇从未尊重过选举。”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权力总是寓于相互关系之中。如果米洛舍维奇真的失败了并且取消了选举,那么他就早已背上民主反对者的名声而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削弱,而对于扩张性的民族主义的一致支持的神话也会因此而破灭。

牙利,可能还有立陶宛)之中,民主实践几乎成为最佳选择。因此,结论确实与民主的讨论相关,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提出重要的范畴、参考框架和证据,从而可以对后共产主义欧洲内部进行比较。

作为对上述重要范畴、参考框架和证据的发展的贡献,我们想指出如下三点。第一,我们将讨论实践者和分析家“颠倒合法性金字塔”的危险性,这些实践者和分析家相信市场将使民主具有正当性。我们将指出,成功民主化的历史表明,这种倒转经常发生。民主将使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具有正当性。第二,许多实践者和分析家也认为,不仅存在广为人知的共时性问题(这点我们接受),而且经济和政治目标必须同时实现,否则,糟糕的经济表现将迅速削弱对于民主化的支持(这点我们并不接受)。我们对于中东欧的民主持谨慎乐观态度,而对前苏联地区波罗的海以外地区的国家的民主不那么乐观,我们将会提供经验资料 and 理论解释。第三,前共产主义政治领导人和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和立陶宛等走在民主转型前列的国家重新掌权,很多大众出版物视之为“回归共产主义”,并将其视之为民主化的大逆转。我们将讨论,为什么这种分析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435

颠倒合法性金字塔的危险性

在第二部分关于南欧的结论之中,我们认为,西班牙先进行政治改革,再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序列可能是民主巩固的理想模式。一般而言,我们不会勉强坚持任何序列模式,因为在历史上实际的序列模式运作差异非常大。

大部分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分析家,尤其是政策倡导者,均含蓄地拒斥了西班牙式序列模式,认为其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需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确实,尽管存在这种共时性规律,国内和国际的实际工作者和顾问还是将经济变革置于优先地位。关于后共产主义政治序列问题的扎实研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在理论(和历史)层面,我们相信,必须更多关注后共产主义国家忽视政治改革,特别是忽视国家重建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什么?

从理论上说,我们认为,现代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创造市场,而是创造一个经济社会。此外,从逻辑上说,从指令经济向经济社会转型,需要连续的管制环境和法治。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首先必须创建一个民主管制的国家

436 权力。^① 关于这点,本书提供的经验案例的两个极端便是西班牙和苏联。在西班牙,对于选举序列模式和宪政改革的注意,有助于有效权力的构建和国家重构。而对选举序列模式(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和宪政改革(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主持)的不重视,导致了苏联和俄罗斯的权力削弱和国家解体。

从经验上来看,关于私有化和结构性经济变迁的事后研究(相对于先前的教条式鼓吹)在这个地区刚刚开始出现。然而,对该地区进行的最好研究正在证实在拉丁美洲已经被证明的一种国家权力模式,由相对比较强的国家推进的私有化(常常被误认为等同于“国家收缩”)最为有效,这些国家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关于私有化和国家重构的众多研究说明,有效的私有化限制了国家的范围,但是加强了国家能力。^② 在后共产主义和后指令经济背景之下,国家能力的迅速削弱并不能有效地推进私有化进程。^③

① 另外一个争议是,所有或大部分公有财产的私有化是否是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二战”之后,奥地利和意大利迅速成为保留了大量公有部门的国家,但是或多或少又是有效的民主市场经济。

② 关于这一现象的四个重要研究包括 Albert Fishlow,“The Latin America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no. 3(1990): pp. 61—74; Hector Schamis, “Re-forming the State: The Role of Privatization in Chile and Britain”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4); Peter Evans, “The State as a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载于 Stephan Haggard 和 Robert R. Kaufman 编: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Distributive Conflict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9—181; 以及 Joan M. Nelson 编: *Intricate Links: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尤其是 Jacek Kochanowicz 的论文, “Reforming Weak States and Deficient Bureaucracies”, pp. 195—226。

③ 我们需要就私有化和经济再造过程中的国家能力的变异性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有些国家进行了激进的国家重构,使私有化过程中的国家能力和效力得到了增强;在另外一些国家,国家重构过程缓和但并不令人满意,从而使后改革时期出现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低层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征兆,其极端案例是国家接近于分裂,在结构变迁之时国家能力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国家提供了以上各种不同的案例。在中东欧国家之中,捷克私有化受到最广泛支持,虽然存在一些腐败,但是在这个国家中,私有化最为透明,而自由选举出的政府在岗位再培训等社会经济改革和国家重建等方面最为尽力。相反,在一些国家之中,如罗马尼亚,国家没有重组,私有化并不透明,有出现低层均衡陷阱的危险。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部分地区,在1992—1993年间,新国家没有建立起来,但旧国家有很强的解体趋势。关于捷克和罗马尼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比较分析,可以参见 Olivier Blanchard, Simon Commander 和 Fabrizio Coricelli, “Unemployment and Restructuring”, World Bank, 1993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也可参见 Roman Frydman, Andrzej Rapaczynski 和 John Earle 编: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in Central Europ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0—94, 以及 Roman Frydman, Andrzej Rapaczynski 和 John Earle 编: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in Russia, Ukraine and the Baltic State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3)。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案例研究表明,国家如果处于混乱之中,就难以推进有序、有效和合法的私有化。也可以参见 Roman Frydman 和 Andrzej Rapaczynski,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s the State Withering Away?*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意,关键在于强国家,民主并不是必需的。在智利,强大的非民主国家相当有效地推行了私有化。然而,在后共产主义背景之下,比如俄罗斯,原有的党—国体制瓦解或者不再有效,只有在国家重构以后,私有化才能以有序的方式进行。一旦全能主义或者后全能主义国家及其指令经济崩溃、放弃、剧减或者解体,国家结构重组必须立即进行。但是,以非民主的方式重组国家,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样容易。

有些人(尤其在俄国)认为,皮诺切特是时世所需。但是,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其他许多国家,支持皮诺切特式人物的连续性国家和统一军队组织已经不复存在。^① 在俄罗斯,威权主义或者半法西斯主义的党—国,在某些时候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可替代的统治模式。然而,拥有意识形态合法性和资源的单一政党,在其承担和运作非民主的权力之时,需要在全国范围出现或者建构霸权式的半法西斯运动,但是,看来这似乎也不可能。依据我们的判断,即使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威权主义或者半法西斯国家,也是肯·朱威特所描述的弱国家—弱社会的典型。^② 西班牙内战之后佛朗哥时代的平静状态,并不同于半法西斯政府治理下的俄罗斯,而更像车臣和阿富汗。有些人提出,可以采取中国式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国模式可能是一种前改革时代的选择,它已不适合于俄罗斯。和俄国不一样,中国的政权和国家从来没有崩溃。确实,中国政府从未发起或考虑过民主化过程,所进行的只是有选择性的、有限的自由化过程。

我们的结论是,对俄罗斯来说,弱民主国家的代价很高,但是与此同时,很多非民主的解决方案既不可行,还可能催生一个高压性但是仍很弱的国家。依照史蒂芬·卢卡斯(Steven Lukes)具有启发性的说法,这样一个国家也许拥有针对民众的权力,但是却没有重建国家的权力。例如,半法西斯式的俄罗斯国家也许拥有凌驾于多数民众之上的高压性权力,但是仍然缺乏重建繁荣

① 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频繁访问俄罗斯的1991—1995年间,关于皮诺切特式解决方案,或者中国式选择的讨论频繁出现在和俄罗斯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会谈之中。但是在实际上,甚至是在俄国军队在车臣的无序行为之前,在1994年4月的民意调查之中,只有3%的俄罗斯被调查者“完全同意”、7%的被调查者“比较同意”由“军人统治”,作为俄罗斯的替代性方案。参见Richard Rose和Christian Haerpfer,“New Russian Barometer III: The Results”,*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28(1994),问题31b。

② Ken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尤其是pp. 249—331。

438 与和平的俄罗斯的能力。^① 因此,在党一国体制已经瓦解、指令经济不可行的背景下,国家必须得到重建。我们的观点是,某种程度的民主合法性是帮助国家进行重建的有益方式,而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这就涉及我们关于合法性和私有化的核心观点。在摆脱国家控制经济的过程中,一些自由市场的热衷者将私有化视为 1989 年之后最重要的内容。私有化,尽管已经完成,被认为是为市场民主创造了关键性的结构性条件,是新的民主的经济基础。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对民主国家进行民意调查一再表明,处于民主合法性最高层级的是全面的民主过程(例如,选举、多党制、言论自由)。在合法性层级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是当政者(例如,国会议员)。与民主有关的政治体制通常都比经济体制如市场经济更具有合法性——市场经济又通常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具有合法性,如果在调查表中如此设定问题的话。此外,经济制度(例如,市场经济)往往比经济行动者(例如,资本家)更具有合法性。^② 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说,那些通过资本家的绩效以及通过增加新的资本家的数量的方式来使 1989 年之后的民主获得合法性的努力,是颠倒了合法性的金字塔。

在那些私有化不受管制、高度不平等且通常不合法的国家之中,比如俄罗斯,这样一种合法性金字塔的颠倒尤其存在问题。^③ 在这一背景下,那些以前的掌权者——例如,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或贸易机构的“红色资本家”——通过各种形式的“自然而然”的私有化或者偷窃方式,在将以前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为新的经济权力的过程中,具有优势地位。比较研究一再表明,在大多数社会之中,只有通过劳动、继承或者经营企业所获得的财产所有权才被认为是合法的。然而,由以前的红色资产阶级转化而来的俄罗斯新兴资本家并不符合这些合法性原则。实际上,他们的新财富常常受到谴责,因为它们来自于对公共财产的非法侵吞,并且可能导致这么一个后果,人们既不相信市场经济(将被看作黑帮经济),也不相信民主制度,因为正是后者一手制造了这些黑帮经济。在建立新的民主政体和经济社会的过程中,更多的政治、理论和研究注意力应

^① 关于这个研究权力的重要途径,参见 S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

^② 对这一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充分研究,参见 Juan J. Linz,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载于 Mattei Dogan 编: *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 Strains on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pp. 65–113。

^③ 例如,参见 Stephen Handelman, “The Russia Mafi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4): pp. 83–96。

当集中于探讨这种颠倒了合法性金字塔对于民主的后果。关于西方民主的经验发现和历史研究已经证明,民主的政治体制使市场经济具有正当性,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当民主国家之中的大多数人不去质疑私人所有权的产生方式的时候,尽管这种质疑可以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私人财产才受到了保护。^①

439

结果的同时性与延迟满足的比较政治学

经济改革——市场和私有化——能使新的民主政体获得合法性这个说法,是基于如下可疑的假设:在取得经济成功并且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可以建立民主制度并且使其获得合法性。我们认为,由于指令经济崩溃,在市场经济充分落实而且产生收益之前,民主政体能够而且必须以各种途径建立起来并且取得合法性。很多分析家和政治顾问忽略了先前所述的国家重建,因为他们推测,由于人们要求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经济和政治成果不仅是人们所追求的,而且应该同时获得。有些人甚至认为,虽然政治和经济的同步改革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同步性却是不可能的。^② 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关于经济和民主化关系的观点称为“紧密相关”(tightly coupled)假设和“松散相关”(loosely coupled)假设。^③

关于松散相关,我们并不是指经济与政治感受之间不存在关系,而是指这种关系并不必然是一对一的关系。至少在一个中观时间范围内,人们对政治和经济趋势做出相互独立甚至相互对立的评估。我们进一步认为,如果

① 参见 Linz, "Legitimacy Democracy".

② 乔恩·厄尔斯特广为流传的论文"The Necessity and Impossibility of Simultaneo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的标题就是这个观点,载于 Douglas Greenberg, Stanley N. Katz, Melanie Beth Oliviero 和 Steven C. Wheatley 编: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ransi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67-274。我们认为,同步性之所以不可能出现,原因并不必然是像厄尔斯特所说的,而可能在于这么一个事实,成功的经济变迁所需要的时间,必然要超过举行一次自由选举、甚至是起草一部宪法所需要的时间。匈牙利政治学家 Laszlo Bruszt 在 "Why on Earth Would East Europeans Support Capitalism?" (国际政治学会第 15 届世界会议论文,柏林,1994 年 8 月 21-24 日)一文中,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于厄尔斯特的假设进行了重要批评,并且探讨了被调查者多维度的时间这一经验事实及他们的“政治经济耐心”。

③ 我们在第五章“合法性与强制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于政治的评价是积极的,它们能为痛苦的经济重构提供有益的缓冲。^① 在后共产主义欧洲的第一个五年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证据来为讨论经济和民主化的关系提供支持呢?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关注相对硬的经济数据,那么 27 个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之中没有一个(波兰除外)在 1992 年是正增长。实际上,在 1993 年所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均低于它们在 1989 年的水平(见表 21.1)。

表 21.1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 GDP、工业产值和通货膨胀率峰值:1989—1995 年

国家	测度	GDP 变化率(%)						1993 年 工业产值 (1989 年=100)	1989—1993 年间通货 膨胀率峰值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估计)			1995 年 (预测)
阿尔巴尼亚	GDP	9.8	-10.0	-27.1	-9.7	11.0	7.0	5.0	52	237(92)
	工业产值	5.0	-7.6	-36.9	-44.0	-10.0	na	na		
亚美尼亚	GDP	14.2	-7.4	-11.0	-52.0	-15.0	0	na	Na	10900(93)
阿塞拜疆	GDP	na	-11.7	-0.7	-22.6	-13.0	-15.0	-10.0	Na	1174(92)
白俄罗斯	GDP	8.0	-3.0	-1.2	-9.6	-11.6	-26.0	-10.0	76	2775(93)
	工业产值	na	na	-6.8	-10.2	-6.0	na	na		
保加利亚	GDP	0.5	-9.1	-11.7	-5.6	-4.2	2.0	4.0	na	339(91)
	工业产值	-1.4	-16.5	-27.3	-22.0	-10.0	4.0	na		
克罗地亚	GDP	-1.6	-8.6	-14.4	-9	-3.2	1.0	6.0	57	1150(92)
	工业产值	na	-11.3	-28.5	-15.0	-6.0	-3.0	6.0		
捷克共和国	GDP	na	-0.4	-14.2	-7.1	-0.3	3.0	6.0	57	52(91)
	工业产值	na	-3.5	-22.3	-10.6	-6.3	0	na		
爱沙尼亚	GDP	-1.1	-8.1	-11	-14.2	-3.2	5.0	6.0	54	965(92)

^① 选民们可能因为糟糕的经济表现而不支持当前的执政者,但是,这些人的继任者可能还是在大体上沿袭以往的经济政策。1993—1995 年的波兰和 1994—1995 年的匈牙利(尤其是在 1995 年改革加速之后)就是这样。以民主的方式更换执政联盟,实际上给了更多的时间以调整经济政策,同时,也为人们政治敏感性的调整,或为人们适应新的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变革所带来的伤害,提供了宝贵的空间。

续表

国家	测度	GDP 变化率(%)						1993 年 工业产值 (1989 年=100)	1989—1993 年间通货 膨胀率峰值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估计)			1995 年 (预测)
马其顿	GDP	na	-9.9	-12.1	-14.0	-14.1	-7.2	0.0	na	1691(92)
	工业产值	na	-10.6	-17.2	-16.1	-17.2	na	na		
格鲁吉亚	NMP	-4.8	-12.4	-20.8	-43.4	-40.0	-35.0	na	na	na
	工业产值	-6.9	-29.9	-24.4	-43.4	-21.0	na	na		
匈牙利	GDP	0.7	-3.5	-11.9	-4.3	-2.3	3.0	3.0	69	
	工业产值	-1.0	-9.6	-18.2	-9.8	-4.0	9.0	6.0		
哈萨克 斯坦	GDP	-0.4	-0.4	-13.0	-14.0	-12.0	-25.0	na	68	1925(93)
吉尔吉 斯斯坦	GDP	3.8	3.2	-5.0	-25.0	-16.0	-10	1.5	53	1354(93)
	工业产值	na	na	0	-27.0	-25.0	na	na		
拉脱维 亚	GDP	6.8	2.9	-8.3	-33.8	-11.7	3.0	3.0	38	958(91)
	制造业 总产值	na	na	0.4	-48.7	-32.6	na	na		
立陶宛	GDP	1.5	-5.0	-13.1	-37.7	-16.2	4.0	4.0	na	1175(92)
	工业产值	na	na	na	-50.9	-42.7	na	na		
摩尔多 瓦	GDP	8.8	-1.5	-11.9	-25.0	-14.0	-20.0	0		837(93)
波兰	GDP	0.2	-11.6	-7.6	1.5	3.8	4.5	5.0	69	640(89)
	工业产值	-1.4	-26.1	-11.9	3.9	5.6	na	na		
罗马尼 亚	GDP	-5.8	-5.6	-12.9	-13.6	1.0	2.0	3.0	47	296(93)
	工业产值	-5.3	-23.7	-22.8	-21.9	1.3	2.0	na		
俄罗斯	GDP	na	na	-13.0	-19.0	-12.0	-15.0	-7.0	60	2138(92)
	工业产值	na	-0.1	-8.0	-18.8	-16.0	-21.0	-12.0		
斯洛伐 克	GDP	1.4	-0.4	-14.5	-7.0	-4.1	3.5	3.0	55	58(91)
	工业产值	-0.7	-3.6	-17.8	-14.0	-10.6	5.5	na		
斯洛文 尼亚	GDP	-1.8	-4.7	-8.1	-5.4	1.0	5.0	6.0	46	247(91)
	工业产值	-0.1	-10.3	-11.3	-12.0	-2.6	6.6	5.1		

续表

国家	测度	GDP 变化率(%)						1993 年 工业产值 (1989 年=100)	1989—1993 年间通货 膨胀率峰值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估计)			1995 年 (预测)
塔吉克 斯坦	NMP	-2.9	-1.6	-12.5	-33.7	-28.0	na	na	56	7344(93)
	工业产值	1.9	1.9	-7.4	-35.7	na	na	na		
土库曼 斯坦	GDP	na	2.0	-4.7	-5.3	-7.6	-10.0	-5.0	90	1875(93)
	GDP	4.1	-3.4	-12	-17.0	-14.0	-23.0	-5.0	79	10155(93)
乌克兰	工业产值	2.8	-0.1	-4.8	-6.5	-8.0	-30.0	na		
	GDP	3.7	1.6	-0.5	-11.1	-2.4	-2.6	2.0	94	927(93)
乌兹别 克斯坦	工业产值	3.6	1.8	1.8	-12.3	-8.3	na	na		
	GDP	na	na	na	na	na	na	na	35	$3.72 * 10^{13}$ (93)

资料来源:1989—1995 年的数据由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提供,伦敦,1995 年 1 月。1994 年的数据为估计值,1995 年的数据是预测值。在数据收集中采用了常见的方法。1993 年的工业产值数据是以 1989 年的数据为 100 作为基线而衡量的,参见 Jacek Rostowski,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in Post-Communi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orthcoming)。波斯尼亚没有数据。通货膨胀率的数据同样来自 Rostowski。南斯拉夫是世界上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通胀率达到了 37 万亿。

442 如果我们考察我们曾经分析过的中东欧这六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民众对经济生活的主观感受,依据 1993 年 11 月至 1994 年 3 月的民意调查,对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取值范围从 +100 到 -100)的均值为 60.2。但是,对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的均值仅仅为 37.3,下降了近 23 个点。紧密相关假设将预测,人们对于政治体制的态度也将急剧下降,尽管下降幅度可能达不到 23 点。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在同一次调查之中,对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的平均值为 45.7。(如果依据完全紧密相关假设)经济评估方面每下降一个点,政治评估就下降一个点,那么结果将是,对于政治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将只有 22.6。然而,对于后共产主义国家体制保持积极评价的比率,并不是如紧密相关假设所预期的那样下降,而是上升到了 61.5,或者说,比完全紧密相关所预计的要高 38.9(见表 21.2)。

表 21.2 对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持积极评价者
所占百分比：中东欧六国调查

问 题	国 家	1989 年持积极评价的 回答者所占百分比	1993—1994 年持积极评价的 回答者所占百分比
“这是一个量表,请对 经济运行情况打分,最 好的为正 100 分,最差 为负 100 分。”	保加利亚	66	15
	捷克	42	66
	匈牙利	75	27
	波兰	52	50
	罗马尼亚	52	35
	斯洛伐克	74	31
	平均值	60	35
“这是一个量表,请对 政府运行情况打分,最 好的为正 100 分,最差 为负 100 分。”	保加利亚	51	59
	捷克	23	78
	匈牙利	58	51
	波兰	38	69
	罗马尼亚	52	60
	斯洛伐克	50	52
	平均值	46	62

资料来源:Richard Rose and Christian Haerfper,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III: Learning from What Is Happening,”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30(1994), questions 22—23, 32—33。表中的百分比为四舍五入值。在这些国家的民意调查于 1993 年 11 月至 1994 年 3 月进行。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呢?首先,人们能够对一揽子经济物品(可能正在恶化)和一揽子政治物品(可能正在改进)进行独立而正确的评判。实际上,在同一次调查之中,所有六个中东欧国家的公民在民意测验之中做出的评价是,在民主政治体制所能直接影响的重要领域,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机会得到了极大的增进,尽管在同一次调查之中,他们承认他们自身家庭的经济状况恶化了(见表 21.3)。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不一致性能长期持续。然而它说明,在中东欧国家如此激进的转型过程之中,经济的恶化并没有必然削弱对政治体制的支持。^①表 21.2 表明,对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的认知,使中东欧国家的民主体制在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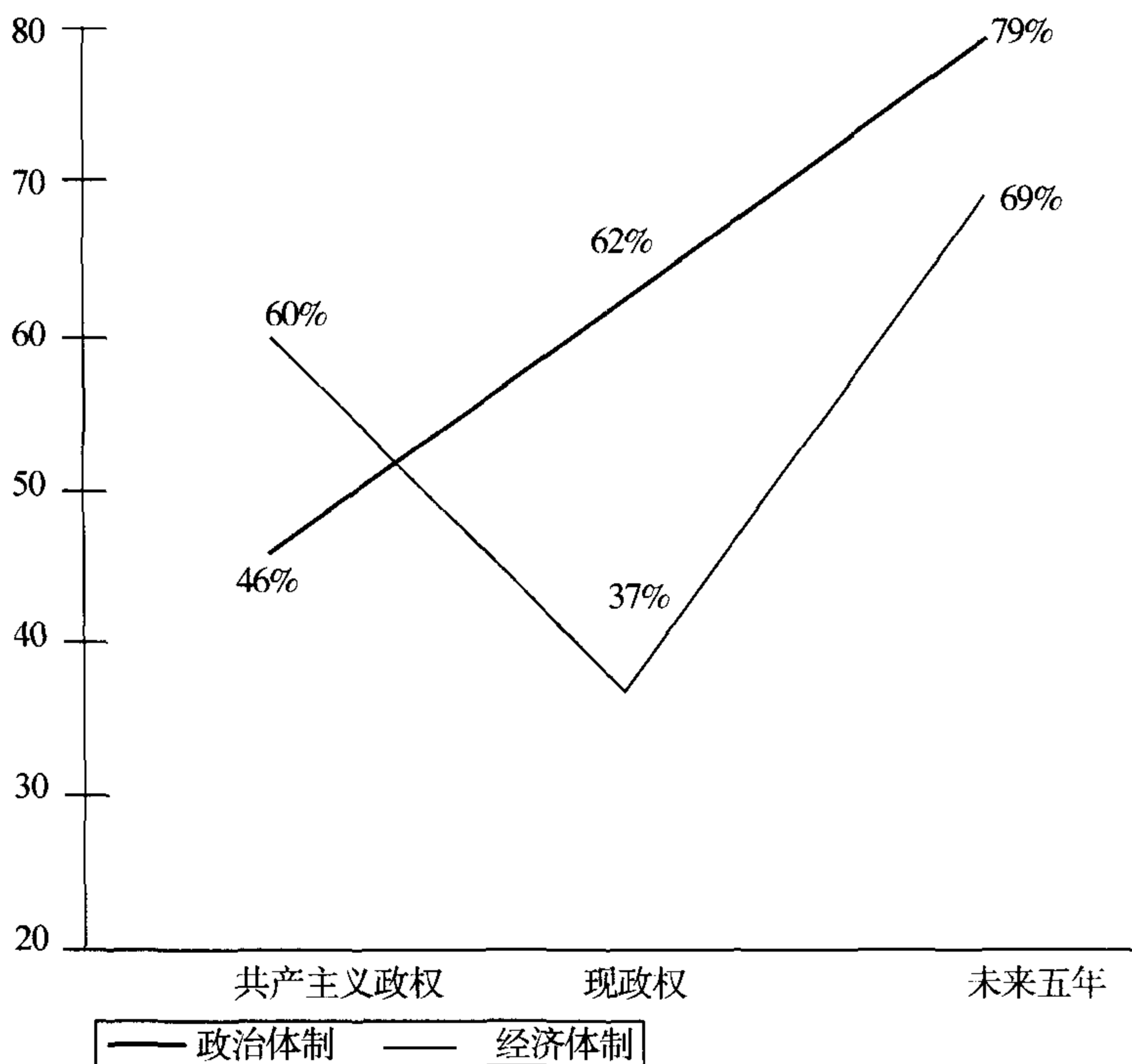
^① 实际上,依据这些数据的回归模型,William Mishler 和 Richard Rose 总结道,“我们的回归模型显示,对于当前或将来经济的评分每下降 4 分,对于政治体制的评分就下降 1 分”。关于这一结果的主要解释是,东欧人民具有相当长的预期。参见 William Mishler 和 Richard Rose, “Trajectories of Fear and Hope: The Dynamics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14 (1993): p. 27。

表 21.3 对于共产主义体制和当前体制之下经济和政治感知的不一致性:中东欧六国调查

问 题	回答“现在更好”与“现在更坏”的回答者之百分比					
	保加利亚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经济方面						
“在过去五年之中,您总体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变好了、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变坏了?”	16/58	23/49	18/62	6/76	17/62	21/65
政治方面						
“请告诉我,与共产主义时期相比,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变好了、没有发生变化,还是变坏了?”						
“人们可以自由参加任何组织。”	95/5	90/1	88/3	81/2	79/2	94/1
“每个人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	90/11	84/3	82/4	73/8	83/4	94/2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自由迁徙。”	95/5	96/1	87/2	75/4	75/7	90/2
“人们可以自由居住,不用担心非法拘禁。”	88/11	73/4	62/5	59/4	71/5	81/1
“每个人都可以决定他对政治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	97/3	84/0	81/1	n/a	69/5	92/1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	98/2	94/0	96/1	83/1	70/6	95/1

资料来源:与图 21.1 相同,参见问题 26、35、36、37、39、40、42。当被调查者回答“相同”之时,累计百分比小于 100。

大程度上与人们对于新经济体制的无效率的认知分割开来。事实上,在 1993 年时,中东欧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有一个很长的预期,他们乐观地认为,到 1998 年时,新的民主的绩效和新的经济体制的绩效都将取得显著进步^①(见图 21.1)。



444

图 21.1 对共产主义时期、当前和五年之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持积极评价者所占百分比:中东欧六国

资料来源:Richard Rose 和 Christian Haerper, “New Russia Barometer III”,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28(1004), questions 24 and 34.

^① 有些读者可能记得,在我们一项关于民主崩溃——特别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的研究之中,我们在没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指出效力和合法性之间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后来收集的数据显示,这一关系只对少数国家适用,特别是对德国和奥地利适用,而对挪威和荷兰不适用。为什么现在会有如此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两次大战间隙,有如下可供选择的合法性模式:苏维埃共产主义乌托邦、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后来出现在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法团主义—威权主义—天主教“有机体”民主、战前的官僚君主威权主义,甚至(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它们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出现无效力民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当前的“民主难题”还没有这样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参见 Juan J.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在中东欧有强有力证据显示,人们对未来感到满意,对将来充满信心是可能的,尽管现在经济增长滞后。快速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成长同步的情况,实际上往往特别难以实现,但是幸运的是,正如图 21.1 表明,中东欧国家的公民并不认为,这种同步性是必要的。本章所有表和图似乎都进一步证明,建立在对颠倒的合法性金字塔进行反思基础之上的政策,是多么具有潜在危险性。

445 在转向分析前苏联之前,我们应该稍微注意另外两个因素,用以解释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人们为什么仍高度支持新政权(政体,而不必然是执政者)。在国家性问题上,中东欧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不像前苏联)之中,没有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同样,这些国家也和俄罗斯不一样,不存在由帝国崩溃或苏联解体所遗留下来的相互矛盾的遗产。

关于对以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满意度,以及对后共产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满意度,如何在同一维度上对前苏联波罗的海地区以外的国家和中东欧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进行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只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数据,但是差异仍然很显著,尤其在评分相对较低的对当前的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支持方面(见图 21.2)。

外部的观察家也注意到,与前苏联地区相比,中东欧国家在其政治发展方面也存在不同的模式。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出版的年鉴提出了一种一般性的方法,用以评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①自由之家用 7 级量表分别给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进行排序。1 分表示权利和自由度最高,而 7 分表示权利和自由度最低。为了测量我们所要讨论的民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得分在 2 以内、公民自由得分在 3 以内,我们就认为该国在当年跨过了民主的门槛。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得分在 4 以上,而且/或者公民自由得分在 5 分以上,我们就认为当年该国没有达到民主的最低要求。处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可以被视为是处于民主边缘的国家。简而言之,数字越小民主程度也就越高。后共产主义欧洲在这一量表上的得分如何?参见表 21.4。

为了使表 21.4 对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比较分析更为有用,我们将这 26 个国家分为三类:中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前南斯拉夫国家。对于前苏联国家,

^① 我们在第三章,尤其是在本书第 41 页注释^③和第 42 页注释^①中,对自由之家年鉴的方法论、资料来源和专家小组利用进行过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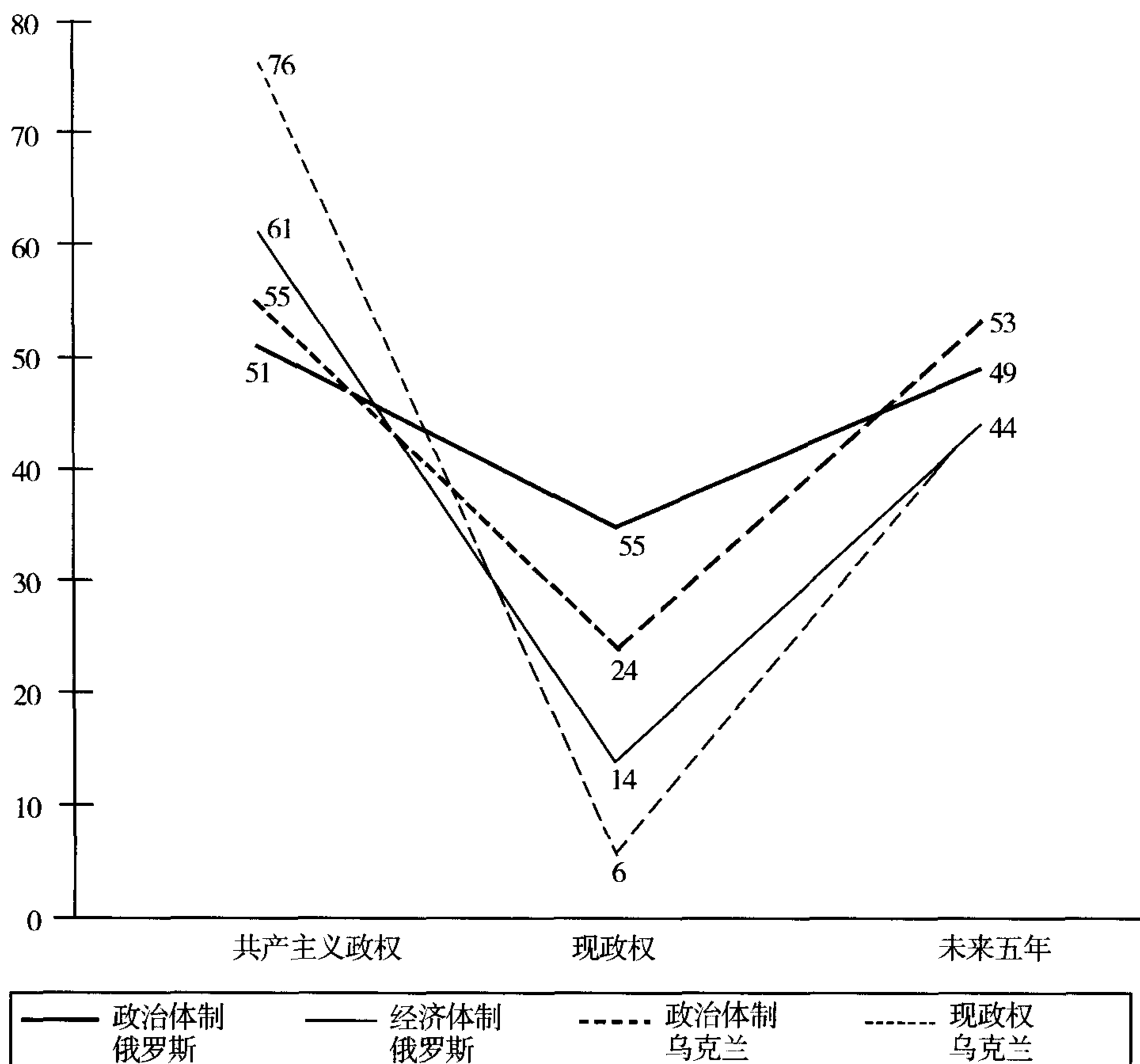


图 21.2 对共产主义时期、当前和五年之后经济

体制和政治体制持积极评价者所占百分比：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资料来源：关于俄罗斯的资料，参见 Richard Rose 和 Christian Haerpfer, “New Russia Barometer III”,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28(1994), 问题 15—17, 27—29。关于乌克兰的资料，参见 Rose and Haerpfer, “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III”, 问题 22—24, 32—34。关于白俄罗斯的数据来源与乌克兰高度相似。对于共产主义时期、当前以及五年之后的经济体制持积极评价者分别为 78, 11 及 47；而对这三个时期的政治体制持积极评价者的比例分别为 64, 28, 56。关于乌克兰的数据同样如此。

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分为自 1920 年代早期就成为苏联一部分的国家、现在和俄罗斯一起构成独联体的国家、只是在 1940 年后才成为苏联一部分的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拒绝加入独联体的国家。分类结果见表 21.5。

表 21.4 1993 年 26 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自由之家量表上的
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得分

国 家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民主门槛等级：“之上”、“之下”、“边缘”
亚美尼亚	3	4	边缘
阿塞拜疆	6	6	之下
白俄罗斯	5	4	之下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6	6	之下
保加利亚	2	2	之上
克罗地亚	4	4	之下
捷克共和国	1	2	之上
爱沙尼亚	3	2	边缘
格鲁吉亚	5	5	之下
匈牙利	1	2	之上
哈萨克斯坦	6	4	之下
吉尔吉斯斯坦	5	3	之下
拉脱维亚	3	3	边缘
立陶宛	1	3	之上
马其顿	3	3	边缘
摩尔多瓦	5	5	之下
波兰	2	2	之上
罗马尼亚	4	4	之下
俄罗斯	3	4	边缘
斯洛伐克	3	4	边缘
斯洛文尼亚	1	2	之上
塔吉克斯坦	7	7	之下
土库曼斯坦	7	7	之下
乌克兰	4	4	边缘
乌兹别克斯坦	7	7	之下

续表

国 家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民主门槛等级：“之上”、“之下”、“边缘”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	6	6	之下
合 计			26个国家之中的 6个属于“之上” 7个属于“边缘” 13个属于“之下”

资料来源：Raymond D. Gastil, ed.,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93-1994*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4), pp. 677-678。

表 21.5 后共产主义欧洲民主门槛等级的比较：中东欧、前苏联国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1993年)

448

分类	国家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民主门槛等级：“之上”、“之下”、“边缘”
中东欧	捷克共和国	1	2	之上
	匈牙利	1	2	之上
	波兰	2	2	之上
	保加利亚	2	2	之上
	斯洛伐克	3	4	边缘
	罗马尼亚	4	4	之下
小 结				4/6“之上” 1/6“边缘” 1/6“之下”
前苏联国家(1940年代开始,现在非独立成员)	立陶宛	1	3	之上
	爱沙尼亚	3	2	边缘
	拉脱维亚	3	3	边缘
小 结				1/3“之上” 2/3“边缘” 0/3“之下”

续表

分类	国家	政治权利	公民自由	民主门槛等级：“之上”、“之下”、“边缘”
前苏联国家(1920年代开始,现在独联体成员)	俄罗斯	3	4	边缘
	亚美尼亚	3	4	边缘
	乌克兰	4	4	边缘
	吉尔吉斯斯坦	5	3	之下
	白俄罗斯	5	4	之下
	摩尔多瓦	5	5	之下
	哈萨克斯坦	6	4	之下
	阿塞拜疆	6	6	之下
	格鲁吉亚	6	6	之下
	塔吉克斯坦	7	7	之下
	土库曼斯坦	7	7	之下
	乌兹别克斯坦	7	7	之下
小 结				0/12“之上” 3/12“边缘” 9/12“之下”
前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亚	1	2	之上
	马其顿	3	3	边缘
	克罗地亚	4	4	之下
	波黑	6	6	之下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	6	6	之下
小 结				1/5“之上” 1/5“边缘” 3/5“之下”

资料来源:同表 21.4。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之中唯一没有被包括在内的是阿尔巴尼亚,该国直到很晚才开始转型。它很难归入上表的地理—历史分类体系。依据我们的判断,在 1995 年中期,阿尔巴尼亚仍在民主门槛“之下”。

我们在这一章所使用的大量图表,以及我们在以前各章的定性分析,它们的涵义将被新一代研究后共产主义欧洲政治的比较研究者进行详细阐述和充分分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注意某些模式。

来自中东欧六个前华约国家的回答者之中,对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给予

积极评价的比率的平均值为 62(比对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积极评价上升了 16 个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三个前苏联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给予积极评价的比率的平均值为 29(比对共产主义体制的积极评价下降了 26 个点)。^①

另一个发现是,根据自由之家 1993 年度民意调查,曾经是前苏联成员的 12 个独联体(CIS)国家之中,没有一个跨过了民主的最低门槛。事实上,其中的 4 个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的得分均为 7 分,是可能得的最低分。^②相反,6 个中东欧国家之中,有 4 个越过了最低门槛。在中东欧 6 个前华约组织国家之中,罗马尼亚得分最低,政治权利得 4 分,公民自由得 4 分。因此,可以准确地说,在 1993 年,中东欧国家之中,民主得分“最高者”和“最低者”都明显高于独联体国家。

449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与中东欧 6 个国家相反,在独联体国家,经济评判和政治评判的相关更为紧密。因此,与中东欧相比,在前苏联非波罗的海地区,延迟满足更低。

如何解释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非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的明显反差呢?让我们从迟滞的满意度开始。毫无疑问,反差的一部分来源于对经济持积极评价者比率的急剧下降(在中东欧,积极评价者的平均值仅仅从 60 下降到 37,然而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前苏联地区,是从 71 下降到 10)。时机和对未来的感知可能也很重要。根据表 21.1,在中东欧国家,经济滑坡最为

^① 即使在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得到部分证实的松散相关假设,即对当前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积极评价的比率,要超过对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积极评价的比率 18.7 个点。

^② 为了让读者了解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实际表现离民主还有多远,我们指出,在民主对抗性的选举活动方面,它们的多元化程度明显低于残存的南斯拉夫(关于南斯拉夫多元化程度的证据,我们已在本章第 1 个注释中提供)。与 1992 年 12 月南斯拉夫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 43% 的选票形成对比,1994 年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竞争在实际上没有意义。根据《经济学家》对 12 个独联体国家政治的概要分析,土库曼斯坦被描述为“一党制国家”。在 1994 年当选的议员,都是非反对派的。1994 年 2 月,99.99% 的选民投票赞成延长[总统]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的任期至 1999 年。只有 212 个土库曼选民正式反对”。《经济学家》这样归纳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主要的反对党被禁。媒体被国家控制。执政党在 1994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超过 80% 的席位;在[1995 年]3 月 26 日的选举中,99.96% 的选民同意延长[总统]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的任期至 2000 年”。《经济学家》这样评论塔吉克斯坦:“拉赫莫诺夫(Imamali Rakhmonov)在去年[1994 年]11 月确认当选总统,这场选举之中,大部分反对党被禁。有大规模选票作弊现象”。参见“Less Poor, Less Democratic”, *Economist*, April 22-28, 1995, p. 48。很清楚,没有一个严肃的理论家会认为,以上三国正在进行任何形式的民主转型。它们仅仅是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纯粹的“选举至上主义”。

糟糕的年份是 1991 年。而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则是在 1994 年,处于民意调查之后。1995 年,就经济方面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要好于 1994 年,但是在 1993 年底,人们可能看不到曙光。

而且,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经济史学者最终会记录这样的事实,即苏联内部严重的国家性问题,以及随后的国家解体和武装冲突蔓延,都在客观上加剧了经济混乱。有些独联体国家在 1995 年持续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人们对于迟滞的满意度的主观信心。毕竟,只有存在某些迹象表明潜在的满意度可以被感知时,延迟满足政治才是理性的。在弱小而且充满分歧的中东欧国家,对未来的信心是强化延迟满足政治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前苏联地区和前南斯拉夫许多国家,对未来的信心相对比较弱。确实,捷克斯洛伐克具有国家性问题,但是由于其有序、理性和精心规划的柔性分离,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都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和严重的经济滑坡。^①

国家性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可以严重地影响民主结果。当我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时,这个判断变得很清楚,即从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 22 个独立国家之中,只有两个国家——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跨过了民主的门槛(见表 21.5)。这两个国家例外正好说明了国家性问题对民主化的重要性。正如我们上一章所强调的,立陶宛的经济虽然没有爱沙尼亚强劲,但是立陶宛是波罗的海地区唯一赋予居民包容性的公民权的国家,而不论居住者是否波罗的海族裔(ethnic Balts)。这项政策使立陶宛可以用一种比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更为民主的方式来处理潜在的国家性问题。因此,立陶宛也理所当然地在“政治权利”上获得了比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更高的得分。

在五个前南斯拉夫国家之中,斯洛文尼亚是唯一没有严重国家性问题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没有太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所以,它不会卷入针对塞尔维亚(或阿尔巴尼亚)居住区的事实或潜在的冲突,而这类冲突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残存的南斯拉夫确实发生,而武装冲突又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不断缩减。与斯洛文尼亚相比,马其顿具有更为严重的潜在的国家性问题(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和希腊一起),这就造成了该国比较不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资格和语言政策。

^① 事实上,捷克 1994 年和 1995 年的 GNP 增长率预计可以分别达到 3% 和 6%,而斯洛伐克 GNP 的增长率可以分别达到 3.5% 和 3%。但是在这两年,俄罗斯的数字分别是 -15% 和 -7%,乌克兰的数字为 -23% 和 -5%。参见表 21.1。

另一个因素无疑可以增加中东欧国家对后共产主义政体的支持(与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与白俄罗斯形成对比),即俄罗斯公民可能会因独立而感到高兴,但是也会有地缘政治丧失感,从而对苏联解体的方式表示愤怒。一个主要因素是,苏联的解体使 2500 万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经常受到围攻,有些时候成为无国籍的少数民族。再者,与捷克共和国公民相信柔性分离有利于提高捷克人的生活标准不同,俄罗斯人相信,苏联分裂导致了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见表 21.6)。

表 21.6 1994 年俄罗斯人对 1991 年苏联解体的态度

451

问 题	年龄段百分比			
	18—29 岁	30—59 岁	60 岁以上	总计
“1991 年 12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解散苏联并成立独联体,你现在如何看那件事情?”				
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16	12	8	12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57	70	75	68
很难回答	28	18	17	20
“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有什么影响?”				
变好	5	4	3	4
变坏	68	76	83	76
没变化	11	8	5	8
很难回答	16	12	9	12

资料来源:Rose 和 Haerfper, “New Russian Barometer III”, questions 57—59。我们相信在白俄罗斯,情况和俄罗斯相似。在白俄罗斯议会中唯一投票反对独立的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1994 年当选为总统。1995 年 5 月,他推动了一项全民公决,其中他提出:“如果人民要求,我们将组成一个比苏联还紧密的政治联盟。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经济联盟。”参见 Matthew Kaminski, “Belarussians Seek the Future in the Past”, *Financial Times* (May 17, 1995), p. 3。卢卡申科在全民公决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获得了支持。在同一篇文章中, *Financial Times* 的通讯记者指出:“在全民公决中,超过四分之三在白俄罗斯人选择保留苏联时期的国徽,将俄语定为官方语言,并支持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

我们可以推测,与 1991 年之后俄罗斯公民的地缘政治失落感相反的是,那些“帝国外围”的国家,比如波兰,由于 1989 年事件,毫无疑问将得到一种地缘政治上的收获感。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公民比俄罗斯公民更为热爱当前政治体制的原因之一,这样,他们也更愿意接受延迟满足政治(见表 21.7)。

表 21.7 1992 年 1—2 月俄罗斯和波兰对新旧政治体制的偏好

倾 向	年龄段百分比			总计	现行体制偏好者和旧体制偏好者所占百分比之差
	29 岁以下	30—59 岁	60 岁以上		
俄罗斯					
当前体制好些	43	39	21	36	-18
旧体制好些	45	52	71	54	
不知道	12	9	8	10	
波兰					
当前体制好些				74	+51
旧体制好些				23	
不知道				3	

资料来源: Irina Bolva 和 Viacheslav Shironin, "Russian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205(1992): pp. 19—22。

但是,我们并不想过分强调俄罗斯对旧体制的偏爱。西班牙许多民众认为,在佛朗哥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更好。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回到那个政治体制下。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是对未来选择的愿望。依据表 21.2 可以发现,事实上,俄罗斯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一揽子政治产品更好一些,但是与中东欧的回答者相比,他们感到有些差距。^① 因此,尽管对于苏联解体有复杂情绪和失落感,但是,只有很小比例的被调查者回答,他们愿意回到共产主义,而愿意将军事统治作为未来选择的人,则比例更低(见表 21.8)。

将来的研究者对后共产主义欧洲民主化差异的其他解释性因素的探讨,当然会涉及时间、先前政体类型,以及是否存在民主传统可供利用。苏联存在了大约 75 年,其中的大部分时间全能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中东欧的苏维埃体制仅仅存在了 40 年。在波兰,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是威权主义而非全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在匈牙利,成熟的后全能主义也在演化。最后,对共产主义

^① 比如,关于在旅行自由方面更好/更坏之比,在捷克共和国是 95/5,波兰是 75/7,而在俄罗斯只有 41/28。关于在不受非法拘捕的自由方面更好/更坏之比,在捷克共和国为 73/4,波兰为 71/5,在俄罗斯仅为 23/15。我们认为,这些结果与其他指标一起,准确反映了由于俄罗斯持续性的国家性危机而对个体所进行的限制,我们在 19 章已经进行讨论。数据来自于本章表 21.2,以及 Rose 和 Haerpfer, "New Russia Barometer III", 问题 30c 和 30e。

之前的历史必须进行比较分析。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自 1919 年独立到 1938 年纳粹入侵,期间是民主政体。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的前苏联地区,在共产主义之前,确实没有这样的民主传统可供利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在这些国家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在民主成为最佳选择之前,还有更为漫长更为艰辛的宪政建设和国家重建过程。

表 21.8 俄罗斯人对重建先前共产主义体制的态度:1994 年 4 月

同意如下说法:“如果重建以前的共产主义体制,事情会更好。”	回答者年龄段百分比			
	29 岁以下	30—59 岁	60 岁以上	总计
完全同意	5	8	18	9
比较同意	8	14	19	14
比较反对	30	29	23	28
完全反对	41	36	22	34
很难回答	16	13	19	15

资料来源:Rose 和 Haerfper, “New Russian Barometer III”, 问题 31a。在同一次民意测验之中,只有 3% 的人完全同意,7% 的人比较同意“由军队统治”。问题 31b。由此可见,军队并非理想选择。

敏锐的读者无疑已经注意到,我们没有将宗教纳入分析用以解释独联体国家和前南斯拉夫地区民主化进程的脆弱性。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首先,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开始将某种宗教(如东正教、伊斯兰教或者儒教)作为一个主要因素,以解释世界上许多地区民主化进程所遭遇的困难。^① 我们在本章所提及的因素,是用来充分解释前苏联波罗的海以外地区和中东欧地区民主化结果的显著差异。其次,在第十六章关于宗教、反抗能力和公民社会的比较分析之时,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不同宗教在其自主控制的资源规模以及它们与国家关系方面,也存在差异。我们认识到,罗马天主教是一个跨国性、层级制的组织,可以为地方教会提供物质或教义支持,以帮助他们对抗国家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可以抵抗的天主教会,可以被视为对更为强大、更具有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的支持。从经验上说,在本书曾经分析的民主反抗活动之中,这些天主教会在波兰和立陶宛承担了支持性的角色,在智利和

453

^① 关于东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关系的观点,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 no. 3 (1993): pp. 22—49。也可参见其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298—311。

巴西以及佛朗哥统治末期的西班牙,也是如此。新教,由于其对个人意识的强调,由于其广泛的国际网络,同样也可以帮助公民社会反抗压制性国家,例如在民主德国和爱沙尼亚。谈及公民社会和抵制国家,东正教在组织上和教义上常常(不是总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是因为,由于韦伯所说的政权高于教权的结构,教会是国内组织,而不是跨国性的组织。在政权高于教权的教会之中,国家通常对教会的财政和人事起主导作用。这样的国内教会,确实不能构成相对自治的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因为,依照韦伯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是“神权依附于世俗权力”^①。虽了解到这一点,但我们并不认为东正教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力量。也就是说,如果国家领袖认同而且实践民主,依据政权高于教权的结构和机制,东正教会可以导致对民主的忠诚支持,1975年以后的希腊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国家领袖和政治社会是反民主的,那么,公民社会的民主反对活动,通常就无法获得来自国内东正教会的实质性的或有效的支持。我们希望在今后研究之中就世界宗教和民主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②

454 民主与共产主义回潮

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波兰、匈牙利和立陶宛——这些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期起了先锋作用——“共产党人重新掌握”了权力,并以此说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经济衰退就意味着民主的衰退。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选举力量至少赢得了一次合法的胜利(而且在许多国家,还没有取得这样一次胜利),我们认为,进行更为细致的评判是合适的。

依据我们在本书中对民主的界定,改革之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联盟重新掌握权力,1992年是在立陶宛,1993年是在波兰,而1994年是在匈牙利,其本身并不是向非民主政体的变化,尽管在一些深化民主的政策上有所退步(例

^① 关于马克斯·韦伯对政权高于教权的讨论,参见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pp. 1159—1163, 引自 p. 1161。

^② 伊斯兰教(不像儒教)是部分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重要价值体系。关于伊斯兰的完整讨论必定会比东正教复杂得多。但是,我们注意到,由于害怕原教旨主义,西方往往利用反民主的政府或运动,甚至使其合法化,来防止原教旨主义的扩散。即使当伊斯兰政党以民主方式成功当选,在实践中也没有践踏民主,也是这样。这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伊斯兰力量在1991年赢得阿尔及利亚第一轮选举之后,西方或明或暗地支持了军事政变。这样,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西方决策者和评论家对与伊朗或阿富汗接壤的前苏联国家(比如,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实施了民主的“双重标准”。

如波兰地方政府改革)。我们这样说是因为,通过本书的几乎全书的可靠解释,改革之后的共产党联盟接受了民主游戏规则,既包括如何参与选举,也包括如何执政。同样重要的是,竞选失利的政党也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胜利者和执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非政治学家通常所说的偏离民主的政体变迁。严格来说,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的选举代表了一种和平而民主的权力选择。

从较长历史视角来看,这甚至说明,这些选举事实上从一个侧面强化了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它们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样意识到,民主已经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在1992—1994年间,正是由于民主被视为最佳选择,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经过改造的共产党极力强调,他们会以民主政党的方式进行治理。他们想法是,如果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治理,一旦他们被轮换下台,他们也会被视为忠诚的民主反对派和合法可供选择的政府。^① 为了表明这点,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他们强调他们将在公民自由方面采取比他们的前辈更高的标准,他们的前辈有时候会以民族主义或者反共产主义“授命”的名义侵犯公民自由。比如,匈牙利改造后的共产党与自由民主党结成联盟,该联盟对大众媒介的总体政策,比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瑕疵更少。在立陶宛,民族独立的领导人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是如此强调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至于阿纳托尔·列文在其杰出的著作之中将其描述成为“一个向后看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者……[他]使得国家比其掌权之初更为分裂”^②。改造之后的共产党继承者,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注意给全体公民的个人权利提供“政治保护”,并追求政治的包容性。

455

“共产党人重掌权力”这个术语,对1990年代中期的中欧国家来说,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就这个术语的总体含义而言,在1989年之前,中欧的共产主义政体,即使是匈牙利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和波兰的威权主义,都意味着一个与非民主霸权世界权力的牢固的、相互依赖的联盟。到了1990年代中期,已经不存在这样的联盟,同时,俄罗斯也不是一个霸权国家。在这样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改革之后的共产党最好的选择是将其

^① 这个观点在斯泰潘和泽西·维亚特(Jerzy Wiatr)的谈话之中被强调,后者在波兰议会之中主管一个关于前共产党人的重要的议会委员会。他强调:“我们政府必须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证明我们是合法的民主的替代者。”华沙谈话,1993年11月5日。

^②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4.

自身定位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社会民主党”^①。即使改革后的共产党在精神深处并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当然没有),但是他们所必须回应的外部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要民主是最佳选择,那些试图寻求政府权力者的动机结构将起源于民主的环境。

456 最后,既然选民在对动机体系(incentive system)进行衡量之时起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确实需要回归共产主义吗?^②在导致所谓的前共产党“重新”掌权的选举之后两个月,波兰选民认为,他们并没有让旧的共产党人掌握权力,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波兰被调查者认识到,在1988—1993年间,世界和国内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当被问及“SLD-PSL[改革后的共产党和他们的老盟友农民党]执政联盟是否意味着1989年之前掌权者的重新掌权”之时,有63%的人回答“不是”,13%的人说“很难回答”,只有24%的人回答“是”。^③我们相信这个答案在地缘政治、政治和历史上都是正确的。对于西班牙案例的观察,可以说明我们的推断。如果

① 在1989—1990年间,后共产主义欧洲的社会民主的政治空间没有被有效占领。历史上的社会民主党过于失色和弱小,而新自由主义话语又太霸权。1992—1994年间,一些改革后的共产党在失去政权之后,对其自身进行部分重建,以填补该空间,回应新自由主义的进入。虽然共产主义崩溃了,社会党国际在后共产主义欧洲寻找新的同盟者。改组后的共产党可以获得社会党国际的认可和支 持,只要他们确实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1994年12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接受改组后的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社会党为社会党国际成员。关于匈牙利和波兰后共产主义政党在失去政权之后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结构分析,参见Michael Waller,“The Adaptation of the Former Communist Parties of East-Central Europe: A Case of Social Democratization?”(为“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arties and Parliamentary Democracy”会议准备的论文,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June 16—17, 1995)。在中欧大学同一次会议上,立陶宛政治学协会主席阿尔基斯·克鲁帕维修斯(Algis Krupavicius)提到立陶宛改组后的共产党(the Democratic Labor Party)在1992年重掌政权之时写道,“处于反对党时期是一个更新党员[从1989年的20万下降到1995年的8000]、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认同的极好时机”。引自他的会议论文,“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pp. 12—13。

② 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选举法使得改组后的共产党及其联盟得到了比选票更多的议席。因此,议席并不是选民意向的有效体现。1993年波兰选举,35.8%投给了改组后的共产党及其同盟农民党,两者共赢得了65.8%的议席。1994年的匈牙利选举,改组后的共产党,匈牙利社会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33%的选票,但在第二轮选举中得到了绝对多数的席位。

③ 由波兰公共舆论机构发表的民意测验,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in November 1993, p. 1。此外,在1993年底1994年初,在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之中,被要求评价“我们应该回到共产党统治”之时,波兰有47%的被调查者“强烈反对”,35%表示“比较反对”。在匈牙利,表示反对的总数也同样达到了82%。参见Rose和Haerpfer,“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 III”,问题43。中东欧国家之中对这一观点表示“强烈支持”百分比最高的国家是保加利亚,有9%。次高的是罗马尼亚,为4%。

在 1990 年代某个时期——似乎可能——Partido Popular, 被视为与佛朗哥执政时期的右翼保持联系的一支, 在某次选举之后赢得了政权, 他们的胜利, 在改变西班牙环境方面, 并不意味着“佛朗哥主义的回归”, 而只是一种权力轮换, 在这次轮换之中, 当代民主的保守政党赢得了选举, 并将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①

当我们以对中东欧民主的未来持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 高兴地结束本书之时, 我们想再次强调, 我们并不保持民主所固有的地缘政治观点或哲学观点。在我们所分析过的一些国家, 民主可能无法得到巩固。在另外一些国家, 民主可能得到巩固, 但是最终将崩溃。我们同样不幸地承认, 有些国家将会巩固其民主, 但是永远不会在性别平等、重要社会服务的准入权、包容性的公民权、尊重人权以及信息自由等方面深化民主。事实上, 他们有时候有可能侵犯人权。

457

所有严肃的民主思想家和活动家现在也注意到, 被广为吹嘘的所谓民主第三波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回潮, 不仅在后共产主义欧洲, 在西欧也是这样。^②在美国, 有影响的自由理论家有时会过于单纯化, 鲁莽地鼓吹完美的民主政治体。在这种背景下, 民主的胜利不仅不能号召, 而且很危险。民主制度不仅需

^① 对很多读者来说, 前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在 1995 年 11 月第二轮选举中的胜利, 可以被视为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从民主巩固的角度来看, 对波兰前途来说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 (1) 后共产党人(他们在 1993 年和 1995 年的选举中占据了议会的 2/3 多数, 并控制了总统职位)是否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 (2) 反共产主义力量是否会接受自由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虽然对 1995 年 11 月的选举结果不满, 但提摩西·加顿·阿什更加担心第二个问题, 而不是第一个问题: “从道德上说, 从美学上说, 后共产党在波兰的胜利确实深深为人厌恶, 但是它危险吗? 我想不, 就目前它们的目标和政策来说……克瓦希涅夫斯基和他的朋友都极力地希望不被当作东欧的后共产党人来看待, 而是被当作西欧的社会党人。”至于第二个问题, 加顿·阿什援引了波兰主教和瓦文萨在选举之后的许多声明, 并且总结道, 波兰最大的危险在于“在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支持下, 大量右翼人士围绕在瓦文萨周围进行反议会运动, 拒不承认克瓦希涅夫斯基作为波兰第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参见 Timothy Garton Ash, “‘Neo-Pagan’ Po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1, 1996), pp. 10–14, 引自 pp. 12–14。

^② 发表在 *Daedalus* 名为“After Communism: What?”(1994 年, 夏季)的特刊之上的三篇优秀论文, 致力于研究在共产主义崩塌之后, 西欧和东欧民主党人因失去了合法性敌人或者“他者”之后所开始经历的未曾预期的危机。很多长时间来被压制和否认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关于这个新兴而且具有挑战性的“范式迷失”问题, 参见 Tony Judt, “Nineteen Eighty-Nine: The End of Which European Era”, pp. 1–20; Elemér Hankiss, “European Paradigms: East and West, 1945–1994”, pp. 115–2; 以及 István Rév, “The Postmortem Victory of Communism”, pp. 157–7。Claus Offe, *Der Tunnel am Ende des Lichts: Erkundungen der politischen Transformation im Neuen Osten*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94)。在该书中, 尤其是在第十章中, 提到了相似的问题。

要被创建,也需要被设计、培育和发展。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建立一个支持民主的经济社会,不仅仅只需要市场和私有产权。现在是时候了,应当质疑并超越“非自由的自由主义(illiberal liberalism)”,并且要将整合性的认同政治加以理论化并进行社会建构,同时反对无限碎片化的认同政治。此外,认为一旦其他选择处于危机之中,民主便优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的论断并不是很充分。民主的维护必须基于自身优点。很清楚,更多的研究必须致力于考察实际存在的民主政体的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新的政治计划,以及研究努力必须致力于改善巩固民主的质量。

索引

(此处所列页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 Abkhaz Autonomous Republic 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 384
- Academy of Science system 科研系统 246
- accountability to parliament 向国会负责 106
- Ackerman, Bruce 艾克曼·布鲁斯 82
- actor-centered variables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变量 66
- Acuña, Carlos 卡洛斯·阿库纳 193, 194, 198
- Afghanistan 阿富汗 437
- Africa, "one-party" state in 非洲的“一党”国家 76
- agency 执政当局 92
- Agüero, Felipe 费利佩·阿圭罗 110, 122, 193
- Aguilar Fernández, Paloma 帕洛玛·费尔南德兹 88
-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xvii
- Alfonsín, Raúl 劳尔·阿方辛 xvi, 150, 192 - 196, 199, 201, 220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266
- Alivizatos, Nikos 尼克斯·艾黎维达托斯 134
- Allamand, Andrés 安德烈·阿拉曼德 215, 216
- Alliance of Free Democrats 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 302, 311
- Almond, Gabriel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41
- Almond, Mark 马克·阿尔蒙德 348
- Alvarez, Mike 迈克·阿尔弗维兹 181
- Aylwin, Patricio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 206 - 209, 210, 211; popularity of 深受欢迎 214, 215, 217, 218; response to military prerogatives 对军方特权的反应 213
- American Watch 《美国观察》 xiii
- Amin, Idi 艾迪·阿明 355
- Anderson,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22, 24
- Andorka, Rudolf 拉多夫·安多尔卡 297n
- Andrés Pérez, Carlos 卡洛斯·安德雷斯·佩雷兹 204
- Andropov, Yuri 尤里·安德罗波夫 376
- Antall, Jozsef 约瑟夫·安托尔 312
- antipolitics 反政治 10;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0, 343;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16, 331; in Poland 波兰的 272 - 275
- Antonescu, General Ion 爱恩·安东内斯库将军 363
- Arafat, Yasir 亚西尔·阿拉法特 26
- Arato, Andrew 安德鲁·阿雷托 9, 301, 304
- Argentina 阿根廷 xvi, 25, 68, 150, 205; absence of pact 缺乏协定 193;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的态度 194, 221 - 230; avoidance of interim government 避免临时政府 192;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 196 - 198;

-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 201;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191, 201;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3;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主义 201;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修宪 202, 203, 220; contrast with Brazil, Chile, and Uruguay 同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比较 190, 193; contrast with Greece and Portugal 同希腊和葡萄牙的比较 191—193;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66, 195, 219; as “delegated democracy” 作为“委托式民主” 203, 220, 396; economic society 经济社会 201; elections 选举 190, 192, 196, 199, 203; hierarchical military in 高层军官 70, 190—192;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侵犯人权 193, 194, 225, 252; hyperinflation 恶性通货膨胀 194, 196; ideology 意识形态 190; “impossible game”, “不可能的博弈” 196—200;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 跨时激励 200; intramilitary divisions 军队内部分裂 191—194; invasion of Malvinas 入侵马尔维纳斯 190, 191, 198; military as institution 作为机构的军队 193, 194; military autonomy 军方自治 224; military defeat 军事失败 191; military trials 军事审判 193, 194; military uprisings 军方起义 194, 213; neoliberal policies 新自由主义政策 198; parties as movements 以运动形式出现的党派 199, 200; Peronism in 庇隆主义 77; political economy of legitimacy 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 195—197, 203, 204;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183, 192, 193, 196—200;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191, 201; politicization of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的政治化 201; presidentialism 总统制 195, 220, 396;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85; quality of democracy 民主的质量 200—204; question of “collapse” “崩溃”问题 191, 192; rule of law 法治 201—203, 225; stabilization 稳定化 90, 193; strikes 罢工 193, 195; trade unions 工会 193, 195, 196—200; violence 暴力 190, 193, 198
- Arias Navarro, Carlos 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 93, 94
- Armed Forces Movement (MFA) 武装力量运动 116, 119, 120, 123
- armed revolt 武装叛乱 70;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by 启动的转型
- Armenia 亚美尼亚: boycott of Gorbachev's referendum 抵制戈尔巴乔夫全民公决 385; and the CIS 与独联体 390; clan politics in 部族政治 387; irredenta 失地 (一国认为应由其统治的他国领土) 26
- Arriagada, Genaro 杰纳罗·阿里亚加达 216
- Astori, Danilo 达尼洛·阿斯托里 158
- Attatürk (Mustafa Kemal) 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 50
-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220—230; alienated respondents 对民主疏离的回答者 226; confident democrats 有信心的民主者 227; critical democrats 持批评意见的民主者 230; democratic respondents 认同民主的回答者 226;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21—230; in Brazil 巴西的 169, 173—179, 221—230; in Chile 智利的 214, 215, 221—230; in Greece 在希腊的 135, 136; in Poland 波兰的 284—286;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25, 144—146; in South America 南美洲的 221—230; in Southern Europe 南欧的 142, 143; in Spain 西班牙的 99, 144—146;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60, 161, 219—228; satisfied democrats 满意的民主者 227; worried democrats 忧虑的民主者 227
- Austria, 奥地利: attempt to merge with Germany 试图与德国合并 21, 26; breakdown of democracy in 民主政体的崩溃 80; efficacy-legitimacy relationship in 效力—合法性关系 443; as parliamentary system 议会制体制 278
-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奥匈帝国 29, 74
- authoritarian communism 威权共产主义 255
-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威权立宪君主制 75
-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政体: contrast with post-totalitarianism 与后全能体制比较 327; co-optation of non-regime elites 体制外精英的共同选择 49; definition of 界定 38; divisions within 内部的分裂 71; human rights abuses in 侵犯人权 252; ideology in 意识形态 48; leadership in 领导层 46, 47; mobilization in 动员

- 49; as modal category of regime type 作为常见政体类型 39; in Poland 波兰的 41, 232, 254—261, 337, 452; role of military in 军方的角色 64, 65; Spain as authoritarian regime 西班牙的 110—112; spontaneous actions in 自发行动 111; stateness problem in 国家性问题 27; transition paths 转型路径 55, 56
- Aves, Jonathan 乔纳森·艾维斯 387
-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385; and the CIS 与独联体 390; interethnic clashes in 内部的种族冲突 366; regime reconstitution in 政体变革 387
- Aznar, José María 何塞·玛丽亚·阿兹纳尔 104
- B**
- “backward legitimation”, 形退实进 91, 92
- Balcerowicz, Leszek 莱谢克·巴尔采洛维奇 268—269
-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 assimilation in 内部同化 410—414, 418, 423, 424; attitudes toward past and future 对过去与未来的态度 419—423; citizenship policies 公民资格政策 410—414, 422—424; Communist parties 共产主义政党 407—409; contrast with CIS 与独联体的比较 427, 428; demographic change 人口统计的变化 403—406; elections 选举 407—409; exit option “离开”选择 424; integration into USSR 并入苏联 402—406; irredenta in “失地” 424—428; language policy 语言政策 413, 418; nation-state discourse 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 414—418; 1989 elections in USSR 苏联的 1989 年选举 379; opposition to Gorbachev reform 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 407;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Russians in 俄罗斯族人的政治认同 410—414, 417, 418;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407—409; Popular Fronts 人民阵线 407—409; Russophone Communists 俄裔共产党员 407; secession from USSR 脱离苏联 367; state- and nation-building 民族国家建设 428—433;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向民主与独立的转型 407—410; treaty with Russia 与俄罗斯签订的协议 409; working class migrants in 工人阶级移民 412, 413, 418
- Barraclough, Geoffry 杰弗莱·巴拉克鲁 20
- Basque nationalism 巴斯克民族主义 17, 28, 98—108
- Batista, Fulgencio 富尔根西奥·巴蒂斯塔 357
- Battle, Jorge 乔治·巴特尔 154, 164
- Belgium, multinational state-building in 比利时的多民族国家建设 23
- Belorussia (Belarus), 白俄罗斯: attitudes towar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对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态度 445—453; and Catholic Church 与天主教会 246; and the CIS 与独联体 390; former Communists in 前共产党员 387; sovereignty from USSR 苏联授予的主权 379
- Bendix, Reinhard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 179
- Bentley, Arthur 阿瑟·本特利 41
- Berman, Jakub 雅克布·贝尔曼 258
- “Bermuda Triangle,” 百慕大三角 283—285
- Beron, Petar 佩达·拜伦 341
- Beszélő 贝泽罗(20世纪匈牙利的一份非法出版物) 300
- Bethell, Nicholas 尼古拉斯·贝瑟尔 257
- Bialer, Seweryn 塞维林·比亚勒 370
- Bierut, Boleslaw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 258
- Bignone, Reynaldo 雷纳尔多·比格农 192
- Bingen, Dieter 迪特·宾根 261
-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23
- Blanco Party 白党 154, 156—158, 165
- blandos* 温和派 296
- Bokassa, Jean-Bedel 让·贝德尔·博卡萨 49, 347, 355
- Bolivia 玻利维亚 xv
- Borja, Celio 塞利欧·波尔扎 177
- Bosnia-Herzegovin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ethnic-cleansing in 种族清洗 35; Serbian irredenta in 塞尔维亚失地 450
- Botez, Mihail 米哈尔·波堤斯 351
- Bradley, John F. N. 约翰·F. N. 布拉德利 327
- Bratton, Michael 米歇尔·布拉顿 65
- Brazauskas, Algirdas 阿尔吉尔达斯·布拉

- 藻斯卡斯 408,455
- Brazil 巴西 xvi, 10, 11, 25, 150, 205, 398;
abertura, 开放 168; absence of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的缺失 166;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
 度 167, 171—177, 221—230; authoritarian
 prior regime type 威权倾向的政体类型
 166; availability of “Spanish model”, “西
 班牙模式”的可行性 117; citizenship 公
 民资格 167, 175, 187; civil society in 公
 民社会 7, 167, 168, 170, 171, 178, 179,
 187; completion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完成
 168; Constituent Assembly 制宪会议
 169, 184, 222;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5, 169, 221;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 167; contrast with
 Greece 同希腊相比 130; corporatism 法
 团主义 77;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66,
 219; denial of political rights 否定政治权
 利 28; difficult consolidation 艰难的巩固
 166, 172, 187; *Directas Já* 直接选举 168;
 economic society 经济社会 178, 187;
 efficacy 效力 167; elections 选举 168,
 172;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166, 189;
 hierarchical military 高级军官 166—
 169;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 166,
 187; legislative-executive conflict 立法—
 行政冲突 171; length of transition 转型
 的历时 168;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167,
 168, 207; military-as-institution 作为机构
 的军队 168; military autonomy 军方自治
 169, 224; “pacted transition” in “协议式
 转型” 66; party indiscipline 政党的分散
 184; political economy of legitimacy 合法
 性的政治经济学 166, 167, 172—174;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in 繁荣的
 政治经济学 80;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167, 168, 170, 180—185, 189;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167, 168, 170, 171,
 174, 178, 180, 187; presidentialism 总统制
 169—171, 180, 181—184, 220, 396;
 privatization strategy 私有化策略 185;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比例代表制
 183—185; “regime concession and societal
 conquest” “政权让步和社会征服” 168;
 role of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的角色
 455; rule of law 法治 167, 174, 178—
 180, 187, 189; security community 安全共
 同体 168; stabilization 稳定化 92, 167,
 170, 180, 189; “state-shrinking” 国家收
 缩 185—187; usable state 可用的国家机
 器 174—178, 185, 186; violence 暴力 175
 —177
- breakdown of democracy 民主政体的崩溃:
 in Austria 奥地利的 80; in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民主巩固国家的 6;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3; in Germany
 德国的 80;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403;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403
- Bremmer, Ian 伊安·布莱默 389
- Bresser Pereira, Louis Carlos 路易斯·卡
 洛斯·布莱瑟·佩雷拉 167
- Brezhnev Doctrine 勃列日涅夫主义 236,
 243, 302
- Brezhnev, 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48, 370, 378; detotalitarianization-by-decay
 under 衰退式后全能主义 376
- British Caribbean 英属加勒比海国家
 xvi, 24
- British Empire, democratization in 英帝国
 的民主化 73
- Brown, Archie 阿齐·布朗 41, 374,
 393, 398
- Brubaker, Rogers 罗格斯·布鲁贝克 25,
 26, 401, 402
- Brudny, Yitzhak M. 伊扎克·M. 布鲁德
 尼 395
- Bruneau, Thomas 托马斯·布鲁诺 124,
 125, 129
- Bruszt, László 拉斯洛·布鲁斯特 283,
 306, 307, 308, 314
- Bujak, Zbigniew 兹比格涅·布雅克 266
- Bulgaria 保加利亚 xvi, 25, 111, 235;
 antipolitics 反政治 340, 343; attitudes
 toward Parliament 对议会的态度 343;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态度
 444; attitudes toward Revolution 对革命
 的态度 340; 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 社
 会党 339—342;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
 教会 246;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335,
 337, 340, 342, 343; Communist Party 共
 产党 295, 335—339;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341; continuity
 with past 与过去的连续性 340; contrast
 to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与匈牙利

- 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较 335,339; “Dark Blues” “深蓝调” 341;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民主的巩固 343; democratic “overperformance” in 民主政治的“过度表现” 342;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6; as early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作为早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 233,294,295,329,333,343; economic society 经济社会 343; elections in 选举 331,339—342;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知识资本 343; liberalization in 自由化 338,339; “Light Blues” “浅蓝调” 341; “lustration” problems in “清洗”问题 251; palace coup in 宫廷政变 336; parliamentarism 议会制 342; perception of the USSR 对苏联的认知 338,339; personalization of dictatorship 独裁的人格化 339; pluralism 多元主义 335—337; “police informers” “警方告密者” 341;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7,341,343;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340,343;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比例代表制 342; as regime-controlled transition 政权主导的转型 295,333,336,339; regime reconstitution 政权的重建 254; response to Gorbachev reforms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应 242,243; role of democratic opposition 民主反对派的角色 335—337,339; Round Table talks 圆桌对话 295,338,340; Ruse Support Committee 鲁塞支持委员会 335,336; semi-presidentialism in 半总统制 342; Stalinism in 斯大林主义 336; trade unions 工会 336,337; Turkish minority in 土耳其少数民族 342; 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 民主力量联盟 339—342
- Burckhardt, J., J. 布尔克哈特 20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官僚威权主义政权 77,151,197
bureaucratic politics 官僚政治 41
- C**
- Caetano, Marcello 马塞罗·卡埃塔诺 118,125,128,250
Campeanu, Pavel 帕维尔·坎佩亚努 348,363
Campos, Roberto 罗伯托·冈波斯 170
carapintadas 花脸运动 194
Cárdenas, Lázaro 拉萨罗·卡德纳斯 195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xx,168,188,189
Carothers, Thomas 托马斯·卡罗萨斯 4
Carrero Blanco, Luis 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 107
Carrilho, Maria 玛丽娅·卡里洛 118
Carrillo, Santiago 圣地亚哥·卡里洛 94,96,97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74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linguistic policy 语言政策 30; migrants in 移民 32; nationalism in 民族主义 17,28;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政治认同 35
Catholicism as rival ideology 作为竞争性意识形态的天主教教义 77
Catterberg, Edgardo 埃德加多·卡特伯格 194,203
Cavallo, Domingo 多明戈·卡瓦洛 196
Cavour, Count Camillo Benso di 卡米罗·本索·迪·加富尔伯爵 23
Ceaușescu, Elena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 347,349,350,359
Ceaușescu, Florea 佛罗里尔·齐奥塞斯库 350
Ceaușescu, Ilie 伊列·齐奥塞斯库 350
Ceaușescu, Ioan 罗恩·齐奥塞斯库 350
Ceaușescu, Nicolae 尼科拉·齐奥塞斯库 49,66,233,345,346; ideology of 意识形态 354,355,364; impact on political society 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362; “judicial murder” of “司法谋杀” 359; mobilization under 动员 355,356; rise to power 掌权 347—349; sultanistic leadership style of 苏丹式领导风格 350,351; violence of regime termination 政权终结过程中的暴力 357,358
Ceaușescu, Nicu 尼库·齐奥塞斯库 350
“Cenaclul de Luni” “星期一圈子” 353
Center Alliance 中间联盟 273,281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共和国 49,347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中亚诸共和国: post-Soviet governments in 后苏维埃政府 389; republic-level elections in 全国性

- 选举 382
- “centrifugal polarization” “离心分化” 156
- “certain institutions of uncertain outcomes” “产生不确定结果的确定制度” 308
- Chamorro, Violeta 维奥莱塔·查莫罗 211
- Charter 77 七七宪章 294, 319—321;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19, 321, 337
- Chechnya 车臣 366, 428, 437
- Chehabi, H. E., H. E. 柴哈比 42, 66
- Chernenko, Konstantin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374
- Chile 智利 xvi, 11, 25, 68, 147; absence of “delegative democracy” “委任式民主”的缺失 213; anti-Pinochet opposition 反皮诺切特立场 363; appointment of Senators 任命参议员 207—208;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214, 215, 221—230;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 威权主义宪制 206—211, 213, 217, 218, 220; “authoritarian enclaves” “威权主义壁垒” 210, 211;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455;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205, 212; “Concertación” 民主联盟 207, 208, 212, 216, 217; consociational features 联盟特征 217;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2, 206; constrained transition 受限制的转型 206—212, 223; continuity of military leadership 军方统治的持续 208; contrast with Chile and Nicaragua 与智利和尼加拉瓜相比 211; contrast with Greece 与希腊相比 130;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66; “disloyal” transfer of power “不忠诚”的权力转移 206—210; economic performance 经济绩效 209, 220; elections 选举 206—208; hierarchical military in 高级军官 70, 71, 74, 150, 211;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侵犯人权 208, 213, 225, 252; military autonomy 军方自治 208, 224, 225; military budget 军事预算 209; military control of state apparatus 军方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211—212; military’s defensive project 军方的防御计划 205; 1988 plebiscite 1988年公民投票 206, 212, 434; political economy of legitimacy 合法性的政治经济学 214;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in 繁荣的政治经济学 80, 81, 220;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07, 212, 216, 247, 248;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212; presidentialism 总统制 216, 217, 220; privatization strategy 私有化策略 185; “regime of truth” “事实机制” 213; rule of law 法治 249; simultaneity of transition completion and consolidation 转型完成与转型巩固的共时性 210, 212;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 支持威权政权 212; 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美国的对外政策 75
- China 中国 People’s Republic of 中华人民共和国 xv, 18, 19, 20; economic over political reform 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 378, 436; liberalization in 自由化 437;
-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of Chile 智利基督教民主党 212, 216
-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of Hungary 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 302
- “Citizens’ Congress” “公民大会” 406
-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 16, 28—29;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1; in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的 410—414, 422—424; in Brazil 巴西的 167, 175, 187; in CIS countries 独联体诸国的 427, 438; definition of 界定 28;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3—406, 409, 414—418, 423, 425—428, 435, 450; inclusive definition of 包容性界定 25;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403—406, 409, 410, 415, 417, 425, 432, 450;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405, 432, 450;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多民族国家的 428—433; in nondemocratic regimes 非民主政权的 27; in Russia 俄罗斯的 367; in Spain 西班牙的 28, 29, 32
- Civic Alliance 公民联盟 346
- Civic Forum 公民论坛 245, 331, 332, 381
- civilian elites 文官精英 66; as potential winners and rulers 作为潜在的胜利者与统治者 68;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by 启动的转型 71
- civilian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 文官化的威权政体;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7; in Spain 西班牙的 110—112
- civilian-led regimes 文官领导的政权 68
-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文武关系 110

-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7—9, 14, 5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1, 201; in Brazil 巴西的 7, 167, 168, 170, 171, 178, 179, 187;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35, 337, 340, 342, 343; in Chile 智利的 205, 212;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27, 337; democratic opposition in 民主反对派 43; effect of “nationalizing policies” on “民族化政策”的影响 35; in Greece 希腊的 130, 131;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300—304, 310, 316—318;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by 启动的转型 71; under interim government 临时政府治下的 71, 72; in Poland 波兰的 7, 232, 237, 245—247, 256, 258, 261—264, 270—274;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45—247; religion and 宗教与 245—246, 453;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46, 351—353, 362, 364, 365; in Spain 西班牙的 111, 115;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2; in USSR 苏联的 376, 377
-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公民社会对抗国家” 270
- Codrescu, Andrei 安德烈·科泽斯库 345
- co-habitation 共治 279
- Cohen, Jean 吉恩·科恩 9
- “collapse of regime” “政权的崩溃”: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1, 192; as concept 作为概念的 46, 321—323;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295, 316, 321—328;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的 46; in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权的 70
- collective rights 集体权利 33, 388—390
- Collier, David 戴维·科里尔 xvi
- Colomer, Josep M. 约瑟普·M. 克罗默尔 62, 89
- colonial rule 殖民统治 19
- colonists 殖民主义者。参见 political identities, colonists
- Colorado Party 红党 155—158
- COMECON 经济互助委员会 xvi, xvii
- command economy 指令经济 11, 299; in mature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在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 43; transition to economic society 向经济社会的转型 435, 436, 438, 439
-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Unjustly Persecuted 保护受迫害者委员会 319
- common “roof” 共同“庇护”。参见 multinational state, provision of common “roof”
-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390; citizenship policy in 公民资格政策 427, 428; constraints on political liberties in 对政治自由的限制 447, 449, 452; contrast with Baltic countries 与波罗的海诸国相比较 427
- communism as rival ideology 作为竞争性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 75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of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 409—411; of Bulgaria 保加利亚 295, 335—339; of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317, 318, 320, 321, 332; of Estonia 爱沙尼亚 409, 411; of Georgia 格鲁吉亚 385; of Greece 希腊 132—134, 138; of Hungary 匈牙利 71, 243, 497, 300, 302, 304—309; and informer legacy 告密传统 251; of Latvia 拉脱维亚 407—409; of Lithuania 立陶宛 407—409; of Poland 波兰 243, 258, 261, 263, 264, 266, 267, 273, 274; of Portugal 葡萄牙 118, 126; relation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同民主巩固的关系 69; of Romania 罗马尼亚 345, 349, 351, 355; of Spain 西班牙 96, 97; of USSR 苏联 239—243, 371, 380—382, 384, 386
- “competitive assimilation game” “竞争性同化博弈” 32
- complementarity of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互补性 8
- complementary multiple identities 相辅相成的多重认同 102
- completed transition 完成转型 requirements for 完成转型的条件 107
- “condemned to democracy” “被迫选择了民主政治” 221
- Connor, Walker 沃克·康纳 30
- Consejo de Fuerzas Políticas de Cataluña 加泰罗尼亚政治力量委员会 101
-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协合民主 33, 40, 388, 390; in Chile 智利的 217; in multinational polities 多民族政体的 429, 430
- consociational pacts 协合式协议 57

- consolidated democracy 巩固的民主政治:
attitudinal definition of 就态度层面 6;
behavioral definition of 就行为层面 5;
benefits of parliamentarism in 议会制的
优势 141-142; in Brazil 巴西的 166,
172, 187; breakdown in 崩溃 6;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3; in Chile 智利的
212-215; citizenship policy in 公民资
格政策 414; in civilian-led regimes 文官
领导的政权 69; Communist parties in 共
产党 69;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必要条
件 7-13; constitutional definition of 制
度界定 5, 6;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s 制宪环境 81-83; in Czech
Republic 捷克的 333, 434;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经济绩效 77, 80;
evaluation of prior regime 对先前政权
的评价 143-147, 171-174; in Greece 希
腊的 132-138; hierarchical military in
高级军官 64;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434; legacies of totalitarian and post-
totalitarian regime type 全能主义与后全
能主义政权的传统 244-254; legitimacy
of territorial unit in 领土单位的合法性
26, 27;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432, 434;
in multinational settings 多民族场景中的
33-37, 424-428; need for market
intervention in 干预市场的必要性 12;
nonhierarchical military in 中下级军官
68; in Poland 波兰的 255, 269-292;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24-129; quality of
质量 137; relation betwee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
关系 8-10; "reserve domains" "保留领
域" 67-69, 84, 110, 116, 126, 133; role of
parties 政党的角色 10; role of timing
时机选择的作用 37; in Slovakia 斯洛伐
克的 333; in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220, 221; in Spain 西班牙的 108-115;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9-161; variety of
多样性 6
- consolidation tasks 民主巩固任务 38, 40,
56;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
义欧洲的 253;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的 295; sequence of 序
列 139
- Constantinescu, Emil 埃米尔·康斯坦丁内
斯库 363
-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 10, 5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3; in Brazil 巴西的 167;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
的 248, 249
-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s 制宪环境
66, 81-8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83,
204, 205, 222; in Brazil 巴西的 83, 171,
186, 221, 222;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1; in Chile 智利的 82, 208-213, 215,
219, 220, 222; consensual constitution-
making 一致性制宪 83, 114; constrained
constituent assembly 受限制的制宪会议
83, 222; constraints on 限制 82; control
by interim government 临时政府的控制
82;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82, 316;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5; in
Greece 希腊的 132-135;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311, 312; "paper" constitution
"纸面上"的宪法 82; partisan constitution
党派性宪法 83; in Poland 波兰的 282-
284;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82, 116, 120,
121, 123, 124, 126; restoration formulas
保留性方案 83, 222; in Spain 西班牙的
83, 98, 102, 116, 117; in Uruguay 乌拉圭
的 83, 154, 222; in USSR 苏联的 82,
381, 396, 398, 399; in Yugoslavia 南斯拉
夫的 82
- constrained constituent assembly 受限制的
制宪会议。参见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s, constrained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
建设性不信任投票 115, 310
- contestation 政治论争 inclusiveness of 包
容 96
- Contreras,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孔
特雷拉斯将军 218, 225
- Convergència i Unió 民族党 115
- COPCON 122
- Coposu, Corneliu 考奈留·科波苏 363
- Coppedge, Michael 迈克尔·柯培基 39
- corporatism 法团主义 in Brazil 巴西的 77
- Cortes 国会 role in Spanish transition 在
西班牙转型中的作用 91-96
- Costa Pinto, António 安东尼奥·考斯特·
品托 128
- costs of repression and toleration 镇压与宽
容的成本 19; in Eastern Europe 东欧的
238, 244; in Spanish transition 西班牙转

- 型中的 98
- Council of Europe, norms for democracy 欧洲理事会民主标准 35
-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 经济互助委员会 236, 240, 242
- Crampton, Richard 理查德·克兰普顿 336
- Croatia 克罗地亚 385; Serbian irredenta in 塞尔维亚失地 450
- Csurka, István 伊什特万·楚尔高 315, 316
- Cuba 古巴 357
- Cunhal, Alvaro 阿尔瓦罗·冈哈尔 121
- Cyprus, invasion by Turkey 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 131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xvi, 8, 10, 24, 25, 111, 142, 235; absence of debt problems 不存在债务问题 296, 318; annexation by Germany 被德国吞并 75; antipolitics 反政治 316, 331; atomized non-society 原子化的非社会状态 321; attitudes toward break-up 对解体的态度 329;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态度 442; behavior of coercive staff 强制机构人员的行为 323;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317; Charter of 宪章 77, 319, 321, 337;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327, 337;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317, 318, 320, 326, 332; constituent assembly 制宪会议 331;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2, 316; contrast to Hungary 与匈牙利截然不同 318, 321; democracy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政治 76, 316, 317, 452; "detotalitarianization by decay" 衰退式去全能主义化 296; dogmatic Stalinism 教条式斯大林主义 317; elections 选举 328, 331; events leading to collapse 导致崩溃的事件 325 - 327; expulsion of German irredenta 驱逐德占失地的德裔居民 425; "forgetting" "遗忘" 320; founding election 奠基性选举 332; as frozen pos-totalitarian regime 停滞的后全能主义政权 42, 45, 47, 232, 254, 294, 295, 316, 319, 320, 327, 331, 337; Helsinki Accords 赫尔辛基人权宣言 318; ideology 意识形态 320, 327;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启动 244; interim government in 临时政府 73, 316; leadership 领导层 320; legitimacy of use of force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323; "living a lie" "过着虚伪的生活" 319; mobilization 动员 319, 320; Munich Agreement 慕尼黑协定 316; mutual veto power 相互否决权 333; parallel culture 并行文化 319, 320; parliamentarism 议会制 276; party-state 党国 330; pluralism 多元主义 318, 320, 326;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7, 316, 321, 331 - 333; post-totalitarianism-by-decay 由衰退导致的后全能主义 319; potential tricameralism 可能成为三院制 330 - 333;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48, 236 - 238, 318; "principle of dissimulation" "伪装原则" 320;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改良式改革——协议式决裂 321; regime collapse 政权崩溃 295, 316, 321 - 328; response to Gorbachev reforms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回应 242, 246, 318; reversal of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的反动 75, 77; role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 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 328; "secession" in 内部的"脱离" 32; Soviet-style federal constitution 苏维埃式联邦宪制 316, 329 - 333, 367, 391;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28 - 333, 366, 450; strikes 罢工 325 - 327; "terminating" election "尾声"选举 332; Velvet Divorce 柔性分裂 328 - 333, 452; Velvet Revolution 天鹅绒革命 316, 319, 331; Youth Un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青年联盟 325
- Czech Republic 捷克: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246; chances of consolidation 民主巩固的机会 333, 434; contrasts with Slovakia 同斯洛伐克相比较 328; economic society in 经济社会 13;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工业发展 328;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436

D

- Dahl, Robert A. 罗伯特·A. 达尔 11, 13, 19, 152, 244;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 polyarchy 多头政治的制度保障 39, 430; priority of stateness to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而言国家性问题的首要性 26, 27, 29
- de Brito, Alexandra Barahona 亚历山德拉·巴拉洪纳·德·布里托 68
-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66, 219, 220;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66, 195, 219; in Brazil 巴西的 166, 219; in Chile 智利的 166;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95, 300; in Poland 波兰的 295; in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219, 220;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66, 219
- deferred gratification 延迟满足 439—453
- De Gaulle, Charles 查尔斯·戴高乐 218, 348
- Dej, Gheorghiu 乔治乌·德志 347
- “delegative democracy” “委任式民主” 165, 221; absence of, in Chile 智利的缺失 21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3, 219, 398; in Poland 波兰的 287
- democracy 民主: defense of 保卫 98; as interacting system 作为互动体制 13; need for sovereign state 作为前提条件的主权国家 17
- Democratic Russia 民主俄国 377, 378, 381, 393, 399
- Democratic Union 民主联盟 289
- Democratic Union of Hungarians 匈牙利民主联盟 359
-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3, 93, 100; and nation-state building 与民族国家建设 24; prosperity and 繁荣与 78
- democratization theory 民主化理论 232
- demos 民众 16, 26, 29; in multinational polities 多民族政体中的 429
- desencanto 幻想破灭: in Brazil 巴西的 189; in Spain 西班牙的 89, 92;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8
- de Silva, Luís Ignácio “Lula” 路易斯·伊格纳西奥·卢拉·德西尔瓦 188
- “detotalitarianism” 去全能主义主义 43; by choice 选择式 51, 375; by decay 衰退式 51, 375, 376; by societal conquest 社会征服导致的 51
- devolution 权力下放 99
- Diamandouros, P. Nikiforos 尼奇夫洛斯·戴尔曼德洛斯 130, 131, 134, 136
- Diamond, Larry 拉里·戴尔蒙德 79
- diffusion effect 扩散效应
- Dimitrov, Dimitr 季米特尔·季米特洛夫 338, 339
- Dimitrov, Filip 菲利普·季米特洛夫 343
- di Palma, Guiseppe 朱塞佩·迪·帕尔马 4, 5, 94, 357
- “disloyalty” “不忠” 156
- divided states 分裂的国家 19, 21
- Djilas, Milovan 米洛万·吉拉斯 256
- Dobre,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多布列 351
-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as sultanistic regime 作为苏丹制政权 42, 49
- double-simultaneous vote 双重投票
- “dual executive” 双重行政 278, 279
- dual identities 双重认同。参见 political identities, dual identities
- Dubc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237, 320
- Duvalier, “Papa Doc” “帕帕多克” 杜瓦利埃 xiii, 49
- Duverger, Maurice 莫里斯·迪韦尔热 276

E

- early post-totalitarianism 早期后全能主义。参见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early post-totalitarianism
-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东欧宪制评论》 82, 364, 435
- East Germany 东德。参见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 Ecoglasnost 生态公开性组织 335, 342
- Ecological Party 生态党 363
- economic performance 经济绩效: in Chile 智利的 209, 220;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3; perceptions of 理解 441—444; in Poland 波兰的 285, 291, 292;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28, 129; relationship with regime stability 与政权稳定性的关系 77—81; in Russia 俄罗斯的 385, 450; in Slovakia 斯洛伐克的 450; in Spain 西班牙的 112; in Ukraine 乌克兰的 385, 450
- economic society 经济社会 11, 14, 54;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01; in Brazil 巴西的 178, 187;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 343; in Chile 智利的 13; effect of “nationalizing policies” on “国有化政策”的影响 37;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13, 298, 299, 312, 313;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调整框架 253, 435; role of markets in 市场的作用 12;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64; in Russia 俄罗斯的 13, 368; in Ukraine 乌克兰的 13
- efficacy 效力: in Brazil 巴西的 167;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62—164
- Egypt 埃及 75
- Eisenstadt, S. N., S. N. 艾森斯塔德 369
- Eisfeld, Rainer 雷纳·埃斯菲尔德 127
- election observers 选举观察员 434
- elections 选举 8, 9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0, 192, 196, 199, 201; in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的 407—409; in Brazil 巴西的 168, 172;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33, 339—342; in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中亚诸共和国的 382; in Chile 智利的 206—208;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28, 333;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经济绩效与 80, 81;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3—409; in Georgia 格鲁吉亚的 383; in Greece 希腊的 132, 134, 135, 136;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97, 306—308; interim government and 临时政府与 71, 120;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of 国际观察员 432;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403, 407—409; in legitimacy hierarchy 在合法性层级中的 438;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403, 407—409; in Poland 波兰的 283—291;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6, 122;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44, 359, 360, 363; in Spain 西班牙的 94, 95, 100;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2, 153, 155; in USSR 苏联的 373, 374, 378, 379, 381—386
- electoralism 选举至上论 6
- “electoralist fallacy” “选举至上论的谬论” 4
- electoral law 选举法 8, 183; d’Hondt formula, d’Hondt 议席分配方案 288; in Poland 波兰的 275, 287—291
- electoral sequence 选举次序 34, 366; and the simultaneity problem 与共时性问题 436; in Spain 西班牙的 366, 382; in USSR 苏联的 366, 367, 374, 379, 382—385;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的 381, 382
- El Salvador 萨尔瓦多 xiii
- Elster, Jon 乔恩·厄尔斯特 10, 84, 328, 439
- Encuentro Progresista 进步联盟 158
- enosis 回归希腊 136
- Estonia 爱沙尼亚: annexation by USSR 被苏联合并 402, 403; attitudes toward past and future 对待过去与未来的态度 419—423; “Black Beret” military units “黑色贝雷帽”部队 409; boycott of Gorbachev’s referendum 抵制戈尔巴乔夫全民公决 385; breakdown of democracy 民主的崩溃 403; Communist Party of 共产党 407—409; competitive assimilation logic 竞争同化逻辑 418;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宪制安排 403; Democratic Election Coalition 民主选举联盟 407;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4, 403; demographic change 人口统计的变化 403—405; dissidence in 政见分歧 406;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经济绩效 433; exclusionary citizenship policy 排斥性公民资格政策 403—406, 409, 414—418, 423, 425—428, 433, 450; language policy 语言政策 413, 415, 417, 426, 427; legacies of totalitarianism 全能主义的传统 409; linguistic survival and extinction 语言存活与灭绝 418; nation-state discourse in 民族国家论述 414—418, 425; National Heritage Society 国家遗产协会 406; Nazi occupation 纳粹占领 403;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Russians in 境内俄罗斯人的政治认同 410—414;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407—409;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407—409, 425; prior regime type 先前政权类型 402—406; Protestantism in 新教 453; recognition by Yeltsin 被叶利钦赏识 409; Roundtables of Ethnic Minorities 少数民族圆桌会议 433; Russians as fifth column 作为第五纵队的俄罗斯族人 418;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俄语人群 233, 403, 408—410, 419—428;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32, 233;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6; transients and colonists 暂住者与殖民者

- 417, 418; United Council of Work Collectives 工会联合委员会 408; working class migrants 工人阶级移民 412, 413
- “ethical civil society” “伦理公民社会”。参见 Poland, “ethical civil society”
- ethical politics 伦理政治 9
- ethnic democracy 种族民主 430; in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的 432, 433
- ethnoauthoritarianism 种族威权主义 254
- ethnocracy 一族统治 69, 239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洲经济共同体 368; Baltic countries and 波罗的海诸国与 402, 409, 417, 420, 433; foreign policy of 对外政策 76; Greek transition and 希腊转型与 127, 219; perestroika and 苏联改革与 239, 240, 242; Poland and 波兰与 292; Portuguese transition and 葡萄牙转型与 125, 127, 219; Southern Europe and 南欧与 140, 141, 219; Spanish transition and 西班牙转型与 102, 113, 219
- Euskadi ta Askatasuna 埃塔(意为:祖国与自由)组织 99, 103, 105—107
- exclusionary consociational authoritarianism 排它的协合式威权主义 60
- ### F
- Farneti, Paolo 帕奥罗·范内提 8
- fascism as rival ideology 作为竞争性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 75
-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in Brazil 巴西的 166, 189; democracy and 民主政治与 19; in multinational polities 多民族政体中的 429; 99; in USSR 苏联的 367, 369—372, 376, 391
-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xvi, 21, 25, 375; citizenship policy of 公民资格政策 416; foreign policy toward Portugal 对葡萄牙的政策 74
- Federation of Young Democrats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302
- Fernández Miranda, Torcuato 多尔夸多·费尔南德斯·米兰达 93
- Ferreira, Wilson 维尔森·弗雷拉 154
- Filipescu, Radu 拉杜·菲利普斯库 352
- Finland 芬兰 24; a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作为半总统制 278
- Fish, M. Stephen, M. 斯蒂芬·费什 381
- Fisher, Mary Ellen 玛丽·艾伦·费舍尔 348, 351
- Fishman, Robert 罗伯特·费希曼 92
- “Flying University” “飞行大学” 261
- foreign policies 对外政策
- four-player game 四方博弈。参见 transition pacts, four-player game
- Foxley, Alejandro 亚历杭德罗·福克斯莱 209, 214
- Fraga, Manuel 曼努埃尔·弗拉加 76, 93
- France 法国 25, 131; Fifth Republic 第五共和国 279, 399; nationalism in 民族主义 20, 21; semipresidentialism in 半总统制 278, 279; state-based nation-building 基于国家的民族建设 30
- Franc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60, 76, 99, 115, 117, 127, 133; legality in Franco regime 佛朗哥政权的合法性 249; retrospective views about 回顾性看法 144, 146
- Franco, Itamar 伊塔玛尔·佛朗哥 171, 177
- Francoite institutions 佛朗哥政权的制度 91
- Free Democrats of Hungary 匈牙利自由民主党 9
-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39, 445
- Freeman, John R. 约翰·R. 弗里曼 12
- Frei, Eduardo 埃杜阿多·弗雷 210, 216, 217
- Frente Amplio 左翼联盟 154, 156—159
- Frepasso 左派联盟 203
- Friedheim, Daniel V. 丹尼尔·V. 弗里德海姆 47, 118, 323, 324
- frozen post-totalitarianism 僵滞的后全能主义。参见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frozen post-totalitarianism
- Fuerza Nueva 新力量党 98
- Fujimori, Alberto 阿尔伯特·藤森 170, 175
-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福山 74
- ### G
- Gaidar, Yegor 叶戈尔·盖达尔 394
- Galtieri, Leopoldo 列奥波尔多·加尔铁

- 尔 192
- Gamsakhurdia, Zviad 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迪亚 383
- García, Prudencio 加西亚·普鲁登西奥 191
- Garibaldi 加里波第 23
- Garretón, Antonio 安东尼奥·加雷顿 210
- Garton Ash, Timothy 提摩西·加顿·阿什 238, 339, 320, 458
- Gastil, Raymond D. 雷蒙德·D. 加斯第尔 39
- gate opening to democratic efforts 打开民主行动之门 73
- Gati, Charles 查尔斯·加蒂 242, 297, 298
- Geisel, Ernesto 埃内斯托·盖泽尔 130, 167
- Gellner, Ernest 欧内斯特·格尔纳 22, 24, 31, 49
- Genov, Edward 爱德华·基诺夫 335
- Georgia 格鲁吉亚 385; boycott of Gorbachev's referendum 反对戈尔巴乔夫公民表决 385; CIS and 独联体与 390; clan politics in 部族政治 387;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383; interethnic clashes in 种族冲突 366; nationalist outbidding 民族主义者的豪赌 383;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383; republic-level election in 全国性选举 383; secession from USSR 脱离苏联 367
- Geremek, Bronislaw 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 xx, 264
-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xvi, 8, 111, 235, 238; as early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作为早期后全能主义政权 295, 375; as froze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作为僵滞的后全能主义政权 45, 47, 254;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启动 244; "lustration" problems "清洗"问题 251; merger with West Germany 同西德合并 21, 26; party domination of state 党治国家 250, 251; Protestant dissidents in 新教异议者 245, 453; response to Gorbachev reforms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回应 242; Stasi files 国家安全部档案 251, 252;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6
- Germany 德国; breakdown of democracy in 民主政体的崩溃 80;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立宪君主政制 77; democratic transition by installation in 就职启动的民主转型 75; efficacy-legitimacy relationship in 效力—合法性关系 443; nation-building in 民族建设 23
- Gerö, Ernő 艾尔诺·格罗 297
- Ghizikis, Phaedon 费登·吉兹凯斯 131
- Gibson, Edward 爱德华·吉布森 198
- Gierek, Edward 爱德华·盖莱克 258, 263
- Gilbert, Trond 特隆德·吉尔伯特 354, 355
- Gillespie, Charles 查尔斯·吉莱斯皮 151, 152, 154, 156
-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 General 高尔贝里·都·库托·厄·席尔瓦将军 167
- Gomes, Ciro 西罗·戈梅斯 186
- Gomulka, Wladyslaw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257, 258, 260, 261
- Gonçalves, Vasco 瓦斯科·冈萨尔维斯 127
- Göncz, Arpád 阿尔帕德·根茨 314
- González, Felipe 费利佩·冈萨雷斯 96, 160
- González, Luiz 路易斯·冈萨雷斯 151, 152, 155, 156, 162, 164
-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3, 92; ambivalence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矛盾 379; ambivalenc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对政党的矛盾 380; announcement of reforms by 改革宣言 239—243; decision to liberalize 实行自由化的决定 378; displacement of 取代 376; Hungarian transition and 匈牙利转型与 301; inattention to electoral sequence 对选举次序的忽视 436; initiation of regime change 政体变革的启动 372—379; mobilization of titular nationalities by 对名义上的民族的动员 374; nationality policy of 国籍政策 368; neglect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对宪制变革的忽略 436; on perestroika 关于改革 368; Polish democracy and 波兰民主政治与 266, 267, 291; referendum 全民公决 387; struggle with Yeltsin 与叶利钦的斗争 389; use of elections by 对选举的运用 373
- Gorbunovs, Anatolijs 阿纳托利斯·戈尔布诺夫斯 408, 410

- Graham, Laurence S. 劳伦斯·S. 格雷厄姆 122
-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210;
on hegemony 关于霸权 237,263
- Greece 希腊 xvi, 25;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135, 136; behavior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的行为 133-134; civil society in 公民社会 130, 131, 135; contrast with Portuguese and Spanish transition 与葡萄牙和西班牙转型的比较 132; coup by hard-liners 强硬路线的争辩 129;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民主巩固 131-138; economic reform 经济改革 139; elections 选举 132, 134, 135, 136; interim government in 临时政府 73, 132; nation-building in 民族构建 23; national feelings in 民族情感 136; nonhierarchical nature of coup 政变的低阶性质 130;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东正教 453; parliamentarism in 议会制 139; political society in 政治社会 130;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military regime 对军人政权的回顾性评价 147; revision of Constitution 修宪 132-135; role of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作用 127, 219; role of hierarchical military 中下级军官的作用 132; role of Nato 北约的作用 219; shortness of transition 转型的不足 130; similarity with Argentina 与阿根廷的相似性 191; transfer-of power formula 权力交接规则 131
- Greenfeld, Liah 李亚·戈林菲尔德 21
- Green Party, of Hungary 匈牙利绿党 316
- Gross, Jan Tomasz 简·托马兹·格罗斯 258, 267
- Grósz, Károly 卡罗伊·格罗斯 304, 305
- Group for Social Dialogue 社会对话组织 346
- Grupos Anti-terroristas de Liberación 自由反恐大队 115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xiii, 4
- Gutiérrez Mellado, General 古铁雷斯·梅拉多将军 93
- Guzman, Jaime 杰米·盖兹曼 108
- H
- Haiti 海地 xiii; as a sultanistic regime 作为苏丹制政权 49, 57; Tonton Macoutes 马库特大叔(美国支持下的海地杜瓦利埃独裁政权的军警暴徒——译注) 53
- Hapsburg Empire, "national curias" in 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发源” 34
- "hard-liners" 强硬路线者。参见 transition pacts, "hard-liners"
- Hartlyn, Jonathan 乔纳森·哈特林 60
- Hauslohner, Peter 彼得·豪斯罗纳 380
- Havel, Václav 瓦茨拉夫·哈维尔 295, 337; refusal to join party 拒绝入党 245, 270, 319, 320; role in collapse 在崩溃中的角色 325-327; role in Velvet Divorce 在柔性分离中的作用 332, 333
- Helsinki Accords 赫尔辛基人权宣言 77, 294
- Helsinki Commission 赫尔辛基委员会 382
- Herri Batasuna 赫里巴塔苏纳党 98, 105
- hierarchical military 高级军官 66-68;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70, 151, 190-192; in Brazil 巴西的 166-169; in Chile 智利的 70, 71, 74, 150, 211; in Greece 希腊的 131, 132;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启动 73; officer corps 军官团 67; possibility of countercoup 反击政变的可能性 122; reassertion of hierarchy 权威的重申 121, 123; in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150, 219;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1
- Hirschman, Albert O. 阿尔伯特·O. 赫西曼 92, 232
- Hilt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355, 418
-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28
- Holmes, Stephen 斯蒂芬·霍尔姆斯 13
- Honduras, 洪都拉斯 xiii
- Hong Kong 香港 18, 19
- Hough, Jerry 杰里·霍夫 41, 412
- Howard, A. E. Dick, A. E. 迪克·霍华德 84
-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侵犯人权 68, 154, 15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3, 194, 225, 252;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主义政权的 252; in Chile 智利的 68, 69, 72, 150, 211;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44, 364
- Hungarian Democratic Alliance 匈牙利民主联盟 363
- 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 匈牙利民主论坛 247, 302, 305, 308, 310, 315

Hungarian Rights Association 匈牙利人权协会 335
 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 匈牙利社会党 455,457
 Hungarian Truth and Life Party 匈牙利真理与生活党 316
 Hungary 匈牙利 xvi,25,145,237;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246;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对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态度 442; attitudes toward regime legitimacy 对政权合法性的态度 302; availability of "Spanish model" "西班牙模式"的可行性 117, 233; chances of consolidation 巩固的机率 436;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300-302, 304, 310, 314-316; Communist Party of 共产党 71,243,297,300,302,304-309; Constitutional Court 宪法法院 314;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311, 312; constructive vote of no-confidence 建设性不信任投票 312; contrast with Poland 同波兰的比较 304, 311;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6; "detotalitarianization by choice" "选择式去全能主义" 294, 296-298, 375; economic society in 经济社会 13, 298, 299, 312, 313; elections 选举 297, 306-308; "flattened" landscape "扁平的"图景 301; founding election 奠基性选举 310; "goulash Communism" "土豆加牛肉式共产主义" 298; historic parties 历史性政党 302; ideology 意识形态 298; indebtedness 债务 295, 300; independent unions 独立联盟 301, 377;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启动 246, 295, 300; irredenta 失地 315, 316; law of association 社团法 302; "lustration" laws "清洗"法 314; as mature post-totalitarian regime 作为成熟的后全能主义政权 42, 43, 44, 48, 56, 232, 254, 294, 295, 309, 337, 452; minority in Romania 罗马尼亚少数民族 363, 364; nation-building in 民族—国家建设 23; neutrality of army 军方中立 309; New Economic Mobilization 新经济动员 298; 1956 Revolution 1956年革命 75, 237, 238, 296, 297, 305, 306; "nomenklatura"

adaptation 党国权贵的适应性 300,308; Opposition Round Table 反对派圆桌会议 307,338; "pacted transition" in 协议式转型 66, 295, 306-310;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irst" "议会选举优先" 311; passive compliance 消极服从 298;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7,248,295, 300,302,305-311,314;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302,307,310,311,314,319, 375;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利 301,312, 375; reform Communists 共产党改革派 308;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 306-310; "regime concession and societal conquest" "政权妥协与社会征服" 304, 305; regulatory framework 规制框架 313; response to Gorbachev reforms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应 243; "return to Communism" "回归共产主义" 76, 435, 454, 455; Round Table talks 圆桌会议 295,307,310,311,338; rule of law 法治 299,312; second economy 第二经济 299, 309,312; split in party-state 党—国分裂 304; Stalinization 斯大林主义化 297; stateness problems 国家性问题 310,314-316; system blame politics 抨击体制的政治 315; Treaty of Trianon 特里亚农条约 315; usable state apparatus 可用的国家机器 313

Huntington, Samuel P. 塞缪尔·P. 亨廷顿 4,75,87

Husák, Gustáv 古斯塔夫·胡萨克 318, 320,327

I

Iceland, parliamentarism in 冰岛的议会制 278

ideology 意识形态 38;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92;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主义政权的 46; of Communist Party elites 共产党精英的 244;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20,327;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98; in Poland 波兰的 255,256, 258;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的 41, 47-48, 293;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54, 355, 364; in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权的 50-51, 54;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权的 40, 48; in USSR 苏联的 77, 236, 238, 375, 376

Iliescu, Ion 扬·伊利埃斯库 345, 358, 359, 361, 364; re-election of 连任 362, 363

“imagined communities” “想象的共同体” 22

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 独立小农党 302

India 印度 19, 24; as a “state-nation” 作为一个“国家民族” 34

individual rights 个体权利 33, 388—390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xv

informer legacy 告密传统 251

institutional indeterminacy 制度性不明确 4

institutionalizing uncertainty 制度化的不确定性 379, 394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制度性多元主义”。参见 totalitarian regimes,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interim government 临时政府。参见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国际影响 66, 72; as diffusion effects 作为扩散效应 76, 119, 357; favorability in Greek transition 希腊转型的支持度 136; as foreign policies 作为对外政策 73, 76, 128; in Poland 对波兰的 266, 267;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对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影响 235—239; in Southern Europe 对南欧的影响 140, 141; subversion by regional hegemony 地区霸权进行的颠覆 74; as zeitgeist 作为时代精神 74—76, 188, 20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62

Inter-Regional Deputies Group 地区间代表组织 379

intraparty alliance 党际联盟 8

inverted legitimacy pyramid 颠倒的合法性金字塔 435—439

Ioannides, Brigadier General 陆军准将约安尼泽斯 129

Iran 伊朗 xiii; as a sultanistic regime 作为一个苏丹式政权 42, 49, 357

Ireland 爱尔兰 24; as parliamentary system 作为议会制体制 278

irredenta 失地 26, 315; in Baltic countries

在波罗的海诸国的 426—430; in Greece 希腊的 138; in Serbia 塞尔维亚的 452

“irreversibility of Communism” “共产主义的不可逆转性” 237, 238

Islam 伊斯兰教 260

Israel, minority parties in 以色列中犹太教的少数党派 431

Italy 意大利 72;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4; fascism as ideology in 法西斯意识形态 75; nation-building in 民族建设 23

J

Jakes, Secretary General 杰克斯总书记 327

Japan 日本 25; democratic transition by installation 经由设置而实现的民主转型 75

Jaruzelski, General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258, 263, 264, 265, 267, 268, 273

Jasiewicz, Krzysztof 克里斯托弗·杰希维茨 280

Jelenski, J. A., J. A. 耶伦斯基 258

Jereissati, Tasso 塔索·热雷萨地 186

Jewish Kabbalah, in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犹太人卡巴 34

Jowitt, Ken 肯·朱威特 233, 347, 437

Juan Carlos (king of Spain) 胡安·卡洛斯(西班牙国王) 76, 89, 92; defeat of coup 政变失败 101, 109; as “democratic monarch” 作为“民主主义君主” 93

Junqueira, Aristides 阿里斯蒂德斯·琼克伊拉 180

Junta of National Salvation 民族救国军人集团 119

Jurca, Engineer 工程师朱洛卡 351

K

Kádár, János 亚诺什·卡达尔 48, 145, 300, 302, 304, 305, 318

kaderpolitik 干部体制 250

Kahler, Miles 迈尔斯·科洛 185

Kania, Stefan 斯蒂芬·卡尼亚 263

Karamanlis,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 131, 132, 134, 135

Karimov, Islam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 449

Karklins, Rasma 拉斯玛·卡尔柯林斯 402,411
 Karl, Terry 特里·卡尔 4,40
 Kashmir 克什米尔 27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400; CIS and 独联体与 390; Russians in 境内的俄罗斯族人 32
 Keane, John 约翰·基恩 9
 Khasbulatov, Ruslan 卢斯兰·哈斯布拉托夫 396,397
 Khazanov, Anatoly 阿纳托利·哈扎诺夫 387
 Khrushchev, 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 32,374,375
 Kirkpatrick, Jeanne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 237
 Kis, János 亚诺什·基什 300,9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127
 Kiszczak, General Czeslaw 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将军 264,265,273
 Kitschelt, Herbert 赫伯特·基奇特 343
 Kiuranov, Ch. 久加诺夫·丘拉诺夫 335,336
 Klaus, Václav 瓦茨拉夫·克劳斯 13, 32,332
 Kligman, Gail 杰尔·克林格曼 346,362
 Klingemann, Hans-Dieter 汉斯-迪特·克林格曼 412
 Kolarova, Rumyana 鲁米亚娜·克拉罗娃 338,339
 Kolarska-Bobinska, Lena 勒纳·科拉斯伽-波宾斯卡 284
 Korbonski, Andrzej 安德烈·科波斯基 264
 Körösnéyi, András 安德拉·克勒谢尼 305
 Kosovo 科索沃 434
 Kozyrev, Andrei 安德雷·柯兹瑞夫 425
 Krupavicius, Algis 阿尔基斯·克鲁帕维修死 455
 Kuchma 库奇马 399
 Kundera, Milan 米兰·昆德拉 320
 Kwasniewski, Aleksander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 266,456
 Kymlicka, Will 威尔·金里卡 34
 Kyrgyzstan 吉尔吉斯斯坦: CIS and 独联体与 390; clan politics in 部族政治 387; Russians in 境内的俄罗斯族人 32

L

Laakso/Taagepera index 拉克瑟/塔格佩拉指数(最高有效政党指数) 181,217; in Poland 波兰的 275,291
 Lacalle, Alberto 阿尔韦托·拉卡列 157
 Lagos, Ricardo 里卡多·拉戈斯 215,216
 Laitin, David 戴维·莱廷 32,402,404, 412,418,426,428
 Landsbergis, Vytautas 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 405,455
 Latawski, Paul C. 保罗·C. 拉托斯基 259
 Latino Barometer 拉美指标 221,227—230
 Latvia 拉脱维亚: annexation by USSR 被苏联合并 402,403; assimilation in 同化 432; attitudes toward past and future 对过去和未来的态度 419—427; boycott of Gorbachev's referendum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 385; breakdown of democracy 民主政体的崩溃 403;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407—409; demographic change 人口统计的变化 403—405; dissidence in 内部的异议 406; elections 选举 403, 407—409; ethnic democracy in 种族民主 432, 433; exclusionary citizenship policy 排外的公民资格政策 403—406, 409, 410, 415, 417, 425, 432, 450; Freedom Monument 自由纪念碑 406; language policy 语言政策 413, 417; legacies of totalitarianism 全能主义的传统 409; Nazi occupation 纳粹占领 403;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Russians in 境内俄罗斯族人的政治认同 410—414;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407—409;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407—409; prior regime type 先前的政体类型 402—406; Russians as fifth column 作为第五纵队的俄罗斯族人 418;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俄语人群 233, 403—406, 408—410, 425;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32, 233;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6
 Lazarsfeld, Paul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concept of property space 财产空间概念 36
 leadership 领导层 38, 68;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政权的 46, 47;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20; in

-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体的 46, 47, 293;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50, 351; in Spain 西班牙的 92—96; in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体的 50, 51, 54;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的 46, 47, 248; in USSR 苏联的 375
- Lefter, Ion Bogdan 艾奥恩·波哥坦·勒夫特 353, 358
- legal culture 守法文化 10
- legal reform 合法的改革 92
- legislatures 立法机关 8, 73
- legitimacy 合法性 8; hierarchy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民主合法性的层级 438; perception by citizens of 公民对合法性的理解 76; relation to efficacy 同效力的关系 76—81, 115, 116, 223—230, 235, 443; of South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南欧民主国家的合法性 142; usefulness in state reconstruction 在国家重建中的有用性 437—439
- Len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列宁 374, 375, 396
- Lepsius, M. Rainer, M. 雷纳·莱普休斯 21
- Letelier, Orlando 奥兰多·莱特列尔 218
-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Poland 波兰自由民主党 289
-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3, 95; in Brazil 巴西的 167, 168, 205;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38, 339;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75, 77, 237; in Poland 波兰的 264;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47; in USSR 苏联的 238, 367, 374, 376, 378, 387
- “liberation by golpe” “由政变实现解放” 107, 120, 130
- Lieven, Anatol 阿纳托尔·列文 32, 402, 405, 455
- Ligachev, Yegor 叶戈尔·利加切夫 368
- Lijphart, Arend 阿伦·李帕特 33, 34, 114, 288, 290, 291, 405
- Lilov, Aleksandar 亚历山大·利洛夫 339, 340
- Limongi, Fernando 费尔南多·利蒙吉 79, 80
- Lin Chia-lung 林佳龙 20
- Lipset, Seymour Martin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39, 77
- Lithuania 立陶宛: annexation by USSR 被苏联合并 403; attitudes toward past and future 对过去和未来的态度 420—422; boycott of Gorbachev's referendum 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 385; breakdown of democracy 民主政治的崩溃 403;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245; Catholic majority in 天主教多数派 405;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407—409;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民主巩固 432, 434;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4, 403; demographic change 人口统计的变化 404, 405; elections 选举 403, 407—409; inclusionary citizenship policy 包容性的公民资格政策 405, 432, 450; language policy 语言政策 413, 415;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407—409;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407—409; “return to Communism” “回归共产主义” 74, 435, 454, 455;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俄语人群 408, 411;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working class migrants 工人阶级移民 412, 413
- “little constitution” “小宪法” 281
- “living in truth” “生活在真理之中” 271
- “living-lie” “活谎言” 48
- Llera, Francisco J. 弗朗西斯科·J. 伊埃拉 105
- loosely coupled hypothesis 松散联系假设 439—453
- Lowenthal, Abraham F. 亚伯拉罕·F. 洛温塔尔 4, 73
- Lucinski 卢辛斯基 383
- Luczywo, Helena 海伦娜·武奇茨娃 292
- Lukanov, Andrei 安德雷·卢卡诺夫 338
- Lukes, Steven 斯蒂芬·卢克斯 437
- “lustration” problems “清洗”问题 251; in Bulgarian 保加利亚的 251; in 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251;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314

M

- Macao 澳门 18
- Macedonia, stateness problems of 马其顿王国的国家性问题 450
- “macro-variables” 微观变量 xiv, 66
- mafia economies 黑帮经济 438

- Mainwaring, Scott 斯科特·梅因沃林 5, 117, 181, 184
- majority system 多数体制 183
- Makarios, Archbishop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131
- Malitza, Mircea 摩西·马里察 349, 357
- Mann, Michael 迈克尔·曼 16
- Manolescu, Nicolae 尼科拉·门诺列斯库 353
- “manufactured majorities” “制造的多数” 290
- Maravall, José María 何塞·玛丽亚·马拉瓦利 79, 116, 128
- Marcos, Ferdinand 费迪南德·马科斯
-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11; need for regulation of 市场经济需要管理 13
- Markovic, Ante 安特·马尔科维奇 385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396
-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成熟的后极权主义。参见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 Maxwell, Kenneth 肯尼斯·麦克斯韦尔 117, 123, 126
- Mazowiecki, Tadeusz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 269, 274, 280
- Mazzini, Giuseppe 朱塞佩·马志尼 23
- McFaul, Michael 迈克尔·迈克弗尔 393
- Meciar,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麦恰尔 332, 333
- Medina, Hugo 胡戈·梅迪纳 155, 160
- Menem, Carlos 卡洛斯·梅内姆 150, 185, 194—195; impact on quality of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质量的影响 200—204, 225; plebiscitary style 全民公决模式 220; role in “impossible game” 在“不可能博弈”中的作用 196, 198—200
- Menéndez, General Luciano 卢西亚诺·梅内德斯将军 190
- MERCOSUR 南美经济共同市场 164, 219
- Meri, Lennart 伦纳特·梅里 420
- Mexico 墨西哥 180; authoritarian hegemony in 威权主义霸权 197; privatization strategy 私有化策略 185
- Micewski, Andrzej 安德烈·米策夫斯基 257
- Michnik, Adam 亚当·米赫尼克 263, 292
- Migranian, Andranik 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 385
- migration, types of 移民的类型 416—418
- Miláns del Bosch, Jaime 杰米·米兰斯·德·博施将军 108
- military 军方: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1—194; as empire 作为帝国的 196—198; internal divisions in 内部分裂 122; in Poland 波兰的 263, 264, 309;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7, 258;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的 65, 66; professionalism of 专业化 219;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09;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权的 67, 68;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的 309
- “military as government” “军政府” 64, 67, 68; costs of extraction 抽身退出的代价 67;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1, 153—156
- “military as institution” “作为机构的军方” 64, 67;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3, 213; in Brazil 巴西的 168; collective incentives in 集体动机 70; extrication in Greece 在希腊的退出 131, 132;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侵犯人权 68; toleration of trials 审判宽容 68;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1, 153—156
- military coup 军方政变: attempt in Spain 西班牙的企图 89; extrication coup 摆脱非民主政体的 68; possibility of countercoup 反政变的可能性 122
- military leaders, trials of 审判军人领袖: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3, 194; in Greece 希腊的 133; in Spain 西班牙的 108;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4, 155, 159, 215, 252
- military prerogatives 军方特权 67, 110;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224; in Brazil 巴西的 169, 224; in Chile 智利的 208, 224, 225;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8
- Millard, Frances 弗朗西斯·米拉德 280
- Milošević, Slobodan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434
- Minc, Hilary 希拉里·闵克 258
- Mindszenty, Cardinal Jozsef 卡迪纳尔·约瑟夫·明曾蒂 297
- minority prime ministers 少数派总理 281
- Mishler, William 威廉姆·米舍勒 442
- Misiunas, Romuald 罗穆尔德·米修纳斯 402, 404
- Mitterand, François 弗朗索瓦·密特

朗 218
 Mladenov, Petar 彼得·姆拉德诺夫 337, 338, 342
 mobilization 动员 38;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主义政体的 47;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19, 320; in Poland 波兰的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27, 138;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体的 47, 48, 293;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55, 356; in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权的 50, 51;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体的 40, 47, 48; in USSR 苏联的 375
 “moderates” “适度”。参见 transition pacts, “moderates”
 Moisés, José Álvaro 何塞·阿尔维托·莫塞斯 172
 Mokrzycki, Edmund 埃德蒙·莫克日茨基 246
 Moldavia, republic -level election in 摩尔达维亚全国性选举 383
 Moldova 摩尔多瓦: boycott of Gorbachev's referendum 反对戈尔巴乔夫全民公决 385; interethnic clashes in 种族冲突 366; secession from USSR 脱离苏联 367
 Molotov-Ribbentrop Pact of 1939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403, 407, 416
 monarchy 君主制 89, 92
 Moncloa Pact 蒙科洛协议。参见 Spain, Moncloa Pact
 monopoly party 垄断型政党 69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238
 Montenegro 黑山 434
 Monticone, Ronald C. 罗纳尔多·C. 蒙蒂科恩 256, 257
 Montoneros 城市游击队 199
 Moscow Association of Voters 莫斯科选民协会 377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 权利与自由运动 342
 “movements of rage” 群情激愤的运动 362
 Movimiento Nacional 全国运动党。参见 official single party, Movimiento
 multicultural state 多文化国家 30, 423; and assimilation 与同化 414
 multilingual state 多语言国家 30—31; Spain as 西班牙 88

multinational state 多民族国家: assimilation in 同化 428—432; in Belgium 比利时 23; conflict with “nation-building” 与民族建设的冲突 24; consociational arrangements in 合作安排 429, 430; democracy in 民主政治 23, 29, 33—37; electoral sequence 选举次序 34, 233, 401, 402, 410, 427;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政治认同 35; provision of common “roof” 共同“庇护”规定 33, 420; Spain as 西班牙
 Munteanu, Marian 马里安·蒙泰努 363
 Murrell, Peter 彼得·默雷尔 12

N

Nagorno-Karabagh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26
 Nagy, Imre 伊姆雷·纳吉 297, 298
 Naples 那不勒斯 21
 Napoleon, and nationalist movements 拿破仑和民族主义运动 20
 nation 民族 16; differences from state 与国家的不同 22; Weberian concept of 韦伯的概念 21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06, 425, 434; of Basques 巴斯克 17, 28, 98—109; i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17, 28; of Hindus 印度 34; in Romania 罗马尼亚 362—365
 nationalism as liberation 作为解放的民族主义 389
 National Liberal Party 民族自由党 359, 363
 “nationalizing state policies” 民族化国家政策 25, 35
 National Peasant Party 全国农民党 359
 nation-building 民族建设 17, 20—23, 106; in the Baltics 波罗的海诸国的 424, 428—433; irredenta 失地 26; by Soviet state 苏维埃国家进行的 412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17, 20; assimilation in 同化 430; discongruent settings for 不适背景 30; discourse of 话语 414—418; emergence of 出现 22; homogeneity of 同质性 25;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政治认同 417, 418; tension with logic of democracy 同民主政治逻辑的张力 239, 402, 425, 426

nation-state building 民族国家建设 233, 401, 430; in Estonia 民族国家建设 414—418, 425;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417, 418, 425

NATO 北约 219, 220

Nehru, 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34

Nelson, Daniel 丹尼尔·纳尔逊 351

Netherlands 荷兰 80

Neues Forum 新思维论坛 381

Neves, Tancredo 坦克雷多·内维斯 168

Nicaragua 尼加拉瓜 xiii, 117, 211, 349, 359

Nicolaides, General Cristiano 克里斯提亚诺·尼克莱德斯将军 192

Nikova, Ekaterina 叶卡婕琳娜·尼库娃 340

Nino, Carlos 卡洛斯·尼尼奥 200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348

Niyazov, Saparmural 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 449

Noica, Constantin 康斯坦丁·诺伊卡 353

nomenklatura 党国权贵 45, 147; civil society and 公民社会与 246; in Poland 波兰的 262, 267, 268; privileges of, in newly capitalist economies 在新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特权地位 69, 70;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47

nondemocratic regimes 非民主政权: coercive capacity of 强制能力 80; constitutions of 宪政 82; economic decline in 经济衰退 77, 79

nonhierarchical military 中下级军官 66, 68, 115; contrast between Argentina, Greece and Portugal 阿根廷、希腊与葡萄牙之间的比较 131, 132;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by 启动的转型 71; interim government and 临时政府与 72;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8—122, 128

Non-Party Bloc of Support of Reform 支持改革的无党派集团 289

nonterritorial autonomy 非领土自治 34

no-party president 无党派总统 281

Nordlinger, Eric 埃里克·诺德凌戈 60

Northern Ireland 北爱尔兰 27

North Korea 朝鲜 xv, 19, 49, 347

Norway 挪威 80

Nyers, Rezső 雷热涅尔什 300

O

O'Donnell, Guillermo 吉列尔莫·奥唐奈 xvi, 3, 5, 16, 74, 75, 165, 177, 196, 197, 203, 287, 397

Offe, Claus 克劳斯·奥菲 244, 459

officer corps 军官团。参见 hierarchical military, officer corps

official single party 一党制 91; Movimiento 国民运动党 93;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6, 117

Olcott, Martha Brill 玛莎·布里尔·奥尔科特 32

Olson, David 戴维·奥尔森 330

Olszewski, Jan 扬·奥尔绍夫斯基 282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一国两制" 18

Ortega, Daniel 丹尼尔·奥尔特加 211

Orthodox Christianity 东正教 245, 260

Osiatynski, Wiktor 维克多·奥夏滕斯基 265, 266

Ost, David 戴维·奥斯特 272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24, 50; millets in 宗教社区自治 34

P

pacts 协议。参见 transition pacts

Pahlavi, Reza (Shah of Iran) 礼萨·巴列维 (伊朗国王) xiii, 355, 357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26

Pan-hellenic Movement 斯拉夫民族统一运动 133—135

Panic, Milan 米兰·帕尼克 434

Papadopoulos, George 乔治·帕帕佐普洛斯 130

Papandreou, Andreas 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 134, 137

"paper" constitution "纸面上"的宪法。参见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s, "paper" constitution

"parallel culture" "并行文化" 43

parliamentarism 议会制 141, 142, 181—183; in Austria 奥地利的 278; in Brazil 巴西的 169, 171, 181—183;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2;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278; in Greece 希腊的 141;

-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78, 310, 311; in Iceland 冰岛的 278; in Spain 西班牙的 141, 142
- 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 基督教民主党 216
- 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 巴西民主行动党 183
-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劳工党 183
- Partido Nacionalista Vasco 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101, 105
- Partido Popular 人民党 104, 456
- Partido por la Democracia 社会民主党 216
- party-soldiers 党军。参见 Poland, party-soldiers
- party-state 党国 41, 66; legacy for usable state 可用的国家机器遗产 250, 251; in Poland 波兰的 255; repression of civil society 镇压公民社会 245
- Pashukanis, E. B., E. B. 帕舒卡尼斯 248
- Pastor, Robert A. 罗伯特·A. 帕斯特 114
- path-dependent analysis 路径依赖分析 254
- Peasant Party 农民党 266, 291
- People against Violence 人民反暴力党 331, 332
- Pérez-Díaz, Víctor M. 维克多·M. 佩雷兹-迪亚兹 88, 112
- performance criteria 绩效标准 47
- Perón, Juan 胡安·庇隆 196, 199, 200
- Peronism 庇隆主义 77, 196—200
- Peronist party 庇隆主义政党 196—200
- Peru 秘鲁 xv, 77, 170, 175
- Philippines 菲律宾 398; as sultanistic regime 作为苏丹制政权 42, 49; 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美国的政策 74
- Pinheiro de Azevedo 皮涅罗·阿泽维多 127
- Pinochet, Augusto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xvi, 80, 135, 185, 220; authoritarian constitution of 威权宪法 206—211; continued resources of 持续性资源 213, 217, 218; defeat in plebiscite 在公民投票中的失败 216; legality under 统治下的合法性 249;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 of 反思评估 147, 214, 215, 224, 225; unpopularity of 不受欢迎 215; warnings by 警告 212
- Pires do Rio Caldeira, Teresa 特雷萨·皮雷斯·都·里奥·卡尔德拉 176
- Pithart, Petr 彼得·皮特哈尔特 331, 332
- pluralism 多元主义 38;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政权的 43; in Brazil 巴西的 255, 256;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35—337;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18, 320, 326;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的 42—47;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51, 353; social pluralism 社会多元主义 48; in Spain 西班牙的 93; in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制政权的 50, 51;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权的 40—42; in USSR 苏联的 374, 379, 380
- Podkrepa 波德科雷 336
- Gianfranco Poggi 贾恩弗兰科·波齐 18
- Poland 波兰 xvi, 10, 25, 211, 232, 235, 238; anti-politics 反政治 272—275;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284—286;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对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态度 444; as authoritarian regime 作为威权主义政权 41, 232, 254—261, 337, 452;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 245, 246, 256, 257, 260, 261, 264;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文武关系 259;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7, 232, 237, 245—247, 256, 258, 261—264, 270—274; Communist Party of 共产党 243, 258, 261, 263, 264, 266, 267, 272, 274;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民主的巩固 255, 269—292;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in 制宪环境 280—282; delegitimation of government 政府合法性的丧失 287;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6; dual power situation 双重权力状态 263; economic performance 经济绩效 285, 291, 292; elections 选举 285, 291; electoral law 选举法 275, 287—291; “ethical civil society” “伦理性公民社会” 255, 270—272, 285; expulsion of German irredenta 驱逐德占失地的德裔 415; four-player game of transition 有关转型的四方博弈 265; geographical gain 地缘政治的收获 451; German-Soviet Pact 苏德条约 259;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of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的横向联系” 262; ideology 意识形态 255, 256, 258;

- indebtedness 无负债 295;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启动 244, 255; i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机构冲突 280—282;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国际影响 266, 267; internationalized authoritarian party-state 国际化的威权党国 255, 270; lack of personality cult 缺乏个人崇拜 258; leadership 领导层 255, 273—275, 287—291;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264; limits on totalitarianism 对全能主义的限制 255—261; martial law 戒严法 263; Military Council for National Salvation 民族救国军事委员会 263, 264; mobilization 动员 256; 1956 revolt 1956年起义 256, 260; nomenklatura system 权贵体制 262, 267, 268; oppositional hegemony 反对派 261, 262; as “pacted transition” “协议式转型” 255, 264—269; party fragmentation 政党分裂 280, 283, 287—291; party-soldiers 党军 255, 263, 267, 268;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249, 273—275, 287—291;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255, 269—276, 287—291; post-totalitarianism in 后全能主义 48; private property 私人产权 256; problems of representation 代表问题 269—275; public opinion survey research 民意调查研究 262, 283—286; “Rawlsian veil of ignorance”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266; referendum 全民公决 265; reform Communist Party 改革派共产党 291; rejection of collectivization 反对集体化 257; response to Gorbachev reforms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回应 245; “return to communism” “重返共产主义” 74, 291, 435, 454—456; role of military 军方的角色 263, 309; Round Table talks 圆桌会谈 265, 269, 274, 280, 282, 308; Sejm 色姆(波兰国会) 267—269, 273, 280—282; semipresidentialism 半总统制 255, 276—282, 286, 287, 395; similarity to Brazil 与巴西类似 232, 262, 265, 270; societal pluralism 社会多元主义 255, 256; Solidarity 团结工会 237, 247, 262—265, 267—269, 273—275; stabilization plan 稳定计划 269;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258; strikes 罢工 265
- Põldvere, Kaljo 凯里奥·波尔德维亚 420
- political economy of legitimacy and coercion 合法性与高压政治的政治经济学 66, 76—81;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50, 195—197, 203, 204; in Brazil 巴西的 166, 167, 172—174; in Chile 智利的 214; in Greece 希腊的 136;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28, 129; relative alternatives 相关选项 80; in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221—228; in Southern Cone 南锥体地区诸国的 150, 223, 225—230; in Spain 西班牙的 113—114; “system blame” and “体制抨击” 80, 81, 99, 139;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62—163
-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繁荣的政治经济学: in Brazil 巴西的 78; in Chile 智利的 78, 79, 220; in South Korean 韩国的 78; in Spain 西班牙的 78
- political identities 政治认同 35, 102, 366, 401; colonists 殖民主义者 417, 418; construction of, in Spain 西班牙的塑造 35, 103, 102—104; i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的 35; in democratic, multinational states 多民族民主国家的 410; dual identities 双重认同 33; in nation-states 民族国家的 417, 418; of Russians in the Baltics 波罗的海诸国俄罗斯族人的 410—414, 417, 418; transients 暂居者 417, 418; in USSR 苏联的 384, 385
- political isolation of terrorists 对恐怖主义者的政治孤立 106
- political leadership 政治领导层 8
- political learning 政治学习 117;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8; in Spain 西班牙的 76;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6
-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8, 71;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83, 192, 193, 196—200, 202; in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的 407—409; in Brazil 巴西的 167, 168, 170, 180—185, 188;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247, 339—341, 343; in Chile 智利的 207, 212, 216, 247, 248;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247, 316, 321, 331—333;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7—409; in Georgia 格鲁吉亚的 383; in Greece 希腊的 133—135, 137—138;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47, 248, 295, 300, 302, 305—311, 314;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407—

- 409; in legitimacy hierarchy 在合法性层级中的 438;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407—409; in multinational polities 多民族政体的 429—431; in Poland 波兰的 247, 273—275, 287—291;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8, 124;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47;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59—361, 367; in Russia 俄罗斯的 378; in Spain 西班牙的 96—98, 100, 106, 247; statewide parties 全国性政党 10;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0—152, 154, 160, 247, 248; in USSR 苏联的 378, 381, 384, 394, 399
-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8, 9, 14, 55, 69;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50, 191, 201; in Brazil 巴西的 167—171, 174, 178, 180, 187;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0, 343; in Chile 智利的 212; as distinct from civil society 与公民社会明确区别的 8—10; effect of “nationalizing policies” on “民族化政策”的影响 37; in Greece 希腊的 130;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302, 307, 310, 311, 314, 315, 375; in Poland 波兰的 255, 269—276, 287—289;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47;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62—365; in Spain 西班牙的 91—96;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152; in USSR 苏联的 377, 378, 381
-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反政治的政治” 272—274
- Portugal 葡萄牙 xvi, 25, 74, 144; absence of innovative leadership 创新型领导层的缺失 118;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125, 140—142; behavior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的行动 125; as civilian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 文官化的威权政权 117; Constituent Assembly elections 制宪会议选举 121;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2, 116; economic performance 经济绩效 128, 129; economic reform 经济改革 140; fascist-style structure 法西斯式结构 116; lack of “stateness” problem in “国家性”问题的缺失 126; Law on National Defense 国防法 124; length of transition 转型的历时 168; mobilization in 动员 127, 128; no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非民主宪制 123, 124; overthrow of Caetano 推翻卡埃塔诺 76; politicized military in 政治化军方 117; reserve domains in 保留领域 126; “revolution of the carnations” “康乃馨革命” 118; role of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作用 125, 127, 219; role of foreign policies in transition 转型过程中对外政策的作用 126; role of NATO 北约的作用 219; rule of law 法律的作用 249; as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半总统制 141, 278; similarities with Spain and Brazil 同巴西和西班牙的相似性 117, 118; similarity to Nicaragua 同尼加拉瓜的相似性 119, 121; simultaneous consolidation and transition completion 转型完成与转型巩固的共时性 124—129, 212; transition as revolution 革命转型 244
-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 232, 233; civil society in 公民社会 245—247;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相同与差异 236; difficult initiation of transitions 转型的艰难启动 238; diverse paths 不同的路径 253, 254; economic society in 经济社会 252—253;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国际影响 235—239; loosely coupled hypothesis in 松散相关假设 439—453; political society in 政治社会 247; rule of law in 法治 248—249; simultaneity problem 共时性问题 244, 437—441; stateness problems 国家性问题 254; transition as revolution 革命转型; usable state 可用的国家机器
-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 40, 41, 55, 232, 233, 244; collapse of 崩溃 50; consolidation tasks in 巩固任务 295; as continuum 连续性 294; cultural life 文化生命 319, 320; distinction between “early,” “mature,” and “frozen” “早期”、“成熟”与“僵滞”的区分 42, 233, 293, 294; early post-totalitarianism 早期 42, 233, 294, 295, 327, 333, 343, 375; as evolutionary type 演化类型 293; frozen post-totalitarianism 僵滞的 42, 46, 47, 64, 111, 232, 254, 294, 295; ideology in 意识形态 41, 46—47, 293; informer legacy in 告密传统 251; leadership in 领导层 46, 47, 295; legacy for usable state 可用的

- 国家机器遗产 250, 251;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成熟的 42, 55, 64, 70, 232, 294, 295, 327; military in 军方 65, 68; mobilization in 动员 47, 48, 293; pluralism in 多元主义 42—46; political society in 政治社会 247; “post-totalitarianism by choice” “选择式后全能主义” 293—298, 377; “post-totalitarianism by decay” “衰退式后全能主义” 293, 294, 319; “post-totalitarianism by societal conquest” “社会征服式后全能主义” 293, 321; role of terror 恐怖统治的作用 293;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27
- Powell, Charles T. 查尔斯·T. 鲍威尔 89
- Pozsgay, Imre 伊姆雷·波茨盖依 300, 304, 305—308, 310
- Pravda, Alex 亚历克斯·普拉维达 242, 267
- presidentialism 总统制 141, 142, 181—183;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3, 220, 396; in Brazil 巴西的 169—171, 180—184, 220, 396; in Chile 智利的 216, 217, 220; in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220; in Uruguay 乌拉圭的 216, 220
- Preston, Paul 保罗·普雷斯顿 109
- Pridham, Geoffrey 杰弗里·普利汉姆 73
- primordial identities 原生性认同 35, 366。
参见 political identities
- prior regime type 先前政体类型 38, 66, 452; in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先前的 402—406;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02—406; impact on transition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对后共产主义欧洲转型的影响 244—254; negative evaluation of 消极评价 143—147; in Portugal 葡萄牙先前的 116; in Spain 西班牙先前的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48;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85; in Brazil 巴西的 185; in Chile 智利的 185; in Czech Republic 捷克的 436; legitimacy and 合法性与 438, 439; need for strong state 强国家的必要性 435, 436;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436;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436; in Russia 俄罗斯的 185, 436—438; in Ukraine 乌克兰的 436; in USSR 苏联的 392, 395
- Prodev S., S. 普罗德夫 338
-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比例代表制 33; closed-list 封闭式名单 184; d'Hondt formula, d'Hondt 席位分配方案 289; in Brazil 巴西的 183—185;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2; open-list 开放式名单 184; in Poland 波兰的 289—291
- provisional government 临时政府 5, 70—71, 111;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92; constitutions created by 创制宪法 84;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73, 316; elections under 治下的选举 71, 120; in Greece 希腊的 71;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16, 121—125, 132; plebiscites and referenda in 治下的公民投票和全民公决 72;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61; after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权之后的 70, 71
- Przeworski, Adam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 4, 62, 81, 82, 146, 156, 181, 266, 269, 270, 379, 394
-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416, 417
- purges, in Portuguese revolution 葡萄牙革命中的清洗 118
- Pye, Lucien W. 卢西恩·W. 派伊 39

R

- Radical party 激进党 196, 198, 199, 201
- Rady, Martyn 马廷·莱蒂 348
- Rakhmonov, Imamali 埃莫马利·拉赫莫诺夫 449
- Rákosi, Mátyás 麦特雅斯·拉科西 297, 298
- Rawls, John 约翰·罗尔斯 266
- Raz, Joseph 约瑟夫·雷兹 34
- “real existing socialism”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147, 246, 261
- recombined public-private property 重构公私产权形式 70
- “red bourgeoisie” “红色资本家” 43
- reforma pactada-ruptura pactada 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 60, 111, 117, 233
- regime popularity, as distinct from incumbents' popularity 明显区别于在任者受欢迎度的政权受欢迎度 445
- regional hegemon as factor in transition 作为转型因素的地区霸权 74
- regulatory state power 规制性国家权力

- 437。参见 also economic society,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 Reinicke, Wolfgang 沃尔福冈·赖尼克 39
- religion 宗教: caesaropapism 国家高于教会 245, 260, 453; Confucianism 儒教 453; democratization and 民主化与 451, 453; Islam 伊斯兰 453; national church 全国性教会 245, 260, 453; Orthodox Christianity 东正教 245, 260, 351, 376, 453;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宗教 245—246; Protestantism 新教 245, 253; secularization 世俗化 246。参见 also Roman Catholic Church
- Renovación Nacional 基督教民主党 216
- Republic Supreme Council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406
- “reserve domains” “保留领域”。参见 consolidated democracy, “reserve domains”
- “return of Communism” “共产主义的回归” 291, 435, 454, 455;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435, 454, 455; in Poland 波兰的 291, 435, 454—456; in Russia 俄罗斯的 455
- Rial, Juan 胡安·赖尔 164
- Rigby, T. H., T. H. 瑞贝 249
- Rodrigo Rodríguez, Fernando 费尔南多·罗德里格·罗德里格斯 98, 111, 114
- Rodríguez Sahagun, Agustín 阿古斯丁·罗德里格斯·萨哈冈 89
- Rokossovsky, Konstantin 康斯坦丁·鲁克索夫斯基 259
-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会 245, 260, 261, 453; in Belorussia 白俄罗斯的 246; in Brazil 巴西的 453;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246; in Chile 智利的 453;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17; in Czech Republic 捷克的 246;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46;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245; in Poland 波兰的 245, 246, 256, 257, 260, 261, 264;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政治多元主义与 260, 261;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246; in Slovakia 斯洛伐克的 246, 328; in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的 246; in Spain 西班牙的 94; transnational base of 跨国基础 262, 455
- Romania 罗马尼亚 xvi, 25, 66, 109, 111, 237; anti-Soviet nationalism 反苏维埃民族主义 347, 348; as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对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态度 442; autonomy of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会的自主性 351; “brown-red-sultanistic” coalition “褐—红—苏丹”联合 364; captured revolution 被俘获的革命 345—347, 362;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246;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346, 351—353, 360, 364, 365; coalition government, 联合政府 362; “collective leadership” “集体领导” 347—349;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345, 349, 351, 355; conspiracy theory 共谋理论 345; contrast with Poland, Hungary and Lithuania 同波兰、匈牙利和立陶宛的比较 365; creation of “anti-Soviet Stalinism” “反苏维埃的斯大林体制”的建立 348; Democratic Convention 民主大会 363;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6; democratic opposition 民主反对派 344, 346, 358, 360, 363; diffusion effects 扩散效应 357; disinformation 虚假情报 346; dispute over “facts” of transition 关于转型“事实”的争论 344—346; dynastic tendencies 家天下倾向 349; economic society 经济社会 364; elections 选举 344, 359, 360, 363; encoded language of dissent 暗含不同政见 353, 354; gypsies in 吉普赛人 364;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侵犯人权 344, 364; Hungarian minority in 匈牙利少数族裔 363, 364; ideology 意识形态 354, 355; interim government 过渡政府 361; lack of consolidation 巩固的缺乏 364; lack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s 圆桌讨论的缺乏 344, 361; lack of “second culture” “第二文化”的缺乏 351; leadership 领导层 349, 350;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347; miners’ strike 矿工罢工 351; mobilization 动员 355, 356; “movements of rage” “激进运动” 362;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362—365;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民族救国阵线 345, 359—362; neo-Communists 新共产主义者 345, 346, 358, 362; nomenklatura 党国权贵 347; onset of post-totalitarianism 后全能主义的开端 348, 349; personalism 个人主义 347, 349—351, 358, 359; pluralism 多元主义 351, 353;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359—361,

- 365;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362 — 365;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436; regime reconstitution 政权重建 254, 358 — 362; repression of independent groups 镇压独立性团体 352; response to Gorbachev reform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回应 242, 243; role of military 军方的作用 309; role of Securitate 秘密警察的作用 346; Romanian exceptionalism 罗马尼亚的例外性 344, 346; rule of law 法治 359, 361, 363, 364; samizdat literature 地下出版物 353; “socialism in one family” “社会主义在一家” 347;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3 — 365; sultanistic regime 苏丹制政权 42, 49, 233, 347, 358 — 360, 362 — 365; trade unions 工会 351; unavailability of Spanish model 西班牙模式的不可行 233, 356; uprising in Timisoara 蒂米什瓦拉起义 344, 358, 362; use of television 电视的应用 345, 357; violence of regime termination 政权终结中的暴力 344, 357
- Romanov Empire 罗曼诺夫帝国 24
- Rose, Richard 理查德·罗斯 xix, 246, 444
- Rothschild, Joseph 约瑟夫·罗特席尔德 237, 257
- round table pact 圆桌会议声明 232, 244; absence of,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缺乏 344, 361;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295, 340, 342;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433;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95, 307, 310, 311, 338; in Poland 波兰的 265, 269, 274, 280, 282, 308
- Ruch Alternatywny Akcja Demokratyczna (ROAD) 公民运动民主促进会 273
- Rukh 重建乌克兰人民阵线(或称鲁赫) 379
- rule of law 法治 10, 14, 55; in Argentina 阿根廷的 150, 203 — 205, 227; in Brazil 巴西的 167, 168, 174, 178 — 180, 187, 189; in Chile 智利的 251; in creation of economic society 经济社会建立中的 437; effect of “nationalizing policies” on “民族化政策”对法治的影响 37;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299, 312; in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成熟后全能主义的 249;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249;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48, 249;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59, 361, 363, 364; socialist legality 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249; in Spanish transition 西班牙转型中的 113, 251;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权的 248; in USSR 苏联的 390
- Russev, S., S. 拉索夫 338
- Russia 俄罗斯: attitudes towar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对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态度 445 — 453; Chechen secession struggle 车臣分离主义斗争 366, 428;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 367; 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 主权要求 384, 389; delegitimation of government 政府的非法化 368; economic performance 经济绩效 385, 450; economic society in 经济社会 13, 368; former Communists in 前共产党员 387; Gorbachev's referendum on USSR 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的全民公决 386; as homeland state actor 祖国的行动者 402, 432; irredenta in Baltic countries 波罗的海诸国的失地 424; legacy of state disintegration 国家瓦解的遗产 233; Orthodoxy 东正教 412;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378;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185, 436 — 438;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253; republic-level elections 全国性选举 384; “return of Communism” in “共产主义的回归” 455; Russian identity in USSR 苏联内部俄罗斯人的认同 411, 412; Russians in the former Republics 前加盟共和国共和国的俄罗斯人 32; simultaneity problem 共时性问题 435;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7; treaty with Baltics 同波罗的海诸国的条约 409; unavailability of nondemocratic solutions 非民主方案的不可行性 437; weakness of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的虚弱状态 412
- Rüütel, Arnokd 阿诺尔德·吕特尔 408
- ## S
- Sajudis 立陶宛改革运动组织 383, 405
- Salazar, Antonio 安东尼奥·萨拉查 116, 117, 128, 135, 144; legality of Salazar regime 萨拉查政权的合法性 249
- samizdat literature 地下出版物 43, 66,

- 390;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01, 353
- Sanguinetti, Jorge 豪尔赫·桑吉内 154, 157—159, 172, 220
- Sarney, José 若泽·萨尔内 168, 169, 220
- Sartori, Giovanni 乔万尼·萨托利 39
- Savisaar, Edgar 埃德加·萨维萨尔 433
- Scheppele, Kim Lane 金·莱恩·斯凯贝 尔 34
- Schmitter, Philippe C. 菲利普·C. 施米特 3, 16, 40, 72, 73, 117, 118, 125, 221
- Schumpeter, Joseph A. 约瑟夫·A. 熊彼特 250
- “second culture” “第二文化” 43
- Seleny, Anna 安娜·塞莱妮 299, 301
- self-determination 自决 23
- “semiloyalty” “半忠诚” 156
- semipresidentialism 半总统制 141, 142, 276—279; in Bulgaria 保加利亚的 342; in Finland 芬兰的 278; in France 法国的 278, 279; in Poland 波兰的 255, 276—282, 286, 287, 395;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41, 278; in Ukraine 乌克兰的 399; in USSR 苏联的 395—400
- Semler, Dwight 德怀特·泽姆勒 397
- Sencovici, Gheorghe 吉尔菲·辛科维奇 355
- Serbia 塞尔维亚 25, 385, 434
- Serra, José 何塞·塞拉 188
- Serra, Narcis 纳西斯·塞拉 90, 110
- Shabad, Goldie 戈尔迪·沙拜德 105
- Shafir, Michael 米歇尔·夏弗 364
- Shain, Yossi 尤西·什恩 xiii, 5, 49, 71
- Share, Donald 唐纳德·赛俄 117
- Shevardnadze, Eduard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240
- Shevtsova, Lilia 丽莉娅·谢夫索娃 397
- Shugart, Matthew 马修·舒加特 398
- Simon, János 亚诺什·西蒙 283, 296, 309, 315
- Simon, Walter B. 沃尔特·B. 西蒙 21
- simultaneit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经济与政治转型的共时性 244, 386, 435—453; electoral sequence and election order 选举次序与 436; loosely coupled hypothesis 松散相关假设 439—453; in Russia 俄罗斯的 435; in Spain 西班牙的 249; tightly coupled hypothesis 紧密相关假设 439—453; in USSR 苏联的 244, 436
- simultaneity of transition completion and consolidation 转型完成与巩固的共时性 124—129; in Chile 在智利 210, 212; in Portugal 在葡萄牙 124—129, 212
- Sinatra Doctrine 辛纳屈主义 302, 303
- Skach, Cindy 辛迪·斯盖茨 181
- Skilling, H. Gordon 戈登·H. 斯基林 41, 237, 330
- Slagstad, Rune 朗内·斯莱格斯塔德 10, 84
- Slovakia 斯洛伐克 25;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对政治经济体制的态度 442;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堂 246, 328; chances of consolidation 巩固的机会 333; economic performance 经济绩效 450; as Nazi puppet state 作为纳粹傀儡国家 328;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迅速的工业化 328; Velvet Divorce in 柔性分离 328—333
-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xvii; absence of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的缺失 450;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堂 246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2
- Smith, Diana 戴安娜·史密斯 129
- Smulovitz, Catalina 卡特琳娜·斯姆洛维茨 193, 194
- Snyder, Richard 理查德·斯奈德 64
- Soares, Mário 马里奥·苏亚雷斯 127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Hungary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302
- Social Democrats, of Estonia 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 425
- Socialists, in Chile 智利社会党 216
-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德国统一社会党 249
-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 社会福利支出 139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社会经济发展 77
- Solidaridad Española 西班牙共产党 98
- Somalia, absence of state in 索马里国家的缺乏 18
- Somoza Debayle, Anastasio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巴伊莱 xiii, 54, 347, 357
- Sotelo, Calvo 卡尔沃·索特洛 141
-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attitudes toward

- democracy in 对政治的态度 221—230;
debt crisis in 债务危机 219, 220;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民主的巩固
220; hierarchical military in 高级军官
219; political economy of legitimacy in 合
法性的政治经济学 223—230;
presidentialism in 总统制 220
- Southern Europe 南欧: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的态度 142, 143;
evaluation of prior regime 对先前政权的
评价 143—147;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国际影响 140, 141; parliamentarism in
议会制 141, 142; sequence of reforms in
改革的序列 139; “state-shrinking” in
“国家收缩” 139
- Southern Ossetian Autonomous Oblast 南奥
塞梯自治州 384
- South Korea 韩国 xv, 19, 145; availability of
“Spanish model” “西班牙模式”的可行性
117;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in 繁
荣的政治经济学 78
- Soviet bloc, democratization in 苏维埃集团
的民主化 75, 235—239
- Soviet Federalism 苏维埃主义 367, 369,
370; career incentives for republican elites
共和国精英的事业激励 372; citizen's
identity 公民认同 371; federal unit's
identity 联邦单位的认同 371;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on under 国际代
表问题 372; mode of adhesion to
federation 并入联邦类型 371; secession
分离 371
- Soviet-style federal constitutions 苏维埃式
联邦宪法 106;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
洛伐克的 316, 329—333, 367, 391;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苏维埃式联邦宪
法 367
- “Soviet-type” regimes “苏维埃型”政权 41
- Soviet Union 苏维埃联盟。参见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Spain 西班牙 xvi, 25, 144, 145; attempted
military coup 军事政变企图 89;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109,
142—144; as authoritarian regime 作为威
权主义政权 110—112; behavior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政治采取的行动 109;
belief in democracy 民主政治信仰 81;
Catholic Church in 天主教会 92;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 28, 29, 32;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91, 92, 96—
98;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
环境 83, 96, 102, 114, 115; democratiza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民主化 76; desencanto 幻想破灭 89, 90;
devolution of power 权力转移 100;
economic factors in consolidation 民主巩
固中的经济因素 112—114; economic
reform 经济改革 140; elections 选举
100; electoral sequence 选举次序 366,
382; evidence of political learning 政治学
习的迹象 78; Francoite institutions 佛朗
哥设立的制度 91; inclusionary choices
包容性选择 97; Law for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法 91, 92, 94—96, 100, 331;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转型过程中的领
导层 92—96; legality of transition 转型
的合法性 91, 92; lessons of civil war 国
内战争的教训 89; linguistic policy i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的语言政策 30;
Moncloa Pact 蒙科洛协议 90, 170;
Movimiento Nacional 国民运动党 252;
nonpoliticization of state apparatus 国家机
器的非政治化 252; pact transition in
协议式转型 62, 66, 87; parliamentarism
议会制 141, 142;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sperity in 繁荣的政治经济学 80;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政治认同 35;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106, 247; priority of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的优先性 95;
“regime-initiated transition” “政权启动的
转型” 89, 453; role of Cortes 国会的作用
90—95; role of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
作用 113, 219; role of foreign policies in
transition 转型过程中对外政策的作用
113, 127; role of NATO 北约的作用
219; rule of law 法治 249; simultaneity
problem 共时性问题 435; stateness
problems 国家性问题 98—107, 367,
391; statewide parties in 全国性政党
106; Statutes of Autonomy 自治法令
101, 106; terrorism of ETA 埃塔恐怖主
义 103—108, 431
- St. Jean, General Iberico 伊韦里科·圣·
让将军 190
- stabilization 稳定化 394; in Argentina 阿
根廷的 92, 193; in Brazil 巴西的 92,

- 167, 170, 180, 198; in Poland 波兰的 269; in USSR 苏联的 394, 397
-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 41, 44, 51, 54, 376; high Stalinism 高度的 248
- Staniszki, Jadwiga 加德维格·斯坦尼斯基 263, 273, 281
- Staravoitova, Galina 加利纳·斯塔拉沃托瓦 369
- Stark, David 达维德·施塔克 72, 306, 308, 314
- Stasi (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 46
- state 国家: legitimacy of 合法性 26; military as part of 作为组成部分的军方 67, 69; as necessary for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的必要性 28; restructuring of 重建 435—439; rightfulness of state unit 组成部分的正当性 26; scope versus capacity 规模与能力 436; state-building 国家建设 17, 20; Tilly's definition of 蒂利的定义 17; Weberian definition of 韦伯的定义 17
- state-based nation-building 基于国家的民族建设 21, 30—31; assimilation and 同化与 32; feasibility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现代背景下的可行性 31; in France 法国的 30; linguistic obstacles to 民语言障碍 30; multiple identities as obstacle to 多重认同障碍 32
- state-building 国家建设: in the Baltics 波罗的海诸国的 428—433;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23, 32, 233;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23, 32, 233;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 23
- state bureaucracy 国家官僚机构 11, 14; effect of "nationalizing policies" on "民族化政策"的影响 37
- state-nation 国家—民族 34
-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7, 16, 26—33; absence of, in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的缺失 450;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政权的 27; in Brazil 巴西的 166;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28—333, 366, 452; in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366; in 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366; in Greek transition 希腊转型中的 136;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310, 314—316; impact on democratization 对民主化的影响 450; in Latvia 拉脱维亚的 366; in Macedonia 马其顿的 450; in Poland 波兰的 258; in Portugal 葡萄牙的 126;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54;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的 27;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363—365; in Russia 俄罗斯的 367; in Southern Europe 南欧的 140; in Spain 西班牙的 98—107, 367, 391; in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体的 27;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权的 27; in USSR 苏联的 366—370, 449;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的 366, 367
- "state-shrinking" "国家收缩" 139; in Brazil 巴西的 175, 185—187; in Peru 秘鲁的 175;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436; in Southern Europe 南欧的国家收缩 139
- Stepán, Miroslav 米洛斯拉夫·斯蒂潘 326
- Suárez, Adolfo 阿道弗·苏亚雷斯 78, 79, 90, 93—96, 141, 331, 391, 392; decision about Communist Party 关于共产党的决议 96—98
- Suchocka, Hanna 汉娜·苏霍科卡 282, 298
- sultanistic regimes 苏丹式政体 40; collapse of 崩溃 70; definition of 定义 51—56; dynastic succession 王朝更替 52, 56; elites in 精英 66, 70; fus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公共与私人的融合 51—52; ideology in 意识形态 50, 51, 54; leadership in 领导层 50, 51, 54, 70, 71; likelihood of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n 临时政府的可能性 70, 71; military in 军方 65, 66; mobilization in 动员 50, 51; pact transition in 协议式转型 64; reconstitution by nondemocratic elites 非民主精英的重组 254; in Romania 罗马尼亚的 42, 51, 233, 347, 358—360, 362—365; stateness problem in 国家性问题 27; transition paths 转型路径 59
- Sunny, Ronald Grigor 罗纳德·格利戈·桑尼 369, 370, 387
- Sweden 瑞典 25
- Switzerland, as a "state-nation" 作为"国家—民族"的瑞典 34
- "system blame" "体制抨击"。参见 political economy of legitimacy and coercion,

system blame

T

Taagepera, Rein 雷恩·塔克佩拉 402, 404, 406
 Taiwan 台湾 xv, 18, 19, 20, 145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CIS and 独联体与 392; constrained political liberties in 受限制的政治自由 447, 449; regime reconstitution in 政权重组 387
 Tanbuev, G., G. 坦波夫 338
 Tarancón, Cardinal 卡迪纳尔·塔兰孔 92
 Tarradellas, Josep 约瑟夫·塔拉德利亚斯 93
 Teitelboim, Volodia 博洛迪亚·泰特尔伯恩 215
 Tejero Molina, Antonio 安东尼奥·泰帖罗·莫利纳 98, 108
 territorial boundaries 领土边界 16, 29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212
 “third wave” “第三波” 4, 77, 87
 tightly coupled hypothesis 紧密相关假设 439—453
 Tilly, Charles 查尔斯·蒂利 17, 18
 timing 时机选择 37, 98; in Chile 智利的 216; in USSR 苏联的 392
 Tironi, Eugenio 欧亨尼奥·迪罗尼 207
 Tismaneanu,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提斯玛尼尔诺 351
 “titular nationality” “名义上的国籍” 23, 32, 254
 Torre, Juan Carlos 胡安·卡洛斯·托雷 201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权 38, 40, 55, 57, 244; as civilian-led regimes 作为文官领导的政权 68—70; contrast with authoritarianism 与威权体制相比较 294, 327; ideology in 意识形态 40; impact on economic society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252; informer legacy in 告密传统 251;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in “制度多元主义” 41, 43; leadership in 领导层 46, 47; legacies of 遗产 55, 69, 409; legacy for usable state 可用的国家机器遗产 250, 251; military in 军方 67, 68; mobilization in 动员 40, 47, 48; paths out

of 走出的路径 293; spontaneous actions in 自发行动 111; stateness problem in 国家性问题 27; transition pacts in 转型协定 64

Träger 领导者 22

transients 暂居者。参见 political identities, transients

transition pacts 转型协议 56, 65; absence of, in Argentina 在阿根廷的缺失 193; in Brazil 巴西的 66; in civilian-led regimes 文官领导型政权的 70;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达成与维护 62; four-player game 四方博弈 63, 65, 265; “hard-liners” in “强硬派” 62, 109, 131, 296; Moncloa Pact as 蒙科洛协议 90, 168; in Poland 波兰的 255, 264—269; round table discussions and 圆桌会谈与 232, 244; in Spain 西班牙的 62, 65, 87;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全能主义政体的 65; two-player game 两方博弈 64

transition paths 转型路径 38, 40, 55;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威权主义政权的 53, 59, 60; availability in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后全能主义政权的 295; availability in sultanistic regimes 在苏丹式政权中的可行性 53, 57; plebiscitary “national liberation” as 全民投票型“国家自由化” 387;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53; in regime controlled transitions 政权控制的转型 295, 335, 336, 339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民主转型: in civilian-led regimes 文官领导型政权的 68—70; constraints on Chilean transition 智利转型的限制因素 206—212, 223; crafting of Spanish transition 西班牙转型的创制 62, 66, 89, 91—96; definition of 定义 3, 207; difficult initiation in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国家的艰难启动 238; external factors in 外部因素 72, 73; as four-player game 作为四方博弈的 63; “hard-liners” and “moderates” “强硬派”与“温和派” 60; with a hierarchical military 始于高层军官 150; inclusionary choices 包容性选择 97; initiation by nonhierarchical military 由中下层军官启动的 118—120, 126; initiation by regime in Spain 西班牙政权启动的 88; initiation

- of 启动 71—72, 242, 253; length of 历时 168; pacts 协议 56, 61, 64; popular pressure and 大众压力 111; presidentialism and 总统制与 220; problem of citizenship in 公民资格问题 28; rol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经济绩效的作用 77—81; role of interim governments 临时政府的角色 71, 72; role of military in 军方的角色 66, 67; “transition by transaction” “由交易引发的转型” 117; as two-player game 作为两方博弈的转型 64
- Trasnea, Ovidiu 奥维迪乌·特勒斯内亚 348, 354, 355
- Trujillo, Rafael 拉斐尔·特鲁希略 49, 51
- Truman, David 戴维·杜鲁门 41
- Tupamaros 图帕马罗人 155
- Turkey 土耳其 50; invasion of Cyprus 入侵塞浦路斯 131
-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401; CIS and 独联体与 390; constrained political liberties in 受限的政治自由 447; non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非民主政府 434, 449; regime reconstitution in 政权重建 387
- two-player game 两方博弈。参见 transition pacts, two-player game
- Tyminski, Stan 斯坦·蒂敏斯基 274, 280
- typologies, analytical usefulness 类型学, 分析用途 39
- Tzvetkov, Plamen 普拉门·泰泽科夫 339
- ### U
- Ukraine 乌克兰 369; attitudes towar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态度 445—453; CIS and 独联体与 390; cultural demarcation of 文化区分 32;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经济绩效 385, 450; economic society in 经济社会 13; former Communists in 前共产党员 387; language policy in 语言政策 383;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436; republic-level election in 全国性选举 383; semipresidentialism 半总统制 399; sovereignty from USSR 苏联授予的主权 379
- 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 民主力量联盟 247
-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xvi, xvii, 25, 232, 233; absence of democratic past 民主历史的缺乏 375; bureaucratic politics in 苏联的官僚政治 41; centralized party-state 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 369, 370, 373, 374, 376, 378, 379;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 28, 29;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376, 377;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239—243, 370, 380—382, 384, 386;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人民代表大会 379, 381, 382, 392—394;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4, 379, 394, 396, 397; contrast with Hungary 同匈牙利的对比 375; democratization in 民主化 378; detotalitarianization-by-decay 衰退式去全能主义化 375; dissidents in 异议分子 376; doctrine of limited sovereignty 有限主权理论 236;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 385; elections 选举 373, 374, 378, 379, 381—386; electoral sequence 选举次序 366, 367, 374, 379, 382—385; ethnofederalism 民族联邦制 76, 376, 377, 386; executive-legislative conflict 行政—立法冲突 391, 394—400; federalism 联邦制 367, 369—372, 376, 391; fictive constitution of 虚设宪法 374; flattened landscape 扁平的图景 377; glasnost 公开性 239, 242, 367, 369, 373, 378; ideology 意识形态 77, 236, 375, 376; importance of prior regime type 先前政权类型的重要性 374; independence of Baltics from 波罗的海诸国从苏联独立 406—410; “inner” and “outer” empires “内部”与“外部”帝国 236; intervention in Baltic countries 干涉波罗的海诸国 402—406; KGB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370, 386; leadership 领导层 375; legitimacy of central government 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384;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367, 374, 376, 378, 387; military expenditures 军事支出 239—241; misperception of nationalism 对民族主义的错误理解 368, 369; mobilization 动员 375; 1991 coup attempt 1991年政变企图 243, 369, 384, 386, 387, 409;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会 376; “parade of sovereignties” “主权问题的公

- 开化” 385; perestroika 新思维 239, 241, 242, 267 — 270, 373, 378, 380; pluralism 多元主义 374, 379, 380; political identities 政治认同 384, 385;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378, 381, 384, 394, 399;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377, 378, 381;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种族差异政治化 367, 370, 373; post-totalitarianism in 后全能主义 48, 375; privileging of collective rights 集体权利优先 387 — 390; privileging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经济改革优先 367, 385, 387, 390 — 397; privileging of independence 独立优先 377, 387, 389; referendum 全民公决 385; regime-initiated change 政权启动的变革 372 — 379; as regional hegemon 作为地区霸权 234 — 342; relation between titular and non-titular nationalities 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关系 389, 390; republics as proto-states 作为初级国家的共和国 369, 376; response to military draft 对军方方案的回应 384; rule of law 法治 390; Russian nationals in party-state 党国体制下的俄罗斯国民 370; semipresidentialism 半总统制 397 — 400; simultaneity problem 共时性问题 244, 436;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378; Soviet mentality 苏维埃精神 376; stabilization 稳定化 392, 395; state disintegration 国家分裂 11, 233, 368, 373, 382, 384, 386 — 401, 450;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6 — 370, 449; “titular nationalities” “主体民族” 377, 382, 389 — 390, 401; transition as plebiscitary “national liberation” 全民公决“民族自由化”的转型 387; Union Treaty 联盟条约 386, 389; usable state 可用的国家机器 390; weight of totalitarian legacy 全能主义传统的重要性 375, 376
- United Council of Work Collectives 工会联合委员会 408
-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英国) 18, 19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21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le 对智利的政策 73; policy toward migrants 移民政策 416, 417; policy toward transitions 转型政策 74; as “state-nation” 作为“国家—民族” 34
- unrestrained personal rulership 不受限制的个人统治权力 54
- Urban, Jan 扬·乌尔班 321, 331, 332
- Urban, László 拉斯洛·乌尔班 309
- Uruguay 乌拉圭 xvi, 25, 68, 150, 205;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对民主的态度 160, 161, 221 — 230; availability of “Spanish model” “西班牙模式”的可行性 117;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文武关系 159, 160, 164;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152; as consolidated democracy 作为巩固的民主 159 — 161;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5, 152, 220; contrast to Spain 同西班牙的比较 163, 164; crisis of efficacy 效力危机 162 — 164; debt crisis 债务危机 166, 219;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project of military 军方的防御与进攻计划 153; deviations within military government 同军政府的分歧 152, 153; double simultaneous vote 同步双投 163; elections in 选举 152, 154, 155; hierarchical military government 高层军方政府 151; high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的高度党派认同 152; military prerogatives in 军方特权 158; military trials 军事审判 154, 155, 159, 213, 252; Naval Club Pact 海军俱乐部协议 154, 157, 159;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152, 153, 162, 247, 248;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 152; presidentialism 总统制 216, 220; quality of democracy 民主的质量 161 — 165; referendum on amnesty 全民公决特赦 155, 158 — 160, 225; repression in 镇压 152, 190; similarity with Greece 同希腊的相似性 154; two-party system 两党制 163, 165
- usable democratic legacy 可用的民主传统 452
- usable state bureaucracy 可用的国家官僚机构 11, 56; in Brazil 巴西的 174 — 178, 185, 186; in Hungary 匈牙利的 313;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后共产主义欧洲的 250 — 252; in USSR 苏联的 390
-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CIS and 独联体与 391; constrained political liberties in 受限政治自由 447, 449; non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非民主政府 434; regime reconstitution 政权重构 387

V

- Vaclavík, General 瓦克拉维克将军 326
 Valenzuela, J. Samuel, J. 塞缪尔·瓦伦祖拉 5
 van de Walle, Nicholas 尼古拉斯·范德沃勒 64
 Varady, Tibor 提波·范拉迪 434
 Vargas, Getúlio 热图利奥·巴尔加斯 195; construction of Estado Novo 新政建设 75
 Vásquez, Tabaré 塔瓦雷·巴斯克斯 157—159
 Vatican II 梵蒂冈二世 77
 “veil of ignorance” “无知之幕” 266
 Velasco, Eugenio 欧亨尼奥·贝拉斯科 209
 Velik, Raivo 拉依沃·威利克 419, 420
 “velvet divorces” “柔性分离” 31, 244; in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的 328—333
 Verbitsky, Horacio 奥拉西奥·贝韦茨基 201
 Verdery, Katherine 凯瑟琳·维德里 346, 355
 Veremis, Thanos 赛诺斯·范雷米斯 131, 132
 Videnov, Zhan 詹·威德诺夫 341
 violence 暴力: in Basque Country 巴斯克地区的 103—108; in Brazil 巴西的 175—177; legacy for democracy of 民主传统 108; in struggle for democracy 争取民主中的 107
 Vitorino, António 安东尼奥·维托里诺 126
 “vote/seat disproportionality” “票数/席位比例失调” 289, 456

W

- Walesa, Lech 列赫·瓦文萨 262, 265, 280—282, 287—289; as charismatic leader 作为克里斯玛型领袖 255, 273; as nonparty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作为无党派总统候选人 274, 275; proposal of “little constitution” “小宪法”提案 281; reaction to 1995 defeat 对1995年失利的反应 456; refusal to join party 拒绝入党 247

-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 xvi, xvii, 235, 236, 238, 244, 359; Prague Spring and 布拉格之春与 318
 Weber, Eugene 尤金·韦伯 30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xiii; on attributes of the state 关于国家的属性 17; on bureaucracy 关于官僚制 179; on caesaropapism 关于国家高于教会 453; concept of nation 民族概念 21; on legitimacy of use of force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323; on sultanism 关于苏丹制 49, 50, 251, 347, 357
 Weffort,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威夫特 77, 168
 Weigel, George 乔治·魏格尔 75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89
 Weinreich, Peter 彼得·瓦恩里希 420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21
 Whitehead, Laurence 洛朗斯·怀特黑德 16, 74, 75, 140, 235
 Wiatr, Jerzy 泽西·维亚特 454
 Wiberg, Hakan 哈坎·韦伯格 30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23
 Wojtyła, Karol (Pope John Paul II) 卡罗尔·沃伊蒂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261, 265
 worker self-management 工人自我管理。参见 Yugoslavia, worker self-management
 working class migrants 工人阶级移民 412, 413
 World War I, peace treaties 一战和平协定 23
 Wyszyński, Cardinal Stefan 枢机主教斯蒂芬·维辛斯基 256

Y

- Yakovlev, Aleksandr 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 240, 368, 373, 376, 407
 Yetsin, Boris 鲍里斯·叶利钦 376, 396; ambivalence toward political parties 对政党的矛盾心态 247, 399; Baltic countries and 波罗的海诸国与叶利钦 409, 425; conflict with legislature 同立法机关的冲突 391, 394—397; election as Russian President 俄罗斯总统选举 384, 386; election Supreme Soviet 最高苏维埃选举 382; inattention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对宪制变革的漠视 438; neglect of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对政治重构的忽视 394; privileging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经济重构优先 391 — 397; on “sovereignty” 关于“主权” 389; struggle with Gorbachev 同戈尔巴乔夫的斗争 389

Young Democrats 青年民主党 311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xvii; constitution-making environment 制宪环境 82; Croatin-Serbian civil wars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内战 88; deferred gratification in 延迟满足 450; democratization in interwar period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民主化 74; electoral sequence 选举次序 381, 382; ethnic cleansing 种族清洗 366; irredenta in 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失地 450; non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非民主政府 434; resurgence of ethnic nationalist dictatorships in 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专制的复苏 76; role of military 军方

的角色 309; Soviet-type federalism 苏维埃式联邦主义 367; state-building in 国家建设 23; state-disintegration 国家瓦解 384; stateness problem 国家性问题 366, 367; worker self-management 工人自我管理 77, 238

Z

Zaldivar, Andrés 安德烈斯·萨尔迪瓦 216

Zaslavsky, Victor 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 388, 389

zeitgeist, 时代精神。参见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zeitgeist

Zhelev, Zhelyu 西琉·哲列夫 342

Zhirinovskiy,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32

Zhivkov, Todor 托多尔·日夫科夫 295, 336, 339, 340

Zimmerman, Ekkart 艾卡特·齐默曼 80

译后记

本书作者胡安·J. 林茨(Juan José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是当代比较政治学领域极负盛名、极有影响的两位学者。

林茨教授 1926 年出生,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海德堡大学等,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斯特林荣誉教授,他在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诸多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林茨教授的近作有《政党:旧概念与新挑战》(2002)、《全能主义政权与威权主义政权》(2000)以及《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1996)。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担任世界民意研究协会会长、国际社会学会政治社会学委员会主席、国际政治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于 196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欧大学、牛津大学,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及政治学系教授。斯泰潘教授出版了《多民族社会的民主:印度及其他国家》(2007)、《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1996)、《民主政体的崩溃》(1978)等多部著作。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院士。

林茨教授与斯泰潘教授合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欧洲》被认为是第一部对南欧与南美的民主巩固过程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著作,也是第一部将后共产主义欧洲纳入比较政治和民主理论研究的著作。著名学者福山指出:“这部权威性的著作,凝结了两位作者致力于民主崩溃、转型和巩固研究的毕生努力……他们所指出的民主巩固的五个必要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社会——以及他们提出的众多分析性范畴,如后极权主义,有望成为标准的分析框架;而他们关于前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是苏联学(Sovietology)回归主流比较政治学的

标志。”

笔者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之时,曾多次听人提及这部著作,始知该著对于研究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性;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以后,对民主转型研究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2005年12月,当杨光斌教授嘱我代为主持浙江人民出版社委托的这部重要著作的翻译工作时,笔者惶恐领命,希望借此机会增进对于民主转型及巩固的系统理解。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前言与致谢,第一、二章,孙龙;第三章,许柳青;第四、五章,胡杰容、孙龙;第六至第九章、索引,张勇;第十至第十三章,张潇爽;第十四章,韩芳;第十五章,袁帅、孙龙;第十六章,于乔霖、孙雪锋、孙龙;第十七章,蔡菲菲、蔡丽蓉;第十八章,刘向辉;第十九章,于景浩、刘向辉;第二十章,杨伊玲、王师;第二十一章,石谨,姚文、孙龙。

本书翻译得以顺利完成,仰仗于众多师友的共同努力。笔者接手翻译组织工作之时,杨光斌教授已安排人手承担了绝大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景跃进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之时,多次来函勉励笔者认真组织翻译和校对,还抽出宝贵的时间,校阅了初稿,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意见。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系吴强博士就有关重要术语的翻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许柳青不仅承担了第三章的翻译,还协助笔者重点校阅了第十七至二十章。在最后定稿之前,张勇、曾毅、徐曼珊、范静菲、陆央云、滕岑等协助统校了索引。在此,特别对以上老师和同学致以诚挚的感谢!

必须指出的是,没有浙江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利波女士的敦促、支持和奉献,本书是根本不可能问世的。她和她的同事王鑫为此书的编辑、校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每一次的校对过程中,他们不但耐心地指出了译文中的错漏之处,而且还协助笔者做了大量的修改和统一工作。对他们的敬业和负责,笔者代表全体译者在此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

最后,笔者愿在此就若干重要概念、术语的翻译,进行几点补充说明。

其一是“totalitarianism”,该词在中文之中有多种译法,其中“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两种翻译均得到了广泛接受和传播,本书初稿即采纳了第一种译法,后来在统稿之时,综合考虑了本丛书主编意见及出版社要求等多方面因素,统一采用后一种译法。

其二是“democracy and its arenas”,“arena”一词大致有“舞台”“场所”“场域”等多个义项,若进一步引申,可翻译为“条件”,部分港台学者在引用本书

时,即曾译为“民主及其条件”。在统稿之时,笔者接受复旦大学政治学系陈周旺博士以及本书责任编辑王利波女士的建议,在多数场合译为“民主及其场域”,在某些语境之中则仍然采用了“民主及其条件”的译法。

其三是“hierarchical military”与“nonhierarchical military”,目前中文之中似乎无准确而贴切的译法,有的译为“等级制军人”或“非等级制军人”,有的译为“高阶军人”或“低阶军人”,也有的译为“高级军官”与“中下级军官”,三种译法均未能从组织形态意义上揭示军人干政的形式,本书多数地方译为“高级军官”与“中下级军官”,在有些情境下则根据语境作了适当变通。

其四是“Civil-Military Relations”,大陆有“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几种译法,港台及海外学者比较多地翻译为“文武关系”,考虑到大陆述及军政关系一词之时,常常是“党政军”并用,而军民关系主要是指军队和普通公众之关系,故本书采用“文武关系”这一译法。

其五是“Nomenklatura”,该词系指苏联时代数量非常少的一群精英,一般而言,他们都具有党员身份,掌握着政府、工业、农业、教育等各个主要领域的关键管理职位。该词在中文中尚无非常令人满意的译法,笔者将之统一译为“党国权贵”。

笔者深知学术翻译工作对于当下中国学术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译事之艰辛,以及译者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翻译得好,是译者应尽的本分;而翻译得不好,则有愚弄学界、误导同仁之嫌。因而,在承担本书翻译工作的近两年里,笔者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尽力抽出时间围绕本书展开统稿、修改及校对工作,并对数章初稿进行了全文重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改定稿,有如爱因斯坦之板凳,与先辈学人所倡导的标准和各位同仁的殷切期望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译者已经尽力而为。

由于原书作者视野开阔,涉猎甚广,覆盖了十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同时,也由于本书参与译者较多,他们的知识背景、行文风格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由于笔者学识、时间和精力有限,本书译文难免存在错谬之处,诚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期将来改进。

孙 龙

2007年12月于北京海淀知春里